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美国通史

第4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本卷主编 余志森

人民出版社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2000



VOL.1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1775

VOL.2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75-1860

VOL.3 AMERICAN CIVIL WAR AND GILDED AGE 1861-THE LATE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VOL.4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9

VOL.5 THE AGE OF FRANKLIN D.ROOSEVELT 1929-1945

VOL.6 POST WW II AMERICAN HISTORY 1945-2000

美国通史

第4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著者 余志森(本卷主编) 王春来(本卷副主编) 王锦瑭 陆甦颖 陈晓

人民出版社

美国通史

总主编（按姓氏笔划）　刘绪贻　杨生茂

策划/编审　邓蜀生

第一卷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著　　者　李剑鸣

第二卷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著　　者　张友伦（本卷主编）　陆镜生　李　青等

第三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著　　者　丁则民（本卷主编）　黄仁伟　王　旭等

第四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著　　者　余志森（本卷主编）　王春来（本卷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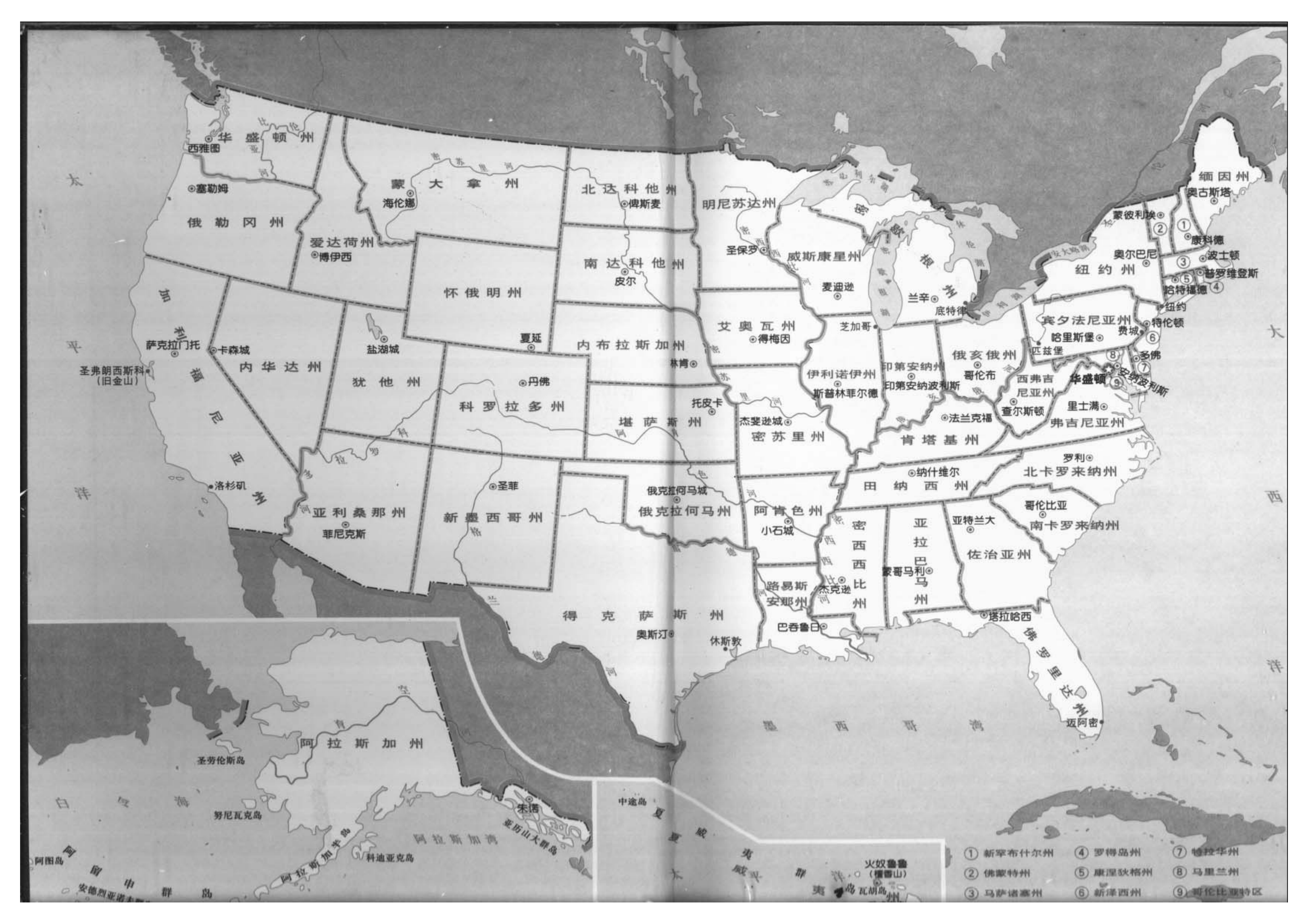
王锦瑭　陆甦颖　陈　晓

第五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著　　者　刘绪贻　李存训

第六卷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著　　者　刘绪贻（本卷主编）　韩　铁　李存训



太平洋
大西洋
墨西哥湾
华盛顿州
西雅图
俄勒冈州
塞勒姆
爱达荷州
博伊西
蒙大拿州
海伦娜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密歇根州
兰辛
底特律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康科德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奥尔巴尼
纽约州
纽约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费城
特伦顿
多佛
安纳波利斯
华盛顿
巴兹堡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怀俄明州
夏延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伊利诺伊州
芝加哥
斯普林菲尔德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
堪萨斯州
托皮卡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阿肯色州
小石城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佛罗里达州
塔拉哈西
迈阿密
阿拉斯加州
朱诺
圣劳伦斯岛
努尼瓦克岛
科迪亚克岛
阿拉斯加半岛
阿拉斯加湾
亚历山大群岛
白令海
阿留申群岛
阿图岛
夏威夷群岛
中途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瓦胡岛
夏威夷州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⑦ 特拉华州
⑧ 马里兰州
⑨ 哥伦比亚特区



太平洋
大西洋
墨西哥湾
白令海
阿拉斯加湾
华盛顿州
西雅图
俄勒冈州
塞勒姆
爱达荷州
博伊西
蒙大拿州
海伦娜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密歇根
兰辛
底特律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怀俄明州
夏延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伊利诺伊州
芝加哥
斯普林菲尔德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费城
匹兹堡
纽约州
奥尔巴尼
纽约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康科德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特伦顿
多佛
安纳波利斯
华盛顿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
堪萨斯州
托皮卡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阿肯色州
小石城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佛罗里达州
塔拉哈西
迈阿密
阿拉斯加州
朱诺
圣劳伦斯岛
努尼瓦克岛
阿拉斯加半岛
科迪亚克岛
亚历山大群岛
阿留申群岛
阿图岛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中途岛
夏威夷群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瓦胡岛
夏威夷岛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⑦ 特拉华州
⑧ 马里兰州
⑨ 哥伦比亚特区

著者说明

本卷为《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内容包括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的对外扩张，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实现，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金融崩溃。全书共11章。引言、第1、2、3、10章为余志森撰写；第4、5、6章为王春来撰写；第8、9章为陆甦颖撰写；第7章为陈晓撰写；第11章为王锦瑭撰写。全书由余志森统稿修订。附录3种均由俞世恩编写或编制，余志森、陆甦颖核定。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郭尚鑫和李治国。

本卷的初稿在分卷主编加工的基础上，由刘绪贻、杨生茂两位主编进行全书统稿，并由分卷主编进行最后加工。

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朱庭光、张椿年两位研究员曾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一些美国历史学家为帮助我们掌握美国史学界的美国史研究最新成果和信息，不断给予支持和赠书。我们一并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刘绪贻、丁则民先生和王寅女士还专门提供了大量极有学术价值的英文原版著作，刘绪贻、杨生茂、邓蜀生先生拨冗对提纲进行认真审阅，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李世洞先生专函寄来他的写作纲要供我们参考。孟庆龙先生也为本书的资料收集提供了帮助。本卷在编写中力求反映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准，对于国内美国史研究者和同行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时间紧迫，水平所限，诚恳希望读者和同行对本书的不足与缺点，提出宝贵批评和帮助。

2001 年 9 月 10 日

目　　录

引　言

19—20世纪之交（1898—1929年）是美国历史上全面完成始于南北战争以来（即镀金时代）的巨大转变的时代，是美国自独立以来变化最快、最猛、最烈的时期之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基本实现。美国经济、科技、文化高速发展，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速转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美国在世界上由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跃而为国际一流的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从殖民地跃至世界一等强国，在西半球陡然崛起，并开始雄心勃勃地越过大洋向东半球肆意扩张。

崛起和扩张成为美国世纪之交的时代主题。美国在崛起中扩张，在扩张中崛起。

取代旧霸主英国，追求世界首强地位，为垄断资本开拓海外“新边疆”，成了美国统治者和财团大亨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美国政府制订对外政策的指路星辰。1898年美国终于与老牌帝国西班牙打响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枪声，从而揭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活动的序幕。美国扩张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太平洋在新世纪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伴随着美国国内扩张主义思潮的鼓

嗓声，美国军舰和军队把星条旗插向从老牌强国西班牙手中夺取的新领地：菲律宾、古巴等地；他们越过太平洋以菲律宾为跳板向中国进军，正式提出对华的“门户开放”照会，形成了美国独立的对华政策；派遣军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并积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向中国渗透，企图让东方文明古国“西方化”和“美国化”。美国近邻拉丁美洲历来是它扩张的重点地区之一。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新门罗主义——“罗斯福推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扩张主义政策。美国政府“用不太高尚”的手段攫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调解了委内瑞拉危机，拒欧洲列强于拉丁美洲之外，军事占领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国。

在美国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扩张主义思潮又沉渣泛起并达到了新的可怕高度，由于它承继了传统扩张主义（基督教“使命”原则和“天定命运”论）思潮的精髓，又有现代帝国主义为追求高额利润的经济军事扩张野心，因而变得更富侵略性、扩张性和欺骗性。美国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潮展开激烈辩论，力排众议，言之凿凿。对外扩张虽然加速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最终也使它遭到了报复。

巨大的发展以巨大的代价为条件，迅猛崛起以沉痛的牺牲为前提。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给美国带来巨变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工业社会综合症：复杂的工业社会结构和城市分层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产品的极大丰富与分配的不合理，提高效率和公平原则间的矛盾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垄断的无度和无序膨胀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致使中小资本强烈不满；权力和金钱的联姻，垄断集团和政府的勾结，导致政治腐败，丑闻迭出；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生活的空虚，造成文明的失落和道德的沦丧；千百万外来移民为美国带来勃勃生机，也

导致城市贫民区域的扩大和蔓延。美国就像一架正在起飞冲向蓝天的飞机，在起飞时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和失衡。及时改革和调整成为美国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进步主义运动就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虽然很难说这是一场有统一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全国性运动，但它确实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黑人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在内的强大社会运动是它的直接推动力量（有的属于运动本身的组成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了先导作用，他们首先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作为运动的理论指导，他们揭露黑幕为改革制造有力的舆论，在联邦、州、市镇各级改革派和各领域改革派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各类社会改革。最后美国政府采用立法手段将改革成果肯定下来。这场运动体现了群众性的某些自发性也兼具政治精英们的自觉因素，运动中的局部目标和地区目的虽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大的改革方向上是一致的。进步主义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果。在政治上既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又扩大了人民的选举权。既扩大了选举的范围（如参议员由民选产生），也扩大了选民的范围（选举权扩大到了妇女）。市政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取消了城市政治机器（城市老板），摸索和建立了若干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对建立现代管理体制和遏制政治腐败起到了积极作用，修正和理顺了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使资本主义顺利地由“自由”竞争体制向垄断体制过渡。在社会和劳动方面，一些立法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劳资关系，政府以总裁者自居宣称“公正施政”。通过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有关保护儿童和妇女权益的法规等。在文化思想上涌现了进步主义文学、进步主义教育、进步主义史学等积极成果。

进步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说是美国社会对工业化作出的一种反应。为了适应已经工业化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作出相应改革。这种改革既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发展又要避免工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现。资本主义制度由自由体制向垄断体制的转化必然引起社会阵痛和震动，进步主义运动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对其体制内的部分结构和游戏规则作出调整和修正，使之适合新的历史条件。它也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场改革，目的在于使美国从传统社会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化。改革中的某些举措具有现代化意义，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同步发展。

在美国工业化和改革进程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这是一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人类史上的巨大悲剧，对美国却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机遇。美国从开始的中立，最后走上通向战争之路，抓住了机遇从战争中获得巨大利益。战争使美国成为提供军事物资和生活资源的军火商和世界工厂，大发战争横财；战争使美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美国人民为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后美国提出以建立国联为中心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美国企图建立以它为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蓝本。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共和党人再次入主白宫。鉴于美国人对国家干预和一战期间的军事轨道的反感，三届共和党政府又回复了自由放任政策，当然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管理革命和科技创新，在经历短暂危机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美国工农业总产量在世界上独居鳌头，美国人过着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准的生活，尽管仍有许多贫困人口存在。在外交上，美国政府从实用主义出发，时而采用孤立主义，时而实行扩张主义，总的战略是企图巩固其扩张

高潮期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列强之间美国极力鼓吹裁减军备以建立某种均势，维护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和平局面。为此美国参与对新生苏俄的武装干涉和所谓的对苏经济援助；在远东与日本既勾结又有矛盾，继续支持中国军阀政府侵犯中国人民利益；在拉丁美洲美国企图巩固在那里所建立的亲美政权，稳定“后院”；在欧洲继续在英、法、德等大国之间搞平衡，不使德国过于贫弱而失去对抗英法的牵制作用，大力推行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企求在欧洲均势中保持美国的特殊地位。

20年代对美国人说来也许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也许还是一个繁荣的年代，那时有人不是已经断言福特“打败”了马克思了吗？但是，在美国20年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潜伏着阴森森的危机，当美国人沉醉于舒适的住宅、漂亮的小汽车、便捷的电冰箱、洗衣机和无线电等等物质享受，争先恐后抢购股票渴求一夜发财的“幸福”时刻，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的滚滚乌云正在向他们袭来……。本书的最后一个句号就在此划下。从此，美国进入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第一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变化往往是衡量时代的尺子。如同总的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似江海的波涛潮涨潮落，其间总会出现若干快速飞跃的高涨时期，即巨大变革时期，质变或部分质变或巨大的量变时期，从一个阶段跃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20世纪初年的美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性时刻。虽然这种巨变始于美国南北战争以后，但这场变化的完成和最后成果的取得却是新世纪开端的20—30年里。这种变化是全面、深刻和多层面的，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完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基本实现。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

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发展的必然产物。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具备了开展新工业革命的各种前提条件，成为人

类史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美国内战以后特别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新工业革命，90年代后向纵深发展，20世纪初工业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新工业革命成为推动美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生产力飞速发展，新产业层出不穷，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美国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思想文化有新的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变革。总之，美国是带着丰硕的成果、巨大的转变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的。在新世纪开初的岁月里，整个美国社会经历了数十年的巨大变化以后，以崭新的但令人震惊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从此美国社会开始完全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之上。

〔完成新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　内战以后美国北部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首先，在经济上美国已有大量资本积累可供发展新工业部门之用，为工业进一步集中与资本集中奠定了雄厚基础。根据美国1900年普查报告，投人工业的资本在10年内增加了50%。1900年拥有100万美元资本的工业公司已并不少见。

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是美国深入开展和完成新工业革命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1905—1910年出现移民高峰，来自南欧和东欧国家的移民为美国的工农业发展和进一步开展新工业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1896年以后，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数首次超过来自西欧北欧的移民。1902—1914年短短12年里的移民总量超过1820—1880年间60年的移民数。1907年据美国国会有关部门的统计，在美国的钢铁、煤矿、建筑、铜矿和炼油等基础工业中，外国出生的工人平均占劳动力的60%。棉制品工业的劳动力，如洛厄尔19世纪创立时的劳力全部是当地的农村妇女，20世纪初

它的几乎70%的劳力是外国出生的。[1] 移民不仅充当了劳动力而且为美国带来了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他们还承担了美国工业发展中那些最艰苦、最繁重和最危险而本地工人不愿干的工作，他们充当了美国新工业革命中的主力军。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得益于因圈地运动破产的自耕农作为主要劳动力来源的话，那么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受惠于大批从世界各地离别家乡而来的移民。

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增强的内需是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得以深入开展和最后完成的前提条件之一。虽然当时美国不如英国法国那样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所形成的商品市场，但是美国有着英法无法比拟的国内市场和日益增长的内部需求。人口迅速增长直接导致了内需的扩大，自南北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口从3150万增长到9200万。铁路交通的迅速发展直接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形成。1902年美国的铁路线几乎已经编织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它已经可以直接或接近全国所有的大小村庄。“这个庞大的铁路网有助于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从而促进了大规模生产和‘巨型企业’的成长。”[2] 全国铁路网的建成使各地货物可以根据商业利益运往全国各地，经济利益成为指导货流的主要因素，国内贸易获得迅猛发展。国内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国内商业的活跃，国内从事商业的人员比例激增。

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是完成新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开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基础，在它的最后完成阶段，科学技术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初，美国进入

---

① 卡尔·N·德格勒：《今从史出：形成当代美国的力量》，哈泼和罗出版公司，1959年，第282页。

② 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1年，第413页。

了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的突飞猛进阶段，成为“发明时代”；新发明层出不穷，新产品令人眼花缭乱。19世纪末所开放的技术发明之花在20世纪初结出丰硕成果，科学成果迅速转化为新产业。在使科学成果和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方面，美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成就。美利坚民族的求实精神导致了美国人重视科学试验和技术改进的优良传统，虽然美国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它们没有成为新技术发展的障碍，20世纪以来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对于新工业革命的最后完成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发明家成为企业家，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新产业。

美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新工业革命的完成提供了有力保证。美国有丰富的煤、铁、有色金属、森林、石油为新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产业，如：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采矿冶炼等等提供了丰裕的物质资源。美国辽阔而肥沃的土地给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地。20世纪初美国进入农业繁荣时期。1910年的美国农业总产值高达90亿美元，大约比1899年增加了1倍。高水平的农业又为工业化铺垫了厚实的基础。美国是两洋国家，它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则为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最佳良港。

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来的，有利条件则是为能抓住机遇的人们准备的。美国不仅具备了上述天时地利条件，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抓住了历史机遇，他们利用南北战争的革命胜利成果，利用这场革命所创造的稳定的政治局面，集中民族的全部精华和精力，在19世纪最后30年开展工业革命，进入20世纪后又不失时机地完成了这场新工业革命。

〔*新工业革命的完成*〕　新工业革命完成于何时何刻难以划定具体时日，况且工业革命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发展也不平

衡。这里我们所言工业革命完成是指整个美国国家而言，新工业革命兴起于“镀金时代”，完成于20世纪初，即“进步主义时代”，历时半个世纪之久。新的标志性产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可以被视作新工业革命深入发展和完成的重要标志。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机器制造业的诞生，那么新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代表这场革命的新产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确立了主要地位。20世纪初美国的新产业已经最后形成并得以充分发展，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经济革命首先表现在动力上的革命。1860年美国的畜力几乎占全国非人力动力构成中的2/3，1890年，改进了的蒸汽动力已成为全国总动力中的60%，1900年，两个新动力即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构成了20世纪工业的基础。[①] 恩格斯早在1883年以其敏锐的目光预见电力革命的前景，他说：“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确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但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②] 20世纪初电力工业部门成为美国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重要部门之一。1913年美国发电量达到248亿度，1919年电力达到全国动力总容量2940匹马力的1/3。电的发明应用也进入新阶段，1910年美国出现了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发展到电子管时代，1910年美国已有电话700万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最早的电影院。

石油工业也是新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产业。1900年它

---

① 卡尔·N·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斯各特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77年，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5卷，第445—446页。

已达到每年6362万桶的稳定高产。石油炼油技术继续改进，特别在高温高压作用下分解石油的新技术和制造合成汽油的工程技术都有突破性进展。与此相关的化学工业也成为独立工业部门。

钢铁工业的发展是新工业革命的产物。1860年美国生铁产量100万吨还不到，1915年已超过3300万吨，1899年已占全世界生铁产量的1/3。1899年美国的钢产量已占全世界的43%。

汽车工业是最具代表性的新产业。它的诞生和发展被称为一场“汽车革命”。[①] 美国发明家亨利·福特在1903年与人在底特律创建福特汽车公司并且运用部件标准化原理，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产品，使美国汽车工业迅速扩展，他生产的汽车价格直线下降，1909—1910年，每辆汽车的价格从780美元跌至360美元。1914年美国年产汽车57.3万辆，1920—1921年福特汽车公司年生产量为125万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

新的工业体制和管理体系的诞生和完善是新工业革命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大企业的形成和自动生产流水线的诞生和定型。大企业的出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特有现象也是工业体制上的重大变革。而生产流水线的出现是工厂管理制度上的一场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工厂制取代了工场制，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以大生产和流水线生产取代一般小规模机器生产的过程。自动生产流水线的诞生是与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分不开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贡献巨大。早在1903年他就说过：“制造汽车的办法就是使一辆汽车和另一辆汽车一样，使它们全都一样，使它们在出厂时完全一样。”为此他认为某一型号汽车的零件，不仅对同一型号的所有其他汽车是通用的，而且和他们已经生产出来的所有汽车的相似零件也是通用的。为了实践

---

① 弗雷德里克·L·艾伦：《巨变》，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2年，第121页。

他的理想，他在汽车工业中创立了自动生产流水线。1917年福特的里弗鲁日汽车厂就是按照连续生产流水线的要求建成的。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式工厂。“工厂如今成了一辆汽车从布置在关键地点的工人们照管的装配线上逐步完成的地方。”① 管理革命既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泰勒管理制度的诞生也是新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

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连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人也对此大为吃惊。1902年一个英国工会领袖代表团访问美国，企图寻求美国生产迅速发展的“秘密”，最后他们发现谜底就是：在美国工厂中广泛使用了机器。一位成员在报告中写道：美国人“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用上了节约劳动的数字，实在令人震惊”。②

〔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　探究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特点和经验是有益的。首先，在工业革命中涌现的工业研究试验室是成功的尝试。虽然工业研究试验室的建立并非美国独有，但是继爱迪生在门罗公园建立工业实验室以后，美国在20世纪初涌现出了大批工业研究实验室，无论其规模和作用都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在美国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终于找到了它的安身立命之所，使它得以空前地发展起来。它是美国20世纪的一个奇迹。”③ 事实证明这是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新产品迅速产业化的有效途径。1900年通用电气公司建立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32岁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威利斯·惠特尼为它的

---

①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南北战争以来的经历》（中译本），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797页。

② 德格勒：前引书，《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31页。

③ 布尔斯廷：前引书，第783页。

第一任组织者（1900—1928）。他在斯克内克塔迪（纽约）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并任该室主任，后又物色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科学家进行共同研究。1902 年，他发现用敷金属的炭丝制作白炽灯的亮度比原来的灯丝增加 25%。后来他一直研究现代电灯泡的工作。1905 年美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库利吉参加实验室工作，3 年后（1908 年）他帮助惠特尼完善了钨丝的制作使之成为现代照明灯泡的组成部分。后他又对 X 射线管进行研究改制使之能产生可以预测的精确的辐射量，获得专利并开创了 X 光的新时代。库利吉管成为现代 X 射线管的原型。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门新兴科学中又取得领先地位。美国物理化学家欧文·朗缪尔 1909 年加入实验室工作。他的研究表明在灯泡中加入惰性气体能大大延长灯泡寿命。他又发展了真空泵和无线电广播用的高真空电子管，后还提出新的原子理论等等。

工业研究实验室同美国巨型企业的命运是互为依存紧密相连的。企业提供大量资金资助科学家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科学家们的新发明新创造反过来给企业带来新产品、新成果、新活力。一个巨型企业光靠优质的老产品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它的任务是促使事物变成陈旧过时的东西。私人咨询实验室创始人阿瑟·利特尔对纤维素产品进行投资取得成功，他的研究成果分别为柯达公司和拉斯特龙公司所利用。1916 年他到坎布利奇，不久就在被称为利特尔研究大厦的实验室里与研究人员们一起进行十分广泛的研究工作。1919 年，利特尔成功地在试验性工厂中发明了一种试验性造纸机，帮助确立了在大规模投产前特别建立的工厂以试验新技术的做法。利特尔的信条是“研究是工业之母”。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

20 世纪初，美国许多大公司认识到建立工业实验室的重要性，实验室如雨后春笋在美国土地上崛起，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重

要产业，如：石油、化学、电话等等。1902年美国杜邦家族通过合并100家商号创建杜邦公司，并于1911年建立杜邦实验室，公司产品由单一生产火药开始转入产品多样化和投资多样化。1884年开办伊斯曼干片和胶卷公司的乔治·伊斯曼于1912年建立了柯达实验室。1927年伊斯曼—柯达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摄影工业公司之一，垄断了美国的摄影工业。1913年美国橡胶公司实验室建立。1899年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被迫解散而成立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1919年新泽西建立美孚石油公司实验室。1925年贝尔电话实验室建立，它的总办事处设在新泽西州的默里希尔，成立后有上万件科学和工程技术得到革新取得辉煌成就，现已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威性的研究机关之一。在这种有效的研究机构中，一些学者、科学家和发明家大有用武之地。一些教授走出校门，跨入实验室投身于科学和企业结合之路，因而在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中，美国涌现出一批由发明家兼企业家的新型企业家。

其次，美利坚民族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识对工业革命的完成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早在19世纪美国就涌现了一大批发明家如：发明轧花机的伊莱·惠特尼、研制成高压蒸汽机和纤维精梳机的奥利弗·埃文思、发明缝纫机的伊莱亚斯·豪、开创炼乳工艺的盖尔·博登、电报发明人和建立第一条电报线的塞缪尔·莫尔斯、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第一架柯达照相机的乔治·伊斯曼、发明赛璐珞制造法的约翰·海厄特、发明凹衍射光栅的美国物理学家亨利·罗兰等等。美利坚民族是一个移民构成的民族，移民具有一种特别的创造精神，他们敢于探索新领域、开拓新边疆。美国科学家强调科学发明和发现的应用性，强调科学成果的开放性，美国第一任物理学会主席亨利·罗兰在1899年发表演说“呼吁美国纯科学研究”时指出：“我们能够想像一位隐居哲学家

也许能作出许多有益的发现，然而，要是他将此藏之于自身，他决不可能要求它对世界有任何裨益。因为他的未公开的成果仅是他的个人所得，于世界尚无补益。只有当他使这些发现用强有力的语言让世人知晓并足以引起注意和相信这是真理时，人类始能受惠。"[①] 在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中提倡学术自由，造成一种自由研究科学的氛围有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美国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提出学术自由的主张，1899 年 6 月 30 日该大学通过决议宣布，大学教师在任何课题上有演讲自由是该校的基本法则，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能改变它；教授的观点只代表他本人，校方不支持有争议的任何一方。[②] 这种学术氛围和倡导鼓励了美国人的创造力。一位美国权威人士说得好："工业中的这种方法的发展来源于我国人民的创造力。他们不受传统势力或因循守旧的习惯所束缚，爱好机器作业，特别热衷于寻求最好最简单的机械化生产方法。[③]

凭借 19 世纪的积累，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人经过发明创造又推出了大批新的实用性成果。1900—1915 年授予专利 96.9 万项，平均每年获得专利的发明数超过 1860 年以前整个美国历史上所获专利的总和。当然要推广这些发明并使这些发明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大量有技术的、勤奋的工人。一位专利局的官员在 1900 年这样写道："要利用这些发明取得最好的效果需要美国工人的聪明智慧，结果导致了聪敏的发明和爱思索的人的结合。在聪敏的机器后面糊涂人是毫无用处的。" 为了使劳动者适应工业化的要求，美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是惊人的。一位权威人士估

---

① 不列颠大百科出版公司：《美国年鉴（第 12 卷）1895—1904，平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改革》，芝加哥，1968 年，第 262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499 页。

③ 转引自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第 386 页。

计在公共教育上，美国从1860年投资6000万美元猛增到1900年的5亿300万美元，到了1910年，美国70%的黑人男子和95%的白人男子有文化[①]。

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给美国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划时代的巨大后果，使美国社会从底层到上层，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文化到社会习俗，甚至连美国人自身的生存方式似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是美国在20世纪初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新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美国的经济基础完全建立在全新的大工业和大公司基础之上，并且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美国的社会领域以城市生活为特征的全新生存方式展现在美国人的面前，大都市崛起，摩天楼矗立，贫民窟相伴而生；在社会经济制度领域内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更高的阶段：从巨型企业、大银行到垄断大财团，直到垄断资本主义，即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在美国最后确立。

二、工业化的实现

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是同步的。20世纪初，美国新工业革命完成之时就是美国工业化实现之日。农业机械化的开始是美国工业化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美国农业机械化的开始〕　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一样，农业革命往往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它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农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美国走了一条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以对美国农民最有利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加上土地辽阔肥沃，土地投机买卖盛行，美国农业发展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31页。

持续稳定，高产多样，基础厚实，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它既为工业人口提供充裕的生活保障，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工业原料；其次，大量的农业人口（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农村的美国人占总人口一半以上）既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产业工人的后备大军，又构成购买国内工业品的巨大市场。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农业始终是推动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完成同样需要依赖农业的坚实基础，同时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完成反过来又会大大促使以机械化为核心的农业革命的实现。美国有关农业发展的统计资料表明，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农业的机械化开始有一定发展，但真正的全面的机械化却开始于1910年以后，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阶段，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1902年，C.W. 哈特与 C.H. 帕尔合作研制成第一台汽油拖拉机，被称为“老式一号”。后来他们创立“哈特—帕尔公司”，专门生产此类拖拉机。直到1913年以后汽油拖拉机才胜过蒸汽拖拉机而得以推广。1900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大农场上，巨型蒸汽拖拉机拖着16张犁、4个耙和1架播种机，同时犁地和播种，一天作业面积为50英亩。在干旱地区人们又发明风力抽水；为翻耕硬地，农民使用新式冷硬铸铁犁。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各种机械被陆续发明和应用。

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的规模生产，因而农场数也大为增加，1860—1916美国农场数从200万个增加到640万个。农场的财产也得益于机械化，全国农场的财产激增，1860年仅为70亿美元，1910年高达360多亿美元。[①]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860年到1910年，每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获面积由

---

① 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前引书，第516页。

每年12英亩增加到23英亩，几乎翻倍。小麦生产增长近3倍，达1632万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国，玉米生产增长2.5倍多，达6858万吨，棉花增长约4倍，达217万吨。1910年美国农业总产值高达90亿美元，一位观察家不无自豪和夸张地说："美国农业一次收成，就可以把比利时王国的一切连同国王一起买到手；两次收成可以买进意大利；三次收成可以买来奥匈帝国；五次收成，如按现货交易价格折算，能够把俄罗斯帝国从沙皇手里买进来。"①

与此同时，农业的功能和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重要变化，农业商品化加速是最大特点。美国农民不仅提供国内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工业原料，而且为出口农产品进行生产。1910年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占输出总值的51%。主要输出畜产品和粮食（小麦），还有棉花。20世纪初美国农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地价不断飙升，由于西部边疆被宣布结束，政治家们预言粮食将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因而引起人们的恐慌，1900—1920年美国土地价格飞涨，抢购土地成风。

当然，因为美国是一个地域十分广阔的国家，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发展很不平衡，从地区分析，美国西部和北部机械化速度最快，特别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中部大西洋沿岸和中央平原东北部发展最快。1910年美国农场约有38%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上。20世纪初，全国小麦生产中心向西迁移，转向南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州，同它们毗邻的东部诸州形成了玉米带。1909年仅艾奥瓦和伊利诺伊两州的玉米产量就占全国的28%。为适应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需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北部，农民们大力发展乳牛、家禽的饲养，开发水果蔬菜以满

---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31—532页。

足城市居民之需。西部地区随着开发的加速，原来发展较慢的农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20世纪初太平洋沿岸各州在农业上开展多种经营取得成效，加利福尼亚州很快成为全国的水果生产基地。南部的农业在很快医治好战争创伤以后，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遇，生产飞速发展，特别是棉花生产占有特殊地位。1909年南部农民的棉花产量为1060多万包（但是棉花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一直不高）。此外南部还生产烟草、稻米、蔗糖等等。

〔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形成〕 美国全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数十年，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后完成，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在全国范围内工业迅猛发展，并从北部向南部和西部扩展。“大企业时代”取代了“小企业时代”。1865—1900年工业产品价值增长了500%，20世纪初增长率更高。新的工业部门和大型的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最后占主导地位，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工业城市相应涌现，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也可见一斑。1860至1914年间美国人口增长3倍左右，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却增长了5.5倍，工业所创造的产值增长了12倍，投资在工业的资产增长22倍。1890年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

在经济领域，机械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初美国工厂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力，广泛采用先进的经过改进的机械。由于机械化程度高，工厂主们尝到使用机器的甜头。1902年一个英国访问团访美，其成员斯蒂门在参观后这样说：“美国工人并不比他们的英国兄弟干得更累，而是存在着使用最新改良机器的趋势：一台新机器应该在今天使用；更好的机器在明天出现，将生产更多产品；最好和最新的机器已准备好，而不管它的价格多少。”他又说：“（我们）使用机器是为了降低工资，而美国却意味着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他们的雇主

鼓励工人这样做。”[1] 另一位英国代表认为美国雇主并不比英国雇主更爱他的工人，而是他认识到新式机器的效益。

美国实现工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是从地域上看，全国性的工业扩张取得成效。美国北方的工业革命起步早，历经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是美国南部和西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大多数州以农业经济为主体。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推进，工业化浪潮席卷南方和西部，呈现出一派全国工业化的新气象。南方本是美国最落后的农业地区，工业化程度低下，但是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也席卷了那里，南方出现了一个所谓“北方化”的过程。特别是盛产棉花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纺织工业，1915年全美国棉花制品总量中60%是南方出产的。期间一些北方的工厂为利用南方出产棉花的优势纷纷迁至南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南方的钢铁和采矿也发展起来。特别是得克萨斯州石油的开采已成为20世纪初南方工业化的标志。路易斯安那的硫磺和其他化学工业得到发展，木材工业几乎在南方所有具备森林资源的各州发展起来。烟草工业也同样获得进展。一战前，美国南方已经初步实现了“北方化”，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变化，因为这表明北方的工业之路已为南方所接受。诚如美国学者德格勒所说：“当然，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工厂传入南方只是深入到南方生活的表层而已，因为对绝大多数南方人包括黑人和白人而言，土地和季节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正如他们的父辈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但是，对于将来南方的工业化却是一件奇迹，它标志着南方熔人国家的开始，与农业传统决裂已经作出，按照北方的形象重塑南方业已开始。随着工厂进人城镇，黑人和白人慢慢

---

[1] 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44页。

地重塑农业的南方，正如他们一直在总体上重建美国文明那样。”[①] 20世纪初美国地区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一些落后地区迅速发展了工业，卷入全国工业化的潮流。

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在全国所有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全面推进；就工业部门而言，它的各种产业都卷入这个过程。除了工业革命中所涌现的新产业外，传统产业也得到改造和技术更新。

工业发展规模巨大、资金雄厚是美国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到1900年大企业形式在美国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矿产品总产量的86%和工业品的2/3都由企业所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北方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并没有带来如20世纪初那样的工业化的深刻程度。只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才给美国带来以大企业为特征的工业化的辉煌成果。其中的差异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工业的差别，不但表现在规模和经营方面，更在内在的结构方面有重大差别。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巨型企业”不仅仅在企业的规模上、外形上远远超过以前的工厂，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企业包含了许多独立的各不相同的运作单位，他们被一些不同等级的工薪行政者所管理。[②]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是否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判断工业化实现与否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建立起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工业体系已经完全不依赖别国而能独立运转，具有独立的能源供应和机械制造能力，门类俱全，部门完整，因此能够生产出本国所需要的一切主要工业品，这个工业体

---

① 本段内容参见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56页。

② 查尔斯·卡尔洪：《镀金时代》，特拉华，学术资料出版公司，1996年，第10页。

系又具备持续发展的潜能和与外国竞争、接受挑战的能力。

20世纪初美国已完成了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变。美国学者查尔斯·卡尔洪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说："期间，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前延续至1900年以后。"

他又说："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世界中能够炫耀它规模最大的、发明最多、生产能力最强的经济。它的公民享受着地球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些发展深深地引起了许多忧虑，这就是该时代许多政治纷扰的焦点。"[①]

有关美国工业化完成的时间美国学者见仁见智。[②]

〔现代铁路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和远西部的成功开发〕

一般而言，交通运输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先行官，美国的经济腾飞依赖交通运输的完善和发展；工业革命取得的成果又直接推动交通运输业。如：美国钢铁工业的进展为铁路事业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为钢轨取代铁轨创造了物质条件。20世纪初，美国的交通运输网络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建成和完善。广袤的大陆已被纵横交错的铁路网连成一片。1900年，营业的铁路线已在19万英里以上，超过欧洲铁路线的总长度，几乎等于全世界铁路线的一半。铁路网的建成和铁路的延伸成了远西部开发的先决条件。可以这样说，随着铁路线的延伸，令人目不暇接的工业品和

---

① 卡尔洪：前引书，第9页。

② 有的美国学者将美国工业化完成的时间划在19世纪末，如：美国学者塞勒斯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阶段在19世纪末完成的。"见查尔斯·塞勒斯等：《美国历史专题》，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芝加哥，1977年，第213页。

令人耳目一新的工业化信息被带到了僻远地区，工业化也随之在那里逐步开展，新的居民点和城镇开始兴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对经济领域发生重大影响，而且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如：它还推动了美国现代广告业和邮购事业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借助铁路运输网络，艾伦·蒙哥马利·沃德开办邮购公司取得极大成功。理查德·沃伦·西尔斯利用铁路火车站代理人的有利条件兴办邮购公司后发展为庞大的商品零售公司，该公司发行的商品目录不仅数目惊人，而且影响巨大，甚至成为农民们喜爱和经常使用的“圣经”。铁路网的建成和完善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带动了西部的开拓，刺激了钢铁工业、能源开发等等，带动了整个美国工业化历史进程。

在铁路线蜿蜒曲折向西推进和移民辛勤开发西部的过程中，陆地“边疆”逐渐消失。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美国人长久熟悉的边疆已经消逝，因为“原先无居民的地区现已被一块块孤立的定居点插入，很难说还存在一条边疆线”。当然边疆的消逝并不意味着西部开发的完成和结束，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标志着西部深度开发和工业化的开始。1898年以后，远西部在前数十年开发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并取得可喜成绩，它们开始熔人全国工业化的大熔炉之中。西部边疆的消逝意味着印第安人的灾难。目睹印第安人状况的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威斯勒这样写道：“保留地给了印第安人一个天堂。从某种意义上，他成了集中营地的囚犯，虽然他的头皮是安全的。他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和教育。当然，印第安人远无幸福……因为征服者的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上。”[①] 90年代以后印第安人基本上停止了武力反抗。北美洲

---

① 罗德门·保尔：《远西部和大平原的转变：1859—1900》，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纽约，1988年，第138页。

最早的居民开始成为美国的最新公民。

20世纪初，美国远西部在以前几十年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新阶段，隆隆机器声代替了往昔的宁静，边缘地区呈现工业化的勃勃生气。就拿美国和墨西哥边疆地区来说，在沿着美墨边疆，从南得克萨斯经南加利福尼亚的广袤边地，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里发生了决定性变化，随着铁路的延伸，这些原来非常孤立的地区被卷入美国国内市场。南得克萨斯州棉花和蔬菜取代了原来的农产品得到大幅度增长，冶炼厂在埃尔帕索建立，铜矿在亚利桑那开挖，南加利福尼亚蓬勃兴起农业水利事业，由于铁路建筑和工业兴起，大量廉价劳动力随之而来，人口激增，1900年以后，更是成倍增长。

矿业的兴起一直是远西部得以开发的机遇。90年代以后由于铜矿的开发，使亚利桑那州和蒙大拿州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铜业大王”马克斯·戴利在蒙大拿州比尤特附近的阿纳康达开发铜矿，成绩卓然。他在18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矿生产商，1900年去世时在蒙大拿的财产值高达2500万美元。同年，他还在扩大他的矿业，正在建造带有世界上最高烟囱的最大熔炉。后来美国企业家古根海姆父子在1901年购得美国冶炼公司控股权，继续在那里开发铜矿事业。道格拉斯城市的建立也是因冶炼业而发展，该市地处亚利桑那州东南部，1900年建立时是炼铜中心，后为墨西哥入境港。美国工业化推动远西部的开发，远西部地区根据本地区特点发展自己。

农业是远西部的重要经济部门，农业机械化和水利灌溉使农业得到进一步提高，也成为远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索尔特河谷的水利灌溉推动了农业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产业和人口的增加，该地区就逐渐发展为一个城市，成为该领地最大的城市——菲尼克斯。加利福尼亚的发展更是同农业和采矿业联系在一

起，特别是后者。采矿技术的改进使加州颇获声望，“虽然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发明的，但是挖矿在加州改进得如此之速因而从1898年始，‘加利福尼亚式’挖矿技术被广泛推广使用。加利福尼亚制造的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加州的金产量远远超过其他各州的总产量”。①

在淘金热中兴起的城市丹佛，地处大平原的西缘，1906年建成美国造币局丹佛分部，生产全美国钱币的75%，成为美国第二大金库。一位到过美国远西部的英国人在1898年写道：“美国变化进程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企望得到一本指南书……几乎毫无用处。丹佛市以这样的速度改变着它的外貌：这种速度已被解释成为……今天只能行走马匹的小道，明天就成了公路，后天就变成了铁路。”

远西部的开发成功是美国工业化蓝图上的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世界工业强国地位的巩固〕　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化的实现使美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工业强国的地位获得巩固。美国从19世纪50年代起到19世纪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其增长已超过20倍。1890年美国工业制品的总值超过农产品的总值，标志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1900年工业制品价值超过农产品价值2倍多，农业社会让位于工业社会。

新世纪初，美国工业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第4位，1894年已跃居第1位，生产量等于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上的优势更为突出，1913年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品1/3

① 罗德门·保尔：前引书，第260页。

以上，比英、法、德、日四国工业产品总量还多。美国的世界工业强国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美国凭借其强国地位和经济实力积极扩大对外贸易，把美国制造的产品打进了世界市场，1897 年以后美国出口大大超过进口，每年约有 5 亿美元的顺差。并且在对外贸易中美国的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原料出口额逐步下降，从 1866 年的 70%下降为 1914 年的 40%；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从 1866 年的 16%上升为 1914 年的 48%，主要出口商品是钢铁、木材制品、精炼油、铜制品、小汽车、农业机械等等。

美国外贸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应归功于美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1901 年一位美国学者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们在商业上已经打入世界上每一个市场。它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我们正迅速迈向世界经济霸权。"[①] 20 世纪初年，全球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和买到美国货。美国出口商品的价值 1895 年是 8 亿美元，1914 年迅速增长为 23 亿美元，增长了 240%，在这短短的 20 年里，单是工业制品的出口就增长了几乎 500%。美国生产的石油和铜一半出口国外。西方多数人在使用"美国制造"的商品，东方人也开始购买美国货，因此出现了世界"美国化"的说法。1901 年，一位名叫威廉·斯蒂德的英国人在描绘世界美国化时说："在英国国内生活中，我们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早晨，一个普通人从新英格兰制造的床单上起身，他用'威廉斯'香皂和杨基保险剃刀刮胡子，在穿着北卡罗来纳短袜的脚上套上波士顿靴子，扣紧了康涅狄格吊带，轻轻地把沃尔瑟姆[②]（Waltham）或沃特伯里[③]

---

① 埃米里·S·罗森伯格：《美国梦的扩展：经济文化扩张 1890—1945》，纽约，1982 年，第 22 页。

②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该市的沃尔瑟姆钟表公司曾是世界最大手表公司之一。

③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部城市曾有发达的钟表工业。

（Waterbury）牌手表放入口袋，然后坐下进早餐。此时，他会对夫人穿的伊利诺伊前胸挺直的紧身胸衣和外配的马萨诸塞的短外套称赞几句。接着他就开始吃早餐了：用大草原面粉做的面包……巴尔的摩来的罐装牡蛎和堪萨斯小熏猪肉，而他的夫人则享受着薄薄一片片的芝加哥牛舌，孩子们得到的是'魁克'[①]（Quaker）麦片。同时，他还阅读着由美国机器用美国墨水印制在美国纸上的晨报，也许还是纽约市一位聪慧的新闻记者编辑的呢。"[②] 这话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却生动地反映了美国货在英国被广泛消费的情景。

美国不仅将自己的工农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使美国货遍及全球，而且开始积极将资本投入国外。1898年时美国在国外总投资额只有6.845亿美元，1914年，增加到35.138亿美元，几乎增加了5倍多。

如果说19世纪美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不久就成为"日不落"的世界工厂，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初美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以后，就已把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抛在后面，成为世界的头等经济强国了。

三、城市化的初步实现

所谓城市化一般指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分布向城市地区集中。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美国学者J·斯特朗曾在1898年出版的著作中，在分析了当时美

① 美国著名魁克麦片公司生产的产品。
② 埃米里·S·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5页。

国农村人口大量移入城市的三大原因后，预言："在美国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以前，不会很久，我们就将是一个城市国家。"[1] 果不其然，20世纪初美国就成了"城市国家"。

根据美国统计局的统计，1860年美国总人口为3149万人，其中城市人口为620万，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8%；1900年，总人口为7590万，城市人口为3010万，占39.7%；1920年，总人口为10570万，城市人口为5410万，占51.2%。从城市人口的增长可以推测美国城市化在1920年基本实现。

20世纪20年代，美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被发达畅通的交通体系串联一起；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和两洋沿岸的土地连成一体，交通线上的大小城市宛如串连一起的透亮珍珠，城市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展基本同步。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大批美国新城市勃然兴起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20多年里，美国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

〔大西洋沿岸老城市的新发展〕　大西洋沿岸老城市的新发展是美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人口的变化是城市发展的尺度。如：纽约1860年人口为117万，1920年已为562万；费城在1890年人口就超过了100万。

东部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而且在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上也发生某些变化。纽约市从一个普通商埠，在1870年成为国际性大都市，1920年一跃而为国际金融中心。[2] 1910年在大纽约地区，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制造公司528家，有100万资产以上的托拉斯公司44个；美国两大财团——摩根财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17页。

② 详见林广博士论文：《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

团和洛克菲勒财团都以纽约为大本营。纽约的华尔街成为全国甚至是世界的金融街。纽约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比较发达的第二产业如机器制造、造船业等开始让位于服装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整个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通讯信息、商业、金融保险等取得显著地位。纽约还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20世纪初随着移民高潮的到来，大量移民涌进城市，导致居民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移民所占比例之高在美国城市中首屈一指。

20世纪初的纽约已经形成了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某些特征。1898年1月1日大纽约正式成立，城市面积扩大为320平方英里，拥有人口330万，包括布鲁克林、昆斯、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开始向世界性大都市发展，年财政预算达90亿美元。当时曼哈顿已建成一批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1908年建成47层高169米的大厦，为当时世界之最。1907年50层的都市生活塔楼高耸纽约，1913年的伍尔沃斯大厦建成开创了摩天大楼的新风格和新潮流，高238米，58层。1920年，克莱勒斯大厦建成，高达318米，超过法国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创世界最高建筑物的记录。1929年，纽约已兴建了188幢摩天大楼。美国发明家欧文·W·科耳班使用窗玻璃机生产大块玻璃，被誉为“第一部可以把窗玻璃连续拉制成任何宽度的机器”，1916年他又完成了连续生产平板玻璃的方法。在此前后美国的摩天大楼开始采用大块玻璃建造窗口。美国摩天楼建筑中的第一个大学派芝加哥学派，除了在建筑中初次使用钢铁外，还以最早应用玻璃著称。如：芝加哥1899—1904年卡森·皮里·斯科特大厦就是以其“芝加哥式窗子”而著称。大厦的墙壁全是透明的平面玻璃，蔚为壮观。纽约市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时，玻璃和钢铁混合的新建筑物也应运而生，1904年建成的辛格·罗夫特大厦，其主楼

矗立在百老汇大街上，这是“创造性地把彩色赤土、玻璃和钢铁揉合在一起”的杰作。在高楼林立的纽约市，纽约时报广场成为城市中心，白天这里车水马龙，人流奔腾；夜间灯火辉煌，流光溢彩，橱窗通明，犹如一颗夜明珠。[①] 摩天大楼的建立反映了纽约商业、金融业和其他的企业行为的繁荣和发达。

现代市内交通系统的建立也是国际大都市的标志之一。20世纪的头 20 年里，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在这方面取得令人惊异的成绩。以纽约为例，1883 年后市内交通网络建设中最令纽约人惊喜的是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大桥的建成，这是一条 1 英里长的铁桥，有 2 条铁路线、4 条公路线、1 条人行线。1904 年，由于电气铁路的改进，纽约建立了第一条地铁线，从市政厅到第 145 街。1913 年纽约建成大中央火车站。当时火车代表最伟大的进步，而城市的火车站则象征着城市的现代化。后来纽约—纽黑文—哈特福德铁路公司在 1907—1914 年首先在纽约与纽黑文之间的铁路线上实现电气化。

重要的文化设施的建立也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于 1895 年建立，该馆中央大楼位于 42 号街与第 5 街的交叉处，1911 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古典风格的建筑物里珍藏着包括《独立宣言》在内的许多珍本。1902 年，一座色彩艳丽的哥特式建筑物，坐落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心馆）建成。1919 年，纽约每日新闻创刊。1892 年纽约植物园由哥伦比亚大学植物学教授纳撒尼尔·洛德·布里顿建立，1900 年正式对外开放。1911 年布鲁克林植物园建立。

总之，纽约市的发展可以成为东部沿海大城市的代表。“纽

① 参见林广博士论文。

约无可争辩地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进入了 20 世纪。城市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技术的改进。1904 年蒸汽铁路被电气铁路取代，新的水利资源正获开发，钢结构迅速增长，第一条地铁建成，城市本身正使自己组织成为一个超乎寻常发展的城市”。[1]

伟大的法国建筑家科比西埃赞扬说：“（纽约）是一个变化进程中的城市。今天它属于世界。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它已成为世界城市皇冠上的宝石，是豪华城市的皇冠，它是柔和的珍珠，或闪闪放光的黄玉石，或光芒四射的青金石，或令人伤感的紫水晶！纽约是一颗伟大的钻石，沉甸甸的，不加修饰的，光芒闪耀，扬扬得意。”[2]

犹如纽约一样，20 世纪初美国大西洋沿岸和中部的其他城市，华盛顿、费城、波士顿等也经历了与纽约相类似的经历，构成了美国初步实现城市化的一幅绚丽画面。华盛顿作为美国首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获得迅速发展。19 世纪末，该市的人口、面积、建筑大为增加。朗方设计的国会大厦和白宫均吸收了巴罗克式建筑风格。城市体现了美国政治中心的庄重和独特的风格。

费城一直是宾州的工业中心，也是教育中心。内战结束后，进入了第二次繁荣时期。继 1876 年建国 100 周年博览会后，20 世纪初又开始规划道路系统改善交通的问题。1914 年贯通全城长 7 英里的罗斯福林荫大道建成，1918 年富兰克林林园大道建成竣工，将费城的贯通南北的主干线和风景区——费尔芒特连接起来。特别是地铁的建成更具有意义，1907 年第一条地铁完工，

---

①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37 页。

② F.R. 维利斯：《西方文明：城市透视》，第 2 卷，D.C. 希斯出版公司，马萨诸塞，1977 年，第 502 页。

第二条接着在1908年开通。1922年开始兴建的现代化悬吊式大桥于1926年飞架特拉华河上，命名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大桥。[①]

波士顿是由老城镇发展而成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和商业取代了原先的海上贸易成为主要行业。该市第一条地铁于1897年建成。波士顿的文化建设在美国是闻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新的建树和业绩，除了以前所建的著名高等学府外，1898年建立东北大学，1906年建立萨福克大学，1895年建成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大厦，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上饰著名壁画。

〔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城市化〕　太平洋沿岸的城市发展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全新的美国特色和最重要的意义，这些城市的开拓和发展成为城市化的新方向，对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起了决定性作用：使"西部城市网"基本形成和进一步完善。该区域的中心城市旧金山从淘金热开始兴起以来，发展迅速，19世纪末成为美国太平洋区域的大商埠。在原有工业基础上，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旧金山不仅城市规模随之扩大，而且工业部门发展均衡、全面，具有很强的适应性。1900年，在全国15个工业城市中按工业产量和产值已经排名第9。主要工业部门有制糖、冶炼、机械、建筑、制瓶、酿酒、成衣、面粉加工、印刷等。1906年大地震以后旧金山人民重建家园。1915年旧金山以崭新的面貌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一展旧金山人民的风采，既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又促进了该地区的工业发展。

洛杉矶得益于地产业和石油开发。1892年洛杉矶市内发现石油，1897年已开挖油井2300口，不久石油产量激增，连同2

---

① 参见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3、254页。

个邻镇一起1902年共产石油900万桶。随着石油开采的兴旺，洛杉矶人口迅速增长，1900年该市人口为10.2万人，1920年为57.6万人。20年中增长了5倍。1901年，一位美国学者说："洛杉矶某一天会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这并非梦想，而是现有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①] 本世纪20年代以来，"好莱坞"的建立意味着电影创作业的兴起，电影创作业很快成为洛杉矶的基本产业之一，它不仅成为洛杉矶的一大文化特色而且也对美国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更给洛杉矶的海运业务带来机遇。在城市化浪潮中洛杉矶显示了它的巨大魅力。

20世纪初，西雅图已发展成为"太平洋皇后城"。这同西部的深入开发特别是西北部各州的林业开发和木材远销有关，1897年阿拉斯加出现的淘金热又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机。1900—1910年间该市开展了削平丹尼山、填平城市西部洼地的大型工程，取得成效。1912年西雅图的进出口总值超过新奥尔良，成为美国第5大港市。1909年西雅图举办了阿拉斯加—育空太平洋展览会获得成功，吸引了375万观众。1916年组建的波音飞机公司为日后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奠定了基础，成为该市的支柱产业。在城市发展中，西雅图人所创造的"西雅图精神"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和精神力量。

〔西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美国的老中西部——大湖区是一个工业区，其中密歇根州是最具代表性的。20世纪初，密歇根经济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工业领域从开采转为加工，经济领域由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转为城市，这些变化反映了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进程。该州的底特律一直是汽车的同义词。

---

① C.D.威拉德：《洛杉矶先驱史》，洛杉矶，1901年，第362页。转引自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1914年1月5日，汽车大王福特宣布给雇员一天发5美元工资（2倍于通常工资），次日就有万名工人要求到福特工厂就职。从此底特律改变了往日的面貌，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汽车工业“制造”了一个新城市。这是一个新产业造就了一个新城市的典型。

芝加哥是大湖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中西部新崛起的大城市的典型。它地处美国的心脏，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缩影。1871年大火以后，芝加哥人重建家园，再塑城市新貌。芝加哥人口在1860年为10.9万人，1900年高达200万，位居世界第五，1920年已达270万人，成为美国社会多方面的中心。1880年电梯发明并投入使用以后，使建造高层建筑由理想成为现实。19世纪末以前，多幢摩天大楼在芝加哥已经高高矗立，1899—1904年又建造了由当代“摩天大师”路易斯·沙利文设计的斯科特商厦等摩天大楼，“它不但在时间上，而且在风格上跨两个世纪，是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的非凡结合”。[1]

20世纪初，在芝加哥建造摩天大楼成为狂热，《芝加哥论坛报》为庆祝该报创刊75周年决定兴建一座“永恒的”报业大楼，1922年在世界上悬赏10万美元征求设计方案，后在260个方案中选中了一个由美国人约翰·米德·豪厄尔和雷蒙德·胡德设计的方案——哥特教堂式的芝加哥论坛报大厦，于1927年建成。同时在20世纪初芝加哥也揭开了“城市美化运动”的序幕。美国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丹尼尔·伯纳姆在1907—1909年与贝内特合作制定了芝加哥城市规划，史称伯纳姆规划，规划具有远见卓识，主张在城市周围和湖滨地区保留一圈森林地带，沿密歇根湖建立公园区，加宽主街道和建立市政中心等。这是现代化

---

① （美）悉尼·利布兰克：《20世纪美国建筑》，中译本，许为础等译，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城市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已成为世界建筑创新中心，走在城市建筑现代化的前列。

如果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大西洋沿岸的老城市表现为变“高”长“大”，由商业中心转向工业城市的话，那么西部和远西部的城市化则表现为大批新兴的中小城市的扩建和发展，它们犹如串串葡萄长在美国西部广袤的原野上，或铁路线两旁，或矿井四周，或大河上下，形成美国20世纪初城市化初步实现时期的壮丽奇观。如：采煤工业造就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小城镇的发展。1870年该州仅开采60万吨煤，1912年产量上升到6700万吨。

地处中央的俄亥俄州，在西部人的眼中它属于东部，在东部人看来它属于西部，该州的克利夫兰是一个移民城市，最早的移民是新英格兰人，后来是爱尔兰人。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德国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法国人、苏格兰人、波希米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立陶宛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来到这里，烧高炉，炼石油。因此人口激增。1860年仅4.3万人，1910年已激增为56万人。1914年这里成立的克利夫兰基金会是美国成立年限最长、规模最大的地方基金会。

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1899年因伐木业兴盛而大获发展，后来面粉业继而成为主要行业。1860年人口仅为0.25万人，1900年已达20.2万人，1920年为38万人。

肯塔基州最大城市是路易斯维尔，19世纪80年代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延伸到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该市后来成为美国威士忌酒和卷烟的主要产地之一。

新奥尔良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大城市，曾是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有较长的历史。19世纪初是它的黄金时代，20世纪初因受铁路交通冲击一度衰败，1840—1900年从美国第3大城市降为第12位。后因驳船和拖船的出现，河运复兴，进行城市改造重

获新生。

普赖斯市是美国犹他州中部城市，1877年由摩门教徒所建。1883年铁路通车后发展迅速。1892年设建制，以采煤、牧业和农业为主。

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在1923年建立了乡下俱乐部广场，是美国第一座完全按照规划建立起来的购物中心。

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市，建于1879年，起初是穿越印第安领土的马车驿道上的一个邮局所在地，直到1905年它的名字仍是塔尔萨镇，一个居民这样说："我们穿过那里时得躲避四处游逛的猪、羊和牛，有时野兽也会走到城里来。"① 但是1906年附近的高质量的格伦石油矿的发现给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石油公司的总部设在那里。城内建有小摩天楼。在西部的其他城市里，一些小摩天楼也在渺无人烟和广阔无垠的草原上耸立起来，美国人建造的摩天楼是工作和生活用房，成了人类能力的最高象征。

远西部的丹佛市更是一个新兴城市的典型。中西部一些新兴小城市因规划在先，建筑于后，所以整齐划一，状如棋盘，市中心是一条主街和主要市政建筑物，其余街道南北东西交叉。

中西部（包括太平洋沿岸）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的中心地区就在那里，全国10大城市中有4个在中西部，芝加哥名列前茅，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相对缓慢的南部城市化进程〕　与其他地区相比美国南方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显得缓慢和滞后，总体水平较低。如密西西比州除了杰克逊、海湾沿岸和该州西北的孟菲斯外，几乎没有几

---

① 尼尔·彼尔斯、杰里·哈格斯特洛姆：《美国志：五十州现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860页。

个可以被称为是非常城市化的人口集中地。尽管如此，南方地区城市化还是取得可喜成果并富有特色。一些城市兴起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也令人刮目相看。如：伯明翰是亚拉巴马州的第一大城市，是南部的“匹兹堡”。它是在内战以后工业发展的年代里兴起的，逐渐成为美国南部钢铁中心。1880 年仅为 3000 人，1920 年为 17.8 万人。纳什维尔历来是中南部的一个贸易和金融中心，产生了一些极其富有的大家族。1860 年人口 1.6 万人，1920 年为 11.8 万人

佛罗里达的城市化在南方地区中颇具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佛罗里达的真正历史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大投资者到来之后才开始的。他们就是美国金融家亨利·弗拉格勒（1911 年前一直任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董事）和亨利·普兰特。普兰特则耗资 300 万美元兴建坦帕湾旅馆，并于 1891 年开张。弗拉格勒在圣奥古斯丁修建庞斯·德·里昂旅馆，后又将铁路修到棕榈海滩。1904 年他投资修建的跨越亚热带礁群的海上铁路工程开始进行。1912 年，82 岁的他乘坐第一列火车从杰克逊维尔到基韦斯特，目睹途中经过的许多桥梁和海上路段。

佛罗里达的城市化与旅游业的发展分不开。该州大城市迈阿密完全是一个人工拓造出来的豪华旅游休养中心及工商金融大都会。1912 年还是一片红树林沼泽，1913 年已有 1.1 万居民，每年游客 1.25 万。1920 年迈阿密已有居民 2.9 万人，“成为一个初具规模、以阳光和海滩为特色的旅游城市”。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流行阳光有利健康的说法，北方人大量涌入迈阿密，交通的便捷也有利人们南来度假。地产商们利用佛罗里达州当时尚未开征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优惠条件，掀起一股地产大推销和投机买卖热潮，1923—1926 年达到高潮。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佛罗里达州的人均收入在 1928 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4%。

如果说佛罗里达靠旅游业兴建和发展了城市，那么得克萨斯州的城市化是在石油开采的推动下进行的。该州的第一次石油大发现是在1901年1月，在一个叫斯宾德尔托普的不显眼的土岗上，黑色的油浆汹涌地喷射出来，从此石油开发商涌进了墨西哥湾沿海地区，德士古和海湾这样的石油大公司诞生了。休斯顿的崛起也与石油开发结下不解之缘。它的地理条件差，多泥泞沼泽，气候炎热，经常遭受流行性黄热病的袭击。该市前商会执行副会长马文·赫尔利曾评价说："这是任何人所能找到的最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建城地点。"① 它的大发展是从1901年发现石油开始的，斯宾德尔托普使休斯顿成为一个巨大的石油中心。工业大幅度发展起来，大大促进了城市扩大和繁荣。1914年休斯顿航道通航，更为城市的兴旺发达带来新的机遇。该运河长81.3公里，深11米，最小宽度90米。航道水深且河面宽阔，可容纳远洋轮船。在吨位上休斯顿港仅次于纽约和新奥尔良。后来这个深水港使休斯顿成为全国自由贸易的鼓吹者。许多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

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在内战后成为带有传奇色彩的西部的第一座牛城，是赶牛路线的基地。20世纪初成为得克萨斯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后被休斯顿和达拉斯所超过。该城的多数建筑建于本世纪20—30年代。"圣安东尼奥属于得克萨斯，但是它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了得克萨斯"。1914年这里建立了动物园和水族馆，占地面积为20公顷，园内有天然喷泉和岩壁，有大量野生动物和鸟类，是美国东南部最好的动物展览点之一。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达拉斯19世纪70年代铁路通车后商业获得极大发展。1907年组建达拉斯棉花交易所。随着城市发展，达拉斯人口从1880年的1万人，发展到1920年的15.8万人。一些文化设施也随

① 尼尔·彼尔斯、杰里·哈格斯特洛姆：前引书，第899页。

之建立，1904年建成市立动物园，占地20公顷，以爬行类动物为特点。此外，南方还涌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中小城市。

〔全国城市化程度的差异和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美国城市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1790年美国只有6座8000或8000以上人口的城镇，1890年已发展为449个，1910年已猛增为778个。但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土广大的国家，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呈现不同特色，发展很不平衡。马萨诸塞州的城市人口占该州总人口的92%以上，纽约为78.8%；但北达科他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1%。就全国而言，平均城市化率为45.7%，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为3个，50—100万人口城市为5个，25—50万人口城市为11个，10—25万人口城市为31个，5—10万人口城市为59个。另一个资料显示，1910年美国最大的25个城市中，南部地区仅有4个，即路易斯维尔、华盛顿特区、新奥尔良和巴尔的摩。但是南方新兴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很高。1900—1910年，休斯顿人口增长76.6%，达拉斯增加116%，伯明翰增长245%。[①]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全美国的主要城市化中心就在那里，全国10大城市中有4个在中西部，芝加哥名列前茅，位居全国第二。

这种城市化程度的差异与美国自然地理的横断面极为相似：东西（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大西洋沿岸，科迪勒拉山系和太平洋沿岸）两边高，中间低洼；北部高，南部低。城市化的程度大致符合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中部农业地区经济相对滞后的特点。也即城市化和自然条件有着重要关系。这同人类历史上一般城市发展有着相似的轨迹，沿海或河口总是人类聚居之地，也是与外界沟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371—372页。

通交流之处，因而商业发达，人口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方开展工业革命较早，在南北战争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这次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产业，如：纺织业、采煤、炼铁、制糖、造船、机器制造等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的工业城市较多。南方在重建后进入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起步晚。有些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不是自然增长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国内农民大量进城所致，而是因为大批国外移民的直接进入城市造成的，这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中最为突出，也是造成一些地区城市人口激增的原因。

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发展进程一样，城市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给人类带来巨大裨益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某些负面效应，也许这是因为人类每征服自然一步，自然必然会向人类进行一次报复的结果。诚如美国学者韦伯所言："城市，作为进步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包含好与坏两方面。"[①] 这种负面效应表现为社会性的和自然性的两个方面。社会性主要是指城市化给人类带来社会方面的负面效应。在一些大城市，特别如纽约、芝加哥等等大都市，在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又生成了既脏乱又贫困的贫民窟，工业区的人类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大城市的不断"扩大"，城市社会问题和城市病与日俱增。纽约形成了黑人聚居区——哈莱姆。本世纪20年代，哈莱姆居住了17万黑人、4万多波多黎各人。由于人多房少，加上周围街区阻止该区居民外移，这里人口拥挤，失业率高，卫生条件极差。诸如哈莱姆这样的区域在美国各个大城市都有，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城市化后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贫富悬殊。据1910年调查，波士顿不熟练工人每周工资只有9—12美元，而且一年内失业多天都没有收

① 卡尔洪：前引书，第108页。

入。但是在城市的另一端却存在着只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工商界巨头，他们的奢侈生活与贫民窟居民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照。

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在自然方面主要表现为：1. 工业城市产生了各种污染。其中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光污染等等。如城市交通发达导致大量汽车的使用，因而产生大量的废气和噪音；工业污水产生水污染使城市内河河水变质发黑；摩天大楼上使用过多的玻璃造成过量光线折射产生光污染；城市人口密集每天产生的垃圾，特别是其中的化纤品同样造成严重环境污染。2. 工业发展引起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自然资源大量被无节制、无计划地开发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如木材的滥砍滥伐，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或因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无序建造致使绿地面积大量减少，甚至使城市变成一座死气沉沉的“水泥森林”。1898年一位英国旅游者是这样描绘匹兹堡的：“白天烟雾弥漫城市上空，晚间河岸边是一片高炉发出的火光。它（匹兹堡）坐落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莫农加希拉河流淌着污浊的黄色水流，阿勒格尼河则河水发黑……因为这里发现了煤矿、天然气和铁矿，所以工业已经失去控制地发展起来……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杂居一处，穷人们居住在租来的陋屋或是匆匆搭建的或毫不考虑道路和位置的棚户中，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一间新房。这是一个最杂乱无章的城市，但是至今还没有一种要求条件变得健康和体面的公共精神或大众意识。”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问题已经凸现，1898年一位美国社会福音布道者就说：“20世纪的问题必将是城市。”② 美

---

① 雷蒙德·莫尔：《新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美国，1860—1920》，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85年，第3页。

② 同上，第194页。

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洞见污染和生态问题。芝加哥一些专家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美化城市运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执政期间力图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有所作为，因此他在任内曾为保护自然资源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国家土地的锐减，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用15年时间将剩余土地转为国有森林，结果罗斯福用了7年时间转变了7800万公顷土地，为后代保存了公园、矿藏，包括石油、煤田，还有水利资源。1909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916年国会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努力克服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的特点〕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美国人根据本国的国情走了一条美国式的道路，既具有世界城市化的共同特点，又有美国特色。美国的国情主要是：第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城市化的道路和移民的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因此美国城市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第三、美国是一个不断从东部向西部推进和开发的国家，它的城市化与西部开发同步而行。因而形成了以下特点。

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在世界史上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即前工业时代的城市化阶段和现代城市化阶段。后者与工业革命不仅紧密相连而且形成为两个互动的社会发展过程。即使是美国东部，城市化起步较早，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整个国家发展起点高、历史短，它不是在人类古代社会的基地上而是在近代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国家，所以美国东部老城市的发展仍属于现代城市化的阶段。如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的发展与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基本同步，较之于世界其他古文明地区的城市化，表现了年轻、跳跃的特点。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具有新的特点，即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同步进行。美国第

二次工业革命开展于内战以后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约为半个世纪左右。美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基本与此相符，大批西部新兴城市崛起和高速发展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特别在70年代以后，并在20世纪20年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和城市化的初步实现是一个互动过程，工业发展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发展促进了工业化。如：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的新产业部门的崛起直接导致新兴工业城市，大大小小的“钢铁城”、“汽车城”、“石油城”、“石化城”、“电影城”等的大量涌现。工业革命改变了交通运输工具，建立交通网络，电气火车取代蒸汽火车，汽车的普及等等，促进了城市的扩大和某种郊区化的趋势，使城市规模成倍扩大。由于钢材和大块玻璃的使用和电梯的发明，城市建筑发生重大革命，摩天大楼耸立大地，城市的商业中心与日俱增。巨型企业的出现和工厂规模的巨型化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反之亦然。城市规模的扩大促使劳动力的大量集中，也使多种产业得到综合发展，又为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提高了人们的文明程度，使培养大批专业人才成为可能，在发展综合实力方面占有优势，成为推动新科技革命的强大动力。大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为扩大内需和增大国内市场提供了最有效的形式和最广阔的空间和场所。工业发展不仅促使城市扩大，也促使中小工业城市的建立，促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自来水、污水排放、卫生设备的制造和空调设备都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这既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城市化的条件。

第二，美国城市化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首先是老城市新发展——东部大城市向现代都市演进。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东部大城市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城市可以纽约为

代表，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些城市在规模上、功能上、外貌上都发生了部分质的变化，而且较早地遇到并逐步探索现代城市化中出现的新问题。20世纪初，纽约、费城、波士顿的规模都已大为扩展。1898年纽约成为大纽约以后，无论在城市人口还是城市区域都呈现出成倍增长的速度。在功能上，这些老城市都由原来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复合型的工业城市（既有传统工业又有新兴工业），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或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或为地区金融中心，或为全国经济中心，纽约更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跻身于巴黎、伦敦等世界大都市之列。城市面貌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摩天大楼成为纽约的标志性建筑物。市内交通运输向地下和天空的立体型发展，立交桥和地铁先后出现。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如：贫民窟问题，城市犯罪问题，工业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对其他后发地区的城市化有一定借鉴意义。

其次是城市化的主体——西部城市化的初步实现。西部城市化是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中最重要、最光辉、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当时美国城市化的主旋律。它的特点是两个高：高速度和高起点。[①] 西部各大地区城市化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据王旭研究，美国东北部的城市从初创到定型和成熟一般需要15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西部约需60年上下，西部仅需30—40年。从整个西部

① 中国学者对美国城市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令人鼓舞。1994年丁则民先生曾对美国西部城市化特点作了简要概括："起点高，速度快，带有跳跃性的特点。"他认为西部小城镇发展为大城市"不是逐级递进，而是具有跳跃性特征"。详见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曾于1996年8月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中美城市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王章辉和黄柯可提出："在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美国呈现出相当明显的特征。其城市化过程以中西部和西部为代表，走的不是循序渐进式道路，而是具有'突发式'、'高潮型'的独特性。"详见前引书，《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284页。

分析这种高速度更为明显。比较一下东部老城市的代表纽约和中西部新兴大城市的典型芝加哥更能看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速度。芝加哥建城时间远较纽约为晚，几乎晚了 2 个世纪，1830 年人口仅 50 人左右，1837 年达到 4000 人。但发展规模与纽约相似，到 20 世纪 20 年代都已成为美国排名一二的大都市（1920 年人口为 270 万），跻身国际大都市的行列，但芝加哥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纽约，城市美化运动走在纽约之前，设计摩天大楼也是芝加哥学派独占鳌头。原因是纽约是老城市，老有老的优点，但历史包袱沉重，在发展过程中需花相当时间改造旧城区和调整旧格局。芝加哥不同，它没有包袱，在空白的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并且在城市兴起与拓展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勃兴，加上它的自然优势，因此依托工业革命中的新产业之兴起乘风而上，它的重工业很快超过了纽约。总之，美国西部地区城市化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历史上尚属少见。

所谓高起点就是指西部城市在初创时就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步，它不仅没有走一般城市发展的道路，即从农贸据点到商业城镇，进而为工业城市的老路；也没有经历城市功能转化的历程，而是越过商业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直接在新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带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如“汽车城”、“钢铁城”、“石油城”等等都是依托在新产业上发展而成的城市，“电影城”、“旅游城”等等也都是新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的文化产业所导致的。换言之，这些城市是工业化直接“化”出来的，是直接在荒野上建起来的工业城市，有时一个新产业“产”出一个新城市，有时若干新产业“产”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有时铁路线的延伸直接“生”出城镇来，或促使小城镇“长大”变富，有时一个新矿的开采“开”出了一个新城市，进而推动了地方性的中心城市形成，它们往往以某种产业为主，兼及其他辅助产业，如以农产品

加工和酿酒为主的密尔沃基，以肉食罐头加工为主的圣路易斯，以巨型钢铁企业闻名的匹兹堡，以钢铁机械产品著称的底特律，此外诸如啤酒城、纺织城、金镇、银镇等等专业性小城镇比比皆是。它们不像东部老城市那样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路程，在新产业革命中需要经历一个改造旧产业和变革旧城区的阶段。其次，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充分利用东部老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且直接在美化城市运动（19 世纪末开始）等现代城市指导原则下，或在规划基础上，或在预防污染基础上发展城市，因此在20 世纪初这些城市进入定型和成熟时已具有现代性：城市中的生产设施、生活设施和文化设施配套，城市美化初具规模，城市交通畅通多样，城市主街和道路成为棋盘网络型，甚至城郊化也已开始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部城市中还有一些大学城、学院城，它们同样是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绽放出来的奇葩。如美国加利福尼亚中西部城市伯克利规模不大但开设多所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太平洋宗教学校、加利福尼亚聋盲人学校和阿姆斯特朗学院等等。伊利诺伊中部城镇诺默尔就是因为设立诺默尔大学发展起来的。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城就是因斯坦福大学而建立。艾奥瓦州中东部城市格林纳尔就是因格林纳尔学院而发展。以一所大学或若干所大学为中心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学院城，这些城市具有商业、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也是美国城市化中的一个部分。

西部城市化其实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产物，是西进运动的伟大成果和结晶，是美国人民和外来移民在美国广袤荒凉的土地上开拓、垦殖，最终使农业的西部变为工业化的西部、城市化的西部的一部伟大壮观的史诗。

再次，南部城市化速度虽较慢但城市发展快。相对而言，美

国南方的城市化在规模上、速度上落在全国之后。1910年南部城市人口仅占21%，农村人口占到79%；10年后，1920年城市人口占25%，农村人口占75%。而同时期的北部和西部城市人口已高达84%，农村人口只有16%。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美国南方还不能认为已经实现了城市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方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工业化程度不高。1900年，南方地区的劳动力依然是农业为主，从事矿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比例在全国是最低的，表明南方工业化程度不高，这就直接影响到它的城市化水平。当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南方在城市化进程中毫无作为，就单个城市或城市本身发展特别是一些新兴城市而言，城建速度很快。1900—1920年达拉斯人口增长率为202%，伯明翰人口增长率为468%，新奥尔良人口增长率为134%。

第三，外来移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城市化离不开外来移民，移民是推动美国城市化的强大动力，也是美国实现城市化的一支生力军，移民参与了城市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从城市兴起、发展壮大到转型变革和城市现代化的实现。这是美国城市化的最大特点，因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和研究20世纪初，即美国初步实现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的历史作用。

首先，移民直接参与美国城市的兴建，甚至直接创建了"移民城镇"，促使城市人口大幅增长。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移民高潮期。19世纪下半叶的外来移民多为北欧斯堪的那维亚人、德国人、东南欧人和亚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从1880年起，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人数激增，1891—1900年，这些新移民占移民总数的52%，1901—1910年则上升到72%。这些移民一部分进入东部城市，使那里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大部分迁居中西部，散居在城镇中；他们大多在钢铁厂、纺织厂、

铁路线上和矿山里谋生，使中西部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191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16个县中有13个县外来人口占20%，华盛顿州人口的21%是外国出生的。20年代末，外国出生的人口占西部总人口的大约2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另据统计，美国世纪之交时，外国出生的居民中有一半居住在2.5万人或以上的160个城市中，有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人——主要是犹太人75%居住在这样规模的城市中，意大利和爱尔兰人中的2/3居住在这样规模的城市中。新移民们在美国土地上直接创建了城市，"这样的新城市十分不同于共和国早期那些在森林中开辟或建于贸易和交通线交汇处的城市。移民城市是美国工业扩张的直接产物，大量的新来者用他们在新的铁矿或新的钢厂形成的移民工人群体而建起了城市。这些新城镇是新工业扩展的边疆。"① 这样的城镇在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伊利诺伊的煤田附近脱颖而出，在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周围和密歇根的铜矿开采处悄然崛起。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报告，1910年纽约州布法罗不远处的西塞内加，仅仅只有10年的短暂历史而人口却已达2万人，其中4/5是移民。1910年，伊利诺伊的匈牙利好罗镇有1.5万保加利亚人在钢厂工作。宾州的沙勒罗瓦和俄亥俄的福特城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

移民成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20世纪初来美国的移民多数是壮年劳动力，1901—1910年，来美国的移民几乎70%是男子，而在1850—1860年男子比例不到60%。他们在城市的工矿中劳作，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1910年只有14%的外国出生的人口在农村工作，而43.5%的人在工矿企业和制造业谋生。根据国会1907年的调查，在基础工业诸如钢铁、采煤、建筑、

---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90—291页。

铜矿开采和冶炼中，平均劳动力的60%是外国出生的。[1] 从欧洲来的移民将母国的先进技术带到了美国，如比利时移民带来了高超的玻璃制造技术，英国移民带来机械技艺等等。一些移民中的杰出人才更为美国城市化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如：拉脱维亚犹太人工程师穆瓦塞夫参与设计纽约建于1903年的威廉斯堡大桥，参与设计1909年建成的昆士博罗和曼哈顿大桥，还参与设计乔治·华盛顿大桥、巴约纳大桥等等。而犹太人主要在金融商业方面在城市化中发挥作用，如犹太人银行家斯希夫为纽约市的金融业建立功勋。另一方面大量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没有特殊技术的新移民往往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劳动，即在城市工业和建筑业中，承担着那些最艰苦、最危险、收入最低的工作，换言之新移民们在城市建设中担当着最为艰辛的工作。同年的移民调查报告指出，在烟煤矿业中，所有白领工作都由美国人或老移民及他们的后裔担任，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只能干捡煤和其他非技术的一般活儿。这种现象也反映在其他行业中，如玻璃工业因其艰苦几乎都依赖新移民而维持和运作着。1900年纽约兴建地铁，1.2万工人中大部分是新来乍到的意大利移民。1900年纽约的普通工人中的25%是意大利移民。大量非技术移民工人的存在还促进了工业机械化的进程，因为雇主们为了雇佣廉价的劳动力，促使他们购买和使用非技术工人容易操作的机器因而加快了机械化。外来移民在美国城市中还为城市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作出贡献。

当然，移民在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诸如在一些大都市中出现移民居住区，这些地区因移民国别、族裔、文化背景不同，特别是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往往会产生种族矛盾和发生冲突；同时因为移民收入低微生活条件

---

[1] 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82页。

较差，社区的安全问题较多。这些区域往往会滋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

20世纪初，与美国城市化初步完成阶段相伴随的是经济领域垄断化的完成。

四、巨型企业、托拉斯和金融财团

〔巨型企业的崛起和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生产力领域给美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实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则带来了意义深远的美国经济体制中垄断化的完成，实现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和转化。美国的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城市化、垄断化是一个基本同步和互动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系统发展的美国社会进化工程。

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化过程也始于内战以后，基本完成于20世纪初。19世纪60—7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发展到顶点，垄断组织开始萌芽。1873年美国国会一调查委员会宣称，国家迅将出现和布满一些掌握控制无数财富、拥有巨大影响和权力的庞大公司。1873年经济危机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得到广泛发展。

巨型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垄断化的第一步。虽然作为一种合法的体制——巨型企业萌芽于16世纪英国的股份公司，19世纪这类企业在某些行业已经取代单资企业，在内战以前美国这类企业组织在运河和铁路行业中已经出现，但是在工业领域还没有成为一种明显的企业形式。1900年这类股份公司获得迅猛发展，采矿业产量中的86%和制造业中的2/3都是由股份公司所生

产的。[1] 股份公司促进了企业巨型化和生产进一步集中发展。这是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成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强大原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是以工厂取代手工工场，因此是以生产单一商品为目的的独资工厂为特征的。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厂取代了旧式的小规模的工厂。新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能源、新的生产工艺以及新的生产要求和管理，逐步促使工厂的外部规模和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形成了以准确性、系统性、连续性、高速运转和经济性为原则的生产流水线。工厂与工厂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出现了合并的趋势，形成巨型企业。从 90 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工厂企业经由纵向和横向两条途径实行联合和兼并向巨型企业转化。一些公司还通过扩展或收买其他企业成为巨型企业。19 世纪 60 年代典型的美国工商业仍是独资业主开办的小企业，一个家庭或一个合伙商所有的企业。这类企业大多在当地经营买卖。但是到了 90 年代美国工商业系统的“基本结构已经变化”，独资企业渐渐为巨型公司（股份公司）所取代。20 世纪初，巨型企业已经侵入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部门。巨型企业的产生为垄断组织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垄断组织是巨型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学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由巨型公司组成的一种制度。”[2]

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强大动力和根本原因，那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产业则为形成巨型企业和垄断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电力、钢铁、化学、石油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 36 页。

②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尔：《垄断资本》（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 年，第 53 页。

和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具有先进的生产能力，它们没有旧产业部门的包袱，一开始就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由于生产特点所决定，这些新产业部门都具有大生产的特点，产业自身就具备了生产一体化的要求。美国最早创立流水线的是新兴的汽车工业，最早的垄断组织托拉斯产生于石油工业，托拉斯运动发展最快的部门是在新兴工业部门：电力、钢铁、化学、汽车等部门，绝非偶然。有的新工业本身就是新技术发展的产物。整个美国电气工业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科学技术进步促进工业垄断化的历史。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这些产业部门都具有大生产的特点，它们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建立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主要工业是“为农业经济服务的”，因此这些厂商往往规模较小，在当地购买原料和出售成品；到了 20 世纪初，美国更多的公司是“在进行生产资料的生产”，商业经济已成为工业经济，即进行重工业产品的生产。以前那种小型工厂已无法承担大规模生产任务，因此巨型企业随新产业的诞生而应运而生，20 世纪初的这些公司已成为规模巨大、有垂直领导体系的、集中化的企业了。[①]

促进巨型企业兴起和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由于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化的初步实现，不断扩大的城市建设和与日俱增的城市居民形成了对商品的大量需求，城市建筑需要大量的钢材、木材、玻璃等等建筑材料，城市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扩展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致使电力、石油、煤气的供应量扶摇直上；城市居民对粮食、肉类、水果、蔬菜等造成大批量的需

① 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商务印书馆，北京，1975 年，第 26—27 页。

求。一些独资的小企业无法适应这种大批量的物质需求，他们或者谋求扩大经营规模，或被其他企业“吃”掉。面对这样大的市场，企业还要考虑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走合并之路势在必然。另外一些诸如食品加工类的企业为了占领全国市场，还努力在全国出售它们的产品，甚至需要掌握交通运输部门专门运送它们的货物，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它们（巨型企业）占有它们所需要的一切，从原材料（油井、蔗糖种植园、煤矿和铁矿）到交通运输工具（铁路、管道、汽船公司和大湖铁船）和市场设施（仓库、零售店和批发分配代理商）。此类所有形式同仅仅控制单一产品的同行业结合形成了鲜明对照。”①

总之，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工业部门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提供了物质基础，新工业部门的诞生发展同资本主义垄断化的过程相辅相成。当然，旧的、传统的工业部门也会因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作用由自由竞争走向集中和垄断，但是如果离开新工业革命的推动，离开这些新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离开这些新能源、新科技的应用，资本主义经济要全面实现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化是难以想像的。巨型企业的继续发展就是企业之间进一步形成垄断集团，即导致了垄断组织的出现，进一步又使巨型企业更加巨型化。企业间组成的垄断集团在美国主要有普尔、卡特尔、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等。美国垄断组织发展大致经历4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是其萌芽时期，1879—1890年是托拉斯运动时期，1897—1903年是联合、合并阶段，是托拉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1903—20年代末为托拉斯稳步发展阶段。

〔第一次兼并高潮和托拉斯帝国〕　　早在19世纪50—60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37页。

年代，美国出现垄断的最初形式：普尔。这是一种短期销售协定的联合制，往往只是规定产品产量和价格，划分销售市场，以保证参加者的垄断利益。70 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批以卡特尔为形式的早期垄断形式。但是无论是普尔还是卡特尔这些早期垄断形式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短期性的垄断组织。

19 世纪 80 年代始，美国出现了较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1882 年美国企业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也译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早在 1870 年，约翰·洛克菲勒组建美孚石油公司，当时资本为 100 万美元。1879 年，美孚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已占全国产量的 90—95%。1882 年美孚石油公司改组为托拉斯，有 14 个石油公司参加，此外还控制了其他 26 个石油公司的多数股票。美孚托拉斯掌握了美国产油区的各大铁路，建筑了四通八达的输油管，拥有自己的仓库码头，还有上百艘海轮，控制了全美国 90% 的石油。美孚石油公司名义资本为 7000 万美元，其中 4600 万掌握在洛克菲勒为首的 9 个委托人手中，公司业务也为这 9 人所左右。

托拉斯一般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与产品有关的企业合并而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增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加入托拉斯的各个股东公司将其股票交由董事会而领取一种所谓信托券成为股东，完全失去了在生产、商业和法律上的独立性。企业经营事务和财务活动完全由董事会负责，原业主仅作为股东按股份取得红利。它的管理机构虽然由股东代表选举产生，实质上受大股东的控制。托拉斯因其是完整的企业联合组织，较为稳定、可靠，因而在美国迅速蔓延扩展。

19 世纪 90 年代直至 20 世纪初美国出现组建托拉斯高潮。继在榨油、炼铝、酿酒、制烟和屠宰等部门出现托拉斯后，自然资

源开发和运输领域也出现建立托拉斯的高潮。20世纪初，美国主要工业部门都已被少数几个托拉斯所垄断，形成了各工业部门中的“大王”。1901年摩根家族凭借其巨大的财势利用摩根钢铁工业在竞争中不断集中的机遇，同剩下的几个最有实力的钢铁集团谈判达成协议，将4个集团合并成一体化的摩根钢铁联合企业，拥有铁矿、煤矿、铁路和运输船只，1907年他的所有职工已有21万人以上，控制了全美60%的铁路，生产了66%的原钢和近50%的钢铁预制品。1910年钢铁产量分别达到1400万吨和1200万吨。1901—1910年间，平均年纯收入为1.12亿美元。

1898—1904年美国出现第一次企业兼并高潮。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这是托拉斯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因，而经济危机则是促进垄断的催化剂，继1873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在1882年、1893年、1903年和1907年连续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促使优胜劣汰，垄断加剧。同时，美国证券市场的形成也成了促使形成兼并高潮的酵母。自186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建立以后，波士顿股票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和巴尔的摩股票交易所也相继成立。股票交易市场的形成，使工业股票得以上市，这就为企业兼并创造了条件。兼并高潮是垄断组织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统计资料表明，1904年美国各经济部门的440个大托拉斯共拥有资金204亿美元，而其中的1/3的资金掌握在最大的7家托拉斯手中。同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1900家，只占整个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2%，但其产值却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9%，所雇职工人数占行业职工总数的1/3。[①]

具体而言，1906年有7个垄断集团控制了全国铁路总利润的85%左右。范德比尔特铁路公司控制纽约—芝加哥地区铁路；

---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740页。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控制从费城和巴尔的摩以西的铁路；摩根财团控制美国东南部铁路；詹姆斯·杰伊尔公司控制西北地区铁路；哈里曼财团控制中央大铁道和南太平洋铁路；古尔德铁路公司和罗克·艾斯兰系统占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铁路。[1] “钢铁王国”——摩根在1901年组成的摩根钢铁公司控制了美国钢铁产量的65%。1900—1910年4大垄断集团（道奇、安纳康达、肯尼科特和卡劳梅特—赫克莱铜矿公司）控制了美国铜产量的75%。1909年美孚石油公司控制全国石油的66%。福特汽车公司在1913年生产了全美国汽车总量的50%。1907年，摩根完全接管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当时公司所属各公司共装有电话机300万部，其他独立公司也装有相同机数，191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装机数已超过500万部，其他独立公司只装机360万部。1898年美国奥蒂斯升降机公司兼并其他8家升降机公司，总资产高达1100万美元，生产了几乎世界上所有最高建筑物的升降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第一批跨国公司。

总之，20世纪初年，垄断已成为美国全部经济生活中的基础，垄断组织（主要是托拉斯）遍布美国的工厂、矿山、油田、铁路、交通运输以及公用事业各个部门。

〔八大财团最后形成〕　在垄断化进程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又逐渐融合，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和大财团，出现了金融寡头。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金融界的巨型企业。1898年纽约最大的17家商业银行拥有全市63家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70%；1900年3家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保险公司、互惠保险公司和纽

---

① 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昌，1995年，第6页。

约人寿保险公司拥有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资产总额和保险单总额各半数以上。纽约的两家合伙经营的银行和两家商业银行各自形成了有力的金融垄断组织。[①] 工业垄断组织和金融垄断组织的形成为两者的联姻创造了条件，为财团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1898—1900 年银行巨头摩根共合并了 20 多家钢铁公司，后又以 4.8 亿美元的高价收买了卡内基的钢铁公司。1901 年，他组建了摩根钢铁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达 10 亿美元的大公司。摩根将银行资本渗入工业资本之中，从而形成美国第一个首屈一指的摩根财团。1912 年，该财团在 112 家大公司中拥有 341 个董事席位，并在 100 家子公司中拥有较大股份。摩根本人是美国 21 条铁路、通用电气公司、西方联合公司、普尔曼车厢公司和 3 个保险公司的董事。财团控制了第一国民银行、银行信托公司等 13 家金融机构，合计资产总额达 30.4 亿美元，其中摩根公司实力最为雄厚，称雄金融界，被誉为“银行家的银行家”。财团还拥有一些大型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几家全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到 19 世纪末，摩根在商界的信誉已超过了美国政府。[②] “一些评论家指出，摩根比大多数总统的权力都大。”[③]

建立财团的另一个典型就是依靠雄厚的工业资本渗入银行金融领域，最后成为仅次于摩根财团的洛克菲勒财团。70 年代洛克菲勒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在掌握了美国石油业后，他又控制了煤气、电气、制锌、制铅、炼铜、炼钢等企业。90 年代始他将工业资本投向银行业，与斯蒂尔曼共同掌握了花旗银行，并利

---

① 引自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前引书，第 15 页。

② （美）罗伯特·索贝尔、戴维·B·西西利亚：《企业家：美国人的创业精神》，（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89 年，第 150 页。

③ 同上书，第 148 页。

用所得利润再投资，或组建新的工业垄断公司，或收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攫取控制权，由此形成实力雄厚的财团。

20世纪初美国形成了8大财团，除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财团外，还有库恩—罗比财团：德裔犹太人A·库恩和S·罗比于1867年创办库恩—罗比公司，主要投资铁路事业。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该财团有“铁路王国”之称，垄断了美国铁路。还投资银行、钢铁、石油、电气等部门。

梅隆财团：T·梅隆于1869年创办托马斯·梅隆银行，1902年更名为梅隆国民银行，这是他发家的金融支柱，后与工业资本融合形成财团。梅隆银行在1890年就控制匹兹堡冶炼公司，后改名为美国铝公司，1910年以来一直垄断了美国的铝生产。长期来通过金融机构控制匹兹堡地区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

杜邦财团：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托拉斯。杜邦公司在1918年资产高达3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垄断公司之一。

芝加哥财团：美国中西部地区财团。20世纪初，由当地富豪家族麦考密克家族、伍德家族及新兴的克朗家族组成。他们利用当地的农业优势，发展肉类加工和农业机械，使芝加哥地区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商业上占有优势。成立于1866年的西尔斯—娄巴克公司为该财团所属。20世纪初经营邮购业务获巨大发展，它的零售商店和供应点遍及全国。

克利夫兰财团：克利夫兰地区的几家关系密切的豪富家族，如：马瑟、汉纳、汉富雷、伊顿等，利用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创办钢铁工业获巨额利润后再投资银行业，并将资本投向橡胶工业和铁路运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具备了财团的条件。

波士顿财团：由19世纪经营奴隶贸易而致富的波士顿地区的富豪，如：洛威尔、劳伦斯、亚当斯、洛奇等家族组成。他们利用海外殖民攫取的财富投资于商业银行、保险事业和投资公

司，并依靠这些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投资纺织、制革、制鞋、服装、食品以及化工等轻纺工业。20世纪初几家世代通婚的家族以波士顿第一银行为核心，形成财团。

此外，还有一些中小财团伴随大财团而生。它们一般都依附某一大财团而生存。

20世纪初年，8大财团形成以后就掌握了美国的经济命脉。美国一些主要工业部门中，都有一家大垄断公司的产品量占整个部门总产量的90%以上，而这些大公司的背后就是垄断财团。以8大财团为主体的美国金融资本不仅支配着整个美国国民经济，成为商业和企业生活的“心脏”和“源泉”，而且还操纵政府，干预政务，并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成为以托拉斯为特点的垄断资本主义，或托拉斯帝国主义。

〔现代企业的定型〕　在美国经济垄断化过程中，现代大企业的初步形成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成果。现代企业形式——股份公司在企业垄断化和巨型化进程中脱颖而出。虽然股份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在美国经济史上早就出现过，最终还可追溯到16世纪的英国，但是股份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在美国真正形成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后。从19世纪50—60年代起股份公司进入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初尽管美国的独资企业形式在经济生活中仍占多数，但在大企业中股份公司已在美国成为一种主导企业形式，成为一种基本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发展和巨型企业的兴起是同步的，都是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兴工业部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等都是需要巨额投资才能兴办的，因而独资企业的形式很难在这些部门有立足之地。同时新兴产业部门已不是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它们往往在纵向上从原料到销售都纳入经营范

围；在横向上同时经营若干相关产品。独资企业要进行这种多样性的生产也无能为力。而股份公司却具有适应上述情况的优点和性能。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股份公司是巨型企业的最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巨型企业并不是仅仅在规模上、人数上比以前的独资企业成倍地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即企业内部的资本所有制形式、生产结构和管理模式所体现的现代性，远远超越了以前的独资企业的形式。

在资本所有形式上，独资企业的资本所有制为个人所有，股份公司则是若干股东的资本所有制，即由分散的私人资本变成集体资本家所有的股份制形式，从而使企业由个别私人资本家变成集体资本家（股东）所有制。这样就为吸收社会资金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也为公司兼并其他企业提供了某种方便。而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与证券市场的发育和运作密不可分。

生产结构上也发生明显变化。独资企业因受规模资金所限，以生产单一产品为特征，产品销售往往在地域上也有所局限。股份公司是巨型企业的组织形式，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或是一条龙经营，即从原料到加工，从成品到销售，从运输到商店经销都由企业自身来完成；或是生产多种产品，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由于不断地兼并联合，不仅使企业规模扩大，而且使产品的内容变得多样化。

生产管理上同样发生了显著的重大变化，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逐步分离。因为股份制巨型企业是集体资本家（包括股东）所有，在管理上就不可能按照独资企业那样进行家长式的个别资本家的管理模式；但是也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集体”管理，让每一位股东都参与企业管理和经营。同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添置设备需要发行新股票向投资者筹集资金，必然导致公司股权的进一

步分散。因此股份公司需要有一批领取薪金的专门从事管理和经营的人员，它们受资本所有者的委托实施经营和管理。在实践中就形成了所谓经理式的公司的管理模式。它的具体组织结构是：董事会是资本所有者的代表机构，下设总经理掌握经营和管理全权。他下面再按企业业务分设管理机构由副总经理司其职，负责生产、销售、人事、研究与开发、财务等工作。这种管理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财团领袖人物可以对所属企业实行单一的垂直领导，犹如天主教会和拿破仑政府一样实行有效的集权管理。著名黑幕揭发者、女记者爱达·塔贝尔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管理集中化与天主教会或拿破仑政府一样不折不扣。"这些专业管理人员"他们每日聚会，把全部时间花在康采恩的管理和发展问题上。……石油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从美国东部的奥什克什市的油绳，到苏联石油在中国的竞争，无不是他们的论题。"而公司的创始人和主持人洛克菲勒完全是组织方面的"奇才"，他绝对"精密地"操纵他自己设计的这架"机器"，"这架机器的思维所产生的影响，从纽约城的权力中枢到最卑微的输油管道巡察工都能感受到"。[①] 在企业管理上 A·卡内基堪称杰出人才。他"抢占市场"的强烈意识是他的钢铁公司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卡内基牢牢掌握市场信息，并不失时机地转换产品打入市场。他认为"占领市场越早越好"。90 年代，他敏锐地感觉到对钢铁公司来说铁路市场行将结束，带着特有的目光瞄向城市建筑市场，"卡内基是第一个最早带着幻想看到城市中心成长的人，他认识到由于电梯发明使建造多层结构成为可能，钢铁公司可以如以前提供铁轨一样在未来提

---

① 引自詹姆斯·罗伯特：《美国神话与美国现实》，（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29—230 页。

供钢梁服务。”为此“卡内基不仅改变产品结构而且改变市场资源”，还将目光瞄准了国际市场。因而卡内基在90年代结束时，“将他的公司由一个十分成功的企业建成为一个工业王国”。[①]

总之，从美国第一次企业合并高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企业已进入其成熟期。美国的整个工业结构甚至经济结构都已具备了现代形态。也就是说，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确立的同时，美国现代企业已趋成熟。

〔关于托拉斯的争论〕　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社会巨变必然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和思想上的争论。对于出现于美国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垄断现象和具体组织，对于美国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变化，美国社会各阶层人民持有不同看法，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有之，议论纷纷，情绪激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把美国垄断化的时代比喻为“恐龙时代”，他说：“（以古代恐龙时代出现的同样方式，）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各种因素合并起来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世界中，从未想像过的大规模公司的巨型企业，犹如古代恐龙似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大地的。它的躯体、力量和进攻武器表明他无敌于天下。”[②] 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著名改革家、思想家梁启超目睹耳闻美国人对托拉斯的辩论后，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这样写道，在美国，人们视托拉斯为“怪物”、“猛兽”，各阶层人民都关注其发展。托拉斯究

① 约瑟夫·华尔：《安德鲁·卡内基》，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86—587页。该书第一版于197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尔教授是当代美国企业史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该书被评价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王国缔造者和慈善家的高明研究，而且是美国巨型企业兴起的引人入胜的编年史。”

② 詹姆斯·T·亚当斯：《美国史诗》，蓝带出版社，纽约，1931年，第342—343页。

竟为何物?“政府之焦虑，学者之讨论，民间各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上所研究争辩，举全国 8000 万人之视线，无不束于此一点。”生动记载和描绘了美国上下对垄断的关注。关于托拉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肯定，有人否定。新闻报上辩论不断。梁启超又进一步将美国人的争论加以归纳，认为托拉斯的产生给美国带来十二“利”和十“弊”。所谓“利”就是：1. 可以利用最新最大最敏之机器而尽其所用；2. 资本既合并，则创出之物其价也随而廉；3. 以工场伙多之故，可以实行分业之学理，使日趋精密；4. 能有余力利用废物，使无弃材；5. 以全国本业皆合同故，能节制生产毋使有羡不足，因以免物价之涨落无定，而资本家无时常倒闭之患，劳力者也不至被牵涉而失其业；6. 能经营附属事业，扩张外国贩路；7. 能淘汰冗员，节减薪费；8. 凡一切竞争之冗费皆可节约；9. 可节省运送费；10. 信用日益坚实；11. 以资本雄大故，不假借贷，无畏外界市场之恐慌；12. 可以交换智识，奖励技术。

托拉斯的弊端为：1. 以全权委诸一二人之专制，苟不得其人，则全局失败；2. 规模太大，难于统一监督；3. 独占一业，竞争失去，技术改进中止；4. 工人失业；5. 使小资本家无法自存；6. 以廉价勒买原料，高价售货损害产家和消费者的利益；7. 日杂粗窳以欺市众；8. 滥用保护关税之权，低价售到国外，高价售于国内；9. 剥削工人更甚；10. 垄断企业一有失败，则其证券搅乱市场。梁启超的概括虽不能说已经十分全面科学，但在客观上反映了美国人民对托拉斯利弊分析之大端。

梁启超的概括尚属旁观者之评述，美国人自己对托拉斯的评价，也许更贴切、更直接。1899 年 9 月，在芝加哥曾召开了一次讨论有关托拉斯的专题会议，出席者中有中西部的几位州长，有劳工代表，有工厂主代表，有农民代表等等。代表们出自不同

的地位、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视角围绕托拉斯问题各叙已见。一位农民代表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企业已经将许多在一个州或若干州的分散企业合并起来……使它们在统一管理之下。这些大型企业，或大家都知道的托拉斯建立起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促使它们推行已经侵犯个人权利的政策，或者已经使用它们的影响限制贸易，伤害劳动权利，摧毁其他财产的价值，剥夺他人利用它们自己资本的权利，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公共政策的明显反对，对共和国最大利益的破坏。"他认为托拉斯的行为正将共和国推入到一个危险境地。因此美国人民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推动国会通过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托拉斯法，明确规定托拉斯的什么行为是伤害公共政策和损害私人企业等等。应该用法律来制止托拉斯利用州给予的特权破坏其他企业和剥夺其他公民使用它们的财产，制止它们利用权力和影响限制贸易，制止它们利用大量钱财控制政党和议会。

一位编辑则持有不同看法，他开门见山地说："合作的权利如同比赛权利一样是毫无疑义的；比赛权包含了退出竞争的权利；合作常是一种竞争方法，从更开阔的视野看，竞争经常是合作的手段；两者均为合法的、有序的、无侵犯性的个人行为，两者都将在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律指导下实施；任何个人或机构用立法行为或任何侵犯性力量企图去禁阻或限制合作或竞争，就这样的人和机构而言，他们将可能因他们的这种企图被公正地评价为自由的敌人、进步的敌人、社会的敌人和人类的敌人。"从此出发，他认为托拉斯如同其他各种工业联合一样，以联合的形式努力做着联合组织中每一个个人正在从事的事情。托拉斯不是一个可以被控告的机构。有人用托拉斯否定竞争来攻讦和否定这种合作形式是荒谬的，说托拉斯否定了竞争等于说竞争否定了竞争。有人认为托拉斯靠生产和出售比在托拉斯外生产的产品更廉价的

产品否定了竞争，如果这理由成立的话，那么每个成功的竞争者不是也都否定了竞争？

对托拉斯持反对态度的工会领导人约翰·海斯在发言中指出，托拉斯和联合问题已经超越了生产和价格等有关制造商的合法运作问题，它已被提升到政府政策的高度，包括人权问题、个人自由、公民地位、公民尊严、自卫权利、关于财富权利的限制问题、商业侵权问题、创建能够保卫我们自由、人格和独立的屏障问题。他认为"托拉斯"这个概念是如此的不肯定、如此的含糊和如此的不确定……我们必须对它作出可靠的界定。韦伯斯特将托拉斯定义为"控制生产和价格的一种联合"。这个定义提供了我们从法理上批判它们的充分理由，因为控制生产包括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了我们公民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我们政府存在的形式。他的结论是"托拉斯的政策是一个反对社会最大利益和摧毁我们自由制度和对大众政府的有组织的肆意侵犯。"

一位社会主义者认为为了处理托拉斯必须了解它们的起源。托拉斯不是怪物而是一种现象，它还会继续发展，在20世纪某一时候，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工业将在托拉斯的控制之下。我们无法停止它们的发展犹如企图在河上筑坝去阻止浩浩荡荡的密西西比河一样。他认为一旦所有工业部门都建立托拉斯后，资本将会全面地改变它的性质。托拉斯机器完全准备交给民主社会的手中——即大众控制。没有人能想像一个社会化的工业将会是被分裂为成千上万个的小企业。对于托拉斯，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企望未来企业实行公有和管理；第二件事是保护劳工反对托拉斯；第三件能够做的事是使一些私人企业实行公共控制，即建立所谓的公用事业，诸如城市所有的市政建设等等。

为托拉斯辩护的制造商们在会上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一位代表这样说，在一些合理的有限联合企业内部能够减低生产成

本。这样的联合企业能够使用最新的改进了的机器和使总的设备工具适应技术上的进步，这在资本缺乏和规模很小的企业里是难以实现的。联合对社会是安全的，资本的联合建设了铁路降低了交通运输费用，美国钢铁生产正适应整个世界的需求甚至美国本身的需求。他还认为在美国除了国家特许的企业以外，真正的垄断是不可能的，工业领域内的联合也不会影响中间商的利益。[①]

上述资料表明美国的农民、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对托拉斯采取了否定态度，他们严厉批判托拉斯，揭露它给美国人民和社会带来的祸害和弊端，指出托拉斯的存在违背了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工厂主和编辑代表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肯定托拉斯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进步和利益，认为托拉斯的建立符合美国精神。

大企业家如何看待托拉斯？约翰·洛克菲勒 1899 年在美国工业委员会前作证时讲述了他的石油公司的起家历史，竭力维护托拉斯的合理性及其优越性，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企业发展变得可能时，我们发现进一步集资是必要的，即获取和需求人员和资本，于是组成了 100 万美元资本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我们发现有更多的资金可获得，发现更多的投资者对企业有兴趣，我们的资金增长到了 350 万美元。因为企业增长、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取得，更多的个人和资金投入我们的企业，新的公司代理处组织起来，但目标经常是相同的——用提供最优秀和最廉价的商品来扩展我们的事业。"在谈到石油公司成功之道时，他说："(成功）在于他坚持这样的政策：通过优质廉价的产品极大地扩展他的企业。在发现、获取和利用最优最省的生产方法上不惜工本。他寻求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并为此支付高额薪金。他为

① 有关 1899 年芝加哥的托拉斯研讨会的材料均来自《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279—298 页。

了更好和更新的设备毫不犹豫地淘汰旧机器和旧工厂。他将工厂设在他们能以最低价格供应市场的地点。他不仅为主要产品也为所有可能的副产品寻求市场，为将它们打人市场不计工本。他毫不犹豫地投资数百万美元到减低储集和分配石油的方法上：即使用输油管，特种卡车，运油轮船和运油车。他在每一个重要的铁路车站修建汽油罐以减低储油和送油的成本。他不惜代价将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包括文明人的市场和不文明人的市场。他对美国石油充满信心，并已投入数百万美元去实现他的目标，固守市场，同俄罗斯和所有产油国家和反对美国石油的竞争者进行竞争。”

洛克菲勒认为关于工业联合的讨论已经太晚了。工业联合是必要的。如果美国人在全美各州和国外都具有扩展他们企业的特权，那么他们必须是大规模的并且需要更多的企业代理。关于工业联合的优越性，他认为：1. 是能调动必要的资本；2. 扩展企业范围；3. 增加对事业感兴趣的人的数量；4. 节约企业费用；5. 企业因许多具有丰富经历的有关人员的知识获得改进和节省；6. 授予公众的权力以更低价格改进产品和依然使股东获利；7. 给劳工以永久的职业和良好的薪金收入。

当问及托拉斯会对公众造成哪些主要弊端或危险时，洛克菲勒回答说：“危险就在于被联合企业所授予的权力可能被滥用；在于组成联合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事业而是为了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机，因而价格会被暂时抬高而不是降低。这种滥用权力的事情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的大企业或小企业中都可能出现，因此这种反对联合的争论如同因蒸汽也许会爆炸而反对蒸汽一样。其实蒸汽是必要的，而且也能使它做到相对的安全。联合是必要的，它的滥用权力也能够被限制到最小程度；要不然，我们的立法者们一定明白他们缺乏能力去处理最重要的工业工具。迄今为

止，大多数立法企图不是努力去控制联合而是想摧毁它，因而他们是徒劳的。”①

上述时代的人对托拉斯的纷纷议论不仅反映了托拉斯在美国出现时给美国带来多大的震动和影响，而且表明托拉斯垄断组织的形成给美国不同阶层的人民带来了不同的利弊。其实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出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为垄断阶段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在工业革命的猛烈推动下，生产高度集中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必然的逻辑发展。各种垄断组织（包括托拉斯在内）都是垄断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事物，它们的产生不是以人类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们的优劣、利弊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人们的反对而不存在，反之亦然。但是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说明，当时垄断的形成基本适应生产关系，容纳了生产力的发展，巨型企业适应了大生产的需要。总之垄断的形成是一种生产力自然发展的产物，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大规模生产势必造成生产的集中，集中就会自然地趋向垄断。诚如列宁所说：“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形成协定，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② 同时，现代企业科学的管理方法符合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由竞争中出现的某些弊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不触动根本制度（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条件下，为适应生产力高度发展实行的一种内部机制的调节，但是托拉斯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某些阻碍，追求高额利润驱使托拉斯产生各种弊端，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本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312—3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页。

身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因为进入垄断阶段而解决或消失，因此经济危机还是周期性地出现，贫富不均成为难以克服的痼疾，竞争以更高的形式甚至更激烈的程度出现。但是，总体而言，托拉斯的出现和形成对当时美国的整个社会来说还是利大于弊，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面效应胜于其负面效应；同时托拉斯的产生是工业发展势在必行的趋势，谁也无法加以制止。所以托拉斯刚在美国出现时，有人反对并主张禁止托拉斯，但是托拉斯还是不断发展起来，并且"日盛一日"，迫使人们对它改变看法转变态度。对此梁启超概括说，经过一段时期以后，美国政府和美国舆论"幡然一变，知此物之发生，由于天演理势"，"于是禁遏之政策，一变为补救之政策"。梁的说法符合当时美国实际的。1913 年以后，美国在托拉斯问题上已出现一种明确的倾向，"主张管理托拉斯而不是解散托拉斯。国会顺应这种情绪制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① 20 世纪初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在全民的辩论声中最后确立起来。

〔大企业家的历史功过〕　巨型企业的崛起，垄断组织的形成都是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但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前行都是通过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实现的，通过一批适应时代需要的个人或群体的有意识活动创造出来的。在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垄断化的进程中，最基本的动力和主要生力军是美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移民，他们担当了工业化的重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现代美国。同时，一批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也应运而生，成为一支特殊的历史力量。要对大企业家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头衔和称呼，如：企

---

① 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 1896—1946》，(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年，第 194 页。

业家、实业家、工业政治家、投机家、发明家、幻想家等。一般而言，他们是企业的创建者、组织者或管理者，有的是发明家和创新者，他们是垄断化的推动者，他们是托拉斯的领袖人物，他们是美国各行各业中的“大王”：汽车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等等，他们是银行家和工业家，他们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他们是证券市场上的投机家……。20世纪初在美国最负盛名的主要大企业家代表有约翰·洛克菲勒（1839—1937），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约翰·摩根（1837—1913），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亨利·福特（1863—1947）等等。

这些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发展和成熟与美国垄断发展阶段相一致，也是垄断化的直接产物。内战以后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开展、大企业崛起，美国出现了大企业家；19世纪80—90年代，随着垄断的兴起和高涨，大企业家群体形成；20世纪初，美国出现第一次企业兼并高潮，垄断化基本完成，美国大企业家群体进入成熟阶段并形成了财团这个新的顶尖阶层。在垄断形式上，他们开始采用“控股公司”的新形式。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这方面独领风骚。1892年，美孚石油公司解散后，新泽西州首先通过有利于美孚公司的“控股公司法”，允许一家公司拥有其他州的公司股票。1899年美孚托拉斯改组为控股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洛克菲勒为最大股东，掌握着公司股票额的25%。总公司下设41个子公司，子公司又拥有70多个下属公司。后又将资本投入金融界控制6家银行，形成垄断财团。即使1911年5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责令其解散，但是解散为34个独立公司后，原股东地位并未变化，洛克菲勒仍掌握实权。财团势力已不可动摇。摩根财团也同样如此。20世纪初美国已形成8大财团。大企业家中的新阶层——财团已经形成，他们已成为美国财富和等级金字塔的顶峰。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因此垄断资本主

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①] 1892年美国《世界》报列出全美3045名百万富翁，《论坛报》将它增为4047名。1900年参议院从中又遴选出25名百万富翁。垄断财团的势力日盛，俨然成为一个金融王国，诚如一位美国评论家在20世纪初所评的那样，"(美国钢铁公司) 的每年收益和扩展的钱财超过除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外的所有国家；它的债务比欧洲许多较小国家的还大；它绝对控制了将近马里兰州或内布拉斯加州那么多人口的命运，直接影响着在数量上两倍于它们人口的命运。"[②]

这些企业家不论他们有着多么不同的称呼，但都同企业和垄断联系在一起，同财富密不可分。因此人们在评价大企业、垄断和托拉斯的时候往往与这些企业家挂上钩，毁其毁，誉同誉，毁誉不一，见智见仁。大企业家出现后，美国历史学家小查尔斯·亚当斯就攻讦他们是"伊利强盗"，他的兄弟亨利·亚当斯则警告说："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权力被委信于少数私人公民手中"，大企业将被一个人或数人的联合所控制，他们将利用这些新的利维坦[③]，成为国家的统治者。[④] 后来，美国一批"黑幕揭发者"将企业家们描绘成为来自上层的毁灭文明的野蛮人，并用大量的调查材料揭露企业家们卑劣的发迹史。1934年美国史学家马修·约瑟夫森出版了他的《强盗大王：1861—1901年美国大资本家》，给美国大企业家正式冠以"强盗大王"的恶名。但是他说这个称呼"出自于19世纪80年代堪萨斯绿背纸币者和平民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0页。

② 约翰·蒂珀尔：《镀金时代的强盗：企业家还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引自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美国的过去》第2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年，第37页。

③ 利维坦为犹太教传说中的巨兽。据《圣经》所载它将成为海洋的统治者。

④ 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前引书，第35页。

主义者的民间传说”。[1] 所谓强盗就是他们夺取了不应得到的东西，所谓大王就是他们是所属领域的实际统治者。大企业家曾被笼统地作为垄断资本家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和阻碍社会发展和腐朽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加以全盘否定和鞭挞，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其实，大企业家本人在世时曾为他们自己的作为进行过自我辩解和评说：坚持认为他们发展企业和敛财所获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全社会包括穷人在内全体成员都带来裨益。使穷人们享受到了以前富人享受不到的东西。卡内基将他的论文集题名为“企业王国”，这也许是他给自己封的一个最合适的头衔。他在1900年写信告诉朋友说：“我们不是为了美元，幸运的是你我和我们的合伙者都已经富足，或正在富起来。我们在企业中，在完成有用的部分中获得乐趣——这是我们的最大回报。”[2] 一些研究企业家历史并对他们持肯定态度、抱有好感的美国学者，在批评大企业家的声浪中纷纷为大企业家鸣不平，称誉他们为“工业政治家”、“实业界的拿破仑”等等，认为他们在经济领域作出的贡献可以同美国的开国元勋在政治上的作为相提并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大企业家们在这块大陆上兴建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一步步地建立起我国的商业，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总的说来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3]

可见，美国大企业家是一个在历史上有争议的群体。这是因为他的复杂性质和历史两面性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群体稍

---

① 阿伯拉罕·艾森斯坦德：《美国历史：1865年以后》第2卷，T.Y.克罗威尔出版公司，纽约，1979年，第120页。

② 约瑟夫·华尔：前引书，第640—641页。

③ 詹姆斯·罗伯特：前引书，第239页。

作分析就会发现这个群体的构成本身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中既有世袭的百万富翁，也有出身贫困而最后发迹的，有漂洋过海而来的移民在新大陆发财致富的，有靠自己的科学发明飞黄腾达的，有赖于时运机遇而爬上社会顶端的……。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成功地达到了胜利的彼岸，但他们在经济领域发挥巨大能量的途径和手段却各不相同，呈现八仙过海的纷纭现象，有的靠发挥自己的才干取得成功，有的靠远见卓识抓住机遇成效显著，有的靠自己的发明获得专利而发财，也有的靠施展手腕获取巨利，有的靠卑劣伎俩"吃掉"别人，靠丧心病狂的欺诈攫取财富，有的与腐败的政界勾结权钱交易大发横财。他们在商场上的表现不乏智慧和勇气，不乏胆识和远见；也充满欺诈与卑劣，充满堕落和无耻。大企业家的最后归宿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最后成为慈善家，用建立基金会的形式把财富"还给"社会，或慷慨解囊到处建立图书馆，或资助科学机构，或奖励青年学子；也有大肆挥霍过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暴殄天物……。大企业家群体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在认识评价他们时的多样性和争议性。

这种复杂性还决定了大企业家群体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充当了人类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化过程中的工具和代表人物，在推进美国工业化和垄断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首先，在经济垄断化进程中，这批大企业家以自己的胆略和勇气，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渠道将企业搞大，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以特有的进取心在残酷的竞争中取胜，成为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领头羊，成为各类"大王"，充当了垄断化的先锋。可以说他们是垄断进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他们是生产集中自然走向垄断过程中的自觉执行者。如同战争年代需要军事家，革命时

代需要革命家，文艺复兴时代出现思想巨人一样，工业时代呼唤企业家的到来。诚如诺里斯1902年所说："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字眼不再是战争而是商业……如果狮心王理查德（理查一世）活到今天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位联合钢铁公司的主要代表了。"①

其次，他们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倡导者。20世纪初美国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股份公司已成为美国大企业中的主导形式。这同大企业家们的积极推行和发展股份公司形式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仅利用股份公司的形式而且创造和丰富了管理上的新鲜经验，并将它推进到新的高度，成为现代股份公司，甚至创造出控股公司的新形式。他们创造和发展了股份公司，同时又成为这些公司的核心人物，操纵公司。在公司内部企业家们又推行管理革命，摸索和建立了现代的管理体制。这方面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走在了前面。他在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设立由9人组成的最高董事会，下设专家委员会和职能委员会。"从9位托管人的活动方式看，他们完全像是一个行业的9位合股人，似乎只有他们才与该行业有关。"② 管理人员都为领取薪金者。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美国经济史家称道说："在美国所有企业的领导权还为个人企业家或传统的企业方法管理时，美孚的管理工作迅速为领取薪金的职员所取代。"③ 泰勒更是管理革命的创始人。他的著作《计件工资制》、《车间管理》、《科学管理原理》等都是有关科学管理的专门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采用泰勒制取得良好效果。科学管理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

① 埃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5页。
② 詹姆斯·罗伯特：前引书，第229页。
③ H·福克纳：《自由放任的衰落：1877—1917》，纽约，1951年，第424页。

世界都产生积极影响。

再次，大企业家往往从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角度出发，在企业内部大力运用新的科技发明从而较为迅速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家本身就是发明家，如爱迪生、福特、泰勒、汤姆森等等。他们直接参与新产品的研制和发明。汤姆森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中进行技术改造，采用多种新技术，福特的T型汽车，爱迪生的各类家用电气等等，都是大企业家直接参与下生产的。另一些大企业家本身不是发明家但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钢铁大王卡内基在企业内建立化学实验室，大胆起用德国化学家弗里克斯博士。他说："我们发现……一位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斯博士——向我们公开了许多奥秘。"卡内基采用了化学博士的意见进行技术改造，大大降低了钢轨的价格。洛克菲勒曾经说：通过优质廉价的产品极大地扩展他的企业。在发现、获取和利用最优最省的生产方法上不惜工本。他寻求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并为此支付高额薪金。他为了更好和更新的设备毫不犹豫地淘汰旧机器和旧工厂。为此他聘用德国化学专家、炼油专家赫尔曼·弗雷克开发印第安纳州的利马油田，并成功地将那里开采出来的含硫量很高的"酸油"精炼成可用石油，1899年美孚石油公司炼油4600万桶，其中50%来自利马油田。在海外市场上，美孚石油成为提供中国灯油的主要供应商。[①]

最后，部分大企业家建立了基金会成为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开创者。在美国从事慈善事业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百万富翁卡内基，他已成为美国著名的慈善家。他在1901至1919年间共出资5600万美元在欧美地区建立2509座图书馆。1911年以1.25亿的

---

① 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前引书，第65页。

巨额建立纽约卡内基基金公司，成为当时美国规模和资金最大的现代化基金会。卡内基不仅积极行善而且还创立行善理论，他在晚年写了著名的《论财富》，提出了慈善理论，认为遗产有三种处理方式：或由死者家属处理，或捐赠给公共事业，或由活着的所有者管理，其中以捐赠公共事业为佳。他认为致富是依靠美国社会制度，因而致富后需回报社会，将一部分财富返回社会改善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返回财产的最好方式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为目的的基金会。他甚至认为富人的财产是为穷人“保管”的。卡内基的理论不管有多大程度上的真实性，但在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洛克菲勒继1889年捐款60万美元兴建芝加哥大学以后，又在1901年捐资20万美元组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05—1919年间总共捐资12900万美元给教育委员会。1913年他又以1亿美元为起点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1910年以前美国已有基金会144个。这种基金会不仅使受益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业因得到资助而发展，还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且从社会角度分析基金会的设立也是一种缩小分配差异的有效手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犹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美国大企业家群体对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与负面效应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在促进工业化和垄断化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因为他们充任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化时期的历史代理人和工具，由于这种转化本身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中进行的，是一种大鱼吃小鱼式的十分残酷的竞争过程，必然充满着种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道德和不公正。同时在转化过程中，大企业家追求的目标始终是高额的垄断利润，这种驱动力可以使他们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最后，这种转化的最终结果是在美国确立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罪恶都会在他们

身上得到反应。因为他们是转化的推动者，也是转化成功后的得益者，他们窃取了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最终都踞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一句话，大企业家功在垄断，罪在垄断。

首先，大企业家的发迹建立在中小企业主和广大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和外来移民）破产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农民和中小企业主对垄断十分憎恨和恐惧的原因。为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等大企业家实现巨富和成功而付出惨重代价的首先是他们企业中的广大劳动群众。泰勒制明显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对工人们而言，却是意味着使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的机器，他们每天上千次地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毫无自由。福特汽车厂被工人们称为“把人变成机器的人间地狱”。一位美国学者说得好：世纪之交的“泰勒主义”作为一种理性化运动和严厉工作纪律的制度，进一步减低了生产成本，因而提高了美国人竞争的锋芒。但是由于使用这些已经成为“机械化”的人，使人类劳动变成机器技术的扩展，泰勒主义强化了雇主和工人间的阶级紧张关系，产生了反对增产流水线的狂潮和停止已增高了的生产率。美国制造商们沉湎于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毫不关注社会分层和由于他们的“流程”所产生的冲突和斗争。[①] 特别是在污染严重的企业里，工人们的身心健康更是受到严重伤害。如 19 世纪 90 年代，卡内基的宾夕法尼亚霍姆斯特工厂空气污染十分严重。工人们对此展开坚决斗争。1913 年美孚石油子公司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的工人们无法忍受种种残害而开展罢工斗争。“美国人民不仅怀疑每一个百万富翁敛取钱财的手段，而且准备相信每一个巨大财富的背后就是罪恶”。他们认为成百万人创造的财富已被少数人自私地盗用，已被强盗大王们用他们不负责任地占用企业

① 埃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 20 页。

所盗用。“成百万人的辛劳成果被无耻地巧取豪夺而为少数人去建立巨大的产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占有者又转而蔑视共和国和危及自由”。[①] 有人这样说：“在洛克菲勒走过的道路上，遍布着破产的人和被遗弃的工厂，摆在他面前的只是对巨大财富资源的不容置疑的控制。”[②]

其次，垄断造成企业内部的集权统治，这就为个人滥用权力和进行不正当竞争提供了可能，必将导致严重社会经济后果。翻开这些大企业家的发家史，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发家就是典型。洛克菲勒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垮别人，扼杀竞争者，因而被称为“工业杀手”，他的竞争手段之毒辣和残忍连推崇企业家的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也不得不说：“迄今为止，这是美国所有工业家集团所能想像得出的最残酷最无情的最能致人于死地的手段。”卡内基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特别在打击合伙人方面颇有手段。1900年他与焦炭大王弗立克的争端就是一例。最后因害怕弗立克揭露肮脏内幕而罢手。这些大企业家往往为追求高额利润而破坏竞争的游戏规则，常常为一己之私利兴风作浪、肆意横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造成国内经济运转的无序状态。他们的触觉还伸向美国的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那里展开竞争，强夺市场和攫取原料，给那里的人民带来痛苦和牺牲。此外他们还不惜挑起国际事端制造危机破坏人类安宁。从生态角度看，企业家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利润的同时却又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为了压低价格和降低成本，他们不惜破坏自然资源，无计划地大肆开采矿藏、滥伐林

---

① 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前引书，第55页。

② 本·巴鲁克·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6页。

木、消耗能源，给地球带来严重污染。

再次，财团和政府勾结，权钱交易造成滋生腐败的温床。大企业家们积累大量财富以后势必要在政治上施展身手，一是为了取得政治地位干预国家重大决策，操纵国家的政治命运；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寻求政治保护伞。20世纪以前他们往往收买政客作为他们的代言人。20世纪初，大财团形成后，他们就直接走上前台，或担任要职、或资助政党、或资助总统选举以左右国家政治。在这方面摩根财团最为典型。20世纪初摩根财团成为美国政府的幕后操纵者之一。他资助历届美国总统上台（从格兰特、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到胡佛），由于摩根的政治作用日益增大，《华尔街日报》称他为“华尔街主神”，说他在“1901年重新组织了这个世界”。在美国中央银行储备体系建立和完备以前，摩根财团俨然成为中央银行的化身，屡屡帮助政府解决经济危机。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西奥多·罗斯福特意邀请摩根共商国是，解决危机。可见其政治地位绝非一般。洛克菲勒则通过资助共和党参加竞选和与议会领袖联姻参与政治，以致共和党就像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样“几乎完全从属于洛克菲勒家属”。为了便于直接参政，企业家们还组织各种联合团体。继1895年成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后，1912年又建立了大企业家的联合组织——美国商会。1916年建立的布鲁金斯学会其成员多为大企业家和政府官员。1919年成立的国际事务协会（1921年更名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其成员近一半是大企业家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律师。操纵舆论工具是大企业家们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力手段。他们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性，舍得花钱控制他们，摩根财团控制的《华尔街日报》被称为是富人的“圣经”。总之，财团像一头章鱼，它的罪恶触须伸向全美国的任何地方，攫取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实际上，我国

是被一系列工业、金融、政治、学术和文化中心所统治。而这些中心是同梅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麦考密克、范德比尔特……的姓名分不开的，就是这个系统影响了总统候选人的挑选，控制了国会两院，决定摩根对外政策，规定了经济方面优先考虑的方针，形成了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标准，确定了谁该有权和谁该无权。”①

少数财团控制政治以后，权钱交易盛行，腐败成风，给美国的政治生活造成严重后果。如：1910年，罗伯特·阿奇伯尔德被塔夫脱总统任命为联邦巡回法官从事商务法院工作。这位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竟收受被告某铁路公司的贿赂：免费让他和家人去欧洲旅行一次，最后是该铁路公司打赢了官司；有一次他又收受某铁路公司的钱财，作为交换条件他使该公司在官司中获胜。在任法官期间他竟还从事煤矿产业的投机买卖。他的罪行涉及伊利铁路公司、拉海谷铁路公司、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公司和费城—里丁铁路公司等。后东窗事发，1913年他终于受到参议院的弹劾被免去职务。《纽约时报》评论说：“他树立了一个榜样，使腐败变得更容易了。”此类腐败案件在20世纪初的美国绝非少数。

大企业家在发迹后，一般都攫取大量财富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恨。垄断化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贫富不均，社会财富如同企业兼并一样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根据1913年成立的美国联邦工业关系专门委员会提供的报告，在美国占全国人口2%的“富人”却拥有全国总财富的60%；占人口65%的“穷人”只拥有5%的财富；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3%，拥

---

①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权势的转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年，第3页。

有财富 35%。而工商界巨头亿万富翁——卡内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摩根等等只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1%，却占有全国总收人的 15%左右。他们往往像赚钱一样拼命花钱，但是只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们讲排场摆阔气，范德比尔特、摩根等人物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表。范的名字成了大量不动产的代名词。威廉·K·范德比尔特在长岛有一个豪华寓所，内有 110 个房间，45 个浴盆和一个容纳 100 辆小汽车的大车库。他的儿子花 600—700 万美元建造有 250 间房间的豪华住宅，建巨大的游艇。摩根不仅在国内有豪宅，而且还在英国买下城堡。

总之，大企业家群体充当了美国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作为美国垄断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历史力量，他们的性格特征和思想素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这段历史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他们勇于进取，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抓住商机义无反顾，反映了时代迅猛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他们那种为追求财富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残忍，为竞争而不顾任何道德准绳，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社会本质。① 历史就是这样通过善与恶、功与罪、正面与反面的相互斗争和作用向前推进。20 世纪初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和推动，美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个人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确立，实现了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变”。② 美国作为经济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崛起在西方。

---

① 参见陆月娟：“试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大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上饶师专学报》，1999 年，第 2 期。

② 罗伯特·韦尔伯：《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67 年，前言。

第二章

美西战争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

美国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使美国成为工业大国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世纪之交，美国沧桑巨变成为列强中最具潜力的“后起之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促使美国改变其外交形象和对外政策，寻求与其地位相称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在国际上发挥与其地位相当的作用。垄断资本主义成为美国向外争夺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强劲动力，垄断资本家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直接驱动者和策划者；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为它在20世纪初年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传统的扩张主义思潮和垄断时期帝国主义的扩张欲望结合成一种美国20世纪所特有的更强烈、更富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行动。“为实现它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梦想，经过半个世纪的准备以后，一个美利坚帝国的新样式，临时披上盔甲登上了国际舞台。”[1]

---

①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美国历史》，第2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纽约，1961年，第223页。

一、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和海洋扩张战略

扩张主义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其实，美国的立国就是基督教向外扩展，信徒们作为上帝选民在新世界建立“山巅之城”使命感的产物；19世纪40年代在西进洪流中美国社会流行一种被称之为“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思潮，宣扬西部土地是上帝对美国人的恩赐，非美国人莫属。随着北美大陆边疆的消失，扩张主义者的目光早就盯上了新大陆以外的领土和领海。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兴起后，“适者生存”成为他们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和世界被瓜分完毕〕　美国虽然在内战以后开始崛起，但当时其国际地位依然属于二流国家。它名列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等之后，充其量世界老七而已。但是历史跨入20世纪后，美国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它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已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外交家和作家很少用同样的口气将美国与6个已公认的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相提并论。20世纪初，它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将它包括在内了。”①这是由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所决定的。它全年的生产总值在19世纪90年代已跃居世界首位，已将老牌列强英国和法国等抛在身后。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在国际上以前所未有的勃勃野心积极寻求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不断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代表美国大资本家利益的全国制造

---

① 欧内斯特·梅：《帝国民主：美国作为强国崛起》，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纽约，1961年，第6页。

商协会，在1897年和1898年召开的年会上，一些企业家和商人强烈要求对外扩张。该会主席西奥多·塞奇在1898年年会上说："本协会是正当合众国制造商开始认识国外市场存在着他们机会之际成立的。由于会员中包括了大部分从事对外贸易的大制造商，所以发展对外贸易，本协会有着比合众国的其他机构都更为重要的利害关系。"一位纽约商人在会上力主打通地峡开辟新航线，他说："太平洋大规模贸易的展开，日本的开发，许多中国港口的开放，巨大的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完成……假如我们要在太平洋国家的贸易中占有合理地位的话，开通这条航路，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都是必要的。……这条运河必须修筑，而且必须由美国人来修筑，由美国人来控制。"[①] 话语显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霸道气势。

经济利益需要政治权力的保护和支持，经济强国地位需要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当时，美国在国外已经开始其殖民活动，在海外积极进行资本投资，海外的美国势力已经成为推动美国政府实行殖民政策的驱动力量。例如：美国制糖工业托拉斯在古巴已经有相当实力。古巴生产的糖90%输往美国。1898年，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时，在古巴有直接经济利害关系的美国商人和企业家、银行家等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稳定古巴的政治局面，保护他们的利益。纽约商人曾给麦金莱总统写了请愿书，在列举了古巴发生的冲突已给美国造成的工商业的种种损失后，他们说："这一剧烈而有破坏性的冲突除了已使美国工商业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外，其危害美国利益的程度已达如此严重，致使我国政府确有正当理由，以恢复和平为惟一目标而迅速采取有效措

---

① 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1年，第47—48页。

施。”[①] 总之大企业家和大制造商为了大肆向外扩张开拓市场，积极组织力量对国外进行探索和调查，他们迫切需要在美国政界寻求靠山和支持；而美国政府也急切需要仰仗他们的经济势力稳定和发展国家利益，于是动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保护他们“走向”世界。商界和政界联手，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互为依存和利用，用国家力量保护商人到海外冒险，成为19世纪末年理解美国经济生活的两条主线。“这两个因素——美国制造者为寻求国外市场进行深入调查和麦金莱政府的迫切企求在这场冒险中支援商业社团——是理解1897—1898年新帝国的经济领域的两条线索。”[②]

关于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的关系，共和党议员、扩张主义者阿尔伯特·贝弗里奇讲得更为露骨：“今天我们种植着我们消费不完的粮食，今天我们制造着多于我们使用的产品。今天我们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拥挤的社会；工人多于工作岗位；资本多于投资。我们无需更多的钱财——我们需要更多的流通和就业。因此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产品找到新的市场，为我们的资本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为劳工找到新的工作岗位。”[③] 他极力鼓吹美国在1898年的对外扩张，宣称美国在扩张中获取的利益就意味着美国的劳动者有新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意味着美国农民生产的每一蒲式耳的小麦和谷物，每一磅牛油和食用肉，他们生产的每一种产品的价格都将得到提高。当时，美国一批扩张主义政客们在国会雄辩滔滔，在会外串联活动，极力推进扩张政策。“当美国进入新的1898年时，新的辛迪加和院外活动集团正为推进美国在东方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61页。

②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前引书，第206页。

③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01页。

的利益而组织起来。"[1]

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曾在1900年发表《美国经济霸权》一书，预见在半个世纪内世界上只有俄国和美国两大强国，而经济上的霸权只有美国拥有。1901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战争是经济竞争的极端状态，认为1897年至1901年间，美国出口超过进口额高达5.1亿美元，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因为美国农产品可以在欧洲低价出卖，矿产品作为原材料也可以在欧洲销售，大部分的钢铁制品和其他工业较低档的产品都可以在欧洲廉价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越来越多地把欧洲挤出中间市场，如果美国加把劲，它的商品将可以欧洲国家无法竞争的低价充斥欧洲。欧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毫无改变地继续下去，他们已将美国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一个竞争对手。亚当斯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不是妥协就是战争，除非美国强大到使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是危险的……。[2]

美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且在军事上也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咄咄逼人。强大的美国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危险因素而受人瞩目，20世纪初在国际舞台上甚至出现了关于“美国危险”的阴影。1903年法国的一位前外交部长问道："我们是否面临美国危险……旧世界将面对美国而走向失败?”“美国危险”一词常常出现在德国议会和争论中。一位英国记者W·T·斯蒂德在他的著作《世界美国化》中对美国作了非常偏颇的评价，他说：现在英国仅有两个选择，或与美国联合，“或沦为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1905年一位法国杰出而审慎的历史学家亨利·豪瑟尔写道：“人们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国危险外别

---

①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前引书，第206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426—427页。

无他物。"[1] 可见，美国已经从不被人注意的二流国家变成世人害怕的"美国危险"。

美国危险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马汉的海上实力论迅速流行于世，引人瞩目。在19世纪中期，欧洲人只不过看到许多美国人在重新谈论"天定命运"，达尔文主义生物学的主要普及者约翰·菲斯克在30多个美国城镇演讲"天定命运"，但是菲斯克在国外并没有多少知名度。世纪之交，马汉鼓吹海上实力的书籍在1890年一出版，就在英国引起反响；接着，德国国王阅读后就下令将该书译成德文并在全国所有的海军图书馆收藏。"不久，马汉在欧洲犹如在美国一样享有盛名了。"[2] 马汉的出名在于他的理论，他以英国为例，说明实力的基本因素是商业——包括打开市场像殖民地那样保护市场——商船经商和战时用军事力量和海军保护商船和贸易。马汉的理论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路星辰，而且成为世界列强指导治国和外交的圭臬。马汉理论之所以受到列强的青睐，还因为加强海上实力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当然，列强重视马汉理论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国危险的担忧，他们从马汉的言论中似乎也听到了美国人霍霍磨刀的声音。

但是当美国跻身世界列强，雄心勃勃地开始向海外扩张的时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其中的非洲已被他们瓜分完毕。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政治独立外，其他所有非洲国家都已沦为殖民地。英国占有非洲的902万平方公里土地，占非洲总面积的30%；法国占非洲总面积的35%，德国占8%，意大利为7%，比利时为7%，葡萄牙为6.9%，西

---

①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5—6页。

②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8页。

班牙为1%。[1] 老牌列强和新列强之间在经济实力和占有殖民地的多寡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差。美国和德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已大大超过英国、法国、西班牙、俄国等国，但是他们在世界上的殖民地和利益范围的数量却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望尘莫及。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建立与资本和实力相称的殖民帝国，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思潮再次泛起，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传统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结合〕　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潮是根深蒂固的。美国本身就是欧洲扩张的产物，它的扩张主义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欧洲。"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2] 美国殖民地时期，移民始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肩负基督教使命来到新世界建立"山巅之城"，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新世界的扩张。因此"自从独立以来，美国人已经周期性地变成侵略性和好争吵的"。19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天定命运论——"一个名称新颖的扩张主义形式"，"它意味着由上苍预先安排的向尚未清楚界定的地区进行扩张。有的理解为向太平洋沿岸扩张；有的认为扩张到北美洲大陆；也有认为扩张到整个半球的。……直到19世纪中期，它吸引了足够的民众形成了一场运动。……为了完成未

---

① 见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第622—623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来伟大美利坚国家的结构，一个世纪也许是必要的。”[1] 在这种思潮的鼓舞下，美国统治者发动了与墨西哥的战争，并为了实现“天定命运”占领太平洋沿岸，威胁同英国开战。一些人已经谈论窃取西班牙的古巴，一些人支持匈牙利革命，企图干涉欧洲事务，一些参议员认为美国可以击败任何欧洲的联盟。内战即将爆发时，国务卿西沃德甚至建议林肯总统挑起与欧洲的纷争以避免内战。[2] 如果说基督教使命感和“天定命运”论是传统扩张主义，那么以马汉为代表的海上实力论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扩张主义，马汉（包括鼓吹扩张主义的一些美国政客，如：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等）是其最完美的理论代表和鼓吹者，美国总统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习称老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则是其最忠实、最积极的推行者和执行者。其中尤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他于 1897 年 6 月 2 日在纽波特海军学院发表演讲，鼓吹建立强大的海军和不惜战争，说：“一个真正自豪、勇敢的伟大民族，将敢于承担一切战争的灾难，而不愿以国家荣誉为代价去购买那种卑鄙的繁荣。……如果我们拥有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那么，为了坚持门罗主义而被拖入一场战争的机会实在是很少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支海军，战争可以在任何时候降临到我们头上。没有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是全然无用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从而不是军人的主人。……我们要求一支强大的海军，部分是因为我们认为拥有这样一支海军是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部分是因为我们感到如果一个国家在必要时不愿孤注一掷，以战争作为对一切事情的最高裁判，不愿大量的流血、流泪，耗费财

---

① F.默克：《美国历史上的天定命运和使命感》，阿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公司，纽约，1966 年，第 24 页。

②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 7 页。

富，而情愿丧失荣誉和声望，那么这个国家的生活就毫无价值。"[1] 罗斯福极力把马汉的理论变成为现实，将扩张主义思潮变成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鼓吹美国应该拥有一支"令人惧怕"的强大海军，鼓吹以武力为外交的后盾，美国要实现强国梦必须依靠实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海上实力。传统扩张主义主要适应美国的大陆扩张需要，主要武器还是枪炮和政治讹诈；新扩张主义适应海外扩张，即要越过国界线远渡重洋，主要依赖于海军实力和国际外交策略。

当然传统扩张主义和新扩张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依据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论。贝弗里奇这样说："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必须遵从我们的血统来占有新市场和新土地，假如新土地是必需的话。（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缔造帝国的本能。"[2] 以前仗着这种高贵血统论，他们开拓新世界，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他们肩负上帝使命不断向西挺进，甚至不惜用血和火强占墨西哥的土地；20世纪初，他们又要凭着缔造帝国的"本能"向着海外占领"新市场和新土地"。贝弗里奇1898年9月16日又在国会发表演说，鼓吹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的政府形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因此美国人应将它们推广到全世界。他认为对外扩张不仅是商业和政治方面，而且还有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性都应该向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传播。[3] 老罗斯福早在1897年就写道："如果英国推翻了马赫迪派和打开了苏丹，那么它正在尽到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他还说："讲英语的种族应该统治南非……，美国……应该统治西半球。"诚如美国史家霍华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50—51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66页。
③ 《美国年鉴》，第12卷，第198页。

德·比尔所言：老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坚信讲英语民族的扩张意味着世界和平的取得和文明的扩展，“这个信念主导了他对外交政策的观察。”①

简而言之，美国20世纪初的新扩张主义是传统扩张主义的继续和发展，② 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扩展欲望和思潮。美国众议员吉布森竟然说：“财富、权力和光荣是人类野心最伟大的目标。它们是海盗两千年前就渴望的三件东西。这就是促使他们的后代敢于在海上冒险，在大陆上追随作为指引西进道路的‘帝国之星’敢冒风雨的三件事。……老海盗精神表现在陆地上。它是我们民族的主导精神。它决心走自己的路。‘天定命运’是它的宣言，它的格言，它的信念和它的战斗呐喊；即使现在美国人民正开始新的航程，他们依然在这种精神和这种原则的激励之下……”③ 。帝国主义扩张主义虽然与传统扩张主义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第一，它以海外扩张为特点。当时美国的大陆扩张已经完成，北美大陆已无地可“扩”，新扩张主义以海外国家和地域为扩张目标，因而具有

---

① 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世界强权的兴起》，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纽约，1967年，第45—46页。

② 美国历史学家默克在他的《美国历史上的天定命运和使命感》（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66年，纽约）中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帝国主义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仅仅是19世纪40年代的天定命运论的变种而已。这是一种错误。它是天定命运论的反题。天定命运是大陆主义。它意味北美洲的吸纳。它在州权中找到鼓舞。……1899年的扩张主义是偏狭的帝国主义，它受到同类的国家主义的鼓舞。”（第256—257页）。他还认为大陆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教义从未真实反映美国的民族精神，“较为真实反映民族精神的是使命感”（第261页）。默克将美国历史上的使命感、天定命运和扩张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加以考察评价，似难自圆其说。其实，美国历史上的基督教使命感、天定命运论和19世纪90年代的扩张主义间虽然存在某种差异，但无法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诸如种族优越论、文明优越论的思想联系和共同点。

③ 阿尔伯特·K·温伯格：《天定命运：美国历史上的国家主义的扩张主义研究》，四方院子图书出版社，芝加哥，1963年，第266页。

极大的侵略性，美国扩张主义理论经过海上实力论的充实，即他们的扩张已经超越任何空间界限，在他们的眼中除了美国利益外地球上不存在任何地域界限，只要符合美国利益，世界上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占领，使之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贝弗里奇在1898年9月16日赤裸裸地对国会说："距离和海洋无可争议。我们祖辈购买的和占领的全部领土都属毗邻是不争的事实。1819年佛罗里达与纽约的距离比今天波多黎各与芝加哥的更远；1845年得克萨斯与华盛顿的距离比1898年夏威夷与波士顿的更远；1847年的加利福尼亚比如今的菲律宾更难进入。直布罗陀与伦敦的距离比哈瓦那与华盛顿更远；墨尔本与利物浦的距离比马尼拉与旧金山更远。海洋无法将我们和责任与期望之地分离……"①

第二，新扩张主义以海军实力为手段。因为美国既然进行海外扩张就必须具备越洋的手段和实力，而这非海军莫属。同时这种海外扩张又必然与其他列强在海上相遇相争，海军实力的大小最后决定这种较量的结果。因此美国必然会遇到竞争对手，其中美国认为最大的对手是老牌列强英国——往日的世界海军之王；另一个就是德国，它的海军实力正在飞速增强。因此美国扩张主义者致力于宣扬力量，炫耀武力。《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这样说："一种新的意识——力量的意识似乎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思想，有了它我们就有一种新的渴望，即渴求显示我们的力量……。野心，利益，追求土地，荣耀，纯粹的好斗，无论它是什么，我们被一种新的感觉变得生气勃勃。我们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命运。人民口中尝到的帝国滋味恰恰就像丛林中的血腥味一样。它意味着一种帝国政策，共和国，复兴，在已经武装起来的国家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00页。

中占有一席之地。"[①] 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就要求国会拨款建立一支有世界影响的海军舰队。1908年，美国已建成位于世界第二的海军舰队：29艘新型战列舰组成的总吨位达611万吨的舰队。

第三，以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海外扩张，特别是以开拓投资场所为具体内容。新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相结合。以大棒为后盾，用金元开路，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在经济上表现出对海外国家疯狂的掠夺性和功利性。

第四，新扩张主义综合了传统扩张主义的理论和说教，以使命感为基础，继续以基督教教义的神圣使命和传播文明为己任作为美国对外扩张的美丽外衣，采用文化手段向海外国家输出基督教文明和帝国主义文化。罗斯福上台前不久就说过："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也不能有野蛮。对生活在野蛮中的人民而言，我们的责任就是关注他们从锁链中争得自由，我们只有摧毁野蛮本身，才能使他们获得自由。传教士、商人和士兵在这场建设中也许都有各自的作用要发挥，最终使人民道德提高和获得进步。"[②] 同时，这种新扩张主义还可以追溯到种族主义思想。有学者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一位种族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伯吉士的学生，他也受到种族扩张梦想的鼓舞。在他的历史著作《西方的胜利》中，罗斯福从边民与印第安人的斗争中得出结论：白人的到来无法阻止，美国的发展代表了这种种族成长的伟大历史的最高成就。"[③]

美国新扩张主义犹如一柄利剑在与西班牙的首次较量中露出了那阴冷而锋利的青光，挑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

① 温伯格：前引书，第289页。

② 温伯格：前引书，第429—430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肯出版公司，波士顿，1955年，第175页。

二、美西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20世纪初，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的世界地图上，太平洋地区和加勒比海区域成了他们海外扩张的战略重点，昔日世界强国西班牙成了美国扩张道路上的最直接的障碍。西班牙曾经在世界上风云一时，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上占有大量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但是18世纪以来，西班牙国运日衰，不久就为英法等国所超。19世纪末，在新兴帝国美国、德国、日本迅速崛起之时，西班牙更显衰败老朽之态，在古巴的统治也摇摇欲坠。

〔美西关系恶化〕　　早在1895年，古巴人民就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1896年西班牙政府镇压古巴起义。美国人民同情古巴人民，在古巴投资的美国商人和企业家也积极支持古巴人民起义。美国麦金莱政府利用人民的同情，在1896年6月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抗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势力范围准备同西班牙摊牌。1897年4月19日，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9月，他就开始考虑同西班牙的作战方案。9月20日，他在写给约·戴·朗的信中说："应准备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把我们的主力放在古巴，由沃克将军统率，并以一支由埃文斯或某位类似的人物率领的飞行舰队对付西班牙，而亚洲舰队对菲律宾作战，我相信事情不会出现很大困难。"[①] 1898年，美国政府又以保护美侨为名派遣"缅因"号战舰开赴哈瓦那。接着，美国报纸，特别是威廉·R·赫斯特主编的《纽约日报》和约瑟夫·普利策主编的《纽约世界》，立即掀起和制造反对西班牙的舆论。有的报纸还公开了所谓西班牙驻美公使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60—161页。

称美国总统为“狡狯政客”的信件。1898年2月15日晚间，“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被炸沉，350多名官兵伤亡（2名军官和264名士兵殉难）[①]。同年3月的调查结果表明缅因号战舰“系由一枚水雷爆炸而被毁，水雷爆炸引起该舰前部两处或多处弹药舱的局部爆炸”，[②] 但是无法肯定是谁所为。不久，全美掀起了反西班牙的狂潮，“牢记缅因号”在美国成为激动人心的口号。美国报刊更是推波助澜。如：《美国人日报》极力煽动美国同西班牙开战，报纸头条大标题为“缅因号因背叛被炸！”和“全国为战争狂热而激动！”[③] 阿尔伯特·肖的《评论者之评论》在1898年4月发表社论，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宣传的大合唱。社论带有煽动的口吻说：“他们（西班牙）将缅因号在哈瓦那的出现看成是对西班牙在该岛主权的威胁，看成是对叛乱的鼓励。……在这真正紧急的时刻，……在美国只有少数人——我们不会相信在7500万人口中会超过10个人——认为美国在古巴危机面前应该放下武器，而与西班牙握手言和接受西班牙的主权……”[④]。美国最受人重视的报纸《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也参与其中，主笔亨利·沃特森在1898年4月20日发表社论，从所谓“法则”的角度论证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性。他说：“我们不要在名称档案馆里那已发了霉的记录中找到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我们在至高无上的法则中——高于土地的、动产的、人体的、人的灵魂的各种名称的法律的法则中——即人的法则、上帝的法则中找到

---

① 法兰克·N·马吉尔：《历史大事记：美国卷》，第2卷，萨伦出版公司，新泽西，1975年，第1286页，该书认为大约260美国人被炸死。最后统计约266人丧生，伤百余人。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43页。

③ 《美国年鉴》，第12卷，第168页。

④ 《美国年鉴》，第12卷，第169—172页。

它。我们从自己的灵感中，从我们自己的命运中找到它。我们从费城敲响我们自己主权的自由钟那里找到它；我们在枪口下赢得我们独立的爱国者的鲜血里找到它……"①。他企图从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获取同西班牙开战的"正当"理由。

随着美国国会中主战派的呼声日益高涨，麦金莱政府加速备战。1898年2月25日，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在香港太平洋基地接到海军部命令——"如果西班牙宣战，你的任务是监视西班牙舰队，使之不离开亚洲海岸，然后对菲律宾群岛发动攻击"。②3月25日，麦金莱总统在白宫接到来自纽约市的一位值得信赖的政治顾问、《纽约先驱报》主编里克的电报，说："这里的大企业现在都相信我们将有一场战争。相信所有人都欢迎战争，摆脱担忧。"③ 4月10日，西班牙政府发表同意停战的声明；4月11日，美国总统要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确保古巴获得自由。4月19日国会经过激烈争论参众两院分别以42票对35票，311票对6票通过决议，主张"承认古巴人民的独立，要求西班牙政府放弃它对古巴岛的权力和统治，并从古巴和古巴水域撤退其陆海军部队，责成合众国总统使用合众国陆海军实行这些决议。"④ 4月24日，西班牙向美国宣战。1898年4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正式向西班牙宣战。

〔美西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1898年5月1日早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湾击溃西班牙舰队，美西战争正式爆发！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所率舰队损失甚微，但西班牙舰队大伤元气：3艘被击沉，8艘被焚毁，2艘被俘。美国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194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71页。

③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美国历史》，第2卷，前引书，第213页。

④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73页。

海军取胜后，利用菲律宾起义军的力量共同抗击西班牙军事力量，最后占领马尼拉。

自1898年5月1日开始，美国在马尼拉湾海战胜利以后，战争主要在古巴战场进行。1898年5月19日，西班牙舰队在塞维拉率领下，从佛得角来到古巴圣地亚哥港，6月美国海军在海军中将桑普森领导下抵达圣地亚哥附近。6月14日，美国陆军在古巴登陆，西奥多·罗斯福率领的第一义勇骑兵团也在古巴战场参战逞威。7月3日，美军在古巴圣地亚哥港彻底击溃西班牙海军上将所率的西班牙加勒比海舰队，“3个世纪以前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以来，衰败中的西班牙帝国海军力量现在又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1] 7月17日，美国威廉·谢夫特将军攻占圣地亚哥市，22万西班牙官兵在圣地亚哥被围投降。同月下旬，美国军队几乎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波多黎各。西班牙在战争中败北，8月12日西班牙政府请求停战。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死280名，伤1577名；海军死伤和退役共91名。[2] 有人形容美国轻易取胜时说：“胜利似乎像采摘成熟的草莓那样容易得来。”[3]

10月，美西双方代表在巴黎会面商讨战后安排问题。12月10日，美西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并承认古巴独立，将关岛和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还以2000万美元为代价将菲律宾群岛主权转让给美国。190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普拉特修正案，规定古巴不得向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转让土地；美国取得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并可以维护古巴“独

---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87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28页。
③ 詹姆斯·T·亚当斯：前引书，第338页。

立”而对其进行干涉等等。1903年美国强占古巴两处海军基地。

美西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共和党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在波士顿发表演说，道出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说：“和英国一样，我们要在全世界设立贸易站，我们要使我们的商船遍及于各大洋，我们要建立与我们的伟大国家相适应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扩展开来；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国旗将在迄今为止是血腥而黑暗的土地上树立起来。假如这是意味着将星条旗飘扬在巴拿马运河上空，在夏威夷上空，在古巴和南海上空，那就让我们欢欣鼓舞地面对那一含意而且实现它吧……”①。

美国参议员亨利·C·洛奇在美西战争后向国会发表演说为美国占领菲律宾辩护，赤裸裸地大谈“获得菲律宾群岛对美国的利益”。除了菲律宾本土的丰盛资源外，他还特别谈到美国占领菲律宾对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重要意义”，他说：“杜威的胜利使我们在东方问题中处于优势地位。”②

美西战争的胜利证实了马汉海上实力论的“正确”。战争刚结束，1899年马汉就对战争进行总结发表专论，指出20世纪初期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他认为应该学习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以英国的经验为指导”，反对像西班牙殖民者那样“对劣等种族实行残酷压迫”。③

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拉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序幕。美西战争对美国的未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这是美国由大陆扩张发展为海上扩张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标志其外交政策已由孤

---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66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86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76页。

立主义转向对外扩张主义。战争的胜利加强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的联系。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成为一个殖民帝国，“这场战争的结果为这些商人进一步经济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①] 它使美国开始成为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世界强国。

美西战争结束后，麦金莱总统继续推行他的对外扩张战略。但是，1901 年 9 月 6 日他在纽约州布法罗的泛美博览会的音乐厅前不幸遇刺，14 日身亡。

〔“西奥多·罗斯福推论”[②] 和大棒政策〕　麦金莱遇刺身亡后，西奥多·罗斯福于 1901 年 9 月 14 日接任美国总统。他是一位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信奉维持世界秩序是一切文明强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国际事务中他强调实力的重要性。老罗斯福在 1904 年和 1905 年对国会提出国情咨文，主张奉行门罗主义对拉丁美洲进行干涉以保持该地区的所谓稳定。他提出了门罗主义的“推理”。1904 年 12 月 6 日，他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软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如果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软弱无能的罪恶昭著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我们对它们的干涉只是最后手段，仅仅在他们明显地无能或不愿在国内外维护正义，危害到我们美国利益或招致外国人侵伤害美洲国家整个躯体时才这样做。”[③] 老罗斯福在 1905 年 12 月 5 日给国会的第 5 次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推论。他说：“对和平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门罗主义，因为它已经一直如此，并正由这个

---

①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前引书，第 207 页。

② 亦译作“申论”。

③ 詹姆斯·纽比尔等：《美国历史注释本》，韦茨华斯出版公司，加利福尼亚，1971 年，第 351 页。

国家所发展和已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没有任何政策如同它一样有效地促进西半球的和平，和给予其上的每一个国家沿着他们自己的道路发展的机会。如果我们拒绝使这个主义适应变化着的条件，现在它会全面陈旧，它不可能符合当今时代的任何需要，事实上，可能被当今时代废弃不用。由于我们已经提出让它符合本半球增长和变化着的需要，它在国内是有用的，在国外正得到承认。"①

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即以"大棒"为主。1903—1904年间，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建立一支强大和有效的海军的计划，但是遭到来自俄亥俄的众议员西奥多·伯顿的反对，1904年2月22日，伯顿在国会发表演说反对海军计划。次日，老罗斯福就写信给他予以答复，宣扬"没有海军就没有帝国"的观点。他说："让我非常简短地指出我认为希望停止建造海军的那些人的根本错误……一个令人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在一个需要力量和勇气的时候，人们表现得缺乏勇气和力量。""如果过去8年里共和党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应该吞并夏威夷，或不应该取得菲律宾，或不应该在古巴建立保护国体制，或不应该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那么我们得转变政策和放弃建立海军；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这些政策而不用一支海军去支持它们，将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铸成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是我们在菲律宾有一个海军基地；要是我们在亚洲海域有一支海军舰队，或在我们人民希望找到市场的东亚发挥最微弱的作用，那么在苏比克湾建立一个我们的海军基地就是最重要的。""现在中国成了列强的消遣玩物，因为她一直在思想上藐

①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戴维尼：《20世纪美国：当代文件和观点》，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顿，1968年，第38页。

视和没有在海岸和水域建造军事力量，因此无力维持国内秩序和外御侵略。欧洲小国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领导了荣耀和自尊的生活，但无力在外交事务中完成任何重大作为，就是因为他们在良好愿望的背后缺乏力量的要素。相反，我们已经一直为海牙法庭和国际仲裁事业所作甚多；我们已经在我们南方水域维持和平；结束了古巴、菲律宾和巴拿马的流血骚乱和流血的国内争斗；我们能够对中国施加和平影响。因为，仅仅因为同正义与和平的目的相随的是，我们拥有一支表明我们不会驯服顺从非正义或默认破坏和平的海军。"①

关于老罗斯福提出门罗主义推论的实质，美国学者认为"西奥多·罗斯福不满新世界的力量平衡。他企求美国对西半球的统治，因而他推行计划，实现他的目标政策。……他特别害怕欧洲列强干涉那些中美洲和加勒比尚未稳定的共和国。为防止这种危险，他发展了他本人对门罗主义的推论"②。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在外交手段上，他的信条是"说话温和，手握大棒……"，这就是所谓的"大棒政策"。为了增加"大棒"的份量，老罗斯福大力发展美国的海军力量，使美国海军综合实力由世界第7位急剧上升为第2位。

对于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威廉·威廉斯谴责他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有人将他和布鲁克斯·亚当斯、亨利·洛奇一起称为"一个战争连绵不绝的世界上的3个枪手"。也有人认为罗斯福"是中美洲的警察，列强间的和平缔造者"。有的学者深入分析认为罗斯福的扩张主义倾向基于如下3方面的需求：一是要求控制那些战略要地，依此进击地峡运河；一是将每一个欧洲列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前引书，第597—598页。

②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戴维尼：前引书，第35页。

强赶出这块大陆；一是保证一些较弱小国家不要拒绝一个肩负优秀民族使命的大国的计划。他认为罗斯福对国家政策和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坚定的把握，他懂得在国际关系中最崇高的理想是毫无价值的，除非它有实力为后盾。[①] 有的学者认为，同老罗斯福经常被摘录的格言相矛盾的是，“罗斯福说话并不总是温和的，有时他的棍棒也大得不够”。[②]

老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的实质就是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门罗总统提出门罗主义与罗斯福对其所作的“推论”，反映了美国传统扩张主义和新扩张主义的区别。前者是在美国羽翼未丰、国力甚弱、人微言轻的背景下，在拉丁美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门罗总统出于美国利益考虑，为避免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所提出的一项外交原则。在表面上多少带有某些尊重拉丁美洲国家主权的意味。但是罗斯福的“推论”明显地发出这样的信息：拉丁美洲国家是需要文明国家加以管理的落后和不文明的地区，这个负有管理责任的文明国家不是别人，就是美国。美国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在拉丁美洲维护稳定和和平的国际警察的责任。隐含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美国要独占拉丁美洲，使其成为美国的利益范围。这是因为美国已今非昔比，在国际上它已头角崭露、财大气粗、穷兵黩武，可以对别的国家指手划脚，仗势欺人了。

〔塔夫脱的金元外交〕　1908 年，罗斯福政府的陆军部长、“生就一个当法官的头脑”的塔夫脱在大选中获胜。次年冬天，在一个“大冷天”宣誓就职。塔夫脱继续美国的扩张主义外

---

① G.K. 哈纳斯和 J.S. 沃克编：《美国外交关系史学评论编纂史》，格林伍德出版社，康涅狄克，1981 年，第 93 页。

② 查尔斯·塞勒斯等：《美国史专题》，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公司，芝加哥，1977 年，第 281 页。

交政策。1910年，塔夫脱在匹兹堡发表演讲，提出了所谓的“金元外交”。他说：“促进和平关系和促进商业关系是一致的。如果美国保证他的公民在国外投资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将促使这样的大规模投资和刺激扩大商业关系，其结果是值得赞扬的。这样的外交被称为‘金元外交’，……这种外交给予其他国家的商人为世界商业竞争以一个他们自己政府非常乐意提供的有利条件，我们政府不应该忽视给予他自己的商人、制造商和资本家提供这个有利条件。……追随这样的政策，美国资本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是合情合理的。政府不仅以资本家的利益而且以期望中的广泛国家利益来衡量企业对实施贷款的支持。”① 当时美国的外贸额每年已高达20亿美元。塔夫脱在1912年12月给国会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对金元外交作了进一步的辩解，他说金元外交是为了保护中美洲国家不受沉重的外债和拮据的国内财政的危害，美国政府支持和鼓励美国银行家向这些国家的财政复兴助一臂之力。金元外交是门罗主义的扩大。“美国政府乐于鼓励和支持那些愿意伸手援助，使这些国家财政得到复兴的美国银行家，因为这种财政复兴和防止海关成为所谓独裁者的掠夺对象，乃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可消除外国债权人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消除革命混乱的威胁。”他又说：“在中国，鼓励金融投资以促使中国自助的政策，已经产生使门户开放政策得到新的生命和实际应用的效果。”② 事实上，塔夫脱上台后，依靠国务卿P.C.诺克斯直接指导加勒比地区的政策，依靠威廉·菲利普和维拉特·斯特赖特处理远东问题。他于1912年对他的“金元外交”作了系

① 约翰·加雷迪、罗伯特·戴维尼：前引书，第45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年，第123—124页。

统和本质说明，即“以金元代替枪弹”，但并非放弃枪弹，而是金元和枪弹并用，以枪弹为后盾，用金元开路，对弱小国家实行资本输出和经济侵略。

美国学者在评价塔夫脱外交政策时，都注意到他的最高目标是用“非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取代领土帝国主义，即用黄金代替枪弹去获得超额资本和商品的出路，从而避免正式的殖民主义和政治控制。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强调金元外交仅仅是为了与世界上其他各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其他各届行政当局的外交政策相区别而已。也有学者把金元外交贬为“只是一个把自己依附于门罗主义身上的一个令人讨厌的藤壶而已”。有人认为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通过利益范围取得大国的力量平衡，塔夫脱则通过普遍的经济原则达到同样目的。老罗斯福更多地从欧洲范围考虑他的外交政策，塔夫脱则从不发达国家及他们的商业要求考虑美国的外交政策。[1]

〔威尔逊的使命外交〕　1912 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提名威尔逊为总统候选人。这位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饱学之士，在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时颇有政绩的教授和历史学家，在竞选中提出“新自由”的口号压倒了共和党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取得选举胜利，从而结束了共和党人的长期执政，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 28 任总统，开始了民主党人的新的统治。他上台以后，在国内积极推行“新自由”；对外政策上，企图改变前任的共和党外交政策，出于他的喀尔文教的信念和对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制度的长期研究，提出用道德原则而不是经济利益或政治强权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特别是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他企图向拉丁美洲人民传播如何制定宪法和选举诚实的政治领导人。威尔逊上台后

①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 101 页。

曾标榜他的外交政策是基于正义而不是利益，“新自由”将是美国的输出品之一，因此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威尔逊搞的是“使命外交”[①]；同时他还宣称美国将在拉丁美洲实行睦邻政策。其实他的睦邻政策是大棒政策的继续。威尔逊 1913 年在亚拉巴马的莫比尔发表演说，在谈到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时侈谈友谊和荣誉。他说：“我们必须证明我们自己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平等和诚实的战士。你们不可能在不平等地位上成为朋友。你们不可能在没有诚实的一切名义下成为朋友……理解必定是生长一切友谊果实的土壤……美国决不用征服再去寻求另外的 1 英尺领土。”[②] 威尔逊对外极力推行所谓“使命外交”；对邻国还经常强调所谓“睦邻”关系，事实上是继续实施美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战略，特别对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新的扩张活动。

总之，在“大棒政策”、“金元外交”、“使命外交”之下，美国大肆对外扩张，在军舰大炮的护卫下，美国星条旗插向他们所认为的新“边疆”，跨越太平洋，登上中国的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土地，“美国造”的商品向世界各地倾销……。

三、向太平洋地区和亚洲的扩张

美西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美国向太平洋和大洋彼岸的亚洲进行扩张，美国利用对西班牙的胜利取代了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向西扩而张之，同时促使美国形成了对中国的完整政策。1903 年 5 月，T·罗斯福在旧金山说：“在我来到太平洋沿岸前，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前引书，作者在第 82 页注释中说明，“传教士外交”并非技术性含义，外交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外的传教士和传教活动。它的确切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把期望帮助其他国家作为外交目的。

②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A·戴维尼：前引书，第 46 页。

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来到这里以后我无法理解任何人……除了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外还能是任何别的什么。"[①] 太平洋使他垂涎三尺，迫不及待。

〔侵占菲律宾〕　强烈主张向远东扩张的美国政客，前美国驻中国公使查尔斯·邓比认为太平洋命中注定比大西洋具有更大的商机，他从远东地区对美国所具有的战略意义的视角为美国占领菲律宾辩护，1898 年 11 月他发表文章公然宣扬："我们有权作为占领者取得菲律宾。我们有权占领它们以作为对战争的部分补偿。……如果我们放弃菲律宾，我们将丢失在远东坚持我们影响的良机，如果我们蓄意这样做，将遭世人嘲笑。我们为何占领马尼拉？我们为何派出 20000 军队去吕宋？……""菲律宾是我们在远东的立足点。占领它们能给予我们地位与影响，也带给我们富有价值的进出口贸易。"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华盛顿总统时代的美国了，它的对外政策应该改变，他说："我知道根据华盛顿告别演说的教导存在着一种反对占领外国领土的国家意识，但是世界前进了，环境变化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有巨大的商业需要照顾。我们要与世界商业国家竞争那遥远的市场。现在是商业而不是政治成了国王，是制造业主和商人主宰外交和控制选举。"[②] 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的眼中，菲律宾在美国向远东"进军"中具有战略意义，美国必欲夺之而后快。

但是菲律宾人民是热爱独立的民族。早在 1896 年，菲律宾人民就掀起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运动。1897 年下半年，领导人 E·阿奎纳多和战友们在香港建立基地。美西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这是推翻西班牙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天赐良

---

① 比尔：前引书，第 159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234—235 页。

机。但是他们发现美国海军领导人杜威只关心共同合作抗击西班牙的军事问题，闭口不谈菲律宾的独立大业。虽然阿奎纳多组织了一支3万人左右的武装队伍并且多次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但是美军坚持拥有最高权威，全权接受马尼拉西班牙当局的投降，没有他们的允许菲律宾人民的武装力量不得进入马尼拉城。因而在菲律宾“当西班牙国旗降下时，取代它的不是菲律宾革命者的旗帜而是美国的星条旗”。[①] 阿奎纳多知悉美国企图吞并菲律宾的意图后，就在1898年6月12日宣布菲律宾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菲律宾临时共和国，他被推选为总统。8月13日，经过一场不流血的战斗，美军占领马尼拉市区，菲律宾起义者则控制了菲律宾国家的其他地区。1898年9月16日，美国总统麦金莱给在欧洲与西班牙谈判的代表发去指示，美国要取得对整个吕宋岛的“全部权利和主权”[②]；10月下旬，麦金莱又指示美国要取得整个菲律宾群岛的主权。美国利用了菲律宾人民的力量共同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窃取了全部胜利成果，根据美西两国在巴黎签订的和约，美国取得了对菲律宾的统治权。菲律宾人民从前门赶走了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却在后门引来了美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者。

美国占领菲律宾以后，无视该国人民的独立要求，因而激起他们的反抗，菲律宾人民不承认美国对菲律宾具有主权。阿奎纳多与美国关系日益恶化。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共和国正式成立，阿奎纳多当选为总统。2月4日晚上，马尼拉爆发反美起义；美国军队立即进行血腥镇压。是年春天，美军为镇压菲律宾起义军向北一直推进到吕宋平原中部，卷入了一场与菲律宾人民

---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1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33页。

之间的不义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较之美西战争花费了更多的钱财和牺牲了更多的生命”。[①] 最后美军兵力高达74万人。美国政府侵略菲律宾的政策受到国内舆论的再次猛烈批评，麦金莱总统在1899年11月21日发表谈话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毫无掩饰地鼓吹美国占领菲律宾“有理”的扩张主义，他宣称美国不能把菲律宾群岛归还给西班牙，因为这对美国来说是胆怯和不荣誉的；美国不能把菲律宾转交给东方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法国，这会招致经济损失和信誉丧失；美国也不能容许菲律宾独立，因为这将导致比西班牙统治更糟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美国惟一能做的就是取得全部菲律宾群岛，然后对菲律宾人民晓以基督教理想，教以西方文明。麦金莱总统的辩解是典型的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

1901年，美军利用军事优势以强凌弱在菲律宾建立了639个据点。[②] 11月，阿奎纳多率军进入北部山区，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争。1901年，萨马岛的菲律宾游击队重创美国侵略军，残忍的美国将军史密斯发动报复性战役，杀害大批无辜菲律宾平民。3月23日阿奎纳多在北吕宋岛被俘，并向国人呼吁停止反抗和接受美国统治。但菲律宾游击队的西米恩·奥拉、马卡里奥·萨凯等领导人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继续领导抗美游击战争，直到1904—1906年在萨马岛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为止。战争期间，美国总统麦金莱曾于1899年和1900年分别派出以舒尔曼为首和以塔夫脱为首的菲律宾委员会到那里活动，并于1901年7月在那里成立了民政政府。

美国军队镇压菲律宾人民的独立运动长达3年余，造成美军

---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2页。

②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2页。

4000人丧生，菲律宾军队牺牲约在1万至2万人之间，约有20万平民死于疾病和饥馑。[①]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无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1818—1898年美国期刊上仅发表有35篇有关菲律宾的论文。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无知达到何等程度以致有的美国人“还不知道菲律宾究竟是群岛还是罐头食品”。这种无知导致美国人无法阻止政府对菲律宾采取的强硬的侵略立场。《文摘》的新闻抽样调查表明，当时约43%的美国人倾向吞并菲律宾，24.6%反对，32.4%犹豫。《纽约先驱报》在1898年12月发现498名编辑中有305名支持吞并菲律宾的政策。[②]但是美国民众对菲律宾缺乏了解和无知，不能成为美国政府侵占菲律宾和向菲律宾人民发动战争的理由。

美国殖民主义者在残酷侵占菲律宾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夏威夷下手。

〔攫取夏威夷〕　夏威夷素称“太平洋的十字路口”，1898年为美国所并吞，1900年设立夏威夷地区。美国国会曾对并吞夏威夷产生过犹豫，且发生激烈争论。麦金莱政府对此也难以定夺。但是“美西战争明显地改变了麦金莱。他由此决心吞并夏威夷”。[③]早在1897年，美国国会中有人反对吞并夏威夷。特别是众议院议长托马斯·里德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但是美西战争爆发特别是杜威在马尼拉湾的胜利，使许多国会议员相信美国真正“需要”夏威夷。1898年4月23日的《纽约论坛报》声称夏威夷岛也许已经占领。一些主张吞并的扩张主义者更是积极活动，声

---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3页。
② 转引自马吉尔：前引书，第1295页。
③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243页。

言他们能够得到所需要的219名议员的签名使里德的否决无效。《太阳报》的保尔·戴纳写信给威尔逊将军说："我相信我们正好似将枪对着里德的脑袋那样有效地对付他。"① 里德停止活动以后，吞并夏威夷的决议毫无疑问将在国会获得通过。6月4日，《纽约论坛报》甚至声言总统希望吞并夏威夷。后来，麦金莱对人说："我们需要夏威夷就好像我们需要加利福尼亚一样强烈。"②

7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关于归并夏威夷群岛的联合决议，决议宣称："接受、承认和批准上述转让。故上述夏威夷群岛及其属地特此合并为美国领土之一部分，隶属于美国的主权范围。上述全部和单独的财产和权利概归美利坚合众国所有。"③ 8月12日，美国占领夏威夷群岛，使之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成为美国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1899年12月2日美国与德国和英国签订"关于调整萨摩亚群岛争端协定"，美国取得土土伊拉岛和帕果—帕果港，使萨摩亚群岛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又一个重要基地。

同时，夏威夷以西500公里、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的关岛也根据美西巴黎和约作为对战争的赔偿由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美国占领关岛具有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世纪之交，海军在军事上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因而煤的供应和电缆的铺设又是加强海军力量的基本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杜威将军在菲律宾的命运取决于煤的充分供应和电缆通讯的便利。在美西战争初期，有人问杜威将军太平洋上何处建立加煤港为最佳地

①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243页。
②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244页。
③ 转引自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48页。

点，他在回答中将关岛列于其中。数年前曾访问过卡罗林群岛的舰队司令斯托克顿在给美国海军学院（世界上首座海军最高学府）创始人、海军少将卢斯的信中描绘了关岛的情势和重要性："我越是想到马里亚纳群岛，我越会想到它们在太平洋上作为停留地的价值。长期被美国捕鲸船作为集合地的关岛是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直航线，它所处的位置正好使这里乘船到日本、韩国、中国上海和香港，以及菲律宾港口乘船到这里都约为 5 天的时间。如果我们在菲律宾确保维持一个加煤港，我们就可以从旧金山或巴拿马地峡运河去夏威夷，从夏威夷到关岛，再从关岛去菲律宾，这就是凭借美国的停留地越过太平洋去加煤港的全部旅程了。"[①] 卢斯根据斯托克顿的意见，强烈要求参议员洛奇利用他自己的影响达到美国占领关岛的目的。他告诉参议员说："我说，'立即'因为战争结束似乎已经可见。一旦和平获得，我们在建立外围供煤站的道路上将无所作为了。" 1898 年 7 月，西班牙在巴黎的代表只同意在马里亚纳群岛中仅割让一个岛屿给美国。同年 9 月 16 日，美国总统指示在巴黎的代表：美国选择了关岛。[②] 1899 年 2 月 10 日，麦金莱总统向国会发表演说："夏威夷岛和关岛成为美国领土，形成越洋途中的便利的停留地，那么美国和所有太平洋岛屿间的快捷电缆通讯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③] 1911 年，关岛总督 E·G·玻恩写道："从西班牙手中接管关岛的目标，当时的计划基本上是为保证贯通太平洋电缆登陆地的安全。"[④]

---

① E.S. 波默罗伊：《太平洋前哨：美国在关岛和密克罗尼亚的战略》，拉萨尔出版社，纽约，1970 年，第 9 页。

② 同上书，第 10 页。

③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 8 页。

④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 7 页。

美国占领关岛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同德国抗衡，不让卡罗林群岛落入敌手。卢斯将军在 1898 年 5 月 10 日要求参议员洛奇呼吁占领关岛时已经注意到德国的勃勃野心，因此他说："我们也许不希望永久地占领它们，但是在战后的利益平衡中，它们将价值连城。"[①] 布兰福德力主美国的和谈代表不要让德国在太平洋上占一席之地。因为这些岛屿可以提供许多良港和加煤站，如果落入敌手，它们将对美国太平洋沿岸和菲律宾间的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他露骨地宣称："如果我们要占领中国海附近的领土，我们就需要珀路斯岛、卡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②] 1911 年，担任美国海军学院负责人的马汉据说已经提出使关岛成为"太平洋的直布罗陀"的进一步计划。曾在关岛服役的海军军官麦肯从美国海军战略高度论及关岛的重要性说，夏威夷和关岛是整个太平洋上的两个战略中心。关岛是太平洋海域西部的中心，夏威夷则为东部中心。如果关岛建成美国一流海军基地将能够保护和威慑从海参崴到新加坡的全部战略地区，保护和威慑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埃斯奎莫尔特交通线侧叶的战略要地。[③]

美国侵占菲律宾、攫取夏威夷和关岛只是他们向太平洋野心勃勃扩张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夏威夷和关岛，下一步就是它的重大目标：进入中国。夏威夷和菲律宾仅仅是它们远征东亚和中国的一块跳板而已。美国扩张主义早就对远东垂涎三尺。当人们以菲律宾不与美国领土毗邻为由批评美国政府企图侵占它时，贝弗里奇声称："我们的海军将使它们成

①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 14 页。
②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 14 页。
③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 14 页。

为毗邻！”美西战争结束以后，他更是声嘶力竭地鼓吹向远东扩张，为此他特意去菲律宾旅行并使他自己成为研究该地区问题的专家。在菲律宾他同数百人谈话，访问战场，记下各种材料。1900年1月9日，他不顾美国国会新参议员不得马上发表演说的传统惯例，抓住机会在国会发表演讲，说："菲律宾永远是属于我们美国的领土，正如宪法所称。一出菲律宾就是中国的无限市场。我们将不会从那里任何一方撤退。我们将不会放弃在该群岛海域的责任。我们将不会失去在东方的机会。我们将不会抛弃在上帝庇佑下我们的种族和作为托管人以及世界文明的使命的所属部分。我们不要像被鞭打的奴隶似地为他们的重负而抱憾，而应抱着为一个值得我们贡献力量的任务而高兴，以及对上帝——他已经将我们作为他的选民从此去领导世界复兴——的感恩之情推进我们自己的工作。”① 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菲律宾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就成了美国的“比邻”。接着美国就可以像对待比邻墨西哥那样对待中国。这就是他们的扩张逻辑。

其次，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眼中，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谁取得了中国这个大市场，谁就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谁就能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贝弗里奇又说："今后我们最大的贸易一定是在亚洲。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中国是我们天然的消费者。较之现在和未来的商业强国：英国、德国或俄国，她与我们更靠近。……菲律宾提供了我们在整个东方大门口的一个基地。……有了菲律宾，那个强国现在是将来永远是美利坚共和国……”②。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1900年出版的《美国经济霸权》中宣称：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前引书，第336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337页。

"中国命运的结局也许与下世纪的经济霸权紧密相连。"鼓吹昔日英帝国对中国的"责任"已经落到美国身上，美国必须在中国取代英国的地位。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成了他们扩张这一地区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第三，美国扩张主义者视太平洋为未来世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地区，美国要成为未来世纪世界的主宰必须取得对太平洋的霸权。而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之一。他们深知中国在未来20世纪里的份量，"太平洋是未来的商业海洋。将来大多数战争将为商业利益而争。因此统治太平洋的强国就是统治世界的强国。"向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扩张还是美国争夺未来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老罗斯福在1905年说："我们未来的历史将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所面临中国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取决于我们所面临欧洲的大西洋上的地位。"[①] 马汉在1900年出版了《亚洲问题》一书，分析了亚洲特别是中国是未来世界列强必争之地，北有俄国虎视眈眈，南有英国垂涎三尺。俄国是陆上霸权，英国是海上霸权，谁控制了中国谁就掌握了未来。他进一步鼓吹美国应该利用海上力量获得中国的长江流域——中国的心脏，这样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其他外来列强的统治。

〔"门户开放"政策〕　一般说，19世纪中叶美国的对华政策还依赖于英国而尚未形成其独立、完整和系统的政策体系。19世纪末，美国羽翼已丰，国力强盛。随着世界强国地位的最后确立，出于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经济需要，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和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并逐步形成和推出其独立的对华政策。查尔斯·邓比在谈到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意义时，特别提到占领菲律宾有利于对中国的扩张。他说：

---

① 比尔：前引书，第161页。

"全世界都视中国为我们国内产品——我们的木材，我们的机车，我们的煤油，我们的铁轨，我们的布匹，我们的采矿设备，以及其他大量物品——的一个最辉煌的市场。除了日本，我们比任何其他商业国家更接近中国。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将使太平洋对我们比大西洋更为重要的无限前景。旧金山、西雅图和塔科马还处在它们的幼年期，但是它们命中注定将要与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一比高低。"①

但是，当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对美国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时候，中国早已不是如美国以前尚未开垦的西部广袤荒原一样，它已面临世界列强（其中包括美国在内）的蹂躏和宰割。1840 年以后中国已逐步殖民地、半殖民地化。1895 年以后，远东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曾在 19 世纪 50 年代被美国"黑船"打开大门的日本，这时已成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它以狂妄的野心和毒辣的手段利用近邻的优势疯狂推行侵华政策，致使欧洲诸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受到冲击，原先的平衡和均势被打破。1895 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日本利用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不仅严重损害和危及中国的神圣主权，也威胁了俄国在华利益。俄国拉拢德国和法国迫使日本让步。日本的侵华行动不仅打破了原先列强在华的瓜分格局，而且刺激和促发了他们对华开始新一轮的争夺和瓜分。

俄国、德国和法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提出进一步无理的侵略要求，俄国提出它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满洲，法国则要求在广西修筑龙州铁路，德国要求租借海港等等。英国早在 1898 年以前就宣布中国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并租借九龙和威海卫。列强瓜分中国最后形成严重局面：俄国企图独霸中

①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235 页。

国东北地区；德国强占胶州湾，还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中国广州湾，又将其势力伸向中国西南地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掠取台湾和澎湖后还将势力扩张到福建省。

面对世界列强这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虽然因忙于美西战争而无暇顾及，但它并没有消极观望。相反，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尝到海外扩张甜头的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实现世界强国目标和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战略需要，以新殖民主义为策略原则，提出了对华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

其实，最早提出“门户开放”的是英国，它曾凭借自己的经济势力早在19世纪中期就主张在中国实行自由贸易。由于经常谈论这样的政策，所以1898年英国议会再次谈到门户开放时有人竟说：“这个著名用语一再地被重复引用，令人烦得几乎作呕。”① 1898年3月，英国政府在给麦金莱总统的秘密信件中提出，“一些强国目前可能吞并中国领土的一些地区或建立租借地等等，面对此种形势，英国是否能指望同美国合作一起反对外国的这类行动，美国是否准备在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同英国一起反对这类措施。”② 但是，19世纪末的美国早已不是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了，决然不愿在外交上再次成为英国的配角，并且出于不结盟的原则，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这一政策。此外，当时的英国已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也失去了充当门户开放政策的倡议者的资格。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发出照会，并要求他们将此转交各自政府。照会主要内容为：一、在中国任何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

---

① 乔治·凯南：《美国外交》，葵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20页。

②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21页。

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二、对于上述利益范围内（除自由港外）一切口岸装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适用中国现行的关税率，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三、任何这样“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进出港的他国船舶不得课以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务费；任何此种“范围”内所敷设、管理或经营的铁路运输他国人民的货物通过此种“范围”，运费不得高于本国人民同样距离所运输的同类货物。[①] 照会发出以后，各国的反应虽各不相同，有的积极，有的消极，有的敷衍，但都闪烁其辞地表明了态度，海约翰急忙宣布各国政府已经明确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上述原则。

1900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震惊列强。不久美国参与8国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血腥镇压起义。中国面临被列强肢解的危险。这时美国害怕因为列强在华均势再次被打破而失去它在华的一切利益，海约翰于7月3日代表美国政府再次向列强发出照会，史称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它宣称：“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宜在目前环境许可之范围内阐明态度。……总统的目的是，正如迄今为止一直与其他列强诸国采取一致行动：1. 开展与北京的联系和营救处于危险中的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其他美国人；2. 对在华所有地区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一切可能的保护；3. 保卫和保护一切美国的合法利益；4. 援助（帝国）阻止其混乱蔓延到帝国其他省份和再次出现此种灾难。当然预言取得最后效果的意义为时过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乃是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维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保护全世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327—328页。

界在中华帝国境内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1] 照会无需各国作出答复，它强调了"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和在整个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较之前次照会有更为明确的含义。至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趋完整。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如海约翰所言是为了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也不是为了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实质上完全是为了美国自身的根本利益。虽然美国在1899年对华贸易仅占全国总贸易额的2%，但是有4亿人口的中国是美国未来的重要潜在市场，美国政界和商界人士对此有深刻印象。美国孜孜以求的商业利益是它的对华政策的指路星辰。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美国不能听之任之坐视列强把中国全部瓜分，它要尽最大的努力企求以最小代价取得在华的最大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美国最聪明最有利可图的一种选择。如果美国像其他列强一样追求在中国的一地一域，或为其利益范围，或为势力范围，一则行不通，二则名声不佳。门户开放政策既可获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之美名，又可坐收其他列强在华所取得的同样之实利。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诚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言："在某种意义上，美国采取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立场是为了占领欧洲市场在中国的份额而已。"[2]"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是美国针对当时列强无视美国利益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为了阻止由一个或若干列强把美国排除在外主宰中国、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3]有的

①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戴维尼：《20世纪美国：当代文件和观点》，前引书，第19页。参见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95年，第134页。

②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8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87页。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府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拯救微弱中国”的背后，有着美国出口商和制造商同4亿中国人进行贸易的渴求。[①] 因为中国对美国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老罗斯福一语破的地说：“由于我们的势力和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的疾速增长，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必定是最深切的利害攸关的国家大事……我们主张‘门户开放’以及这个政策所包含的一切；不仅要在沿海一带取得扩大的商业机会，而且还要从水道进入内地……”。美国企求在中国的门户洞开后，迅速进入中国内地，占领中国市场。[②] 海约翰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宣布确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原则仅5个月后，就秘密指令美国驻北京公使设法在中国福建省的三沙湾为美国获得一个海军加煤站。而当日本察觉俄国在中国加快侵占中国满洲的步伐，询问美国是否准备用武力捍卫美国宣布的原则维护中国行政完整时，美国竟答复说：“目前并不准备单独或同其他国家合作，试图通过任何可能与其他国家为敌的示威行动在东方强制推行这些观点。”[③] 可见，美国政府所谓维护中国行政完整等等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的幌子。

实际上，美国的“门户开放”既是美国为了实现强国梦又是显示其强国地位的一项政策。美国是世界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它的经济实力已在19世纪末超过老牌列强英国、法国而独占世界“鳌头”。但是它的经济强国地位与其国际政治地位之间尚有很大差距。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世界方面已“捷足先登”，美国只是在美西战争中捞到一些好处，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一些岛

①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6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前引书，第118页。
③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28页。

屿而已，在国际事务上美国并没有重大发言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具有很大野心，占领菲律宾的重要目标就是为了今后美国的在华利益。列强在没有同美国打招呼的情况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肢解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已经是经济强国的美国的一种轻视。可是，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已经显示了战胜老牌帝国的荣耀和成就，它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份量，争取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强国。美国打出了“门户开放”的牌，向列强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份量。美国参议员洛奇在 1900 年 3 月 7 日向参议院发表演说：“菲律宾的占领使我们成为东方的强国，不但有了发言权，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有力量支持这种发言权。国务卿海先生要求欧洲列强保证我们在中国的一切条约权利和维持门户开放的政策，并已获得它们的同意。我无意于抹煞我们立国百年以来的这一最重要和最辉煌的外交成就，但是我要说：列强对美国的建议之所以同意，因为它们是面对着马尼拉的主人。若是 3 年以前，它们或许会对我们耸耸肩，一笑置之吧。可是对一个占据了马尼拉湾，并且有舰队游弋其间的强国，它们不得不作出客气的答复。马尼拉和宏伟的马尼拉湾是东方的宝藏和珍珠。如在我们手里，它将变为最大的集散地之一和世界最富的商埠之一。……将保持中国市场对我们的开放，并使美国企业得以在东方的整个贸易中首屈一指。”[①] 这种分析真是入木三分！T·罗斯福总统在 1901 年 12 月 3 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一方面阐述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同时又大肆鼓吹美国应该创建“能在公海上打出霸权来”的美国巨型海军战舰。[②] 门户开放政策和建立海军联系在一起作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287 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前引书，第 118 页。

为施政重点绝非偶然，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以其武力为后盾的，美国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它的“门户开放”政策只能成为被列强耻笑的话柄而已。当然，美国愿不愿意真的使用武力去“捍卫”门户开放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是一种发端于19世纪末流行于20世纪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这是一种更多地以资本输出为特点的全球性殖民政策和体系。它是以强大的经济优势为后盾，甚至超越地区界限的一种殖民政策。带有某种开放性和更大的竞争性。美国政界和商界曾经为扩张海外市场的手段和策略进行过辩论，他们在如下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一是占领别国土地并对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控制；一是寻求开放门户，然后对开放的土地依然从经济上实行控制。辩论的结果自由贸易政策获胜。这是一种比老殖民主义更为有利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实际上发生的是，美国采取反对其他国家的殖民主义是为了推进它的经济帝国主义。”① 有美国学者指出，T·罗斯福集团是在制止美国经济体制呆滞和用积极的海外经济扩张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名义下，保卫他们的经济利益，“由于传统殖民地的公共利益的衰落，门户开放政策的吸引力大大增强。”②

检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客观历史作用的最公正的法官是这项政策在中国的实践，换言之，美国政府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对中国人民究竟干了些什么，而不是海约翰的凿凿言辞。其实，老罗斯福对门户开放政策能否实现和贯彻心存疑惑。1905年，他说：“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件大好事，我希望它在将来会是一件行之有效的事，只要它能得到普遍的外交协议的维护；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9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6页。

但是，正如整个满洲的历史所证明的，在俄国统治下和在日本统治下都一样，只要有一个强国决心置‘门户开放’政策于不顾，宁可冒战争的风险也不愿放弃它的打算，‘门户开放’政策也就烟消云散了。"①

〔美国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1900年，美国军队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是美国向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前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行动，恰恰在两次美国政府的门户开放照会之间发生了镇压义和团运动，也许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美国参与镇压中国的反帝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马汉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诬蔑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动运动"，它的目的是要"割断同现实生活惟一可能的源泉的联系"，鼓吹对义和团使用武力。② 老罗斯福一直依靠他的一些密友经常提供的信息了解中国情况。其中有90年代中期在德国驻华使馆供职的斯潘克·斯腾伯格，他经常向这个罗斯福提供中国信息；还有曾长期供职于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兼汉学家柔克义也与罗斯福经常联系并提供情况。1900年罗斯福致函柔克义说："听说你将去中国我思想上感到好像如释重负，我将非常感激你能为我提供的任何暗示。"③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罗斯福坚决认为派军队去中国是合法的，因为美国需要"为了自己的商人、农民和工资收入者去保卫公开市场的利益"。他还极力主张西方列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义和团起义。他写信告诉他的德国朋友斯潘克·斯腾伯格说："我们所有的西方伙伴让中国的运动发展到如此危机的地步是愚蠢的。但是我认为当半打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相

①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35—36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168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166页。

互妒嫉或猜疑的及其他等等，这样一种愚蠢是无法避免的。”他希望至少德国和美国应该在中国采取联合行动。[1] 1900 年，美国政府派出罗斯福总统赏识的、在美西战争中立过功勋的查非（又译沙飞）将军指挥美国远征队去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罗斯福把义和团起义看成是同菲律宾阿奎纳多起义一样的民众叛乱，颠倒黑白地认为不能给中国人以“自由”去屠杀邻国。这是罗斯福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论的大暴露。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在罗斯福的思想中，义和团是中国人性格缺陷的产物。中国人和菲律宾人一样，必须由西方列强将他们从野蛮中‘解脱’出来，因此使用外国军队是必要的。”[2] 当罗斯福知道包括美国军队在内的 8 国联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以后，依然无动于衷。1901 年 3 月初他写信给美国远征军指挥查非将军说：“因为你在中国已经干的一切——从你的作战方式直到你应该采用的方法，我们全都是你的受惠人。”他的镇压义和团的帝国主义立场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更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仇恨。比尔教授说得好：“如果罗斯福十分容易地忘记了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在中国所干的事，但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已经看到‘文明’国家的代表在基督、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所干的掠夺、强奸、屠杀、蹂躏。他们已经目睹了这些文明国家的‘有纪律’的军队捣毁了他们的家园。在罗斯福的眼中，中国人是可以轻视的，因为他们太虚弱而无法抵抗，但是他们决不会忘却。”[3]

罗斯福在对华关系上喜欢挥舞他手中的“大棒”。1904 年秋，中国人民为了反对美国的排华政策，计划开展抵制美国货和

---

① 比尔：前引书，第 169—170 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 170—171 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 173 页。

抵制中美贸易的群众运动。1905年6月初，抵制运动在全国兴起，而且得到了美国华人的大力支持。7月7日，运动已经席卷包括广州、澳门、厦门等在内的25个城市。罗斯福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制止抵制运动，他一方面向国会提出修改排华法案的某些部分，一方面准备对中国使用武力。1905年底和1906年初，美国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增加力量，一些美国报刊也制造动武舆论。华盛顿邮报发表高级官员的权威报告说，如果中国的形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就向菲律宾增兵，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派出的美国军队组织不善的错误不应重犯，鼓吹要选派美国青年和年富力强的军官参加预期中的对华远征。1906年1月11日，罗斯福向塔夫脱提出忠告：国防部应该"绝对地相信我们要提供一支充足的远征军"，他具体建议至少直接需派出15000人，一个月内再追派5000人。他提醒国防部长说："中国军队比5年前更难对付……我们不应该冒任何风险，"[①]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没有出兵中国，罗斯福于4月2日写信告诉伍德，说："我不相信将会有一次对中国的远征，但是我喜欢相信：如果一旦需要，我们将不会是毫无准备的。"[②] 罗斯福对中国抵制运动的"强硬"政策是他的扩张主义思想和种族优越论的反映，美国学者比尔认为："罗斯福是其殖民主义观点局限性的牺牲品。他的问题不是缺乏信息，而是一种观点使他无法以20世纪世界的目光看待中国。"[③]

1909年，W·H·塔夫脱继任美国总统以后，企图用经济手段进一步在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也即用"金元外交"取代老罗

---

① 比尔：前引书，第215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218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219页。

斯福的力量均衡原则。塔夫脱的对华政策有力助手维拉特·斯特赖特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员，他与美国银行界有密切联系，与新国务卿诺克斯交往甚密。他在中国满洲任职时深知日本对华具有的勃勃野心。1908年他回华盛顿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不在中国继续努力的话，门户开放政策将被瓦解。1909年春，美国政府根据斯特赖特的建议，为保证美国在中国事务中有一定发言权，决定鼓励美国银行家向中国投资，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1909年6月，欧洲银行家签订协议资助中国修建中南线铁路。美国乘机向英、日、俄、法、德、中提出所谓"诺克斯计划"，将中国的东北铁路中立化。美国国务院提出备忘录阐述了对华投资对美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交通有很大空间，中华帝国将建成的铁路网络需要大量贷款，美国参加本次贷款就能为它在中国未来的投资带来机会。中国的铁路建设、采矿发展将带来对设备、机器和原料的需求，美国银行家参加贷款后在指定聘用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方面就有发言权，这些人员将有权决定购买何种设备、机器和原料，这就能保证美国在中国贸易和经济生活中的"合理份额"。有4亿人口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将大量需求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美国计划获得商业中的"合理份额"。美国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对出口有利，而且必然带来国内的大量就业机会。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显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不能自鸣得意地坐视中国的无限商机落到其他人的手中"。备忘录指出："这项贷款将使美国在管理中国的财政，在东方外交和财政紧密联系方面插上一手。"① 诺克斯计划引起了美国和日本两国间的激烈争斗。其实美国对中国的铁路运输事业早有野心。早在1895年美国驻北京

---

① 格拉蒂、戴维尼：前引书，第26—28页。

公使田贝就提出了“田贝计划”，打算在中国建立铁路干线网络，企图夺取中国的东北铁路。但遭到俄国强烈反对。1905 年美国公使康格再次提出关于东北铁路国际化问题，并企图利用日本插手加以控制，后因日本另有所图而失败。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取得中国南满铁路，成了美国实施东北铁路国际化的最大障碍。由于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利益，“各怀鬼胎”，对美国的计划反应不一，在日俄的反对下诺克斯计划最后破产。①

威尔逊上台后继续执行对华侵略政策。1912 年，以美国为首的六国银行团同中国袁世凯相勾结，企图把中国的财政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为中国修筑铁路向中国提供贷款 1.25 亿美元。但是美国在银行团中未获监督官职位。威尔逊总统刚入主白宫就借此大做文章，以银行团的行为已触及中国的行政独立为借口，宣称“应该以一些更好的方式帮助中国”。1913 年 3 月 18 日，他签署公开声明退出 6 国银行集团。威尔逊后来向国会说明：“如果我们与其他列强一起参加这笔贷款，我们除了仅仅影响中国之外将一无所获，我们将失去海约翰国务卿主张门户开放而使美国取得的骄傲地位。”② 这些话道出了美国退出 6 国银行集团的真实用心。其时，德国人就猜测美国将退出银行团，并把它作为在中国取得好意的手段。诚如美国学者林克所说：“因此，行政当局公正处理中国问题的野心，只有当美国在远东摆脱据说是邪恶的欧洲影响发挥一手作用时才能满足。”③ 5 月 2 日，美国在没有与其他列强订立协议的情况下，首先正式单独承认中国的袁世凯卖国政府，却对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多次要求美国承认中华民

---

① 详见余伟：“美日在东北的一场激烈争夺”，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 84 页。

③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 84 页。

国不予理睬。此后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投资，财团们纷纷抢滩中国市场。

在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时，素有推行“使命外交”政策之称的威尔逊总统十分注重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对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在这方面美国传教士和美国教授们起了先锋作用。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1898—1900年任中国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义和团起义时，他力主各国划定势力范围，为帝国主义张目。1908年再回北京传教。1913年美国大学教授古德诺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1915年他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宜于君主立宪制度，诬陷中国“民智低下”，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鼓吹为防止“社会之骚动兴起”，“孔教”与“基督教”应该相互结合，即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结合，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据统计，1914年美国来华的教士达2500人，美国在华全部教会和文化方面的财产约为1000万美元。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1913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经常以政治学专家和学者的身份在华鼓吹和传播美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在实践中他积极推行美国偏袒日本、损害中国利益的蓝辛—石井协定。1919年辞职后他又成为中国北洋军阀的法律顾问。

为了在华推行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教育和传播西方文明，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美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大力在华开办各类学校和文化设施，教会大学在中国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1910年美国教会在成都开办华西协和大学，在南京建立金陵大学堂，1913年有杭州的之江大学，1914年有长沙雅礼大学，山东的齐鲁医学院，1915年在南京开办金陵女子大学，1916年在福建开办协和大学等等。据统计，1899年，即义和团刚起事时，

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创办的学校已超过数千所，仅美国教会开办的初等学校就达 1032 所，中、高等学校 74 所。天主教在中国江南创办的各类学校有 558 所。1916 年，教会学校学生数已在中国同级学校学生中占有相当比例，初级学校为 4%，中等学校为 11%，高等学校占 80%。[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美国传教士们为了推动在华的教育事业和有效地宣传西方文化还专门成立全国教育机构“中华教育会”，并于 1893 年、1896 年、1899 年、1902 年分别召开数次全国会议，更有系统、有计划地在中国推行美国和西方的教育体系和观念，传播基督教。与此同时，美国也注重在中国吸收留学生赴美学习，1911 年中国已有 800 名留学生在美国。[②] 在揭露美国统治者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推行“使命”外交的扩张本质时，对于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和冲击中国旧的教育体系，批判旧的教育观念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理应给以历史主义的总结和肯定。事实上，与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愿望相反，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日后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的激进分子更是成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的先锋。

〔拉拢日本牺牲中国〕　拉日制华是美国在东亚的一贯策略。在调停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进一步对日本又打又拉，以对抗俄国和实施其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1907 年美国和日本签订君子协定解决了因加利福尼亚对日本移民的歧视性立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安抚日本。同时又耀武扬威，1907 年 12 月，罗斯福主要是为了向日本显示美国的海军实力以致让它不要在远东轻举妄

① 刘鉴唐：“近代教会学校教育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见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3 页、第 49 页注 53。

②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 年，北京，第 152 页。

动，派出了一支由16艘战列舰组成的美国舰队——“白色大舰队”，声势赫赫地开始了一次全球航行，历时1年余。1908年，这支美国海军舰队——当时世界上第三大海军舰队特地安排去日本东京访问。随后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不失时机地在华盛顿同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进行会谈，并于1908年11月30日签订了所谓“鲁特—高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和日本两国愿意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和维护中国的行政独立和完整。美国承认日本兼并朝鲜的权利和它在中国东北地区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这是美日妥协牺牲中国利益的又一步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根据美国的外交文件所载，美国曾经试图利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政府同意由美国取代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权利，后因种种原因未果。① 同时美国为了达到将中国置于以美国起主要作用的“国际监督”之下的目的，1914年9月15日签订了中美解纷免战条约。规定由国际公会作为解决中美争执事件的仲裁者。国际公会由5人组成。4名会员分别由缔约国成员担任，其中1名需为本国人，第5会员为会长，经商议由第三国担任。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美日妥协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势头。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侵华秘密条款，即臭名昭著的21条。主要内容为：一、承认并扩大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二、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三、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五、中国必须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等等。2月14日，日本正式

① （苏）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第359页。

向各国驻华使馆通报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21条”（第5部分未公开），后中国报刊揭露了条约的全文。列强先后向日本提出照会。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在照会中提请日本政府注意美国在中国，特别是根据1844年、1858年、1868年和1903年的条约在满洲、内蒙古和山东省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他又通过美国驻日大使要求美国能够得到在中国福建沿海参加港口建设的权利。美国在事件开始时，事实上，“准备承认日本对满洲和山东省的最高利益，讨论怎样利用这样的承认作为处理加利福尼亚问题的讨价还价的武器”。[①] 美国的这种态度和立场鼓励日本的野心，受到美国舆论的批评。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采取强硬态度。4月27日，国务卿布赖恩通知驻华公使：国务院不再拒绝公开他们的立场，因为这种沉默已经被解释成对日本要求的默许。后他又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有关声明。[②] 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予以答复。9日，袁世凯承认21条，除了第5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美国迫不及待地声明要享有最惠国待遇，企图利用日本的无耻要求，谋取美国在华的利益。[③] 美国布赖恩国务卿在袁世凯正式签约前，给中、日政府发出照会指出：“美国政府谨通知日本政府：美国对于日本和中国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予以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前引书，第88页。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89页。

③ 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承认。”[1] 美国首先迫不及待地把维护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可是，它不仅在“21条”问题上极端自私地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还对中国施加压力去满足日本的无耻要求，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国务卿布赖恩以调停者的口吻说什么：“日本不应该要求太多，中国也不应该让与太少。”1915年8月2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就21条中的第5部分内容要求国务卿布赖恩向美国驻日大使古斯理发出电报，建议日方关于顾问、武器等方面不要单独行事，可以与其他列强一起行动。美国不反对日本在“满洲和东蒙”范围内施行警政监督。美国在臭名昭著的21条的第5部分问题上还企图寻求与日本妥协的道路。1915年5月6日，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驻华大使保尔·里斯奇告诉被侵略方的中国政府要以“忍耐和友好”的精神与侵略方日本政府谈判，向袁世凯施加压力。[2] 暴露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上偏袒日本牺牲中国利益的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和虚伪性也昭然若揭。

在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为缓和与日本在中国政策上的矛盾和实现妥协，再一次牺牲中国利益。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驻美大使石井通过换文确定了美日关于中国的协定，即所谓蓝辛—石井协定，企图用含糊的词句掩饰美日的歧见。在协定中，日本保证尊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认为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所谓“特殊利益”，为他们向中国提出的特殊利益的要求提供了法律根据；美方则解释所谓特殊利益仅指日本同中国接壤地区的商工企业而已。蓝辛—石井协定是美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15年，第146页。转引自（苏）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第366页。

② 引自邓蜀川：“威尔逊与中国”，见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6页。

日两国撇开中国讨论所谓中国问题，美国竟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国政府的拒绝，1917年11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①] 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继续进行威胁和欺骗，1917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会见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时强调美国签约的正确，胡说在当时条件下与日本合作是惟一出路；同时以美国与它的邻国关系为例，鼓吹邻国因其地理上的邻近可以享有特殊利益。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且招致美国人民的批评。蓝辛—石井协定于1923年3月30日废止。

美国向太平洋地区大事扩张的同时，从未忘记它对南部拉丁美洲各邻国所担负的“使命”。

四、向拉丁美洲的进一步扩张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近邻，又是它的后院。所以它是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最早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19世纪20年代，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实行扩张的战略方针：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许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20世纪初，美国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就迫不及待为实现梦寐以求的“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梦想大干起来。美国不惜利用海军实力采用武装侵略的罪恶手段，充当国际警察，维护加勒比海的“秩序”，在拉丁美洲建立和扶持亲美政权，使那里成为美国的一统天下。从1898年起的3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对拉丁美

---

① （苏）纳罗奇尼茨基等：前引书，第379—380页。

洲实行的重大武装侵略行动不下23起。[①]

〔占领古巴和波多黎各〕　美西战争结束后，1898年12月10日，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巴黎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美国政府鉴于在菲律宾的教训，害怕激起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无力在菲律宾和古巴同时进行两场殖民战争。1899年1月1日，古巴获得美军占领下的独立。美国在古巴建立了以军事总督为首的军事占领制度，采取“统治而不兼并”的政策。[②] 1900年9月，在美国总督伍德将军，曾任老罗斯福招募的美国志愿兵第一骑兵团司令官的导演下，古巴组成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和在法律上正式确定古美关系。1901年2月，依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古巴宪法草案最终完成，但其中没有关于古巴和美国关系的内容。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E·鲁特为此提出若干条款要求古巴制宪会议将它们列入宪法，主要内容有：依据宪法组成的古巴政府不得签订任何损害古巴独立的条约或未经美国同意不得给予任何强权以任何权利；不得举借超过通常收入的债务；美国对古巴具有干涉之权和保持一个军事基地的权利；古巴政府必须执行美国军政府的法令。这些条款明显侵犯了古巴主权，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反对，制宪会议拒绝讨论。总督伍德在向制宪会议施加压力的同时，又提出一项表示善意的附加条款。1901年3月2日，美国康涅狄克州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在鲁特提出的条款和伍德的附加案基础上进行适当包装组合，向参议院提出了所谓陆军拨款方案的补充条款，美国国会通过后，史称“普拉特修正案”。1901年6月，古巴被迫接受美国强加的“普拉特修正

---

① 冯承柏、李元良：“马汉的海上实力论”，见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292页。

② 丁则民：“1899—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见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334页。

案”，将它列入古巴宪法。根据修正案美国在古巴享有干预古巴内政的权利和在瓜塔那摩建立美军事基地的权利。1902 年 5 月美军撤退，古巴共和国成立。1903 年 2 月，美国迫使古巴签订协定把古巴的瓜塔那摩和翁达湾作为美国军事基地。“普拉特修正案”实质上是将古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它是美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一项帝国主义外交原则，是美国门罗主义原则的新实践和新证据。古巴著名律师说：“我们古巴人民一致认为，‘普拉特修正案’把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白宫的一种保护国。”[①]

美国政府十分清楚，对古巴的政治控制和干涉是为美国向古巴获取经济利益开路的。早在 1898 年，有人在美国的《世纪杂志》上写道：“（在古巴）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消除革命的保证，美国人就有可能由这个岛（古巴）供应它们所需的全部食糖，并且可能以比其他地方更低的价格得到它。”[②] 经过一番内部争论，1902 年 12 月，美国老罗斯福政府与古巴签订了“互惠条约”。次年，条约获美国国会通过。普拉特修正案是套在古巴人民脖子上的政治绞索，互惠条约则成为美国控制古巴经济的咒语。此后，美国同古巴的贸易额激增，古巴逐步成为美国食糖的原料产地，最终成为一个单一经济作物的国家。

古巴人民对美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盘剥强烈不满。1906 年古巴人民发动 8 月起义，自发起义很快变成反美斗争。美军第二次开进古巴镇压自由党人起义，并在古巴建立第二次军事占领制度，占领时间长达 3 年之久，美军最后在 1909 年撤出。1912 年 5 月古巴又爆发黑人起义，美国对古巴再次进行军事干涉。5 年以

---

① 转引自丁则民论文：前引书，第 339 页。

② （苏）I·德门特也夫：《美国：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进步出版公司，莫斯科，英译本，1979 年，第 146 页。

后，1917年美国对古巴再次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对古巴的不断军事占领和干预构成了美古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页。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曾经不安地说："每天我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着我的祖国和我的职责，我要努力避免古巴刚从西班牙赢得独立，就被美国跨过西印度群岛，来侵略我们拉丁美洲各国。"[①] 不幸的是，他的担忧竟成了残酷的事实。

在占领古巴期间，一股兼并古巴的强烈扩张主义思潮在美国甚嚣尘上，有人甚至叫嚷古巴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903年12月12日，一位参议员在国会说："当古巴在它的宪法、法律和自由方面仿效美国，并且将有500万到600万人按照美国方针受教育从而适于享有美国公民一切权利的时候，日子就不太遥远了。于是，随着来自古巴的倡议，我们就能够欢迎我们国旗上另一颗星了。"[②] 有的美国报纸甚至宣称占领与美国海岸近邻的古巴是"天定命运"。[③]

美西战争后，美国还根据巴黎和约夺得波多黎各。当时波多黎各是一个西班牙殖民地，也是一个具有西班牙习俗的文明民族，并于1897年实行内部自治。共有居民95.3万人，其中白人近59万人。1900年4月12日，美国通过福拉克法，为了统治波多黎各，专门成立一个总督和六名行政长官的委员会，行政长官由秘书长、检察长、会计长、审计长、内务委员和教育委员组成。美国人还在波多黎各组成35人的代表院和相当于上院的"行政会议"，由六名行政官员和另由美国政府指定的五人组成，但必须保证其中有五名波多黎各人。华盛顿还任命五名最高法院

---

① 转引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北京，1973年，第448—449页。

② 转引自丁则民论文：前引书，第344—345页。

③ 转引自丁则民论文：前引书，第344—345页。

的法官负责那里的司法工作。根据该法，波多黎各可以管理自己的关税。1917年，岛上居民取得了美国国民的资格。

〔调停委内瑞拉危机〕　委内瑞拉独立以后完全成为考迪罗独裁统治的国家。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于1898年成为第一个统治委内瑞拉的山里人，结束了由平原人和加拉加斯城市人控制国家最高权力的局面，人称他是在委内瑞拉实行独裁统治的“安第斯山的狮子”。1902年11月，英、德两国同意借口向委内瑞拉索债采取联合行动，12月9日，他们用海军封锁了它的5个港口，掠夺了4艘炮舰。10日，军队在委内瑞拉登陆。13日，军队实行轰炸。16日，意大利加盟，英、德、意三强共同对付委内瑞拉。

老罗斯福对委内瑞拉事件保持高度警觉。1901年12月14日，德国政府正式通知他，为了索债他们可能暂时占领委内瑞拉的一些领土，仅仅3天以后，罗斯福立即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给美国海军部，要求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以准备应付突然战争。1902年1月，海军部派出司令约翰·皮尔斯伯里去调查德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2月，美国国务院企图了解外国军队在委内瑞拉登陆及其行进路线的动态。6月，驻加勒比海的美国海军接到通知进行军事大动员。罗斯福指示杜威将军整装待命。罗斯福以美国海军为后盾最后迫使德国就范，维护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原则取得成功。“一些当时的证据表明，海军被用作对德外交政策的支撑，时至12月底目标已经赢得。”[1] 同时，罗斯福总统在外交和政治上也积极采取行动，12月5日，即英德正式攻击委内瑞拉海军前5天，美国向英德两国表示如果英德排除使用任何武力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将非常高兴。12月8日，美国驻英公使亨利·

① 比尔：前引书，第357页。

怀特在英国首都与英国首相举行秘密交谈，表示对委内瑞拉形势的忧虑，提醒首相不要被德国引导而干出违逆公众舆论的事情。后他又接连同首相会谈。美国政府同时对德国政府展开外交活动。12月18日美国政府提醒德国政府，如果它不立刻同意调停，国会也许会通过决议命令总统强制实施门罗主义去反对它。[①] 在处理委内瑞拉事件中，罗斯福又打出了德拉哥主义的牌，委内瑞拉危机时，阿根廷外长德拉哥写信给阿根廷驻华盛顿公使反对欧洲列强以索债为由对委内瑞拉动用武力。他的主张被称为“德拉哥主义”。西奥多·罗斯福借口维护德拉哥宣言，出面调停，要求欧洲列强将委内瑞拉危机提交国际法庭裁决，委内瑞拉总统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表示接受。但是遭德国拒绝。最后，罗斯福派出美国所有海军由杜威将军指挥在加勒比海举行“演习”，“德国才接受调停”。[②]

老罗斯福以武力为后盾在外交和政治上既对英德施加压力又对他们进行分化离间。欧洲列强只得勉强服从，委内瑞拉危机解决，美国遂乘虚而入。

危机一方面表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拉丁美洲的尖锐矛盾和利害冲突，同时也暴露了美国企图独占拉丁美洲的野心。老罗斯福在调停过程中非常强调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解决这类国际争端单纯依靠国际法庭是不够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支一流的海军和一支有效的规模虽小的陆军。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产生短缺，海牙法庭是无法拯救我们的。”[③] 美国学者认为罗斯福调停委内瑞拉是他形成门罗主义推论的出发点：“著名的

---

① 比尔：前引书，第360页。

② 亚当斯：前引书，第356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291页。

门罗主义推论起始于1902年的形势。由于委内瑞拉拒付大笔欠款，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已派遣战舰封锁它的港口。虽然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已经承认这种经济封锁的权力，但是罗斯福总统担心这样的行动将导致对西半球领土事实上的军事渗透和占领，侵害门罗主义。于是，总统在1904年12月6日给国会的第4次咨文中宣布了一项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美国成为西半球的警察。"[①] 在这篇演说中，罗斯福典型地运用了他的著名格言，"开始时说话温和但是最后导致大棒的挥舞。"[②] 委内瑞拉事件不仅促成了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而且使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德国、对英国，甚至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了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产生的年代。对于罗斯福来说，诚如美国学者套用伏尔泰关于上帝的名言所说："如果不存在门罗主义的话，也有必要创造出一个来。""它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③] 有人公开认为："国际法中将为'罗斯福主义'，即完备和完成了的门罗主义，留有空间。保护拉丁美洲利益反对欧洲干预的权利……将不得不被宣布保护欧洲(和北美利益）反对南美洲干预的权利相平衡。"[④]

但是，美国政府在调停委内瑞拉危机中可能赢得的拉美国家对他的尊敬和友谊，很快在巴拿马事件中丧失殆尽。

〔强取巴拿马运河开凿权〕　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一旦

---

① 詹姆斯·G·纽比尔等：前引书，第349—350页。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温伯格认为，如果将西奥多·罗斯福的政策原则仅仅停留在认为是门罗主义的推论上是不够的。因为罗斯福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的基础与门罗主义无多大关系。他认为罗斯福深受帝国主义者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的影响。详见温伯格：前引书，第429页。

② 温伯格：前引书，第428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368—369页。

④ 温伯格：前引书，第426—427页。

出笼，就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的总方针。而强占巴拿马运河开凿权是他扩张计划中的梦寐以求的伟大梦想之一。马汉曾经从加强美国海军实力的战略高度出发竭力鼓吹在中美洲地峡开凿运河，以便缩短美国海军航程，有效进行两洋战争。美西战争期间美舰“俄勒冈”号绕过南美洲的远距离航程耗时费力，贻误战机，使美国领导人倍感开凿巴拿马运河之迫切。1899年3月30日，美国国会授权行政当局对此事的可能性进行调查。1900年2月5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英国驻美大使庞斯福德签订第一个条约，但未获美国国会批准；1901年11月18日，再次签订海约翰—庞斯福德条约，明确废除了1850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协定（该约规定美英两国共同管理规划中的中美洲运河），美国免除了接受国际共管巴拿马运河的义务，获得开凿、管理和防卫运河的独占权，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为和平目的通过该运河。1902年6月29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了斯普纳法案，批准在巴拿马修建运河。1903年1月22日，美国同哥伦比亚签订了海约翰—埃尔兰条约，强迫哥伦比亚政府在巴拿马省划出一条15英里宽的地区供开凿运河之用，租给美国99年；美国则以一次付清1000万美元和每年偿付25万美元给哥伦比亚政府为代价。但哥伦比亚共和国国会以侵犯国家主权和补偿太少为由拒绝批准条约。后哥伦比亚要求提高地价为1500万美元等，均遭海约翰拒绝。美国公使向国务院汇报说：“没有问题，反对批准条约的公共舆论虽然强烈，但哥伦比亚公共舆论在控制立法机关方面不是必要的有力因素。”[①]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了开凿运河曾计划要求国会授权他动用武力从哥伦比亚夺取这块土地。后改变主意，

---

① 威廉·麦克凯：《美国和巴拿马共和国》，纽约，拉塞尔，1965年，第12页。

决定在巴拿马阴谋策动政变、寻求政治代理人，实现美国开凿巴拿马运河计划。法国出生的比诺-瓦里亚是一位工程师，也是法国运河公司的老板。他曾受美国委托与哥伦比亚谈判，谈判失败后，他参与鼓动巴拿马的政变，促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他与罗斯福的朋友法学家约翰·穆东会面后知道美国对巴拿马运河仍有兴趣，10月10日，他拜访美国国务卿首席助理罗密斯，并通过他得以同正忙于总统竞选的美国总统会面。会面后他估计罗斯福总统不会不乐意看到巴拿马发生革命。10月29日，他得知哥伦比亚军队开往巴拿马，急忙赶到华盛顿通知罗密斯"革命即将发生"，并与海约翰会面。11月2日，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军舰"纳什维尔"号驶抵科隆支持巴拿马政变（美舰"亚特兰大"、"迪克斯"和"波士顿"号早在10月19日已待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11月3日比诺-瓦里亚收买曼努埃尔-阿马多尔在巴拿马发动政变制造"独立革命"。次日召开群众大会，阿马多尔宣布为巴拿马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英勇精神使全世界惊讶。昨天我们还是哥伦比亚的奴隶，——而今天我们获得了自由。罗斯福总统'援助'了我们……罗斯福万岁！美国政府万岁！"[①] 3天后，美国政府立即承认巴拿马独立。11月13日，比诺-瓦里亚正式接到华盛顿通知成为巴拿马共和国的驻美公使，并立即着手起草美巴协定，对于该协定"海约翰没作重要修改就立即接受了"。[②] 11月18日，美国和巴拿马签订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为开凿运河在巴拿马永久占领10英里宽的地峡，并在该地区实行统治和设防；为此，美国承认巴拿马独立，并立即支付1000万

① 转引自李春辉：前引书，第418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17页。

美元，9年以后每年支付25万美元作为经济补偿。1903年12月2日，巴拿马在比诺-瓦里亚的竭力推动下批准了条约；1904年2月23日，美国国会批准条约，2天后美国总统签署条约。罗斯福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说：“我先把运河拿下来，然后再把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去辩论，而当辩论继续进行的时候，运河的建筑工作就已经向前推进了。”他毫不掩饰地说：“我拿下了巴拿马，运河区完全变成了我们的，巴拿马共和国也全部在我们的势力控制之下。”①

在哥伦比亚人民的眼中，美国政府为取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策划了一场卑劣的政治阴谋，而法国人比诺-瓦里亚在这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中，起到了最肮脏的作用，获得了最肮脏的大笔利润。比诺-瓦里亚本人因此成了新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杰出成员，获得了该公司价值4000万美元的股票。对于法国来说，比诺-瓦里亚是一位英雄，他为法国公司争得了大笔股票；对于美国政府，他的忠心耿耿的服务赢得了罗斯福总统给予的高度评价：“你最后解开了已使几百年来人类无能为力的难题，为你珍贵的祖国和全世界作出了最杰出的服务。”②

老罗斯福在1903年12月7日向美国国会报告说：“依据条约的条款规定，美国保证和维护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准予美国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一条宽10英里以及两边延伸入海的3英里的地峡，及区域外所有为建造运河和豪华工程的必要土地，以及巴拿马湾的岛屿。”③ 美国用卑劣的政治手腕制造“革命”，阴谋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最后通过巴拿马傀儡政权实现

① 转引自李春辉：前引书，第418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17—18页。
③ 麦克凯：前引书，第17页。

美国在巴拿马地峡开凿、控制和管理运河的目的。取得运河开凿权对美国海军舰队将来出入太平洋和大西洋，实施海上扩张战略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在客观上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对于缩短南美洲航线有着重要意义（约可缩短1万公里左右），有利于世界航运事业。巴拿马运河的设计和开凿是在人类运河史上谱写了一首恢宏悲壮的诗篇。

190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动工。美国陆军上校和工程师乔治·戈瑟尔斯主持开凿工作。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任命他为地峡运河委员会主席和总工程师。1908年1月，戈瑟尔斯全面负责开凿和管理工作。运河开凿困难重重，他克服了技术上和管理上的许多困难，耗时10年，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竣工。1914年8月15日，一艘美国军舰首航成功。1915年春天正式全线通航。运河全长约82公里，宽152—304米。建筑费用为23300万美元，参加修筑的巴拿马和其他国家的劳工牺牲者高达7万人，因此运河区被称为“死亡的海岸”。[①] 运河大大缩短了美国东西两岸的水陆航程，为美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军事利益难以估量，客观上也为人类带来经济和交通上的裨益。

对于西奥多·罗斯福在强占巴拿马运河开凿权中的所作所为，美国外交史专家塞缪尔·比米斯曾说：“1903年的干涉在美国的拉美政策上是惟一的一个真正的污迹，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大污迹。”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罗斯福急于干这肮脏勾当是“悲剧性错误和不可原谅的”。有的认为他“用不太高尚的手段获得了高尚的结果”。[②]

〔美国和巴拿马的冲突〕　　美国政府在庆贺取得了巴拿马

---

① 转引自李春辉：前引书，第419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5页。

运河开凿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与巴拿马人民间的矛盾的种子。巴拿马运河动工不久，在巴拿马运河区实施进出口、海关、税收和邮局建设的时候，就引起了巴拿马的激烈抗议，美巴双方几乎为此开展了长达数月的外交谈判，最后还是由美国国防部长塔夫脱出面解决了事。1904 年 6 月 24 日，塔夫脱签署命令允许巴拿马运河区向友好国家为商用目的而开放，并将该区划分成两个海关区域。克利斯托瓦尔拟划为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沿岸的终端；安孔为运河在太平洋的入口港，并将按照美国征税方式在那里征收进口税。巴拿马运河区总督乔治·戴维斯没有公布该命令的第 8 和第 9 部分，其内容为“运河区总督有权为运河区和巴拿马共和国之间的海关服务，保护两国政府的海关收入和防止欺诈和走私，参与同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签订协议。”①

美巴双方发生的重大争议集中在对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的理解上。众所周知，该条约仅仅在巴拿马宣布独立后 15 天里匆忙制定的，而且代表巴拿马谈判方的竟是一位法国公民比诺-瓦里亚。1904 年 7 月 15 日，巴拿马市商会向巴拿马总统阿马杜尔提交备忘录，反对美国在运河区建造进出港口、海关和征税。商人们埋怨说无论条约的精神还是文字都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在运河区内建设上述机构。他们在备忘录上说：“（该地区的）商业、农业和畜牧业将被毁灭，从这些资源提取税收的巴拿马政府将遭遇同样的命运。灾祸将遍及全国，人民将被迫迁移。根据条约的第 1 条，美国保证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但是根据提议中建设的巴拿马共和国将陷入已经存在的最糟糕的依附、奴役和饥饿。”②美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态度十分傲慢。7 月底，巴拿马总统要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 23 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 26 页。

求美国驻巴拿马公使约翰·巴雷特作出回答，反对美国政府对条约的践踏。巴雷特向华盛顿汇报说，巴拿马人民情绪激昂，对美国的不信任已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除非修改6月24日的命令。7月26日，巴雷特电告美国国务院：巴拿马的激动日增，形势危急。他认为问题最重要的症结是关于运河区的主权问题。他分析说："如果总统的命令在颁布和执行之前，在华盛顿或在巴拿马通过外交途径认真讨论的话，整个麻烦也许可以避免。"①

8月11日，巴拿马驻华盛顿公使致美国国务卿一备忘录，指出根据海约翰—埃尔兰条约和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巴拿马并没有把主权转让给美国。只有在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的第3条中提到主权问题，他认为该条约第3条的陈述是，如果美国对领土有主权的话，美国将行使权利、权力和权威。他还对该条约的第6、10、12、13、23条等等作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结论应该是两个国家共同行使对运河区的主权。备忘录指出骚乱是由6月24日的命令引发的。美国不应该开放克利斯托瓦尔和安孔为运河的出入港口。因为它没有这种权力。而且这些出入港口都是巴拿马城市的一部分，条约第2条规定排除了巴拿马城市和科隆及其连接部分的领土。所以巴拿马政府无法接受同条约相矛盾的状况。巴拿马政府仅仅允许美国在必要时或作为权宜之计提供对运河的保护使之对全世界自由通航，防止被任何外国势力进行不当活动。但没有把运河区转让给美国成为它用高关税作为它的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

美国政府对此持强硬态度，向巴拿马人民挥舞"大棒"。8月中旬，美国海军上将J·G·沃尔克将军主持运河区工作。他傲慢地告诉巴拿马官员，美国决不对此作出让步，因为这是罗斯福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27页。

总统支持的地峡运河委员会的决定性的态度。

同时，美国政府又使用“说话柔和一点”的策略。8月18日，美国国务院给巴拿马公使一封由瓦里亚写的信的复印件。该信写于1904年1月19日，正值美国参议院辩论有关在运河区修建终点港的问题。当时作为巴拿马方官员的瓦里亚在信中说，巴拿马市和科隆市的港湾与运河的港湾是完全分离和独立的，但是位于这两个进口处的港湾，船只在通过运河时必须使用。如有麻烦，美国可由条约第2条给以适当保护。巴拿马公使立即予以回击，他认为瓦里亚依据的只是1903年11月18日签订的条约而已。后来巴拿马官员发现了该国政务院批准瓦里亚信件的文件，事情就变得十分复杂。巴拿马国内舆论从批评美国政府转向巴拿马政务院。美巴继续举行外交谈判。巴拿马政府批评美国政府不尊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巴拿马政府，要求美国驻巴公使约翰·巴雷特参加所有会议和签订所有协议。

1904年10月18日，美国总统命令国防部长威廉·塔夫脱赴运河区和巴拿马解决争端。24日海约翰对巴拿马备忘录作出答复。他坚持认为美国向友好国家为商务目的开放运河、在运河区征收关税、建设邮局开展区内外的邮务活动都是合理的。这些权力基于美国对运河区的主权。海约翰批评巴拿马政府在对条约进行解释时搞错了对象，把美国当成了一个私人公司——法国运河公司。他宣称：“美国为此种目的，用此种方式向本半球它的姐妹国家可能要求领土和主权是如此显现的天命而无需讨论。”①

11月22日，塔夫脱离开美国启航访问巴拿马。27日星期天抵达科隆，然后搭乘专车赴巴拿马市，他告诉巴拿马人：“美国政府在这个地峡计划做的事情只是建立一条连接两洋的运河，它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38页。

将不仅带给你们国家，而且给美国和全人类带来巨大利益。"[1]在美巴谈判中，美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在某些问题上也作出了适当让步。1904年12月3日双方签订协议。但是协议并没有消除美巴之间的矛盾。

酷爱独立和自由的巴拿马人民对巴拿马宪法第136条抱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因为它规定了美国政府为重建所谓公共和平与宪法秩序可以干预巴拿马共和国的任何部分。当时在巴拿马市流传的爱国小册子称宪法第136条是把"羞愧的脸色"留传给未来整整几代人的"巨大和永久的羞耻和侮辱"。[2] 1906年巴拿马计划举行大选，自由党和保守党争端日趋激烈，自由党的反美情绪高涨准备举行政治示威。美国决定对大选进行监督。塔夫脱在1906年4月26日发出指示，"（巴拿马）共和国任何地方发生的暴动都将极大地增加美国建筑运河的困难……我认为美国必将适当地阻止对运河建设的不可避免的干扰，镇压共和国任何地方发生的暴动。"[3] 1908年巴拿马又举行选举，美国海军以"监督选举"为名在巴拿马登陆。1918年，美国海军直接在巴拿马驻扎。

美国在开凿巴拿马运河和干预巴拿马内政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推行金元外交。根据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凯的研究，1903年美国水果公司占有巴拿马铁路和土地，在巴拿马有200多万美元的资产。中南美洲电报公司，新泽西美国商业发展公司等等都在巴拿马经商。1903年以后，美国在巴拿马的投资者数量激增。美国的一些州在巴拿马建立了农业殖民地。如：190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奇里基改良公司在该省省会戴维开设办公室旨在开发奇

---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40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63页。
③ 麦克凯：前引书，第68页。

里基省。1906 年美国新泽西州的奥兰治、圣路易斯和密苏里的居民组成巴拿马公司在巴拿马东部的圣布拉斯半岛建立一个农业殖民地。

美国银行业也打入了巴拿马。美国的康涅狄克国际金融公司，美国商业发展银行和西弗吉尼亚的巴拿马金融公司在运河区开展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公司在巴拿马、科隆都设有分部，1910 年巴拿马金融公司在巴拿马和科隆开展业务。1913 年大陆银行和信托公司在运河区建立。1915 年华盛顿特区的商业国家银行在巴拿马市和克利斯托瓦尔设立分部；运河区银行在科隆开张。美国企业家还在巴拿马开发交通运输，接着石油公司也在巴拿马兴起。

〔*塔夫脱在中美洲的经济扩张*〕　塔夫脱上台后害怕老罗斯福的政策会导致美国对中美洲的频繁干涉，同时他认为中美洲国家的许多麻烦都因财政问题而生。它们从欧洲银行借贷许多资金而无力偿还其利息，因此常常邀请外国加以干预保证还债。塔夫脱决定采取用美元取代欧洲资金的方法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和扩张。在塔夫脱任内，美国国务院大力鼓励美国私人银行家向中美洲国家大量贷款，特别是向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投资。对塔夫脱而言尼加拉瓜是最头疼的麻烦。1909 年那里爆发一场得到美国支持的反对独裁者塞拉亚的革命。塞拉亚从 1893 年执政以来几乎垄断了国家的一切资源，还入侵洪都拉斯，撕毁中美洲 5 国签署的和平协议。塞拉亚向欧洲银行借贷了巨额款项。美国在那里也有它的经济利益，特别是联合果品公司在尼加拉瓜很有经济实力，他们支持反对塞拉亚的起义。1909 年 12 月，塞拉亚以参加起义的罪名处决了 2 名美国职业军人。坚持支持塔夫脱“金元外交”的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指责塞拉亚的暴行并宣布与尼加拉瓜断交。1910 年初，塞拉亚被迫出逃尼加拉瓜到墨西哥避难，

尼加拉瓜建立了新政府。次年，塔夫脱和诺克斯强迫新政府将从欧洲银行的贷款转为向美国借贷。1912年，尼加拉瓜发生反对亲美政权的起义，美国银行家要求塔夫脱政府派军队去尼加拉瓜维护“秩序”。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派往那里一直驻留到1925年。

〔武装干涉墨西哥，占领海地和多米尼加〕　威尔逊在进入白宫前曾对他的普林斯顿朋友们说：“如果我在任内不得不主要去处理外交事务，那将是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不仅嘲弄了威尔逊，而且还十分残酷。他上任不久就遇上了邻国墨西哥发生的令他惶恐的麻烦。

1908年墨西哥独裁总统迪亚斯曾向美国记者透露他将于1910年离任，但后又改变主意声明参加1910年竞选争取连任。当时墨西哥经济衰退，工人罢工不断，农民苦难深重，迪亚斯难以维持统治。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德罗协助组织反连选连任党并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后以煽动起义罪被当局逮捕，交保获释后逃亡美国。1910年10月，他宣布自己为墨西哥合法总统。他的政治伙伴发动起义攻占华雷斯城，迪亚斯宣布辞职。1911年10月墨西哥举行总统选举，马德罗获胜，结束了独裁者迪亚斯的统治。马德罗面对迪亚斯派的谋反危险和更激进派别的攻击，还要面对美国大使亨利·威尔逊的干扰。1913年2月墨西哥发生军事叛乱。马德罗依靠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将军平息叛乱。但是与迪亚斯派勾结的韦尔塔在英国支持下，推翻了政府，杀害了马德罗。韦尔塔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解散立法机构，镇压一切政治反对派。1913年，威尔逊正好入主白宫。墨西哥的政变引起美国不满而拒绝承认韦尔塔政府。1913年墨西哥国内卡兰萨等率领军队反对韦尔塔政权。1914年美国和墨西哥发生所谓坦皮科事件，墨西哥军队逮捕了在坦皮科的美国水兵，虽很快释放了他们，但是美国政府仍要求墨西哥向美国国旗鸣21响

礼炮致歉。韦尔塔不允，威尔逊派军队于1904年4月22日占领了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23日卡兰萨致信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侵略我们的领土和在韦拉·克鲁斯的永久驻军构成对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主权存在的侵犯，它将把我们拖入一场直至今天我们仍希望去避免的不平等战争。"[①] 美国侵墨事件受到拉美许多国家的抗议，蒙得维的亚、圣地亚哥、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等地发生一系列反美示威，那里的报纸都谴责美国的行为是"另一个帝国主义的天定命运"。[②] 1914年韦尔塔辞职出逃。次年卡兰萨军队击败分裂武装就任临时总统。韦尔塔在1915年去美国后因在墨西哥煽动叛乱被捕。卡兰萨在1915年5月1日成为正式法定总统并获美国承认。但是卡兰萨革命政权依然面临重重困难和复杂的政治形势。曾一度得到美国支持的维拉控制了墨西哥的北部江山，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制造事端反对卡兰萨，维拉在1906年3月9日带领军队袭击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城并杀死19名美国人。1916年3月，威尔逊派约翰·潘兴率领军队远征墨西哥。早就反对美国军队入侵韦拉·克鲁斯的卡兰萨总统坚决反对和阻止美国军队入侵墨西哥领土哥伦布市。从1906年至1917年1月15日，美墨双方举行谈判，美国军队自1917年1月27日开始从墨西哥撤退。同时，卡兰萨政权继续在国内进行改革，1916年10月22日，墨西哥人民选举了制宪会议并于当年12月和次年1月召开会议通过了墨西哥宪法，1917年3月11日新的议会和符合宪法的总统卡兰萨正式选举产生，美国立即加以承认。至此，"墨西哥—美国关系上近乎悲剧的一章

①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125页，注41。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124页，注39。

结束了”。[1]

1916年11月25日任德国外长的齐默尔曼为挑起美国与墨西哥的纷争，给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发去密电。1917年2月，美国从英国情报处截获德国外长致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电报，获悉德国当局计划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墨西哥建立联盟。电报声称德国将给予墨西哥以通常的财政援助，鼓励墨西哥向美国收复失地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并要求墨西哥同日本结盟反对美国等等。1917年3月1日，电报公开后，美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德国非但没有达到破坏美墨关系的目的，反而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步伐。

〔对海地的军事统治〕　在威尔逊总统宣誓就职不久，海地新总统被选出。但是海地很快爆发了革命，1914年1月27日总统退位。2月8日，奥雷斯特·萨莫当选总统。9、10月间，海地政局又陷于混乱，萨莫政权垮台。1914年12月，美国总统威尔逊乘海地内乱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在太子港登陆，将海地国家银行中价值5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劫往纽约。[2] 海地再次登场的新领袖又于1915年1月被推翻。1915年初，沙姆上台，美国派出代表团与海地政府谈判。7月27日海地总统在群众暴乱中丧生。美国立即以“保护美国人和外国人利益”为名，于次日正式派遣海军司令卡普顿率军在海地登陆，并占领太子港等重要港口。从此海地沦于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

8月12日，在美国操纵下海地举行新总统选举。亲美傀儡总统达梯圭纳维上台，但真正的统治者还是美国海军司令卡普顿。1915年9月16日美国迫使海地签订条约，规定美国对海地

---

①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145页。

② 李春辉：前引书，第472页。

的海关和财政实施监督；在美国官员领导下成立地方警察；海地政府放弃将本国领土租让给其他国家的权利等等。1915年年底，海地参院批准条约，1916年2月美国参院批准生效，为期10年。1917年美国为海地制定新宪法。认可美国的占领行为和准许美国在海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占领对海地人民犯下了屠杀无辜的罪行。美国学者认为："对海地的军事占领建立在冷血屠杀之上。近3000人——大多是非武装的平民——被杀，仅仅因为一个美国军官和在名单中的12人的失踪。前美国领事詹姆斯·约翰逊报告说：'和平仅仅意味着用机枪在山上猎杀衣衫褴褛的海地人。'这场秘密战为'有功的民主人士'提供了成百个就业职位。他们以豪华的殖民地方式生活：乘舒适汽车，住宽敞住所，还有廉价的忠心不二的仆人护理他们。军事占领的费用和白人殖民统治者的开销全由海地政府支付。"[①] 这是美军占领海地施行暴力的真实写照！

面对美国的军事控制，海地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915年海地人民发动游击战。1918年比拉提领导人民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武装起义，在不长的时间里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5000人，起义一直坚持到1920年。

〔侵犯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主权〕　美国对海地的邻国多米尼加采取了同海地一样的控制政策。1903年1月31日，美国借口维护"圣多明各开发公司"对多米尼加政府贷款的利益，强迫多米尼加政府签订一项协议，规定由多米尼加政府赎回此项债券。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借口多米尼加拒绝偿清债务，挥舞大棒，派出武装力量入侵多米尼加领海，强迫它同意让美国监督

① 杰弗里·佩雷特：《20世纪美国历史》，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纽约，1982年，第126页。

其海关税收和国家财政，1907 年 2 月 25 日美国又逼迫多米尼加同意美国在 50 年内具有征收多米尼加海关关税的权利，并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和保护多米尼加税务使和助理。至此，美国完全控制了多米尼加的财政和经济。

美国控制了多米尼加的海关收入后，在银行家的别有用心的怂恿下，美国政府派詹姆斯·沙利文去多米尼加担任美国代表。

1916 年仲夏，美国国务院认为多米尼加局势已无法控制，必须加以全面管制。威尔逊总统解除了沙利文的职务，任命资深官员威廉·拉塞尔接替，同时派出使者赴多米尼加会见所有政治领导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无法平息国内的混乱，美国将对他们实行军事控制。1916 年年底，威尔逊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多米尼加登陆，不久美国军队占领多米尼加的首都和其他城市。美国占领军达 1.8 万人。美军高级指挥官 H·S·纳普上尉将多米尼加共和国置于美军控制之下。12 月 26 日宣布解散多米尼加国会。此后，美国军事当局还在多米尼加的地方建立听命于美国的政权。美国占领军在那里剥夺了多米尼加人民的政治权利，培植和训练由美国当局直接领导的职业军，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逮捕爱国人士。借助军事占领，美国资本涌入多米尼加，开辟甘蔗种植园，修筑铁路、港口和桥梁，美国公司和银行控制多米尼加的经济命脉等等。这就是美国保证邻国“稳定、秩序”的真实写照。“当哈定入主白宫时，被威尔逊派遣去保护美国财产和亲美政权的美国部队驻守在海地、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占领军不仅败坏了美国的声誉，同时还在那些国家粉碎了给予负责任的政府去发展的任何机会。”①

同时，尼加拉瓜也早已成为美国垂涎的猎物。早在 1897 年 5

---

① 佩雷特：前引书，第 126 页。

月老罗斯福就写信给马汉说："我相信我们应该立即建造尼加拉瓜运河。"① 尼加拉瓜总统塞拉亚从1893年直至1910年长期执政，对内依靠武力实行独裁，垄断了国家的一切资源，但也进行了一些适当的改革，对外也曾采取了一些不满美国的政策。1906年他拒绝出席维持中美洲和平的圣何塞会议，还入侵并推翻了洪都拉斯政府，又企图在萨尔瓦多"制造"革命。他坚决反对美国修建尼加拉瓜运河的计划，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1909年，美国支持尼加拉瓜保守党人推翻塞拉亚统治的行动，建立起以埃斯特拉达为总统的保守政府。1913年6月9—11日，美国和尼加拉瓜签订条约，美国以300万美元代价购买开凿尼加拉瓜运河的土地，美国对该款项的使用进行监督；根据条约美国加紧对尼加拉瓜的控制和干预，维护尼加拉瓜的"独立"。② 1912年，尼加拉瓜爆发反对阿道夫·迪亚斯统治的斗争。为了维护亲美的傀儡政权，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登陆，对该国进行军事控制。1914年8月5日，美国和尼加拉瓜签订了"布赖恩—查莫罗条约"，规定美国享有在尼加拉瓜开凿尼加拉瓜运河的权利，享有在丰塞卡湾建立海军基地的自由，并有权长期租借加勒比海科恩群岛。后因遭尼加拉瓜邻国的抗议，美国没有实现在那里开凿运河的计划仅在科恩群岛建造了一座灯塔而已。

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大国仲裁角色

20世纪初，美国大肆向远东和拉丁美洲扩张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又到处指手划脚，盛气凌人。

---

① 比尔：前引书，第52页。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96页。

〔第一次海牙会议〕　1899年5月18日—7月29日，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了第一次海牙会议。共有26个国家参加，美洲仅美国和墨西哥派代表出席。俄国外交大臣米哈伊尔在邀约中提出建议讨论限制扩军，减少新武器的部署；会议将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即一切治疗伤病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免除被占被俘后被破坏的权利，一切参加战斗者应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治疗，援助伤员的平民应受到保护，公认红十字作为识别公约涉及的人员和装备的标记等原则，均应在海战中加以应用；修订有关地面战法规和惯例的布鲁塞尔宣言。会议最后签订了公约，发表三禁宣言：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气，禁止使用达姆弹，禁止从气球上发射子弹或炸药。会议对"交战国地位的条件"下了定义，对其他地面战与海战的惯例作出解释。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成立常设仲裁法院。但是对会议的主要议题限制军备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参加了会议，并且努力发挥大国的作用。A·T·马汉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他在会上投票反对国际仲裁。

〔西奥多·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　罗斯福在对东亚实行扩张和对华推行门户开放的过程中，希望在东亚建立起某种政治均势，借此美国可以通过协调妥协和多边或单边会谈进行平衡，抬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并可以在东亚获取巨大利益。但是日本的崛起和它的对华野心经常打破这种均势，造成欧洲列强诸国在东亚地区的新矛盾和不平衡。罗斯福总统在对日本、俄国、德国等国在东亚的力量和意图作出分析以后，对日本的认识经过一番变化以后逐步趋向稳定，他既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潜在对手因而对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在海军建设方面美国决不能落在其后；又认识到日本是东亚地区的惟一强国，也可以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俄国扩张的重要力量，所以罗斯福为要利用日本作为牵制俄国的

制衡器竭力讨好日本，对日本采取友好的外交态势，以日制俄，以日制华，建立新的平衡。调停日俄战争就是罗斯福建立远东政治均势的一次重大努力。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场为争夺控制满洲和朝鲜的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俄国企图控制中国的满洲和朝鲜。而日本当时在朝鲜已有落脚点，希望美国能阻止俄国实现它控制满洲的美梦。但是美国有礼貌地通知日本：美国不准备用武力实施其门户开放政策。日本转而与英国结盟，企求欧洲国家共同干涉俄的扩张，不让俄国计划得逞。1904年2月8日，日本向驻守中国旅顺口港的俄国海军舰队发起突然进攻，揭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日本联合舰队在旅顺口封锁俄国海军舰队长达10个月左右，迫使俄军于1905年1月投降。在陆上，侵占中国东北的日军向俄军发起进击。由于俄国兵力有限，给养不足，指挥不力，致使日军连连获胜。1905年5月27日，东乡的日舰在对马海峡与前来支援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遭遇，日舰纵队直穿俄国前进中的横队击毁33艘敌舰，大获全胜。俄军惨败以后，国内又爆发革命风暴，沙皇尼古拉二世内外交困。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关注着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两强战争。他从美国的强国地位出发信奉力量平衡的政治学说以达到维持国际秩序和稳定的目的。在日俄战争中他企图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战争爆发时，罗斯福同情日本，把俄国看成是破坏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侵略者。但在日本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罗斯福企图在两国间进行调停，以恢复亚洲战前的力量均衡。两国最终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日本获得对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口）和南满铁路（通往旅顺口）和库页岛的一半控制权。1906年罗斯福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

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在亚洲扩大其政治影响的惊人举措。早在1905年1月，罗斯福开始有了进行调停的最初想法，他通过私人朋友赖斯与英国进行秘密联系，后又企图与俄国沙皇联络，但困难重重。[①]

5月27、28日，日本海军舰队击溃俄国舰队，罗斯福再次努力结束战争。6月5日美国总统立即以国务院名义给美国驻俄公使迈耶发去秘密备忘录，要他立即求见沙皇陛下向他说明他是根据总统个人的指示，向皇帝陛下提出总统约请俄国代表与日本代表关于是否缔结和平交换意见的要求。总统最迫切和最真诚地希望向俄国提出对它最为有利的劝告。1905年8月9日，日俄和谈正式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举行。

西奥多·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是美国向远东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美国总统企求在处理远东地区的国际问题中发挥"一等"大国作用，显示美国的政治实力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所以在调解过程中罗斯福不顾昔日世界强国英国的干扰和影响，独立自主地运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利用德国、法国、英国与日本和俄国的复杂关系，拉日压俄，软硬兼施，最终抓住俄军惨败的有利时机，逼俄就范。罗斯福的调停也是美国在远东推行的均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美国政治家对俄国和日本的现状和未来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在经历了一定的实际接触以后，罗斯福认为美西战争以来，俄国是一个完全没有信誉的国家，它缺乏对事实的理解和概念，它不愿面对现实，它对自身的强弱缺乏了解，它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而日本的行为已经显示出它将是一个凶恶的敌人，虽然现在美国的海军力量在数量上还是优于日本的。他希望说服美国人民一方面要公正和礼貌地对待日本人，一方面要保

① 比尔：前引书，第244页。

持美国海军的优势。这样就不需要害怕日本了。如果美国像布鲁克斯·亚当斯所说的那样，它自己仅仅是“富裕、进取和手无寸铁”的话，也许在某一时刻日本会对美国造成伤害。无论如何，只要美国处在正义的、武装起来的地位，它就能够把握它的未来，无论是反对日本还是德国，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①]。美国对日本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调停日俄战争过程中罗斯福的同情倾向于日本方面。不过，虽然他对俄国怀有恶感，但是他又要利用俄国牵制日本，因此不希望俄国在战后完全被逐出远东地区，让日本无所顾忌地在远东称霸。他认为如果日俄战争尽早结束的话，远东的均势不可能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战争继续下去俄国可能会失去它的东西伯利亚地区，最后无法同日本抗衡。罗斯福写信给洛奇说：“如果看到俄国被全部逐出太平洋沿岸，我将会感到遗憾……但是假如俄国拒绝和平，类似的事情必将发生。”[②] 诚如美国学者所言：“他不喜欢俄国，但是他不要它放逐出东亚或变得如此虚弱以致它不能牵制日本。”[③] 罗斯福的均衡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他所谓在远东地区实现列强的均势完全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罗斯福希望日俄战争结束后“为美国和其他商人打开满洲的贸易”。[④] 在调解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始终将中国排除在外，甚至不让中国参加朴茨茅斯会议，战争发生在中国领土上，中国人民对战争却没有丝毫发言权，这是极不公正的。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这是罗斯福将中国人民视为“落后民众”而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观点导

---

① 格拉蒂、戴维尼：前引书，第21－24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272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272页。
④ 比尔：前引书，第273页。

致的错误。[①]

〔美国调停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由于法国和德国的矛盾爆发了摩洛哥危机。1904年4月8日，法国和英国签订了《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10月，法国为瓜分摩洛哥又同西班牙签订密约，为了换取它在摩洛哥获得的全部权利，以同意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为条件作交易。但是德国对此大为不满，而坚持在这个地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1905年3月底，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出访丹吉尔并发表针对性的强硬讲话，宣称摩洛哥苏丹是绝对独立的君主，在承认苏丹独立的前提下，各国在摩洛哥享有同等的权利。后来，德国劝说罗斯福总统出面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1906年1月，国际会议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召开，出席国家有法国、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摩洛哥等14个国家。危机虽然缓解，但德国并不满意，因为会上意大利、俄国、英国和美国都支持法国，4月7日通过了阿尔赫西拉斯条例。“会议本身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但是罗斯福的作用鲜被理解，此次会议也极大地有助于理解罗斯福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想法”。[②] 其实，罗斯福是这次会议的实际组织者之一。德国竭力要求召开会议，英法坚决反对。美国从中调停。2月25日，德国首相比洛亲王给驻美大使写去长信，3月6日，罗斯福得悉信件内容：比洛要求美国支持德国在摩洛哥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德国对摩洛哥决无领土野心，只是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排斥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罗斯福表示他将指示美驻摩洛哥大使密切配合德国的工作。在给美国大

---

① 比尔：前引书，第289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306页。

使的命令中，罗斯福告诉他要同法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也要小心保持同德国驻摩洛哥大使的联系，让他知道美国总统已经指示他应该作些什么工作；罗斯福也希望他处理好同英国和其他国家代表的关系。罗斯福积极派员分别与英法政府沟通，了解各方意图。1905 年 6 月初，摩洛哥苏丹向各列强发出邀请出席会议。英国外长认为此次会议完全是德国反对法国的一个阴谋。罗斯福电告德国和法国政府：除非法国默认，美国将不参加会议。6 月 6 日，法国召开内阁会议，坚持反德立场与英国签订英法条约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辞职，内阁制订了对德国较为和解的政策，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罗斯福利用有利时机召见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他向德国政府表示，他将为会议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他告诉英国：如果法国同意参加会议那么英国不要为会议设置障碍；对法国，他坦率地说："我知道你的政府将会考虑我正在调停此事，但是因为摩洛哥问题预示着一场将破坏世界和平的德法战争，所以我认为我这样作是正当的。"[①] 罗斯福说服法国改变态度后，国际会议最终得以召开。

罗斯福在会议进程中继续发挥调停作用致使会议顺利进行。会议矛盾主要是德法争夺摩洛哥的权利问题，焦点集中在摩洛哥的警察和摩洛哥银行上面。德国企图与法国共同控制摩洛哥警察和摩洛哥银行。1906 年 2 月中旬，会议出现危机。罗斯福最终提出 4 点建议。德国接受了其中的第 1、2、4 点，反对其中的第 3 点。后经罗斯福调停，德国和法国都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修改方案，会议取得一定成效。法国政府感谢罗斯福为会议最后解决问题所作的如此繁忙的"个人活动"。德国首相感谢罗斯福为世

---

① 比尔：前引书，第 315 页。

界和平所作的“伟大服务”。[1] 但是，罗斯福在调解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的作用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2]

〔第二次海牙会议〕　如果说美国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上尚未显示其大国风范的话，那么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角色充分地表演了一番。罗斯福总统几乎充当了会议的中心人物。他为第二次海牙会议的召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04年，他首倡召开会议，由俄国沙皇出面召集。罗斯福写信给卡内基说：“要是我能与德皇，法国和英国的负责任的权威人士会面，我认为我能在这次海牙会议的事务中提供帮助。”[3] 在会议准备时期，罗斯福总统尽力与法国和英国政府举行会谈，他认为只要法国、英国和美国联合起来就能实现会议的宗旨。他还坚持要使会议获得成功必须根据现行条件，不能超越现实做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事。他说：“我相信只有在我们的条件下不要试图走得太远，在海牙才能取得一些实际的进步。”[4]

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海牙第二次会议举行。有44个国家参加。在美国的坚持下，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在美国代表支持下，采纳了阿根廷外交部长德拉哥的德拉哥主义，反对通过军事干涉向任何南美洲国家强行索取

---

① 关于西奥多·罗斯福在调停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中的作用，历史学家意见纷纭。一些欧洲历史学家多持否定与贬低的态度，部分美国史家也持相似观点。英国著名近代外交史学家乔治·果奇广泛使用欧洲的历史材料后肯定了罗斯福的重要作用。美国阿伦·内文斯认为亨利·赖特的文件“从一开始就证明美国在会议上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详见霍华德·比尔：前引书，第333页注28。本文从20世纪初美国力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的角度分析本事件，客观评价西奥多·罗斯福的历史作用。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9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292页。

④ 比尔：前引书，第293页。

债款。这实际上是对罗斯福处理委内瑞拉事件的肯定。会上，美国代表提出建立一个比第一次海牙会议建立的“仲裁法庭”更为有效的永久性国际法庭，法庭法官的选拔不考虑国家和外交关系纯粹从法学上考虑，美国想控制国际法庭的企图昭然若揭。会议最后通过了该提案的原则但不同意它的选拔法官的方法。

限制军备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罗斯福倾向于限制军备而不主张裁军。但是很多与会者认为罗斯福提出限制军备是不真诚的，他们尖锐地指出，罗斯福在 1898 年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他在 1900 年和 1905 年的演说足已证明他崇尚武力，反对限制军备。罗斯福为实现他的限制军备建议，早在会议开幕前就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他通过美国驻意公使征求意大利国王的意见。意大利国王认为限制军备将会招致全世界军火商们的强烈抗议，德国皇帝决不会让克虏伯限制他们的军火产量。罗斯福又想说服英国政府站在他一边。通过他的朋友历史学家乔治·屈威廉作为调解人，他写信给他说：“我认识到要达成他们限制军备的协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达成限制战舰规模的一些协议似乎是可能的。”① 罗斯福坚决要求英国同意将战舰限制在 1.5 万吨级。但是他的努力收效不大，因为俄国、日本，特别是德国坚决反对限制战舰吨级的建议。虽然罗斯福为限制军备作了大量外交工作，但是会议还是没有在限制军备问题上达成协议。会议仅在关于使用武力索债问题，关于地面战和海战中中立国家和人员的权利义务问题，关于敷设自动潜水促发水雷问题，关于敌方商船地位问题，以及关于战时海军进行炮击问题等等方面签订了条约。

美国之所以对限制军备和限制战舰吨位感兴趣，迫切希望在海牙会议上通过有关决议，完全出于它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当

---

① 比尔：前引书，第 295 页。

时美国海军力量虽然已有很大发展，但是尚未超过英国，而德国和日本则在加强海军力量方面不惜工本，军备竞赛的速度令人惧怕，构成了对美国的极大威胁，罗斯福的限制军备建议是要限制别人的军备，而不是限制美国的军备。“罗斯福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中的作用极大地表明了他自己对国际行动的态度，也极大地表明了用国际行动取得和平的困难”。[1] 但是历史学家们认为，罗斯福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中的作用不如他在调解日俄战争和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那样出色。他所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程度都有所不同。[2]

其实，罗斯福对国际争端的上述三次调解含义深邃，决非仅仅是受人之托涉足其间而已，而是美国政府的一种深思熟虑、老谋深算之举，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在20世纪初年的国际战略意图。罗斯福调解日俄战争，在远东使日俄互制，维持平衡，实现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如听任日俄两虎争斗不息，最后很可能导致日本在远东称霸，对美国构成威胁。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美国应德国之邀协调处理了德国与法英在非洲的矛盾，召开国际会议，表面上美国在非洲没有太多的直接利益，实际上美国的调停使德国与法英处于某种平衡态势，互相牵制，在国际政治中有利于美国的根本地位；罗斯福在筹备和召开第二次海牙会议中起了调解和某种组织作用，涉足全球性的裁军问题。从调解远东问题、非洲问题到全球性问题，从调解部分列强关系走向调解世界性的国际问题和列强的整体关系，提出限制军备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下，美国企图在各国限制军备之际乘机扩展本国军

① 比尔：前引书，第291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9页。

力，实现它在世界军事力量对比上独占鳌头的目标。尽管历史学家们议论纷纷，但三次调解活动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无可否认。一是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在调解过程中美国无形中被置于超越其他列强之上的地位，美国总统由中间人、仲裁者转化为带有某种决定意义的特殊角色；二是美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罗斯福成为和平使者，美国成为人类和平事业的保卫者；三是维护了美国在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当然，罗斯福的调解对所涉地区的和平和世界和平的维护有其不可否认的某些积极作用。

更重要的是，地区争端的发生和限制军备的争议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美国作为后起之秀，与老牌列强有矛盾，导致了美西战争，开帝国主义战争之先河；美国同新兴列强德国和日本也有争斗，对它们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美国政府利用这些矛盾，使列强互相制约，企图在世界上维持一种力量平衡和均势，不让某种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罗斯福总统热衷于调解国际争端，但他不是人类和平和正义的使者和捍卫者。他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玩弄权术，软硬兼施，信奉力量平衡，追求世界霸权的政坛高手；他是一位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处心积虑发展美国海军实力，决心让美国星条旗飘扬在所有新“边疆”的美国至上主义者。

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在国内受到强烈的反对，国会内外，政坛上下，社团民间，引发了一场广泛和意义深远的辩论。

六、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美国人民反对美西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

〔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　美西战争爆发前后，美国人民掀起了批判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浪潮。社会主义者从阶级分析的视角揭露美国政府对古巴的侵略行为的阶级本质，指出侵略古巴的目的只是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1898 年 4 月 27 日社会劳工党的《人民报》发表社论指出："古巴的自由只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战争，而战争仅仅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这种目的我们共和党内形形色色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思想上很清楚，并且答应在'爱国主义'的喧嚣之下，和蹚着没膝深的美国人和古巴工人阶级的血水来实现这一目的。"① 针对帝国主义者提出的所谓为了美国人的利益，社会主义者阿尔杰农·李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国统治者的所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的谎言，他说：它"并非指保护从事耕耘、播种、收割、摘棉花、开采煤铁矿、磨麦、织布、建筑房舍等美国人的利益。它指的是保护农场主、工厂主等以他人汗水为生的无所事事的资产阶级的利益。"②

深受种族迫害和歧视的美国黑人们从美国政府执行种族歧视政策的角度批驳他们的帝国主义的伪善论调，刘易斯·道格拉斯说："本届政府控制权所到之处，对黑人的歧视十分盛行。古巴、波多黎各、夏威夷和马尼拉的人民同在美国被迫害的印地安人和受凌辱的黑人一样，都很了解这一点。……企图让我们相信杀害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293 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294 页。

菲律宾人是为了一个好政府，是对生命和自由提供保护，是维护对幸福的追求，这是一种最令人作呕的伪善。”[①]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学者纷纷起来揭露扩张主义的严重危害。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萨姆纳著文《关于领土扩张的谬论》，从扩张和民主制度的关系揭示无限扩张会危害民主政体的后果，这种扩张会带来分裂的危险，他指出：“认为一个国家在取得了适当的规模以后，增进领土就等于增进财富和力量，这种观念乃是一种错觉。”无限制的扩张“极有害于共和制度和民主政体。……一切扩张都会给原有群众的内部结合赋予一种新的气质，带有造成新的内部分裂的危险。”[②]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唐纳写了《帝国主义的危险》揭露帝国主义政策的危险是“一个有关我们的民族希望和要求，有关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事业，以及我们盼望我们美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③]

1899 年 1 月 9 日，美国和西班牙的巴黎协定已经签订，美国国会对此进行表决通过，国会内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参议员亨利·洛奇等极力维护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占领菲律宾的侵略行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力排众议反对占领菲律宾，他从国家主权和美国《独立宣言》的根本精神出发批驳扩张有理、侵略合法论，说：“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问题就是，国会是否可以不经另外一个国家的同意和违背他们的意志，去征服和统治他们，是否可以征服和统治一个独立的、不同的和人数众多的民族，是否可以征服和统治一个以后不会有美国人居住，不会成为美国州的，而且不会参与完成和实现制定宪法所要达到日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299－300 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304 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313－321 页。

的的地区……。”[1] 他认为这样做与《独立宣言》所体现和列举的神圣原则毫不相容，也违背了美国宪法的宗旨。他气愤地说，美国开国元勋们决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由于胜利冲昏头脑而忘记这些神圣庄严的真理，以致穿上冒牌帝王抛弃的旧衣趾高气扬起来”；决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对一次胜利后的火药味和枪炮声感到兴奋，就像一个小孩对7月4日国庆上午的烟花鞭炮感到非常兴奋那样。”[2] 美国德裔政治领袖、全国文官制度改革同盟主席（1892—1901年）卡尔·舒尔茨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麦金莱总统对菲律宾继续开战使美国的代议制政府本身受到损害。美国《民族》周刊创始人、出生于爱尔兰的E·戈德金在《民族》周刊上著文反对美国的海外扩张。

反帝国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古金在1899年出版的《一组书面回答》中指出美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将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他说：“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要考虑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允许制定帝国主义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对我们自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3] 1899年，莫里森·斯威夫特发表《帝国主义和自由》一书，对麦金莱总统及其谋士的扩张主义思想进行抨击，指出美国占领菲律宾是犯罪行为。

在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正义呼声中，美国伟大文学家马克·吐温的批判以他特有的锐利和深刻著称。1901年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给在黑暗中的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了严厉谴责和讽刺：“是呀，我们对他们（菲律宾）一直如此友好，一直用如此多的方法使他们振奋起来！我们把枪支弹药借给他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307-308页。
②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12页。
③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14页。

们；用它忠告他们；用它交换他们令人喜悦的礼节；将我们的病号和伤员置于他们的友善关心之下；把我们的西班牙犯人交由他们人道和诚实的手中；和他们肩并肩地与‘共同敌人’（我们自己的用词）战斗；赞扬他们的勇气，赞扬他们的豪侠，赞扬他们的仁慈，赞扬他们的美好荣耀的行为；借用他们的战壕，借用他们先前从西班牙人那里俘获的强固阵地；安抚他们；欺骗他们——冠冕堂皇地宣布我们的土地和海军力量将给予他们以自由，并取代恶劣的西班牙政府——愚弄他们，利用他们，直到我们不再需要他们时为止；接着就嘲笑这个被吸干了的桔子，最后将它丢弃。”①

美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强烈呼声虽然最终没能阻止美国统治者向太平洋西部的扩张，没能制止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远东地区和拉丁美洲的血腥暴行，但是他们的正义之声在历史上永远闪耀着智慧和诚实的光芒，一个世纪后，美国学者这样说："然而回顾这些往事，人们也会深深感到反扩张主义者提出的告诫非常有力而诚恳；他们的合乎逻辑的论点从未被真正驳倒过……"②

〔反帝国主义同盟〕　除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外，美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还组织了反帝国主义同盟。第一个同盟成立于1898年6月15日，它在波士顿召开了一次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主持人加马列尔·布雷福德在演说中说，他一直反对美西战争，现在则是进行有组织的抗议，因为存在着美利坚共和国将成为一个殖民帝国的危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扩张主义是大会的主旋律。会上有人严厉批评美国政府占领西班牙殖民地的

---

① 格拉蒂、戴维尼：前引书，第13－14页。

②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73－174页。

行动破坏了美国政府所赖以建立的原则。美国不仅抛弃了他们自夸的门罗主义，不仅无视华盛顿提出的为后来政府一直追随的不干涉欧洲争端的明智政策，而且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肩负着陆海军的沉重负担，威胁数千英里外的复杂纷争。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并按照独立战争期间成立的通讯委员会那样选举产生了“通讯委员会”。[①] 美国杰出文学家马克·吐温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

此后，美国许多大城市陆续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同盟。虽然参加同盟的成员成分复杂，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共同谴责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如：1899 年 9 月成立的华盛顿地区的反帝同盟在纲领中写道：“它们的目的是，采用各种合法手段反对发动征服菲律宾土地或吞并或统治任何违背他们居民意志的战争。”[②] 又如：芝加哥大会通过的反帝同盟纲领批评了美国政府对菲律宾的政策，要求“立即停止由西班牙开始、并由我们继续的反对自由的战争”。他们深刻指出：“真正的火线不在马尼拉郊外。敌人就在我们国内。1861 年敌人的企图是分裂国家，1899 年敌人的企图是要摧毁立国的基本原则和最崇高的理想。”[③] 1899 年 10 月 17－18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万名代表聚会芝加哥，建立了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同盟。早年曾是美国内战和战后重建时期的激进共和党人的马萨诸塞州的乔治·鲍特韦尔，被选为全国反帝同盟主席。同盟总部最后从波士顿移往芝加哥。同盟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据 1902 年新英格兰反帝同盟的秘书报告说：“在这 4 年里，全国 8 个大城市里建立了同盟，它们出版书

---

①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 173－174 页。

②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 176 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323 页。

籍、小册子、演讲和传单不下400万次（册）。"[①] 其中有些书籍如：鲍特维尔的《共和国还是帝国》、戴维·乔丹的《帝国民主》、乔治·赫荣的《美帝国主义》等等有较大影响，流行全国。此外，还有一些宣传反帝国主义思想的通俗读物，文笔生动活泼。一本名为《自由问答手册》的小册子，问道："为什么一个民族不应该统治另一个民族？"回答是"因为所有民族都有与生俱来的和不可转让的自由权——有权以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以及自治或由选举产生统治者。"对"菲律宾人是否是美国敌人"的回答是"不……他们正在为他们的自由，正在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的权力而战斗。"等等[②]

总之，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扩张主义的呼声在美国已经汇成一股洪流，声势浩大。关于美国国内的反战和反殖民政策传播的情况，俄国驻美大使曾于1898年6月向圣彼得堡报告说："整整一半的美国人不赞成政府所采取的政策。"9月，他又报告了美国人民对政府政策"广泛而犀利"的批评，还开列了反对派中最突出人物的名单，如乔治·霍尔、参议员卡尔·舒尔茨、J·莫里尔、亨利·波特等。他的记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浩大声势。[③]

在广泛而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中，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治家和学者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各自的出发点，有的从社会主义思想出发，有的从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出发，有的从美国立国精神和宪法原则出发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有的从和平主义的愿

①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81页。
②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82页。
③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74页。

望出发，有的是从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种学、环境卫生学、工业主义和国际主义等视角作出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判断和思考。[1] 反战并不单纯是思想上的批评运动，和平运动也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果，1906 年成立了美国国际调停联合会，1910 年成立了美国司法解决国际争端协会，后又相继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和主要用于和平研究的卡内基基金会，1913 年还建立了教会和平协会等等。

---

① 参见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 年，第 152 页。

第三章

社会大变动和群众运动新高涨

20世纪初年的美国，由于新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步实现，美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换和变动。“工业化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是一股崭新的、强劲的力量，即使在它开始之刻，它就重塑着美国的面貌。”[①] 美国社会的变化是全面和深刻的，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到社会风貌和社会思潮等等，这种变化在总体和本质上是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它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改变，也使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信念、思想行为和方式随之发生变动。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工业主义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风貌。大规模生产刺激了移民，促使了城市增长，提供了支持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这个循环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诚如我们所见，也改变了他们考虑生活的方式。”[②]

---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272页。

② 格伦·奥尔茨库勒：《美国社会思想中的种族、族裔和阶级：1865—1919》，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82年，第76页。

巨大的社会变动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震荡和重新组合，导致社会利益的重组和再分配，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经济利益集团间关系的调整；社会的这种动荡和不平衡势必会引发社会不同群体发动的各类运动：工人罢工、农民抗争、妇女要求权利、社会主义运动、禁酒运动等等。群众运动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推动了美国社会各种改革运动，自下而上的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立法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汇成20世纪初年美国社会上的一场蔚为壮观的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实际上这场运动是美国人在整体上对工业化作出的强烈反应，它既是工业化所引发的结果，又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业化，实现社会新的平衡和平稳转化而采取的措施。进步主义成了美国20世纪初年的时代主题。“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反应是美国历史上的平民主义—进步主义时期的主题……”①

一、工业化带来社会大变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关键时期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社会就步入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北方和南方）才全面卷入了由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猛转变的全过程；20世纪初年这种转化进入关键时期，并取得了最后成功。美国的乡村和小城镇都卷进了城市化的浪潮。“工业主义的作用——有时是它们的结果，即城市化——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对城镇的意义是深远的。许多城镇卷进了这

① 塞缪尔·海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1885—191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3页。

个热潮，它们相信如果它们不加入进去就会死路一条，一些城镇则表示忧虑并企图瞒报城镇人口的数字。总之，与进步一起成长的信念占据了他们。"[①] 虽然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但是小城镇和农村的人口仍有一定增长。因为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在大幅度增加。"事实上在 1880 年至 1920 年间，大多数小城镇和村庄的人口还在增长——虽然不如城市增长得那么快。"[②]

〔美国城市和农村〕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化。农业社会与城市社会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简单加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种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有环境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交通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这种区别也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有深层次的、有浅表的，有形式上的，有本质上的，有外形的，有内在的。"农民本能地认识这条界限，知道什么时候他已越过了界限，明白他自己已经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但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究竟何时由乡村进入了城市呢？"

工业化促使社会变化，但社会变化较工业化更为复杂和深刻。政治革命往往带来许多戏剧性效果：轰轰烈烈的政权更迭，权力斗争，阶级搏杀，暴力与战争；工业革命则在无声无息中进行：工厂林立、水坝拦河而筑、高楼拔地而起，汽车火车奔驰大地；社会革命完全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习俗、社会生活甚至包括服饰等等悄悄地变更着。这是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变化，更具群众性、广泛性和

---

① 理查德·林吉曼：《美国小镇》，G.P. 普特南后裔出版公司，纽约，1980 年，第 359 页。

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 328 页。

深刻性。正是它几乎是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同步发生着。

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多样性和农村的单一性方面。城市是一个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代城市社会更是大工业的产物。就环境而言，城市是一系列环境组成的复合体，“城市”不是单个环境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系列环境。例如一个3000人口的城市很明显地不同于一个300万人口的社会环境。多样性的基础是城市社会的经济结构，城市内有各种经济成分和经济类别，因而在就业方面城市人的职业呈现多样性。就个人而言，城市和农村最明显的不同是职业的不同，在城市除了农业一切都有，在农村只有农业。城市生活、习惯和工作的多样性都是环境造成的。在这种环境里可以发现大量的多样化的职业。

其次，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异表现在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不同。诚如奥斯瓦德·斯宾格勒所说：“农村人和城市人有不同的本质。首先，他们感觉到这种不同；接着他们被这种感觉所支配，最后他们停止了相互间的理解。”[①] 人的差别是环境造成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最后都集中在城市。诸如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中心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接受了经济革命无数变异的所有力量，已经成为社会变化的热气腾腾的巨锅。在这种巨锅中养育了现代城市人，一些来自农村的人在巨锅中也变成了城市人。美国学者沃伦·威尔逊在191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农村与城市的挑战”的报告，他的陈述和观点反映了当时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中的某些基本的社会特征。他认为美国城市与农村的差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15页。

别的基础在于人，即美国人被分成为两种不同的层次：城市人和农村人。美国农村主要由老移民构成，很少新移民；城市中却充满着新移民，因而城市社会反映了这些新移民的特点和活动。老移民的结构较为单纯，基本上是来自西欧国家的移民先祖及其后裔；新移民特别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新移民大多来自中欧、东南欧等其他地区，成分复杂。他从老移民和“新”移民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美国的城乡差异不无道理。关于城乡差别，乡村生活运动的领导者比迪·贝利还从农民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解释，他写道：“乡村生活最不足的一个地方是它在社会和经济方式两方面都缺乏组织或凝聚力。农民分散的原因是他们地产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缺乏使他们联合起来行动的这样的一种共同感情。”①

再次，城市和农村的反差还表现在某些社会习俗上，农民缺乏相互间的联系和沟通，许多农民局限在土地上，干他们的“事业”，难以理解土地以外的事物；城市人却有着多样化的思想。各种高度专业化的思想模式、工业人物、机器和企业成员都来到城市。他们给城市带来了机械的、行政的、充满渴望的、乐观的和幽默的社会。农村却缺少这样的多样性，缺乏那种在城市已经过剩的原创性的因素。沃伦还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若干方面的差异。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形式不同。城市流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但是农村却没有这种经济形式，他们的合作仅仅建立在农村邻居的天然合作伙伴的关系上。小城镇的社会生活是直接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也是最接近农村社会生活的。“这些市镇和村庄成为周围农业居民采购物品与寻求娱乐的中心，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②开始时小城镇内居民可以根据居民房屋的颜

---

①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329页。

色和特点认出户主，后来城镇规模扩大建立了邮递制度，各家各户设立了门牌号码。但是一些喜欢农村生活而常常聚居一起的人们常常抱怨住宅号码，而喜欢离开农村的妇女则用她们的住宅号码显耀她们对城市生活的理解。

城市虽然人口多、区域大，但城市人之间却缺乏相互联系和关心，因此孤独感常常成为城市人的心理特征。农民刚到城市就不适应城市这种孤独的生活。谢乐伍德·安德生在描绘俄亥俄温斯伯格市的一个农村孩童时说，他随他父亲从农村来到城镇开店营生，但是害怕温斯伯格人对他家的态度，他们称他家很怪，至少他认为他们是这样看的。最后他只好回到农村继续他的农村生活。他说："我们出外谋生时，生活全变了。我白天劳作晚上睡觉。我常常因为见不到人而只能像现在那样冥思苦想而已。傍晚，我到邮局或去车站观看火车开来，没有一个人同我说话……"①。孤独成了城市人的特点，诚如19世纪90年代的一位教士所写："在城市人们很少有邻居意识，你也许会与邻居仅仅间隔数英尺，而数年不见他的面，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孤独导致自杀成为当时美国城市中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美国社会的自杀率也不断上升。1860年为10万人口平均3.18人，1922年则上升为11.9人。②

与城市市民的孤独相反，美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村民们起得很早，息工时尚有余力。因此他们有余暇的时间相互娱乐和聊天，社会交际活动频繁。妇女们干完了她们的家务活后就常常会与邻居们交谈，内容广涉婚姻、孩子出生、意外事故或死亡等。各种传闻户户相传，家家知晓。一些年老体衰已不务农活的农民

---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59页。

②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19页。

则数年如一日地每天与人围绕庄稼和气候直至病逝或再婚等话题，谈论不休。这些活动非常适应家庭和社区的关系。在农村邻里关系十分密切，人们遇到病痛或灾难就会很快得到富有同情心的邻里的同情和关心；同样人们做错了什么事也会受到邻里的评论和指责。农民们的聊天成了非正式的法官和陪审团。人们经常通过聊天形成一种价值判断或舆论，对规范人们的道德起着重要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教堂和会议室往往是农村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地点。正规的组织都有一些规则，成员都是经挑选的，因此一些小小的过失污点可以限制人们参加包含于整个社区在内的社交活动。农村的社会活动不如城市丰富，但是在周日，教堂的钟声响彻全镇。主日学校也逐步标准化。此外教堂还募捐钱物和庆祝节日，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婚丧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小村镇凡遇婚丧事宜，邻里亲戚都会成群出席。特别是金婚纪念，隆重非凡，这不仅是因为能实现金婚的老人稀少，而且人们也喜欢以此证明小镇上的婚姻更为稳固。此外，乡村集市和集会也是农业社会的一种常见的活动。有的地方每年举行数次，参加人数众多。这种活动后来遗存到城市社会，适应了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变化，赋予它以新的内容和形式。

城市和农村在文化设施上也存在着明显差距。20世纪美国城市学校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在农村学校中保守主义的影响超过了对其他各类机构。当然，20世纪初农业科学在美国全民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农村思想。当时正在兴起的农业大学和各州建立的农业部和国家农业部对农村的影响也促使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方向转化。城市和农村的宗教和教堂也有差异。在城市中，一些新教教堂和教职人员面对城市中激增的犯罪活动和道德沦丧认为城市是非教徒们的“家”，并看不起城市中的劳动阶级，所以当某地区住满了劳动群众以后，教堂就

往外迁徙。如：芝加哥某地区有6万居民却无一所教堂。[①]

但是城乡最广泛的差别是两者的精神生活，农民认为自己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城市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消费者。虽然农民现在也是某些商品的购买者，但是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生活。他们依然将眼前的大多数商品看成是在他们拥有或租用的土地上，甚至是他们家屋里生产出来的。这种观念导致他们产生独立于城市和瞧不起城市人，甚至对有关城市的事物产生对抗的态度。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当时美国大致有3种看法：一是认为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互不联系，相互独立；二是认为两者相互对抗和竞争；三是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紧密联系，互为因果，认为“美国历史上，城市增长与畜牧业的系统理想主义的发展和对农业的特殊教育的增长相一致。”[②] 美国学者德格勒认为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物质方面有差异，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习惯上也产生差异，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往往依赖于气候、季节变化，因而农民中间缺少一种公共意识，缺乏一种公共土地、共同未来、共同命运的意识。他们的家庭较为闭塞。城市人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职业，城市家庭与社会发生较为紧密的联系，甚至它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城市人每天进进出出，事业或成或败。城市本身的面貌由城市人亲手建造或由他们亲手毁灭，而农村生活却犹如自然本身自生自灭。因为城乡在文化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明显差距。19世纪90年代美国出版的《人名词典》所收人物中城市人的比例是农村人的2倍。[③]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158页。

② 《美国年鉴》，第14卷，第88页。

③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18页。

但是20世纪初年，美国城乡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已开始进一步接近、同化和相互依赖。农村向城市的转化进入关键时期，其中农村的主体——农民则在转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农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应〕　工业化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活动。美国人如何对这种转变作出反应？如何适应他们已经缠入的商业和金融网络？如何对城市生活方式渗入他们占统治地位的农村文化作出反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如何看待新移民？农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新的城市中心根本改变了小城镇和农村的文化模式。农民妒嫉城市日益增长的人口、财富和力量，但是他们也害怕陌生的新利益和活动使城市产生懒散闲暇成为可能，害怕移民中出现的机构。这种变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迫使他们去维护他们在州和国家中更广泛生活的权利，去转变植根于农村并在整个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农村社区的居民感到他们的生活模式，即他们认为是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①

接着，农民似乎开始认为工业化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选择。一般说来，随着工业化的开始，美国人对工业化就作出了反应，美国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深和加剧了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反应，加强了对这种迅速变化的冲击和适应。20世纪美国人开始慢慢学会如何在一个新的工业制度下生活，他们无法去选择，更不可能去摧毁这个制度，只能慢慢地去适应它，渐渐地融入这个社会，最后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整体美国人而言，"组织起来"是对工业化的最基本的反应。美国学者塞缪尔·海斯认为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反应是：不是组织起来就是灭亡。他认为："个别的企业家、农民、工人无法对付非个人化的价格—

① 海斯：前引书，第110页。

市场网络，但是他们立刻发现他们作为集团就能够应付这可观的力量，因此个体经济企业让位于集体企业。生产者联合控制他们出售自己商品的条件；分配者联合起来影响市场和交通；工人们组织工会与管理者对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农民和工业品消费者联合降低买卖价格；只有城市消费者没有联合起来。这种组织革命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形成势头，并以日益增长的力量继续发展到 20 世纪上半期。"① 美国农民面对工业化对农村的冲击也曾经组织起来进行抗争，但是，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滔滔洪流蓬勃奔腾汹涌，农民们在强大的工业力量的推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旋涡，跨越了由农村进入城市的门槛，慢慢地城市化，慢慢地转化为商人、企业主。

在转化进程中，一些农民还是希望保持他们原来的农村生活传统。面对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民们还是顾虑重重：他们害怕建造农村公路只是为了城里人的利益，他们只希望建造农村通向市场的公路通道；他们担心农村学校为城里人控制，他们的子女接受的全是城市教育；他们担忧科学务农将会改变他们传统的耕作方式，让他们放弃世代相传的传统经验等等。在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潮流中，一些农民还是不理解、不放心，他们在无奈接受新事物的同时，还不时进行一些有限的抵制和抗争。

他们不仅抵制这些由城市鼓动起来的所谓新生活运动，阻止运动对他们生活方式的进攻，而且还在 1893—1897 年萧条以后发起反攻。农村地区积极支持立法机构通过限制移民的法令，以保护美国的本地文化免遭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那种以农村为基

① 海斯：前引书，第 48 页。

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有着相类似的动机：反对对圣经作较自由宽松的解释，主张提高城市社会对教会的关注，保守的宗教领袖重新宣扬对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信念。在数量众多的乡村教会里，教会领袖们抵制将权威看成真理源泉的批评，这种反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09年，两位加利福尼亚石油百万富翁资助出版宣扬这种观点的《基本原理：对真理的证明》，很快销售了300万册。[①]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初美国的禁酒运动也是农村抵御城市“侵犯”的一种反应。禁酒运动的目标主要针对城市的沙龙和城市酒鬼。禁酒运动的发动者认为城市政府的主要罪恶是因为政府官员和沙龙所有者结成腐败联盟所致。在一些农业州，反沙龙联盟建立起州级范围的禁酒法令，从1907年佐治亚州开始直到1916年，至少在美国南方和西部有14个州实施了禁酒法。其实与农村比邻的小城镇也有类似现象发生，“城镇对红色，激进，工会，外国人，移民，沙龙和酒精，天主教，一定程度上的犹太人——所有大城市的弊病都持反对立场。”[②]

尽管农民对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强烈反应，但时代潮流还是不可逆转。美国人向城市移居的进程无法阻挡，美国实现工业化的形势日新月异，美国终于成为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美国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化。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得好：“美国诞生于农村，移居在城市。”[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美国的城市社会包括大都市和中小城镇都是一种新兴的现代工业社会，而传统的农业社会本身

---

① 海斯：前引书，第113－114页。

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340页。

③ 约翰·卡里和尤里乌斯·温伯格：《社会经纬：内战以来的美国生活》，小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顿，1978年，第77页。

也发生了向城市转化的变动，这是一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农村中诞生的美国终于成功地“移居”到城市，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和城市社会。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种对城市社会的恐惧和不安的思潮，托马斯·杰斐逊崇尚农村社会，认为城市社会将给美国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甚至道德沦丧等等。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认为是边疆而不是城市创造了美国文明。但是城市化毕竟冲破了美国农村的宁静和稳定，不顾人们的忧虑和担心随着工业化的开展新兴城市蓬勃兴起。美国人大批大批由农村涌向城市，或在居住的农村田野矿山上亲手建起新城镇，星罗棋布的城市成为美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已成普遍现象。“在本世纪最初的20年中，北部和中西部小市镇和乡村几乎每家至少都有一个人变成了城市居民。”[①] 农村向城市转化逐渐模糊了城乡社会的面貌。“随着向城市的移民，美国的‘城市’与‘农村’社会不再是遥远的两极。……犹如战后的两个国家，他们打开了边界，逐步交换民众，设置交通线。城镇在经济上已同城市连成一起，城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城镇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商品的消费者，同样在思想上也是如此。”[②]

〔农业人口的部分城市化〕　20世纪初大批美国大中城市的崛起和发展，使多数美国人从以前的农村社会转向全新的城市社会，过起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甚至连小城镇的人口比例也下降不少。“城市化时代有意义的变化是居住小镇的总人口的百分比在慢慢地下降。例如：在1903年的中西部，少于5000人口的乡镇总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8%，但是1932年则

① 德怀德·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1页。

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392页。

下降为16%。"[1]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城市是美国工业化最重要的成果，犹如内战前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是南方农业发展的产物一样，犹如北方的小农场制度是北方农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那样，美国城市在19世纪末已第一次成为全美国生活中的主导因素。城市成为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进步的中心，城市民众创造了全新的社会需要：要求城市社会具有更好的照明，便捷的交通，高层而舒适的建筑，优良的文化品位和精神生活。因此在城市中可以找到最好的教堂，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博物馆、文化艺术走廊，最好的书店和最好的剧场等等。同时，美国城市往往具有一种非常类似的特点，即相似性。美国的城市除了大都市如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等以外，典型的美国城市大都是"千市一面"，城市面貌和结构都"似曾相识"。因而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城市相互间的差异仅仅在于一些城市在建筑中使用了较多的木料，有的使用了较多的砖瓦，仅此而已。许多地方都是差不多的棋盘格式的布局，街道整齐划一，商店、邮局、银行几乎按照同样的格局安置有序，主街上有相似的银行和邮局，有同样的带着良好设施的旅社，同样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匆匆地忙碌着……，甚至还有相同的街名。当然农民进入大城市所感受到的反差较之进入中小城市更大，因此更不易适应，但是城市毕竟是一种新的社会，与农村相比毕竟存在一种质的差别。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美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作为组成新社会的每个个体同样经历了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缓慢过程。这正是社会转型的艰难之所在。"大多数美

---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329页。

国人适应工业化是缓慢和痛苦的。”[1]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城市社会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与农村大相径庭有天壤之别。城市社会的生活节奏紧张而有序。工厂、公司、机关、学校和行政管理部门等等都有严格的管理体制和严厉的纪律。其次，城市虽然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失业危险始终像阴影一样笼罩在人们头上，城市的生活条件优裕但费用昂贵，城市生活富裕舒适但社会问题复杂，犯罪率高，污染严重，城市人容易受到各种诱惑，稍不慎就容易跌入罪恶的深渊，因此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巨大。再次，城市人之间的关系远较农村人疏远、冷漠和缺少关心。在由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民适应了新社会的环境，生活得更好，但也有一些农民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而回到农村，有的则被城市生活的激流所湮没了。“每个市民在从乡村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生活方式的时候，都不得不适应精神紧张的环境，新的饮食习惯、新的休息和娱乐方式。他们不能不完全适应一种先赚钱后花钱的体制，这种体制因有失业之虞而受到限制。公寓住宅，有浴室、暖气、电灯并且还要同邻居相处，这总是比不上以前的菜园、花草和新鲜空气。有些人对于这种变化能够很容易地很好地适应了；其他的人在罪恶和犯罪的莫大引诱下动摇了；另外还有一些人由于身心机能和习惯遭到不可避免的扰乱而感到不同程度的痛苦。”[2] 经历了这种变化，许多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他们随着市场经济海洋的波涛而驶入新生活的彼岸，进入了新的城市生活的层次。关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美国学者以一小镇为例加以说明。在俄克拉何马的安吉代博镇周围的农场从1900至1907年间农业人口降低了25%。大

① 海斯：前引书，第24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43页。

约有一半农民出卖掉土地进了城，在那里从事建筑房屋、地产买卖等，其他人则到邻州尚未开垦的土地上务农；留下的人大多是北方人，他们虽然讨厌那里的气候但必须住满必要的5年才能获得土地，然后将其出卖外出。稳定不走的是来自肯塔基的农民、德国人和其他移民。但这不是典型的，大部分农村的农民是移向周围的小城镇或更远的西部。来到这里务农的外国移民通常是优秀的农民。[①] 而留在农村的农民们同样经历着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化。

〔农业社会中的新气象〕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劲春风吹皱了农村平静的生活湖面。农村出现了新气象，农村变了样：公路和铁路筑到了田野，工业品涌进农村，电器产品给农村带来光明和温暖，时髦服饰在农村展现，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大多是关于城市的新闻。农村现代化了。

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但是农村的新面貌却日新月异。20世纪初的美国农村不再是传统的中世纪的农村或殖民地时代的农村了，它已经逐步变成现代的农业社会。工业化给农村带来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机械代替了人力和畜力，电力给农村带来活力和光明，公路修筑到了偏远乡村，火车进入山谷旷野。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农村生活运动”，领导运动的学者们提出了建立农村公路、建立农村学校和改进农业技术等等目标。其中科学务农的开展影响最大，科学务农就是科学种田。为此各州都陆续建起农学院和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们传授科学知识和科学兴农的道理，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州农业学院和试验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学的发展。领导者们还进一步建议每县都必须拥有一位农业专家对农事提供指导，这对科学种田大有

---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331页。

裨益。1912年纽约县设立美国第一个农业专门家。美国植物学家利比迪·贝利，于1903年至1913年间任纽约州立农学院院长，他和其他农学家领导了"农村生活运动"，目的是通过对农业科学化和农作物的改良使乡村生活更富吸引力和更有利可图，把城市社区的优惠带给农村地区，防止农村人口的衰落。他的各类措施后为各县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粮食压力巨大，对农业专家寄予更大希望，"农村生活运动"因而大为推广，收效显著。

美国农村在20世纪初的新面貌还表现在经济方式上的深刻变化：20世纪初美国的农业已经成为全美国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并且卷入了世界市场。美国农产品不仅满足了美国城市人口的需求，而且为国际市场提供商品。农业商业化使农民的生产变成了商品生产，他们不再为满足自己和自己家庭的需求和生计而劳动，而是为了出卖商品而生产。这样，商品经济像强酸一样把农村自然经济的经济模式最后彻底瓦解和溶化，使美国农村完全成为生产商品经济的基地，这正是农业现代化的特征之一。这样，美国农民要根据市场需求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

美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市民化"。城市的存在对农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当然是肯定的和建设性的影响，城市的存在也越来越趋向去干预和组织农村生活。如：现在提供牛奶的农民必须根据城市需要送奶进城，即要间隔12小时，每天上午4点到下午4点向城市居民提供牛奶。其他农产品也必须按城市的需求组织供应，根据城市生活规律运输和销售。城市已经成为美国农民思想中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必须根据城市的需要组织劳动，并使之更加工业化和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减低产品成本，参与竞争。

农民的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他们的吃、穿、用、住越来越变得像城市居民了。1901年，当时美国农业统计员乔治·霍尔姆斯告诉工业委员会说："这是农民的新时代。他们远远超过了以前，现在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廉价而精美的图书和期刊放置在客厅和起居室的书架和桌子上，较之以前，他们更多地外出旅行和长途旅游。他们的孩子受到比他们自己孩童时代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穿戴比他们儿童时代优美得多。他们比以前更经常地与城镇生活联系起来。"[①] 关于农民生活受城市影响的问题，早在1896年美国社会学家法兰克·吉廷斯就这样说："孤独的农民和他的家庭已经开始以悲惨的方式受到现代生活情调的影响。他们不再对城市奢侈生活熟视无睹，他们不再满足俭朴的生活方式。房屋需重新改装和修缮；桌台要多式多样；衣服一定要'时髦'，马匹、马车和马具一定要豪华。"对此德格勒认为："20世纪初的年代里，城市价值观已经渗入农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无法谈论城市和农村生活间的明显区别；现在仅仅存在城市主义的不同程度而已。"[②]

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伴随着经济革命，社会结构的若干变化发生了。"[③] 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势必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异，变化越烈，变异越大，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初步实现使美国国内的社会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26页。

②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29页。

③ 雷蒙德·麦克、卡尔文·布雷德福：《转变中的美国：社会变化模式》，兰德出版社，纽约，1979年，第70页。

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关系更趋复杂。随着城市的增加和扩大，社会结构和分层，城市人之间的差异也扩大了。

新阶层的出现和旧阶级的变化构成了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美国的社会结构变了，支撑美国社会的构架变了，犹如化学反应一样，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级和阶层重组和分化的过程，一些新质产生了，某些旧质消失了。

〔大企业家阶层的出现〕　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已经明显地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大企业家或垄断资本家的阶层。

大企业家群体，即垄断资产阶级，他们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扩展和大企业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最终成为美国社会中经济上最富有、政治上最有势力的群体和阶层。他们比一般工业资产阶级或中小企业家有更大的资本和实力，他们在美国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他们垄断了美国的国家经济命脉，操纵着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金融，各垄断集团间还存在极为激烈的竞争。（详见第一章有关章节）

这个阶级和阶层是美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部分，是垄断资本的人格化。“财富如无尽的江河一般，源源不绝地流入那些设立公司、修建铁路、开办电话电报，和开发这个新工业帝国的天然资源的人们手中。”[①] 这些人还通过开办银行和金融机构敛财，他们的财富如滚雪球似地膨胀起来。1917年，这个占全国人口1%的最高阶层的收入竟占全国总收入的14.2%，包括了全国红利收入的72.4%和全国利息收入的45%。[②]

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有权势的阶层。他们通过对总统选举的资助和各种经济手段在美国政府中寻求代理人和代言人，贯彻他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27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93页。

们的政治主张；或在幕后与政界巨头进行政治交易。有人认为当时一些百万富翁的威望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总统决定某些重要政策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们在社会上人数少、能量大。他们往往具有极为强烈的追求财富的欲望，敢于冒任何风险的精神，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品格；他们在商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政界玩弄权术、纵横捭阖。

一般说，他们信奉个人主义，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制造商协会在 1904 年的章程中公开“拥护个人主义”，他们宣称：“我们坚持这样一个理论原则，即个人是权威的单位、权力的单位和发展的单位。”具体而言就是“工厂老板有经营他们财产的绝对权利，并且必须保持这些权利，使之不受任何一伙匪徒和违法者的侵犯。”他们对产业工人和工会抱有敌意。一个铁路大王曾经说过：“去他妈的群众！”[①] 在劳资关系上，他们鼓吹只有劳资合作成为合伙人才能创造财富并使生产增长成为可能。[②]

〔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早在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小城镇中已经出现中产阶级，他们“包括杂货商，商人，店主，手工业者，职员，医生，律师，牙医，教师，牧师，簿记员，小官员——受人尊敬，勤奋的，敬畏上帝，早睡早起，留意邻居评价，一心赚钱不违常规的。”[③] 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些中产阶级生活发生变化。就其居住条件而言，19 世纪 90 年代的城镇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住宅是“宽 25 英尺，深 125—150 英尺，紧靠人行道，后面还有一个花园。……内置老式家具，底楼是客厅、厨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第 188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4 卷，第 23—24 页。
③ 林吉曼：前引书，第 170 页。

房、餐厅，楼上是3—4个卧室”。[1] 随着大企业的崛起，中产阶级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初与美国大企业与生俱来的不仅是一批大企业家，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白领阶层。“这个时期，伴随大型工业企业的出现俱来的是一个管理官僚阶层的增长——白领工作力量集中在新的市中心的办公大楼中。”[2]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从1870—1920年制造‘另一半人’和贫民窟的同样力量也创造了他们的对立面——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城郊区。”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从1870年的75.6万人扩展到1910年的560.9万人，人数扩大了大约7倍多。白领阶层的形成壮大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大企业的出现，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产生了一个以薪金维生的管理阶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技术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其中包括企业中的中低层管理人员和企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包括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教师、律师等等。从城市的居住状况分析，一些贫困的阶层留在市中心地段，一些富有者则往郊区转移，在那里建起独家居住的别墅。在城市中已经形成居住城郊的阶层。根据美国学者萨姆·沃纳的研究，1870—1900年波士顿已经有一批居住在城郊的社会阶层。他们希望居住在收入丰厚的人群中间。他们在城郊建起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私人别墅。他们告诉城市工人只要他们积攒了足够的钱财，他们也同样能拥有舒适和成功的象征：私人别墅。城市工人梦想能为自己的家庭得到这样的城郊式的居住条件，但是成功者毕竟不

---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291页。

② 雷蒙德·莫尔：前引书，《新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美国：1860—1920》，第40页。

多。而一些中产阶级成员则迁往城市边缘地区，居住在朴实的公寓或独家居住的房屋中。

但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稳定，一部分人可能爬上富人的阶层，一部分人可能坠入穷人的行列。他们向上看着上层人士的豪华生活时充满憧憬，向下望见“另一半人”的痛苦生活时不寒而栗。诚如一位学者所言：“新城市中产阶级的成员——经济管理者，热心城市社会改革者，国家文化的仲裁者，引人注目的商人和向上爬的钻营之徒——他们因恐惧和害怕被迫注视着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因多种原因被拖入这个另一半人中去。”[①] 此语较为真实地揭示了美国中产阶级人士因多种原因沦为下层人士的事实和他们害怕成为“另一半人”的心态。

〔*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及其境遇*〕　“随着工厂制度和固定资本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自由劳动。”[②]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工人队伍增长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工厂已经成为城市构架中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区域的扩大，工厂规模和数量也随之增大，导致产业工人数量激增。其次，城市本身的发展又产生了市政建设的新行业，这些行业需要大量工人。如：城市的水处理和水供应需要建造大量水厂。1890—1920 年间，美国建立的水厂从 1878 家扩大为 9850 家，而受惠于过滤水的人口从 31 万扩大为 1700 万人。[③] 其他诸如煤气厂、公交公司等等都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更需要成千上万的产业后备军，大批新矿山、新工厂、新铁路、新公路的建造开拓吸引大量劳动者加入工人阶级

① 戴维·利维廷编：《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雅各布·里斯）》，圣马丁出版社，纽约，1996 年，第 29 页。

②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 57 页。

③ 查尔斯·卡尔洪：前引书，第 104 页。

的队伍。1890年美国大约有2300万人参加劳动，或是总人口的37%是劳动者。1900年，工人标准的工厂劳动时间是每周54—60小时，每年为3000小时。[1]

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从1865—1920年的半个世纪里，使美国社会发生转变的结构性变化也继续重组了工人阶级的构成。"[2] 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超过50%以上的成人都不是雇佣工人，1920年美国成为城市国家后，绝大多数的成人已成为被雇佣者。在1870至1920年间，约有1100万美国人从农村来到城市，2000万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大部分在城市定居。从1900—1920年，美国整个劳动力增长几乎高达50%时，非受雇者包括农民在内仅仅增长10%左右。

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进步主义时代一些政府和私人的社会工作者对当时纽约市的工人家庭收入作过估计，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最低的健康和生活必需开支估计是，一个4口之家是每年收入在800美元到876美元之间，单身是505美元，一个劳动妇女是466美元。但是联邦、州和私人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工人实际收入低于上述标准。如美国移民委员会对1万名工资收入者的抽样调查发现，他们的平均年收人最高为413美元，将近一半的人收入低于400美元，女工收入是男工的一半，她们中的三分之二的收入低于300美元一年。移民家庭收入更是微薄，据统计一个移民家庭的平均总收入（包括丈夫、妻子和孩子的）都在上述必需生活费（每年800美元）以下，特别是新抵达美国的移民。纽约州工厂调查委员会（1911—1915）发现了同

---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73—74页。

② 梅尔文·杜波斯基：《工业主义和美国工人：1865—1920》，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75年，第3页。

样令人沮丧的证据，在对109481名工资收入者的抽样调查后，据报告，绝大多数人收入是每周10美元，其中15—30%的作为新手的劳动力仅为3美元至6美元。委员会发现纽约市的各类低收入工业中心工人的平均收入都低于最低生活费用标准。两位调查女工情况的人员发现每5名女工中有4名需要外加补贴始能达到州委员会提出的健康和生活必需的最低标准。一位女工埋怨说："我不是活着，仅仅是存在着。我无法如你称为生活的那样活着。……我要花多少个月的时间才能积攒点钱买一件衣服或一双鞋……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最艰难的挣扎。"据1910年调查，波士顿非熟练工人每周只挣9—12美元，而且每年还失业多时，全年总收入更低。

工作条件的低劣使工人过着工业奴隶的生活。据美国学者的研究，马萨诸塞的纺织中心劳伦斯城是全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城市。在匹兹堡这座钢铁城市中，钢铁工人饱受痛苦生活的折磨。一位报告者说："他们（工人的孩子们）的脸色显得特别衰老，他们的目光中显露出早熟，这都是每天不是为生活，而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结果。"明尼苏达的矿工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心酸地说："如果我们要吃就没法穿，如果我们要穿就没得吃。"在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山区煤矿中，工人们就像工业奴隶一样在封建式的矿主的统治下。

低收入的工人们在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下劳动时间又特别长，直到1920年，技术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平均为50.4小时，非技术工人为53.7小时。钢铁工人每周平均63.1小时，一些基础流程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7天工作。超负荷的劳动导致经常发生工伤事故的惨剧，工人死亡率激增。在西部工业地区，1880—1900年每年有35000名工人死亡，536000人受伤。

更可悲的是，工人们还在工伤事故中牺牲大批无辜的生命。

1909年伊利诺伊的彻丽镇的煤矿爆炸中180人死亡。1911年纽约市一个现代的"防火顶"工场发生大火，146名劳动妇女和姑娘被大火吞噬。1917年夏蒙大拿州164名铜矿工人在矿井中被烤炙致死。[①]

对整个工人阶级而言，他们都还面临失业的危险。美国的经济危机和萧条造成阶段性的失业循环，劳动方式和气候的变化形成季节性的失业，新机器取代劳动力会造成结构性的失业。如：1908年到1909年短暂的萧条引起广泛的失业，1913—1914年更为严重。经过1901—1907年相对繁荣以后，在1908年至1915年间失业人数占国内劳力的4.4%，其中3年高达8%。又如：纽约州劳动局统计每年6月和12月的失业情况时发现超过10%的非工会劳力在上述时间处于失业状态，1913年由于经济危机和一系列罢工斗争，纽约40%的成衣工人和25%的建筑工人没有职业。失业必然造成贫困。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亨特研究，世纪之交时波士顿和纽约几乎有20%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亨特认为，每4个工人中有1人的年收入会因某一个时期延长数月的被迫失业而锐减。[②]

美国的产业工人因为与大规模生产相联系所以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当时美国社会中一个凝聚力强大和组织得最好的群体；由于受资本家剥削因而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精神。19世纪末全国性工人组织已经出现，并且领导工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取得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一些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再次形成（详见后面的工人运动）。美国产业工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

---

① 本节有关美国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均引自梅尔文·杜波斯基：前引书，第17—20页。

②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22页。

中数量最多、最有组织的队伍之一。

劳动者的业余生活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研究当时工人群众的业余生活状况有助于对他们的处境作出整体性了解。美国学者罗伊·罗森兹维格对伍斯特市进行调查研究后写成专著《从酒店到剧场区：工人和电影》，反映了劳工阶级的业余生活。他在书中对工人的业余生活，特别是与电影业发展的关系作了大量描绘。他认为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沙龙的衰落和电影的兴起是紧密相连的。“当伍斯特市沙龙开始进入内部转变进程时，一个劳动阶级休闲的新形式发展起来——电影——证明是一个从族裔劳动阶级生活中心取代沙龙的非常强大的力量。”[①] 1910年对1000位纽约劳动者作抽样调查发现，虽然5分钱电影尚未将沙龙逐出休闲界，但是平衡已经打破，调查者中的60%人在电影院度过休闲时间，仅30%的人常去沙龙。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电影已经作为普通劳动者休闲的最普及的形式，而且每周几乎吸引了美国人口的一半，即5000万观众观看电影。根据美国学者研究，1912年在伍斯特有3家廉价电影院，最贫困的移民聚在最差影院，较好一些的劳工们带着他们的妻儿拥挤在“家庭”影院，离此不远的“壮丽”影院也聚集着相似的人群。在娱乐活动中明显地反映出阶级差异。在纽约同样如此。1910年，蓝领工人仅构成该市上演剧场观众的2%左右，而成为廉价电影院的主要观众（约为75%）。

在伍斯特，电影还是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进行非工作联系的重要途径。一位13岁的意大利移民在1907年到达伍斯特时说：“在意大利我住在农村从未见过电影，来到这里我对看电影感到

---

① 托马斯·弗雷泽：《美国历史的民间部分》，第2卷，HBJ出版公司，纽约，1987年，第108页。

兴趣。”他在工厂每周工作60小时，但是他还是用积余下来的60美分中的一部分看电影。在纽约，一位受到父母严格管教的意大利服装女工回忆说：“我被允许独自外出的惟一地方就是电影院，父母亲不让我到任何其他地方，即使我已经24岁了。”另一位女工回忆说她后来的丈夫就是在电影院认识的。20世纪初由于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增高，电影院观众的结构也出现变化。在伍斯特同样如此，从1890到1910年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由19.5%上升到23.7%。因而廉价电影院观众中妇女和儿童的比例增加。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克拉认为：“电影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社会现象，只是当它们符合劳动阶级的需要和希望时才进入美国生活的。”电影的早期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阶级观众。观看电影成为劳动阶级文化。劳动群众与廉价电影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面貌。

〔童工的普遍使用〕　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还导致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后果：大批童工的出现。童工已成为美国劳动阶级中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中最艰苦最悲惨的要数煤矿中的童工。美国政府曾发表研究报告披露了1919年美国谢南道河谷煤矿区的童工情况，反映了20世纪初年美国童工艰苦生活和悲苦境况的冰山一角。如同美国其他任何矿区一样，工业迅猛发展既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无数财富，但也巨大地改变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原先是美丽可人的乡村现在成了一个工业污染严重的黑色城镇，它的上空充满着黑色尘埃，空气因混杂烟灰也变为黑色，这里有堆满垃圾的建筑物和贫民窟，工人们从作业区回来脸上都沾满了煤灰尘埃，似乎带着黑色面具一般。这里的树木早已被砍光作为矿井中的支架。在这样的环境中，童工们和他们的父辈在这里劳作不息。童工和成年工人站在运送煤块的传送带的旁边，在煤块滚动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噪杂声

中劳动，照看传送带将煤块送入粉碎机打碎。这工作没有技术要求但是非常肮脏，到处是飞扬的煤灰，窗上粘着煤灰，空气中飞扬煤灰，人们的肺里也充满煤灰。有人说："你在碎煤机旁开始工作，在碎煤机旁结束工作，最后也粉碎了自己。"[①] 更惨酷的是，童工们还被派往地下矿井劳动。调查期间，委员会发现在地下矿井劳动的163名童工中，92名开始是看门工，他们站在黑暗或半黑暗的坑道里，负责开启或关闭通道中的门，放行煤车。看门童工中，17人仅是13岁，3人只有12岁时就参加了正式工作。有些童工还被分配在有危险的工段劳动。如：在把最后残留煤块从煤柱或墙上凿下的工段里，童工们要不时用手将飞速转动着的风扇转向在那里工作的工人，这里不仅到处是废物而且经常发生塌方事故，工人们常常因此致残致伤，甚至丧生。由于工作条件恶劣，这里工伤事故不断，童工们也不能幸免于难。有的在事故中丧生，有的致残。该地区在1919年，即调查阶段共有978名童工曾在矿山工作（包括短期和非正规的），其中有178人遭到事故伤害。

童工们以各种方式出卖劳动力挣钱。其中卖报又是一种特殊方式，大批报童的出现形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又一奇特现象。报童成了童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0年美国2/3的日报在下午出版；1900年，人们下班回家路上读的晚报在数量上约以3比1的比例超过日报。随着城市化的实现，人口的增长，信息传播量的扩大，人们不仅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或在轮渡上，或在火车上，或在公共汽车上读报，而且急切地渴求各种商业信息。因此晚报数量激增。1912年雅各布·里斯曾经揭露过报童的艰苦生活环境，说："今天的报童是另一类小家伙，他们有家和亲人。"后

---

① 《美国年鉴》，第14卷，第321—322页。

来报童的工作条件起了某种变化，即他们是“一群生活在家里，放学后去卖报的商业小家伙。”① 19世纪报童们在街上整天卖日报；20世纪初报童们则在放学后外出卖晚报。这样可以弥补他们因无法卖日报造成的经济损失。卖报由全日制变成业余制以后，美国报童数量激增。因为晚报有大量最新信息和商业广告需要立即送到顾客手中，加上晚报售报正值工厂企业的下班时间，人们行色匆匆在回家路上，所以报业经理、编辑、出版商和广告商们需要组织大量人力将刚出版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这时童工充当了他们所需要的最好角色。美国学者认为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新闻报只能依靠报童而别无选择”。② 当然报童的族裔结构不同，他们来自美国不同的族裔。例如：纽约市75%的报童是俄罗斯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在芝加哥超过2/3的报童是“美国人”、黑人、德国人或爱尔兰人；巴尔的摩40%的报童是“美国白人”；辛辛那提29%的报童是美国有色人种；达拉斯80%的报童是“美国人”或北欧人。据调查，童工的家庭出身基本是劳工阶级。纽约1917年7月对806个报童的家庭出身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父亲除了4名是承包商和建筑商，5名杂货商，23名职员，7名推销员和一些白领工人外，其他大多数是劳工、裁缝、驾驶员、小贩、搬运工、熨衣工、（渔业）陆上服务人员、擦皮鞋者、技术工匠和工厂雇员。

美国历史记录表明，20世纪最初10年在美国街上卖报的报童数量之多以致成为他们这一代少年中多数人的普遍生活经历，当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需要经济收入时，少年儿童们就会上街卖报。因此美国许多传记作家或自传作者都会提到他们在20世纪

---

① 弗雷泽：前引书，第139页。

② 弗雷泽：前引书，第142页。

初年的童年卖报经历，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欧文·伯林、乔·布朗、乔治·伯恩斯、威廉·道格拉斯、华纳兄弟等等在他们的传记中都或多或少谈到了他们作为报童时的一段生活。关于美国当时报童的确切数字是难以统计的。只能根据一些地方史和社会研究的成果加以推测和估算。

20世纪初的报童的处境虽然较之19世纪时要好，但是依然存在问题。报童们要为筹集第一笔款项而担心，然后又得计算领取多少报纸为好，因为晚报不如日报销售时间长，领多了卖不了就会亏本，领少了不够卖会失去顾客。他们在售报时还要千方百计地向顾客宣传报纸的重大新闻加以推销，在大街上边叫边卖。因此凡是遇到重大新闻诸如战争、谋杀案、自然灾害等新闻时，报童们庆幸这是他们推销报纸的好机会。美国喜剧演员乔·布朗在离开俄亥俄的托莱多市街道半个世纪以后，还生动地回忆起他当报童时的情景，说："在我卖报生涯中最丰盛的一周要算麦金莱总统被谋杀后的一周，他在布法罗展览会被枪击后还活了一星期，那整整一周内人们对新闻的兴趣处于狂热之中。"[①] 布朗在那一周推销报纸超过了他梦寐以求的最好的可能数量。《泰坦尼克》号轮沉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等都为报童们提供了推销的好机会。这时，报童们简直成了报纸编辑在积极传播新闻。但是更多的时候报童们还是卖不完报纸。报童在街上大声推销报纸不仅遭人白眼还受到人们的谴责和非难。纽约人抱怨纽约简直成了世界上报童叫喊声最噪杂的地方。1912年夏，有人投书《时代》杂志抱怨报童已经成为麻烦制造者，影响病人的健康和休息。1917年10月，纽约《时代》杂志甚至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警察行动起来制止报童的噪杂声……"报道纽约警察局已经接

① 弗雷泽：前引书，第149页。

到人们指责报童制造麻烦的投书，报童不仅在市区而且在郊区利用大家对世界大战的关注更改各种新闻大肆推销报纸等等，警察局负责人表示要尽力制止这类麻烦。在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数众多的报童犹如“街角上的路灯一般”在大街上排列齐整地高喊头条新闻。西雅图等城市通过法令禁止报童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内大声叫卖。当然也有社会正义人士为报童辩护，一位亚特兰大法官在法庭上申辩说，报童们有权“在街上叫卖他们的报纸，只要他们不妨碍交通和影响病人……人行道既为百万富翁也为报童所用。”①

报童们为了推销报纸需要忍受很多苦难，他们的工作时间决定于报纸出版的时间，因而往往拖得很长。如：在巴尔的摩报童卖晚报，就要等待费城报纸的到来，大约在晚上 10 点左右报纸从费城运到，报童在后半夜 1 点半就要到达编辑部取报。在芝加哥报童往往半夜取得第一份报纸一直卖到第二天凌晨。纽约的报童在时报广场从傍晚开始推销晚报直到半夜以后。星期六晚上是报童们卖报的最好时机，因此他们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彻夜不眠，有的卖当天晚报，有的等待星期日报纸的到来。时任全国消费者协会秘书的佛罗伦斯·凯利女士在纽约市目睹报童在深夜卖报的情景说：“午夜 12 点 1 刻，一个小孩，面黄肌瘦，可怜而衣衫褴褛的小孩还站在妇女旅馆——玛莎·华盛顿饭店的门口卖报。”②

因为一个城市里有若干份晚报和其他报纸，报商们都希望自己的报纸有好销路，所以利用报童拼命促销。在报纸推销商或发行经理的挑动下经常发生贩卖不同报纸的报童间的殴斗，推销商们甚至雇佣年青打手对报童进行打击和威胁，对贩卖其他报纸的

① 弗雷泽：前引书，第 151 页。

② 弗雷泽：前引书，第 153—154 页。

报童加以拦阻，不让他们在街上卖报。如：20世纪初，当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进入芝加哥市场时，报摊和报童拒绝卖他的报纸，赫斯特就雇佣成人打手强迫报摊和报童卖他们的报纸——“美国人”和“检查人”报，导致报战的全面爆发，但是受害的往往是报童。

〔农民的变迁〕　工业改变了农村面貌，交通的改进和提高扩大和规范了农民市场，使大规模的专业农场的建立成为可能，使大规模农场使用昂贵的机械成为必要。[①] 从全国范围而言，1860—1916年，美国农场数从200万个增加到640万个，农场土地总面积由4007万多英亩扩大为8790万英亩。据统计，1900年美国参加劳动的总人数中37.5%是在农场工作。[②] 由于工业化的实现，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发生了重要变化，总趋势是农业生产变得更为商品化。农民们往往实现了生产专业化，根据自己特点和优势为市场的需要生产若干农产品。农业的全面商品化和市场化使美国农场主阶层处在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农场主自身经历着一场变革。农场主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化，他们由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化为农业商人或农民企业家。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民适应社会转变的产物。“市场，机器和科学使美国农业从一个相对简单运作、小量资本和少量知识的事业转变为一种较复杂的事务，因此需要日益增长的投资、设备、科学信息和对市场的密切关注。现在，农民无可抗拒地卷入了一个复杂的工业体系。他们只有不是作为样样都能干的万金油，而是作为一个精打细算的、机灵的、有学识的商人才能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331页。
②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74页。

生存。”[①] 美国农民已在向农业企业家和农民商人转化，这是农业逐步工业化和商品化的结果。

其次，美国农场主阶层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供应者，美国农民已经卷人到世界经济网络中去。面临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他们带着困难慢慢学会去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像商人那样精确地计算价格和成本，共同联合起来去对付强大的市场力量。他们埋怨他们的生产成本太高，而价格太低。农民们生产谷物越多，收入却越少。如：1912 年美国生产了 67775.8 万蒲式耳谷物，较 1913 年为多，但农民收入反比 1913 年为低，只有 17163.8 万美元。[②] 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制约，美国农产品要与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俄国农产品进行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如：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谷物平均价格每蒲式耳约为 60 美分，但是在 1896—1900 年间，下降为每蒲式耳为 28 美分；小麦由 1 美元多下降为 60 美分；棉花从 16 美分下降为 8 美分。1900 年美国 1/3 的农民是租地自己耕作的佃农。[③]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农民的命运已和国际市场的荣辱盛衰息息相关。

农场主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要求，必须学习科学务农的知识。诚如美国学者所言，这时美国正处于农业革命的过程中。科学务农成为当时美国农业的重要举措，也对农场主阶层产生不小的冲击。1914 年美国科研机构首次提出在农业中推广科学方法和手段，但是对于美国大量小农而言收效甚微，他们还是固守传统的农作方法。美国政府和科学家向农民有步骤地推广科学方法。首

---

① 海斯：前引书，第 15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4 卷，第 2—3 页。

③ 奥斯卡·汉德林：《美国人：新美国人民史》，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63 年，第 280 页。

先，他们要求农民选用改良种子，并使良种种植率从25%提高到100%；第二，教育农民如何使自己的产品市场化，尽可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售给顾客；第三，让农民懂得进行有利的买卖；第四，要求农民们明白使不断增长的农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在出卖农产品中取得更大利益，再以低价购进所需物品，使他们过上更勤奋、更欢乐、更有希望的生活。农民们在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下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经商本领。同时，农业革命还大大冲击了农民的个体思想，使他们在实践中明白合作精神不仅能使他们免受垄断集团的伤害，而且可以有效地增加他们作为科学农民和企业管理者的利益。但是一些农民将这些忠告看成是让羊羔躺在狮子脚下。长期以来他们害怕城市的企业家和商人；同样城市企业家和商人也对农民心存怀疑。[①] 农场主的上述变化是他们对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作的一种反应。“美国农民向商人转化仅仅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最明显的后果。”[②]

20世纪初美国农场主经历了一个生活较为富裕的时期。在世纪之交的15年里，美国农业进入黄金时代。原因是工业发展速度超过农业，因此增强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加上地价上涨也给美国农民带来好运。“一般说来，在南北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民享受了最富裕的生活。”[③] 但是农场主们遇到的问题仍不少。首先是美国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当他们出卖农产品时受到自由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只能低价出售；当他们购进生产或生活所需的工业品时，却因保护关税政策而不得不高价购进，经济

① 《美国年鉴》，第14卷，第4页。
②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37页。
③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33页。

损失严重。“农民在竞争市场上销售农产品，而在受保护、被控制的市场上购买工业品；他们作为买方和卖方都处在不利地位。”其次，垄断化给美国农场主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痛苦。垄断集团操纵工业品的价格和垄断原料的渠道，迫使农民在他们的控制下出售农产品和购买工业品，此外他们还掌握全国或地区的运输工具控制农产品的外运内销，对农民进行无端盘剥。农场主阶层中也出现垄断化的趋势，一些农场主兼并了中小农场主的土地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大农场主，他们与财团勾结，控制农业资本，霸占农村市场和原料收购，对土地和资本实行垄断。中小农场主纷纷破产，农场主沦为农业工人。因此美国农民深受垄断之苦，他们甚至已经沦落到“只为垄断土地的财主砍柴打水”的奴仆地位。[①]

〔新移民〕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因此移民的构成及其变化状况是研究美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移民再次大量涌入美国形成蔚为壮观的高潮。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移民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移民大多来自爱尔兰、德国、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第二次移民高潮开始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波兰、俄罗斯、意大利、希腊、匈牙利、亚美尼亚、土耳其、东欧犹太人和各种斯拉夫人。甚至还有中国和日本移民。据统计，从1870年至1924年间共有2000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75%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约有500万意大利人，200万东欧犹太人，还有斯拉夫人、波兰人、奥匈人等等。来到美国的移民分布全国各地。如：法裔加拿大人移居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城

---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41页。

市，墨西哥人则在加利福尼亚或西南和中西部城市如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等地定居。诚如经济学家里查德·伊斯林所言：“（当时）移民美国规模之巨大在人类历史上是无法比拟的。”[①] 移民规模之大，成分之复杂可从移民入关时的场面情景略知一二。一位从奥匈帝国来到美国的亨利·罗斯回忆1907年抵达美国埃利斯岛时说：“这是1907年5月间的事，说起这年，正是来美国移民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一天（春天至今，天天如此），从早到晚，外国移民成百上千地拥挤在甲板上。世界上哪一处的人都有：双下巴、剃平头的条顿人；满脸大胡子的俄罗斯人；须发蓬乱的犹太人，里面还夹杂着面容温顺的斯洛伐克人；两颊光滑、肤色棕黑的亚美尼亚人；还有爱长酒刺的希腊人和眼角布满皱纹的丹麦人等等。”[②] 大部分外来移民在母国都是农民，来到美国后他们将城市作为目的地，所以移民人流入关以后就很快涌向美国城市，像水银落在地上一般消失在美国社会中间。1900年美国全国外来移民总数的大约2/3是城市人口，1920年城市人口已扩大到3/4。新移民集中在工业城市成了美国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1910年，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构成了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密尔沃基市人口的70%；在旧金山、纽瓦克、匹兹堡、圣路易斯、费城、辛辛那提他们的比例在50—70%之间。[③] 在城市中，外来移民在城市中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移民区域。带有血缘和种族特点的机构如教堂、咖啡屋、沙龙、饭店、旅社、杂货店等等，它们往往像磁铁一般吸引着该城市或其他城市中的“同乡邻居”。

---

① 莫尔：前引书，第22—23页。

②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③ 莫尔：前引书，第25页。

新移民构成了美国劳工阶层的最低层，他们的生活境遇十分悲惨，居住条件极为简陋困难，移民居住地往往成为美国城市中的贫民区。一位英国访问者在目睹贫民区惨状后这样说："我决不会说地狱是丑陋的。"对于移民工人的痛苦遭遇，一位亲身经历者激动地说："这就是美国人夸耀的自由和机会——自由就是为尊敬的公民使用可怕的两轮手推车去出售卷心菜，机会就是让尊敬的公民居住在那些怪异的、肮脏的和照不到阳光的洞穴（租屋）里。"① 纽约移民居住条件更糟。19 世纪 90 年代，纽约下东部地区每平方英里平均居住 33 万人，而同时的伦敦最高居住率为每平方英里 17.5 万人，纽约拥挤程度几乎高出伦敦 1 倍！一位观察家这样写道："瞧上瞧下，走这走那，满目破碎、无序、恐怖和可憎；处处是污秽，人行道拥挤不堪，窗户旁躺着人，门阶上充斥团团烟雾。毫无秀色可言。"② 移民工人在美国经常受到种族歧视，因此他们往往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工资收益低的工种，他们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白人劳工。移民工人的收入低下是造成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1909 年匹兹堡的家庭最低生活费用需要每周 15 美元，但是该市的移民工人中的三分之二收入不到每周 12.50 美元，其中的一半人每周收入还低于 10 美元。③

美国社会中的不同移民集团因他们各自文化背景和母国地位的差异在发展中也显现一些区别和特点。美国的犹太移民是外来移民中一个很有特色，堪称最成功的移民群体。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 150 万犹太移民蜂拥美国。特别是东欧犹

---

①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 23 页。

② 华尔特·特拉纳：《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史》，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纽约，1989 年，第 149 页。

③ 特拉纳：前引书，第 149 页。

太人集中在美国的纽约市的东南端，饱受贫民窟之苦。曼哈顿东南端的居住条件十分拥挤，“到世纪之交，曼哈顿东南端平均每英亩土地上住着700多人，密度超过孟买最差劲的贫民窟。”[①] 1908年的调查资料表明，曼哈顿东南端的居民家庭，一个房间住有2人以下的不到1/10。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是每个房间睡上3—4人，还有1/3以上家庭一个房间睡上5或5人以上。[②] 在就业方面，据统计1880—1915年间，犹太移民中一度有10%是小贩，只有5%的犹太移民从事高级白领行业，但就美国犹太人整体而言，有2/3是熟练的技术工。当时的犹太移民在美国是最成功的移民群体之一。他们在人口的垂直流动中趋向于向上发展，即由社会低层次向高或较高层次发展。如：1897—1907年间，曼哈顿地区犹太人中担任医生职业的由450人增为1000人，药剂师由45人增为115人，牙科医生由59人增为350人。整个纽约的犹太人从事“高级白领”职业的人数比例大增，从1880年的5%扩大到1905年的15%，小商贩的人数下降75%。[③] 但是，当时美国社会上的反犹苗头已经显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犹太人确曾成为美国社会的目标。”[④] 美国一些有地位的人、家属或集团甚至拒绝与犹太人新贵交往。由于在20世纪初美国的犹太移民加入了白领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多，美国社会开始公开抵制和歧视犹太人。甚至报上的招聘广告中出现“不欢迎犹太人”的话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内出现反犹狂热。

---

① （美国）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14页。

④ 邓蜀生：《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9页。

世纪之交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除了10多万劳工，大多从事海员、泥瓦匠、裁缝、鞋匠、理发师等职业。而从事教师、医生、律师的还不足100人。意裔工人工资低于白人。据统计，1910年，美籍意裔男子所得的年收入低于本土白人或黑人的。就职业而言，1905年在纽约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中有40%是非熟练工人。1910年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几乎有2/3的人是属于体力工人，从事白领工作的仅占12%。意大利移民在美国参加市政管理工作的，从最低层的清道夫到警察、职员占有相当比例。1898年以后纽约发展为“大纽约”，该市的大量市政建设为意大利移民的就业提供了机会。1911年纽约的意大利男性移民45%在建筑行业当壮工，15%当工匠。1914年初纽约就有800多家职业介绍所专为意大利移民服务。[①] 19世纪末在纽约公共工程充当市政职员的大约8000人。旧金山的意大利移民几乎“垄断”了清道夫等其他市政管理工作。意大利移民还从事教育工作，纽约的意大利人1915年就有400名左右教师，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在1920年初大约有42人。意大利移民劳工中曾盛行包工头制度。包工头一般是具有某种组织能力和强悍贪婪之人，专司招募、组织和监督意大利劳工之职，他们的“业务”范围已扩大到美国若干城市，他们的网络甚至跨越美国和意大利。如：19世纪末，包工头控制着纽约全部劳力的2/3，在芝加哥有20%的意大利人为包工头干活。包工头在美国老板和意大利移民中间充当中介，赚取丰厚的报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移民在社会垂直流动中也出现了向上的流动趋势，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开始从原来居住的贫困区向长岛、威斯特切斯特地区，向城郊区迁徙。意大利人逐渐向主流社会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保持和发挥了他们

---

①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142页。

的优越的音乐素养。

移民结构的变化还牵涉到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问题。20世纪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以后面临母国文化传统和美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他们既要保持母国文化传统和语言，又要适应新的美国文化环境，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美国学者西奥多·索罗特在对希腊移民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初年在美国的希腊移民强烈地希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此他们在美国的居住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教堂，负责本地区的学校教育，甚至上演本民族的戏剧和音乐，还保持了希腊人独特的咖啡屋。在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上，他们首先面临一个双语问题，一方面他们明白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学习英语是必要的，但是本国的希腊语也不能荒废，他们要求自己的后代学习希腊语言，他们开始把教堂作为孩子学习希腊语的学校。因为他们的教堂只接纳讲希腊语的人，教职人员就是最好的希腊语教师。为了让孩子们不忘希腊语，他们还建立社区学校教授希腊语，以致希腊孩子们特别辛苦。在公立学校放学以后，他们还得进希腊学校学语言直到傍晚。在语言学校里各种年龄段的孩子们集中一起，最年幼的只有5—6岁。他们或者挤在教堂的地下室，或在租来的会堂、或在空闲的仓库里、或在社区中心学习希腊语。一些移民特别强调说："让我们种族的伟大品格……渗透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教他们希腊语，用希腊人的性格和德行影响他们。"但是这样的学校因为学生的负担太重而收效甚微。1914年芝加哥的希腊学校也许是其他城市中的典型。据估计约有500位出身希腊移民家庭的孩子参加了希腊学校。但学校条件很差，孩子们白天上公立学校，下午很晚了还要进希腊学校，致使年幼的他们身心疲乏，缺乏学习兴趣。

如同建立希腊学校一样普遍，希腊移民社区还建立了不少友

谊社团。开始时这些社团成员一般有15—30人组成，由12—15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成员们有一定的制服，特别是社团还有自己组织的印章，甚至每一个社团组织有主席、副主席、秘书和财务人员等。参加社团的成员是根据原来居住在希腊的村庄、城镇、地区甚至岛屿决定的。成员间相互帮助关心。他们集资兴建学校、桥梁、道路等公共设施。1907年，美国已有这样的希腊移民社团大约100多个，仅纽约就有30个，此外他们还有一种全国性的组织。同时希腊移民还在美国的居住区建起咖啡屋这样的社交场所。因为开办咖啡屋费资不多，设备简单，发展迅速。这些咖啡屋往往成了希腊工人打发业余时间的好去处。每间咖啡屋都取了一个自己的好名称。希腊移民们在这里喝咖啡谈论天下事。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有时大家聚在那里谈论战事，希腊打败土耳其的事成为谈话热点，为此有的咖啡屋还特意挂上一张希腊地图。当然有些咖啡屋最后演变成赌博场所。后来咖啡屋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因为移民们对美国的了解日益加深，在美国的朋友日渐增多，社交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英语水平随之提高，咖啡屋后来就成了早期希腊移民生活的象征和回忆而已。

宗教活动也是希腊移民团体的重要社交方式。妇女们经常在周末或周日到教堂活动。宗教节日往往是移民们聚会的好时光。其中命名节比生日更热闹。这是从欧洲带来的习俗。亲朋好友在命名节互相访问和祝福。此外基督教的很多节日和婚礼都是吸引移民参加的大好机会。此外希腊移民同时还出版了希腊文的报纸。[①] 希腊移民的状况仅仅是整个美国新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

20世纪初年，美国东方移民的处境日益恶化是一大特点。

---

① 卡里和温伯格：前引书，第95—102页。

自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以后，各种加强补充排华法的法案不断出台[1]，1904年，美国限禁华工条例续订，"禁例"增为60多条。在美国政府的排华法案的鼓动下，华人在美国处境更为困难，他们被无辜驱赶的惨剧屡有发生，如：1903年波士顿发生拘捕华人200余名的事件。更有甚者，华人刚进入美国大门就遭遇艰险和歧视。据研究美国移民史的中国学者邓蜀生的记述，1910年1月21日，耗资20万美元的天使岛移民拘留站正式启用。华人们一踏上美国国土就被拘禁在天使岛的"木笼"里，过着非人的生活。1910年3月16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登载了"木屋拘囚序"，一位被囚华人以悲痛的心情写道："躬到美域，徒观海水之汪洋；船泊码头，转拨埃仑之孤岛。离埠十里，托足孤峰。三层木屋坚如万里长城；几度监牢，长扃此门锁钥。同胞数百，难期漏网之鱼；黄种半千，恍若密罗之雀。"报社编辑为此按语："笔者以身受之苦，作悲愤之文。血耶？泪耶？墨耶？吾知海内外同胞读之，必告无限激刺矣。虽然，吾同胞虽有无限之激刺，空作楚囚之对泣，亦何济于事。"[2] 日本移民境遇比华人要好一些，他们趁华人被排斥之机来美寻求机会，1900—1905年约有9万日本移民纷至沓来进入美国。1907年一年就有3万多人。但是，1907—1908年美国与日本政府还是签订了实际上是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的协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说："到1908年，几乎完全排斥了东方移民。"[3] 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同在美的华人的遭遇一样："先是受欢迎，继之被排斥，再继之被施以暴行。"1900年5月7日，旧金山市市长在大会上大肆

---

① （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第53页。

②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258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上册，第16页。

诬蔑华人和日本移民说："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是地道的公民，他们都不是美国公民那样的人。"美国报纸上出现诸如："日本人是对美国妇女的威胁"、"褐色人是公共学校的祸害：成年人挤走了孩子"、"日本人的血汗作坊是我市的耻辱。"等等。1907年5月20日旧金山发生暴徒袭击日本旅馆和澡堂事件。[1]

总体而言，20世纪初来美国的移民，尽管有些移民集团在社会垂直流动中流向较高层次，一些人的生活也许比在母国多有改善；但总体遭遇是悲惨的、令人不满的。他们为美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得到的回报却非常令人失望。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克·哈斯金写了这样一首移民歌："我是外来移民……我为屠宰业和肉类包装业提供85%的劳动力。我承担烟煤矿7/10的劳动力。我承担羊毛厂劳动的78%。我提供棉纺工厂9/10的劳动。我制作全部服装的19/20，我制作鞋的50%。然而，我却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2] 移民（包括西方和东方的）为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立下汗马功劳，为美国这座新兴的世界工业大厦奠下坚实基石，可是到头来他们却被歧视、被驱赶。这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

〔贫困人口的增加〕　　贫困问题的出现和贫困人口阶层的形成是美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又一突出现象。虽然这个问题在美国早已有之，但20世纪初显得更为突出。美国人因而对此加以更多的关注。关于贫困问题，一些传统的观点认为穷人的贫穷是咎由自取，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威尔斯这样说："穷人倒霉是因为穷，他们自己害了自己。"[3] 19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社会工

①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299—230页。
②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147页。
③ 梅里亚姆：前引书，第187页。

作者经过对穷人生活条件的大量调查研究以后，对贫困的成因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最出色的是芝加哥的J·亚当斯、纽约市的L·华尔德和R·亨特。R·亨特在1904年出版了他的《贫困》一书。在他的笔下，美国的穷人被描绘成："他们像犯人一般在欲求的刺激下，在饥饿的鞭策下，从黎明工作到夜幕降临，或从日落干到黎明。"他估计在这个他曾生活过的社区中，处境最艰苦的有5万男人、妇女和孩子，他们一直生活在贫穷或贫困的边缘之中。描绘他们如何工作、如何饥馑和渴求摆脱困境简直是不可能的。[①]

亨特所描绘的情景仅是美国穷人中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当时美国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贫困人口阶层。亨特认为，穷人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有最长的工作时间和最低的收入，他们面临最尖锐的竞争——来自各地的非技术工人到这里寻求职业，他们受血汗劳动制的压迫，他们租赁的房屋条件最差但租金比其他阶级所付的要多，他们背负着比其他任何阶级更高的死亡重担，他们没有任何积余，因而处在随时失去工作的实际危险之中，他们可能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立刻失业。根据亨特的估计，在正常繁荣年景，美国约有不少于1000万人处在贫困之中，即少吃缺穿和居住困难的。其中400万人是公开的乞讨者。200多万人是一年中有4—6个月失业的工人。在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每年约有50万外来移民男子来此求职。美国有几乎一半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约有170万正当求学年龄的小孩面临沦为童工的境地。约有500万妇女发现她们必须为生活而寻求工作。约有200万妇女在工厂或工场劳动。每年约有100万工人在劳动时因事故而伤亡。约有1000万人生活得可以。贫困产生穷人，穷人形成贫民窟，贫民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588页。

窟成为美国城市的一部分。雅各布·里斯在1902年发表了著名文章《与贫民窟的斗争》，他在文中揭露说："在宣言颁布1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睁眼看到的是：城市中的劳动妇女一天工钱只有60美分，生产1打短裤才得40美分，贫民墓地夺走城里1/10的人，每年有1/10的人死于战乱，这恰恰是贫民窟里婴儿的死亡率。"他深刻指出："在与贫民窟的斗争中，我们要么战胜，要么灭亡，没有中间路可走。"[①]

在贫困成因的分析中，亨特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分倾向于认为那些处于贫困的人是一些不为自身利益奋斗、只是等待别人解救他们的无用之辈。"其实不然，他们是"被一种支配他们命运的残忍的经济力量拖入绝望的。"[②] 这种分析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贫困的产生不能归罪于穷人本身，而应从社会、经济等深层次领域寻找原因。亨特所指的经济力量就是当时美国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这是一种无形的经济力量，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穷的穷，富的富；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当时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更是强化了这种贫富不均的趋势和力度。

三、社会人口流动高潮

〔美国经济地区结构的变化〕　经济地区结构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发生了地区结构的变化。大致而言，美国的工业区域向中西部扩展和延伸，经济重心出现向西推

---

① （美）戴安娜·拉维奇：《美国读本》下册，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491、493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586页。

移发展的趋势，原来的工业基地依然获得重大发展。工业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即俄亥俄河之北和密西西比河以东，主要有钢铁工业、纺织和制鞋工厂，还有木材工业和家具工厂等等，这里还有美国最密集的铁路网；有的地区因资源丰富导致工业发展，如宾夕法尼亚的煤，中部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大湖区的木材，新英格兰的丰富水力资源带动了这些地区相关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一些有利的交通条件促使全国性的东西交通线的形成。如：伊利运河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将东部地区和大湖区联系起来。此外工业布局还受到老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影响，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的出海口直接影响了工业布局。

美国的南部和西部以农业和矿业为主，成为北方工业产品的市场，并为它们提供粮食和原材料。南方提供棉花、烟草和稻米，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为东北的城市和欧洲城市市场提供粮食，大平原地区则提供牛肉制品。农产品基地有一个向西转移的过程。如：最初的粮食产地在中部大西洋沿岸诸州，后转移到圣路易斯，再转至明尼阿波利斯和堪萨斯市；牛肉和猪肉制品移到了中西部的西部地区，全国的屠宰业中心由辛辛那提转向芝加哥，最后往西移至堪萨斯市、苏城等6个养牛场的边缘。西部地区还往东部运送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如：先是上大湖区后从蒙大拿、亚利桑那、犹他等州向东部运送铁矿石和铜矿石。铅锌矿则从堪萨斯、密苏里和阿肯色等州运出。木材从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

西部和南部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域，成为美国的新兴经济区。但是西部和南部涌现的新工业城市同样离不开东部工业区，他们仍然需要东部地区生产的工业制品，农机、建筑材料、服装等等。这些涌现出来的地区专业化经济和全国经济体制融为一体。

同一经济地区内部，农村和城市间的专业区别也日益扩大。

城市成为工业活动的中心，集中了生产出来的工业品，远远超过了以前农民在农村所完成的工作。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向城市涌来，生产成品从这里输出。城市成了最大的进出口岸、生产中心，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的集聚地。城市的核心是商业，其他的人类活动都尾随这个核心而生，以适应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社区。①

虽然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人口流动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居于前列，甚至也可以说美国社会一直处在流动之中。但是这种流动犹如汹涌波涛，起伏相间。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人口流动的高潮，包括从欧洲向美国大量移民形成人口迁移潮流，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转移，由东部向西部流动，由南方向北方流动；在垂直流动中，美国人由社会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或由高层次向低层次流动，在两股相反方向的垂直流动潮的汇合点中形成了中产阶级的荣辱盛衰，但总的流动趋势是向上的。有的美国学者曾经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美国人从农民转变为工人，再由工人转变为职员的历史。世纪之交时期正是美国的第一阶段：即由农民转化为工人阶段，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当然这个转化的历史过程与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在人口流动中，黑人向北方城市和南部城市的进军占有重要地位。世纪之交的美国人口流动高潮包含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人口转移和黑人由南部向北方大迁移两大内容。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美国世纪之交的劳动力转移高潮是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的直接后果。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了对大量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各种勃然兴起的工业部

---

① 海斯：前引书，第15—17页。

门成为吸纳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除了社会上各种闲散劳力被吸收加入工业劳动大军以外，国外移民也像被磁石吸引一般来到美国，他们同国内农村劳动力一起纷纷转向城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场到工厂，变农民为工人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了农村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领域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这就为农业人口转向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构成一个互动的过程，城市兴起为接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提供了巨大空间，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则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建设者和未来城市市民的主体阶层。所以，20世纪初的这次美国劳动力转移高潮恰恰与美国城市化的初步实现相一致，与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相同步。

美国工业城市人口流动即人口迁入迁出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不断吸纳新的成员，不断将多余的人口“溢出”城市。[①] 因此当我们从统计材料上知道某城市在若干年内人口增长比例时，其实际上的增长数字要高得多。美国人经常处于流动的状态中，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一个标准的工人在一生工作期间大约干了30个工种，在12个不同城镇生活过。

根据我国学者的最新研究，[②] 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口流动主要是从中西部向西移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例如：从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州就有50多万人向西迁移，27万人在内布拉斯加停留，余者20多万人向俄勒冈进军直至太平洋沿岸。有27万人从中部州阿肯色和密苏里向西迁移，一部分进入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另一支向加利福尼亚挺进。

---

① 莫尔：前引书，第26页。

② 详见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前引书。

事实上，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并没有因为“边疆”宣布结束而停止，它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继续向西推进和发展，主要表现为西部各州人口激增和开发成功。如：北达科他州的人口1900年为31.9万人，在短短的10年里就翻了一番达64.6万人（1920年）。南达科他、科罗拉多、爱达荷、蒙大拿、犹他、怀俄明等州的人口也同样显著增加。西南部的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州的迅速开发反映了西进的规模和成效。这些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的新工业区。

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以后，在城市人口的社会垂直流动中造成了原来的白人工人向上流动的趋势，除了农村人口大量入城以外，国外移民的大批到来也是造成美国人口垂直流动向上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成千上万移民梦幻般地涌进美国，促进了美国大量内部需求，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给美国工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其次，因为大批移民是非技术或半技术劳工，他们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占领了大量收入低、非技术的工作岗位，这就造成大批白人工人向技术强、收入高的岗位流动，职业结构发生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美国的数百万移民，事实上不知不觉地为那里的人民造成了一定数量的向上流动。”①

〔黑人大迁徙〕　19世纪末和新世纪最初的20年，在美国出现的人口大转移高潮中，黑人向北方迁移形成了一股最有特色的潮流，“其数量堪与历史上历次国际大移民相比。”② 他们跨出地区和州际界限，涌向北方的大西洋沿岸和中西部城市。其特点不但是迁移路程长，而且是黑人们离开了世代生息的宁静而痛苦的乡村来到嘈杂陌生的城市，寻求新的生活。终于使美国所谓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109页。

② （美国）托马斯·索威尔：前引书，第267页。

的“黑色地带”瓦解消融。

城市新边疆为美国国内的南方黑人提供了迁徙的新空间。内战结束后其实已经出现了南方黑人向北方城市移民的趋势。1900—1910年，19.4万黑人移居城市，1910—1920年55.5万黑人迁入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时，这种迁徙运动因北方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加剧。20世纪20年代共有75万以上的黑人离开了南方。[①] 大部分黑人涌向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1920年居住在非南方地区的黑人中大约有85%在城市中生活。1920年前，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城市都兴起了它们的最大的黑人社区。20世纪头10年内，工业心脏地区诸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圣路易斯、堪萨斯等城市都成了黑人们的“希望之乡”。[②] 当然与此同时部分南方黑人也在南方城市中寻求他们的生存之地，20世纪头20年，南方城市黑人居民增加了48.9万人；20年代，南方城市黑人居民增加39.7万，而农村人口却减少了47.9万人。黑人的大量外移，甚至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枯竭，只有老人、病人和儿童被留弃在南方农村，甚至使“产量丰富的棉花种植场变成了荒芜的土地”。[③]

从南方的肯塔基、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佐治亚等州向外迁移的黑人数量最多。黑人大规模外移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黑人虽然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方，但是奴隶制度对黑人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痛苦和悲伤。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在法律上已经废除，但是黑人并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因此离开南方一直成为黑人的强烈愿望。早在内战爆发前黑人们就利用“地下铁道”，冒着生命

---

① （美国）托马斯·索威尔：前引书，第267页。

② 莫尔：前引书，第21—22页。

③ 杜鲛德：前引书，第36—37页。

危险冲破重重障碍奔赴没有奴隶制的北方，争取人身自由，摆脱奴隶制及其残余成了黑人们离开南方的强大推动力，这是黑人北移的深刻历史背景；同时在工业化的高潮中，南方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多余也促使南方黑人大规模北移，有的黑人在南方农村难以维生。从北方的外部条件而言，那里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黑人无疑是最优秀的劳力，他们不计报酬，刻苦耐劳，因此很快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一部分，加上黑人还没有自己的劳工组织，所以雇主们可以随意对他们压低工资、加长工时，甚至随意开除。在白人工人发动罢工时，黑人往往可以被雇主作为替代者加以雇佣。总之，北方对黑人来说具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南方的推力和北方的引力形成了黑人北移的滚滚洪流。

根据菲特的研究，1910 年美国黑人总数约为 980 万，1920 年增加至 1040 万。1890—1910 年，75%的黑人居住在南方农村，但是一些黑人已经开始迁出南方农村。1890 年开始出现黑人大迁徙。1890—1900 年，南卡罗来纳迁出 6.5 万人，弗吉尼亚 7.1 万人。

黑人们虽然怀着美好的憧憬背井离乡从南方来到北方，从农村来到城市，冲破了奴隶制度残余的桎梏，获得了某种改善。但是黑人们到了北方进了城市还是摆脱不了美国种族歧视的浓重阴影，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南方城市中盛行种族隔离。黑人被迫住在隔离区，黑人子女只能在隔离区的学校上学。北方城市中，黑人因收入微薄只能在黑人聚居区入住，在黑人学校入学，与黑人商人做买卖。纽约市的哈莱姆贫民窟地区就是最好的典型。1900 年美国全国大约有一半的黑人是文盲。[1] 虽然少数黑

---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 57 页。

人也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或经商涉足金融业，1909年有黑人在密西西比州开设一家储蓄保险公司，但是诚如一位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总之，对美国黑人来说1890到1920的30年是最黑暗的时期。"①

四、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像魔术一般在美国大地上突然展现出无数工厂铁路，摩天大楼，机器轰鸣，汽车奔驰；另一方面又奇迹般地使美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阶级和阶层重新组合，财富实行新的分配，阶级矛盾和经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趋于激烈，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出自自身的利益向社会提出各自要求。社会动荡，群众运动随之兴起。

〔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出现了曲折发展的形势。"到世纪末，美国已经成熟为一个工业社会，它的劳工运动也已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和常常是不确定的成长模式。"② 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人罢工出现高潮。据1900年美国工业委员会的报告，1881—1900年，美国全国共发生22793起工人罢工，波及11.7万家工商企业。这些罢工事件（75%）主要起因于工资和工时问题。1900年，美国无烟煤矿工人在约翰·米切尔的领导下为要求提高工资和若干改革举行罢工，结果以工人取得提高工资10%而胜利告终，但斗争并没有结束。1902年5月，工人因雇主拒绝同工会进行谈判再次举行罢工斗争。后由罗

① 塞缪尔·莫里森：《牛津美国人民史》，第3卷，新美国图书出版公司，纽约，1972年，第109页。

②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30页。

斯福总统出面进行调停再增加工人工资10%予以解决。1898—1908年间，国际印刷工人联合会为他们的成员在印刷行业赢得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代表技术工人的铁路兄弟会也取得了斗争成果。[①] 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6万多工人罢工。1909年纽约万名制衣工人罢工。1910—1914年西部矿工举行罢工斗争。1913年密歇根矿工联合会组织矿工罢工。

1913—1914年科罗拉多矿工们举行反对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大罢工，轰动全国。该州当局竟然出动军警进行镇压，他们向罢工者居住的帐篷上倾倒煤油纵火，甚至使用机关枪向罢工者和家属扫射，杀死妇女、儿童和工人20名左右，后工人们在此专门立碑纪念死难者。但小约翰·洛克菲勒却无视工人要求，不顾公众舆论和威尔逊总统的压力，专断横行。他还于1916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劳方和资方——合伙人》的文章，冠冕堂皇地鼓吹"在处理工业问题中，我们的困难是由于太长时间不理解劳资双方的真实利益。"资方离开劳方无法推动轮子前进，反之亦然。只有劳资成为合伙人才能创造财富并使生产增长成为可能。[②] 妄图欺骗舆论。

在对付工人罢工斗争中，一些资本卫道士表现出露骨的反劳工的立场。1902年费城无烟煤矿工人罢工期间，一位名为克拉克的公民以基督的名义在1902年7月17日写信给费城和雷丁铁路主席乔治·比尔，呼吁他对工人作出让步结束罢工。比尔对此作出的答复令人愤怒，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和批评，他在答复中竟然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看你是一个教士，但是你偏爱倾向于劳工有权去控制他在其中只应得到他合理劳动所得，而

---

①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87—88页。

② 《美国年鉴》，第14卷，第23—24页。

别无他利的企业。……劳工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保护和关心，但不是由劳工的煽动者，而是由上帝以他无限的智慧已经授予控制国家财产权益的基督教徒，而且成功的管理也极其依赖于他们。……牢记上帝依然在统治，牢记这是一种法律和秩序，而不是暴力和犯罪的统治。"[①] 这种超保守主义的观点完全反映了资本家控制财富的顽固立场。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斗争〕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工人组织，进行多次卓有成效的斗争。其中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最为突出。它是在劳动骑士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98 年以前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内部分裂和罢工失利。此后劳联的工人队伍发展迅速，成员从 1897 年的 26.5 万人，增加到 1918 年的 272.5 万人。[②] 但是美国劳联从 90 年代开始走上阶级调和、排斥非熟练工人和实行种族歧视的歧途。美国工人运动史专家康蒙斯认为"1894 年到 1904 年可以叫做'资本和工人的蜜月时期'。"劳联领袖龚伯斯已经成为工人贵族，他将工会办公地从印地安那波利斯迁往首都华盛顿，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机构，"龚伯斯的穿着打扮则更像是一个绅士和企业管理人员，而不像一个工人或 19 世纪的劳工领袖。"[③] 在龚伯斯的领导下，劳联已成为一个有技术、受尊敬的工人阶级精英的舒适的家。龚伯斯在 1906 年这样说："工会不是周日学校，它是工资收入者的组织。处理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他认为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不需要理论，反对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结合，排斥知识分子。他认为与不懂工人运

---

① 《美国年鉴》，第 14 卷，第 455 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 112 页；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01 页。

③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 86—87 页。

动实践的知识分子纠缠结合是危险的。其他一些工会领袖也都有着与他相类似的看法。约翰·米切尔说："劳联为劳动者服务，但不反对任何人。他们不仇视雇主，对一般公众利益也毫无敌意。……不存在劳资对立的必要。"有人主张劳工运动"不要反对雇佣者的利益"，龚伯斯则进而言之："要为雇佣者的利益行动。"事实证明劳联已是工业资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敌人。①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创建和活动〕　20世纪初，正当劳联盛行阶级调和主义将工人运动引入歧途时，世界产联的建立和活动构成了美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最为绚丽的一页。在创建世界产联过程中美国的非熟练工人积极性最高，1893年成立的西部矿业联盟是他们的基本力量。这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工人组织，对劳联的阶级调和论抱有强烈的反感。他们在1898年5月的盐湖城大会上决定成立西部工人联合会同劳联相对抗。1902年，他们根据德布斯建议将组织扩大到东部工人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双重工会——全国工人联盟，为创建世界产业联合会打下了基础。

1905年6月27日，一些左翼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自美国西部矿工联盟、全国工人联盟、社会主义党左翼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在芝加哥布兰德会堂集会，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是威廉·海伍德，他出生在盐湖城，曾当过矿工和农民，领导过工人运动，参加过美国社会党。他对工人富于同情心，他在世界产联成立大会上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把这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形成阶级的运动，这个运动将把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们要到贫民区去找工人群众，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像样的水平。"工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267页。

人运动领袖德布斯、德里昂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大会对劳联的阶级调和政策加以严厉批评，指出劳联已经趋于明显的反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会议洋溢着一种团结战斗的气氛，与会者为来自东部的德里昂、来自西部的海伍德和来自中部的德布斯能参加会议欢聚一堂感到欢欣鼓舞。海伍德将大会比喻为“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①] 德布斯在会上说：“两者必居其一，一方是劳联和资本主义，另一方是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②] 世界产联主张暴力革命，采取直接行动摧毁资本主义。它的纲领序言中写道：“工人阶级同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要成百万工人还在忍受饥饿和穷困，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还在享有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世界产联成立之初有约5—6万成员，最多时达到10万人左右。它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人斗争，组织过一些成功的罢工，1906—1907年共领导了24次工人罢工，失败仅2次而已。在罢工斗争中，世界产联领导人注意通过罢工提高工人的觉悟水平和主动性，力排种族主义的影响，例如：世界产联在传单《致有色男女工人》上写道：“如果你是雇佣工人，就欢迎你光临世界产联会堂，而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由此你可以看到，世界产联不是白人的联合会，也不是红色或是黄色人的联合会，而是工人联合会。”它也是第一个接纳华裔美国人的劳工组织。世界产联还在流动工人中进行了广泛而有效的活动，把街头巷尾作为动员工人的场所。[③] 但是由于组织中存在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组织

---

① 见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90—292页。

②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101页。

③ 张友伦：前引书，第293—294页。

内部不断分裂，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产联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和劳联领袖的无耻破坏，最后逐步解体。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　美国社会党的建立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自 1898 年始，德布斯和伯杰成为组织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德布斯被列宁称誉为"美国无产阶级最敬爱的领袖之一"。他们得到反对德里昂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德布斯团结了美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在 1901 年建立美国社会党。此后美国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在美国日益增长。德布斯参加了 1900 年、1904 年、1912 年和 1920 年的总统选举。1912 年，德布斯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获得 89.7011 万张选票。美国社会党严厉批评美国劳联的阶级调和路线。德布斯曾说劳联是被工人贵族控制的工会组织，"我们谈论改革那个处于工人贵族绝对统治下的腐败透顶的劳联，正像把玫瑰油撒在臭水池里一样，白白浪费时间。"[2] 令人遗憾的是 1909 年社会党左右翼开始分化。

美国社会主义者在组织实际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工作。例如：里维雷特·维尔曾在 1902 年专门出版了一本题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小册子。他在书中强调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运动，指出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必要性，认为这场运动基于阶级斗争之上，是一场革命运动而不是一场改革，即主张在社会内部进行变革，没有这种变革无法取得进步。他在书中说："譬如，改革者仅仅希望消灭剥削中产阶级的铁路垄断，而社会主义者则希望用消灭工资制度来消灭所有的

---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05 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04 页。

剥削……社会主义者要求一个社会的全面变革——变化如此激进以致成为一个社会革命。'革命'这个概念用来描绘最后目标的取得，而非实现目标的手段或策略。"①

五、妇女继续为争取权利而斗争

〔工业化对妇女的影响〕 妇女和妇女运动是20世纪初年美国社会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美国妇女社会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妇女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的一种反应。

初步实现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梦想是工业化给妇女带来的最大变化和惠顾。这使她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质的转折。由于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对大量自由劳动力的需求，这就给妇女参加劳动提供了客观需要；许多家用电器诸如电灯、电熨斗、电烤箱等等的发明和使用，为妇女走出家庭摆脱繁重的家务提供了现实可能；工业化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家庭生活简化减轻了家务劳动的强度，为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创造了条件。自镀金时代开始，美国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已经逐年提高，1870年外出劳动的妇女占整个妇女人数的15%，1900年占21%。1910年，每千人中有243人参加了工作，包括189.1万已婚妇女在内。妇女参加劳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得到的回报却是难以想像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美国劳工局在1907年到1909年间对棉纺织厂、绢织厂、服装厂、玻璃制造厂和丝织品制造厂等进行调查，发现在这些行业的女工特别多，但是她们的工资却最低，低廉到只能维持她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而已。1914年，大约有一半16岁以上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496—497页。

的女工，每周工资仅为6美元多一点。[①] 在妇女劳动大军中，移民和黑人妇女在家庭佣工和制造业中占有绝对多数。他们大多住在贫民窟和租赁的房屋里，饮食失调，缺乏阳光、新鲜空气和娱乐设备，医疗照顾不够和自来水不清洁等等，因此在妇女和儿童中间出现了像早年边疆时期那种骇人听闻的高死亡率。[②] 典型的女工是城市中的年轻单身女子，她们不是移民就是移民子女。她们往往和家人住在一起，她们的职业多为家庭佣工，即在雇主和中产阶级家庭帮佣。女工的收入低于男工，往往只能养活自己而已。据统计，一个自给的女工生活费用约为平均每周5.51美元，她们的平均收入为5.68美元。[③] 在南方城市中，黑人已婚妇女参加劳动的数量是白人妇女的5倍左右。

工业化也冲击了美国妇女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思想观念。总体而言，妇女因为参加劳动减少了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独立性得到提高，所以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有所增强。因而冲击了家庭婚姻观念和家庭的稳固性，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890年的10万分之53上升到1900年的10万分之73，1916年的10万分之112。[④] 妇女首先提出离婚的人数日增。工业化时代，美国妇女在服饰上也有了新的追求，劳动妇女和爱好体育活动的女子追求服饰的实用和简便，渐渐改变了过去以高领、紧身、拖地为特征的旧服饰。与婚姻恋爱观相联系的是生育观，据统计在白领阶层的妇女中生育率已有大幅下降。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妇女群体自身的结构也随之发

① 哈罗德·福克纳：《追求社会公正：1898—1914》，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1年，第153、154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44页。

③ 卡尔洪：前引书，第122页。

④ 福克纳：前引书，第168页。

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一支中产阶级妇女队伍。一些家境较好的妇女开始摆脱家务的羁绊冲出家庭走上社会，外出劳动或进入学校深造。1910年美国约有8500名妇女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约有数十万人参加工作成为教士或职员等等。[①] 中产阶级妇女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平等意识，她们站在妇女运动的前列，发表文章宣传男女平等和争取妇女权利的重要性。20世纪初年美国妇女运动出现新的高涨形势。

〔*妇女运动的高涨*〕　争取男女平等一直是美国妇女运动的目标之一。在1898年美国一些州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歧视妇女的严重现象。例如：美国有7个州法律规定父亲对子女的权威性；6个州仍然规定父亲为一家之首，妻子必须服从丈夫；3个州在法律上采取双重标准：通奸只有在妻子成为冒犯者时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等等，不一而足。[②] 但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何在？美国妇女领袖们对此作出了深刻分析。美国著名妇女运动理论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1898年发表的《妇女与经济》中说道："妇女的劳动不仅在内容上受限制，在形式上也一样受到制约。即使允许她们干这做那，她们也只能独自悄悄地进行，所从事的是最原始的手工劳动……"[③] 她认为经济地位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所以她主张妇女要取得地位最本质的是取得经济独立。美国学者德格勒认为"《妇女与经济》成了20世纪初美国和欧洲妇女运动一本主要读物，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是一位从事妇女事业的主要知识分子。"[④]

女权运动成为美国妇女运动的主流，领导人之一的M·凯里·

---

① 林克、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73页。

②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96—1900》，第172页。

③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474页。

④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96—1900》，第172页。

托马斯于1899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布林莫尔学院院长。1901年她发表文章《妇女应受不同的高等教育吗?》。她在文中说："妇女在大学期间应该享有最广泛的教育。这种教育应是不分男女性别的，原因是：一、我相信最好的教育只有一种；二、男女将作为同志、知心朋友、生活伴侣，一道生活，一道工作；三、如果男女在大学里，受到同样的知识训练，拥有同样的道德情操，那么，他们本身卓有成效的幸福生活以及他们后代子女的幸福日子都将有增无减。"① 1900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合并原来的妇女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了，领导人为卡丽·查普曼·卡特。在她的领导下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再现辉煌，1902年她在就职演说中说："过去，妇女运动的全部努力在于推翻女性在家庭中的隶属地位。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整体的女性是否应顺从作为整体的男性？能否允许在生活的各个部门享有自治权的女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享有自治权？一个男子支配一个女子是不对的，整个男性支配整个女性也同样不对。"②

美国女社会改革家，因在1889年创建赫尔大厦闻名遐迩的简·亚当斯积极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并且身体力行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10年担任美国全国社会工作者会议的第一任女主席，1915年任国际海牙妇女大会主席。与以前的女权运动不同的是，20世纪初年，在新的领导人带领下美国女权运动更注重斗争策略，注意与其他群众团体的合作，在争取实现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大目标时着重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她们举行各类社会活动，包括游行示威、群众集会等等，因而成效显著，最终取得选举权。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96—1900》，第488页。

② （美）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498—499页。

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中还有一股值得注意的力量：即妇女节育运动。节制生育是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大事。该运动领导人是被称为“计划生育之母”的美国节制生育运动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她曾说：“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1914年她创办《妇女反抗者》（后改为《节制生育评论》）。为了宣传节制生育的重要性，她向人们散发有关小册子和邮寄节育知识材料。她发表过不少有关节育的论著，在《妇女和新人类》一书中，她说：“节育的问题直接产生于妇女挣脱束缚，争取自由的努力。”“是妇女经年累月肩负着怀孕、生育、培养多余子女的重担。……看着畸形、瘦弱、营养不良、劳累过度的孩子，是妇女的心最先、最多、最深地受到刺痛。因为害怕再次怀孕，是她们的爱情生活最先窒息。是她们的自我表现机会因此最先丧失。”① 她不但是节制生育运动的宣传者更是一位实践者。1916年她大胆地在布鲁克林城创建美国第一所节制生育诊所，候诊者人满为患排成长龙。她因此在1917年因“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被拘禁30天。但她的工作受到妇女的支持和同情，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取得成果。1921年，桑格夫人创立美国节制生育联盟，并任该组织主席；1927年组织了世界第一次人口会议在日内瓦成功召开。1922年，桑格夫人还到过中国，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宣传节育。她因而也成了节制生育运动的国际领导人。她创导的节育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全球发生的影响与日俱增。

女工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们除了积极参加行业工人罢工斗争外，还独立进行罢工争取自身权益。1909年3月，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罢工和游行，得到世界和全国妇女的支持。

---

①（美）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581、583页。

1910年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决定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这是美国妇女斗争的胜利成果。

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进入更为有组织的阶段，一系列的妇女组织建立起来并开展了有效的社会活动。1899年成立了全国消费者联盟，领导人为约瑟芬·洛厄尔、佛罗伦斯·凯利和约瑟芬·戈德马克；1901年建立了青年联盟，1903年建立了美国全国妇女工会联盟，推动建立该组织的是玛格丽特·德赖尔·罗宾斯和玛丽·麦克道尔。已有成百万的妇女参加各类妇女俱乐部。

六、少数族裔的抗争

〔印第安人的抗争〕　20世纪初虽然印第安人被认为结束了武装反抗，但是他们的抗争从未停止。原因是印第安人的处境并未真正得到改善。据统计，1890年美国印第安人总数为27万左右，1910年减为22万人。从1901年开始美国印第安人进入一个被认为是美国人的过程。1901年在俄克拉何马保留地的5个部落获美国公民身份。[①] 1906年美国通过柏克法案修正案，取消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部落制度和土地公有制，使白人进一步夺取保留地内土地成为合法化。1907年保留地的其他印第安人归化入美国籍。虽然在1890年开始，印第安人一般结束了武装反抗白人侵犯的斗争方式，但是印第安人依然常常被剥夺土地，被赶出保留地，公民权利被否定。1900年大约有25万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即使在保留地生活，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法得到保障。首先，在保留地里一些印第安人部落因为不习惯那里的单调生活，在疾病和营养不良等因素的侵袭下人口锐减，平原印第安人曾有

①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前引书，第81页。

15 万人，但 1907 年只剩 5.3 万人。32 个部落中有 6 个已经被消灭。“黑足”部落从 1.5 万人锐减为 5000 人。9 万多居住在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印第安人锐减到 1.6 万人。[1]

其次，在保留地中，印第安人的权利也经常遭到轻视甚至侵犯。美国新闻记者乔治·凯南于 1902 年 3 月 29 日发表文章题为：“保留地印第安人有授予权吗?”文章揭露了有关印第安人保留地受到侵犯的事实。这是根据政府与苏族印第安人在 1868 年协议建立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那里是一片光秃秃的半干旱土地。20 年后，即 1888 年这里的一半土地被白人占有。1902 年，这里只有 3700 名印第安人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他们勤劳、友好和忠诚，在文明进程中取得长足的进步。1901 年，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计划将铁路修筑到保留地东南角的对面。公司企图说服印第安人为公司投资人的利益让出一大块保留地作为牧牛场。在 1901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会议上，印第安人表示拒绝。因为他们已经有 1.5 万头牛和 8000 头马，为此他们将需要利用开发保留地的东南部土地。同年 5 月 15 日，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琼斯写信给华盛顿的助理说：“我非常喜欢从保留地得到多余的土地作为牧场。但是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我们无能为力。”但是 5 个月后，即同年 10 月 9 日，这位印第安人事务专员却改变主意，未经印第安人同意竟然答应铁路公司的要求，诱使印第安人签订有利于铁路公司的协议，并在协议中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印第安人同意的“保留地的未居住地区”改成“保留地的居住地区”，即将印第安人居住的、开发改良好的土地都辟为牧场。这种无理要求激起印第安人的抗议，1902 年 1 月 13 日，保留地的 3 位印第安人领袖电告阿肯色州参议员琼斯说：“有 400

---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87 页。

家庭居住在根据协议建议的界限之内，他们反对签署这样的联合协议。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一致提出抗议。这样做，我们的农场将被蹂躏和践踏。我们在家乡的建筑和农耕的一切努力将化为乌有。"① 抗争终于取得成功。

〔黑人的反抗斗争〕　20世纪初年，美国黑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高举黑人运动反抗的旗帜，成为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良好开端。面对19世纪晚期黑人运动中的妥协倾向和布克·华盛顿的温和路线的影响，1903年美国黑人著名学者杜波伊斯出版了《黑人的灵魂》一书，提出黑人斗争的强硬道路，并富有预见地说："20世纪的问题是种族歧视下的肤色界限问题"。在书中，他明确地揭示了美国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两重性，说："一个人总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方面是美国人，另一方面是黑人；两颗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妥协的抗争，在同一个黑人身躯中两种冲突的理想；只是其自身的顽强毅力才免使自己的身躯被撕得破碎。"他还批评了黑人运动中布克·华盛顿提出的妥协路线。1905年7月11日—13日黑人报纸《卫报》在尼亚加拉召开大会，揭露和抗议黑人在美国社会遭受的迫害和歧视，发起了尼亚加拉运动，杜波伊斯当选为总干事。尼亚加拉运动之原则声明（据说是杜波伊斯起草的）强调了维护黑人的选举权、公民自由、谋生机会、教育权等等权益，严正地宣称："我们认为美国公民中的这一阶级应着重不断地反对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还支持反对剥夺我们民权的斗争。只是由于种族或肤色不同而加以歧视，这是野蛮行径，无论习俗、权术和偏见如何使之神圣化，我们全然不管。"声明还指出"将黑人子弟排除在陆军和海

① 《美国年鉴》，第14卷，第476—480页。

军训练学校门外，是不公正的。”[1] 尼亚加拉运动持续了4年。在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中，杜波伊斯特别强调黑人的高等教育问题，1906年他被邀在汉普顿参加会议发表演说，题为“汉普顿概念”，他说，在现代世界中他们这个种族最缺乏的是什么——即他们最需要的，或他们最失败的是什么？他想一些人也许会同意并回答这个问题：有人也许会说是教育，有人会说是财富，一些人会说是耐心，一些人说是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然而他认为多数回答者也许会理解他所给予的答案：能量。[2] 他不同意黑人仅仅接受一般的普通教育或技术职业教育，而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培养黑人自己的人才和领袖。

1908年8月，在林肯的故乡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白人迫害黑人的流血事件，激起民愤，震惊全国。在抨击暴力事件过程中，一些正义人士经过筹划于1909年5月31日和6月1日在纽约召开讨论黑人地位大会，约300多人与会，杜波伊斯在会上发言指出黑人的问题在政治上如同经济上一样非常重要。会上建立了美国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杜波伊斯是该会的创建者之一。其他领导人还有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废奴主义者威廉·加里森之孙）、威廉·华林、玛丽·怀特等等。“建立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重建以来使黑人权利成为全国改革焦点的第一次重大尝试”。[3] 总之，20世纪初，美国黑人斗争在强硬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出色成就。

---

①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509页。

② 杜波伊斯：《黑人教育》，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7页。

③ 法兰克·马吉尔编：《历史大事记美国丛书》第3卷，萨尔姆出版公司，新泽西，1975年，第1386页。

社会结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生深刻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惊人的增长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历程。世界范围的城市扩展在社会组织和文化的重要模式方面正带来巨大变化。”① 有的阶层崛起，有的阶层衰亡，中产阶级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扩大；社会流动加速，黑人大迁移，移民掀起高潮，农业人口流向城市，人们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攀升；社会问题加剧，贫富不均，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群众斗争自下而上连绵不断，工人罢工，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妇女争取权利，黑人斗争走向强硬。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汇成推动改革的巨大动力，惟改革才有出路。美国社会面临重大改革，进步主义运动应运而生。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5页。

第四章

国内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资本主义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难题，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美国民众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困惑之中。何以心中珍藏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反差？早在19世纪末年，美国的农场主阶层、都市工人阶级以及部分中产阶级人士，就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要求和主张，有的甚至在一定范围之内将其付诸实践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日趋高涨。19世纪后期改革的涓涓细流，终于在新世纪降临之际，汇集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改革浪潮。这便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

一、“黑幕揭发”的掀起和暴露文学的兴盛

舆论总是改革运动的先导。20世纪初年，“当分散的、无组织的进步主义队伍在美国的各个角落逐渐地汇集时，一种新的新

闻时尚骤然间将进步主义运动带人人们视野的中心,"[1] 这种"新的新闻时尚"便是所谓"黑幕揭发"运动。它的兴起,堪称新闻领域内的一场"革命"。此间,一群号称"黑幕揭发者"的新闻记者和时事评论家,探查美国社会中的阴暗角落,揭露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耻辱和腐败,大声疾呼人们警惕那些对民主政治前途产生不妙影响的变化,推动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改革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文学领域内也涌现出一大批现实主义的、有着丰富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称之为"暴露文学"。

〔"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头十年间,一些正直的、有社会良心的新闻工作者,受职业道德的驱使,拿起自己锐利的笔,专注于揭露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各种为人关注的问题,例如1895年以后托拉斯惊人的成长,政治上的腐败,劳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城市化的罪恶,教育上的失败以及卖淫、种族关系等等。进步主义时代的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问题对于美国自由政府的存续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除非充分地唤醒民众发动一场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新闻领域内的黑幕揭发者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方面的舆论动员工作。

黑幕揭发者继承了19世纪80、90年代《麦克卢尔》、《芒西》和《世界主义者》等大众杂志形成的传统。多年来,《论坛》、《竞技场》、《麦克卢尔》甚至稳重的《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杂志,一直刊登描述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弊端的文章。亨利·劳埃德在《大西洋月刊》上对准美孚石油公司所放的第一炮,可以远溯到1881年。诸如亨利·乔治、尤金·德布斯这样的激进分子,早在90年代初就在《竞技场》上讨论各种问题。乔西亚·夫莱恩特1900年在《麦克卢尔》上暴露了罪犯与纽约警察

[1] 约翰·格拉蒂:《1865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纽约,1966年,第230页。

之间的腐败关系。这类文学的节奏和力度稳步增长。直至1902年秋，《麦克卢尔》开始刊登三篇极具影响力的连载文章，其一是爱达·塔贝尔关于美孚石油公司的文章，其二是林肯·斯蒂芬斯有关都市政治机器的作品，其三是雷·斯坦纳德·贝克的文章。

《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始人麦克卢尔“是一位热情奔放但有点古怪的爱尔兰人”，具有经营头脑，善于捕捉新思想和读者。他了解到公众对于铁路和工业联合体扩张的激动心情，逐渐产生办廉价刊物的新颖想法，决定刊登具有当时经济和社会重要性的文章。1896年，他让年轻的属下爱达·塔贝尔写一部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并计划下一年2月份开始连载。结果塔贝尔小姐整整花了5年时间从事艰巨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了《美孚石油公司史》，并于1902年11月起在《麦克卢尔》上刊登，连载15个月，轰动全国。

塔贝尔的作品以冷静客观见长，她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注重事实，将洛克菲勒及其同伙建立石油垄断的种种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她对洛克菲勒手法的谴责令很多美国人大为震惊，同时也令很多人高兴不已。洛克菲勒是“自我造就者”的缩影以及自由企业体制的国家象征，塔贝尔关于他的公司的起源以及惯用的集聚财富的手法的揭露，引起很多深思的美国人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的利弊进行重新审视。1904年，她的文章结集出版。

在1903年1月号的社论里，麦克卢尔声称“美国人品行”的某些方面出了大问题，因为刊登的这些文章表明，大量的美国雇主、工人和政治家实质上都是不道德的。更为严重的是，律师成了大企业的工具，法官允许作恶的人逃避正义，教会变成物质至上，学院甚至无法理解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这篇社论写道：

“已经阅读过本期杂志的人中有多少人注意到它里面包含有三篇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我们并非刻意地将它们放到一起。1

月号的《麦克卢尔》对美国人这样地加以责难以致我们每一个人停下来深思，纯属巧合。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点了呢？

标题文章‘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或许更应该称之为‘美国人对法律的蔑视’。那一标题用于本期塔贝尔小姐‘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篇章也会很合适。将之用于贝克先生的‘工作的权利’将太完美了。总之，这些文章已差不多反映出我们的这种危险特性是多么的普遍。塔贝尔小姐讲述了我们的资本家如何依据法律，深思熟虑地、精明地图谋打破限制他们的法律，以及滥用它去限制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贝克先生让人们看到，劳工——资本的古老敌人以及托拉斯违法行为的主要抱怨者，本身在犯罪并为自己作辩解。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市政府如何利用罪犯犯罪来为选任官谋取利益，而公民们——有着良好血统和一般教养之上的美国人以及诚实的、健康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却自满地站在一旁，未能为之警觉。

资本家、工人、政治家、公民——全都在违法，或是听凭法律遭到侵犯。还有谁剩下来坚守法律呢？律师吗？这个国家里的一些最出色的律师确实被雇佣，但不是进入法庭去替案子辩护，而是在为公司和商号出谋划策，看如何能够在没有冒太大惩处危险的情况下钻法律的空子。法官吗？他们中太多的人如此尊重法律，以致于由于某些‘错误’或模棱两可的措辞，他们就退居办公室，成为自由人……。教会呢？……

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人了，除了我们。资本（由于劳工的违法行为而义愤填膺）正在得知自己的对头对法律的蔑视是对财产的威胁。劳工已经尖声地喊出自己的信念：资本的非法权力是对工人的一个威胁。这两者越来越接近。去年 11 月，当以芝加哥为中心的铁路运输工人威胁着要罢工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起，通过提高工资解决了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运费。他们让公众掏腰

包。我们都在干坏事，都在让公众掏腰包。公众就是人民。

我们忘记了我们都是人民；当我们每个人将今天的账单推给别人时，债务仅仅是延期偿付，别人正在将其推还给我们。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付出，我们当中每个人概不例外。而且最终的债务总数将是我们的自由。”①

在社论的结尾，麦克卢尔呼吁“人民”发起对恶行的道德远征。杂志一出版，很快销售一空。通过阅读它所刊载的文章，“成千上万的读者发现自己含糊的忧虑被提出来了，一些人积极地投身于各种进步主义运动之中，更多的人消极地表示支持。”②

《麦克卢尔》杂志总编辑林肯·斯蒂芬斯（1866—1936年）堪称20世纪最优秀的记者之一，他为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党魁政治所吸引，开始了城市黑幕揭发的非凡经历。他第一篇重要揭露文章“圣路易市特威德统治的日子里”出现于1902年10月号上。1902—1903年间，他先后调查了圣路易、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费城、芝加哥和纽约等地的政治状况，所见所闻令他眼界大开，所发现的政治腐败现象之普遍，程度之深之广，令他吃惊不已。他将这一切发现，公诸于《麦克卢尔》杂志，并得出结论性的看法：“城市的腐败主要是由于人们驰废的道德引起的。”③文章发表后，他的知名度大增，某些地方政客也因为文章所揭发出的真相而忧心忡忡。1904年，这些揭露城市腐败的系列文章汇编成册出版，名为《城市之羞》。

斯蒂芬斯接着致力于揭露密苏里州、罗得岛州的政治腐败，其成果于1905—1906年在《麦克卢尔》上连载，并于1906年汇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533—534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1页。

③ 里查德·E·马歇尔、约翰·E·威尔兹：《从进步主义时代到常态》，J. B. 里平科特公司，费城和纽约，1973年，第9页。

编成书出版，名为《争取自治的斗争》。在揭露了两个州之后，斯蒂芬斯又将注意力转向联邦政府，目标对准那些具有新英格兰血统的“WASP”领袖们的腐败。

《麦克卢尔》杂志第三个重要的黑幕揭发者雷·斯坦纳德·贝克，着力从事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调查，其笔触先后指向了1903—1904年的科罗拉多煤矿大罢工、铁路公司的不法行为以及当时南北方盛行的白人种族主义。他的《铁路公司受审判》对铁路进行了有力的控诉，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说服力，推动了罗斯福总统插手扩大州际贸易委员会权力的斗争。

除此之外，《麦克卢尔》还拥有其他一些出色记者。伯顿·亨德里克1906年公布了纽约各保险公司的腐化堕落和管理不善的揭发材料。乔治·特纳1909年揭露了中西部城市芝加哥的警察与有组织的卖淫业相勾结的黑幕，引起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为此而专门成立的罪恶调查委员会经过一番深入调查之后，于1911年提出了一份非常著名的调查报告。

《麦克卢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刹那间便成为一份畅销杂志，月发行量达到25万册以上。其他杂志也争相仿效。《科利尔》杂志揭露了专卖药物的骗局和“黄色报人”威廉·赫斯特的诡计，《人人》杂志揭发了牛肉托拉斯的垄断，也都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1903—1909年间，黑幕揭发活动日益兴隆，触及美国生活的每个阴暗角落，揭发题材涵盖政府、劳工、工会、大企业、华尔街、健康医疗、食品工业、童工、女权、贫民窟生活、人寿保险、药品业、学院运动员、卖淫、血汗工厂、政治腐败等等方面。这些黑幕揭发文章总体上建构在事实之上，格调上充满了义愤，主要诉诸公众的良心，同时它也包含一定的“煽情”成份，某些杂志一味地迎合公众对丑闻的爱好，片面地投好中产阶级阅

读的口味。所以，有历史学家指出：黑幕揭发作家中，“很多人是活跃的改革家，另一些仅仅是接受了任务的诚实的新闻记者，还有一些人则是利用流行时尚的玩世不恭的雇佣文人。”[①]

玩世不恭的文人中有一类便是所谓的“黄色”黑幕揭发作家或出版商。这些不正派的出版商和作家利用黑幕揭发，作为生财之道。第一个黄色黑幕揭发作家是托马斯·劳森，他在1905年刊登于《人人》杂志上的连载文章《疯狂的金融》，揭发了高度发展的金融业这个怪物的内幕，但对金融腐化的揭发过分渲染、高度夸张。但文章产生的影响巨大，使得《人人》杂志的发行额一年内就由15万份猛增至75万份以上，同时也加强了公众控制股票市场的要求，这种要求最终促成了1913年普乔委员会的成立和立法调查活动的开展。另一个例子是“黄色报人”威廉·赫斯特。1906年，他宣称他的《世界主义者》杂志即将发表所有揭发文章中“最为强悍有力的”揭发文章。事实上，他即将炮制的由小说家戴维·菲利普斯执笔的名为《参议院的背叛》的连载文章，“是把真实、虚构和彻头彻尾的撒谎结合起来了”。

正是由于某些黑幕揭发作家作品的这种“过分渲染”和“扭曲事实”，激起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产生厌烦心理。在1906年的一次演说中，罗斯福对专门以社会黑幕为题材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横加指责，将他们比作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中“拿着粪耙的人”。他不客气地说：“在班扬的《天路历程》中，你们可以回想起对那个拿着粪耙的人的描写。那个人从不看方向，只是手持粪耙低头朝下。人们拿神圣的皇冠换他的粪耙，但是他既不抬头也不看一眼递过去的皇冠，只知道一个劲地耙地上的脏东西。”“黑幕揭发者”原意为“耙粪者（Muckraker)”，本来是罗斯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1页。

福送给那些专门揭发社会黑暗的人的一个带有侮辱性的恶名，然而却被他们心安理得地接了过去。从此，该名称与黑幕揭发文章一起广为传播。

20世纪初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也大大得益于技术上的进步。由于印刷技术的突破，报刊的印刷成本大幅度降低，刊物的零售价大幅度下降，平均由35美分降低至10美分，从而拓宽了市场。而报刊发行量的扩大，又使得这种传媒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总之，廉价刊物给黑幕揭发者提供了舆论宣传工具，这种宣传推动了社会变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虽然黑幕揭发者并非进步运动的创始者，他们只不过是"美国社会一场更大运动（即进步主义）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声音"，[①] 但是，他们的加入及其活动，"激发起中产阶级的义愤，有助于促使进步运动成为一场全国的起义，而不是一系列零散的战斗。"[②]

〔*暴露文学的兴盛*〕　　几乎与黑幕揭发开展的同时，一种献身于改革事业的暴露文学创作在90年代蓬勃兴起。

暴露文学始于70年代后期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1879年）的问世；随着80年代后期爱德华·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顾》（1888年）的发表而具有声势；到90年代中期前后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尖锐抨击美孚石油托拉斯的《与共和国抗衡的财富》（1894年）而臻于成熟。此后，美国报刊上指责和揭露蔚然成风。

如同黑幕揭发运动的兴盛一样，暴露文学的兴起，也是中产阶级美国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产物，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良知觉

---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美国今昔》，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公司，伊利诺斯州，1986年，第355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第76页。

醒的结果。20世纪初年，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受过良好教育、往往具有正直心的作家便以其现实主义的笔调，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坦率的再现和暴露，甚至作无情的鞭挞和针砭。暴露文学的兴起，也与1900年以后美国文学创作中自然主义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自然主义流派强调，必须像生物学家研究动物世界那样研究人性，并且不用同情的眼光也不用道德的标准去描绘纯粹的自然现象。

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里斯、厄普顿·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等都是著名的现实主义暴露文学的代表。这些人的作品格调清新，视野广阔，主题广泛：或展现生活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微薄者、朝不保夕者、希望渺茫和生活呆板的人们的活生生的人间悲剧，或描绘处于深渊之中的下层人们的反抗和仇恨；或揭示金融家、巨头等大人物的发迹和胡作非为，或谴责触角无处不到的大企业大公司；或揭露党魁的专横、政党的肮脏，或批评政治制度的腐败；或从经济问题落墨，或专注于社会问题。总之，他们战斗的笔，辅之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不同侧面和视角，触及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主要领域和方面，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阴暗面、丑恶现象及其腐朽本质暴露无遗。在尖锐揭发之余，有的激进作家甚至呼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贫困一向是暴露文学作家着力耕耘的一块领地。早在1882年，作家、编辑、家庭经济学家海伦·斯图亚特·坎普尔(1839—1918年)就在关于纽约贫民窟的著作《穷人的难题》中对其有所揭露。同时她还给《论坛报》撰稿，后来结集为《穷困的囚徒》(1887年)出版。1890年，“美国梦”破灭了的丹麦移民雅各布·里斯发表《另一半人如何生活》，真实地描绘了城市贫民窟中的日常生活，其散文体和照片激发起美国人的良知。此

外，还有：罗伯特·亨特的《贫困》（1904 年）、约翰·斯帕哥的《儿童的痛苦哭声》（1906 年）、沃尔特·劳申布什的《基督教与社会危机》（1907 年）以及佛罗伦斯·凯利的《失业》（1915 年）。这些著述，使得很多人很难再相信：肮脏和饥饿是加给懒惰者和道德品行上有缺陷的人的神圣惩罚。揭发富豪统治集团的作家中，最多产的是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斯·迈尔斯。为弄清美国的巨大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他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 3 卷本的《美国富豪史》（1909—1910 年），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一向的指控：美国的巨大财富是靠掠夺和预先占有自然资源而形成的。

随着暴露文学的兴盛，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写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大师西奥多·德莱塞便是其中之一。德莱塞的父亲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生活极其艰难，德莱塞就是在贫困的家境之中长大成人的。他的代表作之一《嘉莉妹妹》描述了小人物如何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的悲惨命运。在谈及 1901 年发表的《嘉莉妹妹》时，他说它“并非被设想成一部文学艺术师的巨著，而是一幅时代画卷。”[①] 他在生物学中找到了探索真理的答案，揭示出：人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在不具人格的宇宙中为生存而斗争；在为财富、权力和欲望的满足而奋斗的过程中，人恢复了真正的动物本性；社会势力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并驱使不能公开反抗社会习俗的弱者去犯罪和采取暴力行动。1911 年他又发表了《嘉莉妹妹》的姊妹篇《珍妮姑娘》。他的“欲望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金融家》（1912 年）和《巨人》（1914 年）是有影响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两书取材于 19 世纪 90 年代芝加哥公共运输业巨头查尔斯·耶基斯的经历，描绘了人为了拼命地追

---

① 查尔斯·M·多纳：《美国：变动的时代》，纽约，威利出版社，1979 年，第 731 页。

求成功，如何滥用价值，如何常常导致暴力犯罪。

南太平洋铁路是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章鱼》（1901 年）的主题。作为描写有关小麦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未完成的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书展示了南太平洋铁路如何控制加利福尼亚州政治、如何扼杀麦农。三部曲的第二部《深渊》（1903 年）描述了一家垄断性的铁路公司操纵小麦市场的企图及努力。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天晓得的成功》（1901 年）和《第二代》（1907 年）中，发掘了金钱的腐蚀力这一主题；另外一本著作《苏珊·伦诺克斯的沉浮》（1917 年）则剖析了驱使一个农村姑娘在城市卖淫的社会势力。罗伯特·赫里克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1905 年）和《克拉克的战场》（1914 年），深刻描绘了在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中富豪的飞黄腾达。

另一些暴露文学作品尖锐地批判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缺陷。罗伯特·亨特的《贫困》（1904 年）和本·林赛的《野兽》（1910 年），控诉了资本主义使贪婪、剥削、贫困和腐败不可避免。社会党领袖兼作家约翰·斯帕哥在《儿童的痛苦哭声》（1906 年）中，愤怒控诉吞噬儿童的资本主义制度，呼吁对童工状况进行改革。

社会主义批评家中最有影响的是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 年），他“毕生致力于对美国社会弊端的攻击，同时寻觅人道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改革”。[①] 其最重要的著作《屠宰场》（1906 年），通过讲述在芝加哥屠宰加工厂工作的一位立陶宛移民的故事，对带给广大人民群众以饥饿和不幸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动人的控诉，呼吁实现社会主义。作品对芝加哥肉类加工、包装业中的状况尤其是对屠宰场污秽环境的暴露描写，激起民众极大

① 里查德·E·马歇尔、约翰·E·威尔兹：前引书，第 11 页。

的关注，最终导致罗斯福总统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调查，成为促进1906年肉食检查法通过的一个有力推动因素。卡尔·桑德堡的诗歌谴责了牲畜围场和钢铁厂内的非人道性。另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杰克·伦敦，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猛烈的文学上的激进派。《深渊中的人》（1903年）描述贫困，《铁蹄》（1907年）描绘了所谓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制度；《阶级战争》（1905年）和《革命》（1910年）断言工人阶级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20世纪头10年，政治小说家对美国制度的批评虽然较温和，但更加多产。亨利·刘易斯的《老板》（1903年）是根据坦慕尼协会的“党魁”理查德·克罗克的经历写成的。埃利奥特·弗劳尔的《政党分赃制的赞助人》（1903年）描绘了政治腐败行为。布兰德·惠特洛克根据自己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政府任职的经历，写成《第十三选区》（1902年）和《均势的转变》（1907年），是暴露文学中两部有影响的作品。布思·塔金顿的《印第安纳州来的绅士》（1899年）、《竞争场里》（1905年）及其他小说，主要描写州政治生活为铁路公司和企业界所腐蚀的现象。

新罕布什尔州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最受欢迎的政治性暴露文学作家，他的《科尼斯坦》（1906年）和《克鲁先生的经历》（1908年）始终贯穿着一个信念，即只要坚强质朴的人民清除坏蛋，选贤任能，美国政治就会更新。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揭露政治腐败，他的作品也成了畅销书，销售高达几十万册。和一些作品失之肤浅的作家不同，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李树》（1905年）试图揭露美国各地的腐化和特权现象，表现出一定的深度。

反对现状的文学家，对进步运动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写作的主题涵盖面广，包括童工问题、动用州军队镇压罢工、政治腐败、美国社会的阴暗面等等；其作品广为阅读，尤其是中产

阶级美国人。通过这些作品，暴露文学家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使得人们坚信：只要举国一致努力，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诚实政府一定能够实现。

二、进步主义思潮的形成

社会大变动在带来物质的、有形的变化的同时，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深层次的思想领域。19世纪下半叶，美国人的传统信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放任思潮日益显现出其保守特性，并因不断受到挑战而走向没落；相应地，强调政府对无序经济行为实行宏观管理与干预，对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整体发展进行协调与规划的进步主义思潮日渐形成。如果说黑幕揭发运动和暴露文学的兴起，为进步主义改革起了舆论动员作用的话，那么，进步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壮大，则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思想武器。

〔保守思潮——自由放任主义趋向衰落〕　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人奉行的哲学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放任主义，具体表现为：强调政府不应干涉人们的生活，强调个人权利和人身自由的不受侵犯，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领域内则表现为经济个人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这种哲学，以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信仰为基础，以古典经济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理论依据。

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源于英国，由移民将其引入北美大陆，随后在北美独特的土壤里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早在“杰克逊时代”，它就取得了国家信条的地位，甚至从美国独立起，“个人主义、对企业的热爱以及对个人自由的荣耀，就一直被美国人看作

不仅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而且是他们独自拥有的财产”。[1] 美国人思想文化中的这种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与源源而人的广大移民的积极进取精神相对应，对于推动北美大陆的大规模开发和美国的迅速崛起，曾经起到了有益的、值得肯定的作用。

古典经济学强调：惟有允许人们不受政府限制措施的掣肘，也不得助于政府的恩惠，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最高的社会福祉。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据此阐发出一系列的理论。所谓“财富的福音”，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推论，同时尽力为工业巨头的领导地位寻找道德和社会的根据。此说争辩说，成功以及财富的获得，是勤俭、节约和才智的正当回报，人类的芸芸众生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其自身的懒惰以及天生的弱智。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秩序、保护财产；控制经济的事务，应该留给那些在竞争中取得了领导地位的天然贵族。另一方面，这些天生贵族对于社会负有大量义务，因为他们是国民财富的保护者。

南北战争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传入美国，加剧了美国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同时也为其涂上了一层冠冕堂皇的理论保护色。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物种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却牵强地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如同动物界一样，通过适应环境缓慢地进化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这种庸俗的社会观——即所谓社

---

① 詹姆斯·布赖斯：《美利坚共和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2 年，第 590 – 591 页。罗伯特·凯利：《美国过去的塑造》，第 2 卷，新泽西，1986 年，第 416 页。

会达尔文主义起初影响并不大，倒是传人美国后立即赢得了广大的市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主要阐释者和鼓吹者是耶鲁大学的知名教授、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威廉·萨姆纳。由于他的努力，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成为 19 世纪最后 30 余年间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哲学。

作为一种庸俗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社会、现状、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国家职能等问题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解释。首先，它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地进化着，竞争、毁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社会藉此而前进。对现存制度的任何干预只会阻碍进步。在一个根据适者生存原则运行的自由社会里，权力会自然地流向最有才能者手中，财产的拥有和获得是神圣权利，“文明依赖于这种体制”。[①] 其次，它认为，进步源于自然进化，取决于自由竞争。“文明的进步依赖于选择的进程，选择的进程又有赖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进行。竞争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这种法则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无法摆脱或废除。”[②] 第三，国家应该只限于从事保护财产和维持秩序的治安活动；若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势必会破坏自然选择的有益影响。贫民窟和贫困是竞争带来的不幸，然而是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由国家出面干涉来消灭贫民窟和贫困是方向性的错误。[③] 贸易有某些天然法则，运用这些法则将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自由竞争是经济生活的伟大调整器，它保证适者生存、劣者淘汰。干预竞争法则就是家长式统治或社会主义，它使得人类进步的冲动受到压制。因此，理想的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它只实行最低限度的

① 玛莉·诺顿等：《民族和国家：美国历史》，米夫林公司，1982 年，第 478 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纽约，1959 年，第 57 页。

③ J. 布鲁姆等：《美国的历程》下（一），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55 页。

政治控制，对个人则给予最大的机会。[①]

显然，这是一种保守的哲学。它提倡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它主张严格限制政府权力，敌视行政管理；它维护现状，否认人有意识地改变目前环境的能力，阻碍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这种维护现状的传统保守思想，不遗余力地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大企业的统治辩护，鼓吹宪法是富于“灵感”的文件，最高法院是“神判”的解释者，铁路建筑者、金融家和工业巨头对国家的进步有功。然而，正是这种哲学，成为“南北战争后一个时期内不断上升的资本家的一种度身定制的哲学”[②]，得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极力拥护。到 1900 年，这些观念在一般公众心中也同样根深蒂固，几乎成了美国人的信条。大工业家、大金融家和大企业主们，总是乐于运用这种哲学来证明 19 世纪末年至 20 世纪初美国空前剧烈的竞争、大规模的企业合并或者巨额财富积累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必然性，将其作为存在的“护身符”。于是，在“社会进步”的名义下，经济领域内的战争、贫困、剥削以及苦难，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南北战争后美国的泛滥，离不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由于“美国是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③] 由于美国的主权基础“并不是在愚昧和迷信的暗淡时代奠定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奠定起来的”，[④] 因此，较之其他国家，美国人民享有较多的个人自由，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同时，美国又是一个

---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35 页。

② 哈罗德·U·福克纳：《政治、改革与扩张，1890—1900》，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9 年，第 1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558 页。

④ 菲利普·方纳编：《华盛顿文选》，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 56 页。

移民国家，将新教伦理和拓荒精神集于一身的移民们，在富于流动性的开拓丛林和荒原的生计中，把自己的贫富荣辱系于个人的勤俭、勇敢、机智和冒险精神之中，由此使得一般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正因为此，个人主义在19世纪初就确立了国家信条的地位。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工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边疆的消逝、城市的崛起、国力的猛增，使得美国人的乐观主义达到极点，人们充满了信心。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得刚刚摆脱内战苦难的美国人坚信："一个连接两洋，殷实富庶、联系紧密的崭新美利坚已经奇迹般地出现"。[①] 总之，美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自由竞争得到充分发展的现实，造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广泛传播、迅速扎根的良好土壤。

〔*反传统的新社会思潮的形成*〕　任何社会变革，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革命；要想破除改革的障碍，首先必须抨击、摧毁上述保守思想，必须使得人民相信改革和公共管理措施的有效。实际上，19世纪后期起，主张劳工立法的人，社会正义措施的拥护者，新社会学的法理学的解释者，宣讲基督教救世教义的福音派领袖，力主像从个人角度一样来从社会角度看待恶行的社会学家们，都在朝这方面努力，都试图用经济与社会事实为实现积极的政府管理打下基础。

伴随着南北战争后的政治、工业和农业革命，深思的人们对于政府及其在人类事务中应起的作用的态度也逐渐发生深刻变化。惊人的工业化引起的社会状况、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惊人不平等，逐渐摧毁了美国早期个人主义和平等信仰的基础。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对解释一切

---

① 罗伯特·威尔伯：《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67年，第11页。

行为的自然法则提出疑问。80年代中叶起，一批年轻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开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哲学提出挑战，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哲学、法学和史学等领域，提出了反传统的进步主义思想。

社会学领域内，以莱斯特·沃德和E. A·罗斯为首的社会学家对“斯宾塞—萨姆纳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进行了全面否定。首先，两人反对将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沃德论述道：“事实上，除了极有限的意义外，人类与社会并不受那控制其他动物世界的动力法则的影响，……如果我们说生物的进程是自然的，那么我们必须将社会的进程视作人为的。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则是人为的选择。”[1] 继之，沃德对社会理论中的自然法则加以攻击。在《动力社会学》（1883年）一书中，他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而不是自然法则，是文明向前迈进的原因所在；统一而协调的活动（即有计划的和政府的干预）才是达到和睦幸福的最进步手段。[2] 在此基础上，沃德对放任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如果自然藉着弱者的灭亡而进步，人类就应该是藉着保护弱者而得到发展。”[3] 在他看来，政府干预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个人自由只能通过社会调节来实现”；立法也不过是一项发明，与无数发明中的任何别的发明一样，都是人用以战胜自然的手段，立法乃是“社会集体智慧科学地控制各种社会力量以造福于社会的一种机制”。[4] 虽然沃德的同代人中鲜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但

---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79页。

② 玛莉·诺顿等：前引书，第479页。

③ 里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79页。

④ H.S.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12—313页。

是他在一大群年轻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的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美国人。

经济学领域内，理查德·伊利和约翰·康蒙斯等联合发难，对古典经济学的正统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盲目信仰进行了严厉抨击。1885年夏，这些曾经留学德国或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集会于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成立美国经济学会。“学会”发表的宣言谴责自由放任原则“政治上的危险性”和“伦理上的不健全”，声称“国家作为一个代理机构，它的有效帮助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①]；“变动中的经济形势必须有不断变化的进步主义立法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科的最高成就不在于“揣测推想，而是在于对人类经济生活情况作历史的和计量的研究”[②]。以之为指导，学者们开始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进行探索，开始研究公司的行为、市场的运行、金融活动、银行体制、劳工调解等等。

1887年，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的亨利·亚当斯发表《自由放任的限度》一文，认为垄断企业的产生不可避免，而且对社会生产有利，但必须将其置于国家的控制监督之下。文章指出：“人们并不抱怨垄断的存在，因为他们认识到垄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对滥用垄断带来的特权及不寻常的权力去谋求个人私利而不是服务于它的崇高目的感到不满”，因此，“应当保证社会能够抑制那些用于个人私利的独断特权，而同时也应当保护集中的组织所带来的好处”。

反传统的经济学家、社会批评家索尔斯坦·维布伦将经济法

---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147页。

②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5年，第15页。

则视为人类贪婪的面具，其著《有闲阶级论》（1899年）和《商业企业的理论》（1904年）分析了商人阶层的“掠夺性财富”和“显形消费”，对工业巨头是“最适者”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攻击，指出商人阶级的居心和习惯基本上具有掠夺性。在著作中，他具体区分了商业和工业，发现惟有工业能造福于社会，因为它不像商业，关心的不仅仅是利润。工业制造出产品，商业仅仅销售产品。但是，维布伦对所有的大企业表示怀疑并进行了控诉。他的《技巧的本能》（1914年）揭示了天生的创造欲是如何在毫无人性的垄断企业氛围中被挫败了。虽然维布伦的著作读者有限，但连同其他作品一起，“为进步主义改革的发动提供了论证、理论和技巧”①。

律师爱德华·贝拉米生长于新英格兰西部工业地区，对工业状况下社会的弊端多有了解。1887年写成的乌托邦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对现存社会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批评，对未来的社会制度作了展望。他梦想一种合作制社会，在那里，贫困、贪婪、犯罪不复存在。他还认为，把生产事业交给不负责任的个人经营，造成了极大浪费，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而财富和贫困达到极点就会产生灾难。避免灾难的补救方法是通过和平的道路进行社会改革，实现充分的国有化，以“兄弟般的合作原则”代替邪恶的竞争和破坏性的垄断。于是，他设想了一种新的“国家主义”体制。在此体制下，政府拥有并掌握生产和分配的手段，工业实行国有，整个社会组成劳动大军，个人主义的竞争原则被抛弃，合作是新秩序的秘密，分发生活必需品的大百货商店取代了林立的竞争性商铺，信用卡代替了货币。这种主张对渴望财富的广泛分配的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激发了许多主

---

① 查尔斯·M·多纳：前引书，第730页。

张公用事业国有化的国家主义俱乐部的形成。贝拉米也由此一夜之间成了全国闻名的改革家。

哲学领域内，由于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等人的努力，美国的哲学思想摆脱了爱默生的乐观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僵化教条的束缚，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实用主义哲学体系。这种新哲学重行动胜过逻辑，重实践胜过理论，重研究创新胜过墨守成规，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方法论，有助于摆脱古典经济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教条主义的理论框框，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良策。他们的作品促成的实用主义方法，使得美国知识分子确信：国家问题可以通过直接的、实际的方式加以批评攻击和解决；是社会而非自然产生了这些问题，社会能够加以纠正。

非难自由放任主义的进步哲学家们，还找到了自己的先知——亨利·乔治。早在1879年，乔治就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对传统的贫困观（即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有力挑战。书中写道："当今这个世纪以财富生产能力的惊人增长而著称……人们很自然地去期望、过去也一直这样期望着……真正的贫困将成为昔日的一桩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是，相反，"富裕阶层越来越富有；贫困阶层越来越具有依赖性。"[①] 亨利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罪恶，土地垄断是万恶之源，"地租吞噬了全部的利益，因此，贫困伴随着进步。"乔治将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弊端统统归咎于土地垄断，主张废除一切租税，单独征收地价税，即"土地单一税"，这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学主张，但他对贫困问题的揭露以及坚信人类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能够改造社会的信念却深得人心。因为他反反复复地强调，通过经济和社会改进，能够带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前引书，第317页。

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为“镀金时代”有影响的民主哲学家，乔治成为南北战争之前时期的改革运动和20世纪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要联结点。《进步与贫困》问世不久就有了多种译本，据估计到1905年发行量已高达200万册。有人认为，除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著述能像亨利·乔治那样轰动全球。在不少地方，乔治成了“人们多年来一直追寻的预言家和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哥伦布”。[①] 在美国，乔治也拥有大批信徒，1886年他竞选纽约市长时一举夺得6.8万张选票。

乔治的言论激励了一大批追随者。俄亥俄州阿什塔布拉年轻的乡村律师克拉伦斯·达罗是其中之一。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达罗坚信，罪犯是由于“人类生活的不公正状况”而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前往芝加哥，此后40余年间一直致力于推动人们相信贫困是犯罪之根源。

〔*克罗利的新政治哲学*〕　对自由放任主义、敌视政府管理进行最猛烈抨击的是克罗利、韦尔、李普曼等政治学家。

纽约新闻记者赫伯特·克罗利，是进步主义的主要哲学家，也是20世纪初美国最孚盛名的政治学家。1914年创办《新共和》杂志并自任编辑，团结了大批青年社会和经济思想家。他对进步政治理论作出了最重要的系统阐述，其著《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进步的民主政治》(1914年)具有深远影响。

克罗利指出：人们公认的美国政治传统，是不相信政府管理而在经济事务中实行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杰斐逊传统，这种传统已与民主政治合而为一，深入人心。相反，主张强有力的政府管理的汉密尔顿传统，由于在公众的头脑中被认为等同于上层阶级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62页。

的特权，未予足够的重视。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造成目前弊病丛生。如果说杰斐逊传统在农业社会还只是潜在的危险，那么在工业化时代它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危害。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坚信，只有收回一切特权，给予企业阶级以恢复竞争的黄金时代，美国生活的美好希望才能实现。

克罗利警告说：在一个必然出现大工业大金融的时代，这种不干涉和放任自流的政策，只能把国家带到一种同样不可避免的毁灭之途——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扩张和广大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怎样把国家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美国民主政治和机会均等的梦想怎样实现？对于克罗利而言，途径是：改革者们必须放弃浪漫的杰斐逊观念，而代之以州和联邦在所有经济战线实行积极广泛干预的纲领。这首先意味着改革者必须放弃对于阶级或特殊利益立法的敌视。

克罗利宣称，当前重要的任务首先是确定什么是"国家利益"，然后通过计划和立法加以实现。那么谁来确定国家利益？克罗利认为应该提倡一种"新国家主义"，吸引"最杰出的才智之士"，在调和有计划而积极的政府管理与民主传统的工作中进行领导，以适应民主所避免不了的新形势。克罗利的理论，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国家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沃尔特·韦尔的《新民主政治》（1912 年）、沃尔特·李普曼的《政治学序言》（1913 年）和《放任与控制》（1914 年）中，也都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呼吁国家干预。韦尔认为，实现新的社会和工业民主政治纲领的动力是切身利益。一个民主国家不能允许大多数人遭受屈辱和剥削，因为这些人最终会诉诸暴力并可能摧毁社会。人们不转而求助于法律、政府和国家，新的民主便不会到来。正在放弃空谈激进主义的年轻社会主义者沃尔特·李普曼补充了克罗利尤其是韦尔的论点，赞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

对待政治，认为必须实行民主集体主义。他说，自由并不是没有计划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清静无为和软弱政府，那是对自由主义的曲解。能干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关心法律的制定，关心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定……”。[1]

〔破除改革的法律障碍：实用主义法学和政治科学的形成〕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正义运动、女权运动、市政改革和州级改革的深入，改革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中之一便是关于法律的狭隘理解和过时解释。教条主义的法理学认为：法律具有普遍性而且一成不变；美国宪法是一项“神圣的”文献，是上帝智慧和“灵感”的体现；对于它，只能作“严格解释”而不能作“宽松解释”，不能随意扩大联邦政府的职权。

20世纪初年，社会学的法理学开始取代教条主义的法理学。具有新社会思想的律师和法学理论家摈弃了这种看法，视立法为社会环境的反映，从而将立法本身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以霍姆斯为首的实用主义法学家对长久把持美国法学界的“司法复审”原理进行了反击，认为：法律应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情况，过去美国法律体制的传统主义所形成的保守性和僵化性，应对其加以改革。因为，昨日之法无拘束法官今日判案之效力，判案要根据“是”的精神：法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长期以来，司法部门固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条，凭借其“司法复审权”阻挠变革，为保守势力服务，成为保守主义的强大堡垒。霍姆斯倡导的社会学法理学，对于摧毁司法部门的专断，推动国家干预影响巨大。

在霍姆斯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也开始将

---

① H.S. 康马杰：《美国精神》，第327页。

法律与社会改革联系起来，不再简单地视犯罪行为为个人弱点所致，而同样将其看作是社会问题的结果。路易斯·布兰代斯的生涯集中体现了这一变化。他原先是一个富有的公司律师，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期间改变了关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开始抨击公司的恶行和政治腐败，并最终赢得"人民律师"的称号，深为民众所拥护。在穆勒诉俄勒冈案中，他以出色的辩护，为改革派赢得了一场巨大胜利。[①]

与此同时，政治科学领域内也出现极大变化，强调研究政治过程而不是政治学中的抽象法则。伍德罗·威尔逊在《政府的作用》（1889年）一书中指出，政府除了保障人民的"天赋权利"这项职能外，还应有广泛的"管理职能"，诸如监督管理工商业，处理劳工事务，发展公用事业和教育，赈灾济贫，保护森林等。后来在《新自由》、《论国家》等书中又围绕着国家干预、"政府行为的准则是必要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艾伦·史密斯和查尔斯·比尔德等对宪法的保守性进行了探讨，指出宪法乃少数人从阶级利益出发而构思出来的，并得出结论说：如此经常阻碍改革的宪法，比起其他东西，并非更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经济解释"，抹去了长期以来围绕在宪法头上的"光环"，揭开了蒙在宪法身上的神秘面纱，从根本上否定了宪法的"神源论"，从而为顺应时势发展之要求，适时修改宪法中过时条款，赋予联邦政府新的职能，管理、干预社会和经济以确保其良性协调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的宗教哲学——"社会福音"的兴起〕　基督教信仰危机的出现，推动了新的宗教哲学——"社会福音"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怀疑主义的发展、达尔文主义者和原教旨主

---

① 有关穆勒诉俄勒冈案，详见本书"最高法院和社会立法"一节。

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哲学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等等，促进了世俗主义的成长。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信仰抱怀疑态度，但基督教的伦理学不仅保存下来，而且被赋予新的内涵。新教各教会大多放弃了原教旨主义，并重新发现古代基督教的所谓社会正义的“启示”；罗马天主教会则将其社会服务扩及贫民。世纪之交，新教发生的变化深刻。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歧越来越突出，前者坚持古老教义和忏悔；后者主张开明的神学观，强调教会的社会使命。1900年以后，现代派开始占据优势。1908年，拥有1700万信徒的33个新教福音团体宣布成立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此举表明社会福音运动在美国新教中取得胜利。天主教会此间也获得巨大发展，1890—1916年，随着“新移民”的进入，天主教徒由734万上升到1572万，翻了一倍。19世纪晚期，美国出现了天主教会“美国化”的运动，结果由于罗马教皇顽固坚持传统习惯而将其扼杀。尽管如此，美国的天主教会并未减弱自己的社会良心，一些主教和教士热心于帮助、指导新移民和城市下层贫民。巴尔的摩的詹姆斯·吉本斯曾经积极投入19世纪80年代的劳动骑士团运动。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神父约翰·瑞安等在20世纪争取通过社会和经济立法的运动中赫赫有名。

“社会福音”的兴起，也是基督教适应工业化社会的产物。

现代工业文明的兴盛带来了许多弊端，贫民窟的形成便是其中之一。雅各布·里斯曾写道：“贫民窟问题是历代的慢性病。可19世纪目睹的各种巨大变化，新工业及政治自由使这一疾病恶性发作，并直接威胁到政治自由本身。……我们的国家已经繁荣富强，源源不断地通过我们港口的是足够几百万欧洲人享用的食物。然而，在穷街陋巷里一堆堆目不识丁、缺吃少穿的人挤在一块。……在与贫民窟的斗争中，我们要么战胜，要么灭亡，没有

中间道路可走。"[1] 活跃于贫民窟当中的神父和牧师最先向贫民窟宣战。19世纪80年代起，基督教会开始将纯教义问题置于一边，关心起工业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贫民窟、酗酒、卖淫、血汗工厂、童工女工待遇、股票掺水等等"社会问题"。许多新教教士向他们的先驱——废奴主义者一样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罪恶进行了猛烈抨击。"牧师对工业弊端大感困扰……他们不仅被工业现状所震惊，同时也因之警觉"。[2] 以公理会牧师华盛顿·格莱顿、浸礼会牧师沃尔特·劳申布施等为代表的新教教士严厉批评工业资本主义，认为它是"基督教决不能满意的拜金主义体制"，提出以合作、集体主义和民主来代替竞争法则，实现一种介于"竞争制度下的冷酷的个人主义与危险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仁慈的、温情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一理想，基督教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福音运动"，着手对各种社会问题加以改造。宗教界发起的这场运动，吸引了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欢迎。

社会福音运动的目的在于复兴基督教，并向工业社会宣布所谓基督教的"启示"。从18世纪卫理公会出现以来，美国基督教中一直存在一个关心社会的强大的新教左翼。1870—1890年是美国新教社会意识觉醒的时代，其间开展了内容广泛的讨论，"愈来愈多的牧师开始用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竞争的、剥削的时代精神，并且发现这些新的价值不足为贵。"[3] 他们的来世观点更淡薄，并开始从社会和道德的以及神学的角度来看待灵魂的拯救。传统的新教教义强调个人的"得救"以及在另一世界过上美

---

①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491—493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纽约，1959年，第106页。

③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26—27页。

好生活，视贫困为“罪”的体现，贫困者只有责备自己。财富和赤贫、郊区和贫民窟，均是上帝之所安排。80年代起，一批教会开始在贫民窟中开展活动。由于生活于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中间，这些都市传教士对于维护现状的宗教教义越来越不耐烦，很多人开始支持正在出现的新的宗教哲学，即“社会福音”，其内涵是在强调心灵拯救的同时同样强调改善居住条件。于是，教会日渐成为宗教活动和社会改进的中心。

90年代起，社会福音运动趋向成熟，开明的神学家完全接受了进化论。与此同时，一个独立的“社会工作者”阶层初步形成，其中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且年轻而有理想。他们通常受雇于慈善组织或社区福利机构，以英国伦敦的汤因比会堂为榜样创建公共会堂来帮助穷人。19世纪80年代第一批公共会堂在纽约市和芝加哥建立，分别称之为“邻居互助会”和赫尔事务所，世纪之交时，这样的机构超过100家，到1910年则多达400余个。[①] 1900年以后，日益壮大的“社会工作者”阶层日渐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颇有影响的力量。

社会福音运动的领袖和代言人首推沃尔特·劳申布施。他起初在纽约市一个教堂中任职，90年代出任罗彻斯特神学院教会史教授，开始阐述教会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的责任。在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之后，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1907年发表著作《基督教和社会危机》，第二年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创立。在费城举行的会议上，联邦基督教协进会通过了《教会和现代工业》的声明，表示新教坚定地支持社会福音运动，

---

① 小奥蒂斯·格拉海姆：《伟大的运动：美国的改革和战争，1900—1928》，罗伯特·克雷格出版公司，1980年，第22页；罗伯特·戴维尼等：《美国今昔》，前引书，第318页。

支持通过社会福利立法和加强工会来结束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

最为活跃的社会福音运动领导人是公理会牧师、多产作家华盛顿·格莱顿。他通过将基督教和社会经济环境联系起来，毕生致力于“社会拯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谴责竞争，倡导雇主和雇员间建立一种“工业伙伴关系”并呼吁采取行动帮助穷人。

20世纪初年，反传统的进步思想家队伍迅速壮大。作为一个整体，此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全面抛弃了自由放任主义信条，开始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提供理论指导。这些思想家对于“人民”有一种诚挚的信念，普遍认为“人民”从根本上说都是正派的，一旦他们充分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变革，铲除美国生活中的腐败、贫困和罪恶。新社会思想的形成，瓦解了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消除了社会变革道路上的某些无形障碍，为广泛深远的改革运动的兴起作好了理论准备。知识分子的反叛影响深远，对于使进步运动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种永久的力量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的重大贡献，在于推翻一直牢牢支撑现状的保守思想，在于为社会福利国家提出一种哲学体系。因此，在这方面以及因为这种原因，知识分子是进步主义的真正发酵剂。”[①]

三、社会经济领域的群众性改革运动

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一小撮百万富翁攫取了社会的大量财富，千百万劳动人民特别是童工、女工、城市贫民却难以维生。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士认为，两极分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84页。

化是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公所致，因此热衷于以改良手段祈求社会公正，掀起一场所谓“社会正义运动”。在贫民窟中开展工作的神父和牧师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到1900年，“社会正义运动”已形成一股不小的社会力量。

社会正义运动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旨在减少美国社会生活中阴暗面的尝试，它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全国性的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形成。到后期，社会正义运动本身也汇入了全国性的改革洪流之中，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正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正义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处于都市社会最底层的贫困者，目标是为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提供某种帮助，减轻他们的疾苦，例如：贫民窟内悲惨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工业部门中对女工、童工的剥削；每况愈下的、毫无保障的工人的屈辱生活等等。

最先向贫民窟开战的是活跃于贫民窟当中的神父和牧师。如前所述19世纪80年代起，基督教会开始抛弃纯教义问题，关注工业化带来的贫民窟、酗酒、卖淫、血汗工厂和股票掺水等社会问题，并对这些社会罪恶进行猛烈抨击。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为此展开声势浩大的所谓“社会福音运动”，着手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改造。宗教界发起的这场运动，吸引了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欢迎。在慈善基金的赞助下，广大的社会工作者深入基层，针对工作条件、贫困的原因、缓和社会疾苦的办法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此过程中，他们当中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有的专注于关心照顾移民，有的忙于劳工问题的解决，有的则醉心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研。

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正义运动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初期它主要是一场“个人性质的改良”运动，到后来则转向期望借

助国家的管理权来重新调整经济关系，从而实现所谓“社会拯救”的最终目的。在投身这场运动的改革家看来，州政府、联邦政府也都应该加入到保护弱者的战斗中去。其具体做法是：先在“社会工作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法律，然后起用“社会工作者”加以实施。

在进步主义年代里，抱着寻求社会正义理想的改革家们更加热衷于“社会性的诊疗”而非个人的慈善之举。在他们看来，各类社会问题是无穷无尽的而且相互间纵横交错。在社会正义运动兴起的早期，他们较多地关注单个个体的福利，到后来，则将主要目光转向对整个邻里、职业阶层乃至阶级的科学分析。1900年，纽约市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劳伦斯·维勒举办公共会堂展览，展出1000多幅照片、贫民窟区详细的地图、统计图表以及纸板搭成的颇为逼真的住宅图像。透过形象生动的图片资料以及发人深思的数据文献，维勒揭示出了贫困和疾病同居住条件之间的关联，引起人们心灵极大的震动。在公众不满呼声的刺激下，纽约州长西奥多·罗斯福随即任命纽约州公共会堂委员会着手解决此类问题。①

维勒的成功树立了一个样板，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争相效法。在地方性的社会工作者活动的基础上，1915年，社会正义运动的改革家组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工作机构——“慈善机构和补救措施全国委员会”。借助于该组织，社会工作者之间加强了交流和切磋，并力图开辟社会科学当中的一个新领域。他们在哈佛、芝加哥以及其他主要大学组建职业学校，1909年发行自己的刊物《观察》。到这时，社会正义运动已不再局限于零星的改革，而是致力于综合性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最低工资立法、最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前引书，第356页。

高工时立法、雇工赔偿以及寡妇津贴等。

妇女在社会正义运动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公共会堂中的很多社会工作者是女性，其中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著名改革家简·亚当斯1889年在芝加哥建立了著名的赫尔事务所，期望藉此

北方，1903—1904年间新泽西州、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也通过了类似法案。1904年，运动的南北两翼汇合，组成全国童工委员会，该委员会到1910年在22个州拥有25个分会。在该童工委员会及全国消费者联盟等组织的压力下，到一战前夕，社会正义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00年，2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没有规定工人的最低年龄。到1914年，除个别例外，每个州都制定了有关对从事工作的儿童提供保护的法律，通常确定的最低年龄限制为14岁，不少州还禁止14—16岁的儿童上夜班或从事危险工作。[1]

联邦对童工立法直到进步主义时代末期才见成效。印第安纳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于1906年提出第一个联邦法案，但遭到全国童工委员会的拒绝，理由是最好在州一级再活动一段时间，取得更多的成效。1914年，联邦采取行动的条件趋向成熟：全国童工委员会向国会提出立法动议，草案要求：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运输全部由或部分由14岁以下童工生产的商品以及雇佣16岁以下童工的矿山或采石场生产的产品。法案于当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搁浅，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南部纺织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谴责法案侵犯了州的管理权因而违宪。1916年夏，威尔逊总统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增加民主党人取胜的机会，促使参议院通过了童工立法，即所谓《基廷—欧文法》，至此，社会正义运动在联邦一级取得了意义深远的胜利。

然而，童工立法命运多舛。最高法院在1918年的哈默诉达根哈特案中裁定《基廷—欧文法》对地方劳工状况进行了“不适当的”管理。1919年国会通过第二个童工法，同样在1922年被

---

[1]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前引书，第70—71页。

最高法院在巴莱诉德莱克塞尔家具公司案中推翻。直到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国会才成功地通过一项最高法院愿意遵守的全国童工立法。

〔女工保护及最低工资立法〕　社会正义运动指向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工业部门中的女工保护问题。由于芝加哥赫尔事务所的佛罗伦斯·凯利的努力，1893年伊利诺伊州曾通过一个强制法令，规定妇女工作时间为日8小时。但这项最早的妇女8小时工作日立法两年后被州最高法院宣布违宪。90年代晚期，运动的领导权转向东部地区，在妇女消费者联盟的努力下，争取妇女工时立法的运动迅速展开。纽约州（1896年）和马萨诸塞州（1900年）先后制定法规，将妇女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周60小时。以此为开端，运动逐渐扩展到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田纳西州。1909—1917年间，39个州制定了工作日立法，通常为每周不超过6天，每天不超过10小时。190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裁定工时立法有效，从而扫除了关于妇女工时立法合法性问题上的疑问，至此改革的障碍终于被扫除。到1913年，39个州确定了妇女最高工时标准，或者禁止夜间雇佣妇女工作。

社会正义运动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女工的最低工资立法。1896年至1909年间，澳大利亚和英国制订出最早的这类立法，使得美国的改革者深受鼓舞。1911—1914年间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的调查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推动力，这些调查揭示，大量妇女获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准。1910年，全国消费者联盟将最低工资立法列入其长远纲领之中。次年，妇女工会联盟也加入战斗。争取女工最低工资立法运动开始了。

改革联盟于1912年取得初次胜利，这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设

立工资委员会，授权其就妇女最低工资提出立法建议，并揭发拒绝守法的雇主。第二年，8个中西部和西部州通过终于生效的法案，并授权工资委员会确定有约束力的最低工资率。然而，1913年以后，运动大大减弱。1914—1923年间，仅有另外6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加入致力于保障女工的生活水准、从而保障其健康和德行的州行列。

〔建立工伤事故保险体制〕　社会福利斗争的最后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工伤事故的公共保险制度。到1900年，西欧国家已经较长时期地显示出这类制度的优越和切实可行。然而在美国，与工伤事故有关的习惯法的条条框框仍然支配着事故赔偿金的支付。

根据习惯法的规定，如果受伤雇工是自愿承担这一工作的风险，如果致伤是由于他本人的疏忽或者其同事的疏忽，那么他就无权要求赔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伤雇工为要求赔偿就得起诉，并证明自己受伤确系雇主的直接疏忽所造成。显然，根据习惯法而实际上将工伤事故和死亡的全部财政负担加在工人及其家庭身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不公之处，这种现象引起早期要求废除或修改这些条款的运动。到1910年，大多数州已对习惯法的规定作了有利于受伤工人的修改。但受伤工人的境况较之从前并未有多少改观，因为要得到损害赔偿仍不得不进行起诉。

1902—1909年间，马里兰州、蒙大拿州及联邦政府曾试行过不完善的有限的事故保险制度。1909—1913年间，政府方面又就整个问题作了短期认真的调查。所有的委员会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现行的赔偿制度已经瓦解，建议颁布事故保险法。从此，立法浪潮席卷全国。1911年，有10个州建立保险制度；1912—1916年，又有20个州、3个地区及联邦政府步它们的后尘。

追求社会正义的力量在进步主义时代逐渐壮大起来，成为美

国民主政治中一支补救的力量，并在改革运动中紧密团结，将一个自由放任、相互角逐的社会，改造成某种近乎福利国家的社会。他们有好几十个组织，进行的社会改革斗争内容丰富，为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卓有成效的新的社会正义运动照亮了道路”。[①]

〔最高法院和社会立法〕　　社会正义运动的深入开展，招致了来自几个方面的巨大阻力：一是雇主和自私自利的经济界其他代表人物的围攻；二是保守的法官和法庭的反对。

美国宪法制度中，法官具有特殊的权力，拥有决定立法是否违反州和联邦成文宪法条款的特权。20世纪初的美国律师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按照英美法律传统培养出来的，这种传统重视自由甚于正义，重视产权甚于人性；坚信经济规律的自动运转，强烈反对公共管理的观念；一贯站在铁路和其他大公司一边。在判定涉及社会立法的案件时，美国的“法官们常常不知不觉地让传统的偏见而不是健全的法律准则来支配他们的判决。”[②] 19世纪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已确立一个信条：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公司就是法人。于是，公司有权请求联邦法院保护；而联邦法院则坚持复审州的立法，以判定它是否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关于各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

1898年，最高法院首次涉及对州劳工立法的复审。在霍尔登控诉哈迪案中，最高法院支持犹他州关于矿工8小时工作日的立法，裁定州有权限制危险职业中的劳动时间。其理由是：保护所属公民的身心健康是州的职责；可以适当使用州的管理权来提

---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69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70页。

供这种保护；在此情况下使用管理权并不侵犯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契约自由。然而，1905 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却使得这一理论受到挑战。案件涉及到纽约州一项限制面包工人每天劳动 10 小时、每周 60 小时的立法，控方认为该法不适当地侵犯了雇主与工人订立劳动合同的自由。最高法院以勉强过半数判定：由于做面包并非特别对健康有害，因而“限制成年干练工人赖以维生的工时的法规，无非是对个人权利的无理干涉”。即各州不得侵犯契约自由，除非有明显而且充分的行使管理权的理由。

随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穆勒控诉俄勒冈州案。1907 年，雇主穆勒对俄勒冈州妇女 10 小时工作日法令提出异议，引起争论。应全国消费者联盟的请求，美国著名的“人民律师”、波士顿的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挺身而出为此法辩护。他强调说，律师、法官都应该对案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有所了解，“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律师，很可能成为公众的敌人”。为此他建议用社会学的法理学来取代目光短浅的法律上的传统主义。在提交给法庭的长达 104 页的辩护状中，布兰代斯仅用两页纸进行通常的法律推理和援引判例，而为了说明妇女劳动时间长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竟用了 102 页，其中引用了数百种经济学、社会学和医疗方面的资料，包括工厂监督员、卫生和健康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来说明俄勒冈州 10 小时立法对于保护妇女的健康、安全和道德不可或缺。1908 年 1 月，最高法院就案件进行辩论。控方声称：妇女与男人平等，同样有订立契约的自由，任何立法机关不得侵犯。布兰代斯再次用一系列有说服力的事实作了回答。尽管最高法院为守旧派所操纵，但布兰代斯的辩论深深地打动了法官。最终，法庭声称：在决定这类立法的合宪性时，“注意到……司法渊源之外的看法”，“或许不是错误

的”，“妇女的体质构造，以及由此承担的功能，使得特殊的立法正当、必要”，“该法规对其契约权施加的限制，……并非仅仅针对其个人利益，同时更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全体利益。”① 因此，俄勒冈州限制妇女10小时工作日法令，是“对州管理权的合法行使”。②

最高法院关于穆勒控诉俄勒冈州案的判决，堪称社会正义运动“一次划时代的胜利”。③ 它确认了俄勒冈10小时工作日法令符合宪法精神；法院第一次承认需要用事实来证明社会立法是否合理。但是，社会立法的障碍并未清除掉，洛克纳案的判决并未被推翻。其后发生的几个案件中，法院否定了以行使管理权为根据的劳动法。但是，1908年以后，州有权通过特殊立法来保护社会成员中的弱者这一观点得到广泛接受，应用经济和社会资料为社会立法辩护的做法（所谓“布兰代斯理念”）很快流行起来。

1908—1915年间，又有四件涉及妇女劳动时间立法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复审时均坚持穆勒诉俄勒冈案确定的原则，甚至还批准加利福尼亚一项内容广泛的妇女8小时工作日法令。1898—1915年间，最高法院还复审过一些州的童工法。尽管法院一贯声称各州有权保护儿童，禁止其从事危险职业或者在不利于健康和品德发展的年龄参加劳动，但是在1918年以前，国会能否运用其对商业的控制来管理儿童劳动，仍然悬而未决。到1917年，法院几乎认可了所有形式的劳工立法。在邦廷诉俄勒冈案中，最高法院认定俄勒冈州男工10小时工作日立法合法，从而推翻了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判决。在威尔逊诉纽约一案中，

① 约翰·格拉蒂：《1865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前引书，第237页。
② 约翰·格拉蒂：《1865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前引书，第237页。
③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72页。

法院认可了从事州际贸易的铁路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立法。在斯特勒诉奥哈拉案中，法院认可了一项规定女工最低工资的俄勒冈法令。在一系列判决中，最高法院承认当时各州实行的三种工业事故保障体制符合宪法。

〔*女权运动的深入*〕　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早在1848年即已开始，此后半个世纪内涌现出卢·莫特、卡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一批杰出领袖。但运动遇到不少阻力。女性自身的不团结，男性的反对，女权运动策略上的分歧（例如是在州级还是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天主教会的抵制，来自酒类利益集团的反对（它们将女权运动与禁酒联系起来）等等，制约了女权运动的进展。到1900年，给予妇女以选举权的仅有怀俄明地区（1869年）、怀俄明州（1890年）、科罗拉多州（1893年）、爱达荷州（1896年）和犹他州（1896年）。

女权运动的深入有赖于新一代的美国女性。1890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正式组建，到1920年会员数将近200万。1900年，卡丽·卡特当选为该协会主席，从此，争取女权的斗争由散漫的运动转变为社会改革运动，其斗争从西向东展开，成为整个进步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赢得社会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妇女选举权协会开展了大量游说工作，发表演说，在大城市发起游行活动。平等联盟（后来的妇女政治同盟）、国会争取妇女选举权同盟和全国妇女党等组织更加富有战斗性，举行示威，进行纠察，诘难政治候选人，有时被捕入狱，便在狱中仿效英国妇女发动绝食斗争。类似妇女俱乐部总联盟这样的一些组织，也将日常的文学聚会转变为社会行动集会。为了吸引人们对妇女关注社会改革事业的注意力，1904年成为妇女俱乐部总联盟主席的萨拉·德克尔夫人面对其组织成员慷慨陈词："丹东已经死了……我想，现在该是我们放弃研究他的地狱、将注意力转向我们

自己的时候了。”①

女权运动首先在州一级取得成效。1910年和1911年，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分别给予妇女选举权。1912年，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和俄勒冈州采取同样行动。1913年，伊利诺伊州给予妇女选举总统的权利。1914年，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同意给予妇女选举权。1917年，纽约州也转变立场支持女权主义者的主张。同年，蒙大拿州的珍尼特·兰金成为美国第一个国会女议员。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大量美国女性投身于与军事有关的生产或服务行业之中。在此过程中，妇女以其出色的表现越来越多地赢得男性同胞的尊重，个人尊严和社会地位均有所提高，推动了女权运动的深入。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也引起进步派的关注，他们认为妇女选举权将有助于“纯洁”政治。1918年1月10日，美国众议院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禁止各州以性别为理由拒绝给予选举权；参议院于1919年6月4日表示赞同。1920年8月26日，修正案经36州批准正式生效。2600万美国适龄女性由此获得了与男性同胞所享有的同等的选举权。

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生效后，美国各州针对本州的具体情况对法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允许妇女拥有、继承和遗赠财产，对原来的离婚法也作了相应修改，以便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和监护子女的权利。然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妇女在就业、工资待遇等方面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远未结束。

---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前引书，第357页。

四、市政改革的深入

城市的迅速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而多变的社会问题。世纪之交，美国的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相应地，各方面的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日益突出。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深刻暴露了市政体制的内在矛盾，使得城市日益成为广大民众不满以及要求变革的“风暴的中心”。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进步主义思潮的广为传播，社会正义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开展，市政改革运动获得新的动力。

〔城市之羞〕　美国在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市政管理和建设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城市经济利益集团和政党核心集团操纵市政府，经济集团和政党机器相互勾结，腐败成风，贿赂成灾；特权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特许状、承包合同和豁免权，严重危害大众利益；随着人口的剧增尤其移民的大量涌入，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管理日趋复杂，但现行市政管理低效无能，结果贫困、犯罪、疾病等“城市病”不断蔓延。针对这些弊端，19世纪末年很多政论家提出了批评。塞斯·娄说：“美国的麻烦是在几年之中迅速出现了大城市”；布赖斯认为，美国市政府是“美国政治机构最明显的失败”；安德鲁·怀特则宣称：“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城市政府乃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最奢侈，最无能，最腐败。”[①]

城市内部的社会问题相当突出。富裕与赤贫之间形成强烈的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纽约，1955年，第176页。

反差，往往一边是百万元的豪宅、公园和林荫小道环绕；另外一边则是荒废的棚户和肮脏无比的街道。拥挤的都市区内，卫生状况、治安状况和社会服务状况也极为糟糕。19世纪末年，费城和圣路易的排水系统总长度仅仅略多于两个城市街道总长度的半数，而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城市则依旧主要依靠露天排水沟来排泄污水。由于不洁净水的供应，匹兹堡成为世界大城市中伤寒热、痢疾和霍乱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①] 城市犯罪率也急剧上升并居高不下。

对于大多数进步派来说，政治腐败和无能是所有困扰美国社会弊端的根源。政党机器由于太腐败而不能提供都市人口所必需的服务，而传统的管理机构则由于发育不全而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要求。20世纪初，美国城市代议制政府几乎完全崩溃。大多数城市不是由公正选举的代表治理，而是由其等级结构类似于现代公司等级结构的政党核心小集团统治着。这种核心小集团成为大城市内名副其实的“无形政府”，其领导人称“头头”、“大人物”或“首领”。虽然他们本人由于声名狼藉而通常不出任公职，但其指令却能够有条不紊地、顺畅地从“小集团”一直下达到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早在杰克逊时代，美国城市被授予或修改特许状时，就有意识地将权力和责任分散给市长、两院制议会、独立的部门和委员会等诸多机构。在此体制下，责任制政府几乎难以形成，政党核心小集团便伺机进人这种相互牵制、平衡和分权的制度造成的权力真空之中。

在长期实践中，政党核心小集团形成了足够进行治理的内聚力和集中的权力，成为“混乱的都市社会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聚合力和团结力之一”。他们懂得施舍，在各选区内，为大量的人提

① 阿瑟·林克、理查德·麦考密克：《进步主义》，前引书，第29页。

供服务。如派代理人到码头接待举目无亲的移民，帮助他们找住所和工作；还开展慈善工作，帮助鳏寡孤独者；给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提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机会。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以至于“到1900年时，多数选民并不问某个组织是否腐化，而只问它是否为他们做点事。”① 施恩图报的心理，促使很多选民投了政党核心小集团的票。政党核心小集团用于施舍的钱财大部分来源于“非法收入”，上至大公司提供的政治赞助和巨额贿赂，下至罪犯、妓女乃至酒吧间老板向政客和警察提供的所谓“保护费”。据芝加哥犯罪调查委员会1911年的报告，该城每年从犯罪中获利1500万美元，其中1/5是用贿赂形式付给警察的。由于不遗余力地获取非法利益，操纵市政的政党机器逐渐忽视并最终背离了公众的根本利益。

旧金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1901年以后，一个名叫阿比·鲁夫的精明律师操纵了腐败的旧金山市政机构。旧金山的街道上只能采用一种铺砌材料，鲁夫就是提供这种材料的公司的律师。当当地煤气公司提出每100立方英尺煤气涨价10美分时，鲁夫从这家公司索取了2万美元的贿赂，在此之前，他作为一个“零售商”每月从公司收取1000美元。当地街车公司需要市政府授权建立无轨电车的空中电线，为获得鲁夫的赞同花去了公司85000美元。旧金山的卖淫活动猖獗，鲁夫及其亲信则心安理得地从中分享利润。同样，在酒类专卖及其他方面也存在着非法勾当。“对于那些腐败分子而言，没有什么交易是太大或者太小。一个与销售一些家具给市府这件事沾上边有关的官员收受了26.1美元的贿赂。类似情形存在于无数社区。”② 为了给最著名

---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85—86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4页。

的黑幕揭发杂志《麦克卢尔》写稿，林肯·斯蒂芬斯考察了圣路易、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结果发现各地的情况无一例外。

为获得庇护特权、特许状和工程承包合同，逃避公平税收，大公司大企业往往不失时机地大肆行贿。核心集团的头头手中通常握有由他支配的特许权和承包合同，如有关市政建设方面的建筑新铁路线、排水系统、煤气管道、电线、自来水管道等。圣路易的民主党头头把特许权、执照和豁免权有组织地出售给企业界的头面人物。明尼阿波利斯的头头操纵着全国最引人注目的警察受贿网。匹兹堡的两名共和党领导人掌握着市镇会议，靠出售承包合同和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而致富。在黑幕揭发作家林肯·斯蒂芬斯看来，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自以为正直的骗子”，他们“在圣路易收买行贿者，在明尼阿波利斯替受贿者辩护，在匹兹堡滋生腐败，在费城与政党老板们分摊好处，在芝加哥为改革而感到遗憾，在纽约以腐蚀性的金钱击倒善良的政府。”[①] 改革家福雷德里克·豪指出，辛辛那提市的老板乔治·考克斯像一个中世纪的男爵对待自己的农奴一样统治着这个城市。[②] 通过钱权交易，城市重大利益集团买得了对政党核心集团的控制权，从而“将美元变成选票，将财产变成政权”。

〔城市的“反叛”：市政改革运动的兴起〕　市政的普遍腐败和混乱，促成了进步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政治运动——市政改革运动。1906年，改革家福雷德里克·豪在对都市生活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研究之后指出：城市的挑战，“已经成为人类体面

---

① 伯纳德·贝林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77年，第892页。

② 有关考克斯统治辛辛那提的详细情况，参见赞恩·米勒：《“老板”考克斯的辛辛那提：进步主义时代的都市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生存中的一个问题”。[1]

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重了城市消费者的负担，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政党机器统治的缺陷上来，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改革的紧迫感，从此，城市逐渐成为“风暴的中心”。90年代起，一些城市陆续展开了旨在消灭贪污腐化现象、恢复城市代议制政府、实行公平税收、加强对公用事业管理以及扩大公益服务事业的市政改革运动。1894年，城市改革者组成全国市镇联盟，此后市政改革逐渐遍及全国，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其间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城市改革家，如克利夫兰市的汤姆·约翰逊、托莱多市长塞缪尔·琼斯、底特律市长黑兹恩·平格里以及芝加哥市长卡特·哈里森等等。各城市的改革虽因时因地而各具特色，但基本遵循同一途径，即：首先依靠城市俱乐部或都市选举人联盟驱除“党棍”，选出进步市长，组成“诚实政府”；继之进行市政机构改革，“还政于民”，促使公众能有效地参与和控制政治；最后实施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都市改革的关键是“无形政府”，即市政当局与企业利益集团之间的邪恶联盟。“腐败的政府”与“傲慢的企业”之间纯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到1890年，美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两者间的交易，而惟一的受害者是公众。[2] 为了消除政党核心集团对市政的控制，扩大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改革者要求建立直接预选制，实施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为了消除州立法机关对市政的干预，改革者要求实行城市自治。市政改革的核心是改革市政领导体制，改革者的目标是废除市长—市政会议制，代之以市政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1900年得克萨斯州作为权

---

① 伯纳德·贝林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第890页。

② 伯纳德·贝林等：前引书，第891页。

宜之计试行委员会制，随后迅速得到推广。城市范围内的改革到19世纪结束时初见成效，改进了市政府的功能和形式，提高了政府效率；解决了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对深刻影响人民生活的大公司企业和公用事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制或将其收归公有。

都市改革运动一开始往往以"人民运动"形式出现，旨在消除腐败现象，在都市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由于不存在阶级和职业的界限，且集中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如提高铁路叉口的安全、改进卫生设施、降低街车票价，因此，进步运动在早期阶段带有显著的民主特色和道德色彩，而企业家和政治老板则是这幕改革家道德剧中的两个孪生恶棍。

90年代后期开始，进步派对不诚实和无能的都市政府问题发起猛烈攻击。在旧金山，报人福雷蒙特·奥尔德和富裕的蔗糖制造家伦道夫·斯普莱克斯领导的一批人打碎了政治老板机器，最终将鲁夫送进监狱。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塞缪尔·琼斯1897年赢得选举，出任市长，成功地领导当地公民开展反腐败的斗争，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琼斯将写着"不要进草坪"的公园草坪告示牌，改换成"公民们，保护你们的财产"。这一做法集中体现了他的管理精神。此外，圣路易的约瑟夫·富克，纽约市的塞斯·娄及其继任者约翰·米切尔，底特律的黑兹恩·平格里，泽西市的马克·法根，也都为市政改革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芝加哥的改革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当该市的市政会议准备将公众最宝贵的权利出卖给公用事业大亨查尔斯·耶基斯时，抗议非法出卖特权的呼声随之高涨。约232名市民领袖于1895年组成城市选民联盟，并发起一个超党派的运动，以清扫市政府的积弊。通过无情揭发腐败的市政官的老底，该联盟于1896年和1897年的高级市政官的选举中取得市政会议的控制权，并在1897年促成进步市长卡特·哈里森的当选。其他各地的市政改革

运动采取类似方式。1913 年，纽约市各种超党派的廉洁政府联盟联合起来，推翻坦慕尼协会的统治，选举年轻的改革家约翰·米切尔为市长。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精力充沛的市民委员会和无所畏惧的大陪审团，揭发出由市长艾姆斯操纵的警察贿赂网，并将市长及其亲信送进了监狱。

一般说来，市政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两大模式：一类是在对政党机器的腐败和无能产生不满的企业家和专业工作者的领导下进行，着力于建设一个"诚实、高效、类似于商业"的政府。1895—1897 年间出任纽约市长的商人威廉·斯特朗是这类改革家的典型。另一类改革运动的动力来自于广大市民要求提供城市服务以及经济救济的压力，底特律市长平格里（1890—1897 年任职）属于此类。较之斯特朗，平格里更加关注社会福利、公用事业公司的管理以及税收负担的重新分配。到 1900 年，这两类模式及其交叉混合模式在全美各地得到广泛实施，"都市进步主义迈步进入其最具创造性阶段的门槛之上"。[1]

〔克利夫兰市的改革〕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改革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市政改革模式，即所谓"社会改革型"的都市进步主义。底特律市长平格里虽是这方面的先驱，但最具影响的是克利夫兰市的汤姆·约翰逊（1901—1909 年任市长）。他长期致力于改进城市生活，抑制腐败，削弱特权，调整税收，为克利夫兰市赢得了"美国治理得最好的城市"的声誉。

1901 年，约翰逊以平等税收和"3 分钱电车费"为竞选纲领，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当选为市长。执政后他罗致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市政管理人才，协助推进各方面的工作。他首先针对税收的不平等展开斗争；接着向在克利夫兰拥有大量财产但几乎不

---

① 阿瑟·林克、理查德·麦考密克：《进步主义》，前引书，第 39 页。

纳税的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开火。1903—1904年，州议会加倍征收铁路税，公用事业部门则同意将税款翻一番。更加激烈的是争取“3分钱电车费”的伟大斗争。地方公共运输利益集团拒不屈服，约翰逊及其市政会议乃建设对抗性电车线路并邀请市外资本家来投标。地方公共运输界乃求助于州共和党核心集团。该集团向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上诉，结果州最高法院宣布俄亥俄州各城市所有特许状无效，理由是这些特许状是特别立法的产物。州核心集团随后召集议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统一的市政法典，取消了各市旧的集权制度，而由分散的权力机关和独立部门进行治理。

克利夫兰市长约翰逊没有气馁，继续向人民呼吁，并得以再次当选。最后他断定，消除市政腐败罪恶根源的惟一出路只有一条，即将公用事业和公共运输业收归国有。1909年改选时，约翰逊被保守势力击败，不到一年后去世。但他的政纲却由于其主要副手牛顿·贝克在1911年当选市长而继承下来。

克利夫兰的改革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约翰逊之后，很多城市开始尝试性地推行所谓“煤气和自来水的社会主义”①，接管了公用事业公司，将其作为市政府的一些部门加以运作。到1915年，全国所有城市水厂当中，将近2/3收归公有，很多煤气、电力和街车系统也一样。进步派市长还取得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例如，托莱多的琼斯确立了市雇员的最低工资，兴建了运动场和高尔夫球场，放宽了严厉的刑罚。纽约的塞斯·娄改进了该市的公共运输系统，1901年《公共住房法》获得通过。

〔新型市政体制的建立〕　　市政改革者面临的共同敌人，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6页。

是与企业特权和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的顽固腐化的政客；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大公无私的政府、公平的税收、对公用事业公司的管理以及面向下层阶级的公益服务事业的扩大。然而，在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朝着共同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改革者们逐渐认识到：仅仅驱除恶棍并制定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是不够的，只要党魁依然控制着党的机构，改革者就决不能高枕无忧，必须转而致力于政治机构的改革，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和控制政治。为此，城市进步派与其他改革团体携手，对政党核心集团及其“头头”展开正面进攻，力争建立直接预选制以提名候选人，选举市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实行创制、复决和罢免权。这些也是州级进步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目标。

约翰逊等进步分子发现，城市核心集团都是州核心集团的组成部分。地方核心集团即使被打碎了，但州核心集团往往通过立法机关取消市级改革的成果。要结束、摆脱州立法机关对市政的干预，必须争取城市自治。为此，市政改革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04年，仅有密苏里、明尼苏达、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4个州的城市已经获得自治权。到1914年，这样的州增加到12个。[①] 然而这些州中，只有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拥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城市；更有甚者，即便是在这些获得了“自治宪章”的城市，城市改革家也毫无例外地没有能够改变市政体制，因而根本不能永久地摧毁地方党派机器。

1899年，全国城市联盟（此时加入的“好政府”已达200个）为寻求改进都市管理提供了一个模范性的“城市宪章”，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市长的职权；对市政会议成员进行普遍的而不是按选区的选举；削弱州对市政事务的干预；根据文官制度规

---

① 杰拉德·拉什：《伟大的转变：20世纪美国史》，波士顿，1971年，第45页。

则任命行政官员。不少城市创立研究局，以一种科学的、非党派的态度展开调查、研究或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新型市政管理模式：强市长—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

第一种模式：强市长—议会制。该体制基本上是在原市长—议会制的基础上加以改革而形成的。在该体制之下，市长的权力得到加强，原来的市议会大多由两院变成一院。强市长不仅有权任命和罢免各部部长，享有全部行政管理权，在部属的帮助下制定和执行预算，管理公务，而且往往能够贯彻并实施建设性的政策，甚至有权否决议会的提案。布法罗市长格罗夫·克利夫兰就曾屡屡行使否决权，否决党派机器操纵下的市议会通过的许多法案，赢得了“否决市长”的称号，他也因此而倍受改革派的青睐，以致于后来终于荣登总统宝座。强市长—议会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中比较流行，1880 年，全国 23 个最大城市中还仅有 1 个实行这种体制，但到 1900 年时就已经增加到 12 个。① 该体制也存在着缺陷：一是在加强行政部门特别是市长权力的同时，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二是要求市长既是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又是高效的行政管理官员，而身兼两种品质的人毕竟太少。因此，美国更多的城市则尝试着采取其他类型的市政体制。

第二种模式：委员会制。为了彻底消除旧的市长—市政议会制的弊端，改革派探讨着组建超党派委员会的可行性。委员会制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即已提出并经多次讨论，1900 年，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市作为一项应急措施首次采纳。这年 9 月 8 日，飓风和海啸袭击加尔维斯顿市，破坏惨重。面对迫在眉睫的救灾

---

① 约翰·布鲁姆等：《国家的经历：美国史》，哈考特和布雷斯世界公司，1968 年，第 473 页。

和灾后重建任务，腐败的市政会议束手无策。改革派要求撇开市政府，成立一个5人委员会，全权负责各项工作。市议会批准了这一要求，由此诞生了委员会制。

在后来的实践中，委员会制不断得到完善。它一般适合于中等规模的城市，通常情况下将行政和立法权力合而为一交给一个5人左右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分别担任各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其中1人由委员会推选为市长，但其权力并不比其他委员大多少。1903年以后，委员会的委员由人民选举产生。1907年，艾奥瓦州议会在得克萨斯州样板的基础上采纳一种更完善的形式，通过的法令规定：允许本州2.5万人以上的城市采用委员会制；将创制、复决和罢免权作为城市政治机制的组成部分，并规定在超党派选举中提名委员候选人。该州的得梅因市率先推行，颇为成功，从此，委员会制便因所谓“得梅因理念”而著称于世。到1910年，已有100多个城市采纳委员会制；一战前夕，这样的城市超过400个，主要是中西部、新英格兰和太平洋沿岸诸州的中等城市；到1917年，采用委员会制的城市达到500多个。[①]

实践证明，委员会制具有显著的优点：它打破了传统的分权学说，将行政权和立法权集中于一个小团体手中，使得职责集中，易于协调复杂的政府活动；它实施了管理的部门化，每个委员各自负责市政府的一个部门，职责明确，提高了工作效率；委员会制下的责任制政府对于遏制城市老板专权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委员会制也存在体制上的缺陷：它破坏了分权与制衡原则，虽然有一定的制约机制存在，但容易造成委员的揽权

①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第85页；詹姆斯·伯恩斯等：《民治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21页。

和专权；与此同时，委员会内部又存在权力分散现象，各个委员地位相等，没有一个负责的单一行政首长来对全市的行政负责，缺少一个中心机构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结果造成一个市有5个市长的局面。此外，由于不能保证委员会的委员是管理专家，因而委员会难以使得管理责任集中。针对这些缺陷，进步派对其逐步加以改进，在吸纳商业经营的经验之后，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城市经理制。

第三种模式：城市经理制。该体制最先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城镇斯汤顿市得到试验。斯汤顿是个后起的工业城市，为了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1908年市议会任命一名总经理来指导该市的工作，并赋予其较大的行政权力，效果很理想。改革家理查德·蔡斯对这种新的尝试很为关注，经过研究发现倘若将委员会制和这种试验结合起来，效果将更好。在他的积极鼓吹下，城市经理制很快成为改革家和企业界精英的"宠物"，被称为"市政改革的最新口号"。

采纳城市经理制最为典型的是俄亥俄州的戴顿。1913年，戴顿市遭到特大洪水，市长及市政会议无能为力，于是率先完整地采用此制。城市经理制保存了市政委员会制的优点，摈弃了其大部分弱点。在这种体制之下，超党派选举产生的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及法令，批准预算，并对委员会任命的市经理实行监督；市经理（通常是受过训练的专家）是单一的行政首脑，负责全市的行政事务，领导市政府各部门编制预算，执行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二者职责分明，前者不得干预后者的行政事务，后者则必须在一切事务中对前者负责。

上述三种模式中，城市经理制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它既有宏观控制，又有分散管理，既能得到可靠而内行的管理，又不牺牲民主管理原则，因而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市政管理的科学化。正因

为此，城市经理制迅速推广，很快在很多城市取代委员会制。到1923年，采纳城市经理制的城市达300多个，特别是中小城市，普遍采用这一管理模式。①

进步主义时代结束时，权威人士在对美国状况作了调查之后认为，美国的城市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它清除了城市的社会罪恶，抑制了市政管理中的腐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弥补了美国"都市政府结构中的机械化缺陷"②，推进了民众政治和责任制政府的发展。由于这些成就，进步派的市政改革家有理由确信：经过进步主义运动期间的大规模市政改革，"即使城市还没有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它也不再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顽敌"。③

五、州级改革运动的兴起

在都市改革运动不断发展并且越来越普遍时，进步派在州一级开辟了改革的"第二战线"。④

这并非偶然。市政改革和州级改革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随着都市改革的推进，进步派越来越感到州宪法和州政府的不足。都市改革处处受到州宪法和法规的掣肘和阻碍，必须在州级有根本的改变。特别是实现城市自治更离不开州的改革进程。为消除政党机器的不良影响，摆脱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对州政治的控制，促进州的社会福利，在改革潮流推动下，一些州相继出

---

① 杰拉德·拉什：《伟大的转变：20世纪的美国史》，第46页。

② 阿瑟·林克、理查德·麦考密克：《进步主义》，第29页。

③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91页。

④ 奥蒂斯·格拉海姆：《伟大的运动：美国的改革和战争，1900—1928年》，第30页。

现了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西部诸州是改革的大本营，这里有被称为“民主实验室”的威斯康星，还有不甘示弱的艾奥瓦和印第安纳。东部纽约州查尔斯·休斯领导的改革波澜壮阔，新泽西州的“新思想运动”浩浩荡荡，最终导致进步主义改革家伍德罗·威尔逊的上台。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在西拉姆·约翰逊和威廉·尤伦执政时期的政治面貌也焕然一新。

〔州的耻辱和改革运动的兴盛〕　如同城市的情形一样，本世纪初年，腐化和特权在许多州猖獗一时。各州盛行党魁制度，党的权力总是集中在州委员会手里。通常由州委员会主席来组织州议会，控制立法，并与铁路和公司的说客打交道。代表铁路公司和企业界利益的院外活动集团，贿赂、收买州议会中的政党核心小组，成为“合法机构后面操纵一切的真正起作用的政府”。这种情形在密苏里等州最为典型。而由大公司和政党核心集团结盟控制州政的情况则在新泽西州达到极点。这里的企业和金融界领袖，实际上常常是位居优势的共和党的领袖，企业人员通常不必去贿赂议员或州政府官员。例如，铁路公司通过院外活动集团在 1903 年就安插了自己人出任州首席法官、司法部长、州审计员、保险业特派员以及州税务官员。另外该州的两名国会参议员都和公用事业有利害关系，而退休的司法部长则在 3 个公用事业公司中任董事。因此，州公用事业公司得以逃避政府的管理和税收。

各州反对党魁制度的斗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即已展开，到进步主义时代达到极点。20 世纪初年，既得利益集团牢牢控制着中西部各州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党。1900—1908 年间，该地区受到一连串共和党人“反叛”浪潮的震荡。在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福莱特、艾奥瓦州的艾伯特·卡明斯、印第安纳州的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等人的领导下，中西部各州由保守共和党人的堡垒，一

变而为进步主义的大本营。随着新面孔的出现和新力量的得势，改革在一州又一州产生影响。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南北达科他、俄勒冈等州的新州长，也都成功地建立了进步主义的政府。这些改革中，最激进、最知名的进步主义领导者是罗伯特·拉福莱特。

东部地区，进步派的反叛带有更明显的城市色彩。这里的城市改革运动早就如火如荼地展开，其规模、程度和影响较之中西部地区毫不逊色。查尔斯·休斯在1906年和1908年当选为纽约州长，为了直接预选和公用事业以及铁路的公共管理进行了英勇斗争。新泽西州，1906年共和党人内部出现的“造反”行动揭开了“新思想运动”的序幕，并最终导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1910年当选为州长。俄亥俄州于1912年通过新宪法，并选举民主党进步派詹姆斯·考克斯为州长。

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政治也大为改观，进步派取得了一些胜利，如加利福尼亚州的西拉姆·约翰逊、俄勒冈州的威廉·尤伦。到1912年，进步派领袖们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致于当时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1900年以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已经完成。

〔“好斗的鲍勃”与威斯康星州的改革〕　威斯康星提供了州级改革“最为成功的典范”。[①] 20世纪的头10年，在“最杰出的时代人物之一”拉福莱特的领导下，威斯康星州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罗伯特·拉福莱特（1855—1925年），出身于威斯康星州普里罗斯镇一个劳动者家庭，深受农业平民党人传统的影响，但未曾成为一个平民党人。1885年，年仅30岁的他竞选国会参议员获胜，成为第49届国会中最年轻的成员。他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第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4页。

三选区，身高仅5英尺5英寸，比绝大多数议员稍矮，满脸胡须，但与多数来自中西部地区北部的人一样，对共和党抱有强烈信念，所不同的是他比很多同事更有雄心。1885—1891年间，他连续3届出任共和党人国会议员。期间，以不妥协地反对腐败和企业对政治的控制而著称，1901—1906年出任威斯康星州州长。[①] 他的政治信仰中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一旦人民被妥当地告知、得到激励，人民将做出正确的选择，“(政党）机器的控制是建立在不正确的代表和无知之上的。民主建构在知情之上……击败老板和头头统治的惟一途径是保持人民完全知情。”[②] 他的政治生涯证明了这一点。在和保守的威斯康星共和党人政党机器的不断冲突和斗争中，拉福莱特借助强有力的诉诸人民的选举，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此，他也获得了“好斗的鲍勃”的绰号。

作为州长，拉福莱特冲击了威斯康星州的政治结构。面对屈服于州内铁路和木材利益集团的保守共和党人的反对，他团结支持者赢得提名候选人的直接预选法、腐败行为法、限制竞选支出和游说活动的法律。在权力上，他本人变得有点像老板，当时的著名新闻记者马克·沙利文就曾这样评价道：“作为一名州长，拉福莱特在多年来不断地痛斥党魁制度之后，自己事实上也成了威斯康星州的党魁。”[③] 他无情地利用赞助，要求属下绝对的忠诚，一味地迷信于将复杂问题交给选民选择，从而常常使得问题被扭曲或过分地简单化了。他献身于诚实政府的事业，如同很多都市改革家一样，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以及专业训练对于解决复杂的现

---

① 有关拉福莱特的早年政治经历，请参阅戴维·希伦：《罗伯特·拉福莱特与反叛精神》，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76年。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5页。

③ S.D.加什曼：《“巨头”时代的美国》，纽约，1988年，第52页。

代政府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州的某些职能要求高技术专家的知识。在他的推动下，威斯康星州政府创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和机构，来处理诸如铁路管理、税收计算、资源保护、高速公路建设这样的问题。他还建立了一个立法参考图书馆，以帮助制定法律的人起草法案时参考。在这方面，他充分利用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资源，成功地劝说经济学家 B·H·迈耶尔、政治科学家托马斯·亚当斯这样的人出任公职，并且随时能够从理查德·伊利、约翰·康蒙斯、爱德华·罗斯这样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得到有关决策的咨询意见。

威斯康星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被称为“威斯康星理念”，西奥多·罗斯福誉其为“民主的实验室”。到一战爆发前，威斯康星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管理文官、院外活动和竞选费用的法规；同时引入直接预选制、创制权和复决权。其他方面取得的改革成就更是不胜枚举，如童工、女工立法，公共健康和纯净食品法，资源保护立法，州对银行和铁路的控制，高额的公司税收等。威斯康星还是美国第一个颁布工人赔偿法和所得税法的州。

威斯康星的改革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艾奥瓦（1901年）、阿肯色（1901年）、俄勒冈（1902年）、明尼苏达、堪萨斯（1904年）、密西西比（1904年）、纽约（1906年）、佐治亚（1906年）、内布拉斯加（1909年）、新泽西（1910年）和科罗拉多（1910年）等州纷纷效法。有些州内，改革者主要是共和党人；另一些州，改革者主要是民主党人；还有一些州内，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协同作战，共同推进改革事业。但是，所有这些州以及其他很多州，都受到威斯康星的“样板”作用的极大影响。20世纪初年，要求提供经验和建议的请求从美国各地涌向威斯康星的管理者。1910年，已有15个州建立了立法参考服务机构，

其间工作的大多数人都在威斯康星州接受过培训。[1] 直接预选制也很快普及到其他州；有些州在试图推进政府充分体现民意方面甚至走到威斯康星的前面。1902年，俄勒冈在威廉·尤伦的有力领导下，开始尝试创制和复决体制。到1914年，11个州（绝大多数为西部州）制定了这方面的立法，13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2]

〔“还政于民”与政治领域内的改革〕　州级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恢复代议制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改革派认为，由政党机器控制的州政府已不再代表人民，因而提出“还政于民”的战斗口号，并在这一口号的指导下对州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

建立直接预选制。在进步主义获胜的各州，都有敢作敢为的改革派领袖，他们发动人民起来斗争，并在胜利后建立认真负责而卓有成效的政府。他们认为，如果代议制政府已告崩溃，那就必须建立新制度，以便于公众控制政党和政府。如何实现？首要的目标是建立直接预选制，以之取代党魁控制的代表大会提名的旧制度。在进步派看来，代表大会提名的旧制度为党魁提供了永远占据统治地位的便利手段。1900年以前，美国市、州的选任官，都是由地区、县和州的党代表大会提名，这样的代表大会容易被收买或控制，通常从属于政党核心小集团。通过建立由人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的制度，选民将较易而党魁则较难控制政党。直接预选制19世纪40年代首创于宾夕法尼亚州，但直到90年代才在地方一级广泛采用，且主要在南部地区实行。1902年密西西比州首先通过强制性的全州预选法。1903年拉福莱特领导下

---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5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6页。

的威斯康星率先采纳直接预选制。此后，预选制迅速传播到各地。到1914年，至少有30个州有了直接预选的有关立法；到1916年，只剩下罗得岛、康涅狄格和新墨西哥3个州未颁布直接预选立法。[①]

实行联邦参议员直接选举，以代替州立法机关的推选。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是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倡导的主张之一，1900年民主党也将其列入党纲。1894年、1898年、1900年和1902年，联邦众议院四次提出参议员直接选举的有关宪法修正案，但每次都遭到参议院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拒绝。在此情况下，很多州转变策略，采取一种间接方法来达到直接选举参议员的目的，即：要求参议员候选人在预选中提名，并要求州议会候选人宣誓投由人民这样提名的参议员候选人的票。1909年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党魁”威廉·洛里默被选入参议院的“丑闻”发生后，群情激愤，改革出现新的推动力。1912年，联邦参议院被迫通过了关于直接选举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1913年5月31日法案生效。

争取创制权和复决权，以改进民主的政治机构的运行。许多进步派人士认为，即使在新的更民主的体制下，代议制政府也可能被特权势力所推翻。因此，必须求助于“最后的手段”，即赋予人民以“创制权”和“复决权”。借助于前者，选民可以在达到规定的选民百分数要求的情况下，直接制定违背立法机关意愿的立法。此时，立法机关必须对选民提出的法案予以考虑，如果立法机关拒绝批准该法案，它必须另外举行特别选举。选民们可在这种选举中表决通过或否决该法案。凭借“复决权”，选民可以否决立法机关批准了的违背广大民众利益的立法。1898年，

---

① 杰拉德·拉什：前引书，第52页。

南达科他州率先采用创制和复决的做法。继之，西部的犹他州、内华达州、蒙大拿州、俄克拉何马州等纷纷效法。在俄勒冈州，创制和复决得到最好的试验，1902—1910年间不少于32项措施被提交人民表决。[1] 1908—1915年间，另有15个州（包括东部、南部的一些州）规定了公民的创制权和复决权。此后，由于保守派的反击，加上广大选民无力对付立法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运动陷入停顿。

为了进一步保护公众利益，进步派改革家呼吁赋予选民撤换不称职选任官的权力，即"罢免权"。罢免的做法1903年始于洛杉矶，最初只限于市政部门和地方上的选任官，在实行委员会制或城市经理制的城市里比较流行。1908年，俄勒冈州将其应用于州和地方的选任官。另有9个州（大多为西部州）在1911—1915年间效法。俄勒冈、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科罗拉多、堪萨斯和北达科他7个州，甚至授予人民罢免法官的权力，结果激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实际上，罢免法官的做法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少州对不合时宜的州宪进行了修订。据估计，1900—1920年间提出的州宪修正案多达1500条以上。[2] 此外，州政改革中还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贿赂、组成政府经济效能委员会、加强科学管理等。

〔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改革〕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改革派也发动了强大攻势，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加强立法，建立对大企业、公用事业公司和银行的管理与控制，限制集中的经济权力以

① 约翰·希克斯：《美国民主简史》，里沃萨德出版社，1946年，第647页。
② 杰拉德·拉什：《伟大的转变：20世纪的美国史》，第52页。

恢复经济生活的平等。1900—1917年间各州通过的各种各样的管理立法几乎多得无法数清。为了管理商业，实质上每个州都建立了委员会，授权其查阅公司账簿，举行公众听证会。1900年以后，委员会又被授予采取行动的新权力，而不是消极的等待着投诉，有时还确定最高限价和运费。州级管理委员会的一些做法后来被吸收到1906和1910年的联邦立法当中。一些企业领导人也支持联邦立法，宁可接受统一的管理机构而不是面对无数分散的州委员会。

威斯康星的改革在很多方面走在前列。那里的进步派创立了由超党派专家组成的强大的铁路委员会；制定了累进制的州所得税法，加强了州税收委员会，着手迫使公司承担适当的管理费用；极力争取管理保险公司的法律，仅1907年1年就通过了20多项法案，并建立了一个州属小型人寿保险公司，以之作为核定私人公司收费率的评判标准。1911年，创立了一个工业委员会以实施该州广泛的劳工和工厂立法体系，此外，还建立了一个由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西斯为首的资源保护委员会。[1] 各州在对铁路建立有力的公共控制方面，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1905年，威斯康星州议会通过拉福莱特州长的铁路委员会法案，至此，各州对铁路的管理运动达到高潮。到1914年，管理铁路的运动“变得如此声势浩大，铁路经理们当时只得求助于国会，使其免遭州委员会的侵害”。[2] 在对公用事业公司的控制等方面，各州的基本做法是通过各种委员会对公用事业公司和保险投资公司的收费标准、保险费、利率以及服务等进行专门的管理，这一运动在进步主义时代达到第一个高潮。

---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8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97页。

威尔逊任新泽西州长期间（1911—1913年），新泽西也经历了一场立法的风暴。在威尔逊的力促之下，该州立法机构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授权其评估铁路、煤气、电力、电话和运输（快递）公司的财产，为这些公司确定税率和收费标准。立法机关还通过了储存和食品检查法，并在威尔逊已经入主白宫的1913年制定了7个法案（俗称“七姊妹”法），大力加强州对公司的控制，从而为新泽西州赢得了“信用之母”这一无可争辩的声誉。[①]

其他州的经济改革运动虽然不象上述州如此壮观，但总体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纽约州一项关于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调查，导致了该州保险立法的深刻变革，并将主持这次调查的查尔斯·休斯送上了州长的宝座。随后他领导开展了其他进步改革。在艾奥瓦州，1906年通过了管理铁路的比较强硬的新法律。在内布拉斯加，立法机关1909年创立了一个银行储蓄保险体制。大约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州开征遗产税，并设立一个州所有的收割机工厂来抗衡收割机托拉斯。佐治亚州提高了公司的税收。所有这些，还仅仅是各州通过的成百条立法当中列举的几个典型。[②]

在社会领域内，改革派以州的管理权为依据，置法院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而强加的限制于不顾，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在争取童工立法、女工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立法、建立赔偿和保险体制乃至发展公共教育等所谓“社会正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

世纪交替之际，美国的政治生活仍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地方政治和州政府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远比联邦政府突

---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8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8页。

出，因而各州的改革行动在消除工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弊端方面作出的努力中占有重要地位。大规模的市政改革和州政改革，动摇了政党核心小集团的权力基础，简化了政府的组织形式，拓宽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从而一定程度上刷新了美国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改革派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意义同样不容低估。1913年，罗伯特·拉福莱特在回顾自己作为威斯康星州州长为人民所作的艰苦奋斗时，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在威斯康星州任职的叙述到此结束。这是一段充满斗争的岁月，但也是一个我乐于回顾的时代。这曾是一场极其值得进行的战斗。我希望人民按照它实际取得的成果对它作出评价，象它最终必将得到的评价一样。如果能够证明威斯康星州是一个较幸福较美好的居留之邦，其制度较民主，其所有人民都享有较平等的机会，其社会正义较近于普遍，其人民生活较安全和愉快——那么，我就会怀着进步运动取得胜利的心情而心满意足。"[①] 这段话至今读起来，仍然意味深长，发人深思。

---

① 《罗伯特·拉福莱特自传》，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13年版，第368—369页。转引自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98页。

第五章

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

美国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及其时代的专家乔治·莫里说，麦金莱的去世，使进步主义运动在白宫有了一个发言人。① 随着市、州改革的深入，改革派不得不转向首都华盛顿，以求解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比如对铁路和其他大公司的进一步控制和管理，银行体制的改革，关税政策的修订，自然资源的保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单纯依靠某个州或者某些州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改革事业呼唤一个充满活力的全国性的代言人，而西奥多·罗斯福正是进步派所要寻找的人物。

一、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斗争

罗斯福上台后，如何控制工业联合体的势力，纠正和防止由它所带来的流弊，促使社会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依然是一个亟

① 乔治·莫里：《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与现代美国的诞生》，纽约哈珀公司，1958年，第106页。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罗斯福在总统的第一任期内，针对托拉斯这个20世纪初年美国最敏感、最关键和最错综复杂的难题，采取了惊人之举，复活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一系列民愤极大的大托拉斯集团提起诉讼并迫令其解散，由此赢得了“托拉斯轰炸机”的绰号。

〔白宫最年轻的总统〕　1901年9月，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年仅42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此前很久，罗斯福就已经设计好了入主白宫的打算，这一意外事件，只不过提前实现了他的愿望。对此他写道：“这样就任总统之职，是很可怕的事，但如果为此而感到可怕，那就更糟糕得多了。”[①]

罗斯福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集诸多经历于一身，既是警察、牛仔，又是战斗英雄和为正义而战的勇士。他出身名门，毕业于哈佛大学，早年即立志从政，是忠诚的共和党人。1898年11月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州长任内（1899—1900年）厉行改革，向公用事业公司开战，迫使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接受公众的控制。为此遭到共和党内保守派的排挤。长期控制纽约共和党人的党魁托马斯·普拉特参议员深为不安，于1900年设法提名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将其撵出纽约州。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罗斯福写过很多迄今仍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任纽约市官员期间，就因为贫民窟的状况而深感震惊，并开始倾听社会改革家的主张。他从未对那些一心只想赚钱的人表示过好感，谈起这些人时，他总是习惯性地带着蔑视和诋毁的口吻。他的大门总是对知识分子、诗人、奖项追逐者、牛

---

① 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03页。

仔、艺术家和急性子的年轻记者们敞开着。

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且是一个虔诚的共和党人。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固有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贵族，而共和党就是“社会上最杰出的人”的党。他曾哀叹盎格鲁萨克逊人出生率的下降。早在19世纪90年代，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本土主义者，支持限制移民。此外，他发自内心地厌恶公共事务中的不诚实。控制纽约市的坦慕尼政党机器、腐败盛行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使得他甚至不曾考虑要做一个民主党人。

他之所以选择共和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首先，共和党哲学并非仅仅专注于精英政治和贵族政治，它还强调努力工作、不断进取、过道德和诚实的生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之所以投共和党的票正是因为这一点。共和党人坚持说，它们是可靠的个人主义者，通过工业化给有才能的普通人和企业提供致富的机会，至少使得他们感到舒适和自立。对于这些看法，罗斯福表示赞同。其次，还有国家主义因素的作用。罗斯福是一个带有浓厚色彩的国家主义者，共和党人也都是“美国至上”的国家主义者。罗斯福喜欢知识分子，但前提是，在他看来他们对美国不是持过分批评立场。弗兰克·诺里斯的暴露性小说曾令他不安。同样是他带着蔑视的口吻称呼那些暴露社会阴暗面的新闻记者为“黑幕揭发者”。他信赖大企业家，但认为大企业家在个人的自私自利方面走得太远了。他主张穷人有权获得体面的工资和生活条件，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令他怒气冲冲。

政治上，罗斯福是汉密尔顿哲学的信徒，希望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美国，其做法是建立一个能够满怀信心带领这个国家前进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认为总统是“人民的管家，应该为

人民鞠躬尽瘁”。[1]

如同这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常常说有必要借助于促使政府提高“效能”来解决国家的弊病。他坚信，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将真正的权力赋予品行良好的强人和能人。罗斯福从不信赖立法程序，在他看来，州立法机构和国会每每出差错，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立法部门被搞得晕头转向、缺乏领导以及沉迷于琐屑之事。在日后的总统生涯中，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以绕过国会赞同的方式处理内外事务。

作为总统，他比前任更看重强有力的独立委员会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这些委员会往往由专家组成，不受国会的干涉。罗斯福希望借助强有力的管理来解决国家的弊端，在这点上，同时期的新中产阶级在市州政府内、农民组织内、专业机构内以及商业和工业方面所做的一切目标是相同的。必须看到，强有力的独立委员会虽然被广泛称赞为民主之举并代表着人民利益，但根本不是必要的民主理念。公共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想当然地以为这些人带着良好愿望，但是，这一权力如何行使，仍然是一个问题。罗斯福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所关心的只是务必将品行端正之人任命到委员会之中。罗斯福对能人的强有力领导的乐观主义信念，使得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国政府的制度模式。

罗斯福继任总统之后，政治上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受到很大局限。他继承了麦金莱的政府，国会为保守派所控制，共和党组织紧紧地掌握在正统派手中。然而，他并未烦躁不安，而是充分利用自己进入白宫之前已积累的十余年从政经验，纵横捭阖，寻找良机。他博学多才，易于接受谋士意见，上任后即着手弄清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一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网罗了一

---

①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204页。

批出色的顾问和僚属到联邦政府部门供职，改组了联邦机构，十分巧妙地摆脱了共和党“党魁”马克·汉纳对党内事务的操纵，确保了官吏的任命权。他留用麦金莱的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并提升其为国务卿，任命威廉·塔夫脱继任陆军部长、吉福德·平肖任森林局长、詹姆斯·加菲尔德任内政部长，后两人是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打击托拉斯："托拉斯轰炸机"〕　罗斯福就任之初，围绕关税和货币政策，国会即已闹得不可开交。作为一个渐进主义者，他决定先采纳参议院保守派对此问题的政策建议。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工业合并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能力控制”托拉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托拉斯的成长和壮大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对于托拉斯的活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们作出了大量的反应，各级政府也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到19世纪80年代，各州除了颁布铁路运费法令外，还通过了一些局部性的不完整的反垄断法。1890年时，至少有14个州和领地（均在西部和南部）的宪法条文中包含有反托拉斯的条款，另外13个州通过了反托拉斯法。[①] 然而各州法律条文差异颇大，州的立法既不能摧毁垄断企业，也不能恢复竞争。1890年，联邦政府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通过了反托拉斯的“谢尔曼法”。法令规定：“凡以托拉斯或其他类似形式的契约和联合，以及限制州际贸易及对外贸易为目的的秘密协议，均属违法。任何人如缔结此类契约，或从事任何此类联合或秘密协议，均应认为犯罪”；“任何人如独占，或企图独占，或同任何其他个人或多人联合，或阴谋独占州际或对外商业和贸易的任何一部分，均应认

①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前引书，第111页。

为犯罪”，并规定受害者有权起诉，追回3倍的赔偿费。然而，垄断资本家反对该法，认为是对合法商业的打击，对经济发展不利，因而在司法部执行过程中处处掣肘；加上存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难题，实际上司法部门未能认真执行该法，因而“谢尔曼法”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徒有虚名。1895年，联邦最高法院就“联邦诉奈特公司案”作出判决，宣布州内商务垄断不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打击之列，此举再次表明联邦政府无力控制托拉斯。

1895—1904年的公司合并高潮招致了广泛的忧虑。许多企业家（如罗斯福的好友、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乔治·帕金斯等）为企业经营中的毁灭性竞争和非人道行为所震惊，开始希望政府对企业行为进行适当管理，以之作为改变混乱状况、恢复经济常态的手段。全国消费者联盟要求联邦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反对大企业的胡作非为。一些进步派则担忧财富和权力集中于一小撮人之手将加剧不平等，构成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威胁。共同的愿望（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促使联邦政府在大企业的管理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899—1900年间，国会内部掀起一股修改反托拉斯法的浪潮。一项旨在推翻奈特判决的宪法修正案被提交国会表决，结果由于未能获得2/3多数票赞成而流产。1900年，众议院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一项修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法案，但因参议院的阻挠而搁浅。同年，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托拉斯与工业联合的初步报告，总结关于垄断公司制的两种看法：一种意见偏向大公司，认为大企业为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好处，如节省资本与劳动，统一商标和专利垄断、集中管理、综合许多企业的管理技巧、有利于出口贸易等等；另一种意见对大公司持有异议，大肆指责大公司裁减雇员导致失业，采用不公正的竞争手

段提高产品价格，实行投机和股票掺水，大搞运费歧视，牟取市场垄断等等。[1] 对托拉斯认识上的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联邦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取向。虽然到20世纪初年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由政府对大公司实行适当控制，但针对诸如如何控制、控制到何种程度之类的问题，并未达成共识。

罗斯福原则上不反对大公司，相反，认为它们是进化过程中必然的、富有成效的部分，因为大公司效能高得多，可以调动大量资金用于资源的开发、协调性的合作，消除"浪费性"的竞争。罗斯福总是羡慕有权势者，倾向于支持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干。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有权势者中的某些人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因此，罗斯福相信，已经到了主权者——人民通过他们的联邦政府介入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罗斯福政府选择反托拉斯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突破口，还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考虑。反托拉斯作为一个政治性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主要是由于一些托拉斯企业招致了社会广泛的不满。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要从总体上消灭托拉斯，而是就事论事有针对有选择地打击那些最劣迹昭彰的托拉斯企业。他从来没有认为摧毁托拉斯就可以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热衷于拆散托拉斯的人。他执政的7年间所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甚至少于他"保守的"继任者塔夫脱在位4年所提出的数量。[2] 在1901年12月4日提交国会的咨文中，罗斯福定下了对托拉斯政策的基调，认为政府所要做的应该是监督、控制

---

① 路易斯·哈克编：《美国经济史主要文件集》第2卷，新泽西1961年，第7—11页。转引自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②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进步的负担：1900—1929》，斯考特和福雷斯曼公司1978年，第69页。

和管理托拉斯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垄断。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清除大公司，相反，这些大型企业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那些企图破坏它的努力必然是无效的……我们并不是攻击大公司，我们只是要去除其中的污垢。"[①] 他还说，"我个人的经验使我相信，……所要寻求的目标并非对所有企业联合不问目的如何一概加以禁止，而是采取监督的办法以防止有害的企业联合，从而保证所有发生的联合都有利于公众的利益。"[②] 任内，他反复强调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联合的时代，任何阻止所有联合的努力不仅是无效的，最终也必然是错误的。"[③] 美国史学家阿布拉姆斯甚至认为，罗斯福是工业合并的热心支持者，因为"在他的国会咨文、公开演说和私人信件中都充满着对为了提高效率而重建美国工商业的努力的同情"。[④]

罗斯福当政时期复活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开始大规模地起诉大垄断公司。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北方证券公司。

北方证券公司是在金融家摩根操纵之下于 1901 年组建的一个铁路垄断集团，是由北方太平洋铁路、大北方铁路、芝加哥—伯林顿—昆西铁路三家铁路公司联合组成的庞大控股公司，控制了美国西北部的铁路交通运输。在它组建之前，金融界的巨头摩根公司、洛克菲勒集团、詹姆斯·希尔和 E.H. 哈里曼为了控制西北交通生命线，竞相争夺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结果引起 1901 年华尔街的金融恐慌。恐慌给不少经纪人带来灾难，也引起公众对残酷无情的投机活动的关注。随后，这些金融巨头达

① 杜威·格拉海姆：《西奥多·罗斯福》，新泽西 1971 年、第 55 页。

②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前引书，第 132 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纽约，1979 年，第 223 页。

④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进步的负担：1900—1929》，前引书，第 69—70 页。

成协议，共同组建了北方证券公司。公司共拥有4亿美元股份，其中含有30%的水分。公司的成立，也立即引起美国西北部地区农民的焦虑不安，他们担心铁路运费会随之上涨。

罗斯福觉得北方证券公司的成立大有文章可做，表示要在法庭上来检验该公司的合法性。在其指示下，司法部长诺克斯开始秘密收集证据。1902年2月19日下午，诺克斯宣布政府将控告北方证券公司违反谢尔曼法，消息传出，华尔街为之愕然。妄自尊大的摩根派律师与司法部长诺克斯商谈解决办法，以失败告终。结果双方只好对簿公堂。经过一年的努力，罗斯福赢得了诉讼案的胜利。1903年联邦法院下令解散北方证券公司，翌年，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罗斯福认为，此案"意义之重大是无法估量的"。它为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拆散那些庞大的、最具破坏性的联合，开辟了道路。

罗斯福任内，政府还对另外40余家公司提起诉讼。鉴于出售牲畜和牛肉消费者的普遍不满，1902年开始对"牛肉托拉斯"提出诉讼。1906—1907年开始起诉的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纽黑文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同样不得人心。1911年，美孚石油公司案和美国烟草公司案以联邦政府获胜告终。通过这些诉讼，终于确立了一项原则，即根据最高法院的判断，倘若涉嫌公司确曾对自由贸易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那么联邦政府事实上拥有宪法赋予的摧毁垄断的权力。

罗斯福当政时期，根据"谢尔曼法"对托拉斯提起一连串诉讼，司法部起诉18次，受理起诉25次，其总数超过以往历届政府提出的总和。[①] 北方证券公司、牛肉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等都在司法部的起诉之下被迫解散。为此，罗斯福

①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前引书，第113页。

赢得了“托拉斯轰炸机”的绰号。

罗斯福任内，还实现了反托拉斯的制度化，使得反托拉斯逐渐成为美国政府一项长久的政策。为了弄清楚哪些工商业应由政府管理以及如何进行管理，设立公司管理局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在国会内，有关改组商务劳工部、下设公司管理局的议案，遭到了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的强烈反对。在搞清楚阻力所在之后，罗斯福指控约翰·洛克菲勒是幕后的主谋，一时间群情激愤，舆论哗然。1903 年，法案得以较快地获得通过。改组后的商务劳工部下设公司管理局，全权调查企业活动，负责收集企业合并、托拉斯、垄断的有关材料以备司法部门起诉之需。同年，国会通过另一法令——“紧急处置法”。为确保反托拉斯诉讼的有效开展，法案规定增加司法部内反托拉斯局处理反托拉斯事务的律师人手及费用。反托拉斯局一开始拥有 5 名检察官，并在 5 年内可支配 50 万美元的拨款；1908—1935 年间，该局的年度拨款一直维持在 10—30 万美元之间。①

〔罗斯福反托拉斯政策的评价〕　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根植于他的思想体系——新国家主义。

首先，他看到了经济力量的集中是一种趋势，认为大公司是“现代工业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发展”，承认大企业的优越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认识到工业的发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和大有裨益的，因而认为要摧毁公司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破坏托拉斯的做法并非适合于大多数企业，大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并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工业领导地位。“公司的惟一的过错在于规模太大，但因此而将其解散是办不到的事，除非政府也废

① 哈罗德·福克纳：《自由放任主义的衰落，1897—1917 年》，哈珀和罗出版公司 1951 年，第 185 页。

除蒸气、电力、大城市”，需要的是“应该持续不断地由见多识广的内行来管理”，只有联邦政府才适合这一任务。[①]

罗斯福不认为工业分裂为小单位会解决问题，认为必须树立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威，以便利用反托拉斯法来对付垄断或公然的不正当行为。对于现代工业的合并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难题，罗斯福具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他信任内行的管理人员，怀疑公众偏激的情绪；赞同提高联邦政府的权威，以之促进公众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他不是与工商业为敌，认为公共利益不要求联邦政府对工商业进行惩罚，而是要由联邦政府对其实行内行的有效的管理，以防止以掠夺为目的的工商业的种种弊端，并鼓励有责任感的工商业发展其生产力。正是抱着这种理念，罗斯福开始实施他的管理战略。

其次，他注意到了经济活动中托拉斯的弊端和民众对它的不满和敌视情绪，因而主张采取相应的措施。随着大工业的兴起，私人权力大大膨胀并有超过政府权力的趋势。早在 1888 年，作家查尔斯·艾略特就在一篇文章中提醒世人，作为组织单位的大公司在规模和影响上都已远远超过了各级地方政府。例如：某一铁路公司在波士顿设立的办事处，共雇佣职员 1.8 万名，年收入 4000 万美元；而当地的马萨诸塞州政府机关，雇员不过 6000 人，年收入仅 700 万美元。[②] 相形之下，后者显得黯然失色。这种情况还是发生在企业合并远未达到高潮时期，进入 20 世纪以后，就连联邦政府也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例如，1901 年组建的拥有 10 亿美元资本的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集中的资本，就足够支付当时联邦政府所有部门两年的开支。有感于此，后来

---

① J.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 206 页。

② 伍德罗·威尔逊：《新自由》，纽约，1913 年，第 187—188 页。

的威尔逊总统曾在一次公开的演说中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这些人大到足以拥有整个美国政府，我想他们是会去拥有它的"。[①]罗斯福也有同样的忧虑，"当大企业使得很多典型的中产阶级公民感到经济上的威胁时，它们使他（指罗斯福）感到了政治上的威胁。罗斯福并非一个担忧被大企业挤压的小业主，也不是一个担忧涨价的消费者，他是一个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遇到强大对手的政治家"，对于罗斯福来说，"反托拉斯行动当然部分是作为一种满足公众要求政府有所作为的呼声的方式，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加之于工商业的威胁，以此来迫使企业界接受政府的调节。"[②]

在1901年12月递交给国会的国情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写道："巨大而高度复杂的工业发展……使我们面对……一些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工业变动已如此巨大地增强了人类的生产能力，那么（那些过去曾经有用的法律与习惯）就已经不再够用了。"[③] 言下之意，为了顺应时代变迁所提出的新要求，必须对传统的法律与习惯作适当的调整与改革。罗斯福的反托拉斯理念和实践表明，他的反托拉斯行动并非针对所有的大公司。他将托拉斯区分为"好"、"坏"两种类型，并强调"目的不在于废除公司……而仅仅是努力去消除其中的邪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管制与监督方法给公司带来好处"。他还强调：在反托拉斯中，"我们的分界线必须按行为而不是按财富来划分：我们反对某一公司，并非由于它规模之大，而是因为它行为不轨"，对于通过自然增长而获致的垄断，政府应予以监督，使之不致危害社会；对于人为攫取的垄断，则可诉诸反托拉斯法。

---

① S.D.凯什曼：《"巨头"时代的美国》，前引书，第63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222页。

③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第三，罗斯福的反托拉斯含有保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一面。他曾严厉指责那些鼓吹毁灭托拉斯的人，说他们是共和国的敌人；同样，他也谆谆告诫那些反对政府干预的资本家，最好采取合作的态度接受政府的管理，以免招致社会极端势力的侵害。他还强调，只有能保护公司免受不正当侵犯的人，才能受托反对公司的错误行为，从而维护公众利益。在 1908 年 1 月的致国会咨文中，罗斯福认为反托拉斯行动将不可避免地要损害某些企业的利益，但是，那些受到损害的企业正是从长远看来会给整个国家带来损害的企业。[①] 实际上，从长远看，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给企业界带来的并非损害而是利益。虽然国家干预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恢复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秩序，而是调整大公司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所限制的是只是一些企业主的"短视行为"，维护整个企业界的整体利益，缓和因垄断公司制出现而造成的社会紧张状况。罗斯福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职责是把"资本的主人从他们自身的愚蠢行为中解放出来"，与那些拼命企图维持现状的人相比，自己的做法更为"明智"[②] 也正因为此，被视为"托拉斯轰炸机"的罗斯福在 1904 年大选时仍然能够得到华尔街大佬们的慷慨解囊，其数额高达 500 万美元之巨。

总之，从罗斯福反对托拉斯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作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代表的他至少有以下几重考虑：第一，消除经济活动中的某些极端的邪恶现象，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第二，使大公司免遭"不正当的侵犯"，阻止摧毁托拉斯的"毁灭

---

① 杜威·格拉海姆：《西奥多·罗斯福》，前引书，第 57 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纽约 1979 年，第 218 页。

性力量发生作用”；第三，作为其当政时期各项政策的突破口；第四，借助反托拉斯诉讼向国会施压，促使国会加大立法力度，加快立法进程。

二、“公正施政”

20世纪初年的联邦政府在着力调整经济领域内的某些不适应时，也在社会领域内加强立法。调整劳工政策，缓和劳资冲突，加强保护劳工和保护公共利益的立法，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在1901年递交国会的第一个年度咨文中，罗斯福要求政府拥有的部门和企业率先垂范，制订出保护童工和女工的法令，使政府成为一个“好雇主”，对于全国性的劳资关系问题，则未加论述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但在后来的实践中，罗斯福政府逐渐形成比较明确的政策，其指导思想便是限制垄断资本流弊，改善下层人民处境，从而缓和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罗斯福本人将这一做法冠之为“公正施政”。

〔“公正施政”的推行〕　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政策变化，是针对劳工问题。与以往的政策不同，他试图采取仲裁而不是单纯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工人的罢工问题。

19世纪末年，美国政府在劳资关系问题上一向“机械地偏袒资方”。这种态度在1894年芝加哥的普尔曼工人罢工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芝加哥罢工发生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组织工人罢工的工会活动“阴谋阻碍贸易”，并援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发布罢工禁令。结果，联邦政府据此派出军队，凭借武力强行镇压了罢工。罢工失败后，一些工会领袖还以“蔑视法庭罪”被判监禁。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待劳工的政策就是以暴力镇压，而对引起罢工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及其表现，诸如恶劣的工作条件、过长

的劳动时间、过低的劳动报酬、伤亡事故的频繁发生、劳动保障的缺乏、普遍存在的大量雇佣童工女工等等现象，则视而不见，对有关这方面的抱怨则听而不闻。19世纪末年，在受雇于制造业和矿业中的工资收入者家庭，有1/3至一半的人极端贫困，全年收入不足以维持任何一种“舒适或过得去的状况”。[①] 世纪之交时，美国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成为美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在罗斯福看来，工人的联合和工会的兴起具有必然性，因而反对法院在劳资冲突中滥用禁令压制工人。1902年4月，罗斯福在一次演说时声称：“对劳工和资本来说，这都是一个大联合的时代。这些联合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它们都必须在法律之下活动，有关它们的法律则必须公正而明智，否则它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坏事来。”[②] 此后不久，罗斯福便面临着1894年普尔曼工人罢工以来又一次“工业战争”的严峻考验。

1902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工会，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增加10—20%的工资。卷入罢工者多达15万人。拥有煤矿的铁路公司不愿同矿工联合会进行谈判，并雇佣非工会会员从事生产，导致流血冲突，伤亡多达60余人。在冲突过程中，劳工的行为表现得有秩序有纪律，并愿意将纠纷提交仲裁，日益赢得公众的同情，但资方毫不妥协，只是一味地坚持要求政府派兵镇压罢工者，结果罢工一直持续至10月份。此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曾派遣民兵2000人前往矿区维持秩序，但无济于事。

随着燃料的缺乏以及严冬的迫近，公众对矿主的不满加剧。

---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45页。

② 转引自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43页。

同情工人的罗斯福对于缺煤情况焦虑不安，但对于介入争端犹豫不决，原因是这样做无先例可循，且直接涉及总统的宪法权限以及契约自由和财产权利等美国人的基本信条问题。10月初，在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罗斯福召集劳资双方领导人到白宫进行磋商。工会领袖约翰·米切尔再次提出将争端交付仲裁，但矿主方面执拗不从，反而要求总统颁布禁令，并于必要时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这种“傲慢的愚蠢”态度激怒了罗斯福，促使他决定动用军队去接管煤矿并组织煤炭生产。形势趋向紧张，有关方面加紧调解，在摩根本人的协助下，矿主接受了妥协的解决办法。经商定，劳资双方同意：矿工复工，由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仲裁。12月份，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委员会组成。罗斯福告诫委员会要秉公办事，“要努力在无烟煤矿区将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公正而永久的基础上，并尽可能地消除重新引起你们将要去解决的这些困难的原因。”[①] 经过前后近4个月的调查研究，调查委员会于翌年3月裁定：矿工工资提高10%，非工会工人与工会工人应得到平等待遇；矿主与矿工之间的所有争执均由一个6人委员会（双方各指派3名成员）协调解决，协调未果时由当地联邦巡回法院一名法官作最后仲裁。这个折衷性的裁决结果，得到矿主和矿工双方的认可，且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胜利。对此，《纽约论坛报》在3月22日评论道：委员会的报告“赋予这场争端的一方以胜利，但胜利的一方既不是工会，也不是矿主，而是第三方，那就是广大公众。公众的利益尽管常被劳资双方及其热心的斗士们所忽略了，但却

---

① 约瑟夫·毕肖普：《展现在其信件中的西奥多·罗斯福及其时代》，纽约1920年，第1卷第218页。

是永久的"。[①]

〔"公正施政"的评价〕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头一位召集劳资双方到白宫解决争端的总统，是头一位使双方都接受总统任命的委员会裁决的总统，也是以接管煤矿相威胁而迫使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的资本家就范的第一位总统。这一切与1894年普尔曼罢工期间联邦政府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罗斯福政府对1902年劳资纠纷的仲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开创了美国国家政权干预劳资关系的先例，使得联邦政府首次以公共权力机关的角色进入以往纯属私人契约的领域实施干预与调节。调查委员会根据罗斯福关于在公正而永久的基础上确立雇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思想，建立了调解劳资纠纷的长久机制，为其他企业处理劳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裁决比较公正地处理了工人和矿主间的纠纷，使得工人的意志首次得到重视，工人的要求部分地得到满足。这一划时代的变化，"不仅反映出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趋势，而且表明工人可以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争取自己的利益。"[②] 同时，仲裁的成功初步树立了罗斯福作为"强势总统"的形象，提高了他的政治威望，有助于推进在其他领域内的改革。

1904年大选期间，为了赢得工人的选票，罗斯福大肆渲染自己对无烟煤矿工人罢工的调解，标榜自己的政府不偏不倚，既不为富人，也不为穷人，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正派公民，自己所奉行的是一种"公正施政"。

实际上，罗斯福政府对劳工政策所作的调整，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自南北战争及其重建以来，美国两党间的政策差异越

---

① 约瑟夫·毕肖普：前引书，第218页。

② 参见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0—152页。

来越小，历届政府不管党派所属，均实行“亲企业”的政策。联邦政府日益投向企业界的怀抱，行政部门也多为亲企业界的人所掌握，结果，民众普遍认为政府成了有钱有势的工业家们的掌上玩物。罗斯福试图改变联邦政府的这种不光彩形象，让人们相信自己所主持的政府代表的是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囊中私物。正因为此，他反反复复地大谈特谈“公正施政”，强调说：“我在劳工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应当时时与我对资本家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考虑，而这两者都可概括为我所喜欢的一个公式：对每个人都实行公平施政。”[①]

另一方面，激烈的社会矛盾尤其劳资冲突推动了罗斯福政府在劳工政策问题上进行调整。19世纪末年，劳工对于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主张“纯工会主义”的劳工领袖认为，劳工运动的目的在于获得较好的工资报酬和适当的工时限制，其手段是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利用罢工作为最后的武器。比较激进的劳工活动家认为，只有一个更人道的社会秩序才能不断改善人的处境，因而主张广泛的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采取新的银行和货币体制，甚至对经济的主要部门实行政府所有。工会内的少数极端分子甚至要求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战争，通过战争消灭所有形式的权力，包括政府本身。社会主义作为一股激进力量也在世纪之交兴起，组建于1901年的美国社会党公开宣称，它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组成为政党”，以期“取得政府权力，并用以达到将现有私人占有生产和分配手段的制度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目的”，为此提出了一个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

---

①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3页。

会诸领域内的改革方案。[1] 劳工运动的发展和激进社会主义的兴起，对于"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震惊了统治阶级，直接推动了统治集团的变革。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人只有1%是工会会员，到1914年，工会会员占了工人总数的6%。1900—1904年间，工会会员就由86万多上升至200万。[2] 统治集团惊恐地将工会的成长和工人大规模罢工称作"劳工的大起义"。持续的罢工及其达到的暴力程度，也不断在一般公众心中激起种种忧虑。比这"更为可怕"的是经常谈及革命、宣称"通过被剥夺阶级的公开反叛来'解放人类'的左翼社会党人。1904年的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得到42万张选民票，对此，罗斯福惊呼：社会主义的成长"远比昔日任何平民主义运动或类似的运动可怕"。一年以后，他又说道："那些最富有者的愚蠢，他们的贪婪和傲慢，以及企业和政治中的腐败，已经趋向于在公众心目中造成一种极不健康的亢奋和愤怒状态，这一点从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猛烈增长中得到很好说明。"[3] 比较开明的联邦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在1906年强调说："应付目前社会主义的及烦扰不宁态势的惟一途径在于，着手处理并消除每种不公正的现象。"[4]

然而，调解也并非罗斯福政府处理劳资纠纷的惟一办法。对于不同情况下发生的不同罢工，罗斯福政府则采取不同的对策加以处置。针对1903年6月亚利桑那领地莫伦西矿工因反对该领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政党史》第1卷，纽约，1980年，第2490页。

② 小奥蒂斯·格拉海姆：《伟大的运动：美国的改革和战争，1900—1928》，前引书，第23页。

③ 雷·金吉尔：《过剩的时代：1877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纽约，1965年，第299页。

④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前引书，第43—44页。

地禁止地下矿井中超过8小时工作日的立法而掀起的罢工，罗斯福应邀派遣正规军前往，一举加以平息。1904年7月芝加哥屠宰业工人举行罢工时，罗斯福政府采取了观望立场。同年，科罗拉多的克里普尔—克里克发生罢工，州长请求罗斯福派兵弹压，罢工工人则要求总统派兵保护工人以使他们免遭州民兵的镇压，但罗斯福对双方的要求均置之不理。由此可见，罗斯福对待劳工方面并非一味地加以偏袒，对待企业主方面也并非执意地加以压制，总体而言，他是“林肯以后第一位能够比较理智、比较公正地对待工会的总统”。①

〔1904年选举〕　在前总统麦金莱遇刺的阴影笼罩之中，继任的罗斯福度过了他的第一任总统生涯。此间，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罗斯福总统轰轰烈烈地展开打击托拉斯的运动，打破常规利用政府的权威插手劳资纠纷，充分树立了作为“有为”总统的良好形象。他所取得的这些政绩，为争取下一届总统连任提供了政治资本。

对于一向高傲且富有强烈自尊心的罗斯福而言，1901年9月“踏着麦金莱的坟茔”而继任为美国总统毕竟是一件不够风光、让人悲哀的事情，他自己看重的则是在1904年大选时“以自己的名义”谋求总统职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继任总统后便刻意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势力：为了协调与共和党内党魁们的关系，他不惜压抑个性，刻意逢迎，前倨后恭；为了确保党内的提名，他对可能成为障碍物的共和党党魁马克·汉纳软硬兼施；为了能扩大共和党在传统的民主党势力范围——南部的影响，他借助官职任免来改变南部的政治力量构成，并打破常规，邀请黑人领袖、教育家布克·华盛顿到白宫做客并兼任官职任免工作顾

---

①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4页。

问；为了扩大政治影响，阐述自己的施政方针，他曾自东向西作横贯大陆的旅游，发表演说，笼络人心；为了争取普通选民的支持，他强调要废除特权，扩大个人机会，声称自己的“天然盟友是农民、小商人和高级技工”，即那些“德智体三方面都根本健全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为了博得企业界的欢心，他不得不故作亲近姿态；为了迎合保守派，他重弹关税和繁荣问题的老调。[①]

1904年6月23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致推举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是印第安纳州的现任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费尔班克斯，此人是一个82岁的富翁。两党的竞选活动也形成鲜明对比。罗斯福方面志在必得，不但有大公司大企业主们的钟情和慷慨资助，而且赢得了心存感激的劳工界对“公正施政”的回报；民主党方面则死气沉沉，直至败局已定时，总统候选人A·B·帕克才起而攻击罗斯福的竞选负责人乔治·科特柳从一些大公司得到竞选费用。帕克的指责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企业界确实为罗斯福的竞选出了大力，其中摩根捐献了15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捐献了12.5万美元。据1912年国会一个委员会的调查，1904年共和党的竞选费用中，大公司和企业主的捐款占了72.5%。

此次大选，共和党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罗斯福获得57.4%的普选票，帕克获得37.6%的普选票；罗斯福赢得选举人票336张，帕克仅获得140张。罗斯福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

① 参见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9—160页。

三、政府与企业

1905年3月4日，西奥多·罗斯福开始了总统生涯中的第二任期。与此同时，大量进步派人士通过选举进入市镇、各州乃至联邦的行政和立法部门，进步主义改革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罗斯福开始新的总统任期时，联邦政府以及各州的改革均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断深化。州级改革在中西部以及其他地区开展得轰轰烈烈，成效卓著；城市改革深入到"结构性的制度改革"阶段。改革思潮广为传播，改革理念深入人心，改革主张广泛张扬，标榜"进步派"成为时尚。所有这些，促使不久前凭借自身优势而获胜的罗斯福总统一反昔日的谨小慎微，思想上、行动上更趋激进和强硬，最终成为举国瞩目的进步主义"领袖"。

〔加强对铁路的管理〕　罗斯福第二任开始时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对铁路的管理。早在1904年12月，他就在递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内容涉及管理铁路、保护资源、劳工立法、节约政府开支、改进农业、反对腐败以及改善环境等等。其中，管理铁路位居首位。

铁路问题一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上下非常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于铁路运输中严重弊端的存在，早在19世纪70、80年代美国社会上便掀起一场要求政府管理铁路的运动。迫于压力，国会于1887年通过了第一个管理铁路的法案——州际贸易法。法案禁止铁路联营、歧视、运费折扣及短程收费高于远程等不正当行为，规定运费必须公平合理，铁路公司应公布运费表，并设立州际贸易委员会负责执行。但是，铁路公司对州际贸易委员会试图取消运费回扣加以抵制，联邦最高法院也在1896—1897年的几次判决中裁定州际贸易委员会无权确定铁

路运费，因而铁路经营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依然如故。19 世纪最后几年，铁路经营更趋混乱，剧烈的竞争不仅加重了一般货主的负担，而且也给铁路利益集团带来一定损失，运费回扣逐渐成为铁路公司的包袱。于是，铁路巨头、货主连同政府官员，共同寻求有效的联邦控制措施。

罗斯福一向反对铁路的国有化，认为不能用不明智的政策去危害铁路这一经济生活的命脉。他上任后递交的第一篇国情咨文声称：州际贸易法作为一项实验，尽管其目标是明智的，但规定却不恰当，因而必须加以修改。1903 年，在期望营造有序竞争环境的铁路公司经理们的要求下，国会通过了禁止运费回扣的"埃尔金斯法"。该法案同时还规定，任何偏离已公布运费的行为均属违法。然而，回扣之风禁而不止，各铁路公司随意变动运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在此情况下，亟需制定新的法律，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规定合理的、一视同仁的运费率，制止不公平的做法。中西部农场主和中小商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最为强烈，为了对立法施加影响，他们组建了"州际贸易法大会"，积极开展院外游说活动。一些铁路公司也逐渐认识到与单一的联邦权力机关（而不是众多的州委员会）打交道的可取之处，但总体上倾向于保守的司法部门而不是州际贸易委员会。绝大多数铁路公司、享有特权的货主以及保守经济理论的信徒则强烈反对联邦政府规定运费率，认为此举将意味着授权全国政府规定价格，而规定价格一向被视为私人企业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

罗斯福在 1904 年的大选后意识到铁路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新任期内首先应着力解决这个紧迫的问题。在他看来，自由放任主义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合乎道德的大公司行为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铁路公司的行为违反道德，那么，实施国家的干预和政府的管理就势在必行。在 1904 年度的国情咨文中，罗斯

福定下了管理铁路立法的基调，其基本点包含两项内容：其一，虽然不能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确定运价，但委员会应有权根据货主的申诉展开调查，在证实某一运价确系不合理之后，可以制定新的合理运价取而代之；其二，法院有权对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进行复审。为实现这一目标，罗斯福积极进行活动。1904 年和 1905 年间，他反复敦促国会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调整货主所不满意的运费率，国会随之展开了漫长的辩论。各派力量纷纷登场，围绕着管理铁路立法时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限、法院的作用、州际贸易委员会决定的生效时间以及法院禁令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大致说来，进步派主张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确定铁路运价，保守派倾向于法院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进步派主张将司法复审权局限于“程序”方面，保守派倾向于赋予法院“宽泛的”复审权，即法院有权对案件的事实作出重新解释；关于委员会决定的生效期限，进步派倾向于缩短，而保守派则力主延长，保守派还坚持赋予法院废止和取消委员会命令的权力，罗斯福代表的进步派则竭力反对法院拥有如此绝对的权力。[①]

1906 年 1 月，众议院通过艾奥瓦州国会众议员彼得·赫伯恩提出的铁路法案，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在货主申诉时降低既定运费。参议院内的保守势力对此议案横加阻挠，铁路公司还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宣传抵制运动。罗斯福针锋相对，发表了一系列激烈的演说予以还击，并大谈特谈关税改革，以之向参议院内的共和党保守派和企业界施压，迫其就范。5 月份，在罗斯福总统的活动下，一项折衷的修正案提出并获得通过。6 月份生效的“赫伯恩法”对“州际贸易法”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限，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可根据货主的申诉进行调查活动；废

①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 173 页。

除现行的不合理的运费率，另行规定新运费率，从而剥夺了铁路公司定价的最后控制权；铁路方面可就委员会的决定向法院上诉，倘若法院认可委员会的决定，铁路公司则必须执行。“赫伯恩法”还规定铁路公司实行统一的成本会计制度以消除核算上的舞弊，并要求铁路公司在规定的年限（1908年）以后放弃铁路以外的财产。

“赫伯恩法”大大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职权，摆脱了过去那种管理铁路时“只能诊断而不能开药方”的困境，建立起了联邦政府对铁路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其后几年，法令得到较好的实施。在最初的两年内，委员会就受理了31053起货主投诉案，而在1906年以前的18年中，总计受理的案件仅仅873起。此后，在拉福莱特等进步派的进一步推动下，铁路管理立法又取得新的突破。1910年在进步派努力下通过的“曼恩—埃尔金斯法”进一步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职能，授权贸易委员会中止铁路公司的普遍提价，并据其动议修改运价；规定设立贸易法庭以直接听取该委员会的控诉，规定电话、电报、电缆和无线电公司为运输业范畴。1913年又通过法令规定州际贸易委员会对铁路公司资产进行估价，并以之作为订定运价的基础。至此，联邦政府基本上确立了对铁路的比较全面、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1906年，国会还先后通过几项其他立法。一是“雇主责任法”，它要求从事州际贸易的所有雇主必须为因工伤亡的雇员及其家属提供补偿，但在实施过程中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二是“食品和药物卫生检验法”，此法早经众议院两度通过，但在参议院受阻，塞缪尔·亚当斯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专利药品的危害性，唤醒了社会舆论，加速了法案的最终通过，但最初20年间由于拨款不足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三是“联邦肉类检验法”，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1906年）对推动该法的颁

布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小说对芝加哥肉类加工行业极不卫生的生产过程作了详细的、生动的、有的甚至是令人恶心的描写，充分暴露了肉类加工业中令人吃惊的糟糕状况，引起广大消费者的严重关注。在舆论的推动下，罗斯福下令进行对肉类加工业进行专项调查，并最终促成此法的通过。同年，罗斯福还向国会提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改革问题的建议，如废除童工、制定有效的工人赔偿法等，但国会未予采纳。

〔政府与企业间的“协作”〕　历史学家在论述20世纪初年罗斯福政府的进步主义改革时，往往较多地、片面地强调政府与大企业的对立。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对待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问题上。实际上，如上文所述，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本意不在于摧毁托拉斯，而是借此树立政府的权威，迫使企业界接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和调节措施。逐渐地，垄断资本家也开始理解罗斯福政府的用心，甚至开始寻求政府的帮助，而罗斯福政府的政策表明政府的控制也并没有原来想像中的那样“可怕”。于是，政府与企业界、尤其是与大企业间逐渐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

1903年建立的公司调查局在政府与企业界的相互合作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些历史学家曾指责该局缺乏“独立性”，可实际上公司调查局从来就不是一个反托拉斯机构。该局首任局长加菲尔德曾几次强调该局收集的资料不会用于反托拉斯诉讼。[①] 当时美国政府建立公司调查局主要是为将来可能的立法做一些调查和取证工作，在具体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公司调查局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与企业界之间相互沟通和联络的桥梁。加菲尔德在工作报告中说，该局的政策是“与工商界合作而非对抗……

① 加布里尔·柯尔可：《保守主义的胜利》，纽约，1963年，第75页。

正直的商人无须有任何疑虑”。[①]

一般说来，大企业都愿意同公司调查局合作，以避免被送上反托拉斯诉讼的法庭。1904年罗斯福就曾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加里达成一项协议，加里保证：“如果在任何时候政府认为美国钢铁公司应该受到调查，你都将有机会检查我们的所有账本和记录，如果认为我们做错了，我们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加以改正。”[②] 同样，在公司调查局调查美孚石油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牛肉托拉斯等大企业时，这些垄断企业都愿意与之合作，提供所需资料，而公司调查局也保证为这些资料“保密”并不用于反托拉斯诉讼。当美国经济出现异常情况时，政府与企业界的合作还超出了公司调查局的范围。1907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亲赴纽约与摩根财团的银行家合作在各个银行之间融资以挽救证券市场，当摩根提出通过证券市场由美国钢铁公司购买由一些银行掌握的田纳西钢铁公司的股票，以使这些银行免于破产时，罗斯福默许了这笔交易，尽管这种做法明显地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③]

四、保护自然资源

研究罗斯福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乃至世界作出了一个最大贡献，那就是大力倡导和推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罗斯福执政期间，大力推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先后将美国各类土地2.35亿英亩收归国有（其中林地面积近1.5亿英亩），

---

① 加布里尔·柯尔可：《保守主义的胜利》，第77页。

② 加布里尔·柯尔可：《保守主义的胜利》，第79页。

③ 陈伟硕士论文：《论1901—1917年间美国政府的改革政策》，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

使国有森林数目由 41 个增至 149 个，创立了 51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立了包括自然和历史等方面的 18 个国家纪念地。在资源保护领域内，他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大力起用科学专家并采纳他们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以发展、持续、公平、效率为指导原则，以森林保护为中心环节，对水土、森林、牧场、矿产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全面保护，大力制止劫掠、浪费和破坏自然资源行径，提倡节制使用的长远的综合性的自然资源保护目标。罗斯福的这一理论和实践，为日后美国经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美国和世界的环境保护史开创了诸多先例，为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①]

〔*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　早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即有人开始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并为此展开活动，但主要局限于民间，且多系自发的、零星的活动，因此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和效果。20 世纪初期，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大力提倡和推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开始形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规模运动。

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在充分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环境的过分破坏之后所采取的一种补救和防范措施。长期以来，沉溺于“天定命运”论色彩之中的美国人自认为美国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肆无忌惮地对广阔的西部大陆进行着挥霍性的开发和攫取。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工业化掀起新浪潮，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浪费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度的森林砍伐、土地开垦和草原放牧，导致土壤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大量流失，旱涝灾害频仍，沃

---

① 孙港波：《西奥多·罗斯福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思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 9 届年会论文。

土良田变成荒野。根据罗斯福的好友、后来出任森林局长的森林专家吉福德·平肖的估计，按照1910年的开发速度，美国的林木资源不够30年之用，每年仅密西西比河冲走的沃土就达4亿吨之巨，约有100平方英亩的肥沃土地被毁。森林的砍伐减少了河道上游水库的蓄水能力，导致河道淤塞，水位下降，既影响通航又影响到农业灌溉。自然环境的恶化也给稀有动植物带来灭顶之灾，野生动物遭到肆无忌惮的捕杀，很多物种濒临灭绝。19世纪末年的美国人还以极端浪费的方式进行煤炭、铁矿、石油、天然气等矿藏资源的开采。平肖指出，由于不科学的采掘方法，煤炭的采掘率仅有一半，另一半煤或质量稍次的煤，只好重新埋入地下且永远无法开采；使用煤时则仅有5%的能量得到利用；石油、铁矿采掘时的浪费同样惊人。这样下去，美国的无烟煤仅够用50年，烟煤可用200年。为此，平肖呼吁全国民众关注这些问题，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①

罗斯福自幼热爱大自然，阅读过大量有关自然界的书籍，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接受过多门自然科学课程的正规教育和训练，并进行过大量的野外科学考察。1884—1886年间，他在达科他州当过两年的牧场主，一边经营牧场，一边从事野外狩猎、观察和研究动物，同时从事西部史研究。西部生活的经历不仅使罗斯福的感情更加接近于自然界，而且使他对西部干旱缺水、土地荒芜废弃、牧场主的疾苦等有了切身的了解和体会。这一经历以及个人爱好和思想认识，深刻影响了罗斯福对自然资源保护的看法。早在1887年，罗斯福就与自然科学家乔治·格林内尔一起建立了

---

① 吉福德·平肖：《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7页、123—124页。转引自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77—178页。

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并创办《森林与河流》杂志，倡导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罗斯福在任俱乐部主席期间（1888—1893 年），俱乐部为保护黄石国家公园、推动公园保护法的制定、建立国家动物园以及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就是由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所开创的。纽约州长任内，罗斯福同样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在向州议会提交的第一篇年度咨文中，他提出要严格执行保护森林、动物和鱼的法律，随后不久便调查和改组了州的渔业、森林和野生动物委员会。他还盛情邀请平肖到阿尔巴尼，听取其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意见。1900 年 1 月，罗斯福在第二篇州长年度咨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思想，论及的问题包括森林保护、森林火灾预防、洪水、河流污染、土壤流失和水利建设、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森林与水流的关系等等。这在美国各州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年 11 月，在“致全国水利大会的信”中，罗斯福又较全面地阐述了对全国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思想，提出了由联邦政府领导和资助发展美国西部的水利事业，修建水库，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改变联邦政府自然资源管理职权分散和效率低下的状况，实行专家管理等主张。到这时，罗斯福关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实行全面的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非常明晰。他在总统任内所推行的一系列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不过是这一思想和主张合乎逻辑的发展。

〔*罗斯福与自然资源的保护*〕　保护自然资源是罗斯福早就专注的一项事业。到罗斯福执政时期，这项事业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

1901 年 12 月，罗斯福在递交国会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用了将近 1/4 的篇幅阐述自己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和主张，为本届政府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定下了基调。第一任内，罗斯福采取的

主要行动是加强对西部贫瘠土地的开发。1900年以前，西部很多州广泛兴建灌溉工程，但其中绝大多数由于财政原因而告中断。来自内华达的国会参议员法兰西斯·G·纽兰兹提议联邦政府设立开垦局、建立专项基金来支持灌溉工程的修建。法案首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在众议院却引起激烈辩论。众议院“党魁”约瑟夫·坎农抵制该法案，罗斯福总统则为法案的最终通过提供了积极支持。1902年6月，“纽兰兹法”经罗斯福签署而生效。根据“纽兰兹法”的规定，组建了一个土地开发署，具体负责西部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管理，开发署的主要成员是各类工程师和专业人员，人数多达400之众。为了促进西部土地的开发，建立了开垦区，移居开垦区的人在定居5年并耕作一定面积的土地后，即可获得80英亩土地，每年向政府支付20—30美元灌溉费用，政府利用这笔钱再去兴建新的水利设施，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纽兰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到1920年，已经有约120万英亩的土地因此而得到开发。

罗斯福更重视的是森林资源的保护。在他看来，森林是整个自然资源良性循环的关键，水土的保持，环境的美化。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林木资源产业的发展，无不与森林息息相关。但现实情况是，所有资源中森林资源遭受的毁坏和威胁最为突出。从克利夫兰当政时起，联邦政府就已经收回成百万英亩的林地，开辟为国有森林保留地，禁止私人任意砍伐。到罗斯福上任时，国有森林保留地的面积已经达到4641万余英亩。然而，国有林地的管理存在严重弊端。管理权分属于农业部的森林局和内政部的土地总署，后者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但对森林保护既无兴趣又缺乏专业知识，结果根本无法实行集中的有效的管理，在罗斯福和森林局长平肖的艰苦努力下，国会最终同意将森林管理权划归农业部。平肖领导的森林局在罗斯福总统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发展

壮大，它的年拨款数由1899年的2.8万多美元剧增至1908年的357万多美元。它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不仅仅成为一个高效的管理机构，同时也是保护自然资源运动的信息中心和宣传部门。

罗斯福所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新的森林保留地。入主白宫的头一年，他就下令建立了15个森林保留地。此后迫于压力，直至1905年一直没有采取新的举动。国会内代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反对派利益的议员，利用立法武器，极力阻挠扩大森林保留地。1907年2月，该派势力在讨论一项关于农业部拨款的提案中附加上一条款，规定非经国会同意，不得在西部6州[1]开辟新的森林保留地。当时农业部急需经费，罗斯福必须签署这项议案，但在签署法令的前4天，他突击下令将7500万英亩的林地划归国有，此面积相当于迄今美国所有森林保留地面积的总和。至此，美国国有林地达150个，总面积达1.5亿英亩。与此同时，罗斯福和平肖极力主张国家的森林理念应该进一步扩展，这最终导致了1911年法案的通过。该法允许国家获得大面积的东部林区，森林保护由此扩展至整个大陆。此外，罗斯福还在矿产资源、野生动物、风景名胜的保护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下令将6500万英亩矿产资源划归国有，禁止私人开采；建立了53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禁止任何猎杀活动；改善了国家公园的管理，下令建造18处国家历史纪念地。

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掀起的同时，一种名为自然保留的运动也一度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自然保留运动最具戏剧性的领导人是约翰·穆尔。由于受到大卫·梭罗有关自然思想的影响，穆尔在约塞米蒂峡谷度过多年，并徒步穿越内华达山脉。他说，自然是一扇“开向苍穹的门户，

---

[1] 这6州是：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科罗拉多和怀俄明。

一面反射造物主的镜子”，必须作为疲惫的现代人类的一帖兴奋剂而加以保留。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在1890年取得一个重大胜利。是年，国会建立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专门保护这里优美的野生环境。1892年，他协助成立了旧金山山脉俱乐部，借以促进保留主张。一个时期内，穆尔和平肖是相互仰慕的盟友，然而两人的目标分歧颇大，一个赞成保留；一个主张有计划的利用。当羊群被许可在林地放牧时，穆尔对由此招致的花草破坏感到吃惊；平肖则认为这是对林地的明智利用，只要这种放牧适度即可，因为林地提供了必要的食物。19世纪90年代后期，两人针对应该采取何种原则来管理设立的新的森林保留地发生争论。1897年国会颁布“森林管理法”，此举表明平肖的主张赢得了胜利。

罗斯福虽然热爱荒野，但他非常赞成平肖的做法。强有力的管理，集中的规划，让资源结出硕果造福于人类社会，所有这些对于罗斯福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在罗斯福总统的鼓励下，平肖将森林服务从一个为木材商人提供信息的小办事处，改造成为一个由意志坚决的森林学家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努力保护森林资源以免其遭到毁灭性的过度利用的大军团。在此过程中，罗斯福还极大地拓展了资源保护的概念，使之适用于水力资源和矿产资源。1903年，他否决了一项允许私人在田纳西河的麻瑟尔滩建立水坝和电站的法案，主张由国家来承担这样重大的工程。当政期间，他将3500个水力基址保留为国家所有，他甚至促使平肖撤销了2500个内河水电站，声称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立守林站。1907年，罗斯福又在第7次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综合开发美国水资源的设想，以便将主要河流建成集发电、灌溉、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力体系。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实际上便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

罗斯福深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不是一代人、一个国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全人类永恒的一项事业。为此，必须唤醒全体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关注、参与这一事业。1908年5月，在他的倡议之下，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应邀与会的有44名州长、国会两院代表、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政府内阁成员、70名民间团体代表、专家学者以及4名公民代表。罗斯福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自然资源保护的意义，其中说道："让我们牢记，自然资源的保护……不过是而且是另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确保这个国家的安全与延续的国家效率和爱国义务问题。"[①] 同年12月，罗斯福又在白宫主持了第二次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在两次大会的推动下，各州相继成立了保护自然资源协会，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也于这年6月宣告成立。1909年2月，罗斯福总统还于离任前夕在白宫主持召开了北美保护自然资源大会，出席者包括加拿大、纽芬兰、墨西哥和美国的代表。罗斯福还计划发起召开自然资源保护国际会议，结果由于任期届满无果而终。

〔与"老卫士派"的分歧〕　1907—1908年间，罗斯福与共和党内"老卫士派"间的隔阂和分歧加深。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自然资源保护问题上，罗斯福所采取的保护自然资源政策，触犯了靠掠夺自然资源发财致富的西部利益集团。经营私有灌溉工程的人反对"纽兰兹法"；牧场主、矿业主、林木业主抗议政府实行森林和矿山的国有化；电力公司对罗斯福多次否决将水力基址赠予私人企业的法案心怀不满；在公共禁地内偷牧牛群和偷伐木材的人因为遭到政府起诉而怀恨在心。国会越来越采取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82页。

敌对态度。罗斯福任命的内河航道委员会提出控制河流和河水的建议，国会对此不予理睬。国会还拒绝提供经费出版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主张联邦政府资助农村学校、道路、农村电气化和农民合作社。

1907年秋季的金融恐慌及其后短暂经济萧条的出现，加剧了罗斯福与“老卫士派”之间的分歧。虽然这次经济衰退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生产设备的扩大超过了当时国家近期的消费能力，银行和货币制度的不健全，金融家毫无节制的投机活动等等，但是，保守的工商界却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罗斯福政府的经济政策。恐慌消逝后，罗斯福敦促国会采取行动，铲除美国金融体制的弊端，国会授权以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研究货币和银行政策并提出报告。与此同时，罗斯福谴责对金融恐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投机倒把、贪污腐化和舞弊欺诈”等行为。在1907年12月和1908年1月的两次国情咨文中，表示要进一步进行改革。其措施包括：所有州际企业改组为有限公司并由联邦政府加以管理；联邦政府对股票市场加以管理；限制反对劳工的禁令；对劳工争端进行强制性的调查；将8小时工作制法扩大至联邦政府雇员；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罗斯福还严厉批评工人赔偿法，认为该法违宪；谴责“来自掠夺的财富”，说有钱人干了不少蠢事，肆无忌惮地反对“工商业中每一项为了诚实而采取的措施”，还私下警告说，如果富人和不明是非的法官迫使工人的命运变得不堪忍受，那么，势必会爆发革命，若不改革，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①] 这些刺耳的话，加剧了保守派的不悦。

---

① J. 布卢姆等著：前引书，第215—216页。

五、塔夫脱主政：改革的停顿

〔1908 年的选举：塔夫脱上台〕　1908 年是四年一度的大选年。早在 1904 年，罗斯福就已经明确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并抵挡住了人们打算再度提名其为总统候选人的诱惑。实际上，罗斯福早已选好了自己的接班人，此人就是威廉·塔夫脱。

在罗斯福看来，塔夫脱是执行他既定方针的理想人选。塔夫脱来自共和党传统的势力范围——中西部的俄亥俄州，曾任联邦法官、菲律宾总督，罗斯福执政期间担任过四年的陆军部长，持有较为保守的进步主义观点，一向支持罗斯福的政策。他出身于老世家，受过东部教育，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博学多才，享有较好的个人声望。罗斯福的青睐以及共和党内的一致支持，使得塔夫脱轻而易举地获得党内的提名。

塔夫脱遇到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候选人威廉·J·布赖恩。1908 年，民主党人第三次挑选布赖恩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布赖恩声称自己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合法继承人。事实上，自从 1900 年总统选举以来，布赖恩的思想已远远超出自由银币问题。1905 年他曾出国作环球旅行，期间拜访了俄国社会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回到纽约时受到隆重欢迎，随即开始争取第三次总统候选人提名。布赖恩的偶像——托马斯·杰斐逊一向攻击财富具有天生的剥削性质，在这次竞选中，布赖恩的焦点是资本的力量。平民党人早已形成了猛烈攻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要求对公司进行广泛的控制甚至收归国有的传统。布赖恩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遗产，同时求助于他在欧洲所学到的新鲜知识。

总体而言，布赖恩呼吁一种所谓的“积极的自由”。他倡导公用事业的公共所有（即所谓“煤气和自来水社会主义”），要求

终止证券市场的投机，要求废除童工，制定严格的纯净食品和药物法案，改革金融体制，以便通货能够以产量收益为基础、而非简单地根据国库地下室内的黄金储存量来发行。由于公开地支持罗斯福，布赖恩开始赢得民主党内日渐壮大的进步派别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些人开始将民主党不信任强大政府的传统置于一边。为了赢得龚伯斯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不断斗争中的劳工运动的支持，在1908年选举中布赖恩要求法院不得像过去那样随意地发布反对工人罢工的禁令。布赖恩的进步主义还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主张众议院的民主化；强调直接预选和创制权、复决权；要求降低关税；要求建立银行存款保证金以便保护工人的积蓄；倡导对托拉斯进行控制；倡导直接选举参议员以便消除公司的操纵，甚至主张禁止公司捐献竞选资金。

长期以来，布赖恩将自己视为改革派的当然领袖，将自己看作罗斯福之后的“合法继承人”。实际上，除南部以外，其他地区占优势的态度都对他不利。他普遍地受到蔑视，被人看不起，那些受人尊敬的人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目空一切的家伙。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农村激进派。总之，布赖恩是一个受人蔑视的少数团体中的一员；他是南方的候选人，他所参加的三次总统竞选很少赢得南方以外州的支持。得意洋洋的共和党人北部和西部，以无可怀疑的优势操纵着这个国家。一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说：“南方被有效地置于美国政府管理方面的一切影响之外，就好像它是一个英国的皇家殖民地所应该的那样。”[1] 此外，布赖恩的基督教福音主义，他的关于人类之爱及和平主义的喋喋不休的说教，使其遭到世故的人们的嘲弄。他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学识的人、一个无知的人，一张滔滔不绝的说

① 罗伯特·凯利：《美国过去的塑造》，第2卷，第488页。

着话的嘴。他知道北方佬带着逗乐的鄙视对待他。因此在选举中他无视西部和南部之外的那些地区，除了北方的都市工人阶级。他坚信，自己是在替美国生活中的弱势者说话。

不出预料，本次选举布赖恩再次败北。塔夫脱以 52% 的普选票和 321 张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布赖恩赢得了 162 张选举人票。共和党人虽然连续第四次在总统选举中赢得胜利，但由老卫士派、中西部市民、城市进步派和西部农民运动派所组成的共和党“联盟”内部的不融洽和裂痕在不断增加。1906 年和 1908 年选举时，共和党人丢掉了众议院的一些议席，1908 年又有几个州长的职位输给了民主党。

〔谨小慎微的塔夫脱总统〕　1908 年赢得胜利的塔夫脱并不适合于做总统。他体态龙钟，行动迟缓，与充满生机活力的罗斯福恰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他在性格和信念上均属于保守派。他忠诚于有权者当政的信念，政治上优柔寡断，缺乏老到，不善手腕。他认为总统不应该干涉立法过程，不愿充分行使总统权力，惧怕行政权力的扩大会侵犯政府其他部门的传统权力。在他看来，法官是社会争端的适当仲裁人，他敌视工会，怀疑直接民主。

塔夫脱是在进步派急于采取行动之际就职的，上台之前他曾承诺要实现罗斯福的纲领，但上台之后却处处谨慎从事，不愿迈大步前进。这一点颇令进步派失望。不久，塔夫脱便处于共和党内“造反派”的敌对包围之中。这些抱成一团的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造反派”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北部地区，喜爱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做法，期望将改革运动进行下去。

塔夫脱并非对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历史发展大势毫无认识，他也认为必须变革，但内心的保守主义促使他不是特别喜欢变革。上台后他组建了一个保守的内阁，其中 5 名保守派是公司律

师。

进步派对塔夫脱的不满首先表现在关税问题上。在竞选过程中，塔夫脱曾表示希望适当降低关税，上台后他“履行诺言”召集国会特别会议着手这项工作。期望低关税的西部进步派指望塔夫脱承担起关税立法的领导重任，在促成关税的下调上有所作为，但塔夫脱根本不愿在此问题上施加自己的影响。结果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关税提案只是降低了某些关税，并拟征收1—5%的等级不一的遗产税。1909年，共和党“造反派”在参议院发动猛烈攻势，以便正在讨论中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能够削减关税。但保守派操纵的参议院删除了草案中关于征收遗产税的条款，并对众议院早先通过的提案作了800多处修改。进步派转而联合民主党人，竭力主张征收所得税。结果进步派与保守派达成妥协：同意对股份公司征收2%的公司所得税，同时保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便征收个人所得税合法化。此后，两院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对许多税率表作了适度修改，但大多数修订的税率有利于制造商，而不利于农民或消费者。最后通过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体现了关税保护主义者的胜利。共和党“造反派”认为塔夫脱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保持缄默从而事实上给予了关税保护主义者以支持。关税问题上的争论，疏远了中西部“造反派”议员及其选民与塔夫脱总统之间的关系。同年9月，塔夫脱多次发表演说，责备进步派投票反对他所认为的“共和党所曾制订的最好的关税法”。

〔*共和党的四分五裂*〕　国会内的共和党“造反派”。议员还试图通过限制议长的权力来改革众议院。20世纪初年，众议院议长约瑟夫·坎农延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沙皇”托马斯·里德所确立的体制，行使着专制的权力，独揽一切委员会的任命权，从而事实上控制了整个立法的过程。1910年，国会重新开

会。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乔治·诺里斯领导下，共和党人“造反派”联合民主党人通过决议，剥夺了坎农对众议院程序委员会的控制，将议长的不少权力转移给众议院程序委员会，从此，委员会的任命由全体议员作为一个整体、通常通过政党核心集团来实现。这一变化显然是进步的，诺里斯说：“我们希望众议院代表人民，每个成员的想法都能够得以体现和表达。”①

随后，共和党人“造反派”又抛弃所谓的“党派忠诚”，与民主党人联手修改了塔夫脱总统提出的铁路议案。该议案包括三项内容：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自行决定税率；设立拥有广泛权力可以复审州际贸易委员会决定的商务法庭（此条意味着一向保守的司法部门享有决定性的否决权）；准许铁路公司取得竞争性线路。进步派团结民主党人支持第一项内容，抨击其他两项，并成功地取消了第三项。同时将电话和电报公司也纳入州际贸易委员会管辖的范畴，并规定将铁路资产的实产估价作为决定公平合理的运费率的根据。后来，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与民主党人达成交易，以同意接纳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加入联邦为条件，换取民主党人同意撤销关于实产估价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曼恩—埃尔金斯法”（1910年），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中止铁路公司的普遍提价，并据其动议修改运价；规定设立贸易法庭以直接听取该委员会的控诉，规定电话、电报、电缆和无线电公司为运输业范畴。这些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职能，使得联邦政府对铁路的管理在罗斯福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进步派与保守派在铁路管理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使得共和党“造反派”与塔夫脱的隔阂加深。针对共和党“造反派”的不满与反抗，塔夫脱采取报复手段，拒绝任命他们担任公职，并试图在1910年中期选举

① 约翰·格拉蒂：《1865年以来的美利民族》，第236页。

中击败他们。

在资源保护问题上，塔夫脱也同样表现出保守的立场。他所任命的内政部长理查德·巴林杰是全国有名的敌视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分子。在塔夫脱的同意下，巴林杰将几百万英亩公地和许多有价值的水力基址出售给私人公司，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前总统罗斯福所信赖的好友平肖早已安排停止出售的。此时平肖仍任森林局长，在得知巴林杰帮助摩根和戴维·古根海姆共同控制的辛迪加购买了阿拉斯加的一处国有煤田之后，便将此事提请塔夫脱处理。结果没有料到塔夫脱处处为巴林杰开脱，平肖为此忿忿不平。随后不久。杂志上出现了两篇攻击巴林杰的文章，平肖虽不是文章的执笔人但提供了其中的某些材料。塔夫脱气愤之下解除了平肖的职务。塔夫脱此举，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大利益集团"又恢复了控制，同时也使得刚从非洲丛林狩猎归来的前总统罗斯福深为不悦。塔夫脱的外交政策也加深了党内的不和。1911年初，塔夫脱提交国会的美加互惠协定将一些工业品和不少农产品列为免税货物，引起西部进步派和关税保护主义者的不满，结果遭到否定。塔夫脱与法国和英国议订仲裁条约也遭到罗斯福的批评与反对。

共和党人内部的不和与倾轧，最终酿成了1910年中期选举时的惨败苦果。这次改选，共和党丢掉了纽约和新泽西等几个州州长的职位；民主党人在东部战胜了老卫士派；进步派共和党人在西部获胜。这一结果表明，塔夫脱已遭到党内及其广大选民的遗弃。同时，民主党人自1882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这一形势，更令塔夫脱处境艰难。

然而，塔夫脱也并非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改革倾向。巴林杰的目标是要联邦政府将公共土地转让给各州，对此塔夫脱断然予以拒绝；他甚至还考虑进一步扩大森林保护

区。加强铁路管理的"曼恩—埃尔金斯法"也是在他的敦促之下通过的。在"美国制度结构方面发生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上，塔夫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促成了后来成为宪法第16条修正案的所得税立法。塔夫脱还是一个坚定的托拉斯打击者，任内被起诉的公司达65家，数量上超过罗斯福当政时期起诉的44个。

〔罗斯福与塔夫脱分道扬镳〕　塔夫脱执政后期，思想上日趋保守。在他看来，共和党内的进步党人"造反派"正在危及国家。他和他的"老大党"追随者坚定地相信，总体上不能依靠人民来提供有效的管理，当进步派呼吁要进一步促进政府的民主化时，塔夫脱退缩了。对于像他这样的保守共和党人而言，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听起来就像是危险的社会主义。他们担心，改革这样推进下去将会导致社会政策的制定权落入那些嫉妒富人的穷人手中。尤其是在进步派开始呼吁人民有权取消司法判决之后，保守共和党人震惊了。特别看重法律秩序的塔夫脱（后来他于1921—1930年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惊讶于这类看法，公开声称它们将摧毁自由和秩序，将使所有事情受到变化莫测的民意的左右。

对于塔夫脱的言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颇有几分失望。1910年8月，在堪萨斯州的奥萨瓦托密，罗斯福呼吁在美国建立一种基于真正的社会正义之上的新社会秩序，从而戏剧性的重新进入全国政治的视野。罗斯福声称，这种新社会秩序可以借助一种"新国家主义"来实现，人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个"与利益集团作战"的更大的、更强有力的政府，总统实际上是"公共福利的管家"。其后不久，罗斯福对塔夫脱的不满加剧。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败北，资源保护问题上的分歧，外交上的举措，都令他深感不安。塔夫脱的反托拉斯政策也激怒了罗斯福。1911年最高法院在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的案件时，发现这

两家公司是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垄断组织，但法院的判决认为这一垄断是“合理的”，而只有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才是非法的。塔夫脱对这一“合理原则”表示满意，罗斯福则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判断应建立在对经济效率和商业行为有所考虑的基础之上。塔夫脱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也招致了罗斯福的不满。诉讼过程中，国会听证会公布了1907年经济危机期间罗斯福同摩根谈判的有关内容（详见前文），颇让罗斯福难堪；而诉讼的结果（宣布美国钢铁公司无罪）更令罗斯福有理由认为塔夫脱的起诉主要是与他为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如果美国人民再次需要他，他将出面竞选总统。1912年2月，他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与此同时，塔夫脱也主张，对复决权和罢免权的一味坚持和支持，极大地威胁了国家的健康和稳定。

为了争夺共和党内的提名，两人展开了恶战，甚至不惜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进步派的老斗士拉福莱特也参加竞选，但以前支持他的人大都转向了罗斯福。受全国委员会操纵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提名塔夫脱为总统候选人。罗斯福派愤而脱离共和党，成立新党——进步党（亦称“雄麋党”）。同年8月，进步党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者有社会工作者、女权主义者、知识分子、被罗斯福个人品格和纲领所吸引的工业家以及对派系不再着迷的共和党政客，大会一致提名罗斯福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塔夫脱的支持者总体上赞成维护社会现状，反对变革，但其中也有某些人具有进步派思想，只是这些人不愿脱离本党。“雄麋党”的竞选纲领“堪称为一个为当时以及后世而制定的进步派改革宪章”，主张总统预选、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国会参议员普选；强调保护人类和自然资源、妇女最低工资、限制使用童工、工人补偿法、社会保险、联邦所得税、限制在劳工

争端中使用禁令；要求设立由专家组成的联邦委员会负责调整关税和管理州际工商业；主张社会正义和由人民治理国家，主张在处理公共问题时讲究效率。这一目标，吸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工商界人士。

共和党在1912年大选时的分裂，为在野党民主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继续推行进步主义改革还是中断改革？人们翘首以待。

第六章

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改革的高潮

在经过塔夫脱时期的“退却”之后，进步主义改革在威尔逊入主白宫之后进入鼎盛时期。

作为学者出身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颇具眼光和见识，这一点使得他上台后能够审时度势地团结党内外一切进步派人士，积极主动地担负起改革的领导重任。执政时期，威尔逊凭借自己作为行政首脑的独特地位、影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驾驭了国会立法的方向和进程，并在很多场合推动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建树，有所突破。针对举国关注的托拉斯和其他大公司大企业经济力量的集中问题，威尔逊进一步完善了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促成国会制订了“克莱顿法”。与此同时，国会立法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并赋予较大职能，此举标志着联邦政府对公司企业开始实行全面的管理与监督，在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关税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弊端，威尔逊大力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促成了“安德伍德关税法”的通过并在任内开征累进所得税。针对货币金融方面的混乱和巨大缺陷，他成功地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体制——联邦储备体制。在童工立法、工时立法等领

域，威尔逊政府也有所作为。威尔逊的这一施政纲领，总称“新自由”。

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改革成就主要是在第一任内取得的。到1917年，“新自由”的立法目标基本完成，进步派历年来所倡导的各种各样改革主张也已初步实现。威尔逊的第二任开始后，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转向外交领域，随着美国的宣战和参战，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和全部工作的重心。在此情形下，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告一段落。

一、威尔逊与“新自由”

民主党总统威尔逊上台后，抛出了不同于共和党人的施政纲领——“新自由”。在经济运行问题上，威尔逊认识到托拉斯和大公司出现的必然性，但比较多地强调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托拉斯问题上，威尔逊主张加强管理和监督，但更多地强调恢复个人的经济机会；在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威尔逊看到了大企业的优势所在，但比较多地倾向小企业，强调为它们提供机会；在政府职能问题上，威尔逊认识到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干预的必要性，但比较多地信赖小政府，反对权力的过分扩大和集中。这些便是“新自由”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自由”与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所主张的“新国家主义”本质上并非截然对立，只不过两者分别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实施过程中，威尔逊“新自由”的某些主张及时地得到修正，执掌白宫后期，“新自由”实际上被“新国家主义”所取代。

〔*1912年选举：改革派的胜利*〕　1912年是选举年，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威廉·塔夫脱和西奥多·罗斯福竞争候选人提名，互不相让，最后分道扬镳，前者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总

统竞选，后者则另立第三党——进步党参加角逐。共和党的分裂为民主党提供了有利时机，民主党人决心从共和党人手中夺回长达 16 年无缘问津的总统宝座。在 1912 年 7 月召开的巴尔的摩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精神世界保守、但却有进步名声”的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在第 43 轮投票时赢得多数票，在第 46 轮投票时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1912 年的竞选基本上是在民主党和进步党之间展开。两党的竞选纲领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重大分歧：民主党人要求大幅度降低关税，进步党人则赞同保护性关税；民主党人强调州权，进步党人则要求建立强有力的联邦管理机构。民主党人虽没有详细地提出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但主张限制使用反对工会的禁令，从而确保了“劳联”对民主党的支持。民主党还承诺降低农业贷款的利息，使农民更容易得到贷款，引起农民的好感。

两党候选人对于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态度，也明显折射出两党的分歧。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强调经济上的合并不可避免以及由此带来的益处，对大企业持欢迎态度，但要求由强大的联邦政府对大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并促进非工商业集团的福利，主张制订积极全面的联邦计划来推进国家利益和社会改革。这些观点，早已在政治理论家赫伯特·克罗利的著作《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 年）一书中得到有力阐发，西奥多·罗斯福只是现成地加以利用。威尔逊的看法有所不同。作为虔诚的长老教会信徒，他认为社会上的个体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上帝负责”，工商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过错也只是个人的过错；坚信只要国家保护和鼓励竞争，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原则将会发挥作用，认为“国家应像赛跑中规定有利和不利条件的人员那样，决心使赛跑者在起跑时就享有公平的条件，也应像警察那样，决心使赛跑者

不乱抢跑道。"[1] 同时，威尔逊也憎恨政治领域和工商界的腐败现象，信仰人民民主，主张制订规章防止工业弊端。

威尔逊提出的竞选口号是"新自由"，其内涵是反对垄断，恢复自由竞争，为中小企业创造竞争条件。他说，罗斯福的设想，将导致"政府同托拉斯结成伙伴"；而民主党的计划，则会保证一种自由的经济，并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他断言，"自由的人不需要保护人"，因为自由人如惟保护人之命是从，就不可能保持自由。威尔逊要求先实行"有节制的竞争"，而不是"有节制的垄断"，担心个人正在被庞大组织所"吞噬"，并谴责那种他认为是"异乎寻常、十分有害的工商业集中"，要求制订"大批法律来照顾那些流血流汗想在辛勤努力的世界上谋得立足之地的人们"。

威尔逊的这一纲领，罗斯福斥之为"农村保守主义"。然而，正是这个"保守的""新自由"纲领，重新燃起了美国农场主阶层、小城镇居民和广大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希望之光，受到中小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结果，威尔逊不仅保住了民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南部，而且赢得了中西部农民、小城镇居民以及城市少数民族集团的拥护。本次大选，威尔逊获得42.5%的普选票和435张选举人票，独占鳌头；罗斯福获得27.8%的普选票和88张选举人票，位居其次；塔夫脱获得23.6%的普选票和8张选举人票，位列第三；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获得近90万张选票。就普选票而言，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的总和超过了威尔逊，如果共和党不发生分裂而共举一位候选人的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尔逊问鼎白宫的前景将要渺茫得多。在职总统塔夫脱的惨败，表明美国民众鄙弃了固执保守的政府，渴望建立积极进取的

---

① 布卢姆等著：前引书，第239页。

新政府。本次大选，民主党人不仅夺回了久违的白宫，而且在国会两院同时获得胜利，因而堪称“一次改革派的胜利”。

〔白宫新主——威尔逊〕　1913年3月初，当选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前往首都华盛顿就职。刚下火车，他就受到一群兴高采烈的“普林斯顿人”[①] 的簇拥。与此同时，大量人群聚集在国会广场上，等待着聆听威尔逊的就职演说。华盛顿的居民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被威尔逊这个不同寻常的人强烈吸引着：白宫新主威尔逊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之后白宫主人中的第一位知识分子；与两位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新总统也是出生于南方，在弗吉尼亚长大。随着南方人最终返回白宫，南方的力量和影响同时进入内阁、新总统的顾问圈、派驻国外的外交部门和国会当中。20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在国会两院同时拥有多数，南方人不仅占据了主要的高层职务，而且控制了国会中的各主要委员会。

新总统威尔逊是美国著名的学者总统和教育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博士头衔的白宫主人。他于1856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城一个英国移民家庭，祖籍爱尔兰，父亲是长老教会牧师，童年在严肃的宗教气氛中度过。1872年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的戴维森学院，1875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期间曾在《国际评论》杂志上发表有关美国国会委员会体制的文章，毕业后至弗吉尼亚大学修读法律，1882年在亚特兰大当过一年律师，随后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继续深造。188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国会制政府》，批评美国行政机构的软弱无能和国会的缺乏效率，赞美英国的议会制度。翌年获博士学位。1886年，威尔逊开始了教学生涯，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女子学院、康

① 指曾经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或就职的学生。

涅狄格州的韦斯利安大学执教，90年代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教授。1902—1910年，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任内倡导并推行改革，所提倡的导师制树立了启发性讨论的学风，获得社会好评，并为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所仿效，20年代以后美国普遍推行。他关于大学生活区的设想，也颇具超前意识，成为日后欧美大学校园中极为普遍的一种形式。作为教育改革家，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一系列举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赢得全国性的关注，被誉为“教育界的民主斗士”。作为一个学者，他一生留下许多著述，1902年出版的5卷本《美国人民史》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1910年，由于建立研究生院的计划受阻，威尔逊辞去校长之职并离开普林斯顿。在民主党新泽西州党魁的支持下，他出面竞选新泽西州州长并当选。任内两年，针对教育体制、公职、选举程序、竞选费用筹措、公用事业经营以及市政管理等问题，推行全面改革，并对党魁干预政府予以抵制，建立了创制和复决制度。由于这些非凡表现，他赢得了“进步主义政治家”的名声。1912年大选来临之际，民主党人“带着感激和钦佩”将他推向全国政治舞台，结果不负众望，一举获得成功。

外表上，威尔逊显得有些严肃。他身体挺拔，举止端庄，瘦长的身材和整洁的外观，与臃肿的前总统塔夫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具有很强的思想力量，信仰道德的力量和正义的力量，同时渴求权力和权威。他那充满激情的品性和所拥有的渊博知识，使得他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所要阐发的主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他的学生常常爆发出阵阵掌声。西奥多·罗斯福曾说白宫是一个“暴徒的讲坛”，然而对于威尔逊而言，总统职务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职责。他坚信，上帝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使命而挑选上他的。

〔威尔逊的政治学："新自由"与强势总统〕　威尔逊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党人，也是一个深受欧美自由民主传统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深受英国的自由主义领袖威廉·格拉斯顿的影响，在他看来，格拉斯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普林斯顿求学时，他就将英国公共生活视为典范。他是一个坚定的、教条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者，坚实货币和金本位的笃信支持者，政治腐败的不屈服的反对者，也是一个相信强有力的管理是国家富强不可缺少的手段的政治科学家。此外，他的想像力丰富，能够紧紧抓住人的心灵。历史之所以让他着迷，是因为历史再现了无畏的人们持之以恒地、充满勇气地追求至上理想的心路历程。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党人，而是一个赤诚的民主党人。威尔逊这种个性的形成，与其强烈的宗教信念有很大关联。如同克利夫兰总统一样，他也是一个长老教徒，强调职责、强有力的管理、道德原则以及法律和秩序的最高需要。在威尔逊看来，上帝在人世间体现其意图，人的职责便是充当其代理人。这样一种信念，势必使得人们思想上趋向教条而保守，但也有可能催人奋进，因为长老教徒心目中的上帝——严厉的耶和华同样对人类生活中的恶行和腐败愤怒不已。当威尔逊像他之前的克利夫兰一样被这种恶行和腐败所激怒时，他也就成了被鼓动起来的改革家。

威尔逊一生追求权力，当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宝座之后，如何行使这一权力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还在1912年竞选期间，威尔逊就周游美国各地，发表一连串演说，提出了不同于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新纲领——"新自由"。他说，近些年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占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就是大公司。这种非人的、不道德的大公司已经建立了一种强大的阴谋网络，使得它们得以剥削整个国家。它们躲藏在保护性关税的

背后，竭力主张它们的所有事务都应该秘密的进行，大公司贿赂政府为它们提供种种特权——施与和土地赠与，提供水电基址和司法上的豁免，乃至法庭发布禁令镇压劳工罢工。

威尔逊说，共和党人政府只听从那些经营着大银行、大工业公司和铁路的人的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奉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国家应该由富人和强者来执掌，因为这些人最明了什么是最好的。威尔逊强调说，这种看法极其荒诞，因为它违背了自主性和普通人的常识。“由受托人进行管理”的哲学应予彻底摈弃，人民应被允许重新接管他们的政府。特殊利益的代表，绝对不可能懂得普遍利益。

威尔逊说，关税是滋生托拉斯和垄断的怪物。剥去这层保护，美国经济将日趋增长和多样化。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对托拉斯发动直接的进攻。威尔逊坚信，像罗斯福那样视托拉斯为不可避免之物，是错误的；由此简单化地要求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对其进行管理，也是错误的。这样做将意味着“由受托人进行管理”的延续。因为有权势的银行家将与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私下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公众则只能伫立一旁等待。“新自由”将加强反托拉斯立法，以便打破现存的各种企业联合；将改造货币托拉斯，以便清除其对信用的扼制；特别是将会使得托拉斯不公平地毁灭竞争的那些行为方式成为非法之举。总之，美国必须经历一次个人主义的新复兴；人民的生机活力必须获得解放。

作为一个传统的民主党人，威尔逊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应该保持开放、活力和公平，以便小人物能够有所发展。而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呼吁，政府不仅要对托拉斯加以管理，而且要给社会上的弱者比如劳工、妇女、儿童和失业者，提供直接的帮助。恪守南方民主党人传统的威尔逊，对大政府持不信任态度，

反对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经济进行直接的和积极的干预，强调说，如果机会公开的话，就没有人真的需要帮助。

威尔逊还决定确立一种新型的总统政治。长期以来，他认为美国总统应该是英国首相式的人物，不应该只是消极地坐在白宫里，等待着实施国会通过的法案，而应该积极地、主动地指导国会内本党党员的活动，推动立法工作的开展。因此，威尔逊通向国会大厦的电话总是忙个不停；党的领袖人物频繁地出入白宫与其进行紧急磋商；至于他亲笔手书的、捎给国会议员们的带有讨好性的、哄骗性的乃至威胁性的便条，更是源源不断。[①] 这种做法（即强有力的总统领导）是典型的民主党人执政的传统。共和党方面，只有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政首脑，促使国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立法，扮演了“人民领袖”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罗斯福失去了共和党正统派的支持，最终不得不与自己的党决裂。然而，在民主党方面，强势总统的例子比比皆是，向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格罗夫·克利夫兰、詹姆斯·波尔克乃至安德鲁·杰克逊。

威尔逊把自己视为英国式的党魁，要求国会内民主党人遵循党的纲领，必要时则越过他们直接诉诸选民。就职后，他团结党内外各派力量，推动立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二、关税政策和银行改革

关税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是整个进步主义时代美国联邦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威尔逊执政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98页。

〔关税改革：安德伍德—西蒙斯法〕　　自从南北战争后的“重建”以来，美国各届联邦政府基本上奉行保护关税的原则。高额保护关税制刺激了大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克利夫兰和塔夫脱当政时期，应舆论要求曾经力促国会降低关税，然均未能如愿。威尔逊入主白宫后，将关税改革视为一项主要目标。

在就职演说中，威尔逊指出，关税制度“违反了公正的征税原则，并使政府成为私人权益集团手中的顺从工具”。[①] 为履行竞选期间许下的诺言，就职后他立即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讨论修订关税问题。在4月份召集的国会特别会议上，他递交的关税改革咨文指责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特权，不利于竞争，其中说道：“我们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建立起一套特权和免除竞争的权利，在这种特权和权利的后面，可以很容易地用任何联合方式，哪怕是粗糙的联合方式来组织垄断公司；直到最后在我们这个大企业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事情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事情能经得起效率与节约的考验……只有新的行动原则才能使我们不致遭受垄断公司最后的吞噬，不致完全失掉那些增进人们的进取心并使人们保护独立能力的因素。”[②] 然而，威尔逊对于关税问题有比这更全面的理解。他并非彻底否定关税制度，认为保护关税是必要的，但其作用应该是保护那些“国内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工业”。[③] 在1913年4月的关税改革咨文中，威尔逊也并未认为关税制度毫无必要，相反只是认为它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他看来，关税改革应该提到“刺激美国人运用其才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商

① 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历任总统就职演说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英文部分第201页。

②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184页。

③ 索尔·帕丹佛：《威尔逊的理想》，华盛顿特区1942年，第62页。

人进行竞争”的作用。[1] 在1916年的一次演说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关税改革的目的是“把美国商人的精力引向世界市场”。[2] 这种观点，成为他推动关税改革的真正动因。

同托拉斯问题一样，关税问题也存在着政治上的敏感性。在许多人看来，正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高额保护关税制度刺激了垄断组织的发展，因此视关税为“托拉斯之母”。20世纪初年，很多人还将关税保护制度与个人收入无需纳税两者并列，称之为“工业和银行界联合控制联邦政府的象征”。[3] 应该说，关税保护对于确保美国民族工业经济的发展曾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物极必反，长期的过度的关税保护，最终只会束缚民族经济尤其工业发展的手脚，使其由于远离市场竞争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高额保护关税也使得美国的对外贸易相对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高额关税壁垒换来的是他国的报复。虽然世界之交的美国联邦政府同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签订了多项互惠协定，但都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威尔逊上台后，充分认识到关税改革的紧迫性，也意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他推行关税改革的步伐显得既迅速又稳妥。还在国会召开前，他就积极活动，并且取得良好效果。国会开幕后，他打破常规，亲往国会发表演说，成为自约翰·亚当斯以来出现在国会的第一位总统。威尔逊在关税改革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及其领导作用，对于促成法案的通过至关重要。这与前任总统塔夫脱在类似问题上的“无为”立场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

① 约翰·布莱曼：《威尔逊》，新泽西，1972年，第48页。
② 布莱曼：前引书，第53页。
③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116页。

面对关税改革问题上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威尔逊总统自始至终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当民主党的领袖们提出一份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但维持农产品的高额关税的草案时，威尔逊立即加以否定，并责成安德伍德参议员重新起草，并指示将食品、蔗糖、皮革、羊毛和棉花等农产品也列入免税商品之列。一个月之后，众议院通过议案：平均税率降低11%左右；一大批消费品增列为免税物品；取消对托拉斯生产的钢铁和其他多种产品实行的保护办法；征收适量的累进所得税以弥补税收的损失[①]。

议案提交参议院后，立即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仅拥有3席的优势，且来自蔗糖和羊毛生产州的本党参议员对议案将这两样产品列为免税物品持有异议。此外，赞成保护贸易制度的院外活动分子趁机大肆活动。针对这种形势，威尔逊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对来自农业州的本党参议员施压；另一方面诉诸公众舆论，发表声明号召舆论界“制止并摧毁狡黠阴险”的院外活动分子所带来的“无法容忍的负担”，结果促成对所有参议员的私人财产进行调查。此举产生了显著效果，议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民主党参议员除两人外都投了赞成票。

最终通过的“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降低了900多种货物的关税，提高了36种，307种税率未变，总的平均税率下降了11%。[②] 新税法提高了美国没有或者不能生产的商品的税率，而“所有能够证明美国产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商品的进口关税却被削减了”。[③] 托拉斯企业生产的钢、铁、农业机器等被列入免税单内，非托拉斯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某些农产

---

① 两个月前批准的宪法第16条修正案已使征收累进所得税合法化。

②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38页。

③ 杜蒙特：前引书，第186页。

品（如棉花和羊毛）、服装和食品亦位居免税之列。为弥补关税收入缩减部分，拟开征个人所得税。在各政党内进步派的共同努力下，法案将个人收入超额累进所得税的最高额提高了1倍。1913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生效，规定对超过一定收入者征收1—6%的累进所得税。

新关税法设定的平均税率为29%，较之原税率降低了约10%，使得关税低于此前长期执政的共和党人时期制定的水准，并且创下了自内战爆发之前迄今一个漫长时期内的历史新低。法案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一般阶层的利益，将部分负担转嫁给那些有能力承担的人，从而改变了联邦的税收结构。对垄断公司和垄断资本家而言，新税法是一个较大的打击，因为垄断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均属于免税名单之列，且其高额的个人收入必须按照相对说来较高的税率纳税。然而，这次关税改革，无论是从主要推动者威尔逊总统的动机来看，还是从整个立法过程抑或改革的最终结果来看，它都不是一次反对所谓企业特权的斗争，而是一次“使美国工业与欧洲制造商展开真正竞争的尝试”，[①] 为使美国商品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所作的准备，总体上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华盛顿的《星期六邮报》评论说：“整个关税改革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在美国，每一个了解我们国家情况的人都会理解关税改革的必要性……其主要的问题只不过涉及方式方法以及所愿意削减的数量而已。”[②]

“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是威尔逊“新自由”纲领的三大基石之一。它的颁布，实现了威尔逊“新自由”目标的第一步，也充分体现了威尔逊的行政领导才能。

---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144页。

② 布莱曼：前引书，第108页。

〔银行改革：联邦储备法〕　1913年夏秋，威尔逊促使国会着手处理另一棘手的难题——银行体制的改革。

货币问题也一直是19世纪下半叶争论不休的对象，绿背纸币和本位之争曾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没有建立起稳固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混乱由来已久。20世纪初，独立银行有3万多家。[1] 这些独立银行互相倾轧，操纵了国计民生。金融是经济的心脏，但在这方面，私人的控制却不受抑制，为所欲为。在确定诸如货币流通量、贴现率、银行设立于何处以及银行应与企业公司间保持什么样的联系之类的关键问题时，没有任何公共机构有任何发言权。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一直对东部的金融家集团不满。西部农场主抱怨说，所有的钱都存放在东部银行里，结果在他们的区域内导致了过高的利率，于是积极鼓动进行货币改革。进步派坚持说，货币流通量应该从私人之手解脱出来而置于公共机构的管理之中。银行家自身也为银行状况所警觉，因为不存在一个能够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的中央银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在不断增长，企业在不断扩大，但货币的流通量相对固定不变，僵化的金融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社会内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的需求。

1907年的金融恐慌，彻底暴露了通货不能变通和信贷缺乏适应性的弊端，让人们体会到了金融大权集中于东部一小撮私人银行家手中所产生的严重恶果。以众议员阿尔塞纳·皮若为主席的众议院委员会对此作了调查，其结论使得不少进步派人士相信确实存在"货币托拉斯"。因为在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等大金融中心，都毫无例外地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大银行通过连锁董事会控制了大量银行、工业和商业的资本，形成庞大的金融帝国。

① 祖波克著、苏更生译：《美国史略》，三联书店，1959年，第317页。

这些庞大的金融帝国就是货币托拉斯。恐慌的经历，也逐渐使得银行家本身倾向于改革。罗斯福执政时期，国会曾通过“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1908年），授权成立一个货币委员会。以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为主席的委员会在对外国财政制度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察研究后，于1911年提出一份美国银行货币制度改革计划的报告。报告虽在塔夫脱当政时期提交到国会，但未受重视。

威尔逊任内，争取银行制度改革的斗争加剧。然而，究竟对货币银行进行怎样的改革，各派主张各异。大多数银行家主张由中央控制银行系统，并创立一种能够针对商业票据的膨胀和紧缩作出迅速反应的通货，而这种通货又以票据的膨胀和紧缩作为部分基础。这些人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英格兰银行和美国历史上引起争论的第二合众国银行。具体说来，他们期望建立一个由政府批准、但由私人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自行负责发行通货。民主党保守派对这种设想不以为然，主张建立一批地区银行来代替单一的中央银行；地区银行将由银行家控制的一个联邦委员会予以监督。

威尔逊无意于摧毁私人金融，其目标是对金融界的某些方面建立某种形式的公共监督。1913年6月，他再次前往国会，向两院发表演说，呼吁创立联邦储备局来监督金融体制。根据他的设想，联邦储备局的成员将由总统任命并需经参议院认可（威尔逊认为银行家不适合于任命此类成员）；全国将被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域，每个区域设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储备银行由董事会实施管理，董事会将主要由本区域内与联邦储备体制建立了会员关系的私人银行选举产生。

威尔逊提出的银行改革方案，核心是建立联邦储备体制。联邦储备体制将提供一种可变通的通货储备以应付不时之需，同时它也将负责纸币的发行。从联邦储备银行中，将会出现一种新式

的通货——联邦储备券。它将纯粹作为联邦政府的一种义务按下列方式发行：比方说，当一家私人银行准备向一家地方工厂发放贷款时，这家银行将从这家企业接受一种抵押或者其他形式的合法负债（通常称之为商业票据）；然后，这家银行来到联邦储备银行，以抵押作为担保，取得联邦储备券，并将之发放给借贷人。实际上，在此过程中，联邦储备银行通常并非按照抵押品的全部价值放款，而是通过对商业票据进行折扣来获取一些利息，联邦储备银行凭借提高或者降低贴现率得以控制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这就赋予了联邦储备体系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潜在权力，从而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缓解通货紧缩。通货并非完全基于黄金或者某种形式的联邦债券之上，而是以企业和工业体制自身的收益为基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于这一规定，使得通货流通的总量得以根据商业活动的情况相应地做出增加或者减少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联邦储备体制的分权化（建立了12个储备银行），有助于减轻华尔街的垄断。

然而，威尔逊提出的银行改革方案招致了进步派和保守派双方的不满。进步派要求建立完全由政府占有和控制的储备和货币制度，保守派的银行家则希望将货币和信贷统统置于私人银行集团的控制之下。针对这一方案，私人银行家首先提出强烈抗议。长期以来，他们带着银行体制就是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情感处理着一切金融事务。而如今，华盛顿的那些“恶棍们”却在难以捉摸的威尔逊的带领下，图谋接管银行事务，对于早已习惯于控制这个国家经济生活的银行家而言，这简直是可怕的、不可容忍的前景。华尔街的传声筒——纽约的《太阳报》几乎怒不可遏地写道：“很难耐着一点性子去讨论这个愚昧无知和缺乏理智的荒谬产物（指联邦储备体制），但是，它却不能带着应有的耻辱离

去"，这个方案"周身沾满了布赖恩主义的粘液"。[1] 南部农民也对这一方案表示不满，要求增加新内容，例如：禁止连锁董事会，由国家来管理地区银行，准许储备银行给农业票据贴现，制止商业票据作为通货的基础。

威尔逊本来赞同民主党保守派的主张，但由于不能满足党内进步派和农民运动派的要求，只好作出让步。在国务卿布赖恩的居间调解下，威尔逊在农业票据贴现问题上作了让步，还允诺处理连锁董事会。作为交换条件，国会内的强硬派同意支持提案的其余部分。

1913年9月，银行改革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绝大多数的美国企业家对此方案表示欢迎，因为它毕竟是对现存状况的一个巨大改进。如同农场主一样，这些人也不满于华尔街一向的专横，赞成金融资源分散至全国各地。进步派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银行界则对众议院通过的方案有颇多抱怨。圣安东尼奥的一个银行家抗议说，改革方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主张"。

议案提交参议院后再次遇到保守派的强大阻力。威尔逊一方面向本党参议员发出呼吁，另一方面直接诉诸民众，警告说银行家正在设法制造新的金融恐慌以便挫败该议案，这些举动消除了某些阻力。然而，尽管民主党人团结一致，但参议院保守派仍成功地对议案作了两点修改：一是增加了发行银行纸币所必需的黄金储备的百分比；二是缩小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限。12月份，联邦储备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该法，全国设一联邦银行，下设12个储备银行，地方性的国民银行和其他银行成为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统一领导储备系统，各储备银行亦设立相应的委员会管理其分行。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99页。

〔对联邦储备法的简要评价〕　联邦储备法是威尔逊总统在内政改革方面取得的最辉煌成就，也是一项典型的威尔逊式的改革。它的颁布，再次体现了威尔逊总统“非凡的领导能力”。该法纠正了美国银行业和通货中的某些弊端。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地区储备银行的建立，使得美国自杰克逊时代以来第一次有了富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它创立了一种较为灵活可靠的货币制度，使得货币流通量能够按照工商业的需求适时作出调整；它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协调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增强了整个金融体系防范、化解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联邦储备体制的确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私人大银行对美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之下，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私人银行家共同拥有控制通货和信贷的权力，一方面，私人银行界凭借雄厚势力操纵着地区银行；另一方面，联邦储备委员会享有的管理权保证了国家比以往更能控制银行业。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调整贴现率控制货币流量的做法，从此成为美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总之，联邦储备体系确立了对于金融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减少了私人银行、垄断公司对于美国商业与财政政策的影响，对稳定和发展美国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威尔逊总统自认为联邦储备法也像安德伍德关税法一样，为美国工商业提供了一个“自由而公平的天地”[①]。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姆等则更明确地指出，“如果不建立这个新系统（指联邦储备体制），国家将无法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重负。”[②]

然而，联邦储备法也招致非议。批评该法的人说，威尔逊的行动与其雄辩之辞并不相称。联邦储备法的颁布，很大程度上毕

---

①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前引书，第84页。

② 布鲁姆等：前引书，第244页。

竟只是对美国银行体制的一次技术性调整，法案中“没有一项条款有助于削弱大企业在获得贷款上较之于中小企业的优惠地位，也没有一项条款涉及禁止银行和工商界的连锁关系，更加没有削弱华尔街垄断财团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① 联邦储备体制建立后，私人银行家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货币的供应及其利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操纵着整个联邦储备体制，俨然成为美国的“金融首都”。联邦储备局既未能强大得足以充当一个中央银行，也未能强大得足以控制美国的银行家。在1929年的证券市场崩溃降临以前，它仅仅只是尝试性地运用了其对贴现率的影响，这一局限性与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不无关联。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5名成员中，威尔逊将其中的3个职位给予了大银行家或有类似背景的人，1915年以后更是将该委员会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大银行家“作为对商人阶级友好的表示”。② 因此，只能说，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对威尔逊自己声称的“我们国家最大的垄断即金融垄断”确立了初步的管理机制，但这一机制仍很脆弱，远不充分，包含着很多不足之处，例如仍然需要放宽长期农业贷款的条件，仍然需要给予政府一些调节商业循环的有力工具。尽管如此，联邦储备法的颁布在进步主义改革当中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正如美国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凯利所指出的那样：“毕竟一项新的、灵活的通货已经创立，一个具有巨大潜能的公共管理体制也已应运而生。开端已经作出，在现情形之下，一个如此根本的改革，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③

---

① 陈伟硕士论文：《论1901－1917年间美国政府的改革政策》，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

②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38页。

③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99－500页。

三、反托拉斯立法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托拉斯问题是威尔逊整个议程中的另一项。该问题牵涉到的实质是事关整个美国企业的改组。前总统罗斯福和塔夫脱也都同样关注过这个问题。

19世纪末年，美国的公司企业内部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为了消除毁灭性的竞争行为和经济混乱现象，企业界加强了联合与协作，美国有的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笼统地称之为“组织革命”。这场革命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摩根事务所等巨型投资银行的出现。在它们的作用下，分散的美国个体企业被集中到一起，铁路得到重组。借助于连锁董事以及控制整个产业部门的大公司，这些投资银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资本结构。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也发生相应变化，形成了一个高级白领阶层组成的管理者队伍。企业家之间，也形成了旨在交流信息、共同对付工会和改革家的一种复杂的企业联合网络。

威尔逊的“新自由”纲领试图促成国会针对这些巨大的新的公司权力中心进行立法。改革的主要矛头并非对准大公司的“大”，而是大公司用于挤垮小对手的“不公平的竞争方法”。当然，相对于共和党人而言，民主党人带有更多的反托拉斯倾向。因此，威尔逊对托拉斯采取何种政策，颇受关注。

对于大工业尤其托拉斯，威尔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还在1912年大选期间，他就痛斥罗斯福当政时期的政策使得大企业事实上控制了联邦政府。但是，这一立场并非他内心真实思想的反映。191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下令解散美孚石油托拉斯时，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合理原则”，声称“只有不合理的

联合和不正当的限制贸易才是违反谢尔曼法的。"[①] 这一原则的提出事实上在法律上承认了托拉斯的合法性，制裁"不合理"的联合，言下之意就是说最高法院将容忍"合理的"联合。威尔逊接受了"合理原则"，他在《新自由》一书中写道："我认为任何商人通过合法的途径，靠经营得法和效率提高而建立起来的大公司都是自然的，我们并不害怕它，不管它的规模有多大"，试图反对这个过程将是错误的。[②] 在威尔逊看来，对待托拉斯问题，合理的态度是惩罚那些"有罪的个人"而不是惩罚公司，正像对街上那些驾车乱开的人而不是对汽车加以惩罚一样。[③] 在这里，威尔逊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托拉斯作为一个经常实体其存在是合理的，有罪的只是那些滥用权力的个人。当然威尔逊对中小商人有更多的同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托拉斯问题上的总体看法。他也像罗斯福一样，意识到"建筑在大规模合作基础上的企业的互相联合，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是随着现代文明的自然发展而来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回到个人竞争的旧秩序中去。"[④] 对此，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指出：到了威尔逊执政的年代，禁止任何垄断的企图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指望"谢尔曼法""作为一种武器对企业联合体进行全面的正面进攻已不可能，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明目张胆地犯有不公平竞争的个别企业有时能够被拉出来进行诉讼。"[⑤] 威尔逊试图采取的举措，其意图正在于加强对工业

① S.D.凯什曼：《"巨头"时代的美国》，前引书，第69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43页。

③ A.B.哈特编：《伍德罗·威尔逊演说和公共文件选集》，纽约1918年，第26页。

④ W·比尔蒙特：《伍德罗·威尔逊的经济思想》，巴尔的摩，1943年，第108年。

⑤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8－209页。

的全面管理和调节，进一步抑制托拉斯经营中的弊端，尽可能地创造一个相对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1914年初，国会例会如期召开，威尔逊在提交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提出管理工业的计划，要求国会着手立法，以便：互有联系的集团无法操纵控股公司；建立委员会协助解散被裁定为属于限制贸易的公司；明确界定何谓不公平的商业做法。保守派认为这些建议过火，无法接受；劳工领袖也不满意，极力主张工会可免除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约束；“雄麋”派同样不满，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管理机构。此时，众议院已经收到几个有关托拉斯问题的提案，并分别就有关内容展开辩论和调查。1914年秋，在威尔逊总统的要求下，民主党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克莱顿提出的法案终于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这便是“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法案第2款禁止可能压制竞争、导致垄断的买主之间的价格歧视；第3款宣布束缚性契约、排他性交易协议以及价格让步等行为为非法；第7款禁止股份公司以削弱竞争为主要目的而取得其他企业的股份（铁路除外）；第8款禁止资本总额在100万美元以上从事州际贸易的相互竞争的工厂之间实行连锁董事制，禁止存款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银行的董事兼任其他银行的董事或高级职员。

得到威尔逊支持并获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对不公正的商业行为作了概念上的界定，并就其主要表现进行了一大长串的列举，明确宣称不公正的商业行为属于非法之举，其中包括禁止设置连锁董事会。参议院讨论时，保守派对禁止办法作了修改，规定凡是没有减少竞争倾向者，均免于禁止；此外提案增加了一个声明，宣称不应该视劳工为商品。“克莱顿法”对劳工利益作了让步，规定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得作为以限制自由贸易为目的的组织，从而摈弃了援引“谢尔曼法”反对工会组织的先例。

对于威尔逊政府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它不过是对“合理原则”的一个诠释。虽然法案针对所谓被禁止的不正当贸易手段开列了一长串清单，但这一列举使得该法本身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自身在不断更新，人们根本无法凭借一次性的列举加以穷尽。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　　作为“克莱顿法”的补充，国会还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因为立法者清醒地意识到，单纯停留在纸上、法案中的列举，根本不可能达到消除掉各种各样的事实上属于不公正的商业行为的目的。狡猾的商人规避法律的手法变化多端，必须设立一个机构以制止对竞争的非法压制。

早在1912年的大选期间，罗斯福所代表的进步党就曾提出设立一个类似于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机构来专门管理公司企业。该机构或称全国工业委员会，或称联邦行政委员会，其拥有的权限和职能是制定最高价格，公布公司账簿，控制工人的工时和工资，调查公司的活动。如发现某公司存在垄断行为，可视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对于因运用不正当手段而谋求到的垄断，可以依据反托拉斯法予以解散；对于因自然增长所导致的垄断，则应借助于为该公司产品制定最高价格的办法而加以控制。任何接受该机构管理的公司，均可免除反托拉斯法的起诉。[①] 对于罗斯福的这一设想，威尔逊曾在大选中加以指责，但是入主白宫之后，威尔逊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不知不觉地接纳了这种主张。

在促成威尔逊的思想转变方面，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起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布兰代斯一直是大公司的敌人，同时也是威尔逊的亲密顾问，曾经帮助拟定了“新自由”纲领，此时的他加入了国会进步派的行列，并以学术权威的身份促成一种新策

---

①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第147页。

略。布兰代斯等进步派认为，威尔逊应该改变态度，赞成新国家主义的主张，即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并赋予其广泛权力对商业行为进行调查，一旦证实确定采用不公正行为，立即发布终止指令。布兰代斯等人的意思是，威尔逊总统应该朝着“积极的自由”方面迈进一步，也就是说，要凭借直接干预，运用政府将社会从权势者的虐待中解放出来。这一建议，意味着“新自由”哲学的重大变化。经过一番深思，威尔逊接受了这一意见。

1914年秋，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国会在威尔逊的要求下，很快通过了布兰代斯协助起草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法案规定：撤销原来的公司管理局，一切事务移交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存在，由5名成员组成，成员由总统提名同时须经参议院认可，任期7年；委员会有权调查公司活动，有权监督“克莱顿法”所适用的私人和公司以便防止其违法，并根据总统或国会委托草拟新法案。此外有权发布命令禁止托拉斯的活动，不服从者移交巡回法院审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款还规定，商务中的不公平竞争方式、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与做法均属非法，这样，政府管理的范围就由原来单纯控制公司的垄断行为，扩展到规范企业活动、制约企业间的竞争方式等广大领域。“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另一职责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下设的总顾问处和竞争事务局拥有数百名职员和律师。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联邦贸易委员会被赋予的职能是通过确保企业公开、公平地竞争，以防止新的垄断组织的出现。然而，何为“公开、公平地竞争”，有关立法并未作具体阐述，且法案在最后通过之前增加的修改意见规定，联邦委员会发布的指令必须由司法部门进行普遍的复审。结果，法案未能使工商业经营达到威尔逊所谋求的程度，也未能完全赋予工会所期望的活动自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被赋予的权力也没有

达到很多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样大。尽管如此，威尔逊政府的这一立法行动，令绝大多数进步派感到满意，即便是罗斯福也觉得威尔逊此举表明民主党人已采纳了“一点点进步党的纲领”。[①] 从长远来看，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设立，对于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政府对公司企业开始实行全面的管理与监督。

到1914年，威尔逊已经可以自豪地宣称，“新自由”纲领已经实现，已经不再需要推动立法进行重大的改革。事实上，对于进一步的改革，他内心深处不再有兴趣。他反对特殊利益的立法，不仅制造商和银行家不能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即使劳工、农场主和儿童也会受到忽视。这实质上是传统的民主党人自由主义理论。政府应尽可能地不插手，不偏袒任何人。这是古老的亚当·斯密的立场，也是民主党人托马斯·杰斐逊的信条。当有人提议帮助社会上受到剥削的群体时，威尔逊挫败了这一企图。

四、转向新国家主义

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向来是衡量美国政治气候的一只晴雨表。正当威尔逊大刀阔斧地推行“新自由”改革纲领，并接二连三地取得成效时，1914年的中期选举降临了。这次选举对于民主党人而言，总体上是有利的。虽然共和党人由于进步党的瓦解而取得相当大的胜利，尤其是在东北部，但结果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两院，在不少地区，民主党人得到进步派的支持。威尔逊领导的联邦改革，又一次赢得了选民的授权。这一点，也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增添了动力。

---

①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第148页。

中期选举之后，南部和西部农民在国会里享有比以往更大的发言权。为适应国会政治和全国政治的要求，威尔逊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16 年，威尔逊突然令人吃惊地朝着新国家主义者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将联邦政府转变成社会改革的机构。

做一个无所作为的总统不是威尔逊的风格，权力一向是他追求的目标。在“新自由”纲领完成之后，要他静静地守候在一旁而无所事事根本办不到。他深知，当时的美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才能加以革除；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政府应该因势利导、有所变化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在任总统的最初两年，威尔逊所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基本上都是保守派，中期选举之后，他顺应时势，作了适当调整。1916 年，威尔逊引领国会朝新的方向迈进，促使国会制订出了“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意义的进步主义立法。”[①] 这一年，他提名自己的亲密顾问、进步派人士、改革家路易斯·布兰代斯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此举令工商界震动不已，参议院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威尔逊这一行动如同在华尔街挥舞起一面红旗，也有人因为布兰代斯是犹太人血统而加以反对。尽管如此，威尔逊仍成功地促成参议院对于布兰代斯提名的认可。

对于民主党改革派，威尔逊也大加鼓励。1916 年，他改变以往的反对态度，支持并成功地促成“联邦农场贷款条例”。条例规定，在美国乡村地区，建立 12 家农场贷款银行，每个银行由联邦政府提供 50 万美元资金。保守派叫嚣这是“社会主义”，但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接着通过的是“联邦雇员赔偿法”。此法草案早就提交国会，但被扼杀。此时由于威尔逊的大力提倡，重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 500 页。

现生机，法案很快获得通过。这以后，威尔逊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国会制定童工立法。他亲自前往国会呼吁，终告成功。此法禁止州际贸易中运输由14岁以下儿童、或者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16岁以下儿童生产的产品。童工法后来被宣布违宪。在这个里程碑式的立法当中，美国联邦政府作出了针对私人业主经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的最初努力。国际贸易方面，威尔逊开始重视进步党关于促进美国工商业的纲领。他还赞同通过立法，准许从事出口贸易的公司联合起来对付外国竞争。为防止关税保护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倾销，国会通过立法设置超党派的、由专家组成的关税委员会，并赋予其就“科学的”关税变革提交建议的职能。对于此类做法，威尔逊在最初的新自由演说中曾专门加以谴责，如今他一反常态，改而积极支持关税的所谓“合理保护”。此举表明他已经极大的背离了传统的民主党原则。

至此，进步党人1912年提出的每一项重要立法建议，几乎都已经在威尔逊总统的支持下成了法律。这一点使得威尔逊在1916年竞选时有理由宣称：民主党也就是进步党，社会正义将出自他所代表的一面，而不是来自共和党。1916年6月，一场巨大的铁路罢工又一次为他提供了表现自己进步倾向的机会。铁路工人要求8小时工作制，同时不削减工资。威尔逊同情并支持劳方，压铁路主满足劳工之要求。在铁路主拒绝之后，威尔逊立即促成国会通过“亚当森法”，强制实行铁路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并使得更高的工资成为可能。此举博得了劳工组织的赞赏。

企业主为此对威尔逊深为不满。1916年大选期间，他们投票支持纽约州进步州长、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休斯。如同过去一样，本次选举期间，反对派大肆宣扬民主党候选人敌视企业。与此同时，威尔逊前往美国各地，提醒人民注意他为劳工、农场主以及儿童所做的一切。进步派汇集到威尔逊的旗帜之下。劳工

为拥有新的勇士而欣喜，竭力为威尔逊的胜利而努力。进步主义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称赞威尔逊将民主党转变成一个社会改革的机构。成千上万的都市少数族裔选民，在1912年大选时将选票投给了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这一次却转向威尔逊。这次大选本身非常微妙，东部州很大程度上支持休斯，但西部州则倾向威尔逊。结果，威尔逊以910万张普选票当选，休斯获得850万张。这是自从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以来民主党在职总统的首次连选连任。

五、"新自由"与美国黑人及南方

〔1900年之后的南方〕　对于南方而言，威尔逊入主白宫，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表明南方重新回到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之中。内战之后差不多过了20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才有幸成为美国总统；内战之后差不多经历了60年，南方民主党人才由于威尔逊当选总统并获得连任而趋于辉煌。但即便这时，也还需要归功于共和党人内部的分裂。南方虽然有些勉勉强强地才回到了全国政治的中心，但这一情况毕竟发生了。

内战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南方是在处于战争的阴影及其"丢失的事业"的悲愤之中度过的。在重建后的岁月里，南方并未能享受到全国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也没有沉迷于北方人那种持久的乐观主义的希冀之中。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南方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诸多不幸，与进步主义时代全国的情形相距甚远。在进步主义时代这一全国获得长足进步的年代，南方滞后很多。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乏味和艰难。"老邦联州"佐治亚的情形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人民极端贫困，2/3的人口劳作于乡村。绝大多数是佃农，1900年年

收入仅260美元（按1929年的美元价格计算）。城镇内的非农业工人的境况少许要好些，年收入达到662美元。然而相比之下，典型的中西部州伊利诺伊州的普通非农业工人这一年的收入却高达1512美元，是前者的2.5倍。[1] 由于多数佐治亚人生活在贫困潦倒的乡村地区，远离为数少得可怜的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鲜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白人和黑人当中的文盲非常普遍。

经济上，南方仍然是美国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佐治亚州除了亚特兰大之外，几无制造业。相比较之下，在北方，单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这样一个城市，其支付给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就超过整个佐治亚州。佐治亚人主要种植棉花，或者在松树林和棉花工厂中劳作，将廉价的木材、松节油和棉花包输往北方。相应地，他们"接受北方的工业制品以及很多北方人的蔑视"。

生活方式方面，内战前即已存在的南北差异在世纪更替之际更加突出。南方人生活的中心依然是家庭和家族，浓厚的宗教影响使得上教堂成为黑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除了经济生活方面的极端艰难外，社会生活也充满了苦难。自殖民时代起，南方就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随后发展起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奇特的、极端专断的"荣誉法则"。在全国性的笃信民主和"人民"的进步主义年代里，南方却陷入了鄙弃民主理念、沉迷于极端无情的种族主义的深渊之中。

南方的绝大多数暴力行为以日常的刀伤和枪击方式出现，它们多源于言行上对某人荣誉的伤害。既有黑人之间的，也有白人之间的。然而，白人暴徒以可怕的私刑袭击黑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据报道，19世纪80—90年代，整个南方一年内发生的此类事件就多达一百余起。白人无论如何总是抱怨黑人，说他们从奴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4－505页。

隶制时代起就变得越来越"傲慢无礼"，后来又染上了北方佬宣扬的所谓人类尊严的思想。因此，尽管私刑总的趋势在下降，但一直持续至20世纪。根据历史学家巴特莱的研究，1890—1930年的40年间，单佐治亚州公开报道的私刑就多达450起。[①] 此外还有频繁发生的所谓"合法私刑"，在此情况下，黑人受害者总是受到仓促的不公正的审判，被立即处以死刑。对黑人的正式指控通常是说黑人罪犯强奸白人妇女。但由于白人妇女无需出庭公开作证，因此犯罪的事实也颇成问题。更为常见的是，如果某个黑人和某个白人之间发生了争执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白人的报复行动。美国学者通过对私刑的研究揭示，私刑几乎成了白人的一种民间仪式，其根本意图在于藉此对黑人制造恐怖气氛，借以维持白人的至上地位。一篇公开刊登的记述这样描写了白人对黑人的私刑：

"他们（指实施私刑的白人）小跑着把尼哥尔先生赶到一棵树的树荫下，把他的身体绑在树干上，然后开始嬉乐。他的周围堆起了一些柴禾。为了使火势更加旺盛，一加仑煤油倾倒在了柴禾之上，然后便划燃了火柴。很快地，佐治亚出现了一个烧焦了的尼哥尔。他的耳朵和鼻子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被割下来作为纪念品……这个尼哥尔招供时提到另外两个黑人，这两人也都在次日遭受私刑……"。[②]

鉴于美国黑人的痛苦处境，黑人牧师、亨利·特纳主教曾经严厉地指出："我想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与黑人有关的，地狱也比美国要好。"

威尔逊上台伊始，他的南方人控制的政府就开始在政府部门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5页。
②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5页。

中实行隔离做法，据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摩擦”。威尔逊认为，隔离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政策，因为它将给黑人工作者提供单独拥有的工作领域，在此领域内，黑人无需担心白人的侵犯。

一般而言，黑人领袖倾向于相信威尔逊总统是一个真诚的人，然而他的有关隔离的辩词显得十分虚伪。威尔逊的父亲过去热情地支持过奴隶制，他的妻子是一个强烈的隔离论者，威尔逊自己除了以动听的言词掩饰“杰米·克劳法”的实践之外，似乎无所作为。更令黑人烦恼的是，政府部门的主管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多地解雇黑人雇员，其惯用的手法是，先将黑人雇员置于某个特殊部门之中，然后再将该部门彻底关闭。

然而，也并非仅仅民主党人这样做。整个进步主义时代，两党都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要求置若罔闻，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均以敌视黑人而著称。正因为此，1912 年大选时，数量可观的黑人将选票转向民主党，这是自黑人获得选举权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威尔逊似乎代表着未来而不是现在，他发布了不少激动人心的声明，但都令黑人沮丧和失望。全国各地的进步派们也都夸口说自己是社会上“被忘却者”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人也都毫无例外地回避种族问题。在他们看来，对于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自己无所作为，无能为力。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南方种族问题曾经作过深入的通盘的考虑，但最终由于自觉无力解决而放弃努力，只是告诉黑人说，他们只能指望白人的良好愿望。此后，就像对无力解决的问题采取极端反应一样，罗斯福采取了深深冒犯黑人社会的措施。1906 年，他固执地解散了黑人士兵的 3 个公司，理由是他们被怀疑卷入了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附近的骚乱。罗斯福甚至还对国会声称，之所以出现私刑，是由于黑人强暴白人妇女。罗斯福执政时

期，共和党人给黑人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威尔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早在塔夫脱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

〔北方的美国黑人〕　美国黑人所遭受的一切并非始于进步主义时代。自从 1877 年重建结束以来，北方白人越来越无视黑人的利益。内战后北方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抚平战争的创伤而将联邦重新连为一体。为了换取南方白人放弃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北方人觉得有必要将种族问题留待南方白人自己解决。联邦最高法院在 1883 年的一系列民权案判决中确立了这种主张，从而彻底背离了重建时代的联邦民权立法。最高法院采纳的哲学是“在种族关系问题上，个体能够自由地采取自己所希望采取的方式”。在 1890 年的路易斯维尔、新奥尔良和得克萨斯铁路诉密西西比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一个州可以在铁路运输中要求（而非仅仅允许）实行隔离。其后，在具有里程碑性的普莱西诉福格森案（1896 年），联邦法院确立了公共设施中的“隔离但平等”原则。法院的观点是，试图通过法律来改变“种族天性”毫无用处。事实上，南方州的立法机构给黑人学校提供的经费少得可怜，这从根本上导致不平等。在 1898 年的威廉斯诉密西西比案中，法院裁定密西西比州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做法“符合宪法”。

北方的黑人虽然保留了政治上的权利和民权，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仍然遭受严重歧视。他们通常在黑人学校中就读，从事最卑贱的工作。北方的工会强烈敌视黑人，尤其美国劳联。矿工联合会仅仅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共 2/3 的会员是黑人。在北方，种族平等的观点几乎遭到普遍的谴责。白人美国人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黑人跌倒在地的话，那是他们自作自受。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种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美国帝国主义思潮的兴起，北方对黑人的歧视加剧。几乎不再有黑人被选进立法机构或担当被任命的职务。旅馆、餐厅和剧院常常歧视黑

人，很多北方州单独设立黑人学校。白人顾客不再从黑人商店购买物品，白人工会和企业拒绝雇佣黑人劳动力。绝大多数工会排斥黑人，大量进人的移民从黑人手中抢走了家庭服务、旅馆和餐饮工作。

〔南方的美国黑人〕　　较之北方，南方的黑人处境更糟。19 世纪末年，南方盛行两种对立的种族关系哲学：一种公开宣扬种族仇恨，结果导致大规模的暴力和对黑人的恐吓。另一种是内战前即已存在的所谓“关怀和仁慈的信条”，一般为白人上层阶级所持有。毫无疑问，两种哲学都没有考虑到种族平等，但是所谓“仁慈说”强调，白人应该像受托人一样细致体贴地对黑人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主张还强调说，北方州已经将问题留给了南方，南方白人就应该以一种负责的、文明的方式承担起这一职责。重建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南方大量黑人继续享有选举权，一些人还担任公职，例如陪审团成员甚至法官，或者当选为市、州和联邦议员。然而，在绝大多数公共设施内，隔离成为通常的模式。经济上的状况也极糟糕。直至 1900 年，南方 3/4 的黑人农民仍然依靠别人的土地过活，绝大多数属于分成制农民或者佃农。与此同时，黑人往往由于微小的过错就受到监禁，而白人犯了同样的过错却会忽略不计。

19 世纪 90 年代平民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南方曾一度引入一种新的种族观念。南方的平民党人强调穷人的平等主义，欢迎黑人加入他们的运动行列。得克萨斯州一个平民党人说，“他们（指黑人）像我们一样，穷困潦倒。”[1] 这种平等理念颇为超前，但广大白人群众尚未作好心理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种族平等，尤其白人中的穷困者。这一点也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平民党人的绝大多数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 507 页。

主张主要诉诸于贫困的白人阶层，而恰恰他们在种族关系问题上表现出近乎疯狂的固执。在平民党人力量取得政治优势的州内，黑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一些平民党人行政长官任命黑人担任陪审团成员，平民党人的报刊编辑也不遗余力地称赞黑人所取得的成就。面对这些新进展，南方州内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逐渐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歇斯底里式的叫嚣："白人必须抱成一团!"为了将白人拉回到民主党中来，种族鼓动家们开始大肆散布种族仇恨。

重建以来，南方黑人就一直遭受着政治上的歧视和限制。自19世纪70年代直至进步主义时代，南方州对选举权设置了种种障碍。通常规定，选民必须符合人头税、读写和登记方面的资格要求，必须有财产证书，必须能够"理解"宪法和法律文献。借助这些条款，大量黑人被排斥在投票站之外，与此同时，共和党也在南方遭到扼杀，被迫在绝大多数州内关闭，于是到1900年，形成了一个民主党人的所谓的"稳固的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形说明了黑人境地的恶化：1896年，13万黑人享有选举权；到1904年，享有选举权的人仅剩下1300人。[①]

美国南方黑人遭受如此不公待遇，与当时整个南方的大气候紧密相关。在黑人被广泛剥夺选举权的同时，大量贫穷白人也由于选举权的资格限制而散失政治上的权利。美国历史学家J·摩根·库泽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黑人和贫穷白人）选举权的剥夺，是一项典型的进步主义改革。"白人上层认为，将选举权从社会上"卑贱者"手中拿开，是为恢复"好政府"而采取的手段。对此，托玛斯·纳尔逊·佩奇冠冕堂皇地说，选举权的资格限制应该足够的高，以便"选举权仅仅落在那些拥有足够的智慧将其作为确保好政府、而不是毁掉好政府的一个工具加以运用的人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7页。

手中。"[①] 然而，白人的这种观点也遭到驳斥。广为人们阅读的《新奥尔良每日小报》谴责白人男子选择权思想"绝对违背自然，不合理性，不为任何公开原则所认可。"到20世纪20年代，南方拥有选举权的人大约仅占成人人口的20—25%，远远低于美国的其他地区。进步主义时代所取得的另外一项成就——预选制，在南方实施过程中也变了形。由于预选只对白人选民开放，因而这项看似民主的改革措施成了将黑人排除在政治之外又一工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黑人遭受大规模的暴力之害和"杰米·克劳法"的歧视之苦加深。189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400名白人涌入一个黑人居住区，烧毁房屋，屠杀黑人居民，死伤无数，成百的居民因惶恐而远避他乡。1900年，整个新奥尔良市被屠杀和恐吓黑人的暴徒所控制。佐治亚州的情况更糟。1906年，在自我标榜为"进步派"的民主党人胡克·史密斯赢得该州州长宝座并掀起一场所谓"白人之上"的远征之后，该州首府亚特兰大陷入了白人动乱之中。史密斯自称"人民的候选人"，竞选时许诺要加强铁路管理并改善学校条件。整个进步主义时代，南方市、镇的白人学校确实大为改观，但黑人学校急剧衰落。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担心失去黑人选票（因为黑人已被剥夺了选举权），所谓的"进步派"州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杰米·克劳法"。于是，铁路车厢和候车室、公共汽车、剧院进出口通道、厕所、售票窗口、公园、马戏团表演、礼堂、观众席、球类运动场、居住区、课本、学校甚至妓院等等，均实行隔离。亚特兰大的各法院有分别供黑人和白人使用的《圣经》，公共建筑物内也分设两种电梯。在这个所谓的"杰米·克劳时代"，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7页。

南方种族关系的紧张状况以及黑人遭受的歧视均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每个黑人，不管睿智的还是愚笨的，衣冠楚楚的还是衣衫褴褛的，有教养的还是无知的，都在法律上被确定为比白人低劣的“卑贱者”。

总之，即便是在经历了20世纪初荡涤一切恶行和社会弊端的进步主义时代大潮的冲刷之后，种族主义观念在美国尤其南方这片土壤里仍然根深蒂固，种族歧视问题仍然是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难以治愈的顽疾之一。

六、进步主义改革的扼要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处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自由放任”和“扩大政府管理职能”两种观念冲突变革的时代。从西奥多·罗斯福到伍德罗·威尔逊之间的历届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初步确立了对于转变时期美国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加强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调节职能，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以“扩大国家职能以调节经济与经济生活”和“关心全社会的利益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核心内容的进步主义传统，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工商业、交通运输和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实行全面调控的做法，虽出于战争特殊环境的需要，但与进步主义时代改革的遗产有较多较大的关联；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新政”，其思想渊源之一同样可以追溯到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英国教授拉斯基曾明确指

出，罗斯福“新政”是威尔逊“新自由”政策的逻辑发展。[①]

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总体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说：从“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共和党就从一个商人为了经济私利而向其交纳贡金的私人俱乐部，变成了一个为商人的总体需要服务的“公共组织”。[②] 改革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老罗斯福也在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新国家主义”时说，“新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的需要放在集团和个人的特权之上”，并且把政府视为“公共利益的管理者”。[③] “新自由”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威尔逊总统在一封致财政部长的函件中总结其改革政策时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我们都在同一条船只上……我们的任务因而不是为了任何单个利益，而是为了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服务。”[④] 虽然他们在推行联邦政策时不时地以诸如“国家需要”、“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类的冠冕堂皇的漂亮辞藻加以妆扮，但其实质始终如一，那便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当然，进步主义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下层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正如邓蜀生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从根本意义上说来，这些改革首先得益的是垄断资本集团，但是也不能无视对普通人民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政府的改革，是广大群众通过斗争争取来的。”[⑤]

---

① 哈罗德·拉斯基：《美国总统制》，伦敦 1943 年，第 250 页。
②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进步的负担，1900－1929 年》，前引书，第 67 页。
③ 威廉·奥勒尔：《进步主义年代，美国的成年》，纽约 1975 年，第 155 页。
④ 约翰·布莱曼：《威尔逊》，第 50 页。
⑤ 邓蜀生：《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第 380 页。

第七章

美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在美国举国上下为消除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所带来的巨大弊端而专注于推进广泛、深刻的进步主义改革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欧洲列强加紧秘密外交和军事结盟活动，并最终在1914年将世界引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深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震惊了世界，也令美国人颇为关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灾难，同时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战结束时，欧洲延续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王朝被扫进了历史的坟墓，满目疮痍、两败俱伤的欧洲交战诸国元气大伤，从此，曾在19世纪支配全球的“欧洲时代”终结了。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战争财，坐收渔人之利，由战前的债务国摇身一变而成为欧洲的债权国，不仅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而且开始试图扮演起作为一流大国领导世界的角色。

一、战争初期美国的中立政策

〔战争初期美国的反应〕　由于长期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

响，美国人民在战争爆发前对欧洲的内部纷争并不关心，“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生活在19世纪那种自负的国际社会里，对这即将来临的大灾难毫无准备。”[①] 对于欧战的爆发，美国人颇觉有些突然，因为他们对于战前欧洲的时局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战争爆发后，美国赶忙强调它与欧洲的不同，宣称无意于介入欧洲战端。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在给威尔逊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一立场，信中写道：“现在当世界一半国家遭受战争不可言状的残忍时，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道义力量、我们的政治权力和我们的理念。”[②] 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也始终是美国人不愿卷入欧洲争端的因素之一。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相距甚远，美国人每每以此为之庆幸，很多人从内心深处“感谢上帝赐予……大西洋”。[③] 在他们看来，有了大西洋的阻隔，美国就可以避免欧洲战祸的侵扰。因此，对于欧洲爆发的战争，美国人觉得自己幸运得多。

然而，地理上的孤立并非欧战爆发初期美国保持中立地位的惟一决定因素。美国在战争初期远离战争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包括“人口构成、国家经济力量与世界经济事务联系、军事潜力、根本的道义的利益的界定”等等。[④] 美国的地理位置仅仅使美国保护了最初几个月的非交战国地位，最终还是美国的世界地位决定了它对战争的态度和在战争中的作用。1914年，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人口约9000万。经过19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年》，前引书，第145页。

② 伯顿·亨德里克编：《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生平与书信》，纽约，1921年，第3卷，第310－311页。

③ 伯顿·亨德里克编：前引书，第3卷，第310页。

④ 罗斯·格雷戈里：《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纽约，诺顿公司，1971年，第3页。

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迅速的发展，美国已从农业国或半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技术领先、生产能量巨大的工业化国家，其工业产值雄居世界首位。相应地，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战争的爆发并没有改变美国需要向欧洲出售商品这一事实，也没有改变美国对欧洲国家原料的需求。战争之初，与美国商业往来密切的4个国家都是交战国，其中3个是欧洲国家。1914年8、9月间，美国大部分评论认为战争为美国提供了经济机会。不仅仅军火商，很多美国企业也感受到欧洲冲突使他们的收入发生了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国企业家们对战争的态度。

美国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究竟如何？一战期间，还没有民意测验的做法。人们只得求助于不太可靠的推测方法，例如“报纸时事杂志的观点；有影响的知名人物的立场；支持或反对的一些私下运动；任何选举中的投票直接或间接反映政府战时政策等。”[①]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不同族裔的民众对战争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占总人口15%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强烈反对英国而支持德国；美籍犹太人也支持同盟国，这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德国渊源，部分是由于俄国的反闪米特人的德性[②]；其余大部分人口是不赞成德国的，他们或者对英法漠不关心，或者对同盟国怀有敌意。[③]

〔英、德在美国的宣传及其影响〕　虽然美国对战争的态度较为淡漠，但交战双方却都想争取美国人，他们努力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以取得美国人的同情。1914—1915年间，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各自开动宣传工具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辩护，以

---

①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7页。

② 闪米特人的特性（Semitism）：尤指其起源与犹太人有关的思想、文化和气质等。

③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7页。

便争取美国人的好感。

在“形象斗争”中，英国占有语言、通讯线路两大优势，并能充分利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发挥作用，例如在美国受尊敬的、可信任的、知名的美国人——詹姆斯·布鲁斯。协约国的宣传致力于“在美国理想与协约国战争原因之间寻找相似之处”[1]，同时把德国描绘成一个无原则的、残忍的一心想控制世界的国家。虽然这种宣传并未能起到促进美国提前参战的效果，但它确实破除了某些美国人反对参战的思想情绪，使另一些人的反战呼声归于沉寂，并鼓励了美国人用广泛的人道主义理由来使他们的参战显得合理，不断赢得美国人的同情。

德国在宣传战中略输一筹。对于协约国的指责，德国很难作出反驳。首先，德国自己的行为不当；其次，它对美国历史、性格、思想和制度的了解有限。最重要的是，德国和奥地利当局在美国的一些军火工厂里暗中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阻挠它们为协约国生产军事定货，引起美国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美国要求德国政府召回驻美陆军武官冯·巴本上尉和海军武官博伊·埃德上尉，要求奥国政府召回驻美大使 K·敦巴。

1914 年 8 月为了达到迅速击败法国的目的，德国公然进攻中立国比利时，并彻底摧毁了比利时的城市卢万。此举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1915 年 5 月间，美国报纸几乎每天刊登有关德国在比利时犯下残暴罪行的报道[2]。此时的美国人虽然被德国入侵比利时的残暴行为震惊了，但还是对战争抱观望态度。

〔美国政府的中立〕　1914 年战争爆发时，执政才一年半的威尔逊政府正致力于内政改革，正在大力推行“新自由”的进

①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 10 页。
②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 10 页。

步主义改革纲领。在外交方面，缺乏经验的民主党人政府（此前16年一直是共和党人执政）相对地将其置于次要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威尔逊政府的决策。

威尔逊政府在最初发表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几个声明中，都正式认可了当时全国上下一致的态度。1914年8月4日，威尔逊正式发表中立宣言。8月19日，他又发表讲话，呼吁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不偏不倚”，“谨防那种对于中立的最深邃、最巧妙、最根本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源于他们所属的民族，也可能出于过激偏袒，在这些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不仅必须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我们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①

美国奉行中立外交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美国建国以来，不卷入欧洲事务、不与欧洲任何国家结盟历来是个传统，易为国会及人民所接受。1916年大选时，威尔逊总统正是凭借“他（指威尔逊）使我们置身战争之外”这一口号而再次当选总统。因此“中立”成为他争取舆论的有力武器。

其次，美国政府在大战爆发之初认为，交战国的任何一方的胜利对美国都不利。1914年8月22日，豪斯上校致信威尔逊总统说，“……依我所见，最可悲的一点是，战争看不出有任何好结果。如果协约国战胜，那主要就是说，俄国统治了欧洲大陆；而如果德国战胜，那就是未来的几代是军国主义的不言而喻的专制……”②。到1917年2月，美德矛盾日趋激化时，威尔逊在内

---

① 亨利·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献》第10版，新泽西，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88年，第2卷，第96页。

② 王铁崖选译：《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史资料丛刊：近代史部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

阁会议上仍然表示“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获胜”[①]。

再次，美国可以利用中立地位，同交战双方大做生意，扩大贸易市场和经济实力。中立宣言发表后，美国政府便鼓励大企业、大商人以供应战争物资方式向交战双方提供信贷。摩根公司实际上成了协约国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

最后，美国最终发挥世界性的领导作用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美国外交将在战争进程中寻找机会，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梦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为美国大踏步走向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大战爆发后不久，豪斯上校致信威尔逊说，“在这场悲剧中，世界希望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您必将担当此任，因为上帝已经赋予您这种力量。”[②] 1916 年 10 月 5 日，威尔逊在奥马哈讲话中说：“美国远离现在这场冲突，而世界其他地区则战火蔓延，不是因为它不感兴趣，也不是因为它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它想要扮演的角色是一种不同与此的角色。”[③] 基于此想法，威尔逊在 1917 年初提出交战双方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口号，以最高仲裁者身份出面干预战争，企图左右国际局势，并利用有利的政治、经济、外交地位攫取世界的领导地位。

然而，美国人在思想感情上长期保持中立是困难的，就是总统本人最后也证明是不可能的，威尔逊长期以来就是英国文化的崇拜者。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美国人忠诚于他们不同的祖国，所以甚至在交战国的宣传机器在美国开

---

①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 2 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4 年，第 628 页。

② 查尔斯·西摩编：《豪斯上校秘密文件》第 1 卷，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26 – 1928 年，第 325 页。

③ 阿瑟·林克编：《伍德罗·威尔逊文集》第 38 卷，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 347 页。

动之前，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立即同情“协约国”（除德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支持中欧三国同盟外）。英裔美国人赞成西欧协约国。英美两国语言和制度相似，更使美国人对英国产生广泛的同情。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经济因素。

〔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早期影响和政府保护经济的措施〕

一战爆发前夕，美国经济已开始从繁荣滑向萧条，美国学者格雷戈里在其著述中描述了战争开始后美国的经济状况，认为美国经济已处于衰退过程中，这场冲突使之更加恶化。他写道：“面对英国证券的猛抛，美国证券市场的营业额急剧下降，然后关闭。随着所有欧洲市场的崩溃，棉花价格猛跌，到了 1914 年 8 月棉花价格仅为 7 月的一半，西部诸州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萧条，如果外国市场不迅速恢复稳定，国家其他地区必然遭受经济损失。”①

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国证券。1914 年 8 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直到 1915 年 4 月才完全复业。美国因出口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加深了已经十分严重的国际货币危机。棉花和粮食的出口由于欧洲的主要顾客（英国、法国和德国）卷入战争而中断，过剩的粮食和棉花堆积在美国仓库里，农产品价格暴跌。由于德国的潜水艇袭击了英国和其他盟国的船只，同时英国又对德国实施封锁，从而进一步破坏了美国的对外贸易。1914 年钢的出口量比前一年的水平降低了将近 50%，其他很多制造业部门，也都差不多受到沉重打击。多数工业品的价格跌落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威尔逊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保护国内经济，扭转经济混乱局面。为减轻欧洲投资者抽回资本对美国黄金储备所造成的压力，

---

①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 29 页。

政府新成立的联邦储备局建立一项特别黄金基金。为了帮助南方的棉花业渡过危机，政府又建立了一项棉花贷款基金。通过这些特别措施，美国政府期望能有助于国内银行和其他财政机构不致收缩基本信贷。同时，威尔逊政府在金融方面采取禁止美国银行家给交战国提供贷款等措施，以保护国库黄金储备，防范金融市场崩溃。对此，美国史学家林克指出："政府在美国银行家给交战国政府提供贷款问题上的早期立场，应该被理解为作出巨大努力保护破坏严重的国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①

1914年8月初，法国政府请摩根公司在美国发行1亿美元的债券，美国政府拒绝批准。威尔逊让国务卿布赖恩发布文告，禁止美国银行家贷款给交战国政府。同年8月15日，布赖恩发表官方声明，宣称美国"毫无理由阻止给中立国政府发放贷款，但按照本政府的意见，美国银行家贷款给任何交战国是不符合中立的真正精神。"②

但是，美国政府很快认识到战争已经为他们所带来的机遇。1914年，布赖恩曾宣布："本政府虽然不能创造贸易，但能够提供给贸易得以发展的一个环境。"③ 1914年7月4日，威尔逊在演说中也指出，"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商人的企业带到地球上每一个地区。当我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关心这件事。"④ 战争很快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当战争演进为持久的消耗战时，战争的巨大规模和堑壕战需要大量供应军用物资，而英法俄协约国的军事工业力量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于是，它们不得不从美国取得补给，以弥补物资的不足。

---

①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151页。

②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151页。

③ 艾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657页。

④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30卷，第251页。

随着欧洲各国购买美国货物的激增，美国的经济衰退在短短几个月内逐渐转向经济繁荣。1913—1916年，美国对欧洲出口总额从15亿美元一下增加到38亿美元。[①] 其中绝大部分是对英法两国的输出激增。同时，欧洲各国对美国的出口骤然减少。战争期间因欧洲各国输出减少，出现了世界市场的真空，美国商品逐渐填补进去。1913年，美国出口总额约为25亿美元，3年后激增为55亿美元。同期美国进口总额从18亿美元增为24亿美元左右。[②] 对外贸易的扩展，带来了工、农业两方面的发展，就业水平日益提高，国内需求逐渐增加，经济增长呈现良性循环的势头。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威尔逊政府立即改变了原先以违反“中立精神”为由禁止发放战争贷款的政策。1914年10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改变立场，表示它将不阻止金融界对交战国贷款。1915年8月21日，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在致威尔逊的机密信中谈到向交战国贷款对美国外贸的重要性。他声称美国经济繁荣正在到来，如果美国能向顾主扩大合理信贷，这种繁荣不仅得以维持，而且经济将获得惊人发展。“我们的繁荣取决于我们继续扩大的对外贸易，要维持这种状况，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我们的顾主购买。”[③]

1915年9月6日，国务卿罗伯特·蓝辛（6月8日布赖恩辞职后，接任为国务卿）致信总统，“如果欧洲各国不能找到方法偿付美国售予和购自它们的货物之间的超出部分，它们就将停止购买，而我们目前的出口贸易将按比例缩减。其结果将是限制生

① 菲特和里斯：《美国经济史》，前引书，第614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615页。

③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34卷，第279页。

产、工业不景气、资本和劳动力过剩、许多公司倒闭、金融衰败，以及劳动阶级的普遍不安和痛苦。"[①] 美国政府决定允许交战国公开在美国筹措贷款。这样，美国银行的贷款、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交战国，主要是协约国。到 1917 年，政府批准给协约国贷款达 23 亿美元，其中德国仅占 2700 万美元。由于英国控制着海洋，美国同欧洲的贸易日益变成完全是同英国和法国的贸易。大量的物资贸易尤其军火贸易，使得美国从中大获其利，带来了战时美国经济的繁荣。

二、通向美国参战之路

〔德国开始潜艇战〕　美国在战争初期因发战争财，财源滚滚，经济繁荣；但是，德国潜艇在海上的突然出现和捣乱，却使美国政府感到无比惊慌。早在 1915 年 2 月 4 日，德国海军部就宣布开始对英国诸岛实行潜艇封锁，"所有敌船将不经警告就被击沉，包括中立国的船只，因为英国滥用中立国的旗帜"。[②] 德国发言人对此解释说，帝国政府采取这种非常手段，是为了报复英国的食品封锁；如果英国放弃封锁，他们也将放弃潜艇封锁。对美国来说，英国放弃封锁和德国放弃潜艇是最理想的局面，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双方都已进入战争"角色"，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双方互不相让，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对德封锁是英国迫使德国就范的一种手段；德国使用潜艇的目的乃是切断大西洋上英国供应品的来源。德国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

---

① 查尔斯·西摩：《美国中立：1914－1917》，耶鲁大学出版社，1935 年，第 100－101 页。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5 年，补遗，第 94 页。

茨在1914年12月说："英国想要困死我们，我们能够如法炮制，我们能使它成为瓮中之鳖，用鱼雷进攻英国任何港口的每一艘英国及其盟国的船只。"[1]

然而，德国使用潜艇必然与美国发生冲突。如果大西洋贸易线中断，美国经济遭到的冲击程度是难以想像的。威尔逊在2月13日致电豪斯说，德国的政策是"一种毁灭商业的特别计划"[2]。经济利益决定了美国必然反对德国的潜艇战。

1915年2月10日威尔逊在复照柏林时提出警告：如果美国船只和美国人的生命遭到非法毁灭，德国应承担"严重责任"，美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本国公民在公海上航行的权利[3]。美国依据国际法对德国潜艇战提出抗议，国际法规定，"战舰在进攻商船之前必须发出警告，首先要保证船上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威尔逊极力说服英国放弃对德食品封锁。英国表示：如果德国停止对商船使用潜艇攻击，就允许粮食进入德国。但是，德国政府坚持要求英国准许原料像粮食一样自由进入德国。英国不同意德国的过分要求，德国也就未同意放弃潜艇战。

针对德国关于潜艇战区的声明，协约国针锋相对，宣布它们将"认为可以自由扣留或把那些载运它们认为是运往敌方目的地、为敌方所有或由敌方制造的货物的船只，押送入港口。它们无意没收这些船只或船货，除非它们有被定罪的理由。"[4] 1915年3月11日，协约国发布行政命令宣布执行上述规定。

对英国实行潜艇战威吓失败后，德国政府开始在北大西洋海

---

① 阿瑟·林克：《争取中立的斗争1914－1915》，新泽西，1960年，第315页。
②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32卷，第231页。
③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625页。
④ 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6页。

域实行不经警告就击沉英国非武装客船的全面恐怖活动。这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由潜艇战引发的美德危机缓缓拉开了序幕。1915年德美间发生重大危机。这年的3月28日，一艘德国潜艇未发警告就击沉英国客轮“法拉巴”号，船上1名美国乘客溺死，引起美德两国纠纷。随后，威尔逊总统及其顾问们试图制定既不引起美德严重危机、又能保护美国权利的政策。布赖恩主张政府应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乘交战国商船旅行。当时国务院法律顾问罗伯特·蓝辛认为：德国击沉非武装的“法拉巴”号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即使造成外交危机，美国也不能不采取坚定立场。然而威尔逊总统已决定不再追问“法拉巴”事件。

〔德国潜艇威胁加剧〕　但是1915年5月1日，又有一艘美国油轮被鱼雷击中，3名美国人丧生。同年5月7日，又发生了不幸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美德关系再次出现重大危机，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着美国欧洲调停计划的破产，也把美德潜艇争执推向高潮。

卢西坦尼亚号是一艘豪华英国客轮，1915年5月7日在爱尔兰海面未经警告即被德国潜艇击沉，1152名旅客罹难，其中包括128位美国公民。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报刊杂志纷纷刊文谴责德国暴行。威尔逊的私人秘书图马尔蒂在回忆录中引用威尔逊本人的话说：“我深知，国家的情绪现在也如痴如狂……”[①] 美国政府内部就此事件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派以国务卿布赖恩为代表，认为对德国抗议是必要的，但口气要缓和，使德国人放心地认识到美国并不准备参战，并建议禁止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另一派则主张美德断绝关系，借机参战，驻英

① 约瑟夫·图马尔蒂：《我所认识的伍德罗·威尔逊》，纽约，1921年，第233页。

大使佩奇说“强烈敦促总统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1] 5月9日豪斯认为，“即使战争随之而来，它将不是一场新战争，而是更为迅速地结束一场旧战争的努力，我们的干预不是增加、而是挽救生命的丧失”。[2] 这两种主张实际上均未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多数美国人的态度和立场是，既想从德国得到满意的答复，又不期望政府卷入战争。

威尔逊总统采取了基本上与舆论一致的立场。在一次公开讲演中，他说道：“有这样一种事情，一个人过于自傲而不屑战斗。也有这样一种事情，一个国家十分有理以致它不必用武力来使别国相信它有理。”[3] 总统对德国政府采取了一场颇有耐心的外交辩论。他在1915年5月13日关于“卢西塔尼亚”事件的首次照会中，以人权的名义，呼吁德帝国政府停止攻击非武装商船，要求德国道歉和经济赔偿，并要保证此类行动不再发生，第一次宣布了美国人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的权利。[4] 德国外交部对此未作正面回答，威尔逊再次提出要求。1915年6月8日，布赖恩因不愿再签发“卢西塔尼亚”事件照会而辞职（蓝辛接任为国务卿）。当德国政府第二次作出含糊答复时，威尔逊发出第三份“卢西塔尼亚”事件照会，宣称继续这种不加警告击沉船只的政策将被美国视为“蓄意为敌”，但德国态度强硬，双方交涉进展不大。

然而，德国政府已开始意识到这样做有进一步激怒美国的危险，于是在1915年6月6日发布密令，要求潜艇司令官们不要攻击大型客船；并且怂恿德皇于适当时机下令完全停止对所有客轮的无限制潜艇战。可是8月19日，又一艘德国潜艇击沉“阿

①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1卷，第433页。
②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33卷，第134页。
③ 比米斯：前引书，第139页。
④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第104页。

拉伯人号"邮船，2名美国人丧生。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蓝辛决心迫使德国人摊牌。9月1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冯·伯恩施托夫通知蓝辛：德国潜艇不会攻击没有武装的"邮船"，只要它们不攻击德国船，并且在被召唤投降的时候不试图逃跑。①

通过"阿拉伯人"号事件的处理和德国提出的保证，总算维持了7个月的和平。但是，1916年3月24日，非武装的法国客船"苏塞克斯"号又被德国鱼雷击中，几名美国人受伤。不容置疑，德国违背了"未警告不击沉不抵抗客船"的诺言。美国面临最严重外交危机。1916年4月18日，国务卿蓝辛在给柏林照会中宣称："除非（德）帝国政府立刻宣布并实行放弃它现行的攻击载客和载货船只的潜艇战方法，否则美国政府只有完全断绝同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关系而不能有其他选择"②。

德国政府在当时情况下对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胜利还没有把握，只得暂时屈服。1916年5月4日，德国许诺："根据国际法所承认的登船检查和摧毁商船的一般原则，这种船只不论在宣布的海战区以内还是以外，将不再未予警告和没有拯救人命的情况下予以击沉，除非这些船只试图逃跑或抵抗。"这一许诺也暗示，如果美国不能迫使英国放弃封锁，德国还要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潜艇战。5月8日威尔逊总统告诉德国："这类事情，责任是单方面的而不是各方面的；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③

几次由潜艇战引发的美德关系危机均以德国暂时妥协而告终，表面上美国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但这只是德国的权宜之计。德国的潜艇不仅使接近破裂的美德关系更为脆弱，而且使美

---

① 比米斯：前引书，第141页。

②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634页。

③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635页。

国更接近参战的边缘。

〔1915 年以来美国的调停〕　在欧洲战火熊熊燃烧之际，美国赢来了四年一度的大选。在 1916 年的选举中，外交政策成为竞选运动的中心问题。民主党人提出了“他（威尔逊）使我们没有卷入战争”的有效口号。威尔逊亲自对选民说，自己“不希望美国参战”。民主党还大事宣扬，“是要威尔逊和光荣的和平？还是要休斯、罗斯（共和党人）和战争？”民主党对保持和平、繁荣和执行进步政策的承诺，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赞赏，也为威尔逊赢得了大选的胜利。

在整个中立期间，和平希望时隐时显。美国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政府既要坚持保护美国的海上权利，又要维护和平。于是，依靠调停来结束战争、摆脱困境便成为美国政府惟一可行的方法。1915 年 1 月，威尔逊要求豪斯上校前往欧洲，开始了战争爆发后的首次调停使命。豪斯发现，只要德国同意撤出比利时和战后实行裁军，并对将来欧洲和平政策给予明确保证，英国官员就愿意商讨和平条件。但德国人不愿作出保证。豪斯的首次和平使命以失败告终。

调停失败后，威尔逊总统又准备召开一次和平会议。1916 年 2 月 22 日，格雷 - 豪斯备忘录中写道，“豪斯上校告诉我，鉴于英法时机成熟，威尔逊总统准备建议召集一个会议以结束战争。如果协约国接受这个建议，而德国拒绝接受，那么美国将‘可能’参战反德”。[①] 由于德国拥有军事优势，而英国也不想在和平桌上被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束缚住手脚。所以，没有一方愿意召开和平会议。

1916 年下半年，交战双方在大战场上的僵持状态正在打破，

---

①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 635 - 636 页。

双方都想利用各自手中掌握的最厉害的武器置对方于死地，赢得战争的胜利。美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或者通过调停结束战争，或者被形势所迫卷入战争。

1916年11月下旬，为了避免美国介入战争，威尔逊打算继续通过调停结束战争，并意欲豪斯再次身负使命，前往伦敦。但是最终因时间不允许，他的欧洲之行被取消。威尔逊此次调停的动机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我们必然在潜艇问题上与德国作战”。[①] 威尔逊草拟了照会初稿，描述了战争的危害和对文明的不利影响，宣称战争起因模糊不清，中立国的权利受到侵犯，要求交战国明确表明各自的战争目标。

德国当局很快就获悉威尔逊的调停计划。12月12日，德国抢在威尔逊之前向协约国发出和平建议。12月18日，威尔逊向交战双方发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提出“交战双方的政治家在此次战争中所抱的目的，按照他们向其本国人民和全世界所一般地说明，实际上是一样的”[②]。这样，只要交战国公布各自的目标，就能找出和谈基础。

威尔逊还希望通过施加压力迫使英国接受调停，但这种压力却难以奏效。早在1916年9月底，英国陆军大臣劳合·乔治就明确表示，威尔逊可能“插手”结束战争，英国不能容忍任何外部干涉，在德国的威胁“最终和彻底消除之前，和平现在和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思议的。……战斗必须进行到最后一个敌人被消灭”。[③] 12月30日，协约国政府发出联合照会，拒绝德方召开和会的建议。1917年1月12日，协约国在对威尔逊12月18日照

---

①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2卷，第390页。

②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82页。

③ 罗斯·格雷戈里：前引书，第108页。

会的复照中，“以最明确的态度，抗议美国照会中把交战国的两个集团混为一谈；这样的混为一谈，以中欧国家的公开声明为根据，是直接违背了有关过去的责任和将来的保证的明显事实；威尔逊总统在提这一点时肯定并无赞同这种提法的意思”①，由此拒绝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德国在 12 月 26 日给威尔逊的照会中指出，“帝国政府还认为，只有在目前的消耗性的战争结束后，才能从事阻止未来战争的伟大工作”②，委婉地拒绝了威尔逊的和平调停。威尔逊的调停努力终告失败。

〔中立时期的美英关系〕 ·战爆发后，美英曾在许多问题上发生过争执。1909 年，德、法、奥、英、俄等 10 国在伦敦签署了海战法宣言，其中规定在战争期间禁止把食物和原料列为禁运品。英国议会未批准这一宣言。战争爆发之初，德国宣布在海战中遵守伦敦宣言，试图利用宣言的规定打破英国对中欧国家发动的经济战。然而，英国以未批准为由宣称不承担履行伦敦宣言的义务。

美国不断抗议英国的这些措施。1914 年 12 月 26 日对英国的照会中宣称：“非交战国家之间的商业不应被从事战争的国家干扰，除非这种干扰明显地是出于保护它们的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并且即便那时也只能做限于必要程度的干扰。”③ 而英国则认为干扰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并继续扩大它的违禁品清单。

不久，英国清除了德国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艇，并开始扩大它的控制面，以阻止中立国与同盟国的贸易。因此，美国政府开始与英国发生纠纷。直到 1915 年 2 月底，英国极力加强其海上控

---

①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 85－86 页。

②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 84 页。

③ 比米斯：前引书，第 134 页。

制体系，英国海军在北海布雷，对德国和欧洲中立国家设下很长的海军封锁线，并截获美国运载某些非禁运品[①] 特别是运粮食到意大利、荷兰和其他欧洲中立国以便转运德国的船只。

对于英国1915年3月实行的封锁，华盛顿政府表面上予以默认，曾于1915年7月14日在致伦敦外交部的照会中，表示美国将保持中立贸易权。10月21日，又给伦敦发出一份照会：抨击英国的封锁是“无效的，非法的和无防御力的”。开始，威尔逊坚持要完全尊重美国的商业权利。后来，他决定默认英国海事制度，保留美国权力以待将来裁决。只有英国在为危及美国安全的目的而战时，威尔逊才有理由试图中断英国从控制海洋中得到的那些利益。

为了防止禁运品流入中欧国家，英国海军甚至搜查美国邮船的包裹。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对个人航海自由的严重侵犯。蓝辛在抗议照会中说，美国政府“不能再容忍由于这些方法使美国公民遭受的以及继续遭受的这些恶行之辱。忍受这样一种无视法律的做法将为交战大国屡屡侵犯国际法打开了大门”。[②]

邮件争执尚未解决，1916年的“黑名单”事件又使美英关系紧张，并且达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1916年7月18日，英国提出一份黑名单——美国的87家公司被怀疑向德国提供过援助，结果英国禁止其臣民与美国进行贸易。据英国政府宣称，“黑名单”是禁止英国臣民帮助敌人的一种合法尝试。这种措施实际上

---

① 按照传统的国际法，在战争期间，物资分为三类：1，绝对禁运物资，即那些将直接用于军事的物资；2，附有条件的禁运物资，即那些容易作为军用的物品；3，非禁运物资，即粮食、原料和那些预定只作民用的物品。按照传统法规，交战国可以截获和没收绝对禁运物资；要没收附有条件的禁运物资时，必须证实那些物资将用于军事；同时，交战国又被要求允许非禁运物资运往敌对国家。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6年，补遗，第608页。

取消了列入名单的美国公司做生意的权利，一方面英国人拒绝与它们做买卖；另一方面未列入名单的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公司再也不敢与它们有业务往来。“黑名单”公布之后，美国舆论哗然，谴责之声见于各大报刊杂志。连强烈亲英的《纽约时报》也把黑名单事件描绘成“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最愚蠢、最不必要的行为”。甚至驻英大使佩奇也对之感到憎恶。[①] 1916 年 7 月 23 日，威尔逊向豪斯上校说道，“我对英国的忍耐到了尽头。黑名单事件是最后的稻草。……我们还能再忍受他们的不可容忍的行为吗？……我打算请求国会授权对协约国禁止贷款和限制出口”。[②] 9 月，国会在休会之前，投票授予总统对协约国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力。9 月 8 日，国会投票通过海军拨款法，规定建造 137 艘各类新舰只。威尔逊宣称：“让我们建立一支比英国海军更强大的海军，随心所欲地行动”。[③] 与英国的冲突成为威尔逊政府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1916 年的扩军运动中，威尔逊曾在圣路易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支海军像美国海军一样须控制如此广阔的防御区，因此，依我所见，美国海军应当成为举世无双、最完备的海军。”[④]

1916 年期间美英虽有冲突纠纷，但并未出现破裂局面。这是因为紧密的经济纽带和悠久的文化渊源已把两国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威尔逊政府充其量也只是施加压力迫使英国改变一下不利于美国的某些做法。英国则想利用其海上优势，对敌国严加封锁以“困死”德国，彻底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它清醒认识

①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 637 页。

②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 637 页。

③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 2 卷，第 316 – 317 页。

④ 罗伊·沃森·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 – 19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291 – 292 页。

到保持与美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在整个中立期间，美英争执虽曾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但最终还是求同存异，顺利解决，两国关系安然无恙。此后，随着战争进程的向前推移，美国中立政策的天平不断地倾向英法这一边。

〔美国宣布参战〕　1917 年 1 月 22 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强调美国的目的是实现“没有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和平，其结果是“无兼并和无赔偿”的媾和，因为只有这样的和平，才能获得持久的世界秩序。[1] 英国附和美国的建议。1 月 26 日，英国外交家威廉·怀斯曼代表政府说，只要德国愿意，英国准备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与它谈判。1 月 31 日，德国政府答复威尔逊的和平呼吁，宣布自 2 月 1 日起，德国潜艇将不加警告地击沉所有在英、法、意和地中海东部周围广大海域航行的交战国和中立国船只。对此，威尔逊“感到世界突然天翻地覆，东西旋转，无法保持镇静”。[2] 威尔逊别无选择，只有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希望卷入战争。

1917 年 1 月 17 日，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用密码致电德驻墨西哥公使称，“如果德美之间发生战争，提议与墨西哥结为军事联盟，德国为墨政府提供财政援助，支持墨西哥收回 19 世纪中期与美战争中失去的领土。电报还提到由墨总统卡兰萨出面邀请日本加入反美联盟”。[3] 显然，德国想利用美墨的紧张关系，使美国纠缠于西半球事务，以便减轻对中欧盟国的压力。这份电报被英国情报部门破译，2 月 25 日，佩奇将其寄给美国政府。

---

①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美国历史文献》，第 2 卷，第 126 页。

②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 2 卷，第 439 页。

③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第 128 页。

威尔逊阅后认为这是对美国尊严的侮辱和对美国安全的挑战，3月1日他授权将电报交付新闻界。电报公布，美国舆论大哗，反德浪潮席卷全国。齐默尔曼电报的公布使一些美国人免于参战的侥幸心理几乎荡然无存，直接导致美国走向战争。

此后，事态发展愈益严重，德国潜艇在海上击沉美国商船，致使大批美国人丧生，美国国内对德国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参战已是大势所趋。这时俄国国内又爆发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临时政府建立，政治前景隐晦不明。这也成了促使美国作出参战决定的因素。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在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为了美国的权利与荣誉”，必须对德国宣战。4月4日参议院以82对6票、4月6日众议院以373对50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威尔逊的战争咨文，美国正式参战，并无条件地站到了协约国方面。

美国与协约国的联合主要原因在于：在政治上，美国人民由于文化上和政治上与英国和法国的民主制度比较接近因而产生一种天然的联合倾向；在经济上，由私人贷款促进的在美国企业与协约国订购军火之间的经济联系控制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并导致威尔逊政府作出参战决定；在军事上，德国的潜艇战早已构成对美国安全和美国人生命财产的威胁，是促成美国参战抗德的重要因素。

三、战时美国

〔战争动员〕　美国公众对于参战反应不一，大部分人是勉强接受这一解决方法的。社会党人、极端激进派、许多进步派和德裔及爱尔兰裔美国人反对美国参与欧洲战争，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的介入是威尔逊总统造成的。

为了让全体美国公民理解美国参战的目的，威尔逊总统在参

战决议通过一星期后，设立由丹佛进步记者乔治·克里尔领导的宣传委员会。克里尔兼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春花怒发式想像力、层出不穷的独创性和无限饱满的干劲”。[①] 他最初采取的行动是建立自愿的新闻检查制，既能使公众非常了解时局，而又保障了高度机密的消息不泄露。该制度进行得非常顺利。随后，他动员几百名演说家、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进行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宣传活动。“全国最高明的插图画家们画招贴画号召年轻人入伍，号召年纪大的人购买‘自由债券’。志愿‘民兵’在教堂、学校和剧院里向听众发表爱国演讲。关于威尔逊的战争目标的报道不仅充斥美国，也大量到欧洲和亚洲”。[②] 宣传委员会一方面着重宣传美国只是为促进全世界自由与民主事业而战，另一方面用骇人的笔调描绘德军的威胁是企图掠夺欧洲并将征服世界。

克里尔的宣传委员会是在美国人被“不忠”、“间谍”和“破坏”的谣言与罪名的恐吓下，乘机向他们灌输参战和安全意识的。克里尔宣传和诸如国家安全同盟和美国保护同盟的建立，在美国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狂热。每个州都有公共安全委员会，其分会遍及各县各市。它们对德裔美国人实行恐怖统治，尤其是在蒙大拿、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在他们的宣传下，“美国人禁止演奏德国音乐，禁止教授讲德语，将德国泡菜改称为‘自由白菜’；在辛辛那提，甚至把椒盐卷饼从酒吧中午餐时随意小吃的柜台上一概拿走”。[③]

---

① 塞缪尔·莫里森，亨利·康马杰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②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页。

③ 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前引书，第274页。

〔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统制〕　政府在经济上为应付战争危机所作的努力，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国经济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受到国家的控制，在战争期间，差不多有20－25%的生产是为适应战争需要服务的。经济统制始于1916年10月设立的国际委员会。1917年2月，军需品标准局成立，其任务在于规定军需品采购的标准。1917年3月，又设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军需品总局，负责协调美国海陆军和协约国采购军需品事宜。美国对德宣战后，对军用物资的需要增加，导致美国海陆军以及协约国常常越过军需品总局而各自安排军事订货，结果造成了一片混乱。

由于军需品总局难尽其责，1917年7月国防委员会成立了战时工业局，担负有系统地在整个经济的工业部门制定优先分配和增加生产的计划。只由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来负责战时整个经济动员与军事努力的一体化现象，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年8月又成立协约国采购委员会，负责协调协约国和美国海陆军的军需品采购。

战时工业局开始时依赖私人工业的自愿合作，但不太成功。例如：新泽西锌业公司总裁、锌业委员会主席爱德加·帕尔默给威尔逊写信表示，他现在必须或者离开委员会，“或者禁止我的公司卖锌给政府”。[①] 不久，政府发现对自愿合作的依赖，难以满足美国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需要，保证对盟国有秩序的大量供应。由于缺乏强迫私人公司合作的强制力量，战时工业局的官员便主张把军事努力置于更强大的政府领导之下。由于这些官员本身就是私人企业主，所以他们寻求既使用强制权力机构，但又不

① 肯尼迪：《在这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社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8页。

危害私人经济力量的方式。

1918年春，为对抗强制权力，威尔逊签署立法，取消分配优先次序、核定物价和命令征用制造工厂的行政权力。他把价格核定权授予另一专门委员会，以致决定权不再属于战时工业局。“战时工业局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正式权力”。[1] 战时工业局在伯纳德·巴鲁克领导下，建立了一些职能部门，负责调节、资源保护、优先调拨物价、原料需求、劳工以及与盟国采购的协作。“1916到1920年间，石油生产和炼制保持与需求量一致或超过它，烟煤年产量上升到5.68亿多吨，汽车生产增加大约20%；但棉纺业使用很少的原材料，钢锭的总产量实际上静止未前”[2]

美国的经济动员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威尔逊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官方与美国主要工业公司的紧密合作。这样，在美国参战的19个月中，美国政府才能保证连续不断地向盟国供应军需品和其他商品。战时的实践，特别是战时工业局的经验，使很多私人企业主相信“政府控制”未必意味着可能是敌意的或有损于私人利益的控制。美国对经济的控制还扩大到粮食和燃料。

〔政府对粮食和燃料的管制〕　一战期间英国和其他协约国粮荒严重。1917年4月20日，赫伯特·胡佛曾电告美国政府协约国的粮食情况已“非常严重”；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都仅有一个月左右的存粮。[3] 5月19日，威尔逊总统任命胡佛为食物管理局局长。6月19日，胡佛在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欧洲食物管理局天生是专制的，但……美国的食物政策应该建立在完全不同于欧洲的理念上……我们将注重人民的志愿努力……我们建议动

---

① 肯尼迪：前引书，第133页。

② 爱德华·柯克兰蒂：《美国经济生活史》，纽约，梅瑞狄斯公司，1969年，第470页。

③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626页。

员人民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牺牲精神”。[①] 为此，食物管理局制订了一个防止浪费和减少稀有食物消费的宣传教育计划。对食糖、小麦、肉类、黄油和其他食品实行有效的管制，并鼓励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同时，采用各种措施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当时报纸曾有如下的一段报道，可见当时实行该计划的具体情景：

“根据食物管制的新条例，每个家庭成员每月配给面粉不超过6磅。这一点你去购买粮食时务请记住。请勿找事，要求粮店多卖一些，因为这对你、对他都会引起很大麻烦。

由于受到粮食供应的限制，原定下星期日在鲁克附近的自由大会堂举行的全日演唱宴会决定取消。

下面是本县食物管理科长芬德利为你们规定的今后四个星期的食谱，务请严格遵守：

星期一，每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二，每餐不吃肉；

星期三，每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四，早餐不吃肉，晚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五，早餐不吃肉，晚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六，每餐不吃猪肉，早餐不吃肉；

星期日，早餐不吃肉，晚餐不吃面粉制品；

食糖务必随时节约使用。喝咖啡不要放糖，除非已经有了长期养成的习惯，但在这种场合下也只能放一匙。

这些规定适用于家庭、旅馆、饭店和其他饮食点。”[②]

食物管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918年美国能出口3倍于它的正常份额的肉、糖和面粉供应协约国。

---

① 肯尼迪：前引书，第118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627页。

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民用和军事工业都出现了严重的燃料荒。几乎所有的燃料供应都短缺，其中最重要的是缺煤。1917年8月联邦政府设立燃料管理局，负责增加燃料生产、进行燃料储备、管制燃料分配、规定燃料的最高价格、减少燃料消费等。1918年4月建立了一般家庭用煤的定量供应制度。同年1月还实行了对燃料油分配的控制办法，以后又把控制范围扩大到天然气和煤油。

〔对运输的战时管制〕　美国对德宣战时，德国炸沉美国轮船的速度超过了美国造船的速度。为了保证稳定的运输力量使供应品能在公海上运送，1917年4月，美国航运局建立附属机构——应急船队公司（资本5000万美元），负责监督造船计划的执行和经营政府船只的航运业务。公司形式上是私人的，但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由政府出资购买它的股票，政府通过它建造百万吨船只。直到1918年查尔斯·M施瓦布成为公司董事长，应急船队公司才成为一个独立企业。应急船队公司最大的项目是从事建造总吨位1740万吨的3148艘船只。大约240万吨到停战时已交付使用；但公司生产继续到1919年。战争开始时美国商船从事对外贸易的几乎不超过150万吨；而到1920年数字高达1350万吨。[①] 国会授权总统将60万吨德国商船扣在美国港口。1917年8月，政府征用了正在建造中的所有钢铁船只，从而增加了30万吨的吨位。最后，政府还接收了所有2500吨以上适合于使用的美国船只，但允许船主自行管理行使。

陆上交通条件较好，政府不必重新创建运输网。“铁路在、铁路的调整者——州际贸易委员会也在。困难是这一体制尚未适

①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73页。

应战争紧急情况。"[1] 各条铁路的运输量因从内地运输大批军队和物资到大西洋港口而空前增加，铁路公司一直没有适当地补充设备，车皮不能满足战争的迫切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于 1917 年 4 月成立战时铁路局，其领导人员都是各铁路公司的经理或董事，任务是在分配设备和其他协调活动方面取得合作，以支援铁路系统为战争所作的努力。私营铁路公司虽然乐于参加，但托运人因私人线路不按协定办事、铁路运价大幅度上涨而不满。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917 年 12 月，威尔逊总统下令政府接管全部铁路。1918 年 3 月，国会颁布了一项用 5 亿美元周转基金来支援铁路营运的法令，到 1920 年 3 月 1 日把铁路交还原主。同时，国会把决定运费的权力交给铁路管理局。政府接管铁路是一项紧急措施，是使铁路业满足战时需要的必要作法。它使各终点站、设备和各机修厂能联合使用；车辆载重能力的新规章保存了资源，保证了铁路的高度综合使用，使铁路能更有效地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1918 年年中，联邦政府还接管了全国的电报与电话系统。

〔战时财政和税收〕　美国参战以后，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美国不仅要维持自己参战的费用，而且还要为协约国的开支负责。早在 1917 年 7 月，英国财政大臣诺斯克利夫勋爵就曾通知豪斯上校，"我们可用以对美国付账的财力业已枯竭。除非合众国政府能够充分满足我们在美国的开销，……否则协约国的整个经济结构必将崩溃。"[2]

1917 年 4 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自由贷款法令"，授权财政部长经过总统的批准，可以在 100 亿美元的范围内给各盟国政

---

①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73 页。

② 莫里森、康马杰等著：前引书，第 497 页。

府提供贷款。此后，私人贷款停止了。据官方估计，1917 年 4 月—1919 年 10 月美国所支出的全部直接战费（包括贷给盟国的 95 亿美元在内）大约为 350 亿美元。[①] 战前国债只有 10 亿美元，到 1919 年 8 月底猛增到空前的 254.845 亿美元，[②] 其中约有 191 亿美元为自由公债和胜利公债。

美国政府筹集用于国内和贷给协约国的巨款，主要靠贷款解决。1917 年 5 月 14 日，财政部公开发行第一批总额为 20 亿美元、利率为 3.5% 的长期公债，之所以选择 3.5% 的利率，麦卡杜解释说，"这个利率比通常储蓄银行的利率低得多。因为如果利率较高的话，恐怕会出现储金大回收局面。"[③] 这批公债被公众立刻认购一空，认购额超过了实际发行额。截至 1918 年 11 月 11 日，财政部共发行了 4 批自由公债，利率从 3.5% 到 4.5% 不等。停战后发行了一次"胜利公债"（即第 5 次）。据估计，战时公债中大约有 70 亿美元，即总数的 30%，是由收入在 2000 美元或 2000 美元以下的人认购的，大约有 100 亿美元是由收入在 2000 美元以上的人认购的，其余的是由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家公司认购的。[④]

战时财政不仅依靠大量借款，而且还靠征收新的、更重的税款。1916 年 9 月国会通过增税法，是该计划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1917 年 10 月，国会又通过了一项增加联邦收入的税法，个人所得税从 15% 提高到 67%，而且，超额累进所得税的起征点

---

① 罗伯特·莱基：《美国战争》，第 1 版，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8 年，第 642 页。

②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67 页。

③ 肯尼迪：前引书，第 101 页。

④ H.U. 福克纳，H.G. 沙伊贝等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310 页。

从2万美元降低到5000美元；公司所得税从2%提高到6%；地产税率提高为2%—25%；超额利润税提高为20%—60%，但军火制造商利润税率却从12.5%减为10%；还提高了酒税、烟税、车辆牌照税、娱乐税等的税率。

1918年6月联邦政府提出了另一项增税新建议并于1919年2月24日成为正式法律。它规定1918年个人所得税率为6%—12%，规定1919年收入的正常个人所得税率为4%—8%；超额累进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65%，这样就使正常税率和附加税率加在一起有可能对富豪征收高达77%的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提高到12%，超额利润税率提高为30%—65%[①]。这条法律明确表示，增税是暂时的，税率以后要逐步降低。

联邦税收提高的税金额从1914—1916年的每年不足8亿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42亿美元，到1919年6月30日为止的这一财政年度为46亿美元。所得税和战时利得税共占税收总数的2/3[②]。

最终“大约有2/3的直接战费是用贷款的方式解决，其余约1/3是用当时的税款支付的”[③]。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筹款办法是比较妥善的；关税税率没有提高；税收的主要部分是靠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

但大量发行公债和大量的黄金储备（到1919年，世界的黄金存贷的1/2在美国）导致美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政府和私人借款增多，银行存款和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量约增加50%，流通速度也加快。因此，“1916—1920年间，总货币供给

①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66页。

② 福克纳、沙伊贝等著：前引书，第312页。

③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67页。

增加大约75%，消费品价格指数几乎增加一倍"。[1] 美国人民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战时劳工〕　1917年美国参战前，国内就存在劳工缺乏的问题。1914年到美国的移民为121.848万人，1915年移民数是它的1/4，1918年移民数仅是它的1/10。[2] 美国参战以后，由于老百姓被征入伍，工农业发展遇到了困难。外来移民的缺乏，导致黑人、妇女开始参加工业劳动但"战时任何一年，女工最大人数均未超过100万"。[3] 铁路上的职业技术性工作第一次雇佣了黑人。在铸造厂、炼钢厂、加工包装厂、建筑公司以及其他工业部门，黑人也找到了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

由于劳力持续缺乏，1917—1918年期间，普遍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按美元计算的工资也迅速提高。然而，物价上涨也很快。因此，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增加很少。

美国参战后不久，威尔逊总统设立专门的调停局，负责管理与作战部订有合同的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这些调停局（每个调停局包括一名由劳联指定的代表）努力使增加工资与生活费指数的上升保持一致。

由龚伯斯领导的劳联，拒绝和平主义的、反军事的劳工传统，他向众议院表白，"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正义和理念，工人们将不会放弃履行自己提供服务的职责"[4]，这就等于说，有组织的劳工或其领导者作出"不罢工"的誓言。劳联成员总数从1915年的256万增加到1920年的503.4万。[5] 与此同时，威尔逊

---

① 肯尼迪：前引书，第103页。
②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70页。
③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71页。
④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71页。
⑤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72页。

政府开展了一场根除、破坏激进工会，特别是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运动。好战的反激进的雇主们，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爱国主义为借口，攻击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

1918年4—5月，战时劳工局和战时劳工政策局成立。战时劳工局是一个受理劳资纠纷案件的准司法机构。战时劳工政策局是制定关于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总政策和总方针。尽管有劳联的合作，但政府的努力并不足以阻止争端或制止罢工。在19个月的战争期间，美国大约发生了6000起罢工事件。

〔战时的公民自由权〕　在极端危急关头，美国政府常常试图防止国内外两方面敌人。因此，威尔逊政府既要强迫士兵在国外作战，又要惩罚那些企图阻挠作战努力或援敌济敌的人。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为了民主而使世界稳定的战争，看来已削弱了对民主进程的信心”。[①]

1917年6月15日的总统对付反战的《间谍活动法》规定：对故意编造假报告帮助敌人的人、煽动武装部队叛乱的人、或企图妨碍征兵或征兵工作的人，判处监禁或罚款；监禁可长达20年，罚款可高达1万美元。该法授权邮政部长对于他认为属鼓吹叛国或强行抵制法律的出版物有权拒绝投送。随后，《美国社会党人》被禁止邮寄；1917年8月和10月社会党的主要刊物《群众》和《密尔沃基导报》被禁止。《间谍活动法》成了压制民主、消除异议和批评政府的工具，“鼓吹用重税替代发行公债，即使在最高法院还未认可征兵的情况下说它违宪，说击沉商船合法，主张在宣战前举行公民投票，声明战争违反基督教义等等，均属犯罪。人们曾因批评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而受到处罚。”[②]

---

① 布莱克著：前引书，第293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239页。

随着战争的进展，政府控制思想和言论的权力逐渐扩大。国会于1917年10月6日通过的与敌通商法增加了政府对外语印刷品进行检查的广泛权力。

不仅对言论进行控制而且破坏激进的工会组织。1917年9月5日，联邦特务们在整个西部袭击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办事处，逮捕该工会领导人，被审讯、判刑和监禁者近100人。1918年4月20日国会通过惩治破坏活动法，将矛头对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并将故意破坏战争物资、公用事业和运输设备规定为联邦罪。[①] 1918年5月16日总统签署惩治叛乱法，该法“扩大美国控制言论与出版物的权力，禁止对美国政府形式、旗帜或制服的各种背叛、玷污、下流或辱骂的议论，也禁止任何不论用何种方式阻碍战争努力的言谈”。[②] 根据间谍活动法与惩治叛乱法，共有2168人被起诉，1050人被判罪；因威胁总统而犯罪的有65人，因实际破坏活动而犯罪的有10人。其中，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惨遭迫害。尤金·德布斯由于表示反战情绪而被监禁十年之久，这是其中最典型的压制民主自由的案件。

战争鼓励了美国政府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侵犯和对工人组织的镇压，削弱了国内的改革运动，却保障了美国武装力量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四、美国的军事行动

〔战前的国内军事动员〕　美国宣布参战以后，威尔逊总统及其军事顾问都认为，征兵是征集一支巨大军队惟一有效和民

---

① 即不能因州法律而得到豁免的罪。

②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第146页。

主的方法。在宣战之前，陆军参谋长休·斯科特将军曾向陆军部长贝克进言，必须通过征兵而不能依靠招募志愿兵来建立军队，[①] 威尔逊采纳这一建议。1917年5月，众议院通过《选征兵役法》，要求所有21岁至30岁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记应征。参议院最后通过的选征兵役法还授权威尔逊对志愿部队一事可相机处理。

1917年6月上旬，900多万男子进行登记，由陆军部委托的地方官员对征兵进行监督，全国秩序良好。1918年8月31日，国会扩大应征年龄限制，将所有18至45岁的男性都包括在内。大战结束前，共有2400多万男子进行了登记，近300万人应征入伍。常备正规军、国民警卫队、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均仍采取募兵制招收志愿人员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人员总数近500万人。威尔逊总统任命约翰·潘兴将军为美国远征军司令。"黑杰克"潘兴是一位干练坚强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曾参加和指挥过与阿帕切人、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的战争。

美国刚宣布参战，协约国军事代表团就纷至沓来到白宫恳求提供援兵。潘兴将军立刻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法国，以鼓舞协约国士气。然而，威尔逊和潘兴都拒绝接受欧洲的建议，即将美国军队混编在需要兵员的协约国部队里。结果美国军队虽在统一调动下同其他国家的军队协同作战，但美国军队仍然保持单独编制和独立地位。因为美国希望有选择自由，并且不愿与协约国同流合污，追求谋取私利的战争目标。所以，美国坚称自己在战争中是"参战国"，而不是"协约国"。

〔美国海军和军事行动〕　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卸

① 莫里森、康马杰著：前引书，第507页。

任时，美国海军实力已迅速增强。战争期间，美国海军得到迅速发展很快位居世界第二位。1914年美国海军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这一年批准建造了“新墨西哥”号战列舰，军舰排水量达32000吨，装有12门14英寸大炮，同时下水的还有“内华达”号，它是美国第一艘以燃油机为动力的战列舰。[①] 但这时美国尚未进入战备状态。“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后，美国加速了海军建设步伐。1916年通过海军法案，进行扩军运动。

1917年4月，以阿瑟·鲍尔弗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和法国代表团先后到达华盛顿，他们预料美国一定会提出某种要求作为美国充分参战的条件。鲍尔弗携带着协约国之间缔结的、在最后胜利时各国实行分赃的秘密条约。但是美国热心于首先打赢战争然后才谈和平。1917年4月24日，国会决定拨款70亿美元，其中30亿美元将贷给协约国政府。1918年11月11日停战之前贷款总数迅速增加到70.77亿多美元，以后又增加了21.7亿多美元。[②]

1917年以前，德国不打无限制的潜艇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潜艇。到1917年2月，德国潜艇数量增加到103艘。德国海军部曾推测：如果每月击沉60万吨船只，6个月内就会使英国屈服。1917年内，德国潜艇共计击毁650多万吨船舶，而美国、协约国和中立国所有造船厂一共只建造了270万吨。因此，英国为自己运送给养已十分困难，更无力守卫美国向欧洲输送补给的航线。1917年4月10日和11日，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参谋人员与英法海军将军们进行商谈，初步划分职责范围。美国海军在西半球防御和巡逻，并协助英国巡逻不列颠群岛周围的水域。第一批6艘驱逐舰在于5月4日到达爱尔兰的昆斯敦。之后3个月

① 丁朝弼编著：《世界近代海战史》，海洋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

② 参见比米斯：前引书，第159页。

内，共47艘美国驱逐舰驻守在欧洲水域。[1]

建立护航制和加强反潜艇战斗，是控制德军潜艇的两个决定因素。美国西姆斯海军上将主张使用驱逐舰和其他兵舰为横渡大西洋的商船护航。而英国商船船长却喜欢单独航行而不愿意组成船队在海军统率下航行。1917年夏天，西姆斯说服了英国伙伴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行事。美国驱逐舰在11月17日首次摧毁一艘德国潜艇，新采用的商船护航策略和进攻性的海上巡航将协约国航运吨位损失从88.1万（4月份），降低到了28.9万吨（11月份），自1918年4月以后，英国每月损失从未超过20万吨。

美国海军的又一项任务是运送美国远征军。由于有了必要的反潜护航力量，把美国部队和补充物资安全运到法国才成为可能。1917年7月1日，美国海军部共有7艘军船和6艘货船，共计9.4万吨。到1918年11月，它已建立起一支具有143艘舰艇的巡洋和运输部队，总计325万吨，共运载士兵91万多人到法国。[2] 1918年，当运输任务紧张时，每艘可以利用的英国运输船也都被迫投入横越大西洋的渡运活动。英国船共运载士兵100多万。此外，美国海军还采取各种办法对德国潜艇队加压进逼。一支由120艘猎潜舰艇组成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与奥地利海军展开战斗。海军飞行员驾驶水上飞机，在欧洲参与战斗。

1918年6月，美国海军首创实施横断北海（从苏格兰到挪威）的巨大规模的水雷布防，以封闭敌方潜艇的出路。据估算，如果要把北海的通道都严密封锁，至少需要40万枚水雷，英国海军部认为这是力所不及的。后来，美国发明家布朗发明了天线

---

① 莱基：前引书，第633页。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227页。

触角水雷。使用这种水雷，封锁北海通道只需10万枚水雷。[1]后因大战很快结束，这种水雷的效能未得到充分试验。在布设水雷壁障之前，海军少将林·罗德曼率领美国战斗舰队补充了若干艘驱逐舰后奉调前来奥克尼群岛，以加强斯卡帕弗洛港[2]的英国主舰队。两支舰队结合起来不仅将德国的外洋海军截堵在港湾内，而且严重挫伤其士气，成为促使德国在1918年11月投降的一个因素。

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共有2000多艘舰只、53.3万名在役官兵。到1918年11月，美国舰艇巡逻着西半球的遥远地区，并在远东与日本、英国军队合作；同时还有843艘舰艇、20万官兵，或者在欧洲水域服役，或者运送军队和给养前往法国。

由于坚决主张实行护航制，美国海军为确保协约国与美国海上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将驱逐舰投入反潜艇战斗，美国海军扭转了第一次大西洋之战中反潜艇作战的形势；而且，由于运送近半数远征军和几乎全部军用品到达法国，美国海军使协约国打败德国的计划提前到1918年实现。

〔美国陆军和军事行动〕　陆战形势不同于海战。1917年6月，第一支美国分遣部队，即第一步兵师抵达法国，在美国独立纪念日（7月4日）那天穿过巴黎街道举行检阅游行。潘兴将军检阅了到达法国的第一支美国军队。第16步兵团的一个营精神抖擞地通过巴黎的街道，近百万巴黎人狂热地投掷鲜花，拥抱美国步兵，尽情地欢呼。美国士兵是一支充满热情但缺乏训练的新兵。“这些人甚至连扛枪也不会。他们带着装了子弹的来福枪，

---

① 内森·米勒著：《美国海军史》，卢如春译，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220－221页。

② 奥克尼群岛在苏格兰东北面，斯卡帕弗洛港位于南奥克尼岛，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海军基地。

就更加危险。”[①] 但是对于厌战的法国人来说，那些生气勃勃的美国军队是鼓舞人心的。1917 年年底，法国境内已有 20 万美军。

1917 年下半年，军事局势急剧转变。德国发起攻势击溃了意军、摧垮了俄军；10 月意军在卡波雷托败北，奥地利军队长驱直入弗留利平原；协约国不得不从西线急调部队以阻遏奥地利军队。协约国急需大批美军增援。11 月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宣布退出战争，致使数十万德军得以转调西线。1918 年春，西线德军已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德国统帅部信心十足地准备直取巴黎结束战争。协约国慌忙组成最高作战委员会统一指挥抵抗，并敦促潘兴增援，但遭拒绝。在德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协约国战线溃不成军，此时威尔逊总统才同意任命法军元帅费迪南·福煦为最高统帅，潘兴将其 4 个可作战的师交由福煦统一指挥。

1918 年 4 月，威尔逊总统在巴尔的摩说，美国人必须使用“武力，最大限度的武力，毫不吝惜和不加限制的武力，能恢复世界的法律并消灭一切自私统治的正义的和胜利的武力”。[②] 给养运输立即给部队运送让路，新建造的运输船舰赶紧投入使用，美国士兵不久就大批投入战斗。在 1918 年 3—10 月的危急月份里，总计共有 175 万名美国士兵到达法国。德军总司令冯·鲁登道夫当时写道，“美国就这样成了在这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③]

1918 年 5 月 27 日夜，德国发起了埃纳攻势，打得法国第六军团猝不及防，节节败退；6 月 3 日，德军再次进攻到离巴黎只有 56 英里的地方——马恩河。法军向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

---

① 科夫曼：前引书，第 4 页。

② 转引自帕特森：前引书，第 399 页。

③ 莫里森、康马杰著：前引书，第 511 页。

求救，美军第二师展开短兵相接的血战，制止了德军的进攻。在随后的反攻中，美国第二师及其所属海军陆战队向德军层层设防、重兵把守的贝莱奥森林发起进攻，美国反复向前推进，经过3周血战，终于把德军赶出了森林。在这次战斗中，美军共伤亡9777人，其中海军陆战队伤亡5383人。

德军企图在更多美军到来之前孤注一掷，速战速决。6月德军又在兰斯与苏瓦松之间的马恩河扇形地区发动进攻。幸好美国人及时到达法国，8个美军师参加了法军的反攻。8月上旬法美联军肃清了扇形地区的全部德军。潘兴指挥的美军第一军接管了圣米耶尔附近的南部战线，并于9月独自击溃了那里的德军。同月下旬，潘兴对凡尔登与色当之间的德军防线发动进攻。在默兹－阿尔贡战役（始于9月26日）中，美军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美国部队参战以来所进行的最大一次战斗：战事为期40余日，共投入兵力120万人，飞机840架，坦克324辆。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伤亡11.7万人。[①] 此次战役的胜利，加上英法军队在北部与中部战线分别反击成功，为停战谈判准备了条件。

早在8月间，鲁登道夫就已预感到德国的前景不妙，战事已临近结束。协约国兵力已占优势，福煦正计划在1919年春发动新攻势。10月2日，鲁登道夫通知德国政府，德军已难以支持48小时。次日，德国马克斯亲王向威尔逊总统首次提议：要求以威尔逊的“十四点”为基础进行议和。协约国方面在外交上又与德国周旋一个月，最后利用德国处境更趋恶化的时机才指示福煦与德方谈判停战。其时，德国海军发生兵变，使得德国无力继续抵抗。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了。

---

① 莫里森、康马杰著：前引书，第51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争之一，双方伤亡惨重。广大无辜百姓更是深受其害。美国军队为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人民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除了成千上万士兵和人民牺牲外，幸存的“美军、同盟军与敌军一样都患上了严重的弹震症，即一种由于作战疲惫，伴随毒气和战壕里的寒冷、泥泞、潮湿污秽而发生的肺结核病”。[①]

然而，战争刚结束，战场上的硝烟尚在弥漫，阵亡将士尸骨还未寒彻，发动战争和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领袖们就已在为分配所谓“战利品”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了。

五、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计划的提出〕　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企图取得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充当世界和平仲裁者从来就是美国决策者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战争进行到 1917 年底，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利用沙皇俄国的崩溃、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在战争中两败俱伤的形势，收拾残局；迫使他们在战后按照美国的设想建立世界和平，企图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宰。十四点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自参战以来，美国就十分关注战后世界和平方案，而且了解协约国已经签订了瓜分德国领土、包括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秘密条约。但是，美国不愿为英法等国的利益付出流血的代价。威尔逊声称：“美国不能为盟国的秘密条约而作战，为它们瓜分世界的目的而作战；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必须使盟国屈服于它的

① 布卢姆等著：前引书，第 268 页。

压力之下，从而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① 显然，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实现美国的战后和平蓝图。

1917年8月以后，威尔逊政府就开始准备美国的具体战争目标与和平纲领。威尔逊一方面拒绝与德国统治者和解；另一方面又企图使德国自由主义者能在战后新世界组织中实行合作。对协约国，威尔逊警告说，“惩罚性的赔偿、对帝国的直接和排外性的自私经济联盟的建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幼稚可笑的，最终比无用还糟糕，不能成为任何类型的和平的适当基础，至少不能成为一个永久和平的适当基础。”②

9月，威尔逊特意建立“调查委员会”，专门研究交战国的战争目标，并针对性地制定美国的战争目标，企图做到有的放矢。这是威尔逊政府准备提出美国战争目标、和平纲领的第一步。10月下旬，威尔逊派豪斯赴伦敦和巴黎参加协约国之间军事合作问题的讨论，并让他在适当时机促成美国与协约国在战争目标上的合作，以便加强对德奥的和平攻势。但众盟国各怀居心，豪斯未能取得成功。

在没有取得协约国合作的情况下，威尔逊政府只好单独行动，决心公布美国的战争目标，在外交上展开对同盟国家一次强有力的攻势。正如豪斯所言，这样做“我们就容易让德国知道我们的打算，也能给所有德国人带来一种他们现在感觉不到的安全感。在中欧国家，全部军事宣传旨在造成对肢解和经济统治的担心。如果能够使德国人民认识到将会得到我们考虑的这样一种和

---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871－1918）第4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② 转引自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平保障时，……军国主义的理由将不攻自破”。[①] 但是威尔逊由于顾虑重重未敢贸然行事，然而他并未放弃这一打算。1918 年 1 月 5 日，豪斯上校致电贝尔福说：“总统希望我让首相和阁下知道，他认为现在必须发表某一具体声明，以反击德国的和平建议。”[②]

1917 年 10 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的和平倡议迅速在美英等国引起巨大反响，世界各国热爱和平的各阶层人士都纷纷谴责协约国，并强烈要求他们对苏维埃的和平倡议作出积极响应。1918 年 1 月 3 日，威尔逊对卸任的英国大使斯普林·赖斯说，面对国内的和平呼声，“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呼吁继续得不到答复，如果丝毫不去抵抗它，那么显然它的影响就会扩大和加强。”[③]

苏维埃政权为揭露协约国进行战争的真正目的，决定公布沙俄政府与临时政府同英法等国缔结的秘密条约。这些秘密条约的披露将打破威尔逊一向宣称的这场战争的“神圣性”，如果威尔逊政府对此不作出反应，必将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利影响。1917 年 12 月 1 日，威尔逊致电豪斯，“我们的人民和国会将不会为任何交战国的任何自私目标而战，……我认为，冷却美国的热情将是致命的错误，所有人都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④] 威尔逊认为公布美国战争目标的时机已到。

总之，威尔逊打算公布美国战争目标由来已久，他的动机首先是回答苏维埃政权的和平建议以使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其次，这一计划是对中欧国家发动的一次和平攻势，揭露德国发动战争

---

① 转引自王晓德：前引书，第 214－215 页。
②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 45 卷，第 486 页。
③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 45 卷，第 456 页。
④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 45 卷，第 176 页。

的真实目的；再次，可以巩固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正义性”的信任，以稳定国内的民心，同时也要协约国放弃其对美国不利的战争目标，使战争符合美国利益。

〔计划的主要内容〕　1917年12月中旬，应豪斯上校的要求，调查委员会为威尔逊总统准备了一份关于战争目标与和平条款的备忘录，并认为现在颁布一个自由主义纲领对美国十分重要，“美国发动的这场强有力的自由攻势将大大刺激美国人在战争中的自豪感和兴趣，使政府保证能得到希望用理想主义解决战争的美国广大人民的支持”。[①] 12月23日，威尔逊在这份备忘录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最后形成了十四点计划的蓝本。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了他的十四点和平宣言，宣称“世界和平的纲领就是我们的纲领”。具体内容如下[②]：

1. 公开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国际谅解。

2. 无论和平与战争时期，公海航行绝对自由。

3. 尽可能排除一切经济上的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

4. 充分地相互保证各国军备应缩减至足以维持国内安定的最低限度。

5. 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时，须以诚相见，绝对公正，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的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与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

6. 撤出全部俄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提供俄国以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不受阻碍的机会，对它的需求和希求的，给予一切帮助。

---

①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45卷，第468页。

② 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前引书，第148－149页。

7. 从比利时撤军并使其复国。

8. 撤出法国所有占领区并恢复原状，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

9. 调整意大利边境。

10. 奥匈帝国的人民应获得自治的机会。

11.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境内占领军撤退，巴尔干诸国的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由国际保证。

12. 承认土耳其帝国内土耳其部分主权，但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应获得绝对的自治权，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

13. 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由国际章约予以保证。

14. 必须根据旨在不分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的专门盟约。

十四点计划构成了威尔逊政府战后对国际秩序安排的基础。上述十四点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点，是整个文件的核心，反映美国企图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的要求。第六点涉及俄罗斯问题，即第二部分，反映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立场。第三部分包括第七至第十三点，涉及欧洲十几个国家的领土和民族问题的处置。第四部分，即第十四点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以保证各国都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随后，威尔逊不断对这一计划进行补充，强调美国对战后世界承担的特殊责任。1918 年 9 月，威尔逊又提出和平方案的民族平等、共同利益、国际联盟、国际经济合作、公开外交等五项原则。显然，美国总统的心愿就是以世界领袖自居。9 月 20 日，威尔逊说："这是一场由美国人民授权扮演一个独特和崇高角色的战争，因为他们无任何自私目的，为永远是我们自己国家生活

基础的原理与理想而战。我们正在试图给世界送去自由和良知以及无私服务于世界的礼物。”[①]

十四点计划发表后，美国国内反响强烈。1月9日《纽约论坛报》的一篇社论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总统向整个世界创造和具体化美国在这场最大悲剧中的作用。……他确定了美国世界政策和整个文明世界的国际政策的理想。”[②] 这反映了当时的主流舆论，虽然也有不同声音。欧洲各国由于战争目标不一，对威尔逊的讲话反应也不同。协约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决不愿意让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来决定一切，“威尔逊是廉价买到了和谈桌上的席位”，[③] 它们可以听取美国意见，但不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处理和平问题。其中，英国认识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美国正在取而代之，所以反对最为强烈。威尔逊的讲话在意大利也导致强烈的不满情绪。

但美国不管欧洲盟国的“不同声音”，我行我素，一意孤行。1918年9月和10月，威尔逊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就停战协定交换照会，更使协约国愈益不安并对十四点计划持坚决保留态度。为了“回敬”协约国的“保留”，威尔逊暗示美国可能与同盟国谈判单独媾和，同时豪斯也打算采取经济强制手段。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英、法、意遂在11月的停战协定中，勉强同意以十四点为基础开始和平谈判。但是分歧犹存。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从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纲领中看出了暗藏的杀机，他们坚持在列宁的领导下，揭露战争的非正义性，

---

①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51卷，第81页。

② 王晓德：前引书，第220页。

③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400页。

致力于摆脱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中欧国家对威尔逊1月8日的讲话反响较大。尽管德国政府认识到十四点计划并非完全不利于德国，但如果同意以此作为未来交战国媾和的基础，但德国独霸欧洲的欲望将永成泡影，而且还会丧失一些领土，所以它婉拒威尔逊的建议。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交战国掀起轩然大波，没有实现他的既定目标。双方依然都想在战场上取胜，进而在谈判桌上强迫对方接受有利于己的和平条款。但是威尔逊没有放弃这个“心愿”，不断向世人推销美国称雄世界的蓝图。

大战末期，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实力。欧洲国家在结束战争和战后建设问题上，尽管出于无奈，但都不得不依赖美国，所以协约国集团内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还是同意以美国提出的“十四点”作为对德和平谈判的基础。

〔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　　1918年同盟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德帝国主义仍想垂死挣扎，3—7月间，德军倾其全力发动了5次攻势。结果两败俱伤。幸亏美国运送越来越多的军事设备、弹药和军队到达欧洲，协约国才实力大振。7月18日，联军在马恩河、圣米耶尔和亚眠三个地带开始大规模反攻。

1918年8月13日，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鲁登道夫、宰相和外交大臣等举行会议，讨论战局。鲁登道夫说，“德军无力在前线展开攻势，凭借防御行动固守阵地也不可能。应当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①]。10月初，英军突破兴登堡防线。联军全线推进。比利时开始收复国土。至此，德国败局已定。

1918年10月3日，德国政府通过瑞士向美国发出首次照会：

---

① 王绳祖主编：前引书，第440页。

"德国政府请美国总统采取步骤恢复和平，将这一请求通知一切交战国，并请它们委派全权代表以便进行谈判。德国政府接受美国总统在他的1918年1月8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和在他的嗣后的声明中所规定的计划，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为避免继续流血，德国请求设法立即缔结全国陆海空停战协定"。[①] 之后，德国又于10月12日、10月20日、10月27日分别发出第二、第三、第四次照会。1918年11月5日美国政府第四次复照，通知德国政府：威尔逊总统已把此事交给将军们从军事形势方面判断是否应当停战。联军司令福煦回答说，假如德国同意有效地解除武装，他就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过美国和协约国间交涉商议，美国总统的十四点和随后的几个声明，最终作为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条件，成为协约国、美国同德国之间的经双方同意的和平谈判的基础。

停战谈判是在临近美国国会1918年改选的时候举行的。威尔逊总统担心假如共和党掌握国会，他的和平纲领将毁于一旦。1918年9月13日，他的一位朋友在白宫问他：假如他在选举中失败的话他将怎么办？威尔逊说，"由于世界范围的形势，美国在其中的影响是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我不能这样做。现在碰到的情况是，即使被人民抛弃的话，我将不得不试图争取达到我们为之而战的目标。"[②] 由于担心在选举中失败，总统向全国发出公开呼吁：要求选举民主党人，使其在国会两院中占有多数席位，以便他可以在即将来到的交涉中完全不受束缚。这个呼吁引起了党派性的问题，威尔逊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

①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140页。

② 比米斯：前引书，第169页。

选举结果事与愿违，共和党在新的参议院中占明显多数，该院将在 1919 年 3 月 4 日以后讨论和平条约。前总统罗斯福作为共和党人，在选举之后向世界宣称："我们的盟邦和我们的敌国，以及威尔逊本人，都应当了解威尔逊先生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权力代表美国人民说话了。他的领导地位已被美国人民明显地否定了……。"① 但是，威尔逊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还要作最后的争斗。

六、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争斗

〔威尔逊出席巴黎和会〕　法国为了迅速实现欧洲和平、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于 1918 年 11 月 29 日，在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向美国建议五大战胜国（美、英、法、意、日）应废除以前只在其中几个盟国间达成的一切特别协定，并立即在这几个国家之间就和平的主要基础取得一致。当涉及小交战国、中立国和正在形成的新国家的利益的时候，可以逐个将它们召唤来商量。当和约初步拟定后，所有国家可以一起来缔造维护世界和平的永久性组织——国际联盟。

威尔逊总统对法国的建议不予答复。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是建立国际联盟问题，并决定将它与和平条约交织结合起来。为此，他将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去巴黎。虽然国会领袖们希望他呆在美国处理国内问题。在组团问题上，威尔逊又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即没有任命一个重要的共和党人或者一个参议员参加美国和平代表团，其成员是：（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总统的长期政治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塔斯克·布利斯将军和职业外交家亨利·

①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 402 页。

怀特。亨利是代表团中惟一的共和党人，但他却不怎么效忠共和党。在前往巴黎前，威尔逊又没有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见。这种做法无疑是在他自己的前进道路上设下了重重障碍。

12月4日，威尔逊一行乘“乔治·华盛顿”号从纽约港启程。伴随美国代表团前往巴黎的还有国务院官员、情报官员、专家和秘书。这些专家是豪斯从学术界和其他各界招募来的。在船上，威尔逊对专家们讲，“他们的使命是进行新秩序与旧秩序的斗争”。[①] 代表团中有不少远东问题专家，除豪斯、蓝辛外，布利斯将军是协约国军事委员会的美方代表，据说他“在亚洲表现出高度的本民族责任感”；“亨利·怀特的心脏为门户开放而跳动”。[②]

〔巴黎和会对殖民地的处置和赔偿问题〕　1919年1月12日，英、法、美、意四国首脑及外交部长召开预备会议，决定加上日本，组成最高理事会。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这是一次典型的强权政治的国际会议。32个国家参加会议，德国和苏俄被排除于会外。英法美是会议的主角，“四巨头”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控制了和会。大多数会议是秘密举行的，这对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第一点（公开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国际谅解）”无疑是一种嘲弄。四巨头内部矛盾重重，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紧张气氛。

威尔逊对建立国联情有独钟，因为建立国际联盟不仅能为他赢得世界声誉，而且还能为美国带来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关心国联盟约的起草，并坚决主张国联盟约与

---

① 柯里著：前引书，第242页。
② 柯里著：前引书，第243页。

和约捆绑在一起。这样，批准和约就意味着批准盟约。法国代表要求首先讨论领土瓜分、赔偿等问题，把国联放在议程的最后一项。英国虽同意将盟约列入和约，但主张分开批准。双方经过紧张的讨价还价最后同意先讨论国联问题。2月中旬，全体会议通过国联盟约草稿。4月28日，盟约修改后正式通过。

盟约的主要精神是集体安全、仲裁国际争端、裁减军备、公开外交等等，它规定建立一个由5个大国（常任的）和若干小国的代表（选举产生）组成的权力很大的行政机构。建立了一个由所有国家参加讨论问题的大会。威尔逊将第十条视为盟约的核心，即旨在制止侵略和战争的条款："国联成员国保证尊重与维护所有联盟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存的政治独立不受外部侵略。如发生任何这样的侵略或出现这样侵略的威胁或危险，行政院将提出履行上述义务之手段。"威尔逊成功地说服了与会者把国联盟约与和约条款合并在一起。这样，国联盟约便成为巴黎和约的前26条。

会议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殖民地的处置。威尔逊曾在十四点中呼吁民族自决，但各交战国早已经签订了掠夺战利品的秘密条约（瓜分德国在非洲、太平洋及亚洲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为了不妨碍国际联盟的建立，威尔逊竟然放弃其"民族自决权"原则，向英、法、意让步，决定把先前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交给已经占领它们的国家实行所谓"委任统治"，而由国联进行不严格的监督。根据委任统治制度，法国和英国获得中东的一部分；法国得到了德属莱茵兰的非武装化和盛产煤炭的萨尔盆地的一部分利益；意大利从崩溃的奥匈帝国吞并了南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协约国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周围建立起一些敌对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同时，为了解除法国对德国复活的担心，美英同法国签定了保证其边境安全的公约。

赔偿问题也同样棘手。威尔逊要求对德国"宽宏大量"些，让德国支付有限的赔款，他在会上说："如果我们使德国人民受屈辱，逼之太甚，我们将会破坏一切政体，布尔什维主义将取而代之。"[①] 但英法希望削弱德国，要求巨额赔偿。结果，威尔逊作了让步。赔偿委员会终于在 1921 年向陷入困境的德国提出 33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从而给以后 10 多年的国际经济关系增加了困难。

1919 年 6 月 28 日，德国在凡尔赛宫镜厅被迫签署和约。德国被迫付出 316.8 亿美元赔款（以后数额减少），丧失了 13%的领土、10%的人口和海外殖民地。德国原指望威尔逊的十四点能够给德国带来一种"宽大开明"的和平，但当他们在和约上签字后发现威尔逊背叛了德国，希望转成仇恨。阿道夫·柏里指责"威尔逊违背了自己的理想"。约瑟夫·富勒斥责美国"在一系列对帝国主义利益和报复要求的妥协中出卖了自己的原则"。[②] 1919 年 9 月，奥地利签约。11 月，保加利亚签约。威尔逊不但背叛了德国，更是出卖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

〔威尔逊牺牲中国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俄被大战束缚了手脚，在远东中国积极进行侵略活动的只有日本。美国为了在远东的扩张竟牺牲中国利益以讨好日本，扶持日本成为在远东地区牵制其他列强的力量。

美国支持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它一方面宣布"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于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

---

① 小戈登·莱文：《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政治：美国对战争和革命的反应》，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 134 页。

②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美国外交政策史》，第 289 页。

或领土完整，一概不能承认”；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又要求其驻华公使芮施恩“劝告中日两国政府忍耐和相互宽容”[1]。1915年3月13日的照会中，美国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东部蒙古要求，没有提出异议，并宣称“美国坦率地承认领土相邻构成日本与这些地区间的特殊关系”。[2] 美国的妥协态度导致了《蓝辛－石井协定》的签订。1917年9月8日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同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华盛顿就中国问题进行正式会谈，11月2日签定《蓝辛－石井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与日本接壤部分，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同意不侵犯中国独立及领土完整，恪守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3] 该协定是美国对日本所作的又一重大让步，促使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然而，美国对中国利益的最大出卖，是在巴黎和会上。

战后初期，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对美国政府抱有幻想。1918年，中国政府派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五人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到达巴黎后，却被告知属于第三类与会国家，只获两个全权代表名额。据美国《纽约论坛报》巴黎和会的特派记者说，“作出此种不公正决定的是豪斯上校向威尔逊建议的”。[4] 这种不公正的开端最终导致不公正的结果。

1919年3月7日，四巨头会议无理地决定将赤道以北的德国太平洋岛屿委托日本管理。早就垂涎取得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日本毫不松口，并且扬言如果日本的要求不能满足，它将拒绝加入国

---

①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3页。
②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3页。
③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4－295页。
④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6－297页。

际联盟。这实际上把威尔逊置于一种两难境地，接受日本的要求将违反他屡屡宣布的公正与自决原则，若加拒绝则有可能使日本退出和会，造成国联盟约批准的被动。在此情况下，威尔逊决定牺牲中国以换取日本对国联盟约的赞成。1919 年 4 月 25 日威尔逊在美、英、法、日四国委员会上表示："日本领土的很大一部分是贫瘠的，因此它当然需要为它的人口找安身之处。它们已经在朝鲜或满洲找到了一些空间，……它现在在中国寻找更多的地方。"① 他的话活活勾画出了一副帝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当时美国自己严格限制日本向美国移民，但却鼓励日本向中国找"生存空间"。4 月 30 日，威尔逊等三巨头开会讨论山东问题，决定把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写入对德和约。中国代表团原指望威尔逊能够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主持公道，至此幻想完全破灭，中国的利益再次成为大国之间交易的牺牲品。可以说，威尔逊的基本立场自始至终都是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威尔逊宣扬的"公正"、"国家平等"、"民族自决"等说教是多么虚伪！

在美国等国的姑息下，日本竟然获得了战胜国中国的山东省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凡尔赛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如下：

第 156 条，德国将按照 1898 年 3 月 6 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有关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施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

① 转引自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前引书，第 404 页。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7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①]

威尔逊也许是做贼心虚，他在接受关于山东省的安排后，给图马尔蒂发了一份海底电报，概述事情缘由，以备将来公开讨论时用。用他自己的话讲，这件事“我认为是以一种尽可能圆满地解决中国自身陷人的这场条约纠纷的方式……解决的。”[②]

威尔逊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的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也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民反对威尔逊的行径，威尔逊的政敌也对他进行猛烈攻击。

〔威尔逊与国会围绕批准国联盟约的斗争〕　1919年2月24日—3月14日，在欧洲花了近6个月时间的威尔逊回到美国。几天之内，他会晤了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3月初，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洛奇策划提出了一个“圆形签名声明”，由39个参议员签名（足够否决条约所需的2/3票数），就国联盟约

---

①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上册，1983年，第490页。

② 柯里著：前引书，第267页。

提出质问，要求和约与国联盟约分别生效；共和党人还攻击条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要求取消巴黎和会通过的山东解决办法。

威尔逊不顾国内的反对意见，再次前往法国。

7月，他回到美国，此时对他的批评还没有平息下来。7月10日，威尔逊把巴黎和约提交参议院。威尔逊遭到来自两方面的严厉批评。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等进步主义者认为，国联在减少战争可能性方面做得不够，它是一个大国继续谋求统治的工具。保守派批评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则认为，国联过多地剥夺了美国的主权。

洛奇成了威尔逊的主要障碍，他在外交委员会中安插了反对国联的参议员，使大多数共和党人在对条约投票时保持一致。共和党使用拖延战略（延期召开听政会）在舆论上取得很大的进展，极力反对国联这个他们所谓的“有一个神圣名字的邪恶事物”。[①] 洛奇又对国联盟约提出十四条保留案。“十四条保留有许多讲得很明白：例如，国会保留宪法赋予它的在外交方面的任务；明确地把门罗主义排除于国联监督之外；美国不同意对山东的解决方法；否决国联对美国国内立法有裁决权等。针对盟约第十条的保留是重要的：除非得到国会授权，美国不承担维护他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义务。”[②]

威尔逊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保留。他辩解说，附有保留条件而批准的条约须重新召开国际会议予以接受。他不愿意造成那样的局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因此而提出对它有利的保留意

① 比米斯：前引书，第202页。

② 比米斯：前引书，第203－204页。

见。[1] 后来，英国宣布接受美国的保留，以便国联得以成立、和约能够通过。

1919年9月，威尔逊意识到拖延下去会使美国人民对和约感到厌烦，便决定在全国巡回演讲，宣传他的主张。威尔逊拒绝了医生要他作一次长期修养的建议，9月4日他开始了行程8000英里的全美旅行。威尔逊对他的秘书约瑟夫·图马尔蒂说："我知道我已经智竭力穷了，但是，我不惜作出任何必要的个人牺牲，因为如果条约通不过的话，结果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只有上帝知道了。在世界面临着大悲剧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正派人都不会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的。"[2] 威尔逊抨击诽谤他的人，斥责反对条约的爱尔兰裔和德裔美国人，并把批评他的人同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他说第十条意味着美国有使用武力的道义而不是法定的义务，美国仍然可以决定它参加什么样的战争。

威尔逊全美旅行共发表37次演说，主要谈到保证国联各成员国领土完整的第十条；关于门罗主义和移民、入国籍、关税、英国议院重复投票等项国内事务不受国联控制的保留条件；山东决议等。[3] 关于山东问题，9月6日他在德斯摩勒演说中说，"我同你们一样不喜欢山东协定，但是环境如此，无他计可施……为了把山东还给中国，你们打算同日本、法国和英国作战吗?"[4] 显然，威尔逊在巡回演说中，还念念不忘极力推卸他牺牲中国的责任。1919年9月26日，威尔逊途中病倒。返回华盛顿后，中风使他的左侧瘫痪，几乎丧命。由于中风，威尔逊的态度更加固

①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410页。

② 〔法国〕安德烈·莫鲁瓦著：《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0页。

③ 柯里著：前引书，第284页。

④ 转引自杨生茂、林静芬编：前引书，第407页。

执，拒绝妥协。

当时参议院已分裂成4派：约有40名民主党人忠于威尔逊，为非保留派；以弗兰克·凯洛格为首的温和保留派，约有13个共和党人；由洛奇操纵的强硬保留派，约有30人，其中约有20个共和党人和少数民主党人；其余的由16个“不妥协分子”组成，包括拉福莱特、诺里斯和博拉，他们不管是否有保留都强烈反对和约。

1919年9月10日，外交委员会把它建议对条约作45处修改和4条保留的报告提交参议院。11月19日，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进行表决。前两次是为附保留案的条约进行的。第一次表决以39票对55票被否决（不妥协分子和非保留派投反对票）。第二次表决是41票对51票被否决。第三次对不附有保留的条约进行表决，又以38票对53票遭否决（不妥协分子和保留派投反对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巴黎，威尔逊为了把国联写进和约时曾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上作了重大让步，可是现在他却不准备为了同样目的在国内对他的政治反对者做必要的妥协。在美国国会的一片否决声中，1920年1月16日，国联正式成立。

洛奇和威尔逊这两个政敌为了相反的动机、共同铸成了条约在美国的悲剧命运。结果，洛奇战胜了威尔逊。1921年7月，国会正式结束战争，8月，通过对德和约，美国宣布巴黎和约条款有效，但国联条款不包括在内。提出建立国联的美国最终却不是它的成员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全人类而言是一场灾难，但是对美国来说，它既是一场灾难也是一个机遇。美国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它既为结束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为发展自己创造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留下了一笔勿庸置疑的遗产。首先，大战为美国提高国际地位创造了

最有利的机会。战争中，英、法、俄、德等列强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战后按照美国制定的和平计划重新安排世界，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发挥领导作用。

其次，战争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战争财，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华尔街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1919年，商船超过战前规模的60%。到1920年，美国生产世界煤炭的40%，生铁的50%。①1919年8月，威尔逊沾沾自喜地说："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期望我们给予领导和指引。"②

再次，在战争过程中，美国扩大了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地区，加强了对亚洲、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如：固特异公司打进了荷属东印度以取得橡胶，斯威夫特和阿穆尔公司在南美得到扩展，锡业集团进入玻利维亚，铜业公司渗入智利，石油公司在拉丁美洲开凿新的油井。

最后，战争促使美国政府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纳入战时轨道，加强联邦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特别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当然，这一切都是以美国民众付出流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而取得的。一战对美国的深远历史影响还将在20年代进一步显现。

---

①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420页。

② 贝克和多德：《官方文件：战争与和平》第1卷，第560页。

第八章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一、共和党执政的20年代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以后，美国告别了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结束了民主党八年的统治，开始了共和党统治的哈定-柯立芝-胡佛时代。整个20年代，共和党不仅占据了总统的宝座，而且控制了参众两院。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由放任在美国再次占了上风，并发展到了极至。

〔从威尔逊到哈定：1920年的大选〕　1920年，美国迎来了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在经历了一战和战后初期的社会冲突及种族纷争之后，美国人已不愿再沉浸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之中，对进步主义的热情已平息，他们需要的是“常态”的回归。这一切增强了共和党对赢得大选的信心，人们要做的只是选出一个足够听话的人作为候选人。当时共和党内的争夺主要集中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追随者伦纳德·伍德将军、伊利诺伊州州长弗兰克·洛登和加利福尼亚州国会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3人之间。到了1920年的6月，如果继续这种相持不下的争斗，将会对共和党最后能否获胜产生影响。11日黄昏，在芝加哥黑石旅馆的那

间著名的烟雾缭绕的密室里，一项重要的决定正在酝酿。经过洛奇、斯墨特、乔治·哈维以及由查尔斯·克梯斯、布兰德吉等人组成的党内参议员集团的整夜磋商与努力，僵局最终在第二天凌晨2点多时被打破，他们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G·哈定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这样对记者说，“哈定这个人不是会引起世界变化的人，但他却是那群人中最合适的一个。”[1]

哈定这个被很多人称为好人的人，拥有典型的美国人的经历。他出生在俄亥俄一个医生家庭中，所受的教育不算多，曾在俄亥俄的一个小镇上当过律师和记者，后来又做过地方银行和电话公司的董事长。有人认为他是个性格讨人喜欢、头脑空空、唯命是听的政党仆从。虽然才智不算出众，但在仕途上却一帆风顺。他可能是共和党历来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最不合格的一个，但他却是他们所需要的。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时期，总统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扩张，而国会尤其是参议院的权威却在递减。因此，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坚信：一个白宫中的英雄，无论是对他们的政党还是这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好事。他们所期望的不是一个英雄。“他们不信任伍德将军的勇气，他们怀疑洛登州长的强大。当然柯立芝也不是他们所想要的那种，但哈定正合他们的口味”[2]。

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也同样出现了分歧和混乱。威尔逊不顾有病在身和从未有连任三届先例等众多因素，仍未放弃被提名的雄心。结果，却妨碍了他的女婿、最有希望获得党内提名的威廉·麦卡杜的仕途。司法部长帕尔默是麦卡杜最大对手，但他在

---

① 威廉·洛希滕伯格：《繁荣中的危机：1914－1932》，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85页。

② 华特·约翰逊等：《文件中的美国人的历史》，吉恩公司，1951年，第685页。

第三十八轮投票中被迫放弃角逐。经过44轮的投票，同样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M·考克斯坐收渔利，由于得到原先支持帕尔默的大部分代表的选票而击败麦卡杜，获得提名。

争斗便在哈定与考克斯之间展开。然而1918年以来出现的反民主党的浪潮使民众的意向到了1920年已经越来越倒向了共和党一方。“1920年的选举人厌倦了战时的兴奋激动，抛弃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而突然赞成哈定的‘常态’”①。西部的农民抱怨民主党的战时的小麦管制政策，不满于威尔逊把美国拖进了一场可以旁观的战争，这致使考克斯失去了太平洋沿岸每一个县的选票。而对民主党政府的不满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民中，中产阶级中也有许多人也对高税率、通货膨胀和劳工纠纷感到愤慨，各少数民族集团则敌视威尔逊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共和党赢得最后的胜利。为了保证哈定能当选，共和党采取了让他呆在家里，三缄其口的策略，宾夕法尼亚的博义斯·潘罗斯劝告道：“把沃伦留在家里，不要让他去做任何演说。如果他出去进行竞选旅行的话，一定会有人向他提问，而他正是那种会努力回答问题的笨蛋”②。如此，哈定获得了61.6%的普选票和404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只获得了34.9%的普选票（另有约3.5%的普选票投向了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和127张选举人票。在东北部地区，“哈定席卷了纽约市的每一个选举区，考克斯则在整个新英格兰仅赢得了一个县”③。而在随后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同样大获全胜，分别以59对37和300对132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共和党终于重新上台执

①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前引书，下册，第294页。

② 威廉·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88页。

③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前引书，第542页。

政，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俄亥俄帮”和政府丑闻〕　很多美国人把哈定描写成一个成天泡在扑克牌、威士忌和女人中玩乐，此外便无所事事的总统。随着他的入主白宫，他的牌朋酒友便也沾了不少光。上任后不久，哈定在任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国务卿查尔斯·休斯等几个颇具实力的内阁要员的同时，对他的老朋友们特别是在竞选中帮了大忙的哈里·多尔蒂也给予了实质性的回报与照顾。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先后任命了多尔蒂为司法部长，艾伯特·福尔为内政部长，威尔·海斯为邮政总局局长，查尔斯·福布斯为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等等。因此一支“俄亥俄帮”开进了华盛顿。

哈定是一个“道义上十分软弱，无力抗拒意愿较强或忌惮较少者施加于他的影响，或者抵制他的朋友们的纠缠强求”[①] 的人，他的这些朋友们就这样给他惹了不小的麻烦，1923 年以后政府丑闻接连不断。事情首先从多尔蒂的朋友杰西·史密斯的自杀开始。史密斯由于与违反禁酒者、逃税者等人勾结，而被要求回到俄亥俄去，但他不忍放逐，于 1923 年 5 月 30 日自杀。由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华盛顿被淹没在丑闻中。多尔蒂的另一个朋友托马斯·米勒也同样因为把酒类从政府仓库中非法运出而被处以 5000 美元的罚金和 18 个月的徒刑。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查尔斯·福布斯利用哈定对其信任和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关心，挪用 2.5 亿美元用来修建医院和购置医院物资的退伍军人拨款，在签定有关退伍军人医院的合同时收受的回扣达 1/3。尽管哈定知道后允许他辞职出国来逃避调查受审，但最后他还是被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以诈骗政府罪送进了监狱。与此同时，哈定的密友内政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前引书，第 543 页。

部长福尔爆出了石油丑闻。1921年他说服哈定将加利福尼亚埃尔克丘陵、怀俄明蒂波特圆丘地的油田从海军部划归内政部管理。尔后他秘密将这两块地分别租给爱德华·多黑尼的泛美石油公司和哈里·辛克莱的马默思石油公司。1923年10月以民主党人蒙大拿的托马斯·沃尔什为首的参议院公众地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调查，揭发出多黑尼曾借给福尔10万美元，辛克莱曾赠送给福尔22.3万美元的政府债券、8.5万美元现金并给福尔的牧场一些牲畜等内幕。1929年10月，福尔被判处受贿罪，监禁一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犯贪污罪而锒铛入狱的内阁成员。而与这多起事件都有牵连的司法部长多尔蒂因与哈定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陪审团为了保护总统的美名而使他幸免入狱。

对于哈定来说，看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他在震惊之余除了选择逃避外，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于是，1923年6月23日，他带着夫人和一批随从开始了横渡大陆的旅行，这也是他与华盛顿的诀别。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哈定由于忧虑、焦急，此时已经心力交瘁。在旅途中先后突发心脏病、染上肺炎、中风，最后于8月2日在旧金山病逝。可悲的是，这个生前并不被人关注的总统的死却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随着丑闻详情以及有关总统的情妇的消息不断传出，美国人对于总统的死也出现了各种说法。“新闻界认为原因是食物中毒、医生们则认为是突发心脏病、谣言散布者们则说成是梅毒，浪漫主义者们理解为破碎的心。”[1]

〔从副总统到总统：柯立芝如愿以偿〕　得知哈定死后，正在家里度假的副总统柯立芝在其位于佛蒙特的家族农庄的起居

---

[1]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传递的火炬：20世纪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1968年，第193页。

室里，伴着一盏油灯，在父亲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0任总统，并在1924年的大选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获得连任。

在很多人的眼里，柯立芝是一个古板、平庸、保守、缺乏想像，但品行端正、奉公守法、节俭朴素的人。他的这些个性特点与其生活环境及经历十分有关。有人认为“柯立芝的平民风度乃是出于习惯，并非来自思想信仰；他的节俭并不表明厌弃财富；他的沉默寡言并非哲学修养所造成的宁谧恬静；他的朴素单纯并无内在的深度。”[①] 柯立芝出生在佛蒙特山区的农村里，父亲是一个商人。靠着自己做工，他读完了阿默斯特大学，随后到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攻读法律，并在那里从底层开始做起进入政界。在1919年9月波士顿警察的罢工中，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柯立芝调用国民警卫队恢复秩序，阻止了罢工，并声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权以罢工来反对公共安全”[②] 由此闻名全国，在仕途中开始时来运转。1920年大选，他被共和党选中，作为哈定的竞选伙伴，并在后来幸运地提前成为白宫的主人。

从副总统到总统，作为白宫的新主人，柯立芝因政治丑闻而对1924年的大选获胜失去信心的共和党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所具有的节俭、无所矫饰的性格，特别是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的寡言少语、出言慎重以及对结交私人朋友缺少热情和慷慨等特点，都使共和党在选民们面前重塑了尊严，并把哈定政府时期的种种丑闻体面地遮盖了起来。柯立芝具有的优点，同他的前任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因此对共和党来说不必在1924年的大选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前引书，第545页。

② 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前引书，下册第一分册，第295页。

时再考虑别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而民主党此时仍然处在内部的争斗中。在北方的民主党人中存在着强大的天主教势力，几乎一致反对禁酒；而南方民主党人却是新教徒，竭力拥护禁酒，反对废除宪法第18条修正案，有许多人参加了三K党的活动。内部争斗首先在南方派威廉·麦卡杜与北方派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之间进行。最终，史密斯不敌，有着三K党和禁酒派强大支持的麦卡杜。1923年6月24日到7月10日民主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会上鼓起勇气向三K党开战，并经过了一百多次投票推出了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为候选人。但“或许在一代白宫英雄之后，一种柯立芝式的总统正是所有美国人在感情上能够接受的。也或许是因为柯立芝要比表面上厉害。”[①] 在目睹了哈定时期的丑闻之后，“只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唤起道德尊崇的领袖”[②]。柯立芝成了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之一，在1924年的大选中，他击败了民主党的戴维斯和第三党罗伯特·拉福莱特。

柯立芝成为总统后，首先解除了内阁中哈定的牌朋酒友们，其中有的被送进了监狱，并代之以真正能胜任这些职务的人。1924年3月前司法部长多尔蒂辞职，柯立芝随即任命了哥伦比亚法学院杰出的前院长哈伦·菲斯克·斯通接任，从而政府作风由贪污腐败转变为廉洁。

〔在期待中走向前台：胡佛入主白宫〕　转眼就到了1928年，据说柯立芝曾私下里考虑争取再次连任，但他那句神秘的

---

①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95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年》，霍顿·米福林公司，1957年，第54页。

“我不选择较量”被认为是一种拒绝，使他失去了机会。[1] 因此，1928年春天当他看到在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中，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已经完全占据了优势时，他明显地表示出了对这位共和党内最有希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的日益不满。他甚至对他的农业部长说，“那个人（注：指胡佛）在六年里向我提出了很多无用的建议，所有的都是不好的”[2]。尽管如此，胡佛还是无可争议地在代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了提名。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纽约州的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也同样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了提名。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主要党派提名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获提名前已四次连任纽约州的州长，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政治战场上的快乐战车”。一场党派的较量随即在史密斯与胡佛之间展开。“快乐战车”在东北部热情、拥挤的人群中不断发表演说，但在西南部的农业地区深受冷落。两个政党都为竞选募集了大量经费，共和党获得的要再多一点，但是打败史密斯的并不是金钱。

对广大选民来说，胡佛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神话，“胡佛的名字代表着个人成功，代表着管理粮食赈济饥民，代表着严厉的吏治[3]。胡佛，这个艾奥瓦州农场主的儿子，8岁时由于双亲过世便跟随亲戚来到西部，在那里他靠自己做工读完了斯坦福大学，成了一名工程师，家产日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任威尔逊内阁粮食局长的胡佛成了救济比利时的英雄。后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他又为创造美国的商业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普通的工人们已经得到了满足，普通的商人们也发了财，他们都

---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剑桥美国人民史》（卷三），新美国图书馆，1972年，第280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88页。

③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321页。

没有任何要求改变的愿望，作为工业效率的代表，“胡佛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而史密斯不是，所以选举也不是竞选了”[1]。最终，虽然史密斯获得了各主要大城市的选票，但胡佛还是以58.1%的普选票和压倒多数的444张选举人票而当选。在众人的期待中，胡佛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入主白宫。

但胡佛的运气似乎不好，他刚上任后不久，曾被美国人认为是“永恒的繁荣”不再繁荣，1929年10月29日成为了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场“大萧条”紧随而至。无可奈何花落去，共和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惨败，罗斯福和他的民主党上台，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执政信条〕　在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一直是政府执政的两种不同的策略，并不断交替出现。如果说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时代是国家干预对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那么进入20年代后，随着共和党的重新执政，自由放任又再次成为政府的政策原则。总统作为一种制度，其政策和决定已超越了担任这个角色的个人的意志。从哈定、柯立芝到胡佛，历届政府政策都受到了所属党派的影响，都把美国的繁荣和大企业的壮大联系在一起，提倡有利于特权集团的关税和税收政策，使联邦行政机关和企业界紧密合作，并反对那些妨碍投资或扩大政府管理范围的措施，政府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被尽可能地限制。

此时的自由放任首先反映在哈定的“恢复常态”上。对于经历了一次大磨难和波动的美国人来说，1920年最需要的是回复到过去的状态中。在参加竞选时，哈定便指出，“美国当前需要的不是豪情壮志，而是疗养生息；不是济事妙策，而是正常状

---

①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前引书，第212页。

态；不是革命，而是复原；不是激烈震荡，而是轻微调整；不是手术，而是静养；不是激情，而是冷静；不是试验，而是均势；不是沉湎于国际理想，而是维持国家的优势地位"[①]。所谓的"常态"就是对威尔逊时期的那种强势政府的否定，就是在国际事务中放弃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国内则放弃对企业行为的管理等。"恢复常态"的核心就是把国家利益与特权集团的利益等同起来，在具体政策上，包括大幅度减税和补偿金、恢复高额关税、安排支持企业界人士进入并控制联邦管理机构等，实质上就是让代表大企业的特权集团来参与国家的管理，政府尽可能少管事。在威尔逊时期，为了整顿商业和工业曾在各重要经济部门建立了若干联邦机构，此时哈定为了实现"常态"的回复，通过将一些权益集团的成员安排在这些机构中或干脆撤销的方式，把各限制性的委员会交到各公司手里，停止实施反托拉斯法、鼓励大规模的企业联合。"凡是在有可能的地方，哈定及其同僚无不使进步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倒退回去。"[②]

从威尔逊到哈定，不仅是两个政党间简单的交锋，而且意味着进步主义在美国的衰落，美国人再次从激进的进步主义理想中回到了现实，哈定的"恢复常态"意味着自由放任的再次兴起。在对哈定政府进行评价时，有的学者把哈定政府说成是"一个专门追求一切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政府"，并认为这样的政府加上"恢复常态"的政策和特权集团的掺和，导致了丑闻迭起的现象。但反过来，我们并不能因为丑闻的出现而否定"恢复常态"，这一政策的选择同样也是战后美国民众的普遍愿望，否则

① 丹尼尔·斯诺曼：《1920年以来的美国》，海内曼教育图书公司1978年，第1页。

②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308页。

也不会将选票投向哈定。

与哈定相比，柯立芝上台后对联邦政府未进行变动。尽可能地少说话是他的处世原则，“我永远不去谈及的事不会使我陷入困境”，“我永远不会被我未曾谈及的事伤害”[①]，沉默是最好的保护。每天下午，白宫总会有一段很长的午睡时间。有一次，当一名参议员指责总统，要求他做点什么的时候，柯立芝两脚翘在书桌上回答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麻烦中有五分之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愿意只坐在那里保持安静。”[②] 他崇拜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努力工作，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懒惰。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即世间财产是上帝进行选择的明证，“一个人的价值是同他所能赚的工资相称的”[③]，政府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富人最了解他们利益所在，政府不应该干预他们经营的企业，而应该促进企业。他提出“美国人主要的事业就是企业”的施政原则，对他来说，企业不仅仅是企业，而是一种信仰，“建造工厂的人实际建了一座教堂……工作在那里的人实际在那里做礼拜”[④]。

然而，正如美国学者、前总统顾问赫伯特·斯坦所说的，相对哈定而言，柯立芝却不是保守主义的，他并没有解除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主政时期的干预政策，他领导了一个新时代，所谓美国的事业即企业并不是说政府要让企业自行其是，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57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58页。
③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315页。
④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57页。

而是说帮助企业是美国政府的事业。[1] 在柯立芝看来，联邦政府服务企业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自己消失，“因为即使联邦政府不再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觉察到有什么两样[2]。所以，政府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其规模、活动和支出压缩到最小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柯立芝政府的联邦预算比塔夫脱时期更加庞大，而且美联储的作用也越来越被认同。这说明柯立芝时期的政府并非完全放任的，他对企业的崇拜使其政府的自由放任更多的是一种服务的需要。

柯立芝的继任者胡佛被许多美国学者称为是被遗忘的进步派，他对大企业的支持增进了经济的理性化，限制了“破坏性”的竞争。早在1922年，胡佛就在一本名为《美国的个人主义》的书中，提出了其要求加强美国进步主义传统和公平竞争的思想，“我们逐步明白有关政府对个人的保护，我们所能期望的就是自由、公正、合理的福利、平等的机会和对服务的刺激”。[3] 出任总统后，他的政策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有限政府哲学的理论中。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创立不是为扩充官僚政府，而是要限制它。真正的自由主义追求一切合法的自由。它首先坚信，倘若没有这种自由，那么对所有别的幸福和利益追求都是徒劳。这一信念是美国一切进步——无论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基础”；“政府经营商业将损害政治平等。它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滥用职权、贪污贿赂现象。它将扼杀主动性、创造性。它将阻碍领导能力的发展。它将使我们的人民智力愚钝，萎靡不振。它将压制平等的机会。它将摧残自由和进步的精神。”“机会均等和美国个人主义的

---

① 赫伯特·斯坦：《美国总统经济史》，金清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57页。

③ 理查德·E·马歇尔等：《从进步主义时代到常态》，前引书，第88页。

本质是，无论在商业和政治上这个共和国不存在任何集团或联合体的统治。相反，它既要政治和社会公正，也要求经济公正，它不是一种放任主义的制度”。[①] 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引导和指导，但不是在一个庞大的官僚制度之下管制进步的过程。“政府和企业之间将一年比一年独立……政府不应该和它的公民一起参与企业的竞争……另一方面，企业也有责任独立运作，以使政府的管理或竞争不再是必须的。”[②] 他坚决相信对经济自由的任何干涉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精神的自由。他的经济政策体现着对不受政府干涉的个人创造性，进取心和机会的绝对信仰。“你要是把政府的控制扩大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就不可能不同时使政府成为人民的灵魂的思想的主宰者”[③]。

在20年代的三个总统中，胡佛是最有能力但运气最不好的一个。他好不容易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又遇到了一场大危机，他的政绩不幸因为萧条而被人遗忘了，甚至后来有人把“胡佛”当成了骂人的前缀。

〔*梅隆及其财政政策*〕　从个人能力角度来说，哈定显然不如他的前任，才智平平、缺乏领导才能，他主张同国会合作，在政策问题上宁愿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不愿反对他的政党的意愿。在他任内似乎只有一件事是得到全国上下称道的，即他的四项政府成员的任命，他们为他承担了制定和推行政府政策的重任。同时，由于一直到1932年财政部长始终是梅隆，而商务部长到1928年总统选举前一直是胡佛，这两个人成了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所以保证了共和党的工业与财政政策在近10年里的连贯性。

---

①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611、612页。

② 华特·约翰逊等：前引书，第696页。

③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470页。

因此，考察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政府对内政策，了解梅隆和他的财政政策是关键。

梅隆，被美国人称为是“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1]，1874年起便进入了匹兹堡的银行界，出任政府财长时已是铝垄断财团和金融—工业帝国的首领。他身材瘦弱、面容冷漠、神情疲倦，由于生活在古董瓷器、极品葡萄酒、昂贵雪茄和雅致的绘画中，他的举止穿着中充满了绅士般爱德华七世的风格。在这位拥有数百万元财富的富翁财长看来，“政府仅仅是一个企业，能够而且必须按照企业原则进行管理”[2]，因此他上任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平衡预算，然后就要偿还国债。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梅隆在其政策措施中贯彻了压缩政府开支和增加收入的原则。

压缩政府开支的政策，首先从改进联邦政府编制预算的程序开始。在梅隆的建议和倡导下，国会于1921年6月10日通过了曾被威尔逊总统否决过的预算法，并建立了联邦预算局，哈定总统任命了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斯为预算局第一任局长。与此同时，退伍军人的补偿金也成了压缩开支的对象。战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发起运动，要求国会对平民在国内享受战时繁荣时，增加曾在部队服役的人的补助金。然而当国会提出有关议案时，遭到了反对，并被总统予以否决。1922年3月国会众院赋税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正的“退伍军人补助金”法案，规定对退伍军人支付20年补助金，其标准为国内服役一天1美元、国外服役的1.25美元。9月19日总统否决了这项法案。然而在势力日增的压力集团退伍军人团的压力下，1924年国会通过补偿金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98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2页。

法案，并使总统的否决无效，以发放已交保险费的为期20年保险单的形式给予补偿金，退伍军人拿这张保险单作抵押可以立即借到有限的现款。

对于梅隆来说，增加政府收入的途径之一就是促进生产，这也是增进全民福利的最好办法。而促进生产，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减少赋税。在他看来现存的高额税率已让人无法忍受，一个收入在100万美元的人要缴纳近30万美元的所得税，而这种高税率的恶果已四处可见，“新的企业不再出现，新的项目被遗弃，而所有这些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高额赋税”。没有人应该把其收入的1/4用来缴税，否则这将是美国创造力的结束。[①] 像汉密尔顿一样，梅隆认为繁荣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主张减少赋税尤其是富人的赋税，向富人征税会阻碍投资，从而延缓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取消超额利得税、略增公司税并将正规和附加所得税从最高的73%降为40%的建议，但受到国会内中西部和民主党人的反对。经过妥协，1921年11月23日哈定总统签署了税收法。新税法废除了向公司征收的超额利得税，把高收入者应缴的附加税最高税率从65%降到50%，而公司净收入税额从10%增加到12.5%。新税法没有对基本所得税和财产税作变更，仍然维持单身汉1000美元基本免税额和已婚者2000美元的基本免税额，但规定每有一个18岁以下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还可以再增加400美元的免税额。尽管减税使联邦正常收入减少了15

---

① 美国1913年的税收法规定对公司利润中超过5000美元的部分征收1%的利得税，1917年又提高到6%，1918年提高到了10%。同时对所有利润中相当于股本的15%到20%的部分征收25%的超额利得税，相当于20%到25%的部分征收35%，相当于25%到35%的部分征收45%。这种税收于1921年被废除，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才恢复。

亿美元,但由于国债仍减少了近20亿美元并有3.1亿美元的结余，因此1923年12月梅隆再次提出将附加税的最高税率减至25%，并相应减轻小收入者的正规所得税，削减联邦财产税。1924年通过的税收法便把附加税的最高税率从50%减到了40%，将中小收入者的正规税减半，同时把最高财产税增加至40%，征收新的馈赠税。由于经济大繁荣的出现，1925年12月7日召开的第69届国会使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财政政策，梅隆可以不受国会的限制贯彻他的财政税收政策了。1926年2月12日再次颁布了新的税收法，与前几次相比，这次的减税幅度大大加强，它不仅将附加税的最高税率减至了梅隆理想中的20%，而且削减了小收入者的正规所得税，废除了馈赠税，减半了财产税，并且单身汉和已婚者的基本免税额分别提高到了1500美元和3500美元。后来在1928年税收法中又稍微削减了公司税和消费税。梅隆的这种以高收入者为主要受益对象的减税政策，利用财政政策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鼓励了投资，对20年代美国的繁荣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并没有从中获得什么益处，他们的收益与高收入者的投资所产生的效益之间呈现不平衡的增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梅隆的这种减税政策导致实际购买力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导致大萧条的原因之一。此外，这种政策在鼓励投资的同时，也同样助长了投机，使股市中的泡沫不正常膨胀。

在关税问题上，作为特权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梅隆主张恢复传统的共和党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原则，采取保护性关税政策。1921年5月27日首先通过了曾遭威尔逊总统否决过的《紧急关税法》，提高了小麦、肉类、羊毛、食糖等农产品的税率，并禁止从德国进口染料。1922年9月19日又通过了《福德

尼—麦坎伯关税法》，从保护主义原则出发，大幅度提高了向美国进口的重要工业品的关税，并指示关税委员会协助总统确定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生产成本的差额，授权总统可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提高或降低任何税率，其范围为50%。后来在此法令执行的过程中，包括柯立芝政府时期，所变动的37种税率中有32种是提高的。正如威尔逊当初在否决《紧急关税法》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希望让欧洲清偿它的政府债务和商业债务，我们就必须作好购买欧洲商品的准备”[①]，因此新的关税政策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美国的发展的，损害了对外贸易。虽然保护了美国的国内市场不受欧洲人的侵占，但也阻碍了他们购买美国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因为他们除非借美元，否则没有能力购买，从而导致欧洲的旧账未还又欠新账。胡佛上任总统后，又于1930年通过了《霍利—斯穆行关税法》，再次将关税的平均值从32%上升到40%左右，对大约70种农产品和900多种工业制品提高了税率。这种高关税的状况对美国和欧洲，这都是一种有害的局面，大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农业集团和农业政策〕　从1920年夏季到1935年美国的农业经历了时起时落的萧条。1920年国外的需求急剧下降，同年5月31日政府取消了对小麦价格补助，就在这个时候共和党利用农民们的不满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重新执政。而在国会中也由于上述原因，在1921和1922年间形成了由南部和中西部不满现状的农场主组成的农业集团，并对美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1921—1924年间甚至控制了政府的农业政策，1924年以后尽管提出的建议屡遭总统否决，但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对政府的政策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前引书，第554页。

1921年8月通过了罐头厂主和牲畜围场主管理法，它授权农业部发布停止令以维护罐头厂主间的竞争，并迫使领取佣金的代理商、谷商和牲畜围场主必须合理定价。

1922年通过一项法律决定反托拉斯法不再适用于农业合作组织，并提出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内增加一名农业代表。

1923年3月通过了农业信贷法，并根据该法令设立了12家中间信贷银行，由财政部提供资本，通过联邦土地银行的附属机构信贷银行对银行、信托公司和信贷股份公司所握有的农业票据再贴现，并凭借仓库收据发放向合作组织和其他农业集团提供的为期6个月至3年的贷款。初期拨款6000万，用于发放短期贷款，用以在价格暂时下跌时，帮助合作组织不把农产品投入市场。

为了保证农产品价格的平等，伊利诺伊州的两名农业机械厂主皮克和约翰逊提出了将可供出售的剩余产品独立开来，以避免国内市场受世界价格的支配的建议，并被写入了1924年麦克纳里—霍根法中。法案计划成立一个由12个委员组成的联邦农场销售委员会，处理超过国内市场需要的剩余农业品，国内农产品价格提高到数额相当于关税额。同时提出委员会应该同出口商订立合同，使每种产品在国外的销售量足以使农产品价格得到提高，并应补偿出口商所蒙受的损失，其数额相当于关税的数额。1927年2月和1928年5月，国会两次通过了该项提案，但都被出身在农场却又不重视农业的柯立芝总统否决了。

在此期间，为了提高国内农产品价格、协助销售农产品，1924和1926年的特别关税法把小麦的关税提高到每蒲式耳0.42美元，奶油提高到每磅0.12美元。

胡佛总统上任后，把农业和关税作为其政府的施政重点。1929年在胡佛总统的支持下，通过了农业销售法并设立了联邦

农业局。由各个销售某种主要农产品的合作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各委员会向该局提出各种意见，并设立5亿美元的周转性借贷基金，供各合作协会贷款，以利于它们更好地销售农产品。

20年代，尽管在农业集团的努力下，在加强农场主的经营能力、改善农民境遇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的农业总体上由于这一时期大企业的繁荣、工业的迅速发展，往往被政府忽视，在三位总统的执政信念中工业的位置更重要。农场主们只有在大选拉选票时才会受到一些重视。

〔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　作为美国分权体制的重要一极的最高法院，在20年代总是摇摆于进步与保守之间，更多的时候由于哈定和柯立芝政府新任命了五位法官，而处于保守状态中。

为了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哈定和柯立芝总统先后新任命了前总统威廉·塔夫脱、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爱德华·桑福德和哈伦·斯通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塔夫脱为首席法官。他们在最高法院内形成了强大的保守力量。1922年最高法院在审理巴莱诉德莱克塞尔家具公司一案中宣布对童工制造的产品课收寓禁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并宣布国会不得应用征税权来达到违宪的目的，从而保护了在各地尤其是南部纺织工厂广为采用的童工制。1923年在艾德金斯控告儿童医院一案中，判定哥伦比亚特区一项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违宪；在此后的洛克控告纽约一案中，乔治·萨瑟兰法官作出了同样的判决，并声称各州有关调整女工工资的努力违反了她们签订劳动合同的自由。在1922年全国煤矿罢工中，为了结束罢工司法部颁布了一项禁止工会担任纠察或以任何方式鼓励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的禁令，最高法院对此表示认可，甚至还认可了规定雇员不得加入工会的“黄狗”合同。这些做法阻碍了工会的发展，剥夺了其为争取公平待遇举行

罢工的权利。此外，这一时期最高法院的保守还反映在它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方面。在1925年吉特洛控诉纽约一案和1927年惠特尼控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法院以煽动性言行构成国家安全危险为理由，支持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关于犯罪性捣乱行为和工团主义的法律。

当然，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还是保留了其部分进步性的。1923年在迈耶控告内布拉斯加案和巴蒂斯控告艾奥瓦案中，推翻禁止在学校使用外语的一些州的战时法令。1925年在皮尔斯控告姊妹社一案中宣布俄勒冈州三K党支持的一个法令为非法。1927年最高法院又以违背宪法的第14和15条修正案为理由，取消了得克萨斯州排斥黑人选民的法令。

然而，在州权和联邦权力问题上，最高法院则再次表现出了保守性，使20年代联邦权力得到扩张。在1922年斯坦福控告华莱士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国会可以运用管理贸易的权力，对某一行业进行州际性的控制。在1923年马萨诸塞控告梅隆一案中，最高法院否决了马萨诸塞关于联邦对各州的拨款制度侵犯了州权的论点，对该制度予以确认。

二、管理革命与技术革新

提到20年代的美国历史，人们除了会想到三个总统、梅隆、休斯等政府要员外，更不会忘了两个引起生产管理领域革命性变化的人：泰勒与福特。因为在他们的推动下，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工艺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当1920年来临的时候，美国在泰勒制和技术革新的推动下，积聚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创造出了经济的繁荣。

〔泰勒制的推广〕　　弗雷德里克·泰勒，美国科学管理的开

山祖。他1856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律师之家，由于眼病不得不中断在哈佛的学习，但这给了他进入工厂学习的机会。1878年他进入米德瓦尔钢铁公司，这为他后来创立科学管理的理论提供了条件，在那里他开始进行劳动时间的研究，并于1885年获得史蒂文斯学院工程学硕士学位，次年成为米德瓦尔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随后，他又在机械制造投资公司担任过总经理，并于1901年退休。1906年他出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主席。泰勒一生共有40多项专利，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计件工资制》、《车间管理》等论著。

在泰勒的论著中，效率始终是其崇拜的偶像。他根据长期的工作经验，对每一步制造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将制造过程分解为各个单独的工序，使每道工序的工人和机器的功能都专门化，提出了一套管理原则、标准和控制手段，以提高经济效益，把人视为"经济人"，以报酬为奖励手段，推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政策，让工人发挥出最大限度的能力，并按照其产品付给工资，"工人和经理人员双方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①。按照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观点，正是从泰勒开始，人类才第一次将知识应用于研究、分析、监督工作，这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

进入20年代后，经过泰勒协会制度化的科学管理方法被企业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的执行大大强化了工人们的工作效率，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的10年中美国人均每小时的产出平均增长40%②。

---

① 余志森、张海英主编：《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83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6页。

泰勒制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科学管理理论成为了一门学科，企业管理专业在20年代走向成熟。因此，随着一大批专业管理人员的出现，单个所有主或合伙人、董事会逐步失去了对企业经营的控制，转而由那些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受过训练的经理人员来对企业的现状和未来进行管理和规划，企业的扩大、产品的多样化和技术的现代化等企业发展的战略成为了职业经理人的责任。这种权力的分离大大加速了美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20年代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当然，泰勒制在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效率的同时，对工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等电影中所演绎的一幅幅可笑而辛酸的场面，正是资本家利用泰勒制对工人们进行压榨的真实表现。

〔福特工厂的流水线作业〕　流水作业在今天已经成为很多生产性企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它被生产者广泛接受要从福特1913年建立第一条固定的汽车生产流水线开始。“高地公园工厂体现了奇迹般的现代设计水平。一部电梯把原材料带到四楼。在这里它们被加工成挡板、挂钩和其他的大件，以及皮革质的车内装饰品。在三楼，轮胎被安在轮子上，车内地板被拼装好，车身被漆成黑色。在二楼，整个汽车被组装成型，然后沿着通过一楼办公室的斜坡，把车开下去。对这日益复杂的生产和装配工艺，有相应的15000台机器。每台机器都一尘不染，并有一个铜标版注明台号”[1]。这种流水作业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福特的发明，埃里·惠特尼互用件原则的发现，经过亨利·勒兰德等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许多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的理论拓展，最后在泰勒的管理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日臻完善的机器、工种的专门化和对操

---

① 彼得·科利尔、大卫·霍罗维兹：《美国楷模》，李必龙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作的工作效率的分析是其主要元素。福特的汽车厂是所有这些人思想的集合。在 1914 年，福特工厂又在上述固定装配线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条流动装配线，通过使用传送带、重力滑板和架空单轨吊车为机器输送零件，使工人只要站在机器旁边操作便可以完成所有的装配工序。它使平均装配一辆 T 型车的速度从一年前的 14 小时缩短为 93 分钟。而到 1925 年 10 月 31 日，福特的流水线上实现了每 10 秒钟就有一辆汽车下线的生产速度[①]，达到了其技术革新的顶峰。这使福特的 T 型汽车在 1927 年停产时达到 1500 万的水平。

亨利·福特和其行政管理人员共同摸索出了一套流水作业的生产方法，实现了生产的产品越多、成本越低的现代工业主义的规模生产的目的。T 型车的价格从 1901—1910 年的 950 美元，降到 1929 年的 290 美元[②]。正是因此，其他企业也纷纷仿效，建立了自己的流水线。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为美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各行业都为了满足战争所带来的巨大需求而努力增加生产，尤其是造船、飞机引擎、军火等部门，流水线便在各行业出现。到 20 年代初，许多行业都采用了流水生产的方式。

三、20 年代的经济繁荣及其问题

正是管理革命和技术进步才使美国拥有了繁荣。如果要让一个人来概括一下美国 19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永恒的繁荣”，由于这一繁荣主要出现柯立芝担任总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79 页。

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阿伦：前引书，《巨变》，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2 年第 111 页。

统的时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柯立芝繁荣”。在经历了1921年战后的短暂危机后，美国的经济从1922年起进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时期。据统计，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20年的862亿美元增至1929年的1044亿美元[①]。当时，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种大繁荣将一直持续下去。然而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大崩溃，使美国人的希望随着股指跌到了谷底。所以20年代的美国经济又被认为是“玫瑰色的噩梦”或“繁荣中的危机”。

〔汽车王国的出现〕　柯立芝就任总统时，曾把“让每户美国家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每家的车库里都有两辆车子”作为其政府目标，汽车王国的出现是美国19世纪20年代繁荣最重要的特征。

汽车王国的出现首先从汽车的数量增长开始。从1900年到1929年，美国的年汽车产量从4000辆跃升至480万辆，到1929年汽车拥有量超过了电话，达到2600多万辆，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辆车，大大超过了英国的每43人一辆、意大利的每325人和俄罗斯的每7000人的汽车拥有量[②]。汽车对于美国人来说，不再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它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流水线生产首先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产量，而且由于成本的降低，使汽车的价格开始下降。福特的T型车一开始就将价格定位在供普通百姓使用的廉价汽车上。当1908年推出时其价格就首次打破1500美元的汽车底价，仅以950美元销售，而后又不断降价，到1929年仅售290美元。

当汽车工业刚开始起步时，曾经有许多具有机械天赋的人像福特那样，建立了他们的小汽车厂，比如克莱门特·斯都的贝克、

---

① 塞缪尔·莫里森：前引书，第288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5页。

皮尔斯·艾罗、哈里·斯杜茨等等。但20年代结束了初期的众多小厂并存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统治的时期。当时除了福特公司以外，还有威廉·杜兰特于1908年合并别克、奥兹及一些小公司建立的控股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在1921年被杜邦和摩根集团控制，生产从豪华的卡迪拉克到廉价的雪弗莱等各种型号的汽车。另外一家相对较小的公司克莱斯勒公司于1923年建立。这三家公司几乎囊括了20年代美国所有汽车的生产。

汽车王国另一个主要表现便是汽车工业在美国20年代的产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一方面，汽车工业推动了钢铁、机械工具、石油、橡胶等其他行业的发展，据统计1928年全美生产的4/5的橡胶、1/2的平板玻璃、8%的铜、11%的钢材和65%的皮革装潢材料被用在了汽车工业上；此外，全美汽车每年共要消耗70多亿加仑的石油[①]。其中，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促进了道路的修建。1921年在美国汽车工业蓝皮书中曾这样警告那些驾车往返于佛蒙特和蒙特利尔的人："请在下雨天里务必用链条固定好车子的四个轮子"，并劝告游客"在遇到山路、沙漠边缘地带和泥泞的地方时，一把有可折叠柄的铲子"可能会非常有用[②]。一次大战前，美国北方9/10的车主在冬天会把汽车放一边，而重新用马车或蒸汽运输工具。所以，到了20年代为了让汽车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改善道路的状况，因此各州都纷纷发展公路修筑。佛罗里达穿过埃佛格来得沼泽地修建了泰米阿密小路；亚利桑那修建了一条横穿斐尼克斯西部沙漠的公路；犹他州在靠近内华达州的一片泥地和古波尼凡尔湖的遗址上建了高速

①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96页。

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巨变》，哈珀兄弟出版社，1952年，第122页。

公路等等。到 1928 年已经可以驾车从纽约往西一直到堪萨斯的圣马里。

另一方面，汽车工业的发展也促使了其他新行业的产生，它们包括在公路旁蓬勃发展起来的汽车修理服务厂、加油站、旅店、古玩商店等。随着汽车的发展，高速公路的延伸，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开车出行，因此“越来越多的加油站和汽车修理服务厂在公路干线旁冒了出来；充满冒险精神的农妇们开起了乡村饭店，以迎合开车兜风的人的需要；二流的企业主开设了舞厅，吸引寻欢作乐的人和他们偶然搭识的人；礼品老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抢着赚驾车者的钱；曾经只有出差过路的销售员光顾的乡村旅馆现在也装修一新，并挂起了‘旧殖民主义时期’的标志。其他还有一些则建立了由一间间独立的小屋构成的旅行者宿营地，二战后则大多让位于汽车旅馆。”① 据说到 1925 年佛罗里达州共有 178 个获得政府认可的宿营地，为 60 万人提供了住宿，其中 60%的游客是开车前来的，其中 2/5 来自南加州②。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许多美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汽车的影响。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庞大的汽车工业中谋生的，1928 年，汽车工业的生产工人数为 375000 人，其他与汽车相关的维修等企业的工作人员达到了 3700000 人③。与此同时随着汽车产量的增长和价格的降低，汽车消费成为美国人的主要开支，美国人用于买车的钱从 1919 年的 13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29 年的 30 亿④。汽车同样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T 型车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革。据说农民们可以愉快地利用汽车完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 225 页。
②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 97 页。
③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 95 页。
④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 198 页。

成每件工作，除了洗碗以外：通过在车上加一个拖车，他们可以把庄稼运到市场上去；通过把后轮用千斤顶托起来并装上自制的附件，又可以用来锯木头、装填粮仓。城镇里的熟练工人可以住到离工作地点几英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可以在晚餐后或周末开车到乡村散散心。甚至南方黑人的聚集区也因福特汽车而得到改善，只要车是在当地买的，即使是最愚昧的三 K 党人也不会不承认他的。汽车不仅给予他娱乐消遣，而且在必要时可以集合家庭成员一起开车到北方去寻找工作。汽车以及燃油农业机械把西部种植小麦的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由于不需要喂养动物，他可以在庄稼一收割完毕就锁上房门，开车到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去过冬。”[①] 在引发的这场革命中更重要的是汽车对美国的社会的影响。“它逐步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把繁荣带到了那些长期处于萧条中的地方，把不毛之地变成了一排排繁华的加油站和热狗店，它使那些铁路城镇与其他城镇相比不再具有优势，它把城市带到了乡村，把乡村带到了城市，它使许多乡下人第一次看到了摩天大楼的阴影和大城市中的罪恶，使很多城市居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牛、绿树、青山和大海，它使乡村的比例与过去相比缩小了，它还使这个国家移动了起来，它创造了车轮上的文明。”

〔工业帝国的壮大〕　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完成，美国在世纪之交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趁着一战带来的机会在战后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许多发电厂建造了起来，输电线不断延伸，电力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在 1889 年工业中使用的动力来源中电力只占 2%，而到 1919 年则增加到了 31%。1909—1929 年发电量增长了 19 倍，从 60 亿千瓦时增加到 1170 亿，1929 年工业中电气化程度也相应增加到 70%，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 225 页。

1919—1927年间，共有44%的蒸汽机被电力所取代。庞大的铁路运输网络逐步建成，连接了东西海岸间的各大城市。到1920年，不仅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量增加了许多，而且运送的旅客人数比1900年增加了一倍，空间距离也翻了三倍。从1920年到1928年，美国的人口增长了12%，但其工业产品增长30%[①]。

航空、建筑、电影和无线电工业是美国除汽车工业之外，在20年代发展比较突出的几个部门。1926年5月9日，理查德·拜德少尉首次驾驶一架220马力螺旋式飞机横越北极点。1927年5月，25岁的查尔斯·林白再次驾驶着相同型号的飞机，成功实现单独从美国长岛直飞法国巴黎、中间不做任何停顿的飞行，全程3735英里，共用时33小时39分。而后，美国的航空事业开始逐步开展商业活动。1927年美国开辟了第一条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商业运输航线；1927年7月，泛美航空公司获得了第一份邮件运送合同；到1930年全美共有122家航空公司，航线总长度达5万英里。

在战争期间处于停滞状态的美国建筑业在20年代后，也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每个城市的上空都出现了新的空中轮廓线。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地区几乎被完全重新翻造了一遍，第五大道回响着断断续续的铆接机的声音和钢铁吊车刺耳的碰撞声。在城市街道的高空，戴着头盔的工人们稳稳地站在房梁上，在他们的下面是正操作着巨大的起重机的工人或滚动着的混凝土搅拌机”[②]。到1931年，纽约竖立起了86层的帝国大厦，克利夫兰则为其52层的顶点大厦骄傲，而芝加哥则有它的护民大厦、休斯顿有石油大楼等等。美国人通过建造摩天大楼向世界炫耀着他的

---

①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12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3页。

富有，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自信与自卑。而在大城市之外，由于人口向郊区的流动，住宅建筑业的发展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整个20年代，从曼哈顿横跨东河的皇后镇上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底特律附近的格罗斯点公园增长了700%，克利夫兰处的夏克海兹增长了1000%，而电影圣地比佛利山则增长了2500%[①]。房地产业在这些地方兴盛起来，其中佛罗里达州为最盛。1925年夏天当那里的房地产生意达到顶峰时，迈阿密的《每日新闻报》上挤满了各类房产广告，共有504页，创下了报刊史上版面最多的记录[②]。

电影和无线电产业是2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兴产业。战前还属于小产业的电影业，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美国10大主要产业之一。1927年出现了有声电影，改变了以往电影不会说话的缺点，电影因此迅速发展。到1929年用于制作、播放电影的资本投资达到20亿美元，每年制作的电影达500部，每周电影的观众达到9500万人次（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大约为1.2亿左右）。好莱坞在世界电影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涌现了查理·卓别林、鲁道夫·瓦伦蒂诺等世界级明星。在无线电产业中，收音机的发展是最主要的。1923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后，收音机的销量急速上升。1922年收音机及其配件的销售额为6000万美元，而到1925年增加到4.3亿美元，1929年达到8.42亿美元，使每三户家庭就拥有一台收音机[③]。

作为工业帝国，美国的其他工业在20年代也取得了发展。比如，通讯业里，电话的安装量从1915年的525000门增加到了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4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4页。
③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96页。

1930年的20200000门；纺织工业领域里，人造丝的产量在1914—1931年间增长了69倍；电器行业中，1921年冰箱的产量是1929年的0.6%[①]。

〔政府对企业兼并的政策〕　自由放任是20年代共和党执政的根本信条，因此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并没有对企业界出现的新的兼并采取任何阻止行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财政部长梅隆，作为大企业的代表，认为政府的放任政策就是要不参与企业事务，并积极通过其税收政策来刺激企业的扩大投资。他指出"税收的下降能激发贸易和商业的动机"[②]，与此同时他又成功说服国会减少对巨额收入的征税额，返还了大公司100万的税款[③]，以鼓励投资。1925年柯立芝总统任命了汉富雷为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主席，这标志着由大企业组成的特权集团从此控制了FTC。汉富雷上任后使FTC开始拥护企业的自我管理，谴责FTC过去对企业的干涉，并接连主持了许多会议鼓励工业部门在贸易中的联合。而政府在此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应该算胡佛领导的商业部。胡佛部长相信工业中的浪费应用合作的行动来加以铲除，并认为取得某一个工业的生产者相互合作的好处而又不破坏机会平等与个人创造性是可能的。"没有人会说这放松了对非法资本联合组织、垄断公司、规定价格、操纵、不公正作法和整个一系列有碍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的限制"。在胡佛看来实施谢尔曼法的限制给公众带来的损失与企业界利用联合组织掩盖上述活动而带来的损失相比更大[④]。1923年初，他任命了一个商业流通与失业委员会，出版了《商业联合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1、195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3页。
③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553页。
④ 杜蒙德：前引书，第432页。

组织的活动》传布合作行动的主张；他将商业部置于FTC的活动之下，帮助各商业联合组织编制出一套规定，这些规定对消除贸易中的不平等有很大作用；他逐步将干涉渗入到降价等问题，通过利用商务部的机构规避最高法院和司法部的限制，从而为企业主共谋逃避反托拉斯法提供了阵地。

政府的这种态度使企业可以大胆地进行一场新的兼并活动，而随着20年代科学管理的深入，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大企业制度逐步在美国的建立也为这种趋势创造了条件。企业通过扩大控股公司的数量和范围使其本身的规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控股公司渗入到公用和交通领域，各商店被串了起来成为零售分销点；在所有的领域里，大公司侵吞小公司并与别的大公司合并。到1930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企业在十年里的发展速度是小企业的两到三倍。它们控制了整个国家财富的一半"[1]。而与以往的企业兼并不同，这一时期的兼并的目标不是行业内的竞争对手而是散布在不同城市的同一行业公司，所以兼并的结果不是一家垄断公司的产生，而是在各行业内出现了几个庞大的控股集团，几个大公司瓜分了某一行业的主要市场。

电力等公用设施行业是兼并的最主要领域，从1917年到1930年，发电厂的功率从900万千瓦增加到3000万千瓦，年发电量从210亿度增加到750亿度，而电力公司的数量却从1917年的4300家减少到1930年的1600家左右[2]。该领域的兼并从1923年联合照明电力公司和美国超级电力公司的建立开始，至1929年尼亚加拉—哈德逊公司和南方联合公司的成立结束。据统计，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5页。

②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97页。

到 1930 年 10 家控股集团公司控制了全美 72%的电力供应[1]。塞缪尔·以撒，这个曾经是伦敦一家公司每周工资仅 5 先令的小职员，成为了这一行业里的巨人。他控股了 23 个州的煤气和电力公司，从缅因州的安德鲁斯克因电力公司到北卡罗来纳的潮水电力公司，担任了 65 家不同工厂的董事会主席。

银行的兼并此时也出现了加速增长。大银行要么直接兼并小银行，要么采取通过开设各地分行的形式抢走小银行的生意逼它们退出的形式不断扩大其在全美各地的市场。旧金山的美国国家信托储蓄联合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 500 家分行，成为美国第四大银行，也是纽约以外的最大银行。而在曼哈顿，花旗银行兼并了农民信贷信托公司，抵押信托银行合并了商业银行，大通国民银行吸纳了公平信托公司。从 1920 年到 1930 年，美国大银行开设的分行数由 1280 家增加到了 3516 家，到 1929 年 1%的银行控制了全美银行资源的 46%。

兼并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连锁企业的发展。比如，大西洋—太平洋茶叶公司的连锁店从 1912 年的 400 家，增加到了 1932 年的 15500 家。据统计，1918 年的美国仅有连锁单位 29000 个，而到 1929 年便增加到了 160000 个；相应的连锁销售额也不断增长，1919—1927 年间药店增长了 124%、果品店为 287%、服装店为 425%；1928 年美国 70%的肉类食品和 94%的香烟市场均被 4 家肉类加工企业和 4 家烟草商占有[2]。

〔广告与新的消费和生活观念〕　广告，曾经只是用来宣传一些寻人启示、医药信息的传播手段，在 20 年代的美国迅速地盛行起来，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观念。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91 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92 页。

广告在美国的兴起仍然要归功于汽车的发展。1910年的广告相对少而简单，但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制造商间争夺消费者的激烈竞争孕育了广告这一新的产业。他们对广告的作用要比制药、化妆品、电器等行业多得多。“汽车时代把广告变成了一系列的使用和购买需求：一辆比你的邻居更宽敞的车子，一次豪华的旅行，一间全部由电器装备的厨房，为母亲准备的貂皮外套和钻石”[1]，广告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1927年的广告投入量达到15亿美元之多。妇女当然成为了广告主要的受宠对象之一，广告的作用使追求时尚的女性在着装上的花费更多，充分体现女性特点的丝袜的销售量从1900年的12000双猛增至1930年的3亿双，由于当时的妇女不断追逐广告里的高档服装的消费，所以被称为是“美国最大的皮毛动物”。虽然人们因为广告而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但面临着钱不够花的问题。一个消费者曾这样说道，“汽车、真空吸尘器、盥洗室设备以及洗衣机都非常的好，但我不是所有都需要，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钱买这些东西”[2]。正是这种有需求但缺钱的情况，导致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分期付款的产生。在20年代，美国人所购买的收音机有3/4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的，在汽车和家具的消费中这种新的消费方式占到了60%[3]。分期付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全国上下都在疯狂消费，到1929年分期付款购物总额达到70亿美元[4]。这是广告带来的第一个影响。

此外，广告作为一种生产者间新的竞争方式，它在为消费者鉴别商品的优劣提供了帮助的同时，随着其本身的不断发展而成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28页。
②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16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5、200页。
④ 布莱克：前引书，第310页。

为了向公众宣传一种生产方式的工具，它对美国人改变生活的观念产生了影响。与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在其作品《穷理查》中所表现的殖民主义时期节约是一种美德的风尚不同，20年代的美国人认为，节俭可能对社会有害，消费才是一种美德。斯各特·菲茨杰拉德这样写道："我们穷得不能节俭了，节约是一种浪费"①。爱默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曾这样说过，要让美国公众相信挣钱和花钱是一种美好的生活。20年代的美国人相信"缺少钱是惟一的罪过"，哥伦布环形办公大楼外的一幅巨大的霓虹灯广告——"当你30岁时，你应该有1万美元的财产；当你40岁时，应该有2.5万美元的财产；当你50岁时，应该是5万美元"②，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为钱而奋斗。奢侈的生活和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美国人的生活理想。

〔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变化〕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在2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其中包括了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食品的多样化等。

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据统计，在1923—1929年间美国人工资收入增长了11%，而与收入的增加相反的是工作时间的减少。1923年美国钢铁公司放弃了每天12小时的工作制度，让其所属的加里工厂实行每班8小时的工作制。而后1926年，福特公司又宣布实行每周5天工作的制度。除此之外，各企业的雇主们还纷纷开展了一场福利资本主义的计划，建造了干净整洁、光线充足的厂房，引进防止伤亡事故的设备，开设配有营养专家的自助餐馆，组织企业的合唱团和棒球队等。难怪林肯·斯蒂芬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8页。
②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15页。

斯，一个长期以来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会写道"在美国大企业正在创造出社会主义者作为他们奋斗目标的东西，即面向所有人的食品、住房和衣服。你将在胡佛政府时期看到这一切"①。

生活质量的提高。由于战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在文教卫生方面的开支，使更多的美国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使美国人的身体健康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28 年美国的政府教育开支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1900 年到 1931 年，一个美国人进入高中的机会从 1/10 上升到 1/7；进入大学的机会则从 1/33 上升到了 1/7;人的期望寿命由 1900 年的 49 岁延长到 1931 年的 59 岁，在此期间各类疾病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②

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首先汽车的发展使美国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过去骑自行车或驾马车，野餐只能到 5、6 英里远的地方去，而现在汽车使人们能够随时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一次野餐，甚至还可以周游全国。电影业的发展，使电影院成为人们娱乐生活的主要去处。电影院每周的票房收入从 1922 年的 4000 万美元增加到 1930 年 1 亿美元。收音机的普及则使广播成为人们足不出户的最佳消遣。当时旧金山的一张报纸曾这样描写道："在每个夜晚，每个地方的空气中都弥散着广播音乐，任何人能在家通过收音机听到，这种设备任何一个男孩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装配出来"③。另外，在 20 年代美国人生活中又多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即吸引了大量观众的体育运动。"网球俱乐部成倍地增长，商人们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经验发现一个四次击球的高尔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93、201 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202 页。

③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就在昨天：20 世纪 20 年代的非官方历史》，哈珀和罗出版公司 1964 年，第 65 页。

夫球洞是进行商谈的最佳场所"①。1921年7月2日，美国泽西城汇集了91000名体育迷们，37000人花了100多万美元去看杰克·丹姆普塞与乔治·卡朋特的拳击赛。大学里的橄榄球比赛到20年代末吸引了很多的人，每年的门票收入可达2100多万美元。②

食品的多样化。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储藏技术的提高，使美国人能够在寒冬吃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路易斯安那的樱桃、亚利桑那的西瓜、卡罗来纳的豌豆、亚拉巴马的玉米等等。罐头食品数量也在增加，1914—1929年间罐装果蔬增加了一倍，牛奶增加了两倍。"在很多城市家庭中，坐下来吃饭的第一道菜是罐装的汤，接着是罐装的肉类食品和蔬菜，最后是罐装的桃子"③。

〔投资热潮和股市泡沫〕　美国各企业在1922—1929年的大繁荣中，利润不断增长，净利润平均增长了76%；利润的增长又使这些公司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也随之上升，股东收益在此期间增长了108%④。更多的人开始把发行新股作为一种发大财的投机手段，不断向市场发行新的股票，套取更多的现金。1923年发行的新股总数达32亿美元，1927年100亿美元⑤。20年代美国企业的繁荣、社会生产的大幅提高等等，都保证了股票价值的上涨，但随着投机行为的出现和膨胀，股票的上涨从1925年起超过了其能够承受的范围。

日益繁荣的股票市场使今天买进的股票到明天一转手可以捞到一大笔钱，这使积累了相当资金的各家公司发现投资股票市场

---

① 艾伦：前引书，第66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5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1页。
④ 斯诺曼：前引书，第8页。
⑤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342页。

要比生产投资能更快地赢利。他们逐渐地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由他们把这些钱贷给那些需要更多资金进行股票买卖的人。“一种普遍高涨的情绪把越来越多的迷糊人拉进了投资市场中，股票经纪公司纷纷在各小城镇和大学校园附近开设分支机构，寡妇、工厂的工人、擦鞋匠和招待甚至那些并不十分渴望进入股市的人都冒险把他们的积蓄投入到股票中，以获取转眼可得的财富。这意味着每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要比社会犯罪或国际事务更多地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大约有 60 多万个股票经纪的账号，估计超过 150 万人加入到了抵押交易中，而这足以培育出疯狂的投机行为”[①]。在这种新的被称为“抵押交易”的购买股票交易中，公司、经纪人和进入股市的主顾们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利益链，只要其中的一环出现问题，便会引起整个的危机。他们都想从股票上捞取一些好处，但没有一方是实实在在为股票增值而努力的。

投资变成了投机，泡沫被越吹越大，股市的繁荣在这种泡沫上危险地高涨。由于上述三方面的联合，使美国国内的资金在 1927 年以后，大量流向股票市场，促使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越来越偏离其实际价值，股指不断攀登新高，成交量不断放大。市值到 1925 年达到 270 亿美元，1929 年又升至 670 亿美元；资本收益从 1923 年 32 亿美元上升到 1927 年 100 亿美元；成交量在 1923 年时为 2.63 亿股，到 1927 年放大到 5.77 亿股；国家的私人净债务额也从 1920 年 1060 亿美元增至 1929 年 1620 亿美元[②]。在看到股票上涨后，投资者并没有将股票套现出来，他们想赚更多的钱。同时，他们又因此以为自己已经确实拥有了这笔财富，所以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不断买公司，掩盖了当时经济运行中购买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 281 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68 页。

力不足的问题。

美国国内早在1926年就有人看到这种疯狂爆涨后面的危机了。1926年秋天，伯纳德·巴拉奇在给马克·沙利文的信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经济将达到它的发展顶点，我们在汽车、钢铁、铁路的报告中，所看到的是已经成为过去的繁荣的证明，而不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未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东西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能很快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它也会被过度利用，而现在恐怕就已经过度了"①。但股市的泡沫继续在膨胀，1928年10月新股中的泡沫达到了51亿美元②。到了1929年，这种担忧更加多了。1929年3月，国际兑换银行主席保罗·华伯格警告说："如果继续放纵无节制的投资行为，使之继续发展的话，最后的崩溃不仅必定会影响投资者本身，而且会引起一场把整个国家都卷入其内的大萧条"③。1929年9月5日，罗杰·巴伯森就预言："一场危机即将来临，它可能是一场十分可怕的危机"，"道琼斯指数可能会下跌60到80点"④。然而所有的忠告都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狂热的投资者无法接受危机即将到来的预言，甚至当《纽约时报》的资深财经编辑亚历山大·挪伊斯预言不断上升的股票和经济的繁荣将会崩溃时，被人谴责为"试图玷污或停止美国的繁荣"。当10月来临的时候，经纪人的借贷达到了60亿美元的水平⑤。

在这场股市的投机中，共和党政府依然坚持了其自由放任的执政原则。自1921年以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的权

---

① 斯诺曼：前引书，第8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85页。
③ 斯诺曼：前引书，第8页。
④ 莫里森：前引书，第285页。
⑤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7页。

力被明显地削弱，它们所具有的对经济和金融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在关键时刻，美联储不能决定该做什么。尽管，1926年1月商务部长胡佛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分期付款消费的过度发展发出过警告，甚至还指责联邦储备系统的银根放松政策；但他没能说服柯立芝总统或梅隆部长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们两个自己也陷入了投机活动中。据说，柯立芝总统曾以32美元一股的价格从内部购买了标准商标公司的股票3000股，当他退休时这种股票的市价已经涨到了40美元。1927年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宣布贴现率从4%降到3.5%，联邦储备系统继续执行其放松银根的政策，对各地银行出现的投资坏账听之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银行系统像美国这样不稳定、不负责任。一位作者这样写道，“银行为它的顾客们提供了除了汽车轮子以外的所有东西”。这是“一种新的不是由银行家组成的银行，看上去更像是证券推销商”[①]。银行的推动助长了股市的投机行为，也使银行内部的不良资产不断堆积。

过度膨胀的泡沫总有破灭的那一刻，1929年夏天美国股市出现了波动，大规模的股市崩盘已经不远了。

〔1929年股市的崩溃〕　尽管1929年初，为了防止坏账率的进一步提高，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不断施压下，同意向其下属银行发出警告：不应该再借款给投机活动。但经济运行中衰退的迹象仍然在夏天表现了出来：对拉动美国经济起了关键作用的建筑合同首先开始大量减少，全年住宅建设投资降到了2.16亿美元，比1928年减少了10多亿；国内商品的存货增加，从1928年的5亿美元上升到1929年的18亿美元；在消费速度方面，表现出了购买力的严重下降，1927年到1928年曾经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247页。

增长7.4%的消费速度，在1928到1929年下降了1.5%[①]。对此，联邦政府没能采取迅速有效的防范行动，却在提高银行贴现率至6%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以美联储的阿道夫·米勒博士、摩根集团的鲁塞尔·拉夫因韦尔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应该提高贴现率，以使股市的膨胀速度放慢；而福斯特等扩张主义者则认为限制性政策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短期内提高利率可能会使真正的投资在投机之前放慢速度。胡佛总统则专注于农业和关税问题，未能及时做出反应。因此，当8月美联储最后同意6%的贴现率、采取强化紧缩银根的政策时，已经不能起到任何的调节、缓解作用。连续6年的股市上涨行情，使人们对政府这一举动未有任何注意，股指继续冲高，9月股票平均价格达到最高点。然而，危机也正在悄悄地到来。

9月，股指出现小幅下跌，但进入10月后投资者仍相信股指会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10月23日，纽约证交所在收市前一小时出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多方大量抛售股票，导致价格下跌，华尔街震荡，崩溃拉开序幕。

24日，“黑色星期四”，股票价值骤降到可怕的程度，几度出现不管多方以什么价格抛售股票都没有买家的局面。中午华尔街的大银行家紧急碰面磋商，决定每人出4000万美元联手干预，并一度恢复了股市的稳定。当天收盘时，交易量接近1300万股。

25日，为稳定市场，银行家、经济学家、财政部、白宫都发表声明，称最可怕的阶段已经过去。胡佛总统说：“这个国家基本产业也就是指商品的制造和分销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繁荣的基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7页。

础上的"[①]，希望人们放心。股票价格因此在周末得到了控制。但是，在歇市期间，银行家为了加强其自身抗拒更深危机的能力，把他们在23日所买进的股票悄悄地返还给市场。这就使经纪人不得不向那些借贷者追债。整个周末，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在不断扩张。

28日，一开盘就爆发了新的震荡，一天内通用汽车的股票票面损失为20亿美元，股市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收市。

29日，股市再次出现多方倾售的局面。经纪人，持股者以任何能够得到的价格抛售股票。中午交易量达到800万股，收盘时打破记录达1600万股。

尽管，报界在30日再度发表乐观的评论，看好股市的未来，但这只能是一些人最后的幻想。随后的几个星期，股指持续下跌。据估计，纽约证交所在这次股市的崩溃中，其上市股票的市值下跌了至少40%，损失达2600万美元[②]。

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12种股票价格

单位：(美元)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缩水率%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310.25	193.25	37.71
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	68.5	20	70.8
电力证券股票（Electric Bond & Share）	189	50	73.54
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403	168.125	58.28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91.75	33.5	63.49
克鲁格—托尔公司（Kreuger & Toll）	46.375	21.125	5445
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	148.75	59	60.34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8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9页。

（续表）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缩水率%
美国收音机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n）	114.75	26	77.34
雷明顿—兰特公司（Remington Rand）	57.75	20.375	64.72
希尔·罗布克公司（Sears, Roebuck）	181	80	55.8
美国矿业冶金公司（United States Smelting, Refining & Mining）	72.875	29.875	59.01
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261.75	150	42.69

（资料来源：《商业金融年鉴》（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30年，转引自塞缪尔·莫理森：《牛津美国人民史》，第3卷，纽约，1972年，第286页。

股市的崩溃只是一种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查尔斯·道威斯柯立芝政府时期的副总统，崩盘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说，目前降临的灾难比美国任何其他时候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信号”。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是少数。很多企业界人士也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警告。对亨利·福特来说，“今天情况已经比昨天好转了”；纽约国民银行的副主席乔治·罗伯特则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经济失败，也没有出现的迹象，现在的各种情况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适合于永恒的繁荣”①。身为总统的胡佛，虽然意识到了这场股市危机背后所隐藏的购买力不足、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低下、私人债务积聚、银行系统疲软等问题，但他的担忧并未促使他采取有效的行动；在对外借贷扩大、家庭分期付款消费增加、农业萧条等问题上，他的行动只是使情况更加恶化。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繁荣中的不平衡〕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承受了一夜之间从繁荣的顶端跌入危机的深渊的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61、162页。

痛苦。痛定思痛，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进行分析，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潜藏在繁荣表象下面的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是繁荣、真相还是神话》一书中，经济学家斯都尔特·恰斯归纳了12种没有享受繁荣的人，即大西洋沿岸中部、中央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人们，农民，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包括小业主、独立的店主、专业人士、批发商），失业者以及煤矿业、纺织业、制鞋业、皮革业、造船业、铁路设备业的从业者和大量破产的企业非熟练工人，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20年代美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美国20年代的发展不平衡集中表现在收入的分配和产业发展两大方面。

繁荣中的不平衡首先体现在收入的分配问题上。统计表明，1923—1929年间，与企业利润增长62%、股权收益增加65%相对照，工人工资只上涨11%；1929年美国有71%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3.6万个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相当于1200万户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的收入总和即42%的美国家庭收入[①]。1929年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2.3%，但他们却拥有高达100亿的储蓄，占全部储蓄额的2/3。收入分配的不均，引起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再加上梅隆的税收政策强调减轻的是富翁的负担，而不是消费者，这就使大量资金积聚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因此，当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出大量商品投放到市场上时，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来吸收这些产品。1923—1929年，工人每人每小时的产量增加了32%，但工资只涨了8%[②]，他们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没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东西，而那些有实力购买的人对产品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这影响了经济运行中的现金合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3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7页。

理的流动。收入分配上的问题，使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间的距离日益扩大，但它被股市繁荣和分期付款盛行下虚假的购买所掩盖，而企业的高度集中化所引起的价格系统敏感度的降低，又使这一问题进一步为人们所忽视。

这种繁荣中的不平衡更明显地体现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上。20年代农业的萧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使农业生产完成了机械化，增加了产量，使美国能生产出足够的农产品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的需要。一战结束时，650万农民耕种着35000万英亩的土地，养活了5倍于其数量的人口①。但是，从1920年开始国外需求的急剧下降，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了1920—1935年的农业始终处在萧条中。战后原先因战争而被占用的耕地重新恢复了生产，使世界耕地增加，从1914—1930年世界耕地总面积增加了1亿英亩以上，各国提出了自给自足计划，这就使世界市场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缩小。面对农产品出口的日渐减少，历来信奉高关税政策的共和党政府，简单地认为只要提高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便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国外产品的影响。但他们忽略了当时美国农产品面临的是如何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之后，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当时主要是欧洲市场）。而国际市场上，别人要买你的东西，首先他得有这个实力，手头要有美元才行。对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尚处在恢复阶段的欧洲各国来说，获得美元的途径无非是要么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换取美元，要么向美国人出口产品换取美元，要么直接向美国人借钱。抛售黄金会引起金融市场的震荡，向美国人借钱总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出售产品既能在短期内获得美元，又能促进战后的生产重建。然而，从哈定上台后，美国政府一直坚持着高关税的政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20页。

策，这无疑堵了欧洲人的路，也间接地砸了美国人自己的脚。从1914—1930年，输往欧洲的小麦从12000万蒲式耳降到了2000万，剩余产品的堆积，使国内市场上的价格下跌，小麦的国内价格从1.26美元降到0.47美元，棉花从每磅0.18美元降到0.05美元，生猪从0.11美元降到0.02美元①。农业收入因此减少。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影响了农民的购买力，使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农村市场受到了影响。整个20年代，农民的购买商品所付的价格始终高于农产品的售出价格，付出的总比得到的多。除了农业的萧条以外，在20年代美国工业内部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在《繁荣中的危机》一书中，洛希滕伯格把它们称为“病态的产业”。这其中包括煤炭业、皮毛业、纺织业等。

上述这种种不平衡，实质上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即美国国内市场供需的失衡，这种失衡在自由放任的政府政策下被极度增强，以致最终大危机的爆发。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此后的经济大萧条成为了美国人心中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回忆。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运动

与美国经济的繁荣相对应的是，美国的社会运动在这一阶段此起彼伏。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史的危机》中，用周期发展的理论阐释了美国的历史，认为在这种发展中全国范围出现了公共目标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持续转换，并每隔20—30年出现一个社会改革的时期，而后接着就是紧缩和一心追逐私人目标的时期，而20年代的美国社会就是处在后一个阶段，是改革力量和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26页。

进步时代对紧缩和私人利益的让步，是一个剧变的时期[①]。当时的美国社会虽然仍可以看到进步主义运动留下来的痕迹，但战争所引起的各方面的变化使保守主义占了优势地位，在这两种力量的碰撞中，整个社会呈现出各种运动交错的复杂状态。

〔“疲惫的进步运动”〕　尽管共和党在20年代上台执政时，恢复了保守主义的政策原则，放弃了很多进步主义时期的政策，但进步运动的力量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中。这一时期的进步运动已经显得支离破碎，风光不再了，洛希滕伯格称之为“疲惫的进步运动”。

进步派在20年代的衰弱，并不因其数量减少，而主要是其内部的分裂所造成的。由于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罗斯福、威尔逊、拉福莱特、布赖恩、德布斯这些进步主义的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各自纠结、相互争斗。早已从威尔逊内阁辞职的布赖恩成了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威尔逊的人；罗斯福的支持者们愤怒而轻蔑地把威尔逊和拉福莱特看成进步运动的叛徒，罗斯福本人还指责拉福莱特是“我们门内的破坏者”和“美国民主的罪恶最深的敌人”；德布斯则早被威尔逊关进了联邦监狱里，并把威尔逊嘲笑成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人”。[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的力量在20年代走向了衰弱，但在当时国会内他们仍作为一种平衡力量，联合起来控制、影响着国会，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反对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能使国会通过他们自己的法案，如1920年的艾什—卡明斯法案和水力法。而1921—

---

① 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历史》，齐文颖、林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21页。

1925年间，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作为更是体现了这一点。他几乎一个人通过其精湛的政治手段，在国会立法上阻止了哈定和柯立芝政府想把位于田纳西河谷马瑟肖尔斯的电站转给私人利益集团的企图。1928年，诺里斯获得了足够的国会支持反对私人管理公用事业公司。国会两次通过了关于设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法案，但都被总统否决了。

1924年的总统竞选中出现的拉福莱特运动可以被看成是进步派力量在20年代的一次反弹。由于1920—1921年间出现的短暂经济危机，在1922年的国会选举中失望的农民把几个进步派选进了国会中。在艾奥瓦，愤怒的农民把史密斯·布鲁克哈特选进了参议院；在威斯康星，拉福莱特以30万的选票重返国会；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蒙大拿州也分别选出了他们的进步派代表。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24年7月4日，举行了大会，推举拉福莱特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拉福莱特在竞选中指出，"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并被杰斐逊和林肯所坚持和捍卫的平等的机会是留给每一个美国人的财产，而这已经被少数人的特权所替代，被他们从多数人的政府手中抢了过去"[1]，并由此提出了征收高额遗产税、铁路国有化、废除童工等进步主义的竞选纲领。然而由于经费的明显不足，他仅有柯立芝4/10的经费，最后他只获得了482.3万张选票。拉福莱特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证明了当时进步派的依然存在。

令进步主义者庆幸的是，20年代出台的很多政策正是他们在战前所努力追求的，如妇女的选举权、禁酒和限制移民等等。"当1924年参议院通过限制移民法时，没有一个进步派对此表示

① 华特·约翰逊等：前引书，第686页。

反对，甚至连乔治·诺里斯这样的人也投了赞成票。”①

〔*劳工运动的低潮和美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8年当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工会领导人来到美国时，他惊讶地发现当时美国劳工运动几近瘫痪的状况，轻蔑地称之为“磕头工会主义”。他观察到“劳工组织只存在于雇主们的容忍范围内……它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产业条件的决定中”，更令他震惊的是劳工缺少统一性，“工会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一种政治信仰，也不是一种社会运动”，每个行业的劳工都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②

正如上面所描述的，美国的劳工运动在经历了“骚动的1919年”之后，在整个20年代都处在低潮时期，劳联的成员从1920年顶峰时期的500万骤降到1923年360万③。工会组织的软弱和发展的停滞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杂志中充满了类似“劳工组织的崩溃”、“在美国有组织劳工的衰弱”和“美国劳联的暮日”等为题的文章④。正如1929年8月，《斯克里普斯—赫沃德报》的一篇名为“美国劳联在哪里?”的文章中所论述的，“事实是美国劳联在其领导者的位置上可怜地失败了，它的弱点一年比一年明显”⑤。另一方面，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传统的手工工艺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大下降，过去的行业工会也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了。工会作为劳工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已经丧失了它的团结、组织工人的作用。劳工对工会组织失去了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27页。

② 欧文·伯恩斯坦：《贫乏的年代：1920—1933年美国工人史》，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年，第83页。

③ 伯纳德·贝林等：《伟大的共和国》，前引书，第765页。

④ 伯恩斯坦：前引书，第83页。

⑤ 伯恩斯坦：前引书，第83、84页。

信心，亨利·华莱士曾这样说过，“农民们从劳工领袖那里所忍受的损失要比从工业或财政领袖那里多”[①]。1923 年一年中，美国劳联就丧失了 26.9 万个会员[②]。原因之二是复杂的劳工结构使他们很难团结起来。一次大战后从东南欧大量迁入的移民和离开南部农场的黑人增加了工人结构的复杂性，种族和民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各种劳工力量因此难以团结起来，削弱了斗争的力量。其他诸如雇主采取了福利资本主义或直接破坏工人组织、法院对劳工案件的态度等也是影响 20 年代美国劳工运动进入低潮的原因。1920 年美国参加工会人数为 5047800 人，而到 1929 年仅为 3442600 人，到 1930 年所有工人中参加工会的人数仅占 10.2%，与 1920 年的 19.4% 相比大大降低了[③]。与此同时，工人罢工的次数和人数也减少。

整个 20 年代，惟一值得庆祝的可能就只有美国共产党的成立。1919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 1 日，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美国共产党分别成立。1920 年 5 月两党合并成为美国统一共产党，但由于原共产党内部就合并出现了分裂，经过共产国际多次干涉调停后，才于 1921 年 5 月举行两党合并成美国共产党的大会。同时，1921 年 1 月美国工人党宣告成立，1923 年 4 月美国共产党合并工人党。1920 年 12 月，美国共产党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把消灭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强调不与劳工党、社会党等怀疑革命的阶级战争的团体或党派共事。这些主张无疑把他们同社会其他的劳工力量对立了起来，不利于其在经历过“红色恐怖”后的美国的发展、壮大，20 年代美国共产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29 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 360 页。

③ 伯恩斯坦：前引书，第 84 页。

党并不成功的发展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限制移民的运动和政策〕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的排华开始，这个移民国家开始有选择地接受新的到来者。1917年，国会通过了移民入境的识字测验的规定，使相当数量的移民被排除在美国之外。一战以后，随着欧洲和平的实现，美国人开始担心会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他们有的害怕大量从东南欧迁入的移民中有共产主义分子。战后初期出现的红色恐惧和劳工运动的高涨使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恐惧，害怕会有劳工运动的领袖随着新移民一起迁入，从而引起美国劳工的不稳定。还有人认为当时美国经济和机械化的高度发展，以使它不再需要更多的移民和劳工了。据统计，从1920年到1929年机械性失业超过了650000人[1]。但最关键的是美国人担心，这些主要来自东南欧的移民会对美国的社会产生威胁。纽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亨利·普莱特·费尔乔把美国的社会比作一棵树，当外部哪怕很小的敌对力量进入这棵树时，都会引起这棵树的生存。对于美国的社会来说，“一场能够被同化的移民运动是可以被忍受的”，而“不被同化的结果将是民族特性的毁灭”，当时的移民是一群无法同化的完全相异的部分，他们正“慢慢地、狡猾地、无法抑制地吞噬掉美国最核心的部分”[2]。1923年柯立芝总统也表示“美国制度完全是建立在好公民的品质之上的。这种制度是拥有自治历史的人民创立起来的。我们应当把新到来的人数限制在我们吸收他们参加好公民队伍的能力范围以内。我们必须使美国成为美国人的美国。为此目的，

---

①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09页。

②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84页。

必须继续推行限制移民的政策"[1]。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政府采取了限制移民的政策。这种限制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第一，直接的移民法案。20年代，美国政府先后在1921、1924和1929年三次颁布移民法，对新移民的人数加以控制。1921年移民法把准许入境的移民总数限制在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各民族人数的3%以内，大约为358000个名额，其中200000个是分给北欧国家的，155000个属于东南欧，但其中由于担心黑手党势力的入侵和大量犹太人及可能的赤色分子的进入，对西西里人和东欧移民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因此，1924年又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把定额改为不得超过1890年时人口总数的2%，每个国家的最低限额为100，每月允许进入的移民不超过全年限额的10%。1929年再次压缩限额，固定每年的总数为150000，其中北欧132000个，东南欧和亚洲共20000个[2]。

第二，移民签证制度。从1924年起，美国规定入境者必须要持有签证。这意味着每一个想要移民的人必须首先在所在国定额的范围内提出获准入境的申请，同时要通过文化测试，符合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关、没有可能成为公众的负担等条件。整个过程需要很多的文件，花费许多时间，而且会常常被拒签，只有那些十分坚定的人才会坚持到最后。

这种限制移民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非英语的媒体在数量和影响方面都不如从前；城市里那些曾聚集了新来的移民寻找朋友和工作的所谓的贫民窟渐渐地衰弱了，但南部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来到北方城市开辟了新的贫民窟；廉价移民劳动力的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06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35页。

减少使在美国每周的工资从1914年10.73美元升到了1926年的13.14美元"[①]。但另一方面，当时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了很大限制，甚至因人为原因造成了很多悲剧。萨柯、万泽蒂案件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无辜的人在经过了长达7年监禁后，仍被处以死刑，而直到50年以后才得以昭雪。尼古拉·萨柯和巴托罗美奥·万泽蒂是意大利的移民。1920年，他们被指控在马萨诸塞州谋杀了一个出纳员，尽管他们不懈地为自己的清白而辩护，但1927年8月22日，他们仍被判处死刑。正如万泽蒂在法庭上的最后申诉说的，"我正在遭受着迫害，因为我是一个激进主义分子，而我确实是一个激进主义分子；我已经遭受了迫害，因为我是一个意大利人，而我确实是一个意大利人"[②]，他们的冤案中包含了司法人员对少数族裔的歧视。

〔*原教旨主义运动与布赖恩—斯科普斯案*〕　当20年代的美国沉浸在机械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时候，在农村出现了一股反对科学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这一运动是从1910年两名狂热的浸礼会教徒出版了一系列名为《原教旨》的小册子开始，主要由农村的卫理公会教和浸会教的教徒组成。他们因为看到机械文明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神秘的威胁力量，所以主张《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正确的。20年代，这些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上，禁止在学校里将进化论作为真理进行教授；1924年1月，北卡罗来纳州教育部门提出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并积极把宣传否定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变为非法。正如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我们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35页。
② 马歇尔：前引书，第87页。

惟一的目的就是支持那些家长们捍卫他们孩子的信仰，使之不受在科学的名义下的种种对超自然信仰的破坏”[1]。他们在南部和西南部各州展开运动，1923年5月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决议，称达尔文主义、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不能也不应在该州公立学校里讲授任何形式的确认人类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来的进化论；1925年10月，得克萨斯州当局命令删去该州公立学校采用的教科书中关于进化论的全部内容。

社会上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对此展开了斗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25年发生在田纳西州代顿的“猴子审讯案”。该州年轻的生物教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因为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而被捕受到起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他提供了一支杰出的律师队伍，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改革运动者、刑事案件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另外还带来由15人组成的专家队伍作为证人。布赖恩则作为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协助起诉。代顿小镇因此而热闹非凡，法庭的每次审理都挤满了旁听的人，以致好几次不得不临时延期。世界各地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其中一部分还通过广播传播。在审讯过程中，由于法庭拒不承认专家关于达尔文理论正确性的证词，双方的唇枪舌战往往是类似下面的问答中进行着。

达罗：布赖恩先生，你相信第一个女人是夏娃吗？

布赖恩：是的。

达罗：你相信她是由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变的吗？

布赖恩：是的。

达罗：你是否发现过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是在哪里得到他的妻子的？

布赖恩：没有，先生，我留给不可知论者来寻找她。

---

① 马歇尔：前引书，第78页。

达罗：圣经上说他找到了一个，是吗？当时地球上有其他的人吗？

布赖恩：我不知道。

达罗：你不知道，这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思考？

布赖恩：从来没有困绕过我。

……[①]

布赖恩经不住达罗的连番诘问，他的回答后来常常引来听众的哄笑，他的追随者们开始怀疑他的主张了。最后的结果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尽管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撤销了对斯科普斯的罚款，但仍然维护了有罪的判决和反进化论的法律。布赖恩在审判后不久便因疲劳和暴食而死。而斯科普斯则获得了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尽管他输了官司，但他仍是一个获胜者。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高潮也随之过去，在北卡罗来纳、佐治亚、肯塔基、佛罗里达等州纷纷拒绝通过反进化论的法案。

〔禁而不止的禁酒运动〕　作为进步运动的一部分，从19世纪末开始的禁酒运动，一战时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到1917年，共有27个州实现了禁酒，1916—1919年间全国酒类消费达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②]。战后，由于禁酒州抱怨邻近的非禁酒州影响了其辖内的禁酒运动；更多的家庭主妇们希望他们的丈夫能把工资全部带回家，而不是把一半用在和一群年轻人在酒廊喝酒上；酒类制造业被证明是引起政治腐败的重要诱因且和嫖娼、赌博及其他恶习联系在一起；企业主们希望通过禁酒来消除工人在每周一的旷工率等等这些因素，促使禁酒运

① 马歇尔：前引书，第81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37页。

动发展成为联邦政府的立法行为。1919年1月16日，宪法第18条修正案被批准，并于1920年起开始正式执行。根据该项修正案，联邦政府将"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然而，整个20年代禁酒运动的开展并不成功，出现了禁而不止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禁酒本身引发出了种种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全国性禁酒开始后不久，一种新的职业私酒业开始代替公开酒馆的出现。由于这一行业满足了相当一部分渴望饮酒的人需要，尽管联邦政府在整个20年代以反禁酒法逮捕了50万人，进行了30万次起诉[1]，但地下酿制和走私酒类的行为依然有增无减。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上，走私酒类的活动十分猖獗。"小船很容易地从古巴把大量酒类运到佛罗里达和海湾各州；山地烈酒走私者成倍地增加；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州内有求必应的葡萄园里提供了一桶桶的葡萄汁，只要花一点时间，放一点蛋糕酵母进去，便可以把它变成无与伦比的人间甘露；一车车的葡萄运到了意大利和希腊裔的美国人那里，然后用传统的制酒机榨出汁液并进行发酵。从缅因州到迈阿密，在离每个港口三英里限制以外的海上航行着一队装着各种酒类的海洋运输船队。由摩托艇把这些货物送上岸，它们速度之快使海岸警卫队或禁酒局无法抓到他。然后这些货物被转运到私酒者的车里，这些车子常常会遭到其他罪犯的抢劫，不管发生什么，这些高度酒将被用水稀释了之后出售。"[2] 对普通的城市居民来说，当时要想喝点酒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几乎每个城市家庭都会光顾当地的私酒店，甚至在一些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36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38页。

州花上10美元就可以在杂货店的货架上得到一瓶美国的杜松子酒。那些被以医疗目的而公开进口的酒类能很容易地在健康人的胃里找到。

禁酒运动还引起了其他的社会问题和变化。大学生在禁酒之前习惯于围坐在一起，喝着一小桶啤酒，唱着“达特摩斯—斯泰因之歌”，而现在则在澡盆里喝杜松子酒。由于宪法第19条修正案而获平等公民权的妇女们则和丈夫们一起违反禁令，帮着他们把过去从酒馆里省下的钱用在喝酒上。社会犯罪也因此而增加。有组织的犯罪在禁酒中产生。芝加哥的艾尔·卡彭是当时最出名的黑社会头子。他不仅在芝加哥开设了酒店、赌场、妓院和毒品馆，而且拥有一支约1000名左右的私人军队，专门从事各类非法活动。他们的活动得到了私酒者的资助，并很快发展了一套自己的遍及中西部地区的酒类生产和销售体系。1926—1927年在芝加哥发生的130起谋杀案中，大部分是他们干的。1929年，卡彭帮与以乔治·墨里为首的黑帮间发生了最大的一起帮派斗殴事件。对于其杀人等行为，卡彭并不认为是犯罪，“不错，我们是杀了一些人，但让我告诉你，他们都是非常坏的人”①。尽管卡彭帮干了很多违法的事，但由于他们每日向高级政府官员支付报酬，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被判罪的。

禁酒运动还对美国的党派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主党内在禁酒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南部选区因禁酒有利于保证黑人的秩序而绝对地支持禁酒；而北方城市里充满了爱尔兰裔、德裔、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他们是坚定地反禁酒主义者。由此引起的党派内部的矛盾影响了民主党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使之在整个20年代都处在下风。1924年民主党内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出现

①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204页。

了两派的对立，详细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共和党在禁酒问题上相对比较一致，都支持这个被胡佛总统称为“动机高尚、目标远大的实验”[1]，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和中产阶级在党内最为强大。

这场禁而不止的禁酒运动，由于它所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和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最终以1933年第21条宪法修正案废除禁酒法而宣告结束。

〔新三K党的猖獗〕　新三K党的出现与猖獗是20年代的美国出现的又一个危害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中。这个组织创立于1915年感恩节的晚上，由前世俗传道士威廉·西蒙斯在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的石山上燃烧的十字架下建立，其名称和统一的白色长袍源自重建时期南部的老三K党组织。这个组织的基本信条就是强调宗教和种族上的纯净，因此他们反对天主教、反对犹太人、反对教育不多的下层中产阶级老移民的后代。它影响最大的地区是西南部、中西部和远西部地区，主要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阿肯色、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俄亥俄等州。这些地方的人们对外来移民侵占的担心远超过对黑人。但一开始，这个组织的发展并不迅速，到1920年其成员总共不到5000人[2]。

20世纪20年代，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着对移民、共产主义等的恐惧，为三K党的盛行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三K党内部也进行了调整。1920年，两名职业资金征募者爱德华·克拉克和伊丽莎白·泰勒夫人在三K党内找到了一条发财的道路，每个符合要求的人只要交10美元的入会费便可以成为三K党的成员，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39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210页。

这些钱的60%将上交给各州和全国的总部，剩下的40%归介绍人会的成员。这种奖励机制大大促进了新成员的发展，仅1920年一年就发展了10万新成员①。1922年，得克萨斯州的牙医海勒姆·伊万斯继任帝国术师，把三K党组织渗透到了西南部各州的政治中。三K党组织因此在20年代进入了最猖狂的时期。公开宣称自己是三K党的人当上了印第安纳、俄勒冈和亚拉巴马三个州的州长，三名成员进入了美国的参议院。根据《纽约世界》的报道，到1923年三K党控制了印第安纳、路易斯安那、俄亥俄、俄克拉何马、俄勒冈和得克萨斯政府，在亚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密苏里和堪萨斯与其他政治力量势均力敌，在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也有相当的力量②。除此之外，三K党还积极参与到党派政治中，1924年帮助麦卡杜参加民主党的提名竞选，1928年又发起反对民主党候选人史密斯的运动。这个组织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到1925年共有成员500万左右，曾一度出现每周成员增加约10万的疯狂状态③。

三K党采取的是鞭打、绑架、烧十字架、纵火、暗杀等恐怖手段。1921年佐治亚州的一黑人被三K党以谋杀一名白人妇女而处死，当时的情况是："这个黑人被带到了一个小丛林里，大约有500多人围在那里，每个人都穿着三K党的白色长袍，堆得有10英尺高的金字塔的树桩上绕了一个绳子。这个黑人被绑在了树桩上，并被问到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这个被阉割、处在难以名状痛苦中的黑人要了一支烟，点燃了，对着这些令他痛苦的人的脸吹了一口烟。柴堆被点燃了。当这个黑人被焚烧时，许

① 林克、卡顿著：前引书，第339页。
②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211页。
③ 杜蒙德：前引书，第376页。

多的男女老少还有他们的祖母们都一起围在边上跳舞。那天晚上，在附近的粮仓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以对此表示庆祝。许多附近城市的人也开车前来参加这个庆祝事件。”①

三K党的种种暴行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得克萨斯，担任了24年参议员的查尔斯·库伯森在1922年击败了一个受三K党支持的候选人；在俄克拉何马，州长沃顿号召所有该州的公民加入军事服务机构，宣布了一项试图消灭这个组织的军事立法，但后来他本人遭到三K党控制的议会的弹劾。三K党组织很快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开始衰弱。1924年印第安纳州的三K党领袖戴维·斯蒂芬森由于绑架、强奸并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年轻的妇女而被起诉，并被判故意杀人罪。这使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三K党腐败龌龊，这个组织的影响因此下降。同时，许多政客们从这件事中找回了与三K党作战的勇气，对该组织的领袖依法提起公诉。到1927年，三K党的政治力量已经被粉碎。20年代末，其人数大大减少到只有10万人左右。

〔女性的进一步解放〕　　“新女性形象”是20年代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她们放弃了掩盖颈项、手臂和脚踝的传统服饰，卷起了袜子、缩短了裙子的长度，1927年出现了及膝裙。她们还剪短了头发，有的开始吸烟、喝酒，享受与男性一样的消遣。传统的温顺、贤惠的淑女形象被干练、开朗，甚至有些放荡的新女性形象所代替。而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包含了当时妇女在政治、经济和观念上的解放。

1920年8月18日，宪法第19条修正案获得批准。根据这项法案，美国的妇女拥有了和男性一样平等的选举权。在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之后，妇女终于享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从此成百万的

① 斯诺曼：前引书，第28页。

妇女参加了选举，有的被选担任了政府公职。在20年代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女州长和一个女国会议员。她们是1922年进入美国参议院的丽贝卡·费尔顿夫人以及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出任怀俄明和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内莉·罗斯夫人和米里亚姆·弗格森夫人。尽管这三个人担任公职的时间并不长，但她们开创了女性参政的先河，从而为20年代美国女性解放运动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政治上获得平等的同时，20年代的女性在经济上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战后，虽然在工资待遇方面还存在对妇女的歧视，但妇女所能从事的职业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当时的妇女可以“驾驶飞机、捕捞海狸、开出租车、架设电报线路、从事深水潜水员和高空作业修建工的工作，可以在丛林里狩猎老虎；当有的妇女们从事在港口装卸货物的工作时，另有一些妇女则指挥着交响乐队、参加棒球队、开凿油井”，到1930年有1000多万的妇女从事各种工作[①]。妇女们因此而更加独立，单身女性搬进了她们自己的公寓；已婚的女性大多仍在工作，由于离开了家庭，她们获得了更多行动和选择的自由。社会为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提供了方便，罐头食品和熟食店不断增多，1914—1924年面包产量增长了60%，洗衣店的使用率增加了57%[②]。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在1924年出版的《家的制造者》中所表现的整个过程，无非就是为了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失败了的母亲却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而她的丈夫，一个事业上失败的人则呆在家里，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父亲”[③]。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59页。
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前引书，第80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61页。

除了上述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地位的提高之外，20 年代妇女更大的解放在于观念上的解放。这场所谓的性道德的革命则是弗洛伊德等人潜意识理论、性心理分析理论在美国传播的结果。早在 1910 年前后，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便开始在美国传播，但直到一战结束后，他们的理论经过翻译、通俗化才开始渗透到美国人的思想中。年长女伴的保护等习俗消失了，训练代替了保护，女孩子开始被认为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男女之间有了更多的自由一起工作、游玩。更重要的是未婚妈妈们不再被逐出家门或成为社会排挤的对象了。女性不再需要从一而终，可以不必再忍受痛苦的婚姻了，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离婚率在当时不断上升。1914 年美国的离婚率第一次突破了 10 万对，而到 1929 年仅当年一年的离婚率就超过了 20.5 万对[①]。

综上所述，回眸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新奇的时代。有些美国学者把这 10 年看成是新秩序出现之前必须经历的旧秩序危机全面爆发的年代。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因为 1929 年以后出现了可怕的大危机。但是，危机爆发的本身是为了调整失衡的经济，解决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潜在问题。20 年代，在政治上美国处在以党派为主导的弱势总统的时期；在经济上，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说，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种种的问题被繁荣所掩盖；在社会层面上，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改善，但改善最多的却是极少数的有钱人，对普通人来说同样存在着失业的威胁与生存的压力，因此各种社会运动仍然存在。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62 页。

第 九 章

20 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外交所表现出的是美国人对其实用主义理论的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发挥，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扩张主义，在制定外交政策中最根本的就是满足美国的需要，一切的外交举措都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所以，在 20 年代的美国外交舞台上出现了“在远东主动干涉和在欧洲被动孤立”的局面。

一、20 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

20 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和其他阶段一样，受到了当时美国所处的各种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而且在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还受到了不同思想观点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局面。

〔20 年代的国内外环境〕　由于美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因此 20 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20 年代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点，即美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格局的重组。

20 年代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大收获的年代，在这 10 年中，

美国人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制造业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近63%，汽车拥有量从1919年的750万辆增加到1929年的2650万辆，公路长度从1919年的35万米延伸到1929年327.2万米。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因此上升。到1929年，美国生产了世界煤产量的40%、70%的原油、1/3的发电量、1/2的钢铁和几乎所有的天然气[①]。战争使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14年美国尚还是一个债务国，美国人欠的外债达到30亿美元，而到1919年美国摇身成为了债权国，拥有近3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并有100多亿的外债[②]。

与美国这种实力不断增强相同步的是国际格局的重组。由于各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发展速度不同，世界列强改变了旧的座次，旧的世界格局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变化。从本世纪初开始，各国特别是那些后起的国家都要求按实力和资本重新瓜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而爆发。战后，在凡尔赛条约的基础上，世界牌局被重洗。欧洲各国由于战争的破坏，无论是英、法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刚刚崛起的德意志等后起之秀，都在这场战争中大伤元气。战后在修复创伤的同时，英国想继续保持过去的优势，尤其是庞大的海军力量，并对欧洲大陆的老大虎视眈眈；法国和德国都想成为欧陆的控制者，都想削弱对方的力量；在一战中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苏俄（后为苏联）则希望保住其革命成果，抵制外部的干涉，努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生存环境，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验。而美国不仅本土丝毫未受战火破坏，而且利用战争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大发战争财。到

① 约翰·依尔·海因斯：《柯立芝和柯立芝时代》，国会图书馆，1998年，第192页。

② 威廉·E·洛希滕伯格：《繁荣中的危机：1914—1932》，前引书，第108页。

1929年，美国的国民收入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17个国家的总和，走出了300年来对英国资本的依赖。纽约取代了伦敦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财经中心。在亚太地区，日本也从一战中获得了利益，而其日益壮大的实力，使之并不满足于此，其野心越来越大，大有赶超欧美之势。

一战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但是此时的美国与二战以后的美国又是不同的，如果说二战以后美国已经可以公然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称的话，那么20年代美国在国际外交的舞台上还只是初露锋芒，它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它世界领袖的头衔。面对上述的国内外环境，20年代对美国来说就是要稳固其在一次大战中所取得利益并抓住一切机会尽力扩大。这种利益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等的不同方面。对于欧洲，它希望拉大相互间的经济差距，不让一个强者在欧洲出现；对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它充满了敌意，因为它的出现不仅在欧洲和远东太平洋地区影响了美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对于野心勃勃的日本，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想把这个小小的岛国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一个棋子，又害怕虎崽养大了之后反咬它一口。这些现实的原因决定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招一式的套路。

〔20年代美国外交决策的原则〕　无论美国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中都采取了怎样的套路，在其制定的过程中无一不体现了美国人实用主义的精神，2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了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坚持对国际事务的有限介入。无论是在对待国联问题还是战争债务和关税等问题上，美国人都坚持了有限介入的原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一战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复

兴有关。

对于传统的孤立主义，美国人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别国问题和事务的政策，是一种对条约、同盟、贸易、文化交流和其他国际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普遍弃权或最低限度的卷入的政策”[①]。自美国建国以来，它就一直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起重要作用。从华盛顿时期的中立政策到后来的门罗主义，都反映出美国人中存在着凭借美国所处的有利地理位置超脱于国际事务之外的思想。如果说这种孤立主义传统的出现是因为建国之初新生的美国的弱小，那么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扩张主义的出现便是一种必然。而在20年代，当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时候，这种思潮的再次复兴，除了能说明威尔逊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在国内的失败之外（在一战中，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威尔逊对国内政策进行的调整引起了中西部农民和城市里劳工的不满；人们都把战后初期出现的失业、通货膨胀等归咎于威尔逊，认为如果美国不卷入战争，就不会出现如此局面），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孤立主义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之一。一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新闻记者弗兰克·西蒙兹曾这样写道：20年代的人们“回到了他们所惯用的方法和他们所熟悉的观念中……这种回归与其说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固有的本能……”[②]。因此，战后传统孤立主义的复兴是很自然的。

但是，孤立主义的复兴并不意味着完全地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参议员威廉·博拉和时任《先驱报》编辑的阿瑟·范登堡是孤立主义复兴的领袖。博拉常说美国要时常做好履行其对人类义务

①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78页。
② 杜勒斯：前引书，第146页。

的准备，同时他更强调这个国家应该独立的行动，不需要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命令下或经过它们的同意。阿瑟也同样相信美国人应该充分地扮演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但要严格坚持维护国家绝对不受任何束缚的自我决定的权利。[①] 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认为在国内应该由较富裕的、较明智的公民来管理事务，而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美国便是国际社会的精英，要对国际事务进行管理。[②] 由此可见，20年代的孤立主义与传统相比，更侧重于对国际事务的有限度地参与，不是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强调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由的行动。因此，这种孤立主义便产生出了一种对别国的不信任，鼓励了国家主义的行为，高关税、限制移民和坚持战争赔款等政策便是很好的反映。

第二，高举和平的旗帜。"战争留给成百万美国人的是一个不再战斗的决定；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任何时候比在两次战争期间所盛行的和平主义更强。"战后，美国人都竭力想忘记这场战争，在有些人看来美国的参战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③]。因此，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由各类爱好和平的团体共同组织的松散的和平运动，其中包括世界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协会、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非党派民族领袖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等。在这一运动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深信，"世界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由国家组成的有组织的整体，抛下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之苦"，"集体安全是维持世界和平的核心，但对侵略最好的遏制是通过经济制裁而不是军事力

---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145页。

② 威廉·阿普曼·威廉姆斯：《美国外交的悲剧》，W·W·诺顿公司，1988年，第130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04页。

量"[①]。

在和平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为了国际利益，在对外政策上竭力创造和平的环境，谋求建立集体安全。柯立芝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这个国家完全相信一种公民的权利在各方面受到保护的可贵的和平"，"与其他国家一样，现在这个国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认为，要通过友好的方式和良好的愿望、通过相互的理解和宽容来推进和平"[②]。从华盛顿会议开始，美国政府就不断倡导国际范围内的裁军行动特别是对海军的限制。不仅如此，在柯立芝政府时还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保证和平。然而，尽管美国谋求加强和保护世界和平结构，但由于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在20年代对外关系中，美国只追求和平的好处，却不愿承担保护和平的义务。更需要指出的是，当和平被作为一种政府政策原则时，它背后的目的已经超越了和平本身。作为一种民间行为，和平运动可能出于对战争的恐惧；但是当民众的这种情绪被政府利用时，便更多地是为了防止、遏制一个强大对手的出现，因此美国可以在和平的名义下大打出手，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对于美国外交并不是件稀奇事。

第三，不断地经济扩张。正如前面所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向，从"门户开放"到"大棒金元"，传统的门罗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扩张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信条。在20年代，从哈定、柯立芝到胡佛三届政府的对内政策的重点都是极力促进大企业的扩张，这种企业至上的政府原则也同样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因此经济扩张的加强也成为了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要原则之一。

---

① 艾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13页。

② 华特·约翰逊等：前引书，第689页。

战争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刺激了美国本身的工业，扩大其投资资本的供应。“在20年代，美国用产品、分厂和投资资本淹没了世界，使这十年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经济扩张最厉害的时期之一”[①]。尽管抛弃了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拒绝参与集体安全计划，美国人却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谋求全球经济利益。根据美国人的看法，这时的经济扩张主义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所谓手段即指通过经济上的扩张来实现美国的和平和繁荣并为以后的扩张打下基础；所谓目标是因为美国要想长久地保持国内经济的繁荣，必须不断地扩张，只有实现了经济的扩张，才能保证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对此，当时美国的政界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样的看法。哈定政府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从美国利益出发强调控制主要原料的重要性，以致出现了石油外交等政策；柯立芝总统曾表示，“我们这样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使地球上任何地方发动任何冲突的企图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些冲突将不会对我们产生不利的影响”；胡佛总统则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盈余寻找有利的市场”[②]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方面，20年代早期帮助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努力表明了美国人正开始认识到除了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之外，对外援助也能刺激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力度。美国借出外债额的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援助则以非政府行为为主。非政府力量在经济的扩张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对外借贷和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私人和企业进行的。到20年代末，通过私人账户进行的附加外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22页。

② 威廉姆斯：前引书，第127页。

债和直接投资的净资产总额达到80多亿美元[①]。而诸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通用汽车、福特公司、IBM、胜家缝纫机械等企业在20年代步入了跨国公司，通过企业海外业务的拓展，也实现着经济扩张的目的。

二、斡旋于国际事务之中

根据上述的三项原则，美国政府在各种国际事务中进行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三项原则都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影响，但在处理某个具体问题时，美国人对这三项原则的使用是有侧重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国联与国际法庭〕　一战后期，美国为了控制战后的欧洲，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各国为了防止类似的战争再次发生，对此表示赞同。然而到最后签订盟约的时候，美国却因为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挟国联以令天下的目标，而拒绝加入。20年代的美国外交的一个重点便是围绕是否加入国联和国际法庭而展开的。

哈定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愿过多卷入国际事务，他说："把你们带入世界重建的计划并不是我的目的，这类计划主要应该由那些更直接相关的国家来实现，他们必须自己通过斗争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然后我们才能对他们进行帮助，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帮助"，"我们不要求别人为我们承担责任，我们也不会承担别人必须自己承担的责任，除非国家主义被绝望地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130页。

吞噬在国际主义之中"[1]。因此，他坚持不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以尽可能地避免卷入国际冲突中。"哈定不仅拒绝甚至是国联的健康计划，而且几个月中其政府官员甚至没有拆开日内瓦的来信。当在1924年的日内瓦草约中，国联试图建立一个比其原先的盟约规定更准确的集体安全系统时，国务卿休斯以尽可能严厉的方式回答了这个计划。"[2] 国务卿休斯尽管曾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并主张加入国联，但在这一时期他认为这种国际组织是不可能的，国际主义"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而且它将很可能成为阻碍其他可能的成功的障碍"[3]。美国国内不论是梅隆，还是拉福莱特、诺里斯，各种政治派别、社会力量都一样反对加入国联。柯立芝上台后，继续了这种政策，强调"避免以牺牲美国的适当独立为代价缔结永久的政治联盟"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并指出"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加入国联而要限制自身的自由和独立的行动"，尽管他承认国联作为一种国家间机构是有用的，但反对美国加入其中[4]。

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1922年开始，国务卿休斯首先派遣了非官方观察员到国联的各种机构和委员会中。而后1923年哈定总统在休斯的影响下，表示愿意让美国有条件地参加国际法庭，但遭到了国会的激烈反对。参加国际法庭问题成为了美国国内的又一争论焦点。国际法庭的目的是裁决某些类型的案件，随时根据国联的要求提出意见，并对它提交的案

---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沃伦·哈定》，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年，第73、110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06页。

③ 杜勒斯：前引书，第150页。

④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卡尔文·柯立芝》，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年，第34页。

件作出仲裁。对此，柯立芝总统抱着积极的态度，1924 年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向国会表示，“我相信它（指国际法庭）将有利于这个国家，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稳定”[1]。1925 年 3 月 3 日，众议院以 303 对 28 通过参加国际法庭的议案。但在孤立主义领袖博拉的鼓动下，众议院对议案增加了保留条件。在经过修改的议案中，尽管承认美国对国际法庭提供财政援助的义务，但同时允许美国可以随时退出国际法庭，并不许法庭在任何对美国利害有关的问题上提出劝告。1926 年 1 月 27 日，参议院以 76 对 17 通过有保留地参加国际法庭的议案[2]。这些保留意见事实上限制了法庭的权利，包括向国联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权利。对此，国联表示除了其中有关对美国问题的劝告内容外，愿意接受全部保留条件，但柯立芝总统把这看成是一种拒绝，因此整个问题被搁置。后来，虽然休斯和凯洛格等人都当过国际法庭的法官。美国政府中也曾有人作过努力，胡佛和罗斯福总统也都赞同加入国际法庭，但最终美国官方依然置身于国际法庭之外。

与加入国际法庭的努力结果不同的是，美国从 1924 年起由于看到日内瓦机构组织非政治性活动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因此改变了过去不理不睬的态度。1924 年美国首次派遣了官方的代表参加国联第二届鸦片会议，以后又先后参加了国际军火交易控制会议（1925）、通信与运输会议（1927）、废除进出口限制会议（1927）、经济统计会议（1928）、货币造假会议（1929）、国际法编纂会议（1930）等许多这类会议。到 1930 年，美国参加过约 40 次的国联会议，派出 5 个常任代表[3]，但美国从没有正

---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卡尔文·柯立芝》，第 57 页。

② 德怀特·L·杜蒙德：前引书，第 438 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 406 页。

式加入国联。

〔华盛顿会议与裁军行动〕　在一战后的国际世界中，1920年11月的华盛顿会议以及与会各国在会上达成的各项协议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美国政府则从这次会议开始，不断地在整个20年代推行裁军计划，以期通过各国间的裁军，在实现世界和平的同时，在对手之间形成一种制约。不幸的是，美国人的和平理想和裁军行动并没能阻止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谓的裁军更多的是为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遏制强大对手出现的一种手段，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更大的军备竞赛的出现和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从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便开始把与欧洲各国的争夺范围扩大到了亚太地区；在经历了一次大战以后，美国更希望在亚太扩大其势力，出于这个目的美国邀请了与亚太利益相关的国家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则是美国、英国和日本于一战后开始的军备竞赛，它改变了整个远东地区军事势力的划分。战争期间，日本破坏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使英国与法国能够在战后重新分配海军力量，并且具备了自世纪之交德国海军兴起以来防御其在远东领地和利益的最稳固的能力。而美国的战列舰也在战争末期穿越了太平洋，其在珍珠港的基地也得到了发展。各列强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纷纷在战后扩大海军的规模。早在1916年美国就通过了一项“大海军”的议案，为了能够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使美国的海军实力超过“海上霸主”英国，海军部在战后不断提出新的造舰计划。而英国方面，为了能保住其战前在海军力量上的领先地位，不得不与美国进行一场军备竞赛。正如英国首相宣称的那样，“英国将花掉最后一个金币以使

其海军优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1]。1921年3月，英国也提出了大规模发展海军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不安于美国在太平洋力量的壮大，到1919年底美国驻太平洋舰队已经可以与整个日本海军相抗衡了，美国海军部还在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不断扩大海军基地并在关岛实施设防的计划。这些都使原本就想在远东称霸的日本在军事上投入更多的财力。1920年，日本国会又核准一项造舰计划。到1921年，日本财政预算的1/3被用在了海军建设和维护上[2]。

这时，美国出现了参议员博拉发起的裁军运动。1921年5月21日，博拉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授权总统召集一次限制海军的会议，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5月25日和6月29日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这项提案，要求政府同英国、日本进行裁军谈判。对于英国和日本来说，他们之间于1902年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正好到期，美国的提议正好合他们的意，除了裁军之外，他们还希望把讨论扩大到整个远东的事务。因此最后把参加对象的范围扩大为9个国家。8月11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对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发出正式邀请。

1921年11月11日，9个国家的代表聚会华盛顿，首先举行了纪念停战三周年的活动。12日，会谈正式举行。哈定总统在开幕辞中信心十足的说道："我们在这里相逢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这里将用所有的朴实、诚挚和敬意记录下一个关于世界本性的公开宣言，它经过了战争中战火的洗礼并因为焦虑的结果而变得更

---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394页。

② 罗伯茨·范雷尔：《美国20世纪的外交》，W.W.诺顿公司，1988年，第169页。

加敏感。我寄希望于那种对强调和平保障的理解能使世界安静的努力来减少负担，改善秩序。”[①] 随后，国务卿休斯发表了令所有代表惊愕的演说，英国舰队司令在听到裁减英国舰船的计划时，甚至吃惊地像一只躺在阳光照射的台阶上睡觉的大狗那样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在演说中，休斯提出了对裁减舰船的设想：美国废弃所有建设中的主力舰以及所有超过（但不包括）特拉华号和北达科他号的旧战列舰；英国停止四艘尚未下水的主力舰建造并且废弃其二线的战列舰和超过（但不包括）乔治五世国王号的一线战列舰；日本放弃它还没有实施的造舰计划，废弃3艘主力舰和4艘战斗巡洋舰以及所有二线的战列舰；根据计划总共裁减1878043吨舰船，美、英、日、法、意的海军力量比为5:5:3:1.67:1.67[②]。与会各国对这项设想反应不一，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就此开始。日本对其在三强中所占的劣势地位表示异议；法国也对其1.67的比例颇为不满。经过一番争论，日本和法国最终都接受了这个比例，但作为条件美、英、日、法首先在1921年12月13日签订了四强条约。条约保障了四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并取代了此前的英日同盟。1922年2月6日，五强海军条约和九国公约在华盛顿签署。现代史上第一个通过谈判达成的裁军协议结束了各国间的军备竞赛，并且在远东建立了相对安全的均势。同时，美国维护了其在远东尤其是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局面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1924年，英国5艘重巡洋舰下水，一个新的造舰计划在英国实施。面对如此情况，日本和美国也不甘示弱。日本开始建造4艘重巡洋舰。

---

① 前引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哈定卷，第64页。

② 前引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哈定卷，第71页。

1924 年 12 月，美国国会批准建造 8 艘巡洋舰。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又将开始。美国人为了不使华盛顿会议的裁军成果就此化为泡影，柯立芝总统于 1927 年 2 月 10 日发出邀请，要求召开五强海军裁军会议。但是美国人的号召已经不灵了。先是意大利和法国拒绝参加，而后当美、英、日三个主要海军国家在日内瓦开会时，美国与英国又争论不休，结果会议不欢而散。由于裁军对于美国来说从一开始便不是单纯的为了防止战争，而是带着遏制其他国家强大、保持美国在一战后所获得优势的目的，美国人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在军事上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不断的扩张，因而美国人裁军的理想，最终被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取代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惠国待遇的扩展〕　国际经济关系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方面。20 年代，美国政府除了利用向外投资、发放贷款等形式调节着国际经济关系外，更主要是通过关税来实现的，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美国人不仅制定了关税政策，而且提出了要把“最惠国待遇”扩展到全球范围，借以处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各种事务。

建立这一政策的想法最早是从 1899 年美国政府提出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开始的，而后在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以及其后签订的九国公约中，得到了加强。20 年代早期，被国会中保护主义的压力孤立的关税委员会建议消除这种不一致，要求总统在各方面推行最惠国待遇或门户开放的政策。

“最惠国待遇的条款意味着两个国家间相互以最有利的方式给予对方相同的关税；对这一个原则的全球范围的接受将意味着平等的贸易税待遇和平等的市场准人”[①]。曾在 1921—1929 年担

---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 141 页。

任政府商务部长的胡佛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这一政策的推行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充满了信心，也说明了在2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是各国间的相互贸易中的平等准入，而不是自由贸易。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到1929年，美国共与其他国家签订了8项相关的条约和12项具体执行协议，但其中大多数是与一些小的贸易伙伴签订的[1]。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柯立芝政府时期，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对外关系中重要内容。有关这项公约内容最早的设想是由芝加哥的律师萨蒙·莱文森提出的。他曾建议各个大国签订一项谴责战争的协定，并得到了当时美国国内和平运动团体的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的关注。1927年初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肖特韦尔在与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中提出建议，希望法国与美国达成一项关于宣布战争为非法并对破坏和平的行为实行国际制裁的协议。然而，白里安更感兴趣的是利用这种协定达到把美国拉入法国的联盟体系中的目的。1927年4月6日，白里安利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周年纪念的机会，为了消除法美两国在裁军和战债方面的摩擦、达到要求美国财政援助的目的，发表致美国人的公开信，建议在两国间拟订一项宣布战争为非法的公约。起初，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美国国内的重视，国务卿凯洛格对此反应冷漠。4月25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人们注意，美国要接受白里安的邀请。经过媒体的报道，立刻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平运动团体对此积极支持，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站在了赞同的方面。华盛顿不得不开始对此给予重视。正在这个时候查尔

---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43页。

斯·林白于5月20日，单独驾机从纽约直飞欧洲并在巴黎郊外成功降落。这一事件不仅成为美国航空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而且一时间使美国与法国民间的友谊达到了高潮，对美国政府最终作出接受法国提议的决定起了推动作用。6月20日，白里安正式照会美国。美国政府遂表示赞同。但国务卿凯洛格认为双边条约是从法国利益出发的一种消极的军事同盟，同时为避免美国和法国建立某种同盟的感觉，因此12月美国政府在答复中建议扩大条约签订的范围，并于1928年4月13日向其他各国散发了根据这一意图拟订的声明草案，表示美国同意在巴黎签订这项公约。在此情况下，法国外长白里安只有勉强接受。1928年8月27日，美、法、德、意、比、英、日、波、捷等15个国家在巴黎开会，签订了《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通常所谓的《凯洛格—白里安条约》，缔约各方共同宣布："他们谴责诉诸于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并在处理相互关系上放弃以战争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做法"；"所有可能发生的争端或冲突的解决或处理，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都只能用和平的方式"[①]。1929年1月15日，该条约以81对1被美国参议院批准。凯洛格本人因为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继15国之后，又有其他国家加入了这个条约。截止1933年，该条约的缔结国共计62个。

然而，这项条约正如人们通常评论的那样，它只是一种"羊皮纸上的和平"，它所追求的和平只是建立在纸上的承诺中的。除了各国的诚意之外，没有其他保障这种和平的后盾，虽然提出了要放弃战争，但没有提出对侵略的惩罚。它完全依靠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力量。尽管在条约中表示了"各国关系的所有变化只能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柯立芝卷》，第121、122页。

通过和平的手段，只能是和平的和有序调整的结果，在此签字的任何国家此后如果要用战争手段来谋求其国家利益，那么将不得享受本条约规定的利益"[①]；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违反条约会受到哪些惩罚。因而，这个条约只能是防君子而非防小人。德、意、日尽管也加入了条约，但它们依然能够在后来发动20世纪最残酷的世界大战。

三、对欧洲的有限干预

20年代在对待欧洲问题上，美国始终坚持了有限干预的原则。在整个10年中，美国政府对欧洲政策中大致就只有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两件事，即有关德国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及处理与其意识形态对立的苏联的关系。

〔*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　19世纪20年代战争的借款与赔款是影响欧洲乃至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也是花费了不少精力。整个战争期间，协约国共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利率为5%的贷款70亿美元[②]。为了处理战后赔款和战争债务等问题，1922年美国国会设立了战争外国借款委员会。由于美国政府高额的关税政策，影响了欧洲国家偿付借款的能力。1923年，国会同意减少部分战争借款的政策，从英国的30%到意大利的80%，各国借款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免[③]。

尽管如此，但是欧洲最大的问题德国的赔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21年德国的赔款固定为330亿美元。战后，德国人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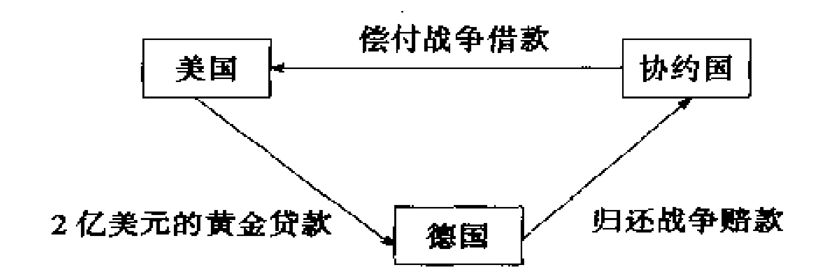
---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柯立芝卷》，第121页。

②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剑桥美国人民史》，第3卷，前引书，第265页。

③ 莫里森：前引书，第265页。

了富庶的鲁尔区，沉重的赔款负担使德国的经济日益困难，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1923年，这种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德国马克降到了只有已分文不值。一张平信邮票要100万马克[①]。面对欧洲金融即将出现的动荡，法国、英国的无力调整，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出手。首先，波士顿的律师罗兰德·波依登一个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人，公开批评法国对德国的政策，提倡债务和赔款必须在"有能力支付"的原则上解决。1923年11月，国会赔款委员会任命了由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和亨利·罗宾逊、欧文·杨格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解救美国有欧洲的借款，说服法国撤除鲁尔，帮助德国政府建立新的、健全的货币，使德国具有一定的偿付能力。1924年4月9日，专家委员会发表了报告书即"道威斯计划"，1927年7—8月的协约国伦敦会议正式通过。根据计划，美国向德国提供了2亿美元的黄金以帮助德国稳定金本位制的德国马克，并通过建立如下图所示的金融机制来收集和分配赔款，制定一个德国可以遵守的支付日程，从而使欧洲摆脱了金融崩溃。



美国人能如此慷慨地解囊相助，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国务卿休斯曾这样说，"我相信道威斯计划的执行是必要的"，如果不那样的话"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必定不仅陷人国外的混乱的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66页。

局势中，而且要面对一种极度的失望"①。一方面正如很多国内外学者所说的，美国借着此项计划，扶植德国在欧洲大陆与法国保持力量的均衡，从而体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均势外交的思想，有利于美国开展与欧洲的交往。而另一方面，美国人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种援助既为美国的产品开拓了欧洲市场，又为美国国内的大量盈余资本找到了理想的输出渠道。德国因此成为了美国人投资的最主要对象。从1924年到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间，在德国的对外借贷中，美国占了80%②。1929年，杨格再度受胡佛总统委派，在上述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了有关德国赔款的计划，把德国的赔款从原来本息相加330亿美元减少到90亿，并将最后的付款期限延长至1988年。到1931年，德国已经偿付了45亿美元的赔款，其中25亿来自于向美国私人投资者的借款③。

〔对苏俄的态度〕　美国在20年代处理欧洲事务中的又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处理与苏俄的关系问题。一战期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由于列宁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意识形态问题成了美国与苏联两国关系之间最根本的障碍。威尔逊在苏联成立之初就采取了不承认的政策，除了上述这一主要原因之外，还包括他认为苏联政府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不守信义的原则、苏俄政府并不代表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等原因④。20年代共和党执政时期，在对苏联政策方面表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威尔逊的不承认政策，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51页。
②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51页。
③ 莫里森：前引书，第266页。
④ 杜蒙德：前引书，第410页。

甚至和欧洲其他国家一起武装干涉苏联；另一方面，在胡佛的商业部的领导下又在经济方面与苏联保持着非官方的交往。

美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早在苏俄政府刚成立时便开始了。国务卿蓝辛首先草拟了支持白卫军卡列丁、阿力克赛夫等人的计划，从1918年开始便和日、英、法等国一起把军队开进了苏俄领土。5月24日，美国继日本登陆远东海参威之后，把巡洋舰"奥林匹亚"号开进了摩尔曼斯克港口，6月9日海军陆战队又在同一地点登陆，威胁苏联北方的安全，并企图向内地进攻。7月8日，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了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联合进行武装干涉的协定。9月1日，美国军队分别由格拉夫斯特和司徒华特率领，侵入西伯利亚和苏俄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又和英国、法国一起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干涉行动。第一次干涉中，美国等14国军队援助了盘踞在西伯利亚被他们公认为是俄国最高统治者的高尔察克，编制成装备精良的30万白卫军。但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便被苏联红军打败。当第一次干涉还进行中时，美国又在南方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行动，为叛军提供了足够装备10万人军队的武器，派遣了特别军事代表团，结果仍然是没撑多久便被打败了。美国并没有甘心，而是于1920年4月参加了第三次武装干涉，为波兰地主军队和白卫军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向波兰地主军队资助5000万美元的贷款，并宣布对苏俄停止商品输出，采取封锁政策。然而，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等政策，保卫了革命的成果，使美国的干涉再次落空。

1921年苏俄发生饥荒，以胡佛为首的美国援助委员会，立刻展开了行动。1922年200名美国人在苏联进行着援助行动，据统计援助委员会共计营救了1100万人。美国的这次援助并不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而更多地是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胡佛

部长希望通过援助行动扼止美国国内因大量盈余而不断下降的农产品价格，国会也从美国作物公司的基金中拨出2000万美元，并允许用它来购买美国多余的玉米[①]。此外，胡佛还把对苏联的援助看成是一种反对苏联政府（1922年底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方式。他认为美国的援助可以有助于让俄罗斯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所以，他迫使苏联政府同意援助委员会尽可能分散地与俄罗斯人进行直接的接触。美国的企业在这十年中也同苏联政府保持着联系。1925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货车有1/3出口到了苏联，1927年苏联农民使用的货车中有85%是福特制造的，1929年福特公司还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项关于帮助建设苏联汽车工业的协议书。其他诸如杜邦、通用电气等公司也都与苏联政府就贸易和技术转让达成了一致。苏联为20年代美国大量的多余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美国的私人投资等又为苏联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帮助。到1928年，在苏联的所有外国投资中美国占了1/4，1930年美国出口市场的25%在苏联[②]。

四、对美洲扩张政策的收缩

自从门罗宣言发表以来，美国一直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旗号下寻求成为美洲的老大。20年代，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更是如此。但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具体处理美洲事务时，往往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扩张的角度，采取了收缩与扩张并用的手段。

---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17页。
② 海因斯：前引书，第240页。

〔美国对拉美的总体战略〕　从门罗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到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威尔逊的实用外交和理想主义，拉美尤其加勒比地区一直是美国重要的战略防御范围，美国长期对这一地区采取了直接干涉政策。对美国人来说，无论其对美国卷入欧洲或亚洲事务的态度如何，都对拉美问题表示关心。因为拉美地区为美国提供了有利的贸易环境，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铁路、公用事业、石油等大量投资。进入20年代，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了部分拉美国家的目标，而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从加勒比撤军的呼声，因此这一时期美国的拉美政策处于从强行扩张干涉到睦邻友好的政策调整阶段。虽然哈定、柯立芝和胡佛的拉美政策并不一贯相同，但共和党政府对这一地区总体上目标是确定的，即通过撤军等手段限制解决各种争端，减少美国对该地区的政治控制，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实现正常化，最重要的是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

美国的这种对拉美的战略首先体现在三届政府的执政实践中。哈定在竞选时就针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要在国联大会上控制12张拉美选票的说法，提出了美国不干涉加勒比各国事务的政策。上任后，在他仅有的几项比较成功的任命中包括了国务卿的任命，国务卿休斯的外交政策对整个20年代美国的国际形象起了重要的影响。在对待拉美问题上，他坚持贯彻了哈定竞选时的不干涉政策。在休斯的战略中，并不是要限制美国对拉美的责任，他同样认识到维持美国在加勒比的强大影响的重要性。所以，他所做的只是让其他国家相信美国对拉美的自由和独立方面没有别的企图。为了表示美国对建立友好关系的诚意，在休斯的努力下，美国与中美洲各国于1922年2月签订了条约，声明相互保持中立、建立中美洲法庭、同意限制军备。12月，他又发起组织了华盛顿中美洲国家会议。在会上休斯明确表示了美国的

立场，“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损害你们的利益而使自己满足的野心，没有与你们的国家愿望相反的政策，也没有要在促进和平的利益以及用你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获得你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有利条件两个方面有所保留的目的。美国的利益存在于这个半球的和平和你们的利益受到保护的条件中”①。同样，正如当年哈定总统的国情咨文中所反映的，20 年代的美国并不是完全放弃干涉权利，而是仍然坚持了有限介入的原则，“中美洲国家的代表团为了稳定他们的国家、消除所有不一致的迹象，现在正聚集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前，寻求国家间的谅解。他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在这里相遇的，而不是我们躲避。他们接受我们的好意，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无私和帮助”②。当凯洛格接替休斯之后，在继续坚持休斯时期的战略原则的基础上，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如果哈定时期这种调整还仅限于使美国不再与拉美国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柯立芝总统则更强调对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因而一方面他主张撤军；另一方面要求参与到各国的内部事务中。“这个地区所有的冲突能够平静、满意地解决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愿望。与我们追求和平的愿望同时存在的是我们对我们拉美兄弟国家财富增长的强烈希望，以及始终存在的推进与他们之间合作的目标，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并常常受到最诚挚的友谊的鼓舞”③。而到了胡佛当选总统后，又大肆摆出睦邻友好的态势。胡佛本人首先是进行了一次所谓友好愿望的拉美之旅，而后又反复强调了美国愿意和南面的邻居们建立最诚挚的联系，同时他还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永远不介入任何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 154 页。
②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哈定卷》，第 110 页。
③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柯立芝卷》，第 58、59 页。

国家的内部事务，拒绝用武力维持经济联系的做法，并声称“我们要用行动来维护我们的信念和理想”①。美国政府的努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据统计，到1929年，美国在拉美的私人直接投资从1924年的10.26亿美元增加到了30.53亿，出口量增加了3倍达到9.86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20%。②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另一个表现就是重新解释门罗主义，推翻罗斯福的推论。首先是休斯不断地强调门罗主义只是一种完全自卫的政策，它既不侵犯任何美洲国家的独立，也不承认美国可以干涉邻国的事务。副国务卿鲁本·克拉克发表了“门罗主义备忘录”指出：门罗主义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是针对欧洲国家而提出的，并用来保护拉美免受欧洲列强的侵略；西奥多·罗斯福的推论既不来源于门罗主义，也不是其组成部分；并强调“就拉美而言，门罗主义现在不是，永远不是暴力和压迫的工具，而是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阴谋中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并且随时可以利用的一种对它们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有效维护”③。

〔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争斗〕　美国与哥伦比亚的问题起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提出的泛美政策。他迫使哥伦比亚把巴拿马的控制权交给了美国。威尔逊政府时曾努力弥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造成的与哥伦比亚的矛盾。1914年威尔逊政府与哥伦比亚签订了条约，据此美国将对掠夺巴拿马一事向哥伦比亚道歉并支付2500万美元的赔偿。这引起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强烈不满，他通过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代表阻止了条约的批准。只是到了20年代，老罗斯福死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才出现转机。

---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156页。

②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③ 洪国起、王晓德：前引书，第163页。

1921年，哥伦比亚准备收回私人开发地下石油矿藏的全部权利，美国在获得哥伦比亚的油田租赁上出现了困难。参议员洛奇为了美孚石油公司能得到哥伦比亚政府的特许，在参议院领导了一场有关支付赔偿和批准条约的斗争。当时，美国在哥伦比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方面。尽管当时有20名参议员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支付了赔偿就等于自己承认了错误，但道歉条约还是于1921年4月21日被批准。而后1922年哥伦比亚政府正式批准条约。至此，美国与哥伦比亚的紧张关系开始松动，美国在哥伦比亚的石油投资也从1922年的200万美元增至1929年的12400万美元。

然而，在美国与拉美关系中，最大的冲突焦点则是美国与南面的邻居墨西哥之间起伏不定的争端。两国的争吵是从墨西哥卡兰萨政府的国家主义政策开始的。1918年2月19日卡兰萨政府颁布实施1917年墨西哥宪法第27条命令，将1917年以前外国人获得的所有地下石油和矿产的所有权赋予墨西哥人民，并要求这些财产的外国主人向政府领取新颁发的特许使用证。这一政策由于美国和英国的抗议而被延期执行。但问题并没有解决。1920年4月奥夫雷贡将军领导的革命废除了卡兰萨政府。美国政府出于自己的商业利益，保护美国人财产权利，始终没有承认墨西哥政府。当休斯上任时，面临的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谈判。1923年9月，双方签订了两项条约，墨西哥政府承认美国人在1917年以前获得的地下土地的权利，同意建立协调委员会解决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其他问题等。而美国则承认了奥夫雷贡政府，并派军队帮助该政府平息国内的叛乱。但不久1924年卡列斯就任总统，再次推翻了1923年的协定，将所有外国人手中的油田、矿藏和其他财产国有化，并对天主教会进行打击。卡列斯提还提议通过了有关外国人只有拒绝接受其本国政府的保护才可以获得墨西哥土

地、同时，他要求美国的油田主们把所有权换为50年的租借权，美国和其他国家石油公司必须在1927年以前重新申请特许权。

卡列斯的这一举动对美国在墨西哥的利益将是很大的打击。因此，国务卿凯洛格和柯立芝总统一开始都抱着开战的态度。凯洛格说，“我们是有耐性的，而且当然认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不能纵容它违反自己的义务，不保护美国公民”① 美国国内甚至还有人指控卡列斯政府在与苏联合作，妄图在墨西哥培育共产主义。当1926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两国之间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在此危急时刻，美国国内的劳工组织、新教徒组织等公众团体高涨的反对战争的情绪，使参议院开始酝酿改善与墨西哥关系的友好行动。1927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和平解决争端。柯立芝派出了自己的好友、摩根集团的合伙人、职业外交官德怀特·莫罗出任驻墨西哥大使，负责解决与墨西哥的问题。莫罗与墨西哥政府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带着威尔·罗杰斯进行了一次参观访问，以通过牛仔的形象来改善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印象；邀请驾机飞越大西洋的查尔斯·林白访问墨西哥城，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等等。通过这些方法莫罗逐渐使卡列斯修改了石油法，使两国之间的油田纠纷取得和解，并使墨西哥政府调整了与教会的关系。1928年3月，美国宣布与墨西哥之间不再存在突出的矛盾，争斗终于得到暂时的解决。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问题的解决不仅实现了共和党人解决争端、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而且更维护了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

〔从加勒比撤军〕　20年代美国人在其后院加勒比地区采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40页。

取了收缩的战略，开始把驻扎在该地区国家内的军事力量撤回，实现这些国家的自治。但是，美国人的这一想法在具体问题上似乎有点一厢情愿，至少在尼加拉瓜问题上是如此。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干涉从塔夫脱总统时期开始。自1909年以来，美国在尼加拉瓜不顾多数尼加拉瓜人的意愿，一直用武力维持着不得人心但亲美的保守党政府。1923年国务卿休斯承诺尼加拉瓜实行和平选举后，美国将撤走军事力量。1924年尼加拉瓜大选，自由党人卡洛斯·索洛萨诺当选为总统。于是，美国就于1925年8月撤回了驻尼加拉瓜的海军陆战队警卫部队。然而，此后形势的发展是美国人未曾始料的。在美国撤军后不久，保守党领袖米利亚诺·查莫罗便立即迫使索洛萨诺辞职。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为此尼加拉瓜国会又于1926年10月，选举了一直与美国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前总统阿尔多福·迪亚斯为新总统，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又一次犯了判断性错误，轻率地作出决定，立即承认了新的迪亚斯政府，从而造成了美国的被动局面。随着流亡自由党人前副总统胡安·萨卡沙回到尼加拉瓜，该国国内一场全面叛乱开始了。面对迪亚斯政府的求救，柯立芝总统作出的反应加深了美国的错误。从美国的利益考虑，当时出兵是必然的，因为美国权益集团在该国总计有1200万美元的投资[①]。1927年，他派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重回尼加拉瓜，镇压起义维持秩序、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尽管派军行动暂时遏制了战斗的发展，但离最终解决问题还相差甚远，而在美国又出现了对这一行动的抗议活动。看来柯立芝此举是吃力不讨好。最后他派了后来出任胡佛政府国务卿的亨利·史汀生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尼加拉瓜解决冲突。经过史汀生的调停，尼加拉瓜冲突双方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40页。

终于达成一致，双方交出了武器，并同意在美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1928 年 11 月 4 日，尼加拉瓜举行大选，结果自由主义分子何塞·蒙卡达取得大权，1929 年 1 月 1 日正式就任。而美国军队由于叛军领袖桑迪诺发起了反对美国军队驻扎的战争，一直到 1934 年才从当地撤回。

类似的问题在多米尼加似乎要简单一点。因为休斯深信多米尼加人已经作好了恢复自治的准备。1922 年起，他开始与多米尼加领导人进行谈判，达成了“休斯—佩纳多计划”。根据双方的商定：多米尼加接受一个批准军政府签定的所有契约以及全部行政命令及法令的协定；承认 1918 年和 1922 年发行的债务；为保证上述协定的执行，1907 年条约继续有效；美国同意在一个临时的多米尼加政府控制下，进行立宪选举；一旦新政府成立，美国军队将全部撤走。1922 年 10 月 21 日，临时政府成立。1924 年 3 月 15 日，举行了立宪政府的选举。7 月 12 日，奥拉肖·巴斯克斯总统就职，美国的军政府宣布解散，美国占领军也结束了对圣多明各的军事占领逐渐撤出。然而美国并没有完全把多米尼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在该国扶植亲美的政权并控制了海关，分割占有了部分的主权，并一直持续到 1941 年。而另一个国家海地，美国的撤军因为担心该国国内会出现无政府的混乱状况、对美国造成不良影响而不得不推迟。尽管休斯曾于 1922 年派专员到海地进行调查，以恢复海地自治。但调查的结果却使美国没有很快采取行动。1929 年，莱众市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海地人攻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局面，胡佛总统再次派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1930 年 11 月，海地进行了民主选举，斯特尼奥·文森特就任总统。1934 年，美国军队全部从海地撤走。

20 年代，尽管美国在加勒比采取了撤军自治的战略，但加勒比海仍然是美国的内湖，美国的收缩是在不影响其安全和利益

的基础上进行的。

〔美国与加拿大〕　　在讨论20年代美国的对外关系时，美国与加拿大这个北方邻居的关系常常会被人忽略。一战中，加拿大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在西线战场上与美国相比遭受了较大的损失。1921年它仅有880万人口，只相当于美国宾夕法尼亚一个州的人口，却背负着22亿美元的战争借款，与美国的240亿美元相比，这个负担不能不说相当沉重[①]。而在政治上，战后加拿大国内出现了一个农业政党，国家激进党，在1921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进步党获65席位、保守党50席、自由党117席[②]，总督遂宣布由多数党自由党领袖麦肯齐·金组阁。

自由党一直和美国保持着友好、密切的关系，而麦肯齐本人又曾在美国学习工作过。他曾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1911年选举失败后回到美国加入了洛克菲勒基金对产业冲突的调查和调解。与此同时，战后加拿大也开始积极努力摆脱英国对其外交的影响。在巴黎和会上，首相罗伯特·博登便坚持要求加拿大独立于英国之外单独签署和批准凡尔赛条约。1922年当英国要求加拿大在国联就土耳其问题投票中站在英国这一边同意宣战时，麦肯齐断然拒绝了。这样的传统和经历，加上战后加拿大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美加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浪潮也影响了加拿大，使之成为美国经济的一部分。1922年美国的投资者取代英国控制了加拿大的资本市场，20年代加拿大成为美国在世界上第二大商品出口国。“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击败了加拿大本国的汽车工业；通用电气控制了加拿大最大的电气公司，美国的附属企业生产了加拿大2/3以上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72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72页。

的电气设备；美国的杂货店、小零售店和食品店遍及整个加拿大"[①]。当1926年加拿大在和英国之间经过谈判获得了准独立的地位，开始独立组织其外交事务的时候，美加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1927年初，文森特·马塞被作为加拿大的外交使节派往华盛顿，美国则派了威廉·菲利浦到渥太华。总体而言，20年代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体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的战略，两国之间的交往仅停留在经济上。

五、对亚太地区的继续争夺

正如前面所说，20年代美国对亚太地区奉行的是绝对干预的政策。当时的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尚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对已经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美国来说，这一地区成为理想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据统计，1926—1930年间，大约有12%的美国出口流向了亚洲，这是一战前1910—1914年间的2倍[②]。而作为一个地跨两大洋的国家，随着西部开发的不断推进，美国开始意识到太平洋地区在国家防御与安全中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愿看到英法甚至日本这些实力不如它的国家在亚太地区分享着各种利益。这促使共和党政府在20年代对这一地区表现出了过分的兴趣。因此，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解决裁军问题的同时，亚太问题也是美国急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根据会后签订的几项条约，美国对亚太作了如下的安排：各国承认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等的完整，并尊重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压缩对其所占领的群岛上的海军基地的建设

① 海因斯：前引书，第237页。
② 海因斯：前引书，第237页。

和扩展，其中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琉球群岛、佩斯卡多尔列岛、福摩萨等；英国、美国则答应不在其占领的新加坡的东部和北部以及夏威夷的西部发展新的防御或建设基地。整个20年代，美国在亚太地区忙得不亦乐乎，甚至“不管美国人是行动还是准备行动，他们的决定常常会决定谁成功、谁失败、谁还存在、谁被灭亡了”[①]。尽管20年代，美国极力想在亚太捞取好处，但那时美国对亚太的参与或因遭到其他列强的抵制或为了自身利益不愿冒风险而显得有限。当1929年中俄为了中东铁路在东北开战时，虽然国务卿史汀生原本想以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对此进行干涉，结果被苏联政府一句“管好自己的事”而顶了回去。

〔美日关系〕　自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启动以后，随着自身的实力增强，日本便开始要寻求在亚太地区的霸权。而美国在完成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变之后，也想在亚太地区扩大其势力范围。对于日本，美国既想使之成为其亚太战略的一个棋子，又害怕为虎作伥、危及自身的利益。因此，美国与日本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双方都想相互遏制对方，以求获得在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优势地位。一战后，日本受委任统治的前德国属地，正好位于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交通线上，这又为两国关系增加了复杂性。

一战爆发后，美国与日本之间对中国争夺也日益激烈。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特使石井在华盛顿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协定无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双方自行商定了关于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等。但这不可能根本解决两国关系。首先是威尔逊为防止日本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北部和满洲地区，宣布恢复了国际银行财团；接

---

① 海因斯：前引书，第237页。

着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和内战，日本于1919年1月初控制了东西伯利亚的全部战略中心，美国便对日本施加了压力，要求其撤军。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两国的关系得到了缓解。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美国又给予了日本慷慨的援助，使日本人十分感激。但两国关系很快由于美国的新移民法的通过，而再次陷入危机。

美国对移民的排斥最早就是从排华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亚裔移民开始的。哈定上任后立刻颁布了紧急移民法。1923年美国国会开始制定新的永久性的移民法。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强烈的排外情绪，劳联、军团和其他一些组织和加利福尼亚人甚至明确提出排斥包括日本在内的移民。日本大使馆因此对休斯发出警告。休斯试图说服国会确定日本移民的定额每年总计246名，并劝告美国人不要采取排斥、侮辱日本人的态度。然而国会没有接受这种劝告。1924年4月10日，日本在一封概述其政府对君子协定态度的信中，提醒美国注意限制移民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尽管休斯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这封信，并引起各界的评论，但4月16日，参议院依然以71对4票通过了新移民法，柯立芝总统也很快签署了这项法案。排外法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美国与日本之间再次展开了军备竞赛。诚如休斯所言，“我们参议院的朋友们在几分钟之内就破坏了多年的工作成果，而且对我们大家的美国造成永久的创伤”①。

总之，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要竭力维护的是他们费尽心机构建的华盛顿体系，想通过它来制约日本在亚太的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施加经济上的影响。到1932年，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在日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399页。

本的投资达到4.66亿美元，1920—1930年美国对日本的债券投资达4亿美元。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从中获得有效的成果。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在亚太的扩张不断发展。

〔菲律宾的独立问题〕　美国曾在1916年的琼斯法中承诺要让菲律宾实现独立，但是1920年代共和党重掌政权期间，菲律宾仍然是殖民地，独立问题又被延迟。哈定执政后为了兑现诺言，曾派了伦纳德·伍德少将和卡梅伦·福伯斯赴菲律宾调查情况。但是由于伍德是一个激烈反对独立的人，因此他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充满偏见的报告，指责菲律宾人滥用了自治权。尽管菲律宾反驳了这份报告，但是独立问题仍因此被拖延了。而柯立芝总统本人又是反对菲律宾独立的，认为如果独立，菲律宾将会因为要自己承担防务并且在与美国贸易时要缴纳关税，而使其经济负担增加。独立问题也就被一拖再拖。

对20年代美国与菲律宾关系影响更大的是哈定和柯立芝都把伍德派到了菲律宾，担任总督一直到1927年才结束。他使哈里森总督时期取得的进步再次被斗争所掩盖。他把政府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甚至废除了国务会议，并曾导致全体内阁辞职。伍德的统治引起了菲律宾人民的公开反对，美国国内也对此表示不满。1926年柯立芝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派卡密·汤普森调查此事。面对菲律宾人民希望立即独立的要求，面对伍德总督希望获得更大独裁权的愿望和总统渴望摆脱困境的要求，汤普森在报告中提出了推迟独立的建议，并提供了三条理由：菲律宾缺乏财力、共同语言和有力的舆论；美国需要菲律宾作为一个商业基地，相互的贸易有利于菲律宾的经济安全；菲律宾的独立可能会引起远东地区的关系复杂化。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恢复总督与菲律宾议会间的合作、任命新总督等建议。因此，在伍德之后，史汀生继任总督，对菲律宾采取了安抚政策。他恢复了哈里森时期的一些

政策，如重开国务会议等等。

〔*扩大在中国的势力*〕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这块肥肉，是他们觊觎已久的。当看到欧洲列强瓜分着中国的财富时，按捺不住的美国人便抛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到了20年代，美国人又赋予这一政策原则新的解释——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这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政策，其实只是美国人扩大在华利益的一种方式。“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注：指美国）排除在外”[①]。

一战后，美国最担心的对手是日本。为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1920年10月，美国提议组成了由37家美国银行参加的新的四国银行集团。而后，又竭力促使华盛顿会议的召开，签订了《九国公约》、《四国海军协定》等协议，企图以“门户开放”为幌子，限制日本在中国的活动，维护美国的利益。在这方面，美国更多地采取直接介入中国事务的政策，通过扶植中国国内的军阀，与日本人在中国的战场上针锋相对，在混战中捞取好处。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两系军阀混战中，由于得到美国支持的吴佩孚获得了胜利，美国也乘机从中获利，美国联合电报公司攫取了在上海建设无线电台，在汉口、广州、北京、哈尔滨设立分台的权利。日本由于不甘心自己支持的皖系失利，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从而导致了直奉两系军阀在1922—1924年间的混战。美国则继续扶植吴佩孚，1923年资助了他价值300万美元的军火，并积极促进美国军火商和吴佩孚之间的买卖，达成了1万枝步枪、2000万发子弹、250挺机枪的交易。当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后，美国公使首先表示祝贺。1924年，美国又与英国勾结支持

---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以日本为后台的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进行江浙战争，使中国再次陷入混战中。后由于直系军阀内部的分裂以及皖系段祺瑞的再起，美国支持的直系战败。

美国处理对华事务的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国内革命力量的态度和反应。当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有时则表现了一定的敌视。美国曾派出战舰阻止孙中山扣押广州海关的盈余。当革命力量不断扩大、北伐取得一系列成功之后，美国开始不得不为其在华利益考虑。1923 年国务卿休斯两次要求海军部长加强在长江巡逻舰队的力量。美国人以保卫租界为由调兵遣将。当北伐军打到武昌时，美国亚洲舰队停驻在烟台的两艘驱逐舰便以 25 海里的时速开赴汉口，长江巡逻队的海军部队则在汉口登陆。当北伐军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之后，1927 年 1 月 7 日，亚洲舰队司令威廉斯亲自从马尼拉赶到上海，可见其紧张的程度。到 2 月底，已有 850 名水兵、300 名陆战队员集结在上海，更多的部队在檀香山、菲律宾等地待命。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由于美国国内的排华而出现了一股反美的浪潮。各地民众纷纷抵制美货，要求结束在华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各种特权、收回被外国军队舰船占领的土地和水域。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人的要求。当时美国驻上海商务官员甚至要求动用武力。但是，美国国内公众包括柯立芝总统在内则认为通过对一个弱国使用武力来实现商业利益和特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1927 年 1 月柯立芝政府表示愿意修改与中国关系的条约，至少在美国人在华特权问题上作一些让步。3 月，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在华美国人生命、财产利益的维护。当包括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在内的几名外国人被乱兵打死时，美国的军舰则毫不犹豫地炮击南京。整个事件的解决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对两国都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美国之所以会在20年代在中国的混战中选择蒋介石，其一是因为虽然美国在旧军阀的混战中输给了日本，但美国的扩张欲望并没有减弱，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力量。另一个原因，可能与美国人对中国人在这一时期进行的革命的认识有关。柯立芝总统曾表示，中国的北伐是对美国革命有价值地仿效，是中国人争取国家统一、从外国统治下独立的完全值得称赞的努力[①]。而蒋介石是美国人最好的选择，他与孙中山有着师徒关系，他的周围有一批或多或少有着美国背景的人。经过“四一二”政变，蒋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组成了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明显采取了亲美的路线。美国则于1928年7月25日在北平与他签订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新条约，正式承认了蒋介石政府。

需要一提的是，当美国政府为了利益而争夺时，20年代在美国的民间也出现了私人对华的援助。无论这些援助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还是属于院外集团为美国政府当局服务的一种形式，都从客观上给了中国一定的帮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修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比较著名的医学院，它于1921年竣工，在整个1924—1943年期间，为中国培养了313名医生[②]。而今天北京大学的校址所在地当年的燕京大学则靠着美国的财务支持，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的亲美的中产阶级。

总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实现它的世界战略，在20年代极力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努力发挥世界强国的领导作用，巩固了已经取得的扩张成果，调整了与某些地区的关系，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侵犯。

---

① 海因斯：前引书，第239页。

② 费正清：前引书，第311页。

第 十 章

1898—1929 年美国政治体制的变化

20 世纪初年，美国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对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适应和调整；也是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和促进。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狂飙的洗礼，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之上。但是美国为在经济上取得重大进步付出了巨大代价。贫富拉开了距离，旧秩序出现动摇，新秩序尚未完善，社会出现动荡。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部分和某种程度的失衡，社会持续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即旧的上层建筑和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美国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它的政治体制面临改革和调整，以适应这种社会关系方面的剧烈变化，这就推动了美国政体的变革。也就是说在不改变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质的前提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中的具体化的方面产生了变化。

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分析，20 世纪初美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美国经济现代化，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现代化，

这是美国朝着政治现代化目标前进的一个必然过程。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互相依存的互动过程。当三者出现错位或失衡时必须使之平衡和复位。20世纪初期美国政治体制演变就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既相矛盾又相适应这个过程的反映。

一、三权分立的权力重心由国会转向总统

〔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新格局的形成〕　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之一。一般认为，美国立国后的相当时间里，权力的重心落在国会手里。“在早期及整个19世纪，国会在制订国家政策方面往往起主导作用。像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和约翰·卡尔霍恩这样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内对当时的重大问题施加了影响。迟至19世纪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称，‘国会是联邦制中主导的，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① 国会在联邦制中占主导地位事出有因。美国人民一贯对暴政怀有特殊的反感，他们对行政权力的膨胀深怀顾忌。即使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林肯总统都属于强势总统，但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三权分立中国会为重心的老格局。内战以后，由于国会对约翰逊总统的弹劾虽然因一票之差没有成功但是国会权威日益提高。国会剥夺了宪法赋予总统的任职权，还干涉内阁事务。总统只是“国会的仆人”，镀金时代成了国会权力居主导地位时期。诚如威尔逊所说，当时“美国国家权力结构实际

---

①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中译本，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8—69页。

是国会至高无上的一种体制”。[1]

从海斯总统开始，美国三权分立的天平开始向行政权力倾斜了。尽管格兰特总统甘愿充当国会的“看门人”，海斯总统也认为国会应当承担全国事务的主要责任，但是克利夫兰总统在任职期间竟然动用了584次否决权，有力地遏制了国会对行政权力的干预。历史跨入20世纪以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原有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总统的权力终于突破了平衡点向重心方向转化，逐步进入了以总统权力为重心，总统为主导地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三权分立原则的演变出现了新的趋势，总统的权力不断扩大，国会的权力日趋削弱，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形成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关系新格局。这一格局一直保持下来，至今未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西奥多·罗斯福起了重要作用。1901年12月3日，罗斯福接任总统后第一次谈到20世纪美国的政治时，他就说，旧制度为了面临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必须改变。“18世纪末宪法制订之时，人类的智慧无法预言一扫无遗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20世纪初。……现在的条件完完全全地不同了，需要完完全全不同的行动。”[3] 罗斯福是一位强势总统，崇尚权力，追求政绩，以历史上有作为的总统华盛顿、林肯为楷模，他首先从改革行政机构着手，将权力逐步集中在总统手中。根据张定河教授的研究，罗斯福“为加强对国家经济的管理，要求国会

---

① 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第8页。

② 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126页。

③ 路易·赖特等：《民主的经历：美国简史》，斯各特·福斯曼出版公司，1968年，伊利诺伊，第298页。

增设商务与劳工部，1903 年商务与劳工部正式成立。虽然在他任职期间建立的行政机构并不多，但却开创了通过建立大批行政机构来扩大总统权力的先河。”1913 年，威尔逊执政后加快加大了罗斯福扩大总统权力的步伐。其实早在他当教授的时候，威尔逊就看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决心对此革故鼎新。1901 年，伍德罗·威尔逊教授认为“效率问题”对民主政治极端重要。他认为：“在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机构中，我们最缺乏的是集中。”美国一直由“大众会议”管理；他嘲笑说，美国的方针政策是由不具备任何或坚实的治国之才的国会委员会“一条一条地”制订的。威尔逊认为，能够提供权力之集中，保证“公共事务之统一”，实施有效统治必需之领导人非总统莫属。[①] 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就步老罗斯福的后尘，继续为扩展总统权力采取措施竭尽全力。在罗斯福改革的基础上他又扩建行政机构。他先将商务与劳工部一分为二扩展成为商务部和劳工部两个内阁部，相应地扩大了有关的行政权力。后来他又连续通过有关法案，先后设置了联邦出版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美国海运委员会、铁路劳工委员会和预算局等 7 个重要的职能委员会。这些机构的建立大大削弱了国会的权力，如：预算局的建立就使国会失去了对国家财政的管理权。诚如美国学者所称：“预算局成立后，国会把执掌国库的权力交给了专家、官僚和行政部门，留在自己手里的只是资金最后拨用权和对个别项目的反应权。……他们‘位居国会山’权重但遥远；他们不是老板，而是董事会。”[②] 这种变化当然是议员们所不愿看到的。

在扩大总统权力上，总统立法权的扩大也是重要方面。一般

---

① 罗伯逊：前引书，第 404 页。

② 罗伯逊：前引书，第 408 页。

说，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的原则，20世纪以前美国的立法权基本掌握在国会手中，总统主要以使用否决权的方式参与立法，牵制立法部门。但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为扩大权力对立法机关加大了影响的力度，罗斯福总统在任内曾经直接干预国会通过许多由他建议的社会立法。通过向国会频繁提交国情咨文的方式，成为总统积极参与立法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威尔逊总统在这方面不愧是一个敢于创新、敢于打破传统的开拓者。他打破了自约翰·亚当斯总统以来把国情咨文转交给国会的传统，1913年4月8日，他在就职的第二个月就亲自到国会宣读咨文并提出改革关税的立法要求。他要求众议员和参议员们亲自看到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向来自嫉妒权力孤岛的国会打招呼的一个政府部门。”[①] 威尔逊的举动，赢得国会的好感，因而直接推动国会迅速通过了他自己所希望的立法。威尔逊执政以后就提出了他的所谓“新自由”纲领，拟定了立法计划，引导议员们对此加以研究讨论最终通过立法。“总统提交的国情咨文实际上成为一种立法纲领，国会的许多主要立法就是在总统咨文的基础上制定的。”[②] 这种做法后来形成了一种制度，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演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虽然宪法给予总统向国会提出措施的权利，直至20世纪，总统才定期而且主动地参与立法程序。总统在每年年初向国会联席会议作他的‘国情’报告，提出政府的年度立法方案。他还向国会提出年度预算咨文、经济咨文和报告，并且频繁地向国会提交专门的咨文，以支持专门的立法。”[③] 威尔逊加强总统权力的做法对美国政治体制发生深远的影响，有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35—36页。

② 张定河：前引书，第127页。

③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50页。

的美国学者认为："威尔逊加强和扩展总统权力也许构成了他对美国政治实践的最久远的贡献。"[①] 与总统权力加强有关的是美国文官制度的最后确立，确保文官的政治中立性。彭德尔顿法曾规定文官政治中立，但仅适用功绩制文官，而政府任命的文官则不受其约束。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曾以行政命令禁止所有文官参加政治竞选活动。1912年，在政府文职人员的斗争下，国会通过《劳埃德——拉福莱特法》，给予联邦政府人员成立工会和向国会请愿的权利。文官制度的完善保证了美国文官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有利于总统权力的实施。

总统权力的扩展还表现在总统的对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上。虽然美国总统握有对外事务的重权，但是根据三权分立和制约的原则，总统的对外事务和重大决策应该通过国会，至少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同他们打招呼。但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执政期间，总统经常绕过国会自行其是，独断专行。1905年，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绕过国会就是明显一例。同年，他又未与参议院商量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与圣多明各政府签约。威尔逊在这方面决不比罗斯福逊色。1914年，他在处理与墨西哥关系问题时先撇开国会，后又先斩后奏取得国会认可。一战期间美国总统权力更为膨胀。威尔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一系列法案，建立了一批战时机构。同时美国总统利用行政协定进行外交活动数量大增，据统计：美国政府在1789—1839年间，签订条约60项，行政协定仅27项，低于条约；1839—1889年间，条约为215项，协定为238项，略多于条约；1889—1939年间，条约为524项，协定为917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34页。

项，约为条约的一倍。[1] 原因在于总统签署的条约必须经过参院2/3的多数批准；而行政协定不经参院同意就可直接生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总统权力的强化。参议院批准和否决条约的权力是牵制总统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三权分立和制约格局的变化，总统权力的加强，“参议院批准和否决条约的权力也已在实践中有所改变。自从它在1920年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以来，参议院已很少拒绝批准条约。”[2]

随着美国总统权力的加强，美国总统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迅速提升，总统成为美国人民注意的焦点人物。“美西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使美国总统（以及宪法赋予总统的一些权力）成为美国人注意的焦点，过去只有亚伯拉罕·林肯——美国人心中一场最伟大的战争的领导者、英雄和烈士——才赢得如此深切的关注。”[3] 美国总统成为民众注意的焦点同总统利用宣传媒介提高总统在公众中的形象是分不开的，“从西奥多·罗斯福开始，记者招待会被总统用来作为新闻媒介与行政首脑直接接触的机会。”[4] 这种政治技巧也为后来的美国总统所效法，随着媒介和宣传工具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总统利用媒介扩大影响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美西战争期间，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统利用传播媒介的情形，全国性媒介都利用美国人民对战争的关心把注意力集中在总统身上，总统的言论占据媒介的重要地位，不仅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总统的政治主张和政策通过媒介向美国民众进行有效的传播和解释。“麦金莱以后的历届总统

---

① （美）詹姆斯·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中译本，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564页。

②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47页。

③ 罗伯逊：前引书，第400—401页。

④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198页。

采用不同的手法和技巧，越来越多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目的是做宣教、说服工作，最重要的是划定讨论和辩论公共事务和公共政府的界限和内容。”[①]

总统权力的加强，也强化了美国总统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后，即1918年底，亲赴巴黎参加和平条约的谈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任内离开美国的总统，第一位（几乎是惟一的一位）亲自与其他主要政府的首脑一起进行重要条约的谈判总统。”[②] 对于美国总统权力的加强，美国教授林德塞·罗杰斯认为威尔逊总统“已经行使了比他前任们更多对国会的几乎是绝对的权力。”[③]

总而言之，20世纪初年美国三权分立和三权制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某种结构性的变异。从国会为重心、国会起主导作用转变为以总统为重心、总统起主导作用的新格局。尽管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他领导北方进行国内战争时，对宪法的许多规定置之不理。国会后来也批准了这些行动，总统掌握了某些主动权。但是这种非常时期的领导方式并没有改变国会的强大地位，尚未确立起总统为重心的新的格局。所以林肯遇刺后不久国会很快与总统抗衡并接连取胜，进人国会起主导作用的时期。直到20世纪初，像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那样强有力的总统，不顾国会的反对或牵制，前者推行他的环境保护和反垄断政策，后者领导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在形式上他们似乎只是继承了林肯总统的某些做法，但是两者有很大区别。林肯的做法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冲击了国会为主导作用的体制但没

① 罗伯逊：前引书，第400—401页。
② 罗伯逊：前引书，第405—406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334页。

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罗斯福和威尔逊则是改革了旧体制，建立了新格局，破中有立。当然这种政体上的变革及其成败不能完全归结于个别领导人物的个人作用。培育这种改革的土壤和条件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所以，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坛又出现了一种"回复"和"回归"的现象，强势总统被一些弱势总统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软弱的总统（哈定、柯立芝、胡佛），这也许代表了国内的一种情绪，即偏爱不活跃的行政首脑。"①

值得说明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三权分立和三权制约的新格局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变化，但并没有改变三权分立和制约的根本性质和结构。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没有改变，只是三种制衡权力结构中的重心和力量配置发生了某种量的变化，总统权力有很大的扩展甚至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依然在立法和司法对其实行制约和牵制之下发挥的，总统成为权力的重心，只是在与其他两种权力的权衡中体现了轻与重的关系。

〔*新格局形成的具体原因和历史意义*〕　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历史进程是导致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根本原因。历史经验表明，严峻的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和复杂的外部环境往往会要求一个国家或民族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果断及时处理各类危机。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工业社会综合症：垄断势力恶性膨胀，贫富差异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思潮激变，自然资源惨遭破坏等等。形势的发展要求联邦政府迅速有效地处理这些全国性、全局性的问题。但是国会本身是一个立法机构，它的特点是：多中心的权力结构，是各种地方势力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38—39页。

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混合体，也是两党党魁争权夺利的场所，必然造成国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久拖不决或无限期的延宕，难以适应20世纪初的美国形势和急速治愈综合症的需求。相对于国会，行政权力较为集中，较少受地方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罗斯福上台时大垄断集团犹如恐龙横行美国，引起社会的种种不安，迫使罗斯福加强权力采取对策；国际上列强们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美国利益何在？迫使罗斯福强化总统权力在国际上推行扩张主义，调整列强间各种复杂和微妙的关系，以获得美国的最大利益。威尔逊入主白宫后，不仅国内垄断势力十分嚣张，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且面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何去何从？正如林肯总统面临严峻的国内形势而采取许多非常时期的政治措施一样，威尔逊超越国会采取很多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势在必行。

其次，总统权力集中与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变化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和扩大，特别是铁路、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加强了不同地区人民的交流，使美国真正连成一片，美国人强化了或具有了真正的美国意识，联邦政府对他们不再是陌生和遥远的了，而且逐步成为他们可以依赖的力量，而总统恰恰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和象征。此外，20世纪初美国社会思潮已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美国人民在镀金时代发现自由放任只是让少数暴发户和垄断资本家获得好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他们进行弱肉强食、吞食弱者的理论依据，所以他们转而要求美国政府对社会经济领域加以干预，遏制垄断集团的过分膨胀，消除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政府既要进行干预就必须拥有足够的行政权力。这股思潮就为总统权力集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社

会舆论。

新格局的形成与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掌握较大的行政权力成功推行进步主义改革是一个互动过程。新格局为美国政府解决20世纪初美国社会出现的工业社会综合症起了一定积极作用，通过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克服了某些暂时出现的困难，理顺了经济领域的关系，遏制了破坏自然资源的势头等等，促使美国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促使美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如地发挥大国作用，更加放肆地推行扩张主义和强权主义，树立了美国是世界一等强国的形象。20世纪初年美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远东和拉丁美洲地区，所犯下的大量殖民主义罪行和推行卑劣的强权政治，大都是握有重权的美国总统一手策划和制造的。过大的权力可以使人成为天使，也可以使人成为魔鬼。

二、联邦制的变化

与总统权力加强相关的是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强化，美国政治体制的总特点是权力的分割和制约，联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是同水平上的权力分割和制约；联邦制度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则体现了纵向上的权力分割和制约。“联邦制，要求在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人民都会有直接影响，都有一些独有的权力。联邦制，像分权原则一样，把政治权力分散，防止权力集中在任何一个群体手里。”[1] 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美国建立了联邦制国家。这是十分符合美国国情和特点的国家权力组织形式。因为美国是一

---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25页。

个先有州后有国的国家，州的观念和地方观念在美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酷爱自由和民主的美国人民出于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害怕，经历了邦联制的实践，推动开国元勋们为未来的美国精心设计了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但是美国宪法包含了一种矛盾的思想：一方面宪法第6条明文规定，肯定宪法和联邦政府依据宪法制订的法律“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同时在第1条第8款中又规定国会拥有“制订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必要的和恰当的法律。”为以后联邦政府扩大权力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保证州政府独立性的原则。宪法第10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保留。”

不管宪法设计者们的主观愿望是什么，联邦制度在美国实施以后，州权色彩非常浓厚，州权论者表现活跃。人们往往将州权理论和维护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联系在一起。因此维护联邦统一和维护州权的争端始终存在。由于美国的领土是由大西洋沿岸逐步向西扩展推进而成的，19世纪上半叶，现代美国的完整疆域尚未最后形成，人们缺乏对美国的整体概念，而对地方和州却怀有乡土情结。自从联邦制建立到19世纪前半期，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关于集权和分权、加强联邦权力和维护州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思想发展到政治，从地方闹到联邦，并且越演越烈甚至闹到一些州提出脱离联邦的地步。19世纪60年代，最后以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为深刻背景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用枪炮刺刀解决了奴隶制问题，也维护了联邦制和国家的统一。南北战争以后直到20世纪初，美国联邦制发生变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联邦权力的增大。

〔联邦权力的增大〕　美国的联邦制度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出现过国会联邦主义、实用联邦主义和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等不同阶段。“我国联邦宪政制度已经演变为这样一种制度，与我们开始的制度相较，形式上差异不大，而实际上则不大相同。”[1] 内战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联邦制进入权力扩大时期（1861—1932年）。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该时期美国的联邦制度属于“二元联邦主义”阶段，即联邦和州都拥有较大权力，但联邦制演变的特点则是联邦政府的权力明显呈扩大趋势。

联邦权力的扩大是一个渐进过程。它是通过对州际商务的管理而扩张的。所谓州际商务（或译州际贸易）是指美国任何越过州界或涉及2个以上的州的商业贸易。历史上存在的传统看法是各州之间商业上的自由贸易不应受到阻挠。但是为了管理铁路，1887年，美国通过了《州际商务法》，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后来这种管理扩大到卡车、轮船、货物运输和其他州际间的运输。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03年2月4日国会通过了《埃尔金斯法》以加强1887年通过的《州际商务法》的法律效力；1906年又通过了众议员威廉·赫伯恩提出的《赫伯恩法》，进一步加强对铁路管理和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1914年通过《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为进一步说明谢尔曼法详细说明了导致垄断和由垄断所造成的各种非法商业活动。禁止某些类型的持股公司和互兼董事，禁止歧视性运费协议和在所谓正常竞争者重新分配销售区域等等。克莱顿法的制订经过了一番周折，它曾经被修改得毫无棱角，参议员里德曾抱怨说：“克莱顿法首次成文时，它是一头满嘴利齿的狂怒狮子。可它已

①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94—95页。

退化为一只没有牙齿、呜呜哀鸣和毫无血色的雌猫。它是立法机关向托拉斯的一种道歉：挥舞着手中的帽子，并保证不会出现无礼的举动。”① 威尔逊总统对此也深表不满。后经修改加以通过。同年国会还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决定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工作机构。反托拉斯法由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法院负责执行。1920 年的埃施——卡明斯法把管理办法加以改变来加强政府的管理。1912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管制无线电通讯的州际商务法。1926 年通过了管制航空的空中商务法，1927 年通过了管制广播的广播管制法。② 联邦政府通过大量立法加强对州际贸易的管理，为了使各种法案付诸实践，联邦政府先后成立各种相应的行政机构。

在政治上，联邦政府通过上述立法还取得干预州的权力。国会通过的《埃尔金斯法》和《赫伯恩法》不仅加强了对州际商业交流的管理，而且进一步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使原来一些由州政府管辖的商业活动纳入到联邦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期还通过连续制订的一系列反托拉斯法和对一些托拉斯进行指控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显示联邦政府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加强对全国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因为托拉斯一般均在州级政府机关注册，州政府有权对其进行管理。反托拉斯法通过以后，联邦政府可借反托拉斯为名行扩展联邦政府权力之实。

建立联邦储备银行体系是扩大联邦政府对全国金融和财政管理权的又一重大措施。1913 年 12 月 23 日，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随后根据该法建立起来的联邦储备系统（或译联邦储备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 72—73 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 78 页。

制度）实际上在美国起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威尔逊总统在国会特别强调了政府对联邦储备系统的控制，他说："我们新法律将建立对银行和发行的控制必然是公众的而非私人的，必须归属于政府本身，以致银行可能是商业，私人企业和创造性的工具，而不是它们的主人。"[①] 威尔逊总统任内还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使联邦政府具有向农业贷款的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还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立法程序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的管理和影响。如 1909 年国会提出宪法修正案第 16 条，于 1913 年批准，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无须在各州按比例进行分配，也无须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1919 年 1 月 16 日，国会又批准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规定"本条批准一年后，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②] 这种征收所得税、禁酒等全国性法令的制订和实施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和权力。针对一些州对土地、森林、矿藏等资源加以掠夺性的开发的不正常现象，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加以制止。如：1902 年国会通过《新土开垦法》，1906 年通过《美国古迹保护法》。联邦政府根据法令加强对土地、森林、矿藏等自然资源的保护，阻止一些州对自然资源的滥砍滥伐，并且"建立 5 家国家森林公司、4 个野生运动保护区、51 个鸟类保护区、18 个国家纪念地。"[③]

联邦政府又采取给各州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以联邦财政补贴的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第 48 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 1173—1174 页。

③ 张定河：前引书，第 110 页。

措施来进一步削弱州权。由于联邦政府获权征收所得税奠定了联邦雄厚的财政基础，为给州政府实行财政补助创造了条件。实行财政补贴后，如果州政府不接受就会影响州的财政，接受了补助就会对联邦政府产生更大的依赖，失去某些州权，因为联邦财政补贴绝不是白给的，它往往带有许多监督和控制。如：1916年国会制订了《联邦公路资助法》，联邦对州政府修筑的公路要进行监督。此后联邦补助金额不断增加，1918—1930年间，每年为1亿美元左右。[①] 1917年通过的史密斯——休斯职业教育法，规定国会要通过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对各州实行此法进行指导和监督。总之，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补助收回了许多本该属于州权的权力。有人认为："总之，州权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受联邦政府财政补助的损害比受商业条款的损害更大。"[②]

联邦政府有关劳工问题的一系列立法也使部分属于州政府权限的事务归联邦政府所有。1915年通过了《拉福莱特海员法》，威尔逊总统在签署该法案后说："我为什么最后决定签署该法案，因为这似乎是为被我们的法律一直忽略太多的劳工阶级干点公正事的惟一机会。"[③] 1916年国会通过《亚当森法》，确定从事州际铁路运输工作的工人标准工作日为8小时。同年9月1日，威尔逊总统带着"真正的感情"签署了国会在8月8日通过的禁止童工的《基廷—欧文法》（也称《童工法》）等。联邦政府通过这些法律超越州政府（或通过州政府，或与州政府共同合作）直接干预劳工问题。霍夫斯塔特认为威尔逊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产生的积极的立法成就比自汉密尔顿时代以来任何任期要多。"[④]

---

① 详见张定河：前引书，第90—91页。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年，北京，第9卷，第508页。

③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63页。

④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334页。

虽然“1900年后，美国州政府权力迅速削弱”[①]，但是州政府的权力和实际运作这些权力的范围仍有很大空间，即宪法最初所赋予州的权力基本上都依然保留着。美国人民不愿意交出他们的“地方自治权”。[②] 同时由于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激变，有关社会生活和社会领域的大量问题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政府的社会职能大大强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工作范围都在迅速扩大。“比政府管理权的扩充更重要的是政府工作范围的扩大。”[③] 20世纪初年美国联邦权力的扩大和州政府权力的削弱是相对的，联邦权力是从以前过弱过小的程度上加大加强；州权则由以前过大过强的水平上减弱；这种权力方面的强弱盛衰变化完全是在美国联邦制的框架内进行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联邦政府权力的增强使美国的联邦制消除了邦联制的某些痕迹，发育得更为健全和名副其实。

〔联邦权力增大的具体原因〕　20世纪初，美国联邦权力的增大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南北战争胜利带来的必然结果。南北战争的胜利不仅消灭了黑人奴隶制度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它是一场由资本主义制度取代黑人奴隶制的革命，也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是美国长期来联邦主义和州权主义争论的最后摊牌，州权主义因其最终导致联邦分裂和维护奴隶制度的严重后果为多数美国人不齿。南北战争的胜利既然维护了国家统一，战后加强联邦的权力和统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世纪之交，美国经济的高度发展，现代化的交通不仅使美国变成两洋国家而且将城市乡村连成一起，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

---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前引书，第9卷，第508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76页。

③ 杜蒙德：前引书，第79页。

展，统一的疆域和版图的出现，使美国从一个尚在不断向西推进中的、变化着的、不定形的国家最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由48个州组成的一个稳定的美国。美国人经历了先有州后有国的政治道路，直到20世纪初他们才进入到真正完整的国家阶段。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时代，美国大陆扩张已经完成，西进结束，星条旗上已有48颗星在闪耀。联邦是国家的象征，48个独立的州虽享有很大权力，但毕竟难以处理和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类问题，酷爱自治的美国人除了加强联邦权力外也别无出路。从外部条件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参战直接推动了联邦权力的加强和政府机构的扩大。

联邦权力的集中和加强使美国的联邦制更为成熟和完善，从而使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联邦权力的集中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联邦和州的两级政府的积极性，使美国在大转变的时代里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化，保证了美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和发展。

三、政党制的新现象：两党趋同、第三党的壮大和利益集团的活跃

美国的政党制，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美国开国元勋们一般都反对建立政党和反对党派精神。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他著名的告别辞中谆谆教导国人：防止和反对党派精神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但是两党制度还是在美国的现实政治需要中经由萌芽状态形成和发展，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了美国政治体制的鲜明特色之一。20

世纪初年，“政党的作用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①]

〔两党的趋同〕　1884—1932年，美国两党制的发展进入了它第二阶段。从两党轮流执政的地位变化加以分析，期间民主党打破了共和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但老大党——共和党在两党政治角逐中仍占主导地位。从两大党的内部构成和政纲性质的变化上看，两党的政治倾向都在向自身的对立方向转化。它们在竞选政纲上的重大对立和政见分歧已经缩小，甚至出现相互靠拢、渗透的“趋同”现象。原因是由于在垄断资本的直接干预和经济资助下，两党逐渐成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它们的政策和经济主张都受到垄断资本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干预。两党的趋同还表现在第三党——人民党的冲击下，出现了共和党向“保守主义政党”和民主党向“自由主义政党”演变的倾向。1896年总统选举前，以保守为特征的民主党为了扩大势力采用了人民党的纲领并从组织上与其合并。结果，大批下层群众站在民主党一边，出现了民主党向自由主义政党演变的倾向性。[②] 在南北战争前后一向以改革著称的共和党则表现得越来越稳健，趋向保守主义。两大党都向着自己的相反方向演变，似乎更靠近了对方。于是也就引起了两党支持者的队伍发生“对流”现象：共和党曾经因反对黑人奴隶制而受到广大黑人的拥护和支持，黑人成为他们稳定的选民群体，但是20世纪初共和党转向保守，抛弃了黑人，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都坚持种族歧视。塔夫脱说：“我绝对不会稍稍偏离我的南部政策。……我不会在南部任命黑人为官员。……我不会放弃在那里建立一个像样的白人政党的希

①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352页。

② 张定河：前引书，第332页。

望。"[①] 这样的政策当然受到黑人的反对，许多黑人转而支持民主党，如在1912年大选中，杜波依斯也支持了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本来支持共和党的劳工也转向民主党。威尔逊时期的有利于劳工的某些立法吸引了劳工。共和党维护企业界的政策把劳工赶向民主党。同时两党内部都出现分化现象：党内形成了各自较为稳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不同党的相同派别的成员们的观点更为接近趋同。

1908年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评论说："两党犹如两个瓶子。每个都贴着表明所盛液体的标签，但每个都是空的。"[②] 话虽尖刻了些，但很形象生动。美国两党在根本政策上的差别除了一些特定历史时刻有所表现外，历来就不是非常巨大和不可调和的，而且两党的这种政纲和宣传仅仅是一种为了获取选票的美丽包装，准备将它实行的程度和可行性甚至连党魁和政客们也心中无数。美国学者劳森认为美国两大党的争论焦点一般可以归纳为：1. 财富在国内的分配问题；2.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适当作用问题。但是不能由此认为这种区别非常尖锐和不可调和。"虽然在一个既定时刻，根据他们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他们的外交政策立场，政党间相互能被粗略地加以区分，但是他们的区别决不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在这些基本差别上偶然会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例外。"[③]

20世纪初年美国两党的这种趋同性表现更为显著，在政纲上两党事实上已经成为没有多大实际内容的两个"空瓶"。根据

---

① 小施莱辛格主编：《美国共和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8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18页。

③ 凯·劳森：《美国政党和民主》，杰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纽约，1968年，第34—35页。

劳森的统计该时期两党在竞选中的主要争议事件是：1900年是银币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即自由铸造银币运动，1896年民主党人将自由铸造银币列为政纲的主要条目，并提名提倡此说最激烈的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但因共和党获胜，1900年大选民主党再次提出银币问题。共和党再次获胜。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金本位制法案，规定美国货币的惟一本位是黄金。1904年大选是托拉斯和关税问题；1908年是托拉斯和关税问题；1912年是腐败和大企业问题；1916年是战争问题；1920年是恢复常态问题；1924年是繁荣问题；1928年是经济状况，禁酒和宗教问题。但是两党在上述问题上的主张和政策不完全是对立的，更不是水火不容的。虽然有些问题在竞选时两党的歧见似乎很尖锐，争论十分激烈，甚至"势不两立"；但是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以后，两党关系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1800年，杰斐逊总统击败联邦党总统亚当斯人主白宫，不久他就宣称："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都是民主共和党人"。其次，两党内部也政见不一，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反对民主党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他上台后基本奉行了共和党的政纲；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都形成了保守和自由两大派，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与共和党主流派发生分歧，另立山头创建进步党；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执政时的政策与共和党的罗斯福有很大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坚持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都可归结为进步主义的框架内。

两党的趋同与两党的内部结构成分的变化也直接有关。

〔两党成分的变化〕　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已今非昔比，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动，阶级和阶层出现重新组合，以前那种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结构被复杂而多层次的工业社会结构所取代，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涌入，更使复杂的社会

结构添加纷纭变化的可变因素。这就导致美国两党的内部构成和成分产生变异。20世纪初加入两大党的民众已经不是昔日的美国人。内战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成分受政治观点影响较大，共和党以反对南方黑奴制的北方人士为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包括北方工人阶级等等；民主党的主流派为保守的南方种植园主阶层。两党在政治上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诚如英国布赖斯勋爵在《美利坚共和国》中写道："现在美国政党之所以继续存在，因为他们已经存在。"[①] 由于两党的组成已不再是按政治立场和信仰决定，而按照经济利益和阶层利益决定。霍夫施塔特认为内战后的美国政党是基于恩施而不是原则；他们的分歧发生在分赃上而不是事件上。"[②] 此话十分中肯。

所以一般说来，根据小施莱辛格的研究，共和党作为老大党更加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党。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它一直能掌握40%的起作用的选举人。因为当时在美国，就能得到的经济上的机会来说，本地人要比外来移民多，新教徒要比天主教徒多，西北部的欧洲人要比东部和南部的欧洲人多。其结果在老大党内更多地集中了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1900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将近600万）、富裕农民、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小商人、专门职业人员和一般受过教育的人。"[③]

随着资产阶级财力和权力的壮大，共和党内部聚集起大批企业家、实业家、银行家和公司巨头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实业家、金融资本家和大公司经理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共和

---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218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218页。

③ 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美国共和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08页。

党。”但是很少大实业家或金融家本人亲自在党内或政府内任职，只是大企业中的许多第二级领导人，特别是铁路和大公司律师，担任了由选举产生或任命的高级职务。例如，1869年至1901年，合众国参议员中有1/3的共和党人是企业家出身，而民主党人中只有1/7……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所占比例这样高，这就保证了共和党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能干的人员到大部分城市、州和国会担任各级领导工作。”[①] 经过共和党和政府部门的这种人员交流循环，共和党内的有钱阶层不断扩大。当然在共和党对政府的控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共和党派遣到国会去的那些人的经济思想。他们受到地区和州的利益的驱使，又因为他们是依赖企业的大部分竞选资金来源获取选票跻身政界的，所以他们的经济主张和政策倾向昭然若揭，何况许多共和党人本身就是企业家，或者通过他们的律师业务而同企业有思想上的联系。垄断大财团支持和资助共和党竞选，共和党获胜后再通过共和党成员控制国会，制订有利财团的一系列政策，回报财团的恩施。世纪之交，由于共和党长期执政，国会里形成了一个共和党的小核心控制了立法程序。由“乔大叔”坎农领导，小核心几乎形成了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操纵政治，玩弄权术。“1894和1910年之间共和党控制联邦政府达到了美国政治史上罕见的程度。”[②] 所以共和党对劳工漠不关心或者持敌视态度。[③]

与共和党不同的是民主党得到比例较高的工人的支持，特别在与人民党合并以后，民主党中的农民比例增高。但是民主党中仍有相当比例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企业家，在党内占决策主导地位

---

①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208—209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144页。

③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209—211页。

的还是有产阶级。尽管两党的结构成分上存在差异，因此也影响了它们的经济主张和外交政策，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是两党都与某些美国大财团相联系。两党都要依靠财团作为后台老板提供竞选经费和资助。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逐渐形成了一个富裕的农业资本家阶层，随着南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美国南方的大企业家和金融家也相继崛起，他们和民主党建立了紧密联系并往往成为民主党的“主心骨”。如犹太金融集团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大后台。美国实业家休伊特在19世纪80年代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市市长，击败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工业家、发明家麦考密克都全力支持民主党。财团支持两党竞选，党的领袖作为新的企业政治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发挥作用。企业影响政党和操纵政党机器最典型的实例是，马克·汉纳是美国操纵竞选运动的实力人物，原在克利夫兰开煤铁公司，后又投资银行、运输和出版业。他支持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1892—1896年为州长，1897—1901年为总统。1896年竞选时期，他筹集350万美元向各地派出1400名人员，散发千百万本小册子，为麦金莱效力。麦金莱上台后即任命参议员谢尔曼为国务卿，让汉纳补其缺成为参议员。又如：前参议员托马斯·普拉特曾一度控制纽约州的共和党，在1900年操纵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时期，美国两党内部滋生出一批党魁，他们不是合法产生的领袖，而是一些在党内有势力的职业政客。他们为垄断资本服务，仰资本家鼻息行事。

在一些根本性的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没有原则性的差别，这是两党趋同的最基本的表现。如：在对待工人运动问题上，两党均采取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基本立场，只是在处理方法上略有差异；在关税政策的反复修改和制订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大都主张保护关税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或通过妥协

调和保持适当税率。在对外政策方面，两党的立场几无差异，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对外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包括对远东和中国的侵略政策，“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决策者几乎毫无保留的支持，并使国家更深和不断地卷入远东事务中去。”① 两党的趋同还反映在他们的地区差异日益淡化和消失。原先独占南部的民主党现在向西部、东北部扩展；共和党则在城市中占较大优势。由此可见，20世纪初，美国的两党制发生了某种变化，政党制受到垄断资本和经济势力的重大影响，更加商业化和企业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本身也变成了一个企业，一家股份公司。谁的股份大谁的发言权就大，谁的经济实力强大，谁就在党内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诚如西沃德所说：“一个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家股份公司，那些在其中贡献最多的人指导行动和管理有关事务。”②

20世纪初，美国两党几无重大原则上的分歧，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是依靠他们的原则和纲领取得竞选的胜利，不是依靠他们政纲的先进和科学，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外政策更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取得胜利，他们获胜的法宝是经济势力和政治手段。“共和党获胜所依靠的真正本钱，看来集中在金钱、组织和灵活运用戴维·希伦所谓的政治交易这三方面。”③ 这是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但是权钱交易必然引起腐败。

两党制的演变和政党的腐败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从1890年开始，为了民主的利益应将政党活动加以控制的想法进一步在立法中获得表现。“许多州通过了‘反腐败行为’条例。起初这

---

①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250页。
② 转引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19页。
③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215页。

些法律几乎无人理睬。但是在1904年选举以后，运动复活了，各州和联邦政府都采取了额外的措施。1907年联邦法铺平了道路，1911年的联邦法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些规章的目的是为竞选运动的收支作出规定……"。[1] 塔夫脱政府于"1910年初，又在两项重要政治改革方面采取了初步措施。第一个是要求公布有关国会议员选举的费用的法案。在全国性的选举中，所有捐助竞选基金的人的姓名、捐款的数目以及竞选委员会一切费用的分类账目，都必需加以公布。第二个是关于成立节约与效率委员会来研究政府行政单位办事方法，以便消除浪费的方案。"[2] 可见美国的两党制尚处在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之中。

〔第三党运动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党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早在1826年就有反共济会党，后有美国党（无所知党），脱离联邦派的民主党，宪法联盟等等，这些小党一般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他们虽曾多次企求取代两大党的地位，但都在全国竞选中败北；但有的小党如1848年成立的自由土壤党，党虽小，影响很大。它提出的"土壤自由、言论自由、劳动自由、人民自由"的口号受到小农、小贩和工人的支持。有些小党在州或地方竞选中获胜，但对全国没有造成影响。美国学者凯伊认为美国的第三党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具有连续政纲的党，如德布斯领导的社会主义党；一是反复产生但存在时间不长的党，如1826年建立的反共济党，这些政党不是从一个大党中分裂出来就是产生于某些利益集团的联合。[3] 内战以后，第三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特别在19世纪90年代，

---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0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165页。
③ 凯·劳森：前引书。第45—46页。

美国平民党运动开启了第三党运动的新阶段。诚如凯·劳森所评价："1892年平民党（也译人民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第三党运动的开始。"[①] 在这"最有影响的"第三党发展时期中，第三党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1. 发展迅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批第三党相继在美国政坛出现，如绿背党，禁酒党，平民党，社会劳工党，美国社会党，罗斯福的进步党和拉福莱特的进步党等；2. 发展规模扩大，如人民党和进步党都颇具规模，有很多的拥护者，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对两党真正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威胁；3. 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增大，第三党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纲领，很可观的选民群体，得票率提高；4. 第三党往往在大党的分裂中产生最后又被大党"吞食掉"，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党和20世纪初的进步党的兴衰都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变化的，都脱离不了这个怪圈。

世纪之交，美国工业化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促使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对社会发展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但是由于垄断资本对两党的控制导致两党趋同，老大党和民主党已无法反映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所以渴求建立新的政党提出他们本阶级或本阶层的政治主张，形成为一种强大的趋势。所以说，两党的趋同成了产生第三党的一个客观条件。其次，两党内部的分裂也为第三党的出现提供契机。20世纪初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内部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些党内的政治派别往往成为新党形成的基础。再次，"镀金时代"规模巨大的平民党的兴起，虽然它在1896年同民主党合流，政党的躯壳脱去，但平民党的政纲犹在，后来平民党的这笔政治思想遗产成了20世纪初进步党的"灵魂"，平民党的某些政纲后来为进步党"所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48页。

接受”。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大为加强，民众对政治的兴趣日增，如美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进步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在1908年指出美国经济被不到100人的富人们所控制。1909年他创办《拉福莱特周刊》，后改为月刊并改名为《进步》。1909年后国会中进步派力量大增，最为著名的进步人士有乔治·诺里斯和威廉·博拉，拉福莱特成为国会中进步人士的领袖，是“三个出色的改革运动领袖中最伟大的一个。”[1] 1911年在他的领导下组成共和党进步同盟，与党内保守派抗衡。后来，同塔夫脱分道扬镳的罗斯福脱离共和党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于1912年8月5日在芝加哥召开大会，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主张改革的政治纲领，赞成直接预选，创制、复决和罢免权等改革措施；赞成妇女选举权和制订防止政治腐败的措施，赞成禁止童工和8小时工作制等等，大会以欢呼的形式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进步党作为第三党参加1912年大选。在这场驴、象、“雄麋”大战中，选举最后结果是，罗斯福仅获88张选举人票，选民票为4119507张，得票比例为27.4%；威尔逊则获435张，选民票为6293019张，民主党获胜。作为第三党的进步党在选举中失败。后来，进步党建议提名罗斯福为1916年大选时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拒绝后提议他的朋友亨利·洛奇为候选人。

另一类第三党在20世纪初的美国依然继续存在，即具有持续性的政纲、存在时间较长但并不谋求立即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当时有影响的是美国社会党，他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激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157页。

进纲领，也参与1912年大选的角逐，党的领袖德布斯获得901873票，比例为6%，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4年，新的第三党，即拉福莱特的进步党复出政坛。在政治倾向上这个党是更纯粹的平民主义。一些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政纲和态度不满意的力量：铁路工会，非党联盟和其他的农业集团，社会党和其他许多的改革领导人在进步主义的旗号下提名拉福莱特为总统候选人。努力实现平民主义纲领，坚持劳工的组织权，主张铁路和水力资源公有化的必要性，国家要为农民利益保证农产品价格，对行政部门进行“大清扫”。与原先的平民主义相较，它更多地向工业劳动者发出了呼吁。在1924年大选中，进步党获13张选举人票和1/6的普通票，最后还是一部分成员并入了民主党，部分转为共和党。1925年拉福莱特逝世后进步党随之解散。此后，第三党运动进入低潮，禁酒运动、天主教和坦曼尼协会等政治力量在1928年的大选中，如同1924年后的拉福莱特的进步党一样都消失了。

从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到20世纪初的进步党构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三党发展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阶段。它们的兴衰与两党制的演进有何关系？

首先，第三党的出现和参政本身是当时美国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的出现和兴衰反过来又深化了这种变革。美国的政治体制包括两党制在20世纪初暴露了不少问题。作为第三党的进步党在形成过程中提出了进步主义理论和政纲，极力主张改革，对政治上的腐败进行全面抨击，他们不仅推动改革，有利改革，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改革力量。同时，第三党的出现和活动也有利于美国社会的稳定，一些对两党不满的政治力量可以通过第三党提出他们自己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第三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缓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关系的一种政治机

制，促使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向稳定方向转化。

其次，第三党的出现不但没有影响美国两党制的存在，相反却巩固了两党制的继续发展。“看一下美国第三党运动的历史就好似仅仅加深了我们对两党控制趋势的印象而已。”[1] 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的存在和消亡最后加强了民主党，同样20世纪初进步党的形成对两党制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无论如何，平民党或进步党等都无法取代民主党和共和党。第三党只有成为第二大党时才有可能赢得总统选举，“少数党只有在政党制度经历一个激进转变，一个大党在解体进程中才有可能期望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2]

第三党的出现和消失促使两党的趋同。在思想上，第三党提出的主张经常被两大党所吸收，从而分别丰富了两党各自的政纲。其结果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先两党的对立立场，如1912年大选中，民主党威尔逊吸收了进步党的许多主张。在组织上，第三党常常成为两党不同派别成员交流的工具。如共和党的自由派在大选中可能加入第三党——进步党，选举结束后，它们往往成为民主党的成员，反之也然。第三党的出现“结果似乎经常是两大党的思想阵线发生轻微变动。甚至可以把共和党在政治上由左向右，民主党由右向左的逐渐转变看作为一系列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使选民流动的主要运输手段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消失了的第三党运动。……这些运动好像已经吸引了较自由的共和党人转而进入民主党，迫使该党较保守的成员们出党，在共和党的领地里去寻求新的居所。”[3] 劳森认为“第三党运动的纯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45页。
② 凯·劳森：前引书，第45页。
③ 劳森：前引书，第50页。

结果也许不是削弱而是加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两党制度。”[①] 关于第三党和大党的关系，V·D·凯伊概括地说：少数党“出生于政治混战的中心，它们在疲惫地从选举到选举行进时，依次影响了大党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②]

美国两党制的演进同美国人民的斗争分不开的，其中美国人民的反政党主义的思潮起了一定作用。这种思潮在美国人民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不断冲击两党制，促使其进行变革。“日益增长的非政党选举和国内政党改革运动的兴起，增长着的选民投票中独立的非党投票趋势，反映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居统治地位的美国反政党主义。”[③]

美国的两党作为沟通美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而存在，但是这种“桥梁”还是难以满足参政意识日益提高和强化的美国民众。

〔利益集团的活跃〕　美国政治中又较大规模地发展出了“利益集团”这个发达工业社会政治体系中“次体系”[④]，构成20世纪初美国政治体制变化中的又一亮点。

对利益集团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压力集团：有相同利益的人们联合起来设法影响立法和其他政治决定以有利于自己的目的，但并不谋求正式控制政府。”[⑤] 劳森在回答何时一个团体就能成为压力集团时说：“压力集团就是一定数量具有某种公共态度，并为实现由公共态度而产生的目的向其他集团（或个

---

① 劳森：前引书，第50页。

② 转引自劳森：前引书，第49页。

③ 乔伊斯·吉尔伯和玛里安娜·帕利：《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和变化》，托马斯·克劳维尔出版公司，纽约，1975年，第305页。

④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⑤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751页。

人）提出某种要求的个人。”他还认为压力集团具有4个要素：即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这些成员必须有一个目标：这些成员必须相信存在一个值得他们去施加压力的对象，即必须有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施加压力并有利于实现他们目的的对象——集团或个人；最后，集团一定相信他们具有一种有效实施压力的手段。[①] 有学者认为“有一类团体是‘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也就是一群人组织起来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②] 阿尔蒙德从比较政治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原理出发则将利益集团作为工业社会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次体系。

利益集团种类繁多，组织各异，“有些是正式的协会或组织，另一些根本没有正式的组织。几个利益集团甚至可能存在于一个组织之内。……一个利益集团可以比一个具体组织范围或广或狭。”[③] 从利益集团的性质和内涵加以区分，大致有经济利益集团，宗教利益集团，性别利益集团，族裔利益集团，有政治利益集团，甚至有娱乐方面利益的等等，不一而足。但其中尤以经济利益集团为主。加里·沃塞曼认为美国的利益集团中最大、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集团，它可分为企业集团、专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农业集团。还有按照宗教、社会和政治利益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各种经济利益集团的具体经济利益不同，企业集团在所有各类组织中，它的联合会“最为纷繁众多。数千个全国性的同业公会和地方团体……在获得利润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其中的主要代表有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全国小企业协会等等。专业集团则以某种职业或专业作为纽带组织而成的集团，如：美国医

---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100—101页；

②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第181—182页。

③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238—239页。

学会、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和律师学会等等，所有这些集团在华盛顿都有强大的院外游说活动，对立法程序有较大的影响力。劳工集团中美国的工会组织是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他们一般都为劳工的经济利益影响立法机构，以作出有利于劳工的政治决定。农业企业利益集团建立很早，规模大、历史长，有很长的、影响很大的游说活动历史。集团中的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全国农场主联盟和全国农场主协进会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几个。除经济利益集团外，在美国"有些利益集团是按宗教、社会或政治利益组织起来的。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城市联盟，南方基督教徒领导会议等；有些利益集团，如自由主义的'争取民主行动美国人'（ADA）和保守主义的'争取宪法行动美国人'（ACA），分别代表具有类似政治观点的人们。"① 此外，还有以性别或族裔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与按经济利益或职业组成的社团相交错，或按种族的、或按性别的、或按意识形态的、或按娱乐的和其他的关系组成的集团。还有一些单项性质的利益集团，仅仅因为某一项"单一目标"，或经济或政治或宗教或性别的主张相同而结成的集团，向立法机构及其成员施加影响，如 19 世纪 90 年代的禁酒同盟就是一例。他们就是致力于禁止含酒精饮料的销售和制造的。就总体而言，美国人较为喜欢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并且愿意为争取自身（或集团）的利益进行不懈的努力。"美国人成为一个以上职业团体的成员的并不多，但是他们却有无穷无尽的非职业性的利益集团，而且往往在感情上和财力上更倾心于这些利益集团。"②

各种社会经济集团在美国出现较早。

---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 183—184 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 252—253 页。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的大量涌现和积极影响立法机关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事情，20世纪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有三个历史条件值得注意。第一，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从多方面影响了政治体系。总的来说，这些变化既大大提高了为解决新问题而协调社会行动的需要，又增加了社会成员扩大政治参与和广泛表达政治要求的可能性。”[①] 原先的劳工组织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政治斗争的技巧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成为美国参加成员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该时期农场主利益集团表现得最为活跃，院外活动十分频繁。企业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联合会风起云涌，1912年终于形成了全国性“联合会的联合会”的美国商会；现代工业的发展是现代劳工组织和企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美国政党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世纪初年，两党制暴露出一些问题，两党无法反映许多利益集团的意见，需要建立次级的政治系列作为两党的补充。“进步主义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构成了美国政治表现的主要渠道。可是，许多集团发现这些组织没有反映他们的利益。最后，他们需要对现存的政治表现的形式作重大的修改，创立新的超党派的政治技巧。”[②] 所谓超党派的政治技巧，就是在两党之外建立利益集团，企业家们组成了“百万富翁俱乐部”，参议员们来自不同利益集团，而不是来自不同的州。他们希望在两党制正常运作的框架外部建立一个对政府的决策过程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新的结构和运作程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政党组织太适合于表达特殊利益或特殊立场。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

---

① 阿尔蒙德等：前引书，第230—231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152页。

了这个空白。"[1] 这就是20世纪初美国出现大量利益集团及其频繁活动的政治基础。第三，美国民众在实践中发现组织第三党并不能有效反映他们的利益，而且第三党本身命运多舛，自身难保。所以建立利益集团影响立法程序成了他们能够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有组织的劳工和农民在80年代和90年代参与党派活动遭遇不幸经历后不再参加第三党，他们精通非党派的'压力集团'活动的技巧。1910年，他们在国会组织了利益集团——由15名强者组成的劳工集团，1921年第一次组织了农民集团……"[2] 最后，利益集团大量形成和参与政治活动与美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参政意识的提高也有着必然联系。

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名目繁多的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土壤上滋生繁衍。"到本世纪初，强大而独立思想，主要代表行业工人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是主要组织。"[3] 这些工会组织为求得生存就必须成为压力集团，或者说这些工会组织必须具有压力集团的功能。劳工集团和企业集团在经济利益上是对立的，所以劳工集团经常遭遇到来自企业集团的反压力。由于企业集团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人才，他们在20世纪初与最高法院关系融洽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劳森认为："劳工的政治活动经常被归入到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成员福利这一类。然而，开始时劳工和他的朋友必须给予政府以强大压力作为保证它作为压力集团的存在的手段。劳工的第一次战斗是为争取权利组织、管理集体交易（与资方谈条件）和罢工，所有这一切都面临来自企业团体的沉重的反压力。因为企业集团在20世纪初的30年里受到一个

---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181—182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154页。

③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251页。

最合作的最高法院的支持。”[①]

除了工人组织外，1902 年成立了农业组织：农场主联合会，它是在 19 世纪后期全国格兰其协会即保护农业协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明显地代表了美国大平原诸州的农场主的利益，并为争取保护小农场的立法而斗争。美国最主要的农业压力集团起源于 19 世纪后期对农业教育的需要。如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农民组织：格兰其和 1902 年建立的全国农民联合会等等。企业界的联合会”则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数以千计的全国性的同业公会和地方团体纷纷应运而生，终于在 1912 年汇合成立了美国商会。美国商会是众多联合会的联合会，由几千个代表数万个商号的地方商会组成。在大部分问题上与美国商会结成松散联盟的是全国制造商协会。该协会于 1893 年萧条之后不久成立的；自成立以来，它一直倾向于代表比较保守的美国企业讲话。然而，一些较小而不知名的组织有相当大的势力。1916 年成立的协商委员会进行实际问题的研究，力图使公众了解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②]自由职业者们也组织了一些诸如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律师协会等全国最强大的联合会。

利益集团向立法机构及其成员施加政治影响的途径，詹姆斯·伯恩斯将其大致归结为：劝说、诉讼、制订法规、竞选活动和院外活动。其实各类罢工、示威等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为利益集团影响立法、给政府立法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各类途径中，院外活动是利益集团经常采用而且十分有效的武器。世纪之交，美国利益集团利用“院外活动”这个武器影响立法盛极一时，蔚然成风。院外活动也有多种形式，如：各种上

---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 108—109 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 252 页。

述利益集团的成员直接进行院外活动，或出资聘请专业院外活动者代表他们活动。具体形式繁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出席立法委员会会议，收集信息施加压力。一些公职人员可以被集团邀请到各种适当场所（甚至私人家里）进行长时间交谈。利益集团可以组织人员向公职人员或有关机构写信、打电话以表达他们所谓的意见和主张，并可以造成相当的声势，有的集团甚至扬言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可以向政府发出几十万封信件，以示该集团之雄厚势力。利益集团可以在竞选中，为了达到目的向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提供金钱或其他物质和其他服务。为了对政府立法产生重大影响，集团要以组织各种运动如发动宣传攻势。有的集团或个人还可以向立法委员会提供有关争议问题的研究成果给立法委员们参考采纳。院外活动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十分活跃，其中取得最富戏剧性效果之一的就是禁酒运动。禁酒同盟（也译联盟）”在反对“该诅咒的酒”多年之后，通过大量的院外活动竟然设法使一项宪法修正案，即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于 1919 年 1 月 16 日在国会获得通过，成为美国的根本大法，这当然是美国立法中最高的也是最难的成就。1919 年 10 月 28 日，美国颁布全国禁酒法案（通称沃尔斯泰德法案）。同样富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反对禁酒派”的院外活动集团也同样强大和成功，它竟然达到了废除禁酒修正案的目的，1933 年他们使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第 21 条，该条第一款宣布：“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第 18 条现予废止”。在美国禁酒运动中曾经形成过“禁酒党”获美国基督新教派的有力支持。在禁酒派的院外活动中反沙龙联盟成了 20 世纪初美国游说禁酒的主要组织，它于 1893 年在俄亥俄州建立，1895 年成为全国性组织。它要求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手段继续禁止酿造和销售酒类。1919 年通过宪法 18 条修正案（禁酒）后，它大力推行禁酒法令。20 世纪初，美国宪法关于禁酒的第 18 条修正案的兴和废，可见禁

酒派和反禁酒派的院外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竟然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最高立法，最后使立法机关作出有利于他们各自集团利益的决定。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院外活动的兴盛是美国20世纪初政治体制变化的一个侧面，与此同时院外活动的弊端也引起美国公众的关注，加强院外活动的管理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课题。院外活动的弊端早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就开始为世人所瞩目，也被媒体揭露和曝光。1873年揭露内战后信贷公司收买国会议员企图操纵联合太平洋铁路建设合同。1877年佐治亚州把院外活动视为罪行写入州宪法。20世纪初自由派报刊指责公司把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投入本杰明·哈里森和威廉·麦金莱这类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本世纪头10年中，国会立法宣布公司在联邦选举中捐款为非法，并且要公司公布钱款的用途。1925年国会通过联邦反腐败法，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候选人以及谋求在一个以上的州影响联邦选举的政治委员会，须在选举前和选举后提交款项收支的公开报告。① 对院外活动的管理和控制也是院外活动这个美国政治次体系走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其既能发挥某些填补政治空白的作用，作为对两党制的一种补充，又使其不能违背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在美国正常的政治机器内部运作。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与政党的关系，从组织角度看，一般说政党比利益集团更为严密，但是因为美国的政党比较松散，相对而言，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有更为严密的组织，因为集团成员有较为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共同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在感情上也更为融洽较易沟通。沃塞曼认为：利益集团通常比政党组织更为严密。他们通常以捐款或会员交纳的会费作为经费。组织者通过简

---

①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270—271页。

讯、邮寄品或会议，与会员取得联系。例如工会会员经常从领导那里收到定期通讯，通知他们有关工会的活动和福利事项，以及希望他们支持的立场。"[①] 相对利益集团而言，政党活动缺乏这种经常性，除了大选等特殊时刻外。从他们两者的功能和作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集团与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益集团既是政党的组成部分，又是政党的竞争者。当利益集团强烈表明他们属于某一个政党并在这个政党内进行工作，影响政府决策达到它们的目标时，这个压力集团能被看成是某一政党的组成部分；但是当他们声称代表（正确或错误地）集团成员的利益，直接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希望通过与某政党不同政策的时候，他们能被看成是某政党的竞争者。事实上，大多数集团几乎同时起着上述两方面的作用。[②] 两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不同。政党主要期望通过大选选出该党的总统提名人作为美国总统，从而控制美国的政府机器实施该党的政治纲领；集团并不谋求控制政府，也不依靠选举机器定期活动，只是利用劝说、交谈、院外活动、开展运动等等手段，通过影响立法机构或立法者、司法机关及其成员作出有利于实现该集团目标的决策或立法。

利益集团期望对立法机构及其成员施加影响获得自身利益，然而，立法机构本身在20世纪也出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重大变化。

四、国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国会是美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根据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它应

---

①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第181—182页。

② .凯·劳森：前引书：第117页。

该是代表民意制订法律的最高权威的机构。20世纪初年，如果说在三权分立政治的格局上权力重心偏向总统，出现了以总统的行政权力为重心的新格局，那么国会的变革是朝着立法程序更为完善的方向变化。在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总背景下，促使国会变化的最基本原因是美国国会中的腐败现象，因为权钱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美国立法机构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如不加以改革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动摇美国政体的基石，破坏政治游戏规则，在进步主义时期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国家的问题能够被归结为“利益”和“人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垄断资本对政治的操纵并利用攫取到的权力进一步侵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灾祸源于垄断，日益增长的企业集中正在扼杀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政府立法来规范商业的手段对付垄断，即利用国家干预调节经济领域中的各种关系，遏制过度的集中和兼并。但是企业和政治的紧密结合堵塞了立法机关的通道，权与钱的密切结合使规范商业的立法难以通过，即使通过了也难以执行。人们经常发现在每一次反对变革行动的背后就有一个公司在那里作怪。美国黑幕揭发者的重要作家林肯·斯蒂芬斯收集了大量有关企业家为谋取特权收买政治家的证据，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揭示了企业资助两党，决定选择候选人，为了扼杀对抗公司的法案进行暗中疏通的种种黑幕。所以，政治改革必须从立法机关开始；一旦“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不被企业的影响所牵制，他们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①] 国会改革成为国会体制变化的直接推动力。

国会体制的变化还基于美国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为适应现代化政治的需要国会必须进一步完善自身。为了适应美国民众

---

① 海斯：前引书，第141页。

参政意识提高和人口增长等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为了保证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国际形势下的立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必须完善立法程序和立法机构。总之，国会的变化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为抵制腐败，一是为了适应新形势。

〔国会发展的现代时期〕　美国国会自建立以来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国会又在前现代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①]

国会议员提名与选举方法的变革是意义深远的。1900年约有2/3的州通过法律，实行预选会制度。最重要的是1913年国会又通过宪法第17条修正案，对国会参议员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州议会选举改为普选，与众议员选举同期进行。“宪法原规定参议员应由各州议会选举。其目的是不让广大的公民参与竞选，而保证由较保守的人士来挑选参议员。这一程序后来由1913年通过的第17条修正案修正。现在参议员由各州有选举权的人民选举，与其他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一样。”[②] 由各州民众直接选举参议员是一种进步，既能保证民意的表达也使参议员受到“乡民”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参议院的保守性。与此同时，国会议席也最后确立。1911年，国会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通过法律将众议院席位确定为435人。“1922年，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众议院人数最多不得超过435名。”[③] 1929年国会通过一项议席分配法，将众议院议席总数永久固定为435人。

国会政党组织的健全是国会变化的重要方面。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国会和政党制相互交叉的政治机制问题。美国的两党除了主

---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194页。
② 沃塞曼：前引书，第71页。
③ 沃塞曼：前引书，第69页。

要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职能外，如何在立法领域发挥政党作用，政党通过什么渠道在国会中起作用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完善国会政党组织的改革在20世纪初显得十分迫切。有关改革首先是从参议院确立政党领袖体制开始的。1911年民主党首先决定由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主席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共和党于1913年步民主党后尘，于是政党领袖体制在参议院建立起来。两党在众议院则设立督导员制度，1897年詹姆斯·托尼为共和党督导员，1900年民主党也任命了该党第一位督导员。从此以后，督导员成为众议院政党的正式职位。后来，民主党在1913年，共和党于1915年也先后在参议院设立了督导员。接着就是建立政党委员会，1911年众议院民主党建立遴选委员会，1917年众议院共和党也建立遴选委员会。1919年共和党又建立政策委员会。[①] 由此可见，20世纪初年美国国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政党组织体制。

关于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的职能和运作，《美国政党政治传统和变革》的作者认为，党的领袖——多数党和少数党的领袖在国会两院——没有提供众议院议长以某些权力的制度上的责任，但他们对自己党的成员能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多数党领袖在众议院中作为正式和重要的职位约始于1899年。多数党领袖具有组织它们自己党的基本职责。“他们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制订决定有关事务的基本日程表，以企求获得所需出席会议的人数，分配和收集信息，说服成员（通过讨价还价或施加压力）在有关个人的提案时采取特殊方式。”[②] 这些政党领袖还可以召开国会中的该党成员会议，即党团会议（有的称协商会议）。讨论该党在国会通

---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194—199页。

②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84页。

过某些立法中应采取什么立场等问题，也可对党员施加压力达到政党领袖们的目标。有时人们也称国会中的政党领袖为政党首领（Whips）。他们在国会中的职责是努力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票数，并且以党所选举的领导加以支持的形式通过他们所要求的法律，他们还是获得和交流信息的代理人。但是政党领袖们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他们的活动还不是经常和全面的。虽然政党首领的作用在19世纪后期两党都得到了发展，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活动还是零星的。[①] 政党领袖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正常发挥两党在国会中的作用。

国会两院政党组织健全的原因在于国会内部两党斗争发展的结果。诚如张定河所言，这是“国会两党的政治斗争使然。”20世纪初，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有趋同倾向，在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别，但是他们在具体的内外政策上由于受不同垄断财团或利益集团或地区利益的影响，依然有一定分歧，在国会制定立法时两党互不妥协。为了使有利于本党利益的国家法律得以通过，多数党往往利用占多数席位的有利地位施展各种手段，而少数党则采取各种手法阻挠多数党提出的立法议案，以致国会经常出现喋喋不休的争论和幕后的拉票活动以及种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所以，两党为了在国会的立法进程中强化党的力量和影响，就需要加强党内统一，集中力量与对方进行斗争，健全党内组织成为必然。同时，1913年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参议员的独立性加强，他们的地方观念胜于党派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是本地区选民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党派利益的代言人，因而在投票时往往首先着眼于本选区选民而不是政党领

---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85页。

袖，以致在投票时参议员个人立场常常与政党领袖的立场存有一定距离。“为了协调本党议员的立法投票动向”[①]，也成了健全国会政党组织的动力。此外，院外活动的频繁开展加强了利益集团对美国立法程序的影响和干预，参议员由选举产生加强了地方利益对立法的影响，国会两党组织的健全可以看成是对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对立法影响的平衡和制约，即用传统的两党观念和政党利益牵制或抵消上述两种利益对立法的过分巨大的影响。

〔议长权力的减弱〕　国会议长权力的减小是国会变化的一个显著方面。众议院议长是众议院的首席官员，形式上由众议院选出，而实际上是由多数党选定的。众议院议长（the Speaker）在国会建立初期权力很小。后来亨利·克莱出任议长后议长权力出现扩大趋势。在托马斯·里德任议长（1889—1891，1895—1899）和约瑟夫·坎农任议长时（1903—1911），议长的权力达到顶峰。由于他们的权力过分巨大，所以里德被称为“沙皇”，坎农被称为“乔大叔”。1909年，坎农阻挠进步立法的通过遭到进步主义议员们的严厉抨击。1910年3月，众议院通过决议，废除议长担任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的规定，剥夺议长任命各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权力，并将议事规则委员会由5人扩大到10人及由委员会选举该委员会主席。1911年坎农被迫下台。这次反议长的斗争被美国学者称为1910—1911年“革命”。詹姆斯·M·伯恩斯认为“1910年普通议员中的进步分子造反，剥夺了议长的大部分权力，包括对什么人能在国会委员会任职的控制权。……1910年的变革旨在缩减议长的权力，是作为进步的改革提出来的。”[②] 此次“革命”以后，从1911年开始，国会中的议长权力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199—200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495页。

减小，因而国会中的党团会议的权力也相继被削弱。相反，国会中的各委员会在数量和权力上相对增长，常设委员会经历了调整和固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会众议院常设委员会的数量不断增加。1909年常设委员会的总数达到61个，1913年参议院常设委员会达74个。20世纪初，国会两院已注意到滥设常设委员会的弊端，要求进行裁并。1909年众议院裁撤了6个；参议院的各委员会1921年裁撤为33个。[①] 其间，国会众议院出现了委员会主席群雄并起的局面。一种新的权力分散的委员会主席领导体制逐步代替了政党领袖的集中领导体制。其实，议长权力被削弱不仅反映了国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美国民众对立法机关的不满，参议员的直接民选和议长权力的减弱，“乔大叔”的权威被打倒都是美国人民斗争的产物。“在这个时期内，政府的立法部门自始至终因公众对其正直、能力和公正无私的精神缺乏信心而受到损害。地方议会和立法机关的诚实经常受到公众怀疑，而国会则常常被认为对民意关习不够——这种看法在要求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和反坎农主义的运动中充分表现了出来。”[②]

五、司法部门的变化

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自从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建立以来，司法部门成为三权分立政治结构中的一极，最高法院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组织，它通过审理涉及美国联邦宪法、法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203—204页。

②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前引书，第264页。

律或美国参加的条约的案件；审理以美国为一方的争议案件；审理国内州际和公民间的争议等等，充当“调解员”和“裁判员”的角色裁决各种案例，明断是非，辨清黑白，维护社会稳定和牵制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权力。它同行政和立法部门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门，联邦司法系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初美国经济剧变，工业勃兴，社会迅速进步，但贫富悬殊，矛盾重重。法院系统面临判案激增应接不暇，同时它本身内部也受到政治腐败的侵袭，判案处理不公不平，引起民众不满，要求司法改革的呼声日增。“法院因公众对其公正无私的精神缺少信任而受到损害。司法部门在许多涉及多数人与少数人权利之争的案件中所作的判决的代表性未能满足民主的要求，而对立法的否决权虽然继续保持下去，却遭到激烈的攻击，威胁着要对它施加严格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而且付诸实现了”。[①]

20世纪初年，虽然最高法院批准了大量的重要的进步主义改革立法，接受了立法机关关于规范铁路费用和服务的立法，批准了几乎所有关于联邦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合理运用的立法；但是最高法院坚持反对行政部门扩张权力的保守立场，无视当时美国社会和经济都随着内战后工业化而产生突飞猛进的变化，无视人民的要求。其实当时美国民众普遍认为，适应和管理这些变化最有效的部门就是总统的职位，所以扩大行政权力积极干预国家经济发展是民心所向。但最高法院仍然顽固地抵制州与联邦扩张管理权，虽然它所推翻的大多数法案（如最低工资法与童工法等）是美国人民所要求的。1890至1936年期间，最高法院共宣布47

---

① 梅里亚姆：前引书，第265页。

个法案部分或全部违宪。① 其中也否决了一些联邦和州的某些限制垄断和州际贸易的立法，使私人垄断资本获利，遭到反对垄断的民主人士的抗议，他们要求限制高院的权力，认为制订规章性的法律是立法机构的事情，最高法院无权干预。“最高法院利用否决州和联邦制订规章的法律，创造了一个私人企业面临最低限制的真空地带。那些要求立法机构对减低工业主义影响的集团作出反应的人，发出了要求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巨大呼声。他们认为法官们已经将法庭转变为国会的‘第三院’，裁定法律的合理性而不是裁定立法机关制订法律的权力。这样的政策事务是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的事，应留给选举产生的议员们去决定。”②

美国民众要求改革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美国社会经济，但是较之行政和立法系统，司法系统在 20 世纪初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没有发生一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里程碑式的变化，没有出现司法系统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的重大变异。这也许同司法系统本身所特有的稳定性、保守性和连续性有关，同它对立法的审理和裁决总是在法律制订之后，而不是在其前有关。

但是变化毕竟还是发生。首先，美国的司法和立法机关发生相互否定的牵制作用十分突出。“如果法院对一项法律的解释不合国会的意，国会往往以改写法律的方法来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宪法修正案也能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③ 南北战争前最高法院曾作出了德雷德·斯各特判案，维护黑奴制度，宣扬白人至上主义，支持全国各地实行罪恶的蓄奴制，但 1865 年生效的宪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 113—114 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 160 页。
③ 沃塞曼：前引书，第 110—111 页。

法第13条修正案却宣布美国领土“不准有奴隶制或强制劳役存在”，否定了最高法院的裁决。1895年最高法院裁决政府不得征收联邦所得税，但1913年批准生效的第16条修正案规定可以征收所得税，反其道而行之。

其次，最高法院维护种族主义的倾向非常严重。内战前后，最高法院的重大裁决倾向于维护黑人奴隶制度，成为种族主义的司法保护伞。重建时期又驳回民权法案。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竟然赞同种族隔离，宣称“隔离与白人优越无关”，即所谓“隔离而同等”，使种族隔离成为南方的传统。加里·沃塞曼说得好：“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对此，最高法院与我们这个政治制度的其他部门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因为在重建时期驳回民权法案并在黑人权力受到最严重摧残的1883至1937年，不去保护他们的是最高法院。使‘隔离而同等’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合法根据的，也是最高法院”。[①]

再次，总统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具有明显党派色彩和政治回报意图。总统在选用和任命法官的过程中，总是考虑政党的因素，很少从反对党方面挑选法官，同时经常用法官职位作为一种政治回报的方式。“总统选用法官同我们自己的反政党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就总统能够使用任命法官作为政治回报而言，反政党主义似已不再存在。”[②] 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作为政治恩施的联邦法官职位：克利夫兰执政时占97.3%，麦金莱为95.7%，老罗斯福为95.7%，塔夫脱为82.2%，威尔逊为98.6%，哈定为97.7%，柯立芝为94.1%。[③] 可见总统和政党间进行权力交易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127—128页。

②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74页。

③ 伯恩斯：前引书，第605页。

之一斑；在大选中胜出的政党成员可以得到总统青睐被任命担任法官，作为总统对他们在选举中卖力的回报。有关总统选择同党同观点的人出任法官的原因，西奥多·罗斯福在给参议员洛奇的一封信中谈得较为坦白。他想任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霍姆斯为最高法院法官时说："现在我想要知道，霍姆斯法官是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即赞同你和我的观点。……如果我竟然任命了哪一个对我们在公共生活中主张的重大国家政策不是完全清醒可靠的人，我就认为自己对国家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①

当然，因为最高法官是终身制的，他的任期远远超过总统，所以这些党员在任职后与政党的联系相对淡化和松弛。

六、选举制度的改善

选举制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国家在选拔公职人员过程中使用选举方法的程度的高低，即公民选举权的范围直接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选举制直接同民众的政治参与相关，甚至是民众政治参与程度高低的标志。"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参与政治的主要检验标准始终是选举。"② 20世纪初美国选举制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选举方法的改进，选举范围的扩大和选民范围的扩大。

〔选举方法的改革：直接选举法〕　一般而言，美国政党制建立以后，政党成了民众选择公职候选人的机器。上至美国总统、下至市镇官员大多数职位都是通过部分党员参加的代表大会

---

① 伯恩斯：前引书，第606页。

② 伯恩斯：前引书，第305页。

挑选和推举出来的。19世纪后期党魁势力横行，他们控制了各级政党组织；同时他们又利用政党机器控制和影响选民的选举行为，甚至垄断选票。严重损害了美国人民行使他们自己的选举权，破坏了美国式的民主。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改革派强烈要求取消党魁政治，极力主张实行直接选举法，不让党魁们操纵选举，左右候选人，“还权于民”。实际上，直接初选法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克劳福德县于1842年采用过，但是在南北战争后它才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在南方正式出现。所谓初选是指选举那些准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或选举党的委员会成员或出席党的会议的代表的选举，“它的目标是扩大群众的参与”。[①] 1903年威斯康星州在改革中首当其冲，制订出美国第一部全州范围实行预选的法律。在直接预选中，特定地区里有权参加一个党竞选投票的公民，通过直接投票来选择政党的公职候选人。“为使党的挑选更为公平和更为民主，并削弱‘党魁’的权势，威斯康星州于1903年在全州范围内采用直接预选。此后15年间，各州相继采用直接预选。这种制度使一个党的每个党员都有权在预选中投票选举候选人。……直接预选被作为克服政党腐败现象的主要药方加以推广。但是，它并没有消除所有的弊病，而且还造成了一些新的弊端。预选的出现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发展。”[②]

1905年，罗伯特·拉福莱特说服威斯康星州议会通过法律，规定通过直接选举来确定参加全国提名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对代表在会上投谁的票不作强制规定。1910年，俄勒冈通过法律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必须表明他支持哪一位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直接选举立法机构首先广泛地在俄勒冈州建立起来，因而以“俄

---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41—242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356页。

勒冈制度”闻名，不久在全国推广普及。后来预选发展出4种形式，即开放式预选（选民可选择他们希望投票的政党进行预选），封闭式预选（仅登记过的党员有权选举），混合式预选（选民不仅不要说明自己的党派归属，而且能参加若干个政党的初选，一党一候选人即可）和非党式预选（在无党派选举中，将竞选选举职位的候选人数减少到或是获50%选票以上者，或是在两个获最多选票但都没超过50%选票的人选中择其一。如两人旗鼓相当不分胜负，再在决胜选举中产生胜利者。）[1]

总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10年中，直接提名法像野火一样迅速遍及全国，到这个时期末，它被一致公认为选择州和地方官员的方法，而且进一步应用于国会选举，在许多情况下还应用于总统提名。在这个时期末，直接初选受到休斯、罗斯福、威尔逊以及国内其他强有力的政党领袖的支持。”[2]

此外，具体的选举方法也有了有利于选民实施选举权的重大改进，即无记名投票制得以推广。自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采用了秘密投票制：公费印制选票，在投票站发票，然后秘密划上记号，折叠后交给工作人员，投入票箱。此法一直延续至今。

〔选民范围和选举范围的扩大〕　20世纪初美国选举制最具改革意义的变化是，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美国公民数量大增，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的范围扩大了。“公民选举权在群众控制的政府官员的数量上和有权选举的人数在美国已经极大扩大。”[3] 选民范围扩大的最主要标志是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美国妇女长期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20世纪初取得辉煌成果。

---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195页。
② 梅里亚姆：前引书，第167页。
③ 凯·劳森：前引书，第73页。

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将妇女选举权作为政纲的重要内容。1913年在9个州妇女获得完全选举权，1914年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统一给予妇女选举权。1917年纽约起了关键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妇女选举权，众议院于1918年1月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9条，参议院应总统威尔逊个人之邀于1919年6月进行表决同意修正案，1920年8月生效。修正案宣布："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性别而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选举范围的扩大主要是规定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1913年批准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17条规定"合众国参议院由每州人民选出两名参议员组成，"参议员改由选举产生是削弱政党领导作用的重要措施，对于民众的政治参与有很大意义。"初选思想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就已经存在的减弱提名过程中的政党领导作用——即美国政党的中心作用的倾向而言，初选是一个反政党工具。1903年，威斯康星（进步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成为第一个通过法律建立初选选举代表出席全国会议的州。初选对于进步主义的吸引力植根于他们的信念：初选制度将向更多民众打开参与候选人的选举。他们视全国会议制度是被政党领袖们所控制的，常常不能代表更广泛的选民。"[1]

妇女获得选举权和参议员改为由选举产生是20世纪初美国选举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就。此外，还在州或联邦范围内出现了加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进步运动支持初选的同时也支持创制权、复决权和非党派的地方选举。到1910—1916年许多州已经制订了总统初选，虽然在未来

---

[1]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42页。

几年里对直接选举会议代表的热情已经减弱。"[1] 创制权是指公民在达到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人数时有权提出一项法律，该法律如在随后的选举中经大多数选民通过，即可付诸实施，保证了一定数量的选民对法案或宪法修正提出公民投票的要求；复决权就是允许占大多数的选民否决一项议案，或应一定数量选民的要求对议会通过的某项法案举行公民投票表决；罢免权则是公民用来罢免经选举产生但任期未满的公职人员的手段。"在美国，采用这些投票方式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以便约束政党的权力，纠正立法机关滥用职权和纠正硬性立法的不完善之处。"[2] 1898 年，南达科达首先实行创制权和复决权，后向全国传播。1919 年已有 20 余州采用类似制度。[3] 罢免权 1913 年首行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1926 年已有 10 余州推行。

〔选举制变革的原因〕 20 世纪初美国选举制向着有利于扩大民众选举权和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方向变革，首先是美国人民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历史表明，她们在经历了长期斗争后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选举权。选举权不是靠谁恩赐的，而是她们不屈斗争得来的。

其次，这是进步派积极推行改革的产物。上述选举制的种种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在各州或联邦的进步派策划和推动下取得的。改革派在威斯康星州首推直接初选制为全国树立了榜样；进步主义的一系列立法从法律上保证和巩固了选举制改革的积极成果。

再次，党魁势力的衰落和选举制的变革互为因果，"政党机

---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 242 页。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前引书，第 3 卷，第 233 页。

③ 参见李剑鸣："关于进步主义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1 年，第 6 期。

器在20世纪初期就已失去它们大部分的杠杆作用，这是由于在这期间发生以下三件事：第一，地方、州和联邦机构接管了向穷人施舍的工作；第二，文官制度使大部分城市就业取决于有竞争性的成绩考核；第三，直接初选使政党提名的竞争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竞争。"①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传统的反政党主义传统是选举改革的一个思想基础，而选举制的改革又助长了反政党主义传统的继续。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政党制最弱的一个州，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反政党主义传统。乔伊斯·吉尔伯认为加利福尼亚的反政党传统源于社会政治条件的多样性：1.1910—1920年间的进步运动能够获得若干极大削弱州政党组织的方法的渠道。其中就是直接初选和在预选中登记作为一个以上政党的候选人。后者提供了一个候选人无需是他企求提名的党的登记成员。结果创立了一种州选举中的非党的特殊类别。州和县的党委员会由于缺乏官职的恩施和领导没有多大权力。2. 在加利福尼亚，所有的市镇选举都建立在非党派（正如县的选举和选举法官的选举）的基础之上，因而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提名并为候选人竞选的强有力的基层选区组织。3. 加利福尼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4. 独立选举人的大量存在。"加利福尼亚的经历，犹如康涅狄格的经历，表明政治文化和州的选举法对于这些州的政党组织发展的关系。"② 这些分析是全面和中肯的。加利福尼亚的现象从一个侧面显示美国选举制改革和反政党主义传统的关系，可以认为是美国地方政党政治衰落的一个缩影。

最后，选举制的变革适应了美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美国人民原先

---

①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171页。

②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192—194页。

就很强烈的民主意识和自由传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终于使美国选举制度向更民主的方向转变。民主的扩大也是对飞速发展的经济扩张的适应和反对因为经济扩张而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的需要。美国选举制度的变革对它的市镇管理体制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七、市政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20世纪初年美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中，美国市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占有显著地位。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体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会随着整体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市镇是美国联邦、州政治生活的基础，有关联邦和州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直接影响市政改革；市镇政治体制的演变也会反作用于联邦和州，如三权分立新格局的形成、选举制的变化、政党制的变化等等都是如此。同时，1920年美国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城市人口，标志美国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进程与市政管理体制是同步发展的，城市化也是市镇改革的推动力。为适应城市化的进展，城市管理必须跟上。新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地方自治感情的培育和增长，政府权力集中的思想都是市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在使旧的市政府适应于现代生活新形势的艰难过程中出现富有特性的政治思想。这些典型思想是：地方自治感情的增长；放弃牵制与平衡学说的趋势；政府职权的迅速扩张。”[1] 自治感情的增长势必要求政治上的自治，争取城市自治成为城市改革的关键。对于城市的自治权的重要性问题，梅里亚姆进一步指出：“福雷德里克·豪说，自由和责任是生存和发展所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前引书，第144页。

必不可少的。'我们给我们的城市穿上紧身衣，却期望它们发展力量和性格。我们剥夺了它们的自治，却不明白自治为什么失败了。'只要给城市足够的权力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地方爱国精神，'这种精神将会把美国的市政从目前的衰弱地位提高到成就辉煌的地位'。"① 推动市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直接动力是进步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进步运动也是从市政体制改革开始的，这就形成了对市政改革的强大推动，使市政改革成为令人瞩目的重要领域。(详见本卷第四章有关内容)

总之，20 世纪初美国的政治体制，从三权分立的权力重心形成的新格局，到联邦体制，国会和法院系统，两党制，选举制和市政管理体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种变化都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对经济迅速增长的适应，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表现。集权和分权，民主和集中，是政治体制变化中的两根轴心，也是政治体制变革中的难题。何时何地实行集中和集权，何时何地扩大民主和自由，20 世纪初美国政体变化的历史事实似乎表明美国在行政领域强化了权力，在立法领域则扩大了民主，在选举制度方面扩大了民众选举范围，增强了选举透明度。②

美国政体的变化与当时美国社会政治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两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政体的变化促进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反之亦然。20 世纪初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由放任思想的衰落和国家干预思潮的增长。可以这样认为，在"镀金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放任主义，到了进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前引书，第 145 页。

② 参见张淑华硕士论文："美国社会转型时期（世纪之交）政治体制演变研究" 1999 年 1 月，华东师范大学。

步主义时代，它的主导思想成了国家干预，因为进步主义的主要思想原则就是国家干预。根据霍夫施塔特的分析，“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①] 他认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被那些坚信威尔逊—布兰代斯—拉福莱特观点，即竞争是生来就合乎需要的人所接受，也为坚信罗斯福—克罗利—冯希斯观念，即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人所接受。”有的学者认为“这世纪的头10年美国的自由思想常常害怕被冷淡而提心吊胆。”[②] 有人在1912年提出：“竞争的正当开展必须被限制在为了保持竞争的限度之内。因为竞争的过度会导致垄断，正如自由的过度会导致绝对主义一样……因此结果是：规范化的竞争对抗规范化的垄断。”[③] 进步主义思想的主要表达者，对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思想有重大影响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克罗利在他的《美国生活的前途》中坚持认为，美国人要学会用希望而不是用命运去思考，不惧怕政府的集中权力；去通过国家政策认识他们的希望。1914年他在自己创刊的《新共和》周刊上撰文认为民主制度必须经常修正，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W·李普曼则以肯定的口气谈论“新国家资本主义”。他说：“我们能够不再把生活视为慢慢流向我们的事物。我们必须审慎地去处理它，设计它的社会组织，改变它的工具，提出它的方法，教育和控制它。”[④] 也许正是在这种国家干预思想的指导下，总统和联邦的权力获得加强，三权分立出现了总统权力为重心的新格局。

国家干预学说的增长同当时多种学说思想影响社会政治思想

---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前引书，第119页。

② 莫顿·怀特：《美国社会思想对形式主义的反叛》，比肯出版公司，波士顿，1957年，第128页。

③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20—121页。

④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22页。

有关。19世纪后半期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影响社会学说生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科学的发展，社会学大大削弱了来自生物学的影响，相反，心理学、实用主义哲学等对社会学发生重要影响。“1890年和1915年间社会学受到社会领域和其他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变化的影响。社会学发展得如此迅速、它的文献如此丰富以致不可能讲清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命运，或不可能除了指明它的理论上的主要趋势外有更多的作为。”① 社会学方法上最最重要的变化是远离生物学，倾向于置社会研究于心理学的基础上。……奥尔平·斯莫尔在1897年写道：“斯宾塞先生的社会学是过去的社会学，而不是现在的。……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是想像中的生物学原理扩至到适应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被当今社会学家作为心理学家而不是生理学家才理解的。”② 实用主义的兴起对美国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其中，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提出政治理论的有罗伯特·克罗利等人，他们竭力宣扬国家干预的重要性。③

世纪之交，美国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思想既是美国政治体制变化的思想基础，又是政治体制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56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58页。

③ 参见袁鹏硕士论文：“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世纪之交美国社会思潮主流之转变”，1991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

第十一章

文化思想新成果

19、20世纪之交，伴随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进展，思想文化上也发生巨大变化，取得了可喜成果。

一、文学的繁荣

〔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于19世纪末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马克·吐温、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等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一反感时伤怀的理想主义笔调，客观真实地描写了镀金时代美国的现实生活和社会风貌，深入地揭示出种种社会矛盾，其丰富性和深刻性大大超过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从而把美国文学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他们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1900年至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此外，美西战争以后，美国迈向世界帝国的步伐日益加紧，对外扩张侵略活动越来越频繁，引起广大工农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当投机、腐败、贿赂之风日趋严重，市、

州及国家各级责任政府走向崩溃的时候，当财阀们的财富滚雪球似地增长，而大城市中贫民窟、贫困和犯罪日益蔓延的时候，当劳动人民尤其是有色人种、妇女和儿童受剥削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当工业、金融企业日益集中、垄断寡头统治深刻影响人民生活又超脱人民控制的时候，广大民众中的“美国梦”进一步幻灭。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许多人心目中动摇甚至消失了。于是，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仔细观察美国社会的严酷现实，不得不重新认识美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界掀起了“黑幕揭发运动”，对垄断资本集团为富不仁，巧取豪夺的卑劣伎俩和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给予曝光，社会各界则兴起了要求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美国现实主义文学逐步从发展走向成熟。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产生了像弗兰克·诺里斯、辛克莱·刘易斯、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和黑人作家杜波伊斯等一大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作品更加广泛深刻地披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出现了许多对不道德、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示抗议的现实主义作品——所谓反叛文学。作家们用批判的眼光描写美国社会，用解剖刀揭露资本主义的脓疮。如弗兰克·诺里斯的作品揭露了西部垄断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描写了中小农场主联合起来反对铁路公司的斗争；杜波伊斯的作品反映了南部黑人农民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了黑人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反对垄断组织的进步主张；德莱塞的作品以描写劳动妇女悲惨命运为主线，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堕落的罪恶；杰克·伦敦的作品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揭示社会矛盾，歌颂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突破了东部对文学的垄断，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现实主义作家不仅限于东部地

区，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都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如豪威尔斯（俄亥俄）、哈姆林·加兰（威斯康星）、德莱塞（印第安纳）、杰克·伦敦（旧金山）、弗兰克·诺里斯（伊利诺伊）、辛克莱·刘易斯（明尼苏达）等，他们都以自己优秀的作品丰富了美国文坛。这个时期美国文学界虽然也受到欧洲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但主流仍是继承了马克·吐温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方向。

〔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 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美国文坛一位跨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一个百万富翁家庭。一生醉心于描写大资本家及其少爷小姐的生活和心理活动，是美国“高雅文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的许多作品发表于19世纪70、80年代，但在20世纪初连续发表了三部最好的长篇小说：《鸽翼》（1902）、《使命》（1903）和《金碗》（1904）。这三部作品以欧洲人的奸猾、冷漠为衬托，赞誉美国人的纯洁、仁慈、慷慨和忠诚无私的品质。在詹姆斯笔下，大资本家及其后代都是心地纯洁，品行高尚的人。由于詹姆斯的作品擅长心理描写，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大师”。詹姆斯长期居住在欧美上层文人和遗老遗少的生活圈子里，根本无法理解美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态度保守。他蔑视甚至仇视社会变革，只热衷于挖掘有闲阶级的心理，因此他的作品脱离现实主义生活，缺乏时代气息，不过是“沙龙之作”。英美文学界称他为大资本家的理想小说家。

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是个记者出身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为“小麦史诗”三部曲：《章鱼》（1901）、《深渊》（1903）等（第三部《豺狼》没有写出来）。诺里斯早期作品受到过自然主义影响，后来转向现实主义。他的小说主要描写19世纪末垄断资本统治下城乡中下层群众的生活，着力于揭露垄断资

本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对劳动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章鱼》写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华金河谷农民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铁路公司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它们侵占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农民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线，联合起来同垄断资本作斗争，结果发生了武装冲突，最后农民被打败，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这是美国文学史上头一次用现实主义手法控诉垄断资本对农民掠夺和歌颂农民斗争的史诗。作者把农民和垄断资本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比喻为两种超自然力量的较量。前者代表“善”，后者代表“恶”。“恶”势力超过了“善”的力量，故农民的斗争遭到了失败。这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压迫下走投无路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情绪，是宿命论的反映。尽管如此，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进步意义。

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也是个记者出身的现实主义作家。早年参加过美国社会党。主要作品有《屠场》（1906）、《石炭王》（1917）等。《屠场》描写立陶宛移民工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十分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资本家将腐烂的肉做成罐头出卖的可耻行径。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群众纷纷谴责资本家为富不仁的卑劣行为。在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下，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和“肉类检验法”，加强了对食品卫生质量的监督和检查。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在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促进国会立法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石炭王》是根据1914—1915年科罗拉多州煤矿工人罢工事件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揭露了煤矿大王剥削工人的罪行，歌颂了工人阶级顽强的斗争精神。辛克莱从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豪威尔斯“写生活中微笑的侧面”的主张，痛斥了资产阶级“财神艺术”。这个时期辛克莱写过一系列政论

和随笔，如《宗教的利益》（1918）、《铜牌》（1919）、《鹅步》（1923）、《财神的艺术》（1925）等。这些文章指出了宗教、报刊、学校、艺术为垄断组织服务的本质，但也流露了作者的改良主义倾向。列宁称辛克莱是“一个有感情而无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

杰克·伦敦（1876—1916）是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是第一个用小说反映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家。杰克·伦敦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从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做过报童、童工、水手、运煤工和铁路工人，曾流浪全国，沿街乞讨。这些苦难经历使他对资本主义压迫有切肤之痛，为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杰克·伦敦一生写有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150部。最主要的有《狼之子》（1900）、《雪地的女儿》（1902）、《深渊中的人们》（1903）、《野性的呼喊》（1903）、《白牙》（1906）、《铁蹄》（1908）、《马丁·伊登》（1909）等。

《铁蹄》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写的是芝加哥工人武装反抗资本家压迫遭到残酷镇压的故事。作者预言，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尖锐化，统治阶级必然要取消民主自由，实行法西斯专政。杰克·伦敦把资产阶级专政比作“铁蹄”有其深刻含义。小说主要意义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采取革命斗争手段，摧毁资产阶级“铁蹄”，否则就会沦为奴隶，丧失已有的一切权利。正是这种思想使这部小说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由于他的多数作品描写了下层群众的命运，被称为把小说交给平民手中的第一人。《铁蹄》中作者过分夸大了工人领袖的作用，把工人群众描绘成没有觉悟、不会思考的群氓，这与杰克·伦敦在思想上受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有关。《马丁·伊登》是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一位水手出身的青年马丁·伊登与资产阶级小姐罗丝

之间的爱情故事。马丁·伊登在爱情力量鼓舞下，唤起了创作热情，才华横溢，精力过人。然而，罗丝在父母反对下和他断绝了爱情关系。后来，马丁·伊登终于成名。此时，过去看不起他的人都来亲近和吹捧他。罗丝也哭哭啼啼跑来要求破镜重圆。这时，功成名就的马丁·伊登觉得，他从前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原来是那么贪婪和虚伪，连他苦苦相恋的罗丝也不是看重他的人品，而是看中他的声名和财富。于是他感到受了骗，精神极度空虚，最终投海自杀。1913 年以后，伦敦的创作热情明显衰退，由于他成名以后，名缰利锁，经不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追求物质享受，挥金如土，为求得稿费不惜赶写一些粗糙的作品，甚至写讨好资产阶级的作品。1914 年退出社会党，同年 11 月因精神空虚，服药自杀，年仅 40 岁。美国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从此殒落。《马丁·伊登》这部小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作者自己命运的写照。厄普顿·辛克莱对杰克·伦敦后期走上毁灭自己的道路作过深刻论述，指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贪得无厌和利己主义盛行的美国，把个人的灵魂和他们的全部伟大的、无法估价的天才一起从我们手中窃走了。这对我们的文学简直是莫大的耻辱、莫大的悲剧。"[①]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现代美国进步文学的杰出代表。德莱塞出身贫寒，曾做过洗碗工、洗衣工、火车站检票员、商店伙计和煤矿工人。21 岁当记者时就开始文学生涯。他的多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如《嘉莉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欲望三部曲中的头两部，《金融家》（1911）和《巨人》（1912）、《天才》（1915）、《美国的悲剧》（1925）、政论文《敲起来吧！战鼓》

① 刘保端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 年，第 222 页。

(1920) 等。

《嘉莉妹妹》是德莱塞第一部成功作品，描写了纯朴的农村姑娘嘉莉到芝加哥谋生的悲惨历程。小说向人们揭示出在美国，靠诚实劳动是难以找到真正的出路的。嘉莉虽然靠出卖肉体，跻身上流社会，获得了金钱和地位，但那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美国式的成功对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是有力的讽刺。难怪该书被认为"有伤风化"，长期遭禁。《珍妮姑娘》在题材和艺术风格上与《嘉莉妹妹》十分相似，塑造了美丽善良的工人女儿珍妮与富家公子相爱，由于社会地位悬殊饱尝凄苦的命运。美国文艺评论家亨利·路易斯·门肯称《珍妮姑娘》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以来美国最优秀的小说。

《欲望》三部曲写的是金融资本家弗兰克·柯柏乌家庭的兴衰史。小说揭露了19世纪末美国垄断资本巧取豪夺，投机钻营以及与政府官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卑劣行径。柯柏乌成为美国文学中典型的资本家形象。

最终奠定德莱塞在美国文学界地位的是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小说叙述了贫民的儿子克莱德在资本主义社会腐蚀下如何从一个天真纯朴的青年堕落成杀人犯最终毁灭自己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克莱德和女工洛蓓达及资本家女儿桑特拉的三角恋爱关系。克莱德为跻身名门，丧心病狂地谋杀了他诱奸已经怀孕的洛蓓达；同时也揭露了美国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和司法部门利用克莱德案件大搞政治投机的丑恶活动。小说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突出，心理刻画细致，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有人称德莱塞是第一个捕捉到现代美国本土气味的小说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悲剧，而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悲剧"。

德莱塞的许多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在他笔下一

幕幕美国社会悲剧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优点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从而暗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都是和当时美国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无论是嘉莉、珍妮，还是克莱德，之所以走上堕落的道路，罪过首先在美国社会本身。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把他完全说成是自然主义作家，甚至是自然主义流派的奠基人，① 未免言过其实。但应该看到，德莱塞早期的作品确实受到过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过分强调了生物本能，如追求金钱、权势和性欲等，说什么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人的意志和行为不能控制天生的弱点和缺点②，从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因素和主观能动性。

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现实主义多产作家，一生写有 22 部小说。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大街》（1920）、《巴比特》（1922）、《阿罗史密斯》（1925）、《埃尔墨·甘特里》（1927）、《多兹沃斯》（1929）等。《大街》是刘易斯第一部成功之作。它描写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女子力图改造乡村小镇最终失败的故事。小说艺术地再现了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暗示乡村和城市一样，到处充满虚伪、邪恶、不平和欺诈，是市侩习气的滋生地，从而使人们对农村浪漫式的幻想一扫而光。《巴比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人物巴比特，描写了他由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精力充沛的商人变为屈服于环境和上级压力、思想空虚、唯唯诺诺随波逐流的市侩的过程。作者暗示：巴比特的个性是被社会扼杀的，他是美国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刘易斯小说的主要艺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 291 页。

② 坎利夫·马库斯：《美国政治的文学》，上册，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 年，第 204 页。

术特色是讽刺，故有人称他是讽刺小说家。美国历史学家亨利·史蒂尔·康马杰认为，“在20年代的所有小说家当中，对所处社会作了最精心报道的是辛克莱·刘易斯”[1]。

〔“迷惘的一代”文学〕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现代文学的高峰期。在这期间，既有现实主义这一坚实的文学流派，又有独树一帜的“迷惘的一代”文学。“迷惘的一代”作家指1900年前后出生并在20年代获得文学声誉、在思想上具有相似倾向的青年作家群。主要人物有欧内斯特·海明威、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E.E.卡明斯、A.麦克利什、T.S.埃利奥特、H.克莱恩等。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观点、相同的生活方式，并以巴黎为活动中心，形成“公认的一代文人”[2]。

“迷惘的一代”作家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中许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场面，战后又目睹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无耻争夺和瓜分，从而使他们怀抱的民主与和平理想彻底破灭。后来当他们返回祖国，看到的则是物欲流和弥漫全国的享乐主义情绪。于是，他们又返回欧洲，希冀在那里找到创作灵感。可是，他们面对的都是满目疮痍和精神文化的倒退。现实生活使他们感到受骗和失望，对前途丧失信心，思想上产生失落感和幻灭感。他们成为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者。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迷惘的一代”作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的生活经历丰富，充满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负伤，腿上身上取出200多个弹

---

① H.S.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384页。

② 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战场上横尸遍野、九死一生的情景以及他心灵上所受的震撼成为他写反战小说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太阳照样兴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长篇小说，1926年出版后一炮打响，颇得好评。小说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幻想破灭、亡命国外的美国青年放浪形骸的情况。这部小说反映了战后一部分美国青年悲观消极的思想风貌，被文学界称为“迷惘的一代”的宣言。海明威则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歌手。1929年，海明威第二部反战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问世。小说描写了美国青年上尉亨利和英国护士凯瑟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海明威称这部小说是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从士兵到军官都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们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憧憬和平幸福的生活。作品告诉人们，“迷惘的一代”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战争。海明威的作品艺术风格独特，西方文学界称之为“海明威风格”。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影响是最大的。国际上曾一度掀起海明威热。有人称他是美国仅次于梭罗的“最伟大的散文文体家”[①]。后来海明威还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小说[②]，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896—1940）是“迷惘的一代”作家中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重要作品都是在20年代问世的。主要作品有《人间天堂》（1920）、《红颜薄命》（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短篇小说集《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所有悲伤的年轻人》（1926）等。菲茨杰拉德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向往财富和特权，幻想有

① 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② 如《丧钟为谁而鸣》（1940）、《老人与海》（1952）等，1954年获诺贝尔奖。

朝一日能跻身上流社会，出人头地，过豪华的贵族生活。为此他极为炫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俨然一副纨绔子弟的派头。后来他与上流社会的一位漂亮而又风流的小姐姗尔达相恋，两人志趣相投，结为伉俪。婚后他们生活奢侈无度，狂欢纵欲。他的小说主人公多是一些饱食终日的花花公子。《人间天堂》是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描写了20年代一群美国青年放荡不羁的生活。主人公阿莫瑞·布莱恩从小娇生惯养，渴望爬上富有阶层，娶"最漂亮的姑娘"。当他家破落后，那个"最漂亮的姑娘"抛弃了他。从此他诅咒那个社会，厌恶这个姑娘。小说表现了一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美国青年追求金钱美女的社会风气，反映了20年代美国青年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又焦躁不安的矛盾心理，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时代性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生活的写照。《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最成功之作。它描写的是出身贫穷家庭的盖茨比和上流社会姑娘苔西之间的爱情故事。盖茨比是中西部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军官，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姑娘苔西，可是苔西嫌盖茨比穷，不肯嫁给他。待他从欧洲远征归来，苔西已和一个花花公子汤姆结了婚。然而，汤姆又另有情妇，苔西并不幸福。尽管如此，盖茨比对苔西仍一往情深，下决心要发财致富，重新赢得苔西的欢心。5年后，盖茨比果真发了财，当他找到苔西求与她重归于好时，苔西却舍不得汤姆的财产，态度暧昧。后来，汤姆发现了苔西与盖茨比之间的隐情，妒火中烧，竟然利用一次车祸，谋杀了盖茨比。小说谴责了上流社会自私、虚伪和残忍，对来自下层社会横遭排斥和暗算的盖茨比寄以深切的同情。盖茨比刚毅、勇敢，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千辛万苦从下层社会爬上来，却又遭到上流社会的暗杀。他朝思暮想苦苦追求的漂亮小姐竟是一个只迷恋金钱没有良心的庸俗女人。作者暗示，盖茨比希望的破灭

象征“美国梦”的幻灭。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哀伤情调，反映了20年代美国青年理想的破灭以及道德和精神的瓦解。正是这个主题使菲茨杰拉德成为“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又一突出代表，被称为“爵士时代的桂冠作家”。“他的小说和故事就某些方面来说是这一整个时期的绝妙记录”①。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20）也是“迷惘的一代”作家。他出身于芝加哥一个律师家庭。哈佛大学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三个士兵》（1921）、《曼哈顿中转站》（1925）等。《三个士兵》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个士兵的不同经历，具有明显的反战倾向，反映了这一代青年对美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和对战争的不满心情。多斯帕索斯较重要的作品是在30年代以后发表的。他早年是左翼作家，曾担任美共外围杂志《新群众》的编委，支持过工人的斗争，同情美共并为其刊物写稿。可是他的进步立场没有坚持到底。由于他思想上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宿命论思想倾向，越到后来越向右转，成为美共和前苏联的反对者，成为变节分子。这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对知识分子的腐蚀作用，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

〔诗歌〕　20世纪头20年，是美国诗歌蓬勃发展的年代。1912年芝加哥《诗刊》杂志的创刊是美国现代诗歌产生的重要标志。美国现代诗坛不仅人数众多，几乎是一代接一代，而且流派纷呈，有新英格兰派、芝加哥派，还有所谓意象派等。埃德加·阿林顿·罗宾逊（1869—1935）和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属新英格兰派诗人。罗宾逊以写人物肖像组诗和抒情诗见

---

① 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

长。他以《独立望天涯》(1916)一诗成名。得过三次普利策奖。其他重要作品有长篇叙事诗《河下游的城镇》(1916)、《默林》、《兰斯洛特》、《特里斯特拉姆》三部曲(1917—1927)等。弗罗斯特的诗一般可分为三类：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弗罗斯特这个时期的作品有《男孩的意愿》(1913)、《波士顿以北》(1914)、《新罕布什尔》(1924)、《西流小溪》(1928)等。他的抒情诗表达了对自然的深爱和对人类的强烈同情，是这个时期最优秀的田园诗人之一。有人称他是“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1]。

本世纪初芝加哥是美国诗歌的中心之一。《诗刊》就是在这里创办的，它在培育诗歌新人，推动新诗运动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维切尔·林赛、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卡尔·桑德堡这几位芝加哥派诗人都是通过《诗刊》登上诗坛的，其中又以桑德堡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卡尔·桑德堡(1878—1967)是最接近普通劳动者的一位诗人。他做过工人、当过兵，还当过流浪汉，生活阅历十分丰富，是成名较早的诗坛新秀。他既是工业文明的歌颂者，也是中西部大草原的歌手。桑德堡的诗风粗犷豪放，语言朴实无华。在他的笔下，大城市的繁忙生活、工厂冒火花的烟囱、草原上的农民生活，城市里的妓女，都变成诗的语言。桑德堡在20年代就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但他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在3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芝加哥诗抄》(1916)、《剥玉米皮的人》(1918)、《烟与钢》(1920)等。维切尔·林赛、E·L·马斯特斯在这个时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比起桑德堡来稍逊一筹。林赛的代表作是《威廉布思将军进天堂》(1916)，马斯特斯的代表作为《匙河集》(1915)。

---

[1] 马库斯·坎利夫：前引书，第243页。

意象派诗歌在美国流行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主要人物有埃兹拉·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艾米·洛厄尔、托马斯·S·埃利奥特等，其中庞德和埃利奥特最重要。庞德是意象派的盟主和精神领袖，是西方公认的现代派诗歌鼓吹者和理论家。庞德的主要作品有《面具》(1909)、《休·西尔文·毛伯莱》(1920)等。庞德还当过《诗刊》编委。他乐于助人，乔伊斯、埃利奥特、D·H·劳伦斯和弗罗斯特等新派诗人都是在他鼓励和支持下登上诗坛的。尽管他长期住在国外，但在美国青年诗人中影响很大。T·S·埃利奥特(1888—1965)是意象派中被认为最善于表达"迷惘的一代"心情的作家。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从此奠定了其在英美诗歌界的地位。《荒原》描绘了精神荒原的战后文明，被认为是写出了整整一代幻灭感的划时代的巨著，是西方诗歌的一个里程碑。此外，埃利奥特的其他重要诗作还有《杰·阿·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小老头》(1920)、《空心人》(1925)等。《普鲁特洛克的情歌》是他的成名作。意象派诗歌具有精简、浓缩、紧凑、韵律整齐的特点。他们从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东方学中吸取养料，是一种自由体诗歌。

〔戏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多年间是美国现代戏剧兴起和繁荣的年代。在此以前，美国剧坛沉闷保守，不少剧院为演出公司所控制。戏剧舞台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些表现历史题材的传奇剧或欧洲的时兴剧本，严肃的剧本如凤毛麟角。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群众对舞台上的传统戏剧越来越感到厌烦，迫切要求上演反映现实生活、能够展现人们内心世界真实感情的现代剧。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15年前后，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等北方城市出现了摆脱旧的艺术传统、探索新的创作道路的"小剧场运动"，各种各样的小剧团纷纷涌现。据统

计，全国各地约有500多个，观众每年可达50万人次。其中，纽约的“华盛顿广场剧社”（1914）和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顿”剧社（1915）最负盛名。“小剧场运动”是美国戏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们提倡采用严肃的优秀剧本，上演现实题材的剧目，主张进行戏剧技巧的改革，热心扶持青年剧作家。至1925年，普罗文斯敦剧社共推出93个文学剧本，并建立了自己的剧院。蓬勃兴起的小剧场运动如春风化雨，培育了一批有才华的美国新一代剧作家，如西德尼·霍华德、菲利普·巴里、尤金·奥尼尔等，奥尼尔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尤金·奥尼尔（1888—1953）出身于美国一个演员家庭，父亲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演员。奥尼尔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系统地学习过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的戏剧理论和实践课程，参加了贝克戏剧演习班——“四十七剧社”。但奥尼尔并不太倾心于这种严肃单一的学院气氛和课程，其创作思路更重视揭示生活真实。他当过水手、游民、淘金者、搬运工和记者，坎坷经历以及从小生活在戏剧氛围中的环境为他积累了丰富生动的创作素材，那些下层劳动群众和落魄的失意者的悲惨命运引起了他深切的同情，从而使其剧作大都充满悲剧色彩。他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结合起来，为美国戏剧发展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成为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被称为与易卜生·契科夫和萧伯纳齐名的西方现代戏剧的泰斗。1916年，奥尼尔第一个剧本《东航加的夫》上演，揭开了美国现代戏剧史的序幕。《东航加的夫》描写了一个名叫扬克的水手幻想能够得到几亩地，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可是，他这个并不太高的渴望终成泡影。1920年，奥尼尔的第二个重要剧本《天边外》在纽约百老汇上演，此剧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的地位。剧本描写了美国农民罗伯特盼望到“天边外”去游历奇妙世

界最终幻想破灭的悲剧。评论界对此评价很高，奥尼尔首次获得了普利策奖。有人称此剧开创了美国戏剧严肃艺术的新纪元。1921年，奥尼尔又推出《安娜·克里斯蒂》。它揭示了代表邪恶势力的大海夺去了少女安娜的父亲，使她沦为妓女，最后又夺去了她爱情的归宿。剧本悲剧色彩较浓，演出后再次获普利策奖。此后几年，奥尼尔戏剧创作达到高潮，几乎每年写一个剧本。如《琼斯皇》、《与众不同》、《最初的人》、《难舍难分》、《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奇异的插曲》等，其中最重要的有《毛猿》(1922)、《榆树下的欲望》(1924)。奥尼尔的剧本大都以悲剧为主，力图表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或爱情所经受的曲折经历和严酷斗争，着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折磨。奥尼尔还特别注重借助于场景、灯光和音响等戏剧手段来烘托戏剧人物的内心活动，加强听觉和视角形象，从而更好地突出了主题思想。奥尼尔是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惟一的一个剧作家，曾4次获得普利策奖。奥尼尔这个时期剧作的最大弱点是，受到过自然主义的影响，太倚重于神秘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解决戏剧矛盾，戏剧语言也欠精炼。

〔黑人文学〕　20年代兴起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是这个时期黑人文学的重要内容。哈莱姆文艺复兴（又称新黑人运动）在这个时期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黑人进一步觉醒和黑人民族文化繁荣的标志。随着20世纪初黑人的大规模北迁，在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集中了大批黑人。纽约的哈莱姆成为全国最大的黑人聚居区；由于黑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具备了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的条件；20年代风靡全国的爵士乐极大地增强了黑人的自豪感；在一战后高涨的黑人民族运动的推动下，一些研究黑人历史文化的机构如“黑人历史研究会”(1912)、“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会”(1915)等纷纷成立。正是在这一系列背景下，产生了以哈莱姆

为中心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哈莱姆一时成为“黑人麦加”，在那里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黑人知识分子和作家。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成员有兰斯顿·休斯、康迪·卡伦、克劳德·麦凯、阿兰·洛克、吉恩·图马、瓦尔特·怀特等。阿兰·洛克是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描写人和精神领袖。1925年，他编辑出版了一部汇集青年黑人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的集子《释新黑人》，在当时文坛影响颇大。他在序言中指出：觉醒中的年轻一代黑人已粉碎了种族歧视的心理枷锁，具有了新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兰斯顿·休斯（1902—1969）是新黑人运动中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写小说和评论，但主要成就是诗歌，被称为“哈莱姆的桂冠诗人”。他的诗通俗易懂，热情奔放，感情丰富，节奏感强，富于民族特色。他的第一本诗集《疲倦的布鲁斯》（1926）抒发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憧憬，洋溢着黑人民族的自豪感，是他早期的优秀诗作。克劳德·麦凯（1890—1948）也是新黑人运动的重要骨干。在黑人文艺复兴高潮时期正是他的创作旺季。他一生写有诗集5部、小说4部、自传1部，其他著作2部。麦凯最佳诗集《新罕布什尔的春天及其他诗集》（1920）和《哈莱姆暗影》（1922）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1928年发表了散文《回到哈莱姆》。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黑人遭受种族歧视和残酷迫害的悲惨情景。他对黑人诗坛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充满斗争精神的抗议诗歌。麦凯1919年为鼓励黑人抗暴斗争而写的《如果我必需死》成为后世传颂的佳作。康迪·卡伦（1903—1946）是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中主张突出诗的艺术性的一位出色的抒情诗人。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肤色》（1925）、《黄昏颂歌》（1927）等，他声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表达人人都有意义的东西，并一再强调，作品主要是追求美，不宜宣传种族斗争，成为斗争的工具。但他流传下来极富感染力的作品恰恰是描写种族问题的诗。“哈莱姆文艺复兴”

中著名作品还有：休斯的《倦乏的忧郁》(1926)，詹姆斯·韦·约翰逊的《上帝的长号》（1927）等。1929年瓦尔特·怀特出版了《绞索与铁条：私刑法官传》，揭露了1919—1928年间美国黑人遭受私刑迫害的惨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有下列几个特点：受自然主义影响较严重，有些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哈莱姆派醉心于描写黑人下层群众的放荡生活，突出地对酒店、夜总会、妓院和犯罪场所大肆宣染；小说大量采用城市黑人俗语和俚语写作，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许多作品否定了汤姆叔叔类型的那种逆来顺受的旧黑人形象，鼓励歌颂新黑人精神，树立新的黑人形象，反映美国黑人对种族歧视和迫害的愤怒反抗，显示了美国黑人新的觉醒。

与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几乎同时活跃于黑人文坛的是杜波伊斯博士。杜波伊斯（1868—1963）是美国黑人著名学者、编辑和作家。他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一批有影响的政论、小说和诗歌，重要的有《黑人的灵魂》（1903）、《黎明的黑暗》、《黑公主》、《费城黑人》等。《黑人的灵魂》是杜波伊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大型文集，包括诗歌、随笔、政论和小说。书中详细描述了南北战争后南方黑人仍然受歧视的生活状况，批判了布克·华盛顿的投降主义哲学，号召广大黑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把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进行到底。美国学者把《黑人的灵魂》列为划时代的作品，称它是黑人的“政治圣经”[①]。杜波依斯则被称为美国“黑人的一个最伟大的代言人”[②]。

---

① （美）柯恩编，朱立民等译：《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三联书店，1988年，第363页。

② 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1960年，第456页。

二、艺术的发展

〔音乐〕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一个重要标志是，音乐界喊出了创建独立的民族音乐的呼声，并在探索音乐的美国化道路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迄20年代初，美国的音乐在民族独立性方面仍相当落后，许多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实际上还是西欧音乐流派的苍白的反映。于是，一些清醒的美国音乐界人士号召培养自己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创作符合民族特色的歌曲，以形成美利坚民族音乐文化。1923年，纽约成立了美国作曲家联盟，并创办了机关刊物《现代音乐》杂志。该联盟联合了不同爱好、不同创作倾向的青年作曲家，致力于创作从精神到语言方面都具有美国特色的音乐作品。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新一代的作曲家，如艾伦·科普兰、罗伊·哈里斯、亨利·考埃尔、费吉尔·汤姆森、沃尔特·皮斯顿、罗杰·塞欣斯和乔治·安泰等。他们中许多人在巴黎学习过，受到过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在探索音乐的美国化道路时，注意研究美国民间歌曲的根源，研究黑人圣歌、布鲁斯、爵士音乐和印第安部落的音乐，从其中吸取有益的养料。正是他们成为建立和发展独立的美国音乐文化的一支生力军。

这一时期美国音乐界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产生了在美国和世界乐坛都具有重要影响的爵士音乐。

爵士乐是源于非洲的一种黑人音乐。它和早期奴隶吟唱和演奏的做工歌、田间号子、圣歌、民谣和舞曲一样，既保留了非洲音乐的特色，又融合了欧洲音乐风格。这些不同的音乐形式互相影响，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黑人民歌风格：爵士乐。布鲁斯是爵士乐最主要的先驱。

布鲁斯和爵士乐有相同点又有相异之处。相同点是都源于非洲，具有非洲传统音乐风格，节奏感特别强，易于表达演唱者的喜怒哀乐。相异之处是诞生的时间不同。布鲁斯产生的确切年代虽无从查考，但形成较早；爵士乐一般认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地也不同，布鲁斯产生在密西西比和得克萨斯的乡村，爵士乐产生于城市，主要是新奥尔良；布鲁斯一直是一种口头流传而不上乐谱的音乐，歌手和乐师通过耳听他人的演唱来学习演奏，表演时不看乐谱，而运用即兴手法。爵士乐则完全不同，它受欧洲音乐影响较大，注意掌握一些传统音乐的谱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不同风格的黑人音乐相互影响和渗透。许多地方，演奏者往往把几种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起来，如后来出现的黑人灵歌音乐就是集布鲁斯、爵士乐、宗教音乐和传统音乐之大成的一种更加奔放的黑人音乐，它更有利于表现黑人的自豪感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精神。也有人把布鲁斯说成是爵士乐的最主要形式。

爵士乐的发展经历了由南向北的扩展过程。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发祥地。因为在那里有大量的克里奥耳人。所谓克里奥耳人是指黑人奴隶和法国、西班牙人所生的后裔。他们对爵士乐的产生和发展起到过很重要的促进作用。据说不少克里奥耳人受过古典音乐的训练，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有的还拥有自己的歌剧院，但因为其有非洲血统，同样受到种族歧视，被迫与从前的奴隶为伍。“爵士乐的起源大体就是克里奥耳人与黑人结合的产物”，即“黑人奴隶的非洲音乐传统与克里奥耳人对欧洲古典音乐兴趣的溶合”[①]。由于新奥尔良当时拥有大量的黑人爵士乐师和爵士乐队，他们最早在新奥尔良开始演奏生涯，因此音乐史家

---

① 格雷厄姆·瓦里美：《爵士乐》，三联书店，1987年，第19页。

都把新奥尔良视为爵士乐的摇篮。

20世纪20年代开始，布鲁斯和爵士乐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特别影响到北方。主要原因是演奏这两种风格的南方黑人大量北移。1910—1920年，芝加哥的黑人人口从4万猛增至10万。其他北方城市如纽约、底特律、圣路易和费城也涌进大量黑人。黑人把自己的音乐带进这些北方城市，进一步扩大了爵士乐的影响。无线电的出现和唱片工业的兴起也为爵士乐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芝加哥就是当时唱片生产的中心，许多优秀的爵士乐唱片都是在那里录制的。此后，不仅在黑人中拥有广泛的爵士乐听众，白人中也有许多爵士乐迷。“爵士乐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20年代被称为“爵士乐黄金时代”[①]。仅仅10年左右时间，爵士乐不仅风靡整个美国，而且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音乐”[②]。

20年代的美国乐坛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爵士乐歌手和乐师。查尔斯·博尔登、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贝西·史密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爵士乐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查尔斯·博尔登是新奥尔良早期的黑人爵士乐大师之一。他擅长吹小号。19世纪90年代，他组织了美国第一个爵士乐队。他的乐队包括小号、单簧管、伸缩喇叭、吉他、低音提琴和大鼓。他把布鲁斯吉他手和歌手的演奏技巧运用到铜管乐器中去，大大推动了爵士乐风格的形成，被称为“小号演奏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是一位出色的小号演奏者。他的喇叭演奏具有对音符位置的良好感觉，善于结合节奏与旋律的微妙变化来制造音乐从紧张趋

---

① 格雷厄姆·瓦里美：前引书，第29页。

② 卡罗尔·卡尔金斯：《美国文学艺术史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又参见罗伯特·M·克伦登：《美国文化简史》，赫尔辛基，1990年，第194页。

向徐缓的氛围，从而为小喇叭增添了许多音色变化，被誉为“爵士乐天才和最具才华的小喇叭手”[①]。他在1928年录制的优秀独奏曲《西部布鲁斯》是最出色的爵士乐唱片之一。贝西·史密斯是20年代名声最大的古典布鲁斯女歌星。她于1923年开始录制唱片，立即走红整个美国，人称“布鲁斯皇后”。她的唱片《穷人布鲁斯》受到广泛欢迎。她是当时大剧院和酒吧里十分叫座的歌星之一，常常与一些名牌明星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一流的唱片。

爵士乐之所以广受垂青，还由于它本身的通俗性。爵士乐有很强的世俗感，形式生动活泼，风格独特，容易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所接受。由于爵士乐注重节奏的运用和擅长用乐器模仿人声，从而为西方音乐传统注入新的活力，现代流行音乐、摇摆乐、摇摆舞曲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它对音乐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20世纪许多其他音乐风格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美国黑人对美利坚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爵士乐的发展造就了许多有才能的美国作曲家和音乐家。他们以色调鲜明的作品丰富了这种轻音乐艺术和整个美国乐坛。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898—1937）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②]。他的主要作品有《蓝色狂想曲》（1924）、《美国人在巴黎》、《古巴序曲》、《F大调钢琴协奏曲》以及歌剧《波吉与贝斯》等。格什温一生写有10个轻歌剧、许多影片乐曲和几百出歌剧，其作品清新有趣、漫柔华美，独具特色，其中一些抒情歌曲成为出色的典范。

20世纪初美国音乐教育开始普及，音乐课列为小学的必修

① 格雷厄姆·瓦里美：前引书，第36页。

② 罗伯特·M·克伦登：《美国文化简史》，第196页。

课。各种专业的音乐学院和机构纷纷建立。1900年费城交响乐团宣告成立。1905年成立了音乐艺术学院。1914年美国作曲家及出版者协会诞生。1919年黑人音乐协会成立。此外，新成立的音乐院校还有曼尼斯音乐学院（1916）、费城社区音乐学院（1916）、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1923）、朱丽亚音乐学院（1926）等。在此前后，纽约、芝加哥和新奥尔良等城市一些管乐队和舞蹈乐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音乐学院和团体的建立为培养美国专业音乐人才和促进美国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是这个时期美国乐坛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电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影在美国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1891—1927年是电影史的默片时期。1891年托马斯·爱迪生的助手威廉·迪克逊发明了一种电影放映机——电影视镜。这是通过一个小孔观看不断闪动的动画片的机器，有人称之为"供一人看的电影"。1896年，爱迪生在纽约用活动电影放映机首次成功地将图像投射到一个大银幕上，可供许多人同时观看，从而开创了电影的新时代。爱迪生乃成为现代电影之父。1900年以后，小型电影院像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涌现出来。1903年，美国拍摄了第一部连贯故事片《火车大劫案》。这是电影故事片的开端，也是西部牛仔片的鼻祖。1905年，乔治·C·黑尔制作的《黑尔旅行》是美国第一部风光片。它综合了听觉、视角、触角和运动觉，模拟表现了行驶中的列车，使人产生一种非常逼真的列车旅行幻觉。放映后倍受观众欢迎，迅速传播到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电影的进一步普及开辟了道路。到1908年，美国已有1万家固定电影院。由于电影业有利可图，资本家纷纷向它投资，电影迅速成为一项产业并日益走向商业化和垄断化。电影业的领导权很快转入巨型垄断组织手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成立了5个大的电影垄断

公司，即派拉蒙、米高梅、华纳、环球和联美。不久以后，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也相继成立。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因集中了众多的电影制片厂，很快成为一座世界电影之都。到1925年，电影在美国已经普及。每周有1.3亿人次看电影。全国有2万家电影院，有些豪华的大型影院拥有7000个座位。

美国电影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如金·维多、约翰·福特、马克·塞内特、塞西尔·德米特、戴维·沃克·格里菲思等，其中，格里菲斯是默片时代的一位最杰出导演，有人把1915（即他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时）至20年代这段时间称为“格里菲斯时代”[①]。格里菲思（1875—1948）是演员出身的导演。1906年涉足戏剧界，次年进入影坛。1908年拍摄电影《陶丽历险记》开始电影生涯。一生拍有几百部影片，到1912年就已制成450部短片[②]。主要的有：《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党同伐异》（1917）、《被摧残的花朵》（1919）、《通向东方》（1920）、《暴风雨中的孤儿们》等。其中，《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是他最好的作品。前者取材于托马斯·迪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描写了南北战争时期两个家族的命运。南方庄园主卡梅伦一家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爆发后，卡梅伦的儿子上了前线，与北方昔日好友斯通曼兄弟成了敌手。战后黑人烧杀抢掠，卡梅伦的长子组织了三K党进行报复。影片把三K党描绘成英雄，把黑人诬蔑为嗜杀成性的人，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放映后遭到黑人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该影片成为第一次世界大

---

① 康纳德·伊·斯特普尔斯主编：《美国电影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② 卡罗尔·卡尔金斯：《美国文学艺术史话》，前引书，第180页。

战期间及战后在美国各地煽动种族暴动的有力因素。许多州禁止上映。但影片以出色的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战争场面，节奏明快、场面壮观，表演细腻，被称为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

《党同伐异》描写了4个互不相关的故事：基督教的历史，波斯人对巴比伦人的攻击，法国胡格诺教徒被屠杀和一个美国工人被诬为杀人犯的故事。电影力图证明，党同伐异是自古以来的生物学现象。但影片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慈善事业的自私本质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行。格里菲斯对电影制作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在摄影、剪辑、特写、蒙太奇手法等方面都有主要创新和突破，极大地丰富了电影语言和导演技巧，开创了电影通向艺术之路。

除了格里菲斯外，20世纪初，美国电影界的马克·塞内特、塞西尔·德米特、金·维多、约翰·福特等电影导演也拍摄了一些富于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马克·塞内特在默片时期为喜剧片开创了新局面。金·维多的《阅兵大典》（1925）和《群众》（1928）对战争和赤贫条件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作了生动的描绘。约翰·福特则开创了西部片的格式。塞西尔·德米特执导的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以《圣经》为题材的影片在20年代有很高的卖座率。如《为何换妻了?》、《莫换你丈夫!》《禁果》、《十诫》、《不信神的少女》、《万王之王》等。这个时期著名的电影演员有玛丽·皮克福德（1893—1979）（旧译壁克馥）、嘉宝等。前者擅长饰演纯情可爱的少女，被称为“美国情人”，曾使许多美国人心醉神迷。她所出演的《红伶秘史》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她有时也扮演活泼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女性，是当时许多妇女所崇拜的偶像。嘉宝成功地主演过《激流》、《肉与魔》、《仙女下凡》等默片，被誉为无声片中“安祥的女神”。后来她主演过《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名片。她那秀丽的容貌、优雅高贵的气质和略带忧

伤的表情，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心。

20年代，美国电影中喜剧片占相当比重。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喜剧导演和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巴斯特·基顿、哈里·朗顿、查理·卓别林是默片时代的喜剧大师，而查理·卓别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卓别林（1889—1977）生于英国。1913年在美国涉足影坛。他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既是杰出的导演，又是出色的演员。他以高超的杂技和各种细微手势技巧，塑造了众多“小人物”的银幕形象。圆礼帽、小上衣、肥裤子、大皮鞋、小胡子，加上一根手杖是卓别林的典型形象。他的表演风趣幽默，哀婉动人。《寻子遇仙记》、《淘金记》、《马戏团》是他在默片的黄金时代创作的三部巨片。比起任何喜剧演员，卓别林最善于表现下层人物的喜怒哀乐。他既能引出人们的泪水，又会逼出观众的笑声。例如，在《淘金记》中，观众看到小乞丐与一位他热恋着的妙龄少女跳舞。在跳舞过程中，由于他的裤子总是掉下来而陷于十分尴尬的地步。他忙中抓起一根绳子，把它当作皮带系在腰间。然而，不幸的是绳子的另一端拴着一只大狗。当那条狗把小乞丐拽倒在地板上时，大家都笑了。但在笑声中，人们对那小家伙又寄以深切的同情。卓别林的作品幽默诙谐，有讽刺社会时弊的效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也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迫害，曾一度被迫离开美国，定居瑞士。

1927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揭开了美国电影史新的一页。从1929年起，整个美国电影业转入生产有声电影片。世界电影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绘画〕　美国民族绘画艺术是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进入一个新阶段。19世纪末被称为美国画坛“三巨头”（或三个“反叛者”）的三位现实主义大师温斯洛·霍默、托马斯·埃金斯、艾伯特·M·惠斯勒是跨世纪的人物。他

们在晚年宝刀不老，继续为美国艺术发展作贡献。他们的有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在90年代发表的。霍默花甲之年满怀深情地歌颂黑人顽强斗争精神的作品《墨西哥湾流》(1899)、《猛击要害(1899) 均发表在这个时期。《墨西哥湾流》这幅画刻画了一位体魄健壮的黑人孤立无援地在大洋中同大自然搏斗的大无畏英雄形象。霍默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最著名的油画家，19世纪美国最出色、最深刻的现实主义大师”[①]。以画肖像画为基本题材，并擅长揭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的埃金斯其许多优秀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如《威廉·马克·德雷尔》(1904)、《约翰·布卢默》(1904)、《查尔斯·艾·达纳》(1902)、《埃吉特·缅霍太太》(1904)、《霍姆斯·德·阿尔萨夫人像》(1902)，等等。由于埃金斯的肖像画总是栩栩如生，富于人物的个性特征，往往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许多人不愿请他画像，一位叫埃德温·艾比的画家风趣地说，我不愿意给埃金斯当模特，因为“他抓住的正是我从来不愿意让人家看到的”[②]。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都举办了埃金斯的大型个人画展，称他是“这个国家产生的最伟大的画家之一”[③]。正是这些“反叛者”为美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许多画坛新秀。罗伯特·亨利、约翰·斯隆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19世纪美国进步大师的优良传统，成为新一代现实主义画家。20世纪初现实主义画派是这个时期美国绘画的主流。他们是在同占统治地位的、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官方艺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随着文化交流

---

① (苏) 阿·契格达耶夫：《美国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② (苏) 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74页。

③ (美) 莉莲·弗里德古德：《美国画家》，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的扩大，西欧大量颓废的形式主义美术传进美国，如泛滥一时的表现主义、未来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其他流派，在美国美术家中得到广泛响应。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对那些脱离人民、远离生活的畸形、怪诞的唯美主义学院派画风倍加赞赏。这股潮流无疑妨碍了健康美术事业的发展，阻碍了真正的民族美术的形成和繁荣。全国美术设计院是保守派的大本营。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这批画坛新人必然要同这些保守派、同这股正统势力发生交锋和冲突。由于罗伯特·亨利等人作画的指导思想、内容和风格不符合正统派的口味，他们的作品常常被指斥为庸俗、丑陋，没有美感而被全国美术设计院和其他组织拒绝参加画展。为了争取艺术表现的自由权利，为了给现实主义美术开辟道路，罗伯特·亨利等人决心另谋出路，组织自己的画展。一场反对传统的美国学院派画风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1908 年 2 月 3 日，“八位独立画家作品展览”冲破重重阻力，在纽约市麦克佩斯美术馆举行了首次画展。这 8 位画家是：罗伯特·亨利、约翰·斯隆、乔治·B·卢克斯、威廉·J·布莱肯斯、阿瑟·B·戴维斯、莫里斯·B·普伦德戈斯特、埃弗雷特·希恩和欧内斯特·劳森；还有后来加入的乔治·贝洛斯。由于他们的作品摒弃传统标准，引进激进概念，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日常生活中的俗人俗事，被保守派认为“不合时尚”而加以指责，称他们为“垃圾箱画派”。一时间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有人咒骂他们是“鼓吹丑恶的人”，甚至把他们叫做“革命黑帮”。可是出人意料的是，“8 人画展”由于受到攻击，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许多人前往观看和购买他们的作品，销售额达 4 万美元。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和另外 8 个城市还邀请他们去展览其作品。从此，“8 人团”画家名声鹊起，独立派画家的地位得到承认。两年后，1910 年 4 月 1 日，亨利和斯隆等人在纽约举行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独立派艺术家画展”，开幕之日门

庭若市。“8 人团”画家的作品以清新的内容和风格一扫美国画坛保守沉闷的风气，使人耳目一新。他们的作品是新时期美国画坛进步倾向的主流。这两次画展标志着现实主义艺术在美国的兴起。

“8 人团”的精神领袖和鼓舞者是 20 世纪美国最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罗伯特·亨利。罗伯特·亨利（1865—1929）生于辛辛那提市，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巴黎朱理安学院和巴黎美术学院。他虽然受到欧洲各种画派思潮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继承了本国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他顶着保守逆流，把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画家聚集在自己周围组成“8 人团”，形成了向传统势力做斗争的重要力量；他谆谆教诫自己的学生“要表现生活，而不是表现技巧”，“不要摹仿，要有自己的风格”[①]。这些现实主义的主张时刻唤起人们把眼光投向生活的真实，影响了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亨利除了少数风景画外，主要以肖像画见长。他尊重人的尊严和美德，思想敏锐，很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善美。他的作品《化装舞会穿的布拉吉》（1912）、《小渔夫》、《里里安》以及《萨特·克拉拉的印第安姑娘》（1917）等，朴实严谨、真挚动人，使人感到亲切可爱。

约翰·斯隆（1871—1951）是“8 人团”中最重要的画家之一，罗伯特·亨利的得意门生。斯隆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6 岁起就承担养家的部分重担，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用来挣钱糊口。坎坷的经历使他对下层劳苦大众十分同情，目光总是瞄向芸芸众生。他以生动而敏锐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纽约的城市生活。街道、贫民窟、妓院、下等酒吧常常是他作画的题材。“垃圾箱画派”这个带侮辱性的绰号很大

---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 102 页。

程度上是针对他的作品来的。斯隆关心社会进步，曾从事政治题材的版画创作，并长期为社会改革刊物《群众》作插图。斯隆的作品主题鲜明，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他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铜版画《第五街》，在画面上一边是坐在豪华马车上疾驰而去的贵妇人，旁边则是衣衫褴褛踯躅街头的乞丐，生动地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的深刻鸿沟。斯隆的其他作品如《春之花》、《麦克索利的酒吧》(1912) 也充分表现了其特有的对比鲜明的画风。斯隆描绘下层群众生活的作品还有《后院——格林威治村》(1914)、《在宾吉小酒馆里的耶茨》、《把灯关掉》等，充分表现了他对悲剧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对人的深切同情。斯隆在晚年仍作画不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美国绘画艺术。

20 世纪初，美国还有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画家乔治·维斯里·贝洛斯 (1882—1925)。贝洛斯虽然没有参加“8 人团”，但他的主张和画风与他们完全一致。贝洛斯也是罗伯特·亨利的学生。他厌恶当时泛滥一时的形式主义、脱离生活的抽象艺术，忠实地继承了霍默、埃金斯、惠勒斯和罗伯特·亨利等人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他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被称为“合众国里最富有美国气质的画家之一”，是“真正的人民画家，民族画家”[①]。贝洛斯既从事油画、素描，也创作石版画、肖像画和风景画，题材十分广泛。从各项运动如拳击、马戏、马球赛到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花园、公园、桥梁和码头；从建筑工人、造船工人到贫民窟中的居民、监狱中的囚犯以及对黑人严刑拷打的场面，笔触所至，几乎包括了生活的各个侧面。贝洛斯的石版画《佐治亚州的祝福仪式》(1916)，通过一位神父正在狱中训诫被戴镣铐的黑人囚犯，生动地讽刺了美国宗教的伪善本质。《峭

---

① (苏) 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 107、105 页。

壁上的栖居者》（1913）和《造船厂里的人》（1912）则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美国社会下层群众的悲惨生活。贝洛斯的两幅反战作品更具特色：《回来了又怎样呢?》描写了从德国回来再不能从事劳动的法国伤残战俘。《杀害爱迪特·凯维尔》（1918）描绘了一位协助伤员从比利时的包围中逃出的英国女护士遭受枪杀之前的场面。作品着色凝重、寓意深刻，充满悲剧色彩，动人心魄，充分揭露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罪恶。在另一幅《向和平致敬》（1918）中，贝洛斯以寓意的形式、浓重的色彩、动感很强的构图，歌颂了人类欢乐和光辉的未来。贝洛斯的作品深刻、真挚、大胆、创新，独具风格，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愧为“20世纪美国最引人注目、最感人的一位现实主义画家”[①]。正是上述这些现实主义画师为美国画坛增光添色，把美国进步美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与美国现实主义绘画发展的同时，正统派画家也在积极活动。1913年2月7日，由画家、雕塑家协会主持在纽约组织了一次大型美术展览会，由于它在纽约华盛顿街心花园附近69步兵团的军械库展出，故称为“军械库展览会”。这是欧洲现代艺术首次在美国大规模展出，展览会共收集了1300多件油画和雕塑。展品中不仅有19世纪法国画家的优秀作品，也有欧洲各种形式主义流派的作品。展览会先在纽约，以后又在芝加哥和波士顿展出，观众达30多万人。由于展览会的内容良莠不分，兼容并蓄，所以其效果也好坏兼具。好处是扩大了美国观众和艺术家的视野，使美国的美术发展不再孤立于世界艺术潮流之外。坏处是，它为欧洲各种现代派作品在美国舞台上大开方便之门，从而“起了极大的副作用”，“加速了早已露头的艺术解体，并没有促进艺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04页。

术的繁荣"[1]。它促使一些"美国的青年画家努力模仿欧洲各种抽象派、形式主义的探索者"，"它使美国20世纪形式主义美术带上毫无个性的世界主义特点"[2]。然而，应该指出，尽管这次展览会在美国美术中给形式主义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延缓了它的最后形成。更主要的是"虽然在1913年军械库展览之后，很多美国艺术家都接受了现代主义，但也有人反对，他们赞成作为美国最持久的传统的现实主义"[3]。这些反对者主要就是像"8人团"这样一批现实主义画家。他们是美国美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雕塑和建筑〕　20世纪初，美国雕塑界没有出现像圣-郭登斯和弗伦奇那样赫赫有名、作品影响深远的雕塑大师，但也有其特色，产生了一批擅长刻画西部风情和人物的雕塑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1905年，他以印第安人为题材创作的"平原战士"、"冲锋战士"，造型生动、富有生气、栩栩如生，是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另外一些雕刻家也以印第安人为创作主题，如索伦·汉尼巴尔·博格姆的作品"苏族印第安人的水牛舞蹈"和赫尔曼·阿特金斯·麦克尼尔的作品"太阳宣誓"，都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生动地展现了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特色。萨特金·约翰逊则以黑人为创作题材。他公开声称："我所关心的只是美国黑人，力图通过他们富有特征的嘴唇、头发、体态和风采来反映他们的自然美感和人格尊严，并且表明黑人比白人更具有美感"[4]。他的代表作"面具"在美国美术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由于受到欧洲前卫艺术家如达达主义和超现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15页。
②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15页。
③ 卡罗尔·卡尔金斯：前引书，第90页。
④ 韦恩·克雷文：《美国艺术文化史》，纽约，布朗公司，1994年，第382页。

实主义雕塑的影响，美国雕塑家们开始尝试用扭曲的线条、怪异的形态以及特殊的材料等手段来表现丰富的联想和复杂的心灵体验。加斯顿·拉克艾斯是美国早期抽象派雕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躯干”（1930）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一种对人体的独特感受。但是，美国有些雕刻家那种荒诞怪异和注重偶然性的表现手法，使人觉得他们的作品抽象难懂，颇费理解。

20世纪初，美国建筑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崭新的形式——摩天大楼。与这一新的建筑形式有关的著名建筑师主要有2个：弗兰克·L·赖特和路易斯·沙利文。弗·劳·赖特（1869—1959）是20世纪初闻名遐迩的建筑师，一生设计了800多幢建筑，其中380幢付诸建造，迄今仍有280幢。他的作品以形式和细节的相互衬托为主旨，对本质有深刻理解。他早年在芝加哥的沙利文建筑事务所任职。1893年自设事务所，创造了一种适合于中西部的建筑风格，形成所谓“草原派”。1900年草原式建筑风格趋于成熟，主要靠自学成才的赖特成为这一风格的主要创始人。此后，草原式住宅被作为商品建筑大量兴建。它用简洁的墙面、宽敞的起居室、环境取暖装置等取代了住宅中复杂的分间和细节，既宽敞实用，又方便舒适，使装饰、家具和实用设施浑然一体。1900—1910年间，他设计建造了50多幢草原式住宅。建于布法罗的D·D·马丁别墅和建于芝加哥的弗雷德里克·C·罗比庄园是其中的典范。1904年他设计建造的拉津邮购公司，采用封闭、防火、空气过滤调节、机械通风和吸声等一系列先进技术，成为20世纪初美国建筑艺术最优秀的代表作。同年设计的达尔文·D·马丁宫，体现了他重申的“草原家园”的简朴风格[①]。

① 悉尼·利布兰克：《20世纪美国建筑》，中译本，安徽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1906年建筑的惟一神教教堂被列为美国国家历史文物。他为日本设计的东京帝国大厦（1915—1922）豪华舒适，空间优美，结构独特，第二年经受了最严重的地震考验，是建筑史上的杰作。

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美国现代建筑艺术的先驱。1872—187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设计课程。1874—1875年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他反对复古主义设计，提倡现代建筑风格，是“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沙利文是美国建筑设计师中最谙哲理的人，他的信条是：“功能决定形式，形式表达功能”。他认为，如果建筑不忠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它就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他也是第一个强调建筑的社会责任的人，被称为“美国现代建筑之父”。他1891年设计的圣路易的温赖特大厦高137英尺，采用钢框架结构，不用承重外墙，奠定了现代摩天楼设计的基础，被认为是“此类建筑中史无前例的精美建筑”①，“是美国第一座成功的摩天楼”②。沙利文设计的摩天大厦是他对美国建筑艺术的最大贡献，成为20世纪初美国建筑艺术的代表作。摩天楼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电梯、钢筋结构、浮动基地的研制成功，使摩天楼的建筑成为可能；地价的日益升值加速了它的发展。芝加哥和纽约是摩天楼建立最早和最集中的城市。建于1913年的伍尔沃思大厦高792英尺，有55层。稍后建造的纽约帝国大厦高达1250英尺，在它102层的观察台上可俯瞰纽约市全景，迄今仍是世界著名的高层建筑之一。摩天楼的出现也是美国城市化、公司化、工商业和金融业迅猛发展的产物，能在摩天楼里安营扎寨的往往是大公司的老板或金融巨头，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问津的。美国建筑师们的摩天楼的设计和建造中抛弃了欧

---

① H.S.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589页。

② 卡尔金斯：前引书，第160页。

洲传统建筑中复杂的内外装饰，把适用与美观结合起来，开创了这种全新的建筑形式。此后，摩天楼像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涌现出来，而且越做越高，成为城市发展中的一大奇观。摩天楼的产生虽然在建筑史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扩展了建筑空间，促进了城市发展，“一度曾被认为是美国建筑活力的骄傲标志”①。但是，摩天楼也有许多副作用。它那盒子式或笼子式的高大楼房使街道变成狭窄阴暗的缝隙，让人觉得压抑和难受；它遮天蔽日，妨碍周围住宅通风和采光，使人感到沉闷、窒息。连摩天楼的设计者们也对它提出尖锐的批评。赖特称摩天楼是建筑上的“巨怪”。路易斯·瓦福德称之为“供天使和飞行员居住的建筑”。有些城市规划者把它看作是社会灾难。沙利文则认为它是“反社会”的②。高耸入云的摩天楼与低矮败破的贫民窟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缩影。

三、史学新成就

〔*历史科学的新阶段*〕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历史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专业历史团体和高学历的历史人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变化。1884 年最早从“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中独立出来的“美国历史协会”到 1909 年已有 2500 名会员。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活力的历史学团体”③。1895 年，该协会的机关刊物《美国历史评论》杂志正式

① 卡尔金斯：前引书，第 153 页。

② 康马杰：前引书，第 591、593 页。

③ 阿瑟·林克：“美国历史协会 100 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55 页。

创刊。1907年，又成立了专门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学术组织“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1965年改名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并办有《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杂志（后改为《美国历史杂志》）。它们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专业研究水平，推动美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882年全美国仅有5所大学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只有2个历史学博士生毕业。1912年已有22所大学具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当年有500人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20年代末已增加到600人，并且平均以每年50人的速度递增。这些博士生的毕业为美国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输送了高素质的人才。大批经过细致整理的原始历史资料相继出版，是这个时期历史学界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三卷本《1787年联邦会议记录》（1911）、共三十四卷的《大陆会议记录》（1904年开始出版）、七卷本《1861—1865年美国南部同盟会议记录》（1904—1905）、五卷本《印第安人事务·法律和条约汇编》（1903年开始出版）、四卷本《美国和其他列强之间条约、公约、国际条例、协定书和协定汇编》（1910年开始出版）。还有哈特主编的分专题出版的二十八卷大型丛书《美国民族》，（1904年开始出版），等等。这些资料的公开问世，为开展美国史的有关课题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时期美国史坛的又一突出表现是学派众多，“群雄并立”。既有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比尔德为代表的经济学派，还有以研究美国劳工问题为其特色的康蒙斯、威斯康星学派，以内文斯为代表的企业史学派，更有伯吉斯、邓宁等人为首的种族主义学派，可说是杂然纷呈。研究范围比以前进一步扩大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专家们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殖民地时期和独立革命时期的历史，也研究内战和重建时期，研究课题除政治制度外，还涉及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劳工史、奴隶制和历史地理等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前

大有进步，并出版了不少专著。

〔进步主义史学〕　　进步主义史学是进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进步运动是内战后美国社会公司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广大中下层群众，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极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社会经济命脉及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十分不满，对各级责任政府的腐败和大城市中贫困和犯罪的日益增长深感忧虑，强烈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合理化，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正是在进步运动和进步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了进步主义史学和一批有才华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有三位：弗雷德里克·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和弗农·L·帕林顿。进步主义史学家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主张使历史成为实行政治变革或改良的工具；他们都来自中西部，接受过进化论的观点，也受到当时史坛上“新历史”思潮的影响；他们打破了新英格兰史学家对史学的垄断地位，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在这三位学者中，特纳是在史学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第一位。他在 1893 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否定了当时在美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生源说”，即认为美国历史是欧洲史的延续，主张从美国实际，特别是从西部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等因素来研究美国文化的起源，从而奠定了“边疆学说”的理论基础，成为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的转折点。特纳的历史观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与当时美国文坛要求建立独立的文学艺术的呼声是一致的，被称为“历史写作的独立宣言”。特纳一生著述不多，但其理论却在美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达 30 多年之久，是边疆学派的一代宗师。查尔斯·比尔德从经济角度对美国宪法的制订经过和实质重新进行解释，写出了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帕林顿则从思想史角度阐述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进程。特纳、比

尔德和帕林顿这三位史学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史学领域"，被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三位大师，是"在史学上长期留下自己风格的学者"[1]。这个时期的进步主义史学家还有詹姆斯·鲁宾逊，他是"新史学"的开创者，重点写社会史，主张重写普通人阅读的美国通史。进步主义史学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独特的研究成果将美国史学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是这个时期美国史学的主流。

〔比尔德与经济史观〕　　查尔斯·A·比尔德（1874—1948）是美国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印第安纳州，成长于平民党和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时期。1898年大学毕业。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英国史和欧洲史。19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比尔德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一生驰骋史坛近50载，写有300多篇论文和60部著作，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比尔德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巨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史学思想在美国史学界一直占支配地位。在这个时期，比尔德的重要著作有三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是他用"经济决定论"解释美国历史的代表作，也是探讨美国宪法制定过程的权威性著作。在本书中，比尔德采用大量翔实的材料仔细分析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发起和制定宪法的动机。他认为，制宪会议代表主要是四个动产利益集团，即货币、公债券、制造业、贸易和航运业。他们都是宪法通过的经济上的直接受益者。比尔德还认为，制宪的另一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防止和镇压"无财产"的群众的"骚动"。比尔德批判了美国早期学派所谓宪法是超阶级的、"全民意志的产物"的错误观点，相当程度上触及到美国宪法的本质，是历史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所以有

---

① 康马杰：前引书，第428页。

人称他为“马克思学派”。但是，比尔德本人却否认他对宪法的经济分析来源于马克思学说，而是强调其研究是以麦迪逊的政治学思想为依据的。事实上，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是机械的、片面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他不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用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掩盖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他有意缩小了种植园奴隶主在制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宪法描绘成资本家债权人一致反对土地债务人的工具”[1]，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对种植园奴隶主的胜利，客观上否认了美国宪法是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调和的产物这一要害实质。对于美国宪法在西方宪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比尔德也未加详细论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该书的重要意义。

比尔德第二部重要著作是《杰斐逊民主的经济根源》(1915)。它是比尔德用“经济决定论”解释美国历史的又一力作。此书总的指导思想是：宪法是一小撮打算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保护其财产不被农民群众侵犯的资本家集团制定的。比尔德认为，杰斐逊民主运动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财产和政治集团的攻击，它不过是政权从资本家集团转到农业集团手中[2]。在本书中，比尔德指出，杰斐逊民主和联邦党人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双方都反对“多数人的暴政”，并认为，杰斐逊不了解政治的经济基础，因而不能给民主力量以足够的支持，推动他们去反对反动派和特权阶级。这是杰斐逊民主的局限性。

比尔德第三部有影响的著作是他与其妻子玛丽·比尔德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本书的“突出特点是把杰斐逊民

---

① 约翰·海厄姆：“查尔斯·比尔德”，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美国史译丛（史学专号）》，1982年，第95页。

② 李世洞：《美国史学思潮专辑》第12页，载《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主制解释为农工起义，把内战看成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北部的商人剥夺了南部种植园主贵族的权力”，比尔德“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发展了的经济决定论和对美国人民的文明成就的公开赞美结合起来了。书中还明确地赞扬了美国人民集体的力量和他们对于进步的坚定信心”①。《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再次显示了比尔德写作历史的独特视角。他突破了学院式的传统写作方式，把文化史看成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全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优美流畅，使人爱读，耐读，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一再重版增订。在比尔德逝世以后，美国《展望》杂志曾在编辑和教育界举行民意测验，投票推选他的这部书为阐述美国民主的最佳著作。

〔帕林顿与思想史学派〕　弗农·L·帕林顿是这个时期“史坛三星”中成名最晚的一位。如果说“特纳的名声只来自一篇文章”，“帕林顿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成名只靠一部书”②。他于1927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美国思想的主流》一炮走红，奠定了其在美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这部皇皇巨著的写作范围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20世纪。每一卷叙述从殖民地时期至杰斐逊任内的美国文化的兴起；第二卷以资本主义发展为背景，叙述了美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卷讲述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中产阶级的反抗运动。全书以政治思想发展史为主线，涉及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领域，材料丰富、视野宽阔。纵观全书可以清楚地看到，帕林顿是美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他认为，自由主义与清教主义、保守主义思潮的斗争是美国思想发展的主旋律。美国文化史是自由和

---

① 约翰·海厄姆：“查尔斯·比尔德”：前引文。

② 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441页。

特权两种力量斗争的历史。“美国思想的伟大传统是自由主义和反抗精神”，只有“开口不离激进思想的人才有美国味”[①]。在他看来，由欧洲传来的清教主义并不是美国民主的福音。美国民主是在美洲大陆土生土长的。因此，在政治方面，他特别推崇杰斐逊民主，并注意研究美国普通劳动群众对美国民主思想发展所作的贡献。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尤其赞赏那些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对文艺界的唯美主义倾向给予严厉的批评。对于像塞缪尔·亚当斯、潘恩、杰斐逊、林肯等这些为美国历史发展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物，帕林顿总是给予热情歌颂。在他笔下的英雄，一个个都是人民大众的斗士。美国著名史学家康马杰高度评价帕林顿这部名著，称它是“号召人民冲锋陷阵的号角”，“是一篇伟大的檄文”[②]。帕林顿这部书的主要弱点是过分强调和渲染杰斐逊民主的作用，明显忽视工商业发展对于美国社会进步的意义。他由衷赞颂的美国的“激进主义”和所谓“理想”无疑都打上鲜明的资产阶级烙印。尽管如此，帕林顿所开创的跨学科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做法值得借鉴，本书不失为一部有深度、有价值的著作。

〔种族主义史学〕　　在美国的史学中从来就存在着种族主义幽灵。20世纪头10年，种族主义史观占有显著地位，其代表人物有约翰·W·伯吉斯和威廉·A·邓宁等人。约翰·W·伯吉斯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历史教授。著有《政治科学与比较法》(1890)、两卷本《内战和宪法》(1901)、《重建和宪法》(1902)等。他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受兰克的“客观”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文明进化的优胜劣汰过程，极力宣扬

① 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438页。

② 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440、441页。

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族优越性，公开宣称，“种族之间在政治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白种人的使命、责任和权利就是将政治权力掌握在手中，以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普遍幸福”①。美国内战和重建是伯吉斯研究的重点，在这些著作中种族主义史观比比皆是。在他看来，美国内战不是北方资本主义和南方种植园奴隶制两种不同制度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说什么内战是“废奴主义者煽动起来的”。他还鼓吹：重建时期激进派的重建方案企图实现黑白种族平等是不现实的，因为黑人属于劣等民族，不能平等地和白人社会融为一体。这种论调反映了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要求，客观上为战后在南方各州制定“黑人法典”，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伯吉斯还把种族优越论扩大到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去，鼓吹为了“迫使落后的民族屈服，甚至必要时不惜采用任何手段”②。这种观点完全适应了美帝国主义者对外扩张的需要。

威廉·A·邓宁是伯吉斯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也是重点研究美国内战和重建史的学者。主要著作有《论内战和重建》(1906)、《1865—1877 年政治和经济的重建》(1907) 等。他把重建时期的斗争说成是不同种族之间理想的冲突，认为重建时期南部的问题并非在于奴隶制而在于同时存在两个性格明显差异因而无法融合的民族。这种“理论”掩盖了“重建是内战的继续，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入”这一实质。邓宁还认为，内战虽然摧毁了奴隶制，但没有一个保障种族平等的制度取而代之；加之，激进派控制的民主政府吸收了一些没有文化、低能、不会

① 哈维·威什：《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历史撰述的社会思想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 年，第 230 页。

② 伯吉斯：《政治学和比较法》，纽约，1890 年，第 45—48 页。转引自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下册，第 1110 页。

治理的黑人参政，从而造成各州政府腐败无能，争权夺利，社会上则犯罪增加，一片混乱。他的结论是：重建是历史的悲剧。这是诋毁黑人及其白人同盟者的种族主义偏见。应该说，南部重建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必然结果，把责任完全推到黑人头上是不公正的。属于邓宁学派的重要史学家还有克劳德·G·鲍尔斯，他的代表作是《悲剧时代：林肯后的革命》(1929)。该书和邓宁的观点同出一辙，其基调是贬低黑人的作用，否认重建的一切成果。在进步主义史观的影响下，邓宁学派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观点在有些方面遭到一部分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反对，这就是在20年代末出现的所谓修正学派。

〔康蒙斯—威斯康星学派〕　康蒙斯—威斯康星学派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出现的一个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学派，也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中产生最早、影响深远的一个正统学派，其最早奠基人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西奥多·伊利（1854—1943)。伊利于1886年出版了美国第一部“美国劳工运动”。1892年他就职于威斯康星大学并于1904年创办了“美国工业研究所”，它是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威斯康星学派的草创时期。他们出成果的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初其第二代传人康蒙斯接手以后。约翰·R·康蒙斯是伊利的得意门生，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康蒙斯不负老师厚望，他带领一批同事和学生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进步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他们着重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工问题，主张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1910—1911年，他们收集和整理出版了十卷本《美国工业社会文献汇编》。这些资料集虽然有较大局限但材料翔实，不失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重要参考书。1918年以后，他们又陆续出版了四卷本的《美国劳工史》。从此，康

蒙斯成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权威。威斯康星大学成为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中心和威斯康星学派的摇篮。威斯康星学派的许多观点是不能同意的。例如，他们强调美国工人运动只需要实际利益，不需要革命理论；他们支持"劳联"的"单纯工会主义"斗争策略，反对工人搞革命斗争，主张美国工人运动走非阶级斗争，即阶级合作道路；他们迎合资产阶级政治需要，宣扬"美国例外论"，用"职工意识"代替和否认"阶级意识"，等等。威斯康星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但是，威斯康星学派的产生及其著作的问世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还是起了有益作用的。该学派的崛起，引起史学界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注意，从而把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提上日程，为工人运动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它完成了美国工人运动史资料的大规模收集和整理工作，为工运史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为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培养和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康蒙斯同时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公用事业管理、文官制度改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威斯康星州草拟了许多经济和行政改革法规，为该州的立法工作做出了贡献，成为制度经济学派三巨头中的第三号人物[①]。

四、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教育

〔实用主义的黄金时代〕　19世纪70年代，在皮尔斯等人倡导下，"形而上学俱乐部"创造了属于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是，这一新的哲学最初并没有引起美国人太多的注意，直

① 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二号人物分别为索尔斯坦·维布伦和韦斯利·米切尔。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詹姆斯和杜威的发展和传播，实用主义才在美国广泛流行，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

1898年，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州作了著名的“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正式引用了实用主义这一说法。与皮尔斯时期仅仅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认识的方法论不同，詹姆斯在演讲中赋予了它浓厚的人本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对此，皮尔斯十分不满，1905年4月，为了表示他与詹姆斯的不同，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实效主义”。然而，皮尔斯毕竟还只是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角度来阐释问题，在他的实用主义中没有包含哲学理论。詹姆斯的贡献便是对这种把实用主义原则局限于狭隘的逻辑和科学方法论范围的超越，先后发表了《实用主义》(1907)、《多元的宇宙》（1909年）、《彻底的经验主义》（1912年）等论著，把实用主义的原则贯彻于人生观、价值观、真理观等各个方面。他的理论主要强调两点即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对于实用主义，他解释为不讲原则，只讲效果，“实用主义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①]；对于彻底经验主义，他是这样阐释的：“我把世界观命名为彻底经验主义，因此我对事物的描述，从部分开始，并且使整体成为一个第二等的存在。我的经验主义本质上一种镶嵌哲学，一种多元事实的哲学，和休谟和他的后继者们哲学一样。他们既不把这些事实拉到实体上去，为它固有，也不把它们拉到一个绝对精神上去，以为它所创造，作为它的物件。但是我的经验主义和休谟类型的经验

---

① 俞吾金：《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主义有所不同，因此我把我的经验主义加上彻底的这个形容词，以表示它的特点”[①]。

詹姆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这一美国哲学推向颠峰的则是另一位大师杜威。他不仅系统论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且将之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使之世俗化、现实化。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实用主义才会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出来。他的主要著作有：《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1909年）、《哲学的改造》（1920年）、《经验与自然》（1925年）、《确定性的追求》（1929年）等。在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中，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是最重要的内容。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哲学理论，“经验既在自然之内，也是关于自然的。被经验到的并不是经验，而是自然——石头、植物、动物、疾病、健康、温度、电力等等。以某些方式起着相互作用的事物，乃是经验；它们是被经验到的东西。当它们以另一些方式与另一种自然对象——人的机体——发生联系的时候，它们也是事物怎样被经验到的情况。经验就是这样达到自然内部的；它有深度。它也有广度，而且在广度是有无限大的伸缩性。它伸张着。那伸张就造成了推论。”[②]。同时，他还提出了工具主义的说法，指出真理、方法都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只能承认它们是行动的出发点，受行动的检验，而不是行动的结局。看清这件事实，也就清除了世界上的各种刻板的教条。这样也就认识到各种关于思想的见解、理论和体系是永远可以通过使用而得到发

---

① 俞吾金：前引书，第22页。
② 俞吾金：前引书，第73页。

展的。这样也就使我得到教训，必须注意找出毛病来改变它们，同时也要找到机会来肯定它们。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之中的。”①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是以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载入史册的，这是这个时期美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进步运动席卷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革派在揭露和批判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黑暗面的同时，矛头所向也触及到学校教育的弊端。如《论坛》杂志在1892年发表了约瑟夫·赖斯的文章，号召人们以弗朗西斯·帕克为榜样，广办“进步主义的学校”②，把它的激励作用和热情惠及全体民众。早在1875年，帕克就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公立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他强调重理解，不重强记，重生动活泼，不强调纪律。后来又主管芝加哥库克师范学校，进一步推行他所谓的“优质教学”试验③。由于他最早发起这方面的革新，被称为“进步教育之父”④。1896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大力倡导进步教育。他和其夫人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又称“杜威学校”，以贯彻他的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笃信进步主义原则的教师纷纷向他学习，也办起了类似的学校，以检验和发展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从而揭开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序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基本上处于试验阶段，而且主要在私立学校进行。随着战争的进行，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在公立学校中也逐步开展起来

---

① 俞吾金：前引书，第61页。
② 指帕克在芝加哥市库克县主办的库克县师范学校。
③ 阿道夫·迈耶：《美国人民教育史》，纽约，1957年，第248页。
④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19页。

了。杜威不仅身体力行，亲自创办学校进行试验，而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从理论上阐述进步教育的意义、办学经验、教学方法和学校组织管理等具体规则。这个时期杜威的主要著作有：《学校与社会》（1899）、《我们怎样思维》（1909）、《明日之学校》（1915）、《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杜威的教育理论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教育思想和美国学校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①。被称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首席代言人"②。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他着重论述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区别、学生的学习与实践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等等。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杜威认为，学校是"雏形的社会"，每一个学校本身都应该是一个社会，儿童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这个雏形社会，最终将会了解他毕业后将要进入的那个大社会；他指出，学校乃是继承机构，应该承接社会中其他一些集团的各种功能而使之继续发挥；他还认为学校是社区的一个富有生气的活动中心，是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变革与改造的杠杆；但是，杜威又认为，学校单独不能进行这种改革，因为它只是许多重要教育机构的一种③。

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区别，杜威认为，教育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连续不断的、无处不在的、渗透一切的和强有力的，而一个人从实际生活中所接受的教育与学校中所提供的教育之间是有差别的。"在日常的生活进程中，教育是偶发的，在学校教育中，教育是有意的"④。

---

① 理查德·范斯科德等：《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②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19页。

③ 理查德·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24—25页。

④ 理查德·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24—25页。

关于学生的学习与实践的关系，杜威指出，个人最好从“做”中学，不管是学走路、谈话、游泳、画图，或者解决问题和形成概念，都是这样。学生要取得最好成绩，不仅要从书本上学，还要会使用工具和有关材料，还应走向社会，在劳动和社交场所尽可能多地与人们接触，更多地了解社会和学习社会。杜威特别强调，为人类社会所必须的职业和生活上的联系，都应该包括在教育的基本范围之内。对学习最可信的测量标准，是个人在社会上理智地行动的能力。

关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杜威认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包括背景、经验和能力，以便因材施教；教师还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掌握知识的新动向，并贯彻到教材中去，启发学生获得新知识、新见解。

对杜威及其拥护者进行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的目的和效果，美国史学家莫里森和康马杰等人作了如下概括：“这些人士和他们的信徒们所进行的‘革命’，乃是要完成一大转变，即着重从讲课转变到着重学习过程，从重视课目转变到重视对学生实际训练，从要求死记硬背转变到让学生获得亲身体验，从事教育为谋生的准备转变到以之作为生活本身。这一转变要求儿童们通过干木活、做饭菜、搞印刷、绘地图这类活动，自己实际参加学习过程……。这样就大大消除了教室中的拘谨、刻板，扩充了课程项目，其代价是学习不透彻和训练不严格。同时这一转变还鼓励儿童在学生自治等类活动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并力图使学生成为杜威所说的‘一种胚胎式’的群体生活，积极从事能反映出较大社会的实际生活的各类活动。为时不久，杜威便和他在师范学校的同道者们获得成功，把他们的教育哲学推行到了全国很大一部

分地区"[1]。

从上述杜威的教育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核心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主张从"干"中学。这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他所要实现的"雏形社会"的理想制度就是要把学校建成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训练基地，缩短学生的成长过程，更好更快地培养资产阶级社会之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其实质是一目了然的。但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教学方法，如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学中着重理解、反对死记硬背，重视培养学生自学和自立能力，强调教师要了解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教学等，无疑都有积极作用和借鉴意义，对于当时美国的教育发展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1919年4月4日，在华盛顿公共图书馆大厅正式成立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其纲领的核心是，用现代科学知识关心学生的身心、道德和社会性诸方面的成长，允许学生以最佳的自然表现和自我管理，来充分发展各个年轻人[2]。1920年，该协会又公布了"七项原则声明"，内容是：(1)学生有自然发展的自由；(2)兴趣是全部活动的动机；(3)教师是一个指导者，而不是布置作业的监工；(4)注重学生发展的科学研究；(5)对儿童的身体发展给予更大的注意；(6)适应儿童生活的需要，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7)在教育运动中，进步学校是一个领导。1924年，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创办了《进步教育》杂志月刊，由格特鲁德·哈特曼任编辑[3]。该杂志大力宣传进步教育理论，也介绍外国的教育经验，对于促进当时正在开展的进步教育改革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进步主义教育

---

① 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腾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册，第288页。

② 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26页。

③ 迈耶：前引书，第316页

协会刚成立时只有几百个成员，到30年代发展到约1万人，成为进步教育事业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①]。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推动下，美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不同程度地都受到影响。学制方面，1910年以前，八—四制和十一年的七—四制一直在美国占优势。后来除少数农村地区外，这种学制慢慢消失了，出现了两年或三年初中。六—三—三制成为“通用学制”[②]。在课程设置方面，有些学校从俄国传入教授金工、木工等技艺；有些中学开办了手工训练课程；中等商业专科学校增设了培养职员、簿记员、打字员的课目；许多学校增加了学生课外活动时间；麦克费读本时代那种机械背诵几乎全被抛弃，代之以包括几门学科的单元课程计划；一些农村贫民区的学校，学生们开始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进步主义教育……在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在进步教育的汹涌澎湃时期，我国没有一所学校能完全逃避它的影响”[③]。

应该指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一段时期内对美国教育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影响深远，但它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它过分强调“实用”和“经验”，忽视了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它过于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忽视了对他们的全面培育和严格的基本训练；片面强调儿童的天然善性和以儿童为中心，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等等。从30年代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40年代逐步走向衰落。

〔*20世纪初美国教育的新发展*〕　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由于受到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时期美国的各级

① 《外国教育资料》，1986年，第1期，第63页。
② 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286页。
③ 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27页。

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新的发展。

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公立学校中就增设了幼儿园这一级。但当时的幼儿园无论师资条件还是教学方法都不够完善，儿童得不到活泼健康的成长。进入90年代，扩大和改革幼儿教育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1900年，美国全国各地还只有250个城市建有幼儿园，到1920年，几乎有8000个左右独立幼儿园，入园儿童达到51.1万人①。如果把公立学校中1—8岁的小孩包括在内，入学儿童达到19377927人，1930年增加到21278593人。② 这个时期儿童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蒙泰索里方法"。玛丽娅·蒙泰索里是意大利的心理医生和教育家。蒙泰索里方法是她所创立的对学龄前儿童的初等教育法。它强调幼儿读、写技能的早期培育，主张给儿童提供舒适的环境以利于智力的开发。发展个人独创性和自我发展是她的教学法的特点。她的教学法把生物的特性和人的智力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儿童在一定年龄就存在着与这年龄相对应的"敏感期"，在这个时期，儿童的兴趣和智能最适于获得某种知识。儿童在6岁以前应该学习读、写、算。后来，她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法，使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自学语法、几何、多位运算、分数、音乐、生物、地理和历史等。自我教育是蒙泰索里方法的核心。蒙泰索里方法引起美国人的极大兴趣。1912年美国出版了《蒙泰索里方法》，她的教学法在当时的美国风靡一时。蒙泰索里式幼儿学校在各地纷纷涌现。2年后由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逐渐冷落下来。

---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21页。

② 美国人口统计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华盛顿·D·C，1961年，第207页。

20世纪初，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有显著变化。1900年，公立学校制度已牢牢确立起来。义务教育有了可喜的进步。到1918—1919年，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最后通过义务教育法，至此，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小学义务教育。1900年，美国大约只有6000所公立中学，1920年达到14000多所，增加一倍多。1900年，中等学校学生只有63万，到1930年增加到470万。全部中小学生注册总数（包括公私立学校）从1900年的16854832人，增加到1930年的28329059人。学生占5—17岁人口的百分比从1900年的72.4%上升到1930年的81.3%。[①] 1900年，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常年经费为2.15亿美元，到1920年已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30年增加到20亿美元。同一期间（1900—1930），学校财产价值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70亿美元。1870—1920年的半个世纪内，公共教育的全国人均开支从1.64美元增加到9.8美元，花在每个中小学生身上的费用从9美元增加到48美元，增长一倍多[②]。由于受到杜威等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学的课程设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890年，大多数中学生只念拉丁文、几何、代数、历史。到1900年，增加了自然地理、生物学、英国文学、文官政府概论。1910年后，又增添了德语、动物学、植物学。1920年起，学习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这些基础课程的学生急剧减少。市政学、家政、手工、音乐、艺术、簿记、打字这些应用型科目则倍受欢迎。1918年，全国教育协会确定了中等教育的“七项基本原则”：促进健康、掌握基本技能、在家中表现良好、职业技能、公民义务、有效利用闲暇

---

① 美国人口统计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第207页。

② 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腾堡：前引书，第287页；杜蒙德：《现代美国》，第67页。

和道德品质。这七项基本原则明显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德、智、体三方面要求，不仅影响20年代，而且成为以后几十年美国中等教育的标尺。这个时期，中小学的教学条件也大为改观。19世纪末，农村学校一般都是一间教室、一个教师、八个年级混在一起。城乡的学校实行小学八年制，中学四年制。20世纪以后，上述情况迅速改变。农村学校告别了旧式的单间教室，合并成较大的学校。普遍创立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不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不少学校建造了更多更好的礼堂、体育馆和试验室等教学设施。

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上所需技术人员急剧增加和政府的大力扶持，美国职业教育也获得较快发展。1914年颁布的《史密斯—利费法》和1925年颁布的《帕内尔法》要求普通中学开设农业技术教育课程。根据1916年全国220所中学抽样调查，有97%的中学开设有农业技术教育课。1918年受政府资助开设此课程的中学达609所，1929年增加到2693所。1917年国会颁布了《史密斯—休斯法》，责成联邦政府通过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为地方职业教育提供资金，帮助各州发展职业教育，并规定了职业教育的领导机构和课程门类。1929年又颁布了《乔治·里德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公立中学中的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为许多青年提供了学习文化掌握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技术人才，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方面一向比较落后的南方，这个时期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0世纪头10年，南部各州教育拨款增加一倍，达2亿美元。白人儿童入学率几乎增加1/3。文盲大为减少。土生白人文盲从1900年的11.8%降至1920年的5.5%。10岁和10岁以上的黑人

文盲从1900年的44.5%降至1920年的22.9%[①]。专为培养黑人教师和促进黑人教育的乔治·皮博迪基金和约翰·斯莱特基金到1927年已创办了300多所立案中学。另外，安娜·琼斯基金(1908)、“普及教育委员会”(1902)、卡罗琳·菲利普斯·斯托克斯基金(1913)和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1914)也在为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及在农村地区盖起新校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和北方其他地区相比，南部的教育发展水平还是相对落后的。教育方面的种族平等也远未实现。

高等教育也有了重要发展。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成立，不久以后，各个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协会。1900—1930年间，学院和大学从977所增加到1409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注册人数由23.8万人增加到110.1万人，其中本科生105.4万人。州立大学发展也很快。有些办得好的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等大学的学术上完全可以同那些较老的私立名牌大学并驾齐驱。

19世纪后半期通过两个摩里尔法的颁布和实施，美国的赠地学院迅速发展。1895年赠地学院的学生还只有25000人，到1926年就达到40万人。赠地学院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和课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一条耗资少、收费低、适应性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新途径，标志着传统的、古典的、尖子学校垄断高等教育局面的结束。

起步于19世纪20年代，由哈佛率先实行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在70—9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1876年成立的，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标志着美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此前，哈佛和耶鲁大学已先后建立了研究生院。此后，康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第22页。

奈尔、加利福尼亚、克拉克、威斯康星、芝加哥等大学也陆续成立了研究生院。到1900年，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已有150多所。1/3的高等院校开设有博士生课程。研究生已达6000人。此后逐年增加，到1930年已达47000人。

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和第19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妇女进入大学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到1920年，女大学生已占大学生总数的47.3%。但是，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不少理科院校和许多医学院校把妇女拒之门外①。

这个时期，大学课程设置也有重大改革。哈佛大学在查尔斯·埃利奥特校长（1869—1909）领导下，首先推行用自由选修课制代替必修课制，使学生有更大的自由选课权利。此后，其他高等院校也纷纷效法，大力采用这一制度②。另外，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受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更多地偏重于一些专门化、应用性强的课程，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课程的开设。课程安排也显得过于分散化。后来，这一制度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到埃利奥特的继任者洛厄尔任内，对选修课制又作了一些调整，将课程设置相对集中，实行"主修"、"辅修"制。不过学生仍有相当程度的选课自由。选修课程制由于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从那时以后一直被沿用下来，为许多大学所采行。

五、宗教

〔美国教会的新发展〕　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宗教团体无论在人数还是在财产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1890年，全国

---

①② 玛莉·诺顿、戴维·卡兹曼主编：《民族与国家：美国历史》，前引书，第361页。阿道夫·迈耶：前引书，第335—336页。

教徒总数为21699000人，到1916年为41927000人，到1931年又增加到59798000人[①]。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仍是美国教会的三大方面军。在三大宗教中，新教徒仍占优势，其次是罗马天主教，再次是犹太教。教徒的数字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迅速递增。“20世纪初的美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是个基督教国家”，其“势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②]

世纪之交美国宗教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壮大。其教徒人数从1890年的734万多人发展到1920年的1800万人。达到6个美国人中有一个天主教徒，3个信教者中就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1929年猛增到20113000人[③] 天主教的迅猛发展与当时大批外来移民洪流涌入美国有关。据统计，从1891—1930年，共有22325970个移民进入美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欧和南欧天主教国家[④]。这些天主教徒加盟美国无疑壮大了天主教教会的人马。大量罗马天主教徒的到来给美国社会和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教徒的管理和与此相关的经费问题。这些新移民有不同的语言、传统和习俗，且大多数为穷人。要管理好他们就必须增加新的牧师，建立新的教区、教会、教堂和神学院。新增加的教士从1880年的6000人增加到1910年的17000人。到1914年教区数目在14个大主教区内共建立了100多个主教辖区[⑤]。教堂也有较大的增加。与此相联系，教会的经费支出猛增。虽然国外

---

① 美国人口统计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288页。

② H.S.康马杰：前引书，第248、252页。

③ 《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288页。

④ 悉尼·阿尔斯特伦：《美国人民宗教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49—750页。

⑤ 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宗教机构提供过不少援助，比如到1914年，欧洲信仰宣传团资助了600多万美元。德国、澳大利亚和瑞士也伸出过援助之手。但大部分财政开支还得靠美国本身来解决，从而增加筹措经费的压力。

其次，是天主教的目标和方法问题。教会围绕这一问题分成两派。“自由派”，即所谓“美国人”（多数为新教徒）认为，教会对天主教徒同化入美国主流方面应采取积极态度，加速新教成员的“美国化”，并支持宗教自由主义、容忍教派差别。“保守派”则希望保持天主教的特色和传统，并拒绝迁就“美国化”。他们希望加强自己的种族教区以对抗地区教区。与此相关的是，爱尔兰裔僧侣集团要求有较大的代表性。自由派则反对这种独立的教区制。“美国化”问题的争论一度引起教会内部的分裂。后来教皇作了让步，让一些独立的教区集团享有较大的代表性。关于“美国化”问题的争论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呈上升趋势的罗马天主教发展势头，削弱了长期以来新教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改变了美国宗教力量对比的格局。

第三，是天主教的教育体系问题。较多的天主教自由派人士包括红衣主教詹姆斯·吉本斯、大主教约翰·艾尔兰、约翰·基恩等人主张把公共教育作为他们的小孩同化入美国生活主流的手段。但是，保守派则主张多建立天主教独立的教区学校，以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德裔天主教徒是独立的教区学校的最积极支持者。他们把这些学校看作是保存其德国语言、文化的一种途径。最后由于大主教迈克尔·A·科里根支持后一种意见，争论以有利于建立教区学校制度而告一段落。到1914年，有100万儿

童进入天主教教区学校读书，教师有20万，年开支达150万美元[①]。然而迄这时为止，仍有大部分天主教徒的小孩进公立学校。天主教教区学校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不同民族儿童“美国化”的进程，但是他们自办学校，减轻了政府教育经费负担，不失为社会办学的一种有益途径。

20世纪初，新教势力也达到了顶峰。1906年，新教各团体共有教徒20857303人，到1916年增加到26205039人[②]。而在新教各派中又以浸礼会、卫理公会团体人数最多，势力最大。1929年，卫理公会教徒有7246000人，南方浸礼会教徒有3771000人[③]。同一年其他教派教徒人数为，长老会1959000人，主教派教会1876000人。每天都有新教堂落成。做礼拜的人数空前增加。

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教会势力的增长，新教和天主教一样，其触角迅速伸向国外，海外布道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和美国军队一起，成为这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一百多年来，在美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教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直居主宰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受到各种新的理性思潮的影响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以后，其优势已有所减弱。

这个时期，美国的犹太教也有所发展。最早到达美国的犹太人是17世纪中叶（1654）从巴西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裔犹太人。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犹太移民发展缓慢。1775年才只有2千人。美国建国后，由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犹太移民接踵

---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59页。

②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24页。

③ 《殖民地时期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288页。

而至。1870 年以前，美国犹太人多为德国人。1870 年以后，大批东欧犹太人涌入美国。1880—1920 年代是犹太人移居美国的高峰期。“单从 1881 年到 1924 年这 44 年间，就有 238.8 万犹太人到了美国，其中大多为讲意第绪语的犹太教穷人”①。他们来自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和奥匈帝国。这些犹太人建造自己的教堂、学校、医院、互助社团。创办自己的报刊，开创自己的文学。他们在文学、科学、法律、音乐、医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美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犹太人还是经商高手，是美国工商界的活跃分子。

在天主教成为美国教会中一支重要势力的同时，东正教也在美国逐步壮大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东正教徒发展到 400 万，他们分成 18 个全国性或地区性集团②。东正教是美国宗教团体中最不美国化的组织，一直保留着自身的许多特点。

20 世纪初叶，美国宗教的繁荣昌盛一度使它们的教徒们激动不已，仿佛这是美国宗教的“黄金时代”。可是与这种发展的同时，美国的教会正面临新时代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新的理性思潮和社会巨变对教会的影响〕　新旧世纪之交美国教会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各种新的理性思维的传播给它带来的巨大冲击。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以魏德迈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先后来到美国，他们创办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南北战争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传播到美国。“主要的科学家几乎都站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立场上”，“这种新的理

①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 93 页。
②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 91 页。

性潮流，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公众意识中”[①]。在大学课堂里、报刊杂志上，讲授和报道这一新的科学理论内容比比皆是；圣经考证学和比较宗教研究对《圣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无疑对宗教的正统观念和《圣经》权威构成威胁；19世纪末日益发展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开始把宗教贬低为一种社会现象”[②]同样是对上帝威严的挑战；与此同时，新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地质学、考古学的兴起也引起神学家的恐惧。在这一系列新的理性思潮的冲击下，美国社会世俗主义迅速发展，宗教在人们中的影响急剧下降。“以致到1920年，或许大多数知识分子已不承认基督教信仰”[③]。康马杰生动地概括了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社会世俗化的状况。他指出，教会虽然在物质上达到空前强大，可是其精神力量却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微弱。耶稣会传教士的布道已推动昔日的权威，著名的传教士钱宁和帕克已后继无人，教会本身日益走向世俗化；在教会伸入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同时，却退出了学术领域；200年来教会几乎一直是教士们的独占财产，此时却悄悄地从他们手中放走了；新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如皮尔士、詹姆斯、桑塔雅纳和杜威等人都不是传教士；教派大学虽然很兴旺，但是像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芝加哥这类名牌大学，再也不属任何教派；1840年，全国所有重要大学校长都由教会培养出来的人担任，100年后再也没有一个教士担任这类大学的校长[④]。

教育的进步和道德习俗的“革命”也对教会造成不小的冲击。宗教戒律对两性关系、结婚、节制生育不再具有约束力。过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11页。
②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11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24页。
④ 康马杰：前引书，第253－254，268页。

去为教会牧师所垄断的社会工作和精神病学现在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据。高等教育的发展使许多会众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把昔日职业牧师所具有的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剥夺殆尽。以前牧师们独占的讲道领域现在为讨论科学、道德的内容所取代。本世纪初期，福音派著名传教士比里·桑戴讲道时，会众趋之若鹜，虔诚地向他敞开心扉，到了20年代以后，他的讲坛门前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露营集会和信仰复兴大会在全国大片地区几乎绝迹。

教会所受的第三个冲击是工业化、城市化、垄断化带来的城乡巨变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在美国经济大发展、工业化进程大大加速的同时，城市人口猛增。随着公司化进程的加快，垄断资本家不仅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而且直接间接操纵着政治。在垄断资本压迫剥削下，广大工农和中、小资产阶级日益贫困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19世纪末工农运动空前高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合又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如贫困、妓院、犯罪、酗酒等阴暗面有增无已。美国再也不是有些人所谓的“世外桃源”、“人间天堂”，正在迅速变为“涤罪所”。面对这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传统教义已经不能解释现实问题，许多教徒对此产生怀疑，甚至动摇，出现信仰危机。在此情况下，教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坚持《圣经》无误说，固守阵地，等待教会削弱或自行消亡；要么进行改革，除旧布新，重振教业。社会福音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美国的教会的派别纷呈。在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大教中，又分化出现代派、原教旨主义派、福音派、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进步派、极右派等，形成教中有派，派中有宗的复杂局面。不同教派代表不同的社会思潮。它们之间围绕对《圣经》的不同理解或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对应政策常常存在分歧和斗争。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内

部现代派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引人注目。

所谓“现代派”又称“科学现代派”是基督教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派别。科学现代派20世纪初开始出现，它以科学上的坚定信仰（现代主义）取代以前《圣经》绝对正确的信仰，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宗教经验，把宗教教规、教会组织和教会实践看作是历史力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①。他们还认为，任何宗教声明只能在科学见解范围内进行。斯塔巴克在1899年宣称：“科学已经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现在，它正向所有领域中最复杂、最难以接近、最神圣的领域进军——那就是宗教领域”②。现代主义的再现反映了科学的威力连最顽固的唯心主义堡垒宗教也难以抵挡它的胜利进军。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是科学现代主义的中心。那里集中了像威廉·哈帕、谢勒·马修斯、G·B·福斯特等这样一些著名教授。马修斯是1912—1926年教会联合委员会主席、1915年北方浸礼会代表大会主席。在这些人的努力下，芝加哥大学在用科学的观点研究神学方面走在美国的前列，建立了富有特色的“芝加哥神学”。马修斯的一句话“有科学头脑的上帝将采用科学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派人对上帝的看法。“在20年代、自由主义在美国新教领袖中几乎取得完全的胜利。许多自由主义者真诚接受进化论，同意用科学历史方法考证《圣经》，不再用神学解释《圣经》以宣传社会福音”。③

科学现代派和新教自由主义者是基督教中比较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派别。他们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及时调整对基督教神学的理解，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而得以适应新的环境，获得新的生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21—222页。

② 迈克·赞拉帕姆斯：前引书，第51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33页。

机。改革后的犹太教也属此类。

原教旨主义者是基督教派中最保守的一个派别。面对各种新的理性思潮和社会巨变的挑战，他们顽固坚持《圣经》绝对正确论，抱残守缺，不肯越雷池一步。美国耶稣教会中地位最重要的是浸礼会、圣公会、卫理公会、路德教派、长老会和罗马天主教会。除了浸礼会和圣公会以外，其他各教会的社会纲领都十分保守，神学上均崇尚原教旨主义。19 世纪 70—90 年代，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美国广泛传播和一系列科学发现揭示出宇宙奥秘的时候，激烈的宗教辩论立即开始。原教旨主义者憎恨科学侵犯了宗教。因为他们相信地球和人类是上帝在 6 天之内造出来的，而地理学家都提出地球形成已经几百万年了，它有自己形成的规律。他们强调圣经绝对正确，而圣经考证学却对《圣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总之，新的科学所否定的东西正是新教保守派所一直信仰的根本原则。这就等于动摇了他们整个神学体系和上帝的无上权威。难怪原教旨主义者暴跳如雷。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查尔斯·霍奇宣布："生物进化是绝对不可能的"。威廉斯学院的院长马克·霍普金斯则咒骂，生物进化是"无神论"[①]。南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最大，成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也为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所控制。中部大西洋各州也存在保守倾向。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保守派根基虽有所松动，但总的基调还是保守的。19 世纪末开始，在那些保守势力强大的教会中，原教旨主义者大肆解雇对《圣经》持不同看法的牧师和大学教师，以此来惩罚自由派神学家和遏制新的理性思潮的传播。如伍德罗·威尔逊的伯父、哥伦比亚神学院教授詹姆斯·伍德罗就被南部长老会

---

① 赞拉帕姆斯：前引书，第 50 页。

全教会议解职，据说他认为进化论可以同《圣经》的解释相调和[1]。康马杰指出，“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继续存在并具有一定的势力，是美国思想史上的奇观之一”[2]。

这个时期，原教旨主义者对现代主义的最大一次进攻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动的反进化论运动（详见第八章中的“美国的社会运动”有关内容）。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27页。

② 康马杰：前引书，第269页。

美国历史大事记

1898年1月至1929年12月

1898年

1月1日 经州立法机关批准，曼哈顿、布鲁克林、斯达腾及昆斯与韦斯切斯特两县的一些居民点将合并成新的大纽约市。

1月25日 以保护美侨为借口，战舰“缅因号”驶抵古巴哈瓦那港。

2月15日 “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爆炸沉没。

3月17日 美国海军第一艘实用的潜艇“荷兰”号建成下水。

3月19日 战舰“俄勒冈”号开始环绕南美大陆航行。

3月27日 驻西班牙公使伍德福德奉命对西班牙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4月25日 对西班牙宣战。

5月12日 路易斯安那州新宪法中制定“祖父条款”，剥夺了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

7月7日 威廉·麦金莱总统签署兼并夏威夷的法案。

8月9日－12日 西班牙同意投降，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及关岛正式割让给美国。

9月15日 全国文学艺术会在纽约成立（1904年，该学会成立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

9月15日 美国黑人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成立。

10月6日 埃德蒙·罗斯坦德的剧本《西兰诺·德贝日拉克》在纽约市花园剧院上演。

12月10日 与西班牙签订《巴黎和约》，美西战争正式结束。

1899 年

2 月 1 日 正式建立对关岛的管辖权。

2 月 6 日 国会批准与西班牙签订结束美西战争的《巴黎和约》。

8 月 17 日 美国黑人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召开第一次年会。

9 月 6 日 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华国际贸易原则，即所谓“门户开放”政策。

10 月 劳联领导集团参加全国公民联合会。

1900 年

1 月 25 日 众议院投票表决剥夺当选议员、犹他州的布里格姆·H·罗伯茨在众议院的席位。

3 月 5 日 美国名人遗物收藏馆在纽约市纽约大学建立。

3 月 14 日 国会通过《金本位制法》。

3 月 20 日 国务卿海约翰宣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已为德、俄、英、意、日等国所接受。

4 月 7 日 国会通过《福勒克法》，建立波多黎各民政机关。

4 月 12 日 开始委派总督统治波多黎各。

4 月 30 日 夏威夷正式并入美国版图。

5 月 1 日 犹他州斯科菲尔德发生煤矿爆炸事件，200 多名工人丧生。

5 月 14 日 原夏威夷共和国总统桑福德·B·多尔被任命为夏威夷准州第一任州长。

6 月 30 日 新泽西州霍博肯的码头与几艘德国汽船起火，326 人丧生。

7 月 5 日 教育家、第一任教育专员亨利·巴纳德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去世。

9 月 8 日 飓风袭击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郡，5000 多人丧生，城市遭到巨大破坏。

1 月 6 日 威廉·麦金莱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1 月 15 日 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创建卡内基理工学院。

2月22日　美驻华公使协同其他列强驻华使节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联合通牒。

本年　美国大学协会成立。

费城交响乐团成立。

1901年

1月10日　得克萨斯州博蒙特南部斯平德托普的油井喷油，是该州石油的首次重大发现。

2月2日　陆军护士部队成立。

2月25日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

3月2日　参议员普拉特提出《普拉特修正案》，规定美国结束占领古巴的各项条件。

4月29日　国会再次通过限制华工入美的法案。

5月27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美西战争中产生的所谓“海岛案”作出裁决。

7月29日　美国社会党成立。

8月10日　美国钢铁公司工人举行大罢工。

9月6日　麦金莱总统在纽约州布法罗泛美博览会上发表演说时遇刺受伤。

9月14日　麦金莱总统因伤重去世，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

11月18日　美、英签订有关开凿巴拿马运河权的《海约翰—庞斯福德条约》。

11月27日　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建立陆军军事学院。

12月3日　西奥多·罗斯福向国会发表第一份咨文，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管理大企业财团。

1902年

2月18日　美国第一次对国内大金融家运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北方证券公司被限制州际贸易。

2月28日　国会通过“史普奈法案”，授权总统从法国手中购买开凿巴拿马

运河之权。

5月12日　美国无烟煤矿矿工14万人举行大罢工，直至1903年3月结束。

6月2日　俄勒冈州采取普遍创议权与公民投票的新措施。

6月17日　国会通过《开垦法》(也称《灌溉法案》)。

6月28日　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法》。

7月1日　国会通过《菲律宾政府法》，由美国扶持建立菲律宾文官政府。

9月23日　地质学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在缅因州黑文逝世。

10月26日　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领导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纽约市去世。

1903年

1月22日　国务卿海约翰与哥伦比亚代表埃尔兰订立《海约翰—埃尔兰条约》。

1月24日　美、加关于阿拉斯加边界的纠纷问题，提交由3名美国人、2名加拿大人与1名英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处理。

2月23日　联邦最高法院在“钱皮恩对艾姆斯”的诉讼案中宣布，国会有权禁止越过州界邮寄彩票。确认联邦警察权力大于州警察。

5月23日　威斯康星州通过立法，在美国首次规定对州的候选人采用直接初选制度。

10月8日　迫使中国清政府订立《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10月20日　英、美委员联合对付加拿大解决阿拉斯加特区与加拿大的边界争端。

11月2日　“纳什维尔号”军舰奉命驶抵巴拿马的科隆。

11月13日　强迫巴拿马签订《美巴条约》。

11月18日　国务卿海约翰与巴拿马代表比诺—瓦里亚订立条约。

12月17日　赖特兄弟发明制造的飞行器（飞机的雏形）试飞成功。

12月30日　芝加哥的易洛魁剧院失火，602人丧生。

本年　拍摄第一部连贯故事片《火车大劫案》。

1904年

1月3日 派遣海军陆战队抵达巴拿马，支持新组建的巴拿马政府军。

1月4日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不得拒绝波多黎各人进入美国。

2月7日－8日 巴尔的摩市商业区发生火灾，约2600幢建筑物被毁。

2月26日 联邦参议院批准《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

2月29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一个由7人组成的巴拿马运河委员会，以监督巴拿马运河的修筑。

3月14日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北方证券公司的成立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4月17日 国会通过新的排华法。

4月23日 购买法国人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并由美国人动工兴建巴拿马运河。

5月4日 获取巴拿马运河区，开始凿修运河工程。

7月1日－11月23日 圣路易举办第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7月4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利用从旧金山到马尼拉的海底电缆，发出一份环球电报，12分钟后收到回电。

10月27日 纽约市地下铁道第一段开始启用。

11月8日 西奥多·罗斯福击败对手当选总统。

12月6日 罗斯福总统发表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

1905年

2月4日 接管多米尼加全部海关。

2月7日 迫使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草签一项授权美国接管该国财政并清理其内外债务的议定书。

2月7日 获得管理圣多明各海关特权。

2月20日 联邦最高法院对“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裁决：州有权制定要求公民接种牛痘的法律。

2月23日 律师保罗·哈里斯在芝加哥创立“扶轮社”，又名“扶轮国际”。

3月31日 罗斯福总统任命一美国官员出任多米尼加共和国关税收税官，"协助"该国清理税收与财政。

3月27日 工人运动领袖德布斯等人在芝加哥组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4月17日 联邦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裁决：州不得规定雇员劳动的最高时限。

6月5日 西奥多·罗斯福电令美驻俄公使向俄皇提议，调解日俄战争。

7月1日 国务卿海约翰在新罕布什尔州纽伯里逝世。

7月22日－10月 新奥尔良发生流行性黄热病。

10月31日 纽约警方勒令禁演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

1906年

2月8日 著名短篇故事作家保罗·L·邓巴在俄亥俄州代顿去世。

3月12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黑尔诉亨克尔"案作出裁决。

3月13日 妇女选举权运动先驱苏珊·布劳内尔·安东尼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去世。

4月18日 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并引起大火。

5月14日 政治家、改革家卡尔·舒尔茨去世。

6月4日 雷诺兹和尼尔关于肉罐头情况的报告发表。

6月8日 《美国古迹保护法》出台。

6月29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法令，决定在巴拿马修建船闸型运河。

6月29日 国会通过《铁路运费管理法》(亦称《赫伯恩法》)。

6月30日 《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和《肉类检验法》在国会通过。

9月24日 罗斯福总统规定怀俄明州的魔塔为第一个国家天然纪念物。

9月29日 陆军部长塔夫脱奉命帮助古巴成立临时政府。

10月3日 马古恩被任命为古巴总督。

11月9日 罗斯福视察巴拿马运河工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任职期间出国的总统。

12月10日 罗斯福总统因其为结束日俄战争所作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

奖。

12月12日 犹太人奥斯卡·S·斯特劳斯被任命为商业与劳工部长。

1907年

2月8日 迫使多米尼加政府缔结关于美国监督多米尼加财政的条约。

3月14日 总统罗斯福与日本缔结“君子协定”，拒绝日本劳工入美。

3月21日 派遣海军陆战队在洪都拉斯登陆，干预该国内政。

4月1日 巴拿马运河委员会改组。

8月1日 陆军通信部队建立航空师，是为美国空军前身。

10月16日 陆军部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召开菲律宾群岛两院制议会第一次会议。

10月21日 纽约人信托公司发生挤兑，引起其他银行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加剧。

11月16日 俄克拉何马州加入联邦，成为合众国第46个州。

12月16日 美国海军组成环航世界的“白色大舰队”，向全世界炫耀美国的海上实力。

本年 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成立。

1908年

2月3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洛伊诉劳勒”案作出裁决。

2月3日 “8人画展”在纽约麦克佩斯美术馆举行。

3月4日 大火烧毁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科林伍德的一所初级中学，175名学童丧生。

4月12日 马萨诸塞州切尔西城约1/3地区为大火所毁，约1万人无家可归。

5月28日 国会通过管理哥伦比亚特区童工的立法，以便使各州效法。

5月30日 国会通过《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规定成立国家货币委员会。

6月8日 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成立。

6月23日 美国与委内瑞拉断绝外交关系。

6月24日 第22和24届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

8月14日 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发生迫害黑人的暴行。

10月1日 福特汽车公司推广T型汽车。

11月3日 威廉·H·塔夫脱当选为美国第27任总统。

11月30日 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在华盛顿签订《鲁特——高平协定》。

12月2日 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在费城成立。

12月24日 防止犯罪协会开创电影审查制度。

本年 联邦基督教协会成立。

1909年

2月21－22日 海军"白色大舰队"驶抵弗吉尼亚州汉普顿锚地，结束历时一年余的环球航行。

3月4日 国会通过《莱西法》。

3月8日 芝加哥女工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后该日被定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3月30日 纽约市东河上的悬臂型昆斯博卢大桥通车。

4月1日 结束对古巴的临时管理。

4月6日 海军准将培里等人首先到达北极。

5月 关于黑人权利的全国性会议在纽约召开，全国黑人委员会成立。

7月12日 国会通过一项征收所得税的宪法修正案。

8月5日 塔夫脱签署有争议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

10月26日 霍华德大学创始人兼校长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在佛蒙特州伯林顿去世。

11月6日 国务卿诺克斯提出所谓的"诺克斯计划"。

11月13日 伊利诺伊州切里的圣保罗煤矿发生爆炸，250多人丧生。

12月16日 策动尼加拉瓜政变，并派海军陆战队入侵该国。

12月31日 纽约市东河上的吊桥曼哈顿大桥通车。

1910年

3月19日 赖特兄弟开办第一所飞行学校。

3月19日 众议院修改众议院规章，缩小议长权力。

3月26日 国会修改《移民法》，禁止乞丐、罪犯、病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入境。

4月1日 纽约举办"独立派艺术家画展"。

4月21日 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康涅狄格州雷丁逝世。

5月16日 内政部设"矿务局"。

5月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

6月5日 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欧·亨利去世。

6月18日 国会通过《曼——埃尔金斯铁路法》。

6月24日 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离开美国的客轮携带无线电设备。

6月25日 国会建立邮政储蓄银行制度。

6月25日 国会通过《竞选经费公开法》和《禁止贩卖妇女为娼法》(《曼法令》)。

9月7日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延长美国在纽芬兰渔场的捕鱼权。

10月17日 女权运动先驱朱莉亚·沃德·豪去世。

10月26日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去世。

11月8日 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自1885年以来第一次获得对众议院的控制。

12月3日 基督教科学教会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去世。

1911年

1月15日 在旧金山航空大会上，陆军中尉克里西驾机投掷第一枚真炸弹获得成功。

1月16日 陆军中尉凯利驾机进行第一次空中摄影侦察飞行。

1月21日 以参议员拉福莱特为领袖的共和党进步派全国联盟成立。

1月26日 设计师柯蒂斯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水上飞机试飞成功。

2月3日 汽车电气自动启动装置进行示范表演。

3月18日 罗斯福水坝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主持下启用。

3月25日 大火席卷纽约市三角女式衬衫厂，约145人死亡。

4月11日 创办第一所陆军航空学校。

5月1日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美国保留林属联邦政府管理，而不属于州管理。

5月8日 海军航空兵诞生。

5月15日 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时首次使用“合理”这一准则。

5月22日 参加四国银团与清政府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5月29日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烟草托拉斯”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7月24日 美、日续订通商条约，并约定继续履行1907年“君子协定”。

10月29日 普利策奖金的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去世。

12月18日 废除1832年与俄国签订的一项条约。

1912年

1月6日 新墨西哥作为第47州加入联邦。

1月7日 塔夫脱总统向国会建议采用制定年度国家预算。

1月12日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领导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后遭到镇压。

1月22日 佛罗里达东海岸铁路公司在基韦斯特与大陆之间开辟了一条铁路线。

2月14日 亚利桑那作为第48州加入联邦。

2月25日 共和党在选举中发生分裂。

3月14日 司法部开始采取行动，制止南太平洋铁路公司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合并。

5月13日 国会通过一项关于改革参议员选举方式的宪法修正案，并送交

各州批准。

5月15日 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克拉克·巴顿在马里兰州格伦埃科去世。

5月22日 建立海军陆战队航空兵。

5月30日 飞机发明者赖特兄弟之一威尔伯去世。

6月5日 海军陆战队在古巴登陆，干涉该国内政。

8月2日 参议院通过“洛奇推论”。

8月24日 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法》。

8月24日 美国小件包裹投递业务获准由联邦邮局从1913年1月1日开始实行。

11月5日 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第28任总统。

12月3日 塔夫脱总统提出“以金元代替枪弹”的“金元外交”政策。

12月10日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席、前国务卿鲁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13年

2月17日 被称为“军械库展览”的欧洲现代艺术首次在美国纽约展出。

2月25日 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经38个州批准后宣布生效。

2月25日－7月 威廉·海伍德亲自领导新泽西州帕森特丝织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4－5日 国会将商业和劳工部分为两个内阁级的部，并成立联邦仲裁调解委员会。

3月12日－4月21日 约15万服装工人在纽约市开始大罢工。

3月21日－26日 俄亥俄河流域发生大水灾。

3月31日 大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意大利罗马去世。

4月24日 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与21国签订的仲裁条约获得最后一国批准。

5月10日 国会规定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

5月31日 规定参议员直接选举的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生效。

8月26日 得梅因河口的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基欧库克水坝启用。

8月28日 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赠送海牙城的礼物“和平宫”在荷兰海牙

落成。

10月3日 国会通过《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

12月23日 威尔逊总统颁布《联邦储备银行法》。

1914年

1月20日 海军航空学校建立。

2月13日 美国作曲家、作家、出版家协会在纽约市成立。

3月12日 发明家乔治·威斯汀豪斯去世。

4月1日 巴拿马运河区建立一永久性文官政府，以取代巴拿马运河委员会。

4月9日 美、墨发生“坦皮科事件”。

4月20日 科罗拉多州鲁德劳的洛克菲勒煤矿工人罢工。

4月21日 美国乘墨西哥政权不稳，借机炮击并侵占其维那库鲁斯港。

4月22日 国会授权威尔逊总统动用武力以维护美国在墨西哥的“荣誉”。

5月29日 “爱尔兰皇后”号在圣劳伦斯河与挪威运煤船相撞后沉没，1014人蒙难。

7月29日 科德角运河开放。

8月3日 巴拿马运河建成，并试航成功。

8月4日 欧洲爆发战争，威尔逊总统发布中立宣言。

8月15日 海军陆战队抵达海地太子港，以维护美国在该国的“利益”。

8月15日 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

9月26日 威尔逊政府颁布《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10月15日 国会通过《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加强与扩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12月24日 探险家、博物学家约翰·米尔在洛杉矶去世。

12月26日 照会协约国，抗议破坏中立国贸易。

1915年

1月25日 贝尔在纽约与旧金山的沃森进行首次横贯大陆的电话通话。

1 月 25 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科佩奇诉堪萨斯州”案作出裁决。

1 月 28 日　美国海岸警卫队成立。

2 月 6 日－20 日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在旧金山开幕。

2 月 8 日　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洛杉矶首次上映。

2 月 10 日　威尔逊总统允许英国商船悬挂美国国旗。

5 月 1 日　油轮“海湾之光”号事前未受警告，被德国潜艇击沉。

6 月 21 日　威尔逊总统就“卢西塔尼亚”事件提出警告德国的第三份照会。

6 月 24 日　游览船“伊斯特兰”号在芝加哥河停泊码头爆炸，800 多人死亡。

7 月 3 日　威尔逊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地全境。

7 月 28 日　派遣海军陆战队在海地太子港登陆。

8 月 10 日　试验性的平民军事训练营活动在纽约州普拉茨堡举行。

8 月 15 日　纽约《世界报》揭露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美、德关系日趋恶化。

9 月 29 日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西奥多·N·维尔进行首次横贯大陆的无线电电话通话。

11 月 14 日　著名黑人社会活动家布克·华盛顿去世。

12 月 4 日　新“三 K 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建立。

12 月 27 日—1916 年 1 月 13 日　俄亥俄州的东扬斯郭城钢铁工人举行大罢工。

1914—1915 年　科罗拉多煤矿工人大罢工。

1916 年

1 月 24 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布鲁沙伯诉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案作出裁决。

1 月 28 日　威尔逊总统任命布兰代斯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2 月 22 日　威尔逊总统私人顾问豪斯会晤英外交大臣格雷，就议和与战争问题达成协议。

2 月 28 日　“小说家泰斗”亨利·詹姆斯在伦敦去世。

2月29日 南卡罗莱纳州通过关于童工的立法。

4月18日 威尔逊总统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潜艇停止袭击商船。

5月5日 海军陆战队在多米尼加登陆，攻占圣多明各城杰罗尼莫堡。

6月3日 国会通过《国防法》。

6月22日 旧金山举行反战示威游行。

7月11日 威尔逊总统签署《联邦公路资助法》。

7月17日 国会通过《联邦农业贷款银行法》。

8月4日 美国以2500万美元购得丹麦所属的西印度群岛的维尔京群岛。

8月25日 内政部成立国家公园、建筑物和保留地管理局。

8月29日 国会通过《菲律宾群岛组织法》。

9月3日 政府颁布《亚当森法》，以避免预定的全国性罢工。

9月7日 美国海运委员会成立。

9月30日 中美订立铁路借款合同。

10月16日 第一家计划生育门诊所由玛格丽特·桑格在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开设。

11月7日 威尔逊当选总统。

11月22日 杰克·伦敦在加利福尼亚州格伦埃伦自杀身亡。

11月29日 宣布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实行军事占领（占领于1922年10月21日结束）。

12月8日 美、加签约，使《莱西法》、《候鸟法》的条款国际化。

1917年

1月29日 国会通过一项关于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的法案。

1月31日 德驻美大使伯恩斯照会国务卿蓝辛，德恢复“无限制潜艇战”。

2月3日 “豪桑图尼克”号被德潜艇击沉，美、德断绝外交关系。

2月5日 国会通过一项排斥所有亚洲移民的法律。

2月23日 国会通过《史密斯一休斯法》。

3月1日 国务院批准公布所谓“齐默尔曼电报”。

3月2日 国会通过《波多黎各组织法》（《琼斯法》），该岛成为美国领地。

3月12日　威尔逊总统下令武装美国商船。

3月12日　宣布凡在交战地带航行的商船将予以武装。

3月31日　从丹麦手中正式接管维尔京群岛。

4月2日　蒙大拿州共和党人珍妮特·兰金成为第一个取得众议院议员资格的妇女。

4月6日　正式对德宣战，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4月24日　国会通过《自由公债法》。

5月18日　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

6月15日　国会通过《惩治间谍法》。

7月24日　国会投票通过拨款6.4亿美元以发展军用飞机制造业。

8月10日　国会通过《利弗粮食与燃料管制法》。

10月3日　国会通过《战时岁入法》。

10月6日　国会通过《对敌贸易法》，决定管制对外贸易。

11月2日　与日本签订《蓝辛—石井协定》。

11月11日　纽约州修改宪法，给予妇女以选举权。

12月7日　对奥匈帝国宣战。

12月18日　联邦政府建立铁路管理局，将铁路系统置于政府管制之下。

12月18日　国会通过关于禁酒宪法修正案。

本年　国会颁布“史密斯—休斯法”。

1918年

1月8日　威尔逊总统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对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计划”。

1月10日　众议院提出一项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

3月4日　威尔逊总统任命伯纳德·巴鲁克接管战时工业委员会。

3月19日　国会提出新作息制度（后称夏令时间），并于3月31日生效。

4月5日　战时财政委员会成立。

4月8日　战时全国劳工委员会成立，以处理有关劳资事端。

4月10日　国会通过《韦布—波默林法》。

4月20日　国会通过《惩治怠工法》。

5月15日　纽约市至首都华盛顿的美国首次航空邮政业务开办。

5月16日　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

5月28日　铁路捷运公司成立。

6月3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哈默诉达金哈特”案作出裁决。

6月8日　战时劳工政策委员会成立。

9月12－16日　参加对德“圣米耶尔之战”。

9月26－11月11日　参加对德“马斯—阿尔贡之战”。

8月16日　美军在苏俄海参崴登陆。

9月14日　尤金·德布斯被指控违反《惩治间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判处10年徒刑。

10月13－15日　森林大火席卷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约1000人死亡。

10月16日　国会通过一项战时措施，禁止主张以武力推翻政府的外国人进入美国。

11月2日　纽约市布鲁克林高速运输系统地下铁道5节车厢出轨。

12月4日　威尔逊总统率团参加巴黎和会。

1918－1919年　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最后通过义务教育法。

本年　全国教育协会制定“七项基本原则”。

1919年

1月6日　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去世。

1月29日　宣布批准第十八条修正案。

4月4日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成立。

7月4日　得克萨斯州发生迫害黑人事件。

7月10日　威尔逊总统将《凡尔赛条约》递交联邦参议院批准。

8月11日　钢铁工业先驱、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马萨诸塞州伦诺克斯去世。

8月31日　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成立。

9月1日　美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5月与共产主义劳工党统一为美国共

产党)。

9月9日 波士顿1100多名警察中约3/4人举行罢工。

9月11日 海军陆战队在洪都拉斯登陆。

9月22日 36万多钢铁工人和20万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持续近4个月。

10月16日 警察捣毁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处，逮捕美共领导人。

10月28日 国会通过《全国禁酒法》或称《沃尔斯特德法》。

11月1-11日 50万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11月19日 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

12月22日 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组织一系列搜捕。

本年 黑人音乐协会成立。

与英、法、日等组成14国武装干涉军队，侵犯苏俄。

1920年

1月2日 司法部长帕尔默利用战时颁布的《惩治间谍法》在70个城市同时进行大逮捕。

1月16日 关于禁酒的宪法修正案开始生效。

2月13日 国务卿罗伯特·蓝辛被总统撤职。

2月28日 国会通过《埃斯克—卡明斯法》(《运输法》)，将铁路归还私人管理。

6月5日 颁布《商船法》。

6月10日 国会通过《水力法》。

8月13日 黑人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主持召开普世黑人协进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世界黑人权利宣言》。

8月26日 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

9月1日 与暹罗（泰国）缔约，使其获得关税自主。

9月8日 纽约与旧金山之间开始航空邮递业务。

10月17日 美共创始人之一约翰·里德去世。

11月2日 共和党人沃伦·哈定击败民主党人詹姆斯·柯克斯当选美国第29任总统。

12月10日 威尔逊总统获得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

1921年

1月3日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条款适用于工会。

4月20日 参议院批准哥伦比亚条约（《汤姆森—乌鲁蒂亚条约》)。

5月4日 派伍德—福布斯使团前往菲律宾调查。

5月19日 国会通过《移民紧急限额法》。

5月27日 政府实施紧急关税法。

5月31日 照会日本，反对其占领西伯利亚和库页岛。

6月3日 阿肯色河泛滥，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约200人丧生。

6月10日 国会通过《国家预算和会计法》。

7月2日 国会宣布结束与德国及奥匈帝国的战争状态。

8月9日 退伍军人局成为一独立机构。

8月13日 波士顿工人组织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展开募捐救济苏维埃俄国灾民的运动的协议。

8月15日 国会通过《肉类批发商和牲畜围场法》。

8月24日 与奥地利缔结和约。

8月24日 与德国签订和约。

9月12日 伍德—福布斯使团反对向菲律宾兑现"给予独立"的诺言。

9月19日 英美6大教会合办的北京协和医学校改由洛克菲勒投资兴办。

9月30日 劳工部报道失业人数已达500万人，并透露许多工业已大幅度削减工资。

11月2日 美国节育联盟成立。

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 华盛顿会议召开。

12月25日 哈定总统赦免正在服刑的尤金·德布斯。

1922年

2月11日 日美雅浦岛条约签字。

2月18日 国会通过《卡珀—沃尔斯特德合作社法》。

3月24日 参议院批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议定的四国《太平洋条约》。

4月1日－9月4日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

5月30日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落成仪式。

7月1日－9月13日 40万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

8月2日 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新斯科舍的巴达克去世。

9月19日 国会通过《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

9月22日 国会通过《凯布尔法》。

10月21日 结束对多米尼加的统治。

本年 《读者文摘》由D·华莱士及其夫人在纽约创刊。

1923年

3月4日 国会通过《农业信贷法》。

4月10日 石油生产居各州之首的俄克拉何马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按比例分配的法律。

8月2日 哈定总统突然死亡，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于3日继任。

8月31日 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

9月15日 三K党恐怖活动猖獗，俄克拉何马州州长沃尔顿在州内实行戒严。

10月26日 电气工程师、发明家查尔斯·P·威金在英国哈罗去世。

12月6日 柯立芝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支持国际法庭，但反对美国参加国联。

本年 美国作曲家联盟在纽约成立。

《时代》周刊由H·R·卢斯和B·哈登在纽约创刊。

1924年

1月24日 道威斯任德国赔款专家委员会主席，主持制定德国赔款计划。

2月3日 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逝世。

2月12日 由保罗·怀特曼指挥的管弦乐队在纽约首演"蓝色狂想曲"。

2月27日 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一项取代1907年条约的新条约。

3 月 31 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俄勒冈州诉讼案”作出裁决。

5 月 19 日 国会通过《退役费法案》。

5 月 26 日 国会通过一项《移民法案》。

6 月 2 日 国会两院重提被宣布违宪的限制童工劳动时间及其他劳动条件的全国性法令。

6 月 15 日 国会颁布法令：所有在美出生的土著印第安人均为美国公民。

7 月 1 日 国会通过《罗杰斯法》。

8 月 24 日 国会批准《农业信贷法》。

9 月 18 日 美军撤离多米尼加。

11 月 4 日 卡尔文·柯立芝击败对手约翰·戴维斯（民主党）和罗伯特·拉福莱特（进步党）当选为美国第 30 任总统。

12 月 13 日 劳联领袖塞缪尔·龚伯斯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去世。

本年 《进步教育》创刊。

1925 年

1 月 5 日 内利·T·罗斯夫人就任怀俄明州州长，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州长。

1 月 21 日 著名作家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去世。

3 月 13 日 与古巴签署一项条约，承认古巴长期以来对松树岛所有权的要求。

3 月 13 日 田纳西州州长签署“教授进化论为非法”的一项州法。

3 月 18 日 龙卷风席卷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几十个城镇，约 800 人丧生。

4 月 18 日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开幕。

6 月 6 日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成立。

6 月 18 日 进步主义运动领袖罗伯特·M·拉福莱特在首都华盛顿去世。

7 月 10－21 日 约翰·斯科普斯教授因在学校讲授进化论而在田纳西州被捕受审，被判有罪并处以 100 美元罚款。

7 月 26 日 威廉·J·布赖恩在田纳西州代顿去世。

8 月 8 日 三 K 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第一届全国大会。

11 月 14 日　同意大利签订还债协定。

12 月 12 日　第一家汽车旅店在加利福尼亚开办。

12 月 29 日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三一学院改名为“杜克大学”。

本年　颁布“帕内尔法”。

贝尔电话实验室在纽约创建。

1926 年

1 月 27 日　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海牙国际常设法庭。

2 月 28 日　柯立芝总统签署一项岁入法。

3 月 7 日　伦敦和纽约之间进行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电话通话。

4 月 11 日　著名实用园艺家卢瑟·伯班克于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6 月 1 日　万国博览会在费城开幕。

7 月 2 日　国会将 1920 年成立的陆军航空兵司令部改为陆军航空队。

8 月 5 日　纽约市沃纳剧院上映世界上第一部配乐有声电影《唐璜》。

9 月 9 日　国家广播公司在纽约成立。

9 月 18 日　飓风席卷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南部州。

10 月 25 日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 1867 年颁布的《官员任期法》违宪。

11 月 11 日　美国促成尼加拉瓜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在科林托城会谈。

11 月 15 日　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成立。

1927 年

1 月 2 日　胡佛委员会宣布，一条连接圣劳伦斯河的水道可能是沟通北美五大湖与大西洋的最佳路线。

1 月 7 日　纽约与伦敦之间的第一个商业电话业务开始。

2 月 17 日　同土耳其复交。

2 月 23 日　国会通过经两院协商的《无线电台管理法案》，并送交柯立芝总统签字。

2 月 24 日　美英联合舰队闯到南京水域，并炮轰下关一带，制造了“南京事件”。

3月2日 美共创始人、原社会党左翼领袖鲁腾堡去世。

3月3日 根据《禁酒法改革条例》成立隶属财政部的禁酒局。

3月7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尼克松诉赫恩登”案作出裁决。

4月5日 罕见的暴雨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

4月7日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设了美国第一个长距离电视广播。

7月29日 第一架电动呼吸器（铁肺）在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投人使用。

9月14日 现代舞创始人、女舞蹈家邓肯在法国尼斯因车祸去世。

10月6日 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放映。

11月13日 第一条通车辆的水下隧道通车。

1928年

1月16日－2月20日 投票反对第六次泛美国家会议通过一项关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决议。

2月2日 马萨诸塞州福尔河城发生大火灾。

2月6日 在华盛顿与法国签署一项仲裁条约。

2月10日 参议院表决通过一项“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决议案。

2月10日 美、德之间开始无线电话业务。

2月10日 纽约市律师协会宣布反对国家《禁酒法》及《沃尔斯特德法》。

2月21日 石油百万富翁哈利·F·辛克莱在首都华盛顿被判定犯有藐视法庭罪，并被判处六个月徒刑。

3月10日 柯立芝总统签署《外侨财产法》。

3月13日 洛杉矶北面四十英里处的一座水坝崩溃，圣克拉河谷大水泛滥，450人丧生。

5月3日 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里—豪根法案》。

5月15日 国会拨款3.25亿美元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洪水。

5月22日 国会通过《商船法》。

6月19－20日 分别与奥地利和丹麦签订合作条约。

7月30日 第一批彩色电影在纽约州罗彻斯特献映。

8月27日 与14国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即巴黎非战条约。

11月6日 赫伯特·胡佛击败对手当选为第31任总统。

11月16日 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达6641250股，创造日成交额空前纪录。

11月21日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麦克纳于首都华盛顿去世。

12月18日 华特·迪斯尼公司卡通影片《蒸汽船威利》在纽约首映。

1929年

1月2日 和加拿大就尼亚加拉河工程签署协定。

1月12日 美国最长的隧道正式通车。

1月15日 参议院表决批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1月27日 参议院批准一项由美、日签订的旨在控制两国之间非法酒类贸易的条约。

2月4日 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已生产出第一批一百万台供A型汽车使用的发动机。

2月11日 银行家杨格对"道威斯计划"进行调整，从而制订"杨格计划"。

2月11日 托马斯·A·爱迪生在佛罗里达州举行庆祝其82岁寿辰的集会。

2月13日 柯立芝总统签署一项在今后3年内建造15艘万吨级巡洋舰的法案。

3月8日 美国向墨西哥政府提供军用物资，以帮助镇压在墨西哥几个州爆发的骚乱。

3月12日 可口可乐饮料创始人亚沙·坎得乐去世。

4月16日 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有关农业救济和关税改革的建议。

5月16日 电影艺术科学院在好莱坞首次将学院奖颁给国内外最有艺术成就的电影，开"奥斯卡"奖之先河。

5月27日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总统使用搁置否决权是合法的。

6月15日 胡佛总统签署《农产品销售法案》。

6月27日 纽约贝尔电话研究所公开试播彩色电视。

7月22日–8月1日 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

10月24日 纽约股票行情暴跌，美国交易所破产，最严重的萧条从此开始。史称“黑色星期五”。

11月11日 横跨底特律河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巴萨多大桥落成。

12月16日 胡佛总统签署一项降低所得税的法案。

12月24日 首都华盛顿行政办公大楼被火烧毁，所幸大部分珍贵文件被抢救出来。

本年 乔治·里德法颁布。

主要中外文参考书目

Ⅰ. **外文部分：**

Aaron, Daniel: Men of Good Hope: A Story of American Progress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阿龙，丹尼尔：《具有良好愿望的人们：美国进步派的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51年。）

Abrams, Richard: The Burdens of Progress, 1900—1929, Glenview Ill., Scott, Fresman and Company, 1978.（阿布拉姆斯，理查德：《进步的负担：1900—1929》，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公司，1978年。）

Adams, James: The Epic of America, Blue Ribbon Books, New York, 1931.（亚当斯，詹姆斯·T：《美国史诗》，纽约：蓝带图书出版公司，1931年。）

Addams, Jane: 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0.（亚当斯，简：《在赫尔事务所的20年》，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0年。）

Allen, Frederick Lewis: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4.（阿伦，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就在昨天：1920年代的非官方历史》，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4年。）

Allen, Frederick Lewis: The Big Change,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52.（艾伦，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巨变》，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2年。）

Alstrom, Sydney E.: A Religion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阿尔斯特伦，悉尼·E：《美国人民宗教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

Altschuler, Glenn C.: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865 – 1919,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82.（奥尔茨库勒，格伦·C:《美国社会思想中的种族、族裔和阶级：1865—1919》，伊利诺伊：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1982年。）

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Appleton – Century – Crofts, 1969.（贝利，托马斯·A:《美国人民的外交史》，纽约：艾普兰顿·塞特里·克劳夫兹，1969年。）

Bailyn, Bernard et.: The Great Republic: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Lexington Mass., D.C.Health & Company, 1981.（贝林，伯纳德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D·C·希尔斯公司，1981年。）

Barck Oscar T. And Blake, Nelson M.: Since 1900: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Tim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巴克，奥斯卡·T和布莱克，纳尔逊·M:《1900年以来：我们时代的美国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年。）

Bates, J.L.: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8, Progressivism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6.（贝兹，J·L:《1898—1928年间的美国：进步主义和转型中的社会》，纽约：麦克格罗－希尔出版公司，1976年。）

Beacroft, B.W.etc.: The Making of America, Second Edition UK: Longman 1982.（比克罗夫特：《美国的形成》，第2版，英国朗文，1982年。）

Beale, Howard K.: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to World Power, Collier – Macmillan House Inc. New York, 1967.（比尔，霍华德：《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世界强权的兴起》，纽约：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7年。）

Beard, Charles and Mary: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Vol.2,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7.（比尔德，查尔斯和比尔德，玛丽：《美国文明的兴起》第2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7年。）

Bellot, H. Hale: America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A Review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pra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gressive Era*),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2.(贝洛特，希尔：《美国和美国历史学家》（进步主义时代），伦敦大学出版社，1952年。)

Bernstein, *Irving*: *The Lean Year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20—193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0.(伯恩斯坦，欧文：《贫乏的年代：1920—1933年的美国工人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年。)

Bishop, *Joseph*: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 Shown in His Own Letter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0.(毕肖普，约瑟夫：《展现在其信件中的西奥多·罗斯福及其时代》，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1920年。)

Blum, *John et .*: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cour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68.(布鲁姆，约翰等：《国家的经历：美国史》，纽约：哈考特和福雷斯曼公司，1968年。)

Braeman, *John*: *Wilson*,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1972.(布莱曼，约翰：《威尔逊》，新泽西：普兰蒂斯 - 霍尔出版公司，1972年。)

Bryce, *Jame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布赖斯，詹姆斯：《美利坚共和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7年。)

Buell, *Raymond Leslie*: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Atheneum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70.(布尔，雷蒙德·莱斯立：《华盛顿会议》，纽约：文学协会出版公司，1970年。)

Burns, *James MacGregor*: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Norwalk, Connecticut: Easton Press, 1989.(伯恩斯，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罗斯福：狮子和狐狸》，康涅狄格州诺沃克：伊斯顿出版社，1989年。)

Calhom, *Charles W.*: *The Gilded Ag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6.(卡尔洪，查尔斯·W：《镀金时代》，特拉华：学术资料出版公司，1996年。)

Cary, *John H.And Weinberg*, *Julius*: *The Social Fabric*: *America Life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Little, Brown & Company, Boston, 1978.(卡里，约

翰·H和温伯格，尤里乌斯：《社会经纬：自内战至今的美国生活》，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公司，1978年。）

Cashman, S.D.: America in the age of Tita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凯什曼，S·D：《"巨头"时代的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社，1988年。）

Cebula, James E.: James M.Cox: Journalist and Politician, New York: Garland, 1985.（塞布拉，詹姆斯·E：《詹姆斯·M·考克斯：新闻工作者和政客》，纽约：加兰，1985年。）

Chamberlain, John: Farewell to Reform: The Rise, Life and Decay of the Progressive Mind in Americ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5.（张伯伦，约翰：《告别改革：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兴起与消长》，芝加哥：四方图书公司，1965年。）

Chasan, Will: Samuel Gompers: Leader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蔡森，威尔：《塞缪尔·龚伯斯：美国劳工领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1年。）

Cochran, Thomas C. and Miller, Wilson: The Age of Enterpris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2.（科克伦，托马斯·C和米勒，威尔逊：《企业时代》，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2年。）

Coffman, Edward M.: The War to End All Wars, Oxford University, 1968.（科夫曼，爱德华·M：《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Commager, Henry: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88.（康马杰，亨利：《美国历史文献》，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88年。）

Cook, Luella B. et.: America Through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8.（库克，柳娜等：《透过文献看美国》，纽约：哈考特和布雷斯公司，1948年。）

Coolidge, Calvin: The Autobiography of Calvin Coolidge, Rutland, Vermott: Academy Books, 1984.（柯立芝，卡尔文：《卡尔文·柯立芝自传》，佛蒙特州罗特兰：学院书店，1984年。）

Cornbise, Alfred E.: War As Advertised: The Four Minute Men and America's

Crusade, 1917—1918,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4.（康伯斯，阿尔弗雷德·E:《众人注目中的战争：四个小人物和美国的改革运动，1917－1918》，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美国哲学学会，1984年。）

Cox, James M.: Journey Through My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6.（考克斯，詹姆斯·M:《岁月回想》，纽约：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46年。）

Cronon, E.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Selected Reading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65－1966.（克劳农，E·D:《20世纪美国选本》，伊利诺伊州荷姆伍德：约翰·多尔希出版公司，1965－1966年。）

Crunden, Robert Morse: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Helsinki, SHS, 1990.（克伦登，罗伯特·M:《美国文化简史》，赫尔辛基：SHS公司，1990年。）

Cuff, Robert D.: War Industries Board: Business － Government Rel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73.（卡夫，罗伯特·D:《战时工业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业界与政府的关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年。）

Cunliffe, Marcus: The Literature of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World Today Press, 1975.（坎利夫，马库斯：《美国文学》，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

Davis, Kenneth S.: FDR: The Beckoning of Destiny, 1882—1928: A History, New York: Putnam, 1971.（戴维斯，肯尼思·S:《富兰克林·D·罗斯福：命运的召唤，1882－1928：历史》，纽约：帕特南公司，1971年。）

De Witt, Benjamin Parke: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 Non － partison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urrent Tendenc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德威特，本杰明：《进步主义运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

Degler, Carl N.: Out of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 Harper & Row, New York, 1959.（德格勒，卡尔·N:《今从史出：形成当代美国的

力量》，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9年。）

Degler, Carl N.: The Age of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1876—1900, Scott, Foresman, Illinois, 1977.（德格勒，卡尔·N：《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伊利诺伊：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出版公司，1977年。）

Dementyev Igor: USA: Imperialists and Anti - Imperialists,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9.（德门特也夫，I:《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英译本，莫斯科：进步出版公司，1979年。）

Diamond, William: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3.（戴尔蒙特，威廉：《伍德罗·威尔逊的经济思想》，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43年。）

Divine, Robert, et.: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6.（戴维尼，罗伯特等：《美国今昔》，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出版公司，1986年。）

Dollar, Charles M. ed.: America: Changing Times, New York, Wiley, 1979.（多纳，查尔斯·M编：《美国：变动的时代》，纽约：威利，1979年。）

Du Bios: The Education of Black People,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3.（杜波伊斯：《黑人的教育》，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3年。）

Dubofsky, Melvyn: Industrialism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1865—1920,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75.（杜波斯基，梅尔文：《工业主义和美国工人：1865—1920》，伊利诺伊：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1975年。）

Dulles, Foster Rhea: 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 1898—1954,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54.（杜勒斯，福斯特：《走向世界霸权的美国：1989—1954年》，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4年。）

Eisenstedt, Abraham S.: American History (Since 1865), Vol.2, T.Y.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0.（艾森斯坦德，阿伯拉罕·S：《1865年以来的美国历史》第2卷，纽约：克劳维尔出版公司，1970年。）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The Annals of America (Vol.12), 1895—1904, Populism, Imperialism, and Reform Chicago, 1968.（不列颠大百科出版公司：《美国年鉴（第12卷）1895－1904，平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改革》，

芝加哥，1968年。）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The Annals of America* Vol.14, 1968.（不列颠大百科出版公司：《美国年鉴》第14卷，1968年。）

Ekirch, Arthur A., Jr.: *Progressitism in America: A Study of the Era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Viewpoints, 1974.（埃科克，小阿瑟：《美国的进步主义：西奥多·罗斯福至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研究》，纽约：观点出版社，1974年。）

Faulkner, Harold: *Politics, Reform and Expansion, 1890—1900*,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3.（福克纳，哈罗德：《政治、改革与扩张：1890—1900》，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9年。）

Faulkner, Harold: *The Decline of Laissez Faire, 1897—1917*, Harper & Row, New York, 1951.（福克纳，哈罗德：《自由放任主义的衰落：1897—1917》，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1年。）

Faulkner, Harold: *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 1898—1914*, New York, Collier - Macmillan House Inc.1972.（福克纳，哈罗德：《追求社会公正：1898—1914》，纽约：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2年。）

Ferrell, Roberth: *American Diplomacy, the Twentieth Century*, W.W.Norton & Company 1988.（范雷尔，罗伯茨：《美国20世纪的外交》，W.W.诺顿公司，1988年。）

Filler, Louis: *Crusaders for American Liberalism*, Yellow Springs, Ohio, Antioch Press, 1961.（菲勒，路易斯：《美国自由主义的斗士》，俄亥俄州：安提俄克出版社，1961年。）

Filler, Louis: *Progressivism and Muckraking*, New York, R.R.Bowker Co., 1976.（菲勒，路易斯：《进步主义和黑幕揭发》，纽约：R·R·鲍克公司，1976年。）

Fine, Sidney: *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费，悉尼：《自由放任与普遍福利国家》，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56年。）

Fine, Sidney and Brown, Gerald S.: *The American Past* Vol.2,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芬尼，悉尼和布朗，杰拉尔德：《美国历史》第2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年。）

Frazier, Thomas R. ed.: The Private Side of American History, Vol.2,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New York, 1987.（弗雷泽，托马斯·R:《美国历史的民间部分》第2卷，纽约：HBJ出版公司，1987年。）

Galbraith J.: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加尔布雷斯，J:《大崩溃：1929》，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88年。）

Garraty, John G. and Divine, Robert A.: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Opinions, Little, Brown & Company, Boston, 1968.（格拉蒂，约翰·A、戴维尼，罗伯特·A:《20世纪美国：当代文件和观点》，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1968年。）

Garraty, John: The American Nation since 1865, New York, 1966.（格拉蒂，约翰:《1865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纽约：1966年。）

Gelb, Joyce and Palley, Maria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5.（吉尔伯，乔伊斯和帕利，玛里安娜·L:《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和变化》，纽约：托马斯·Y·克劳维尔出版公司，1975年。）

Gorege, Henry: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Henry George School of Science, 1940.（乔治，亨利：《进步与贫困》，纽约：亨利·乔治科学院，1940年。）

Gerard, James W.: My Four Years in German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17.（杰拉尔德，詹姆斯·W:《我在德国的四年》，纽约：乔治·多兰出版公司，1917年。）

Ginger, Ray: Age of Excess, the U.S. from 1877 to 191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金吉尔，雷：《过剩的年代：1877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年。）

Goldman, Eric F.: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A History of Modern America Reform, New York, Knopf, 1952.（戈德曼，埃里克：《同命运的汇合：现代美国

改革史》，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2年。）

Gompers, Samuel: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Ithaca, New York: ILR Press, New York St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1984.（龚伯斯，塞缪尔：《生活和工作的70年》，艾沙卡，纽约：ILR出版公司，纽约州工业和劳工关系学校，康奈尔大学，1984年。）

Goodwyn, Lawrence: The Populist Mo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古德温，劳伦斯：《平民党时期》，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

Grab, Gerald N. et. e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II,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67.（格拉布等编：《美国历史的解释》第2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7年。）

Graham, Dewey: Theodore Roosevelt: Great Lives Observ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1.（格拉海姆，杜威：《西奥多·罗斯福》，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71年。）

Graham, Otis L., Jr.: The Great Campaigns: Reform and War in America, 1900—1928, New York, R.E.Krieger Pub.Co., 1980.（格拉海姆，小奥蒂斯：《伟大的运动：美国的改革和战争，1900—1928》，纽约：R·E·克里格尔出版公司，1980年。）

Green, William: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60,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8.（格林，威廉：《1860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

Gregor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71.（格雷戈里，罗斯：《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纽约，W.W. 诺顿公司，1971年。）

Grubbs, Frank L.: Samuel Gompers and the Great War: Protecting Labor' s Standards, Wake Forest, North Carolina: Meridional Publications, 1982.（格拉布斯，福兰克·L：《塞缪尔·龚伯斯和伟大的战争：保护劳工标准》，北卡罗来纳韦克·福雷斯特：玛丽蒂奥诺尔出版社，1982年。）

Haines, Gerald K. and Walker, J. Samuel Edite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Greenwood Press, Connecticut, 1981.（哈纳斯，G·K

和沃克，J.S. 编：《美国外交关系》，康涅狄格：格林伍德出版社，1981年。）

Handlin, Oscar: The Americans: A New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Brown & Company, Boston, 1963.（汉德林，奥斯卡：《美国人：新美国人民史》，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1963年。）

Haynes, John Earl: Calvin Coolidge and the Coolidge Era, Library of Congress 1998, Washington D.C.（海因斯，约翰·依尔：《柯立芝和柯立芝时代》，华盛顿D.C.：国会图书馆，1998年。）

Hays, Samuel P.: 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海斯，塞缪尔：《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

Hays, Samuel P.: 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 1885—191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7.（海斯，塞缪尔·P：《对工业主义的反应：1885—191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

Hendrick, Burton J., editor: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 Page,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5 - 1926.（亨德里克，伯顿编：《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生平与书信》。纽约：道布尔戴和佩奇出版公司，1925 - 1926年。）

Hofstadter, Richard: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霍夫施塔特，理查德：《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9年。）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New York, Knopf, 1955.（霍夫施塔特，理查德：《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5年。）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3.（霍夫施塔特，理查德：《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纽约：兰登出版社，1973年。）

Hofstadter, Richard e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63.（霍夫施塔特，理查德编：《进步主义运动，

1900—1915》，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63年。）

Huberman, Leo: *We, the People*, New York, Harper, 1947.（休伯曼，列奥：《我们美国人民》，纽约：哈珀出版公司，1947年。）

Hunter, Robert: *Poverty,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5.（亨特，罗伯特：《进步时代中的贫困与社会良心》，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5年。）

Hurd, Charles ed: *A Treasury of Great American Speeches*: *Our Country's Life and History in the Words of its Great Men*,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59.（赫德，查尔斯选编：《美国重要演说宝库》，纽约：霍索恩出版社，1959年。）

Johnson, Walter and Craven Avery and Dunn, F. Roger: *A Documenta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oston, Ginn Company, 1951.（约翰逊·华特等：《美国人民文献》，波士顿：吉恩公司，1951年。）

Kelley, Robert: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Past*, Vol.2,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6.（凯利，罗伯特：《美国过去的塑造》，第2卷，第4版，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公司，1986年。）

Kennedy, David M.: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肯尼迪，戴维·M：《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

Kirkland, Edward C.: *A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柯克兰，爱德华·C：《美国经济生活史》，纽约，1969年。）

Kolko, Gabrial: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柯尔可，加布里尔：《保守主义的胜利》，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3年。）

Lansing, Robert: *The 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35.（蓝辛，罗伯特：《罗伯特·蓝辛战争回忆录》，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公司，1935年。）

Laski, Harold J.: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An Interpretation*,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40.（拉斯基，哈罗德：《美国总统制》，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0年。）

Lawson, Kay: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co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8.（劳森，凯：《美国政党和民主》，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公司，1968年。）

Leckie, Robert: The Wars of America, The Harper & Row Company, New York, 1968.（莱基，罗伯特：《美国的战争》，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8年。）

Leuchtenberg, William E.: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1914—193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洛希滕伯格，威廉：《繁荣中的危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

Leviatin, David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How the Other Lives by Jacob A. Riis,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6.（利维廷，戴维编：《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6年。）

Levin, N. Gordo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8.（莱文，小戈登：《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政治：美国对战争和革命的反应》，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Link, Arthur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3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林克，阿瑟编：《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第30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

Link, Arthur S. & McCormick, Richard L.: Progressivism,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83.（林克，阿瑟和麦考密克，理查德：《进步主义》，伊利诺伊：哈兰·戴维逊公司，1983年。）

Link, Arthur 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10—1917,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3.（林克，阿瑟编：《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3年。）

Link, Arthur: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 New York, knopf, 1955.（林克，阿瑟编：《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

以来的美国史》，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5 年。）

Mack，*Raymond W. and Bradford*，*Calvin P.*：*Transforming America*，*Patterns of Social Change*，Random House，New York，1979.（麦克，雷蒙德·W 和布雷德福，卡尔文·P：《转变中的美国：社会变化模式》，纽约：兰登出版社，1979 年。）

Magill，*Frank N. ed.*：*Great Events From History*：*American Series*，Vol.2、3，Salem Press，Incorporated，New Jersey，1975.（马吉尔，法兰克·N：《历史大事记：美国》第 2、3 卷，新泽西：萨伦出版公司，1975 年。）

Mann，*Arthur ed.*：*The Progressive Era*，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曼，阿瑟编：《进步主义时代》，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1963 年。）

Markinnon，*Barbara*：*American Philosophy*：*A History Antholog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马金诺，巴巴拉：《美国哲学：历史文集》，纽约州立大学出版，1985 年。）

Marshall，*Richard E. and Wiltz*，*John Edward*：（*From Progressive Era to Normalcy*，J.B.Lippincott Company，1973.（马歇尔，理查德·E 等：《从进步主义时代到常态》，里平科特公司，1973 年。）

Marshall，*S. L. A.*：*The American Heritage History of World War I*，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4.（马歇尔，S·L·A：《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历史遗产》，纽约：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64 年。）

May，*Ernest R.*：*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Harper & Row，New York，1961.（梅，欧内斯特·R：《帝国民主：美国作为强国崛起》，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1 年。）

McDonald，*Forrest*：*The Torch is Passed*：*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Wayne State University，1968.（麦克唐纳，富里斯特：《传递的火炬：20 世纪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1968 年。）

Merk，*Fredrick*：*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Alfred A.Knopf，Inc.and Random House Inc.New York，1966.（默克，F：《美国历史上的天定命运和使命感》，纽约：阿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公司等，1967 年。）

Meyer, Adolphe Erich: An Educational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7.（迈耶，阿道夫·E：《美国人民教育史》，纽约：麦克格罗-希尔出版公司，1957年。）

Miller, Zane L.: Boss Cox's Cincinnati: Urban Polit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米勒，赞恩：《"老板"考克斯的辛辛那提：进步主义时代的都市政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Mock, James R.: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莫克，詹姆斯·R：《赢得战争的文字：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历史，1917—191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39年。）

Mohl, Raymond A.: The New City: Urban America in the Industrial Age, 1860—1920,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85.（莫尔，雷蒙德·A：《新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美国：1860—1920》，伊利诺伊：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1985年。）

Morison, Samuel Eliot: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ol.3,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New York, 1972.（莫里森，塞缪尔·埃利奥特：《牛津美国人民史》，第3卷，纽约：新美国图书出版公司，1972年。）

Morris, Richard B.: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2.（莫里斯，理查德·B：《美国历史大百科》，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72年。）

Mowry, George E.: 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merica, 1900—1912, New York, Harper, 1958.（莫里，乔治：《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与现代美国的诞生：1900-1912》，纽约：哈珀公司，1958年。）

Murray, Robert K.: The Politics of Normalcy: Government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arding-Coolidge Era,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73.（马瑞，罗伯特·K：《常态时期的政治：哈定-柯立芝时代的政府理论和实践》，纽约，W.W.诺顿公司，1973年。）

Myers, David R., ed.: Samuel Gompers, A Selected List of Reference About the

Man and His Time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6.（迈耶斯，戴维·R编：《塞缪尔·龚伯斯：有关他及其时代的参考书目选集》，华盛顿D.C.：国会图书馆，1986年。）

Nash, *Gerald*: *The Great Transition*: *A Short History of Twentieth – century America*,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1.（拉什，杰拉德：《伟大的转变：20世纪美国简史》，波士顿：艾林培根公司，1971年。）

Newbill, *James G. ed.*: *The American Spectrum*: *An Annotated Histor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California, 1971.（纽比尔，詹姆斯·G等：《美国历史注释本》，加利福尼亚：韦茨华斯出版公司，1971年。）

Noble, *David W.*: *The Paradox of Progressive Though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58.（诺布尔，戴维：《进步主义思想的矛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58年。）

Norton, *Mary Beth & Katzman*, *David M.*: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82.（诺顿，玛莉·贝斯和卡兹曼主编：《民族和国家：美国历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82年。）

Nye, *Russel B.*: *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 *A Historical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1870—1958*,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奈，拉塞尔：《中西部进步主义政治：起源和发展的一项历史研究，1870—1958》，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59年。）

O' Neil, *William L.*: *The Progressive Years*, *America Comes of Age*, New York, Dodd, Mead, 1975.（奥勒尔，威廉：《进步主义年代》，纽约：多德和米德公司，1975年。）

Pointer, *Nell Irving*: *Standing at Armageddon*: *the United States*, *1877—1919*, New York, W.W.Norton, 1987.（佩恩特，尼尔：《伫立在艾美吉登：1877—1919年的美国》，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87年。）

Pallack, *Norman*: *The Populist Response to Industrial America*: *Midwestern Populist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平民主义者对工业美国的反应：中西部平民主义思想》，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Palmer, *Frederick*: *John J. Pershing*, *General of the Armies*: *A Biography*, Har-

risburg, Pennsylvania: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mpany, 1948.（帕尔默，弗雷德里克：《约翰·J·潘兴将军传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军事服务出版公司，1948年。）

Parrington, Vern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帕林顿，弗伦：《美国思想的主流》，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7年。）

Parsons, Stanley B.: *The Populist Context: Rural Versus Urban Power on a Great Plains Fronti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3.（帕森斯，斯坦利：《平民党人视野：大平原边疆地区乡村权力与都市权力的对抗》，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3年。）

Paul, Rodman W.: *The Far West and the Great Pains in Transition: 1895—1900*, Harper & Row, New York, 1988.（保尔，罗德门·W：《远西部和大平原的转变：1895—1900》，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88年。）

Pease, Otis ed.: *The Progressive Years: The Spirit and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Reform*, New York, G.Braziller, 1962.（皮斯，奥蒂斯编：《进步主义年代》，纽约：G·布雷兹拉，1962年。）

Perrett, Geoffrey: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A Histor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82.（佩雷特，杰弗里：《20世纪美国史》，纽约：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2年。）

Pershing, John J.: *My Experiences in the World War*, Blue Ridge Summit, Pennsylvania: Tab Books, 1989.（潘兴，约翰·J：《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宾夕法尼亚：泰伯书店，1989年。）

Pomeroy, Earl S.: *Pacific Outpost: American Strategy in Guam and Micronesi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70.（波默罗伊，E.S：《太平洋前哨：美国在关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的战略》，纽约：拉塞尔出版公司，1970年。）

Porter, Glen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0.（波特，格伦：《美国经济史大百科》，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公司，1980年。）

Robinson, Corinne Roosevelt: *My Brother,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32.（罗宾逊，卡琳·罗斯福：《我的兄弟西奥多·罗斯福》，纽约：卡雷斯·斯克林纳之子出版公司，1932年。）

Romasco, *A.*: *Poverty of Abundance*: *Hoover*, *The Nation*, *The Depres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罗马斯科，A：《富足的贫困：胡佛、国家和经济萧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

Roosevelt, *Theodore*: *An Autobiograph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6.（罗斯福，西奥多：《自传》，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6年。）

Rosenberg, *Emily S.*: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New York, Hill & Wang Company, 1982.（罗森伯格，艾米里·S：《美国梦的传播：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扩张，1890—1945年》，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82年。）

Russell, *Francis*: *The Shadow of Blooming Grove*: *Warren G. Harding in His Times*, New York: MaGraw-Hill, 1968.（拉塞尔，弗朗西斯：《密林中的阴影：沃伦·G·哈定及其时代》，纽约：麦克格罗-霍尔，1968年。）

Schlesinger, *Arthur M.*: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22.（施莱辛格，阿瑟·M：《美国史新观点》，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2年。）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施莱辛格，小阿瑟·M：《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年》，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7年。）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Parties*, Vol.1,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0.（施莱辛格，小阿瑟：《美国政党史》，第1卷，纽约：切尔西·豪斯出版社，1980年。）

Sellers, *Charles and May*, *Henry and McMillan*, *Neil R.*: *A Synopsis of American History*,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1977.（塞勒斯，查尔斯等：《美国历史专题》，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1977年。）

Seymour, *Charles 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Arranged as a Narrati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6—1928*.（西摩，查尔斯编：

《豪斯上校秘密文件》，1914 年豪斯致威尔逊，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26—1928 年。）

Shannon，*David*：*20th Century America*，*The Progressive Era*，Chicago，Rand McNally College Pub.Co.，1974.（香农，戴维：《20 世纪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公司，1974 年。）

Simkhovitch，*Mary*：*Neighborhood*：*My Story of Greenwich Hous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38.（希姆可维奇：《邻里之谊：我在格林威治事务所的故事》，纽约：W.W. 诺顿公司，1938 年。）

Sinclair，*Andrew*：*The Available Man*：*The Life Behind the Mask of Warren Gamaliel Harding*，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5.（辛克莱，安德鲁：《沃伦·加莫里尔·哈定面具后的生活》，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 年。）

Snowman，*Daniel*：*America Since 1920*，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8.（斯诺曼，丹尼尔：《1920 年以来的美国》，伦敦：海内曼教育图书公司，1978 年。）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York，1961.（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至今》，华盛顿 D.C.，1961。）

Stearn，*Gerald Emanuel*：*Gompers*，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1971.（斯蒂恩：杰拉尔德·伊曼纽尔：《龚伯斯》，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71 年。）

Sullivan，*Mark*：*Our Times*：*1900—1925*，6 Vol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1935.（沙利文，马克：《我们的时代：1900—1925.），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1927—1935 年。）

"*The Harding Era*：*Warren G.Harding and his Administration*，Minni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9.（《哈定时代：沃伦·G·哈定及其政府》，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69 年。）

Thelen，*David P.*：*Robert M.LaFollette and the Insurgent Spirit*，Little，Brown & Company，Boston，1976.（希伦，戴维：《罗伯特·拉福莱特与反叛精神》，波士顿：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76 年。）

"*Titles in the Oceana Presidential Chronology Series*: *Warren G. Harding*, Oceana Publications Inc.1970.（《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沃伦·哈定》，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年。）

"*Titles in the Oceana Presidential Chronology Series*: *Calvin Coolidge*, Oceana Publications Inc.1970.（《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卡尔文·柯立芝》，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年。）

Trask, *David F.*: *Captains & Cabinets*,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2.（特拉斯克，戴维·F：《首领和内阁》，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72年。）

Trattner, *Walter I.*: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89.（特拉纳，华尔特·I：《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9年。）

Tumulty, *Joseph P.*: *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1.（图马尔蒂，约瑟夫：《我所认识的伍德罗·威尔逊》，纽约：道布尔戴公司，1921年。）

Vandiver, *Frank*: *Black Jack*: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J. Pershing*,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77.（凡蒂佛，富兰克：《约翰·J·潘兴的生活及其时代》，学院研究所，得克萨斯A和M大学出版，1977年。）

Vatter, *Harold G.*: *Drive to Industrial Maturity*: *the U.S. Economy*, *1860—1914*, Greenwood Press, Connecticut, 1975.（瓦特，哈罗德·G：《驱向工业成熟：美国经济1860—1914》，康涅狄格州：格林乌德出版社，1975年。）

Wald, *Lillian*: *The House on Henry Street*, New York, H.Holt and company, 1915.（沃尔德，莉莲：《亨利街事务所》，纽约：H·豪尔特公司，1915年。）

Wall, *Joseph Franzier*: *Andrew Carnegie*,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9.（华尔，约瑟夫·F：《安德鲁·卡内基》，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9年。）

White, *Morton*: *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 Beacon

Press, Boston, 1957.（怀特，莫顿：《美国社会思想：叛离形式主义》，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7年。）

White, William Allen: A Puritan in Babylon: The Story of Calvin Coolidge,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atterson Simth, 1973.（怀特，威廉·艾伦：《巴比伦的清教徒：卡尔文·柯立芝的故事》，格劳斯特，马萨诸塞：帕特森·史密斯，1973年。）

Wiebe, Robert H.: 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韦尔伯，罗伯特：《企业家与改革：进步运动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Wiebe, Robert H.: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韦尔伯，罗伯特：《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67年。）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W.W.Norton & Comnpany, 1988.（威廉姆斯，威廉·阿普曼：《美国外交的悲剧》，W.W.诺顿公司，1988年。）

Willis, F.Roy: Western Civilization: An Urban Perspective（Vol.2）D.C.Heath and Company, Massachusetts, 1977.（维利斯，F·R：《西方文明：城市视角》，第2卷，马萨诸塞：希斯出版公司，1977年。）

Wilson, Jackson: Reform, Crisis and Confusion, 1900—1929,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杰克逊，威尔逊：《改革、危机和混乱，1900—1929年》，纽约：兰登出版社，1970年。）

Wilson, Woodrow: New Freedo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3.（威尔逊，伍德罗：《新自由》，纽约：道布尔戴和佩奇公司，1913年。）

Woodward, C.V.: The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1913,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1.（伍德沃德，C·V：《新南部的起源，1877—1913》，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51年。）

Wright, Louis B. and other editors: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 Short American Histor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Illinois, 1968.（赖特，路易·B等：

《民主的经历：美国简史》，伊利诺伊：斯各特和福雷斯曼出版公司，1968年。）
Wynn, Neil A: *From Progressive to Prosperity*,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1986.（温，内尔：《从进步主义到繁荣》，霍姆斯和迈耶尔出版公司，1986年。）
2. **中文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2。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埃默里，埃德温等：《美国新闻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2。
艾捷尔，J编、赵一凡等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
巴兰，保罗和斯威尔，保罗：《垄断资本》，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
贝拉米：《回顾》，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
比林顿，雷·艾伦：《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
比米斯，S·F：《美国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彼尔斯，尼尔·R和哈格斯特洛姆，杰里：《美国志——五十州现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伯恩斯，詹姆斯·M等：《美国式民主》，中译本，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伯恩斯，詹姆斯等：《民治政府》，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布尔斯廷，丹尼尔·J：《美国人：南北战争以来的经历》，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布莱克，纳尔逊·曼弗雷德：《美国社会生活和思想史》，下册，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布里登堡：《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7。
布卢姆，J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
曹绍濂：《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
邓蜀生：《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
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杜蒙德，德怀特·L：《现代美国：1896—1946》，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
范斯科德，理查德·C等人：《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方纳，埃里克编：《新美国历史》，中译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方纳，菲利普编：《华盛顿文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
菲特，吉尔伯特·C和里斯，吉姆·E：《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
弗里德古德，莉莲：《美国画家》，中译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福克纳，H·U和沙伊贝，H·G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龚维敬：《美国垄断资本》，人民出版社，1986。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美国经济概况》，人民出版社，1976。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
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霍夫施塔特，理查德：《改革时代》，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科学技术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社会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文化教育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文学艺术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普洛：《美国社会发展趋势》，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凯南，乔治·F、葵阳等译：《美国外交》，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康马杰，H·S：《美国精神》，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考利，马尔科姆：《流放者的归来》，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柯恩编：《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柯里，罗伊·沃森：《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科利尔，彼得和霍罗维兹：《美国楷模》，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
库钦斯基，于尔根：《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与对比》，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拉齐尔，泽夫：《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拉维奇，戴安娜：《美国读本》，中译本，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1973。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李道揆：《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人民出版社，1985。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林顿，加尔文·D：《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林广、张鸿雁：《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林克，阿瑟和卡顿，威廉：《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刘保端译：《美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陆镜生编著：《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罗伯逊，詹姆士·O：《美国神话美国现实》，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马伯格，克拉夫：《美国文化的经济基础》，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马格多夫，哈里《帝国主义时代》，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5。
麦格劳，托马斯·K：《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
米尔斯，赖特：《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莫里森，塞缪尔和康马杰，亨利：《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莫鲁瓦，安德烈：《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帕特森，托马斯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佩尔斯，理查德·H、卢允中等译：《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契格达耶夫，阿：《美国美术史》，中译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塞尔，柯克帕特里克：《权势的转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
塞利格曼，本·巴鲁克：《美国企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施莱辛格，小阿瑟主编：《美国共和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施莱辛格，小阿瑟主编：《美国民主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施瓦茨，伯纳德：《美国法律史》，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斯坦，赫伯特：《美国总统经济史》，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斯特普尔斯，康纳德·伊主编：《美国电影史话》，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索贝尔，罗伯特和西西利亚，戴维·B：《企业家：美国人的创业精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瓦里美，格雷厄姆：《爵士乐》，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王绳祖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王铁崖选译：《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1982。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王晓德：《梦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威尔逊，伍德罗：《国会政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
威什，哈维：《美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史》，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民国70年）。
韦尔：《美国政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
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下册，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休斯，H·S：《意识与社会：1890至1930年欧洲社会思想的新取向》，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民国74年）。
杨令侠：《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史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杨生茂、林静芬主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
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
俞吾金：《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世界经济百科全书》，1987。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译丛（史学专号）》，1982。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祖波克：《美国史纲》，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索　　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C

D

G

M

N

P

Q

R

S

T

W

Y

Z